陕西地情丛书

陕西帝王陵墓志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帝王陵墓志 / 徐卫民主编 ;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编 .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 2017.10

ISBN 978-7-5518-1406-5

Ⅰ . ①陕… Ⅱ . ①徐… ②陕… Ⅲ . ①陵墓 – 介绍 – 陕西 Ⅳ . ① 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4172 号

陕西帝王陵墓志

徐卫民　主编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编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中煤地西安地图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7.75

字　　数　65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18-1406-5

定　　价　198.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陕西帝王陵墓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秦向东

副主任　史天社　吴玉莲　李保国　张世民

委　员　李　川　李洪林　鲁　文　王　斌

郑茂良　肖成刚

《陕西帝王陵墓志》编辑部

主　编　徐卫民

编　辑　丁晓雯　王双怀　王社教

贾志刚　王世平　肖健一

审定单位

初　审　西北大学

终　审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序　言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中心，历史上先后有 14 个王朝在陕西建都。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辉煌的地方，既出现了传说时期的黄帝、炎帝这样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涌现了历史时期的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等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按照“陵随都移”的规律，历代的帝王们一定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陕西。古代帝王的陵墓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营建的，是当时社会的具体反映。

“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帝陵数量和密集度也为全国之最。俗语云：“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充分反映出陕西帝王陵之多及影响之大。帝王陵墓是中国古代帝王留给后代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帝王陵地上、地下宫殿中随葬品应有尽有。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陵，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会来到这里表达祭祀与敬仰；千古一帝秦始皇的陵墓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地下埋藏，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9 座汉唐帝陵迄今巍然屹立在渭河以北的高原上，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被誉为中国的“金字塔”。陕西古代帝王陵，民间有“七十二陵”之说。除了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轩辕黄帝陵外，经田野调查能基本确定的有 42 座。还有些帝王虽未确定墓冢，但多方面考察确认葬在陕西。

帝王陵是我们的民族瑰宝，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文化遗产。古代建造帝王陵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帝王陵也就成了展现国家实力和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载体，充分体现出我国不同时代物质文

明的发展水平，也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因而探寻帝王陵墓的秘密，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陵墓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门类，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地面上的古建筑往往会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收集与研究。而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因为其终年“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科学、艺术等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陕西帝王陵在中国帝王陵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珍贵性，同时也看到了保护帝王陵的紧迫性，所以组织编纂了《陕西帝王陵墓志》。这是陕西地情丛书的一项重大成果，是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探索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修志的一次有益尝试，是进一步拓宽合作领域，深入挖掘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创新示范。希望通过志书的形式，整合帝王陵墓发掘研究资料，为陕西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助力陕西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建设。

是为序。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秦向东

2017 年 9 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系统地记述陕西帝王陵墓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收录陕西境内现存的古代帝王的陵墓，其时限从史前时期到明代。为了展现陕西帝王陵的全貌和资料的全面性，传说时期的黄帝陵、炎帝陵以及秦国在陕西的公王陵和明代秦藩王墓也收录在列。资料断限为2016年底。

三、本志为章、节、目结构，层层相辖，先后相因。采用述、志、图、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相辅。各章内容一般依时代或类别分目。

四、本志分先秦时期的帝王陵、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帝王陵、隋唐时期的帝王陵、明代秦藩王墓。个别号墓为陵的王陵和列入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上的王陵则以附录的形式记述。

五、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均用当时的习惯称谓。志中对古地名加注今名，对历史纪年注明公元年代。历史纪年用汉字数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西汉元狩六年（前117）。

六、凡表示数量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语、成语、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数字。

七、本志原则上使用国务院1986年10月正式公布的《简化字总表》。涉及古代文献的有关章节中的古文字使用繁体字或依其原貌记述。

八、表述方式用现代汉语语体文，文字力求准确、明晰、简洁、通畅。使科学性、资料性、专业性与可读性相结合。

九、本志参照国家有关规范，采用页下注的形式。

十、本志采用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古代有关著作、国内外公开发表的专著或论文以及志稿撰写人长期对陕西帝王陵墓考察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目 录

序 / 001

凡 例 / 003

概 述 / 001

第一章 先秦帝王陵 / 015

第一节 黄帝陵 / 019

第二节 炎帝陵 / 028

第三节 西周王陵 / 035

第四节 秦国公王陵 / 048

第二章 秦代帝陵 / 079

第一节 秦始皇帝陵 / 082

第二节 秦二世皇帝陵 / 139

第三章 西汉帝陵 / 143

第一节 汉高祖刘邦长陵 / 156

第二节 汉惠帝刘盈安陵 / 169

第三节　汉文帝刘恒霸陵 / 178
第四节　汉景帝刘启阳陵 / 188
第五节　汉武帝刘彻茂陵 / 207
第六节　汉昭帝刘弗陵平陵 / 237
第七节　汉宣帝刘询杜陵 / 247
第八节　汉元帝刘奭渭陵 / 261
第九节　汉成帝刘骜延陵 / 277
第十节　汉哀帝刘欣义陵 / 291
第十一节　汉平帝刘衎康陵 / 302
第四章　十六国北朝帝王陵 / 315
第一节　前赵刘渊永垣陵 / 320
第二节　前秦苻坚墓 / 323
第三节　后秦姚苌原陵 / 325
第四节　后秦姚兴偶陵 / 326
第五节　大夏赫连勃勃嘉平陵 / 327
第六节　西魏元宝炬永陵 / 329
第七节　西魏宇文泰成陵 / 332
第八节　北周宇文邕孝陵 / 334
第九节　北周宇文阐恭陵 / 337

第五章　隋代帝陵 / 339

第一节　隋文帝泰陵 / 341

第二节　隋炀帝陵 / 348

第三节　隋恭帝庄陵 / 353

第六章　唐代帝陵 / 357

第一节　唐高祖献陵 / 364

第二节　唐太宗昭陵 / 373

第三节　唐高宗、武则天乾陵 / 397

第四节　唐中宗定陵 / 440

第五节　唐睿宗桥陵 / 446

第六节　唐玄宗泰陵 / 456

第七节　唐肃宗建陵 / 462

第八节　唐代宗元陵 / 467

第九节　唐德宗崇陵 / 472

第十节　唐顺宗丰陵 / 476

第十一节　唐宪宗景陵 / 480

第十二节　唐穆宗光陵 / 485

第十三节　唐敬宗庄陵 / 490

第十四节　唐文宗章陵 / 493

第十五节　唐武宗端陵　/ 496
第十六节　唐宣宗贞陵　/ 500
第十七节　唐懿宗简陵　/ 506
第十八节　唐僖宗靖陵　/ 510
第七章　明代秦藩王墓　/ 529
第一节　秦愍王朱㮮墓　/ 532
第二节　秦隐王墓 、秦康王墓、秦惠王墓　/ 539
第三节　秦简王墓、秦宣王墓、秦世子墓　/ 544
附　录　/ 549
编后记　/ 589

概　述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中心之所在。自西周建立至唐灭亡的近两千年间，先后有 14 个王朝在陕西建都。按照“陵随都移”的规律，帝王陵是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城在陕西，帝王们一定会把自己的归宿地陵墓修在陕西。因此陕西有 80 余座帝王陵，被称为“东方帝王谷”，比著名的“埃及帝王谷”的数量还多，属世界第一帝王谷。这里位于诞生人类文明的北纬 34° 线，作为人类文明中唯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发祥地，埋藏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基因密码。这些帝王们生前叱咤风云、留下英名，希望死后仍然像生前一样，继续统治着地下世界。因此历史上的周、秦、汉、隋、唐既为陕西创造了辉煌的地上文化，也为陕西创造了辉煌的地下文化。

陕西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辉煌的王朝都城所在地，既出现了传说时期的黄帝、炎帝这样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也涌现了历史时期的周文王、周武王、秦始皇、汉武帝、汉宣帝、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等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

俗语云：“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这充分反映出陕西帝王陵的影响之大。 这众多的帝王陵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黄帝陵成为中华民族的祖陵，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来到这里祭祖。1987 年，秦始皇陵以其深邃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地下埋藏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单位之一。还有 29 座汉唐帝陵像金字塔一样迄今巍然屹立在渭河南北，吸引着世界各地人们的目光。

“秦中自古帝王都，陕西文物甲天下。”帝王陵墓是中国古代帝王留给后代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帝王陵墓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要求营建的，帝王陵地上、地下宫殿中随葬品应有尽有，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尽管由于古代社会所发生的众多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地上与地宫中的文物大多被盗掘，地面上雄伟建筑也大多荡然无存，但是通过考古勘探与发掘，陕西古代帝王陵仍然为复原中国古代的社会状况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图 1　黄帝陵外景　（编写组供稿）

一、陕西帝王陵概况

帝王陵的构造，大体上分地上和地宫两大部分。

地上部分，早期如西周到春秋早期是“不封不树”的，即地面没有陵丘封土等标记，但有供祭祀的享堂之类建筑，称为“享堂墓”，因为年代久远，现地面已很难找到遗迹。正因为如此，西周的天子墓到目前还没有找到。

秦国国君的墓葬排列比较清楚，从雍城陵区来看，已经发现了 22 个“中”字形大墓，栎阳的秦公陵区按照史书记载，已经出现了高大的封土墓，到惠文王和武王墓，由于国家实力日益强大，国君的墓葬形制已经由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变成了四个墓道的“亞”字形，这在当时是僭越行为。到了秦昭襄王时，陵寝建筑开始出现在封土周围。到秦始皇陵时，更出现空前绝后的巨大封土陵丘，设计高度达 50 丈，至今残高仍有 70 余米。秦的陵墓都修建有围沟或者夯土墙，作为防护或者与陵区的区分。

汉代的 11 个帝陵巍然屹立在长安城的周边，像一座座巨型金字塔。汉景帝阳陵封土周围有众多的陪葬坑和陪葬墓，俨然是把生前汉长安城的各个部门搬到了地下，以达到继续统治天下的目的。从高祖长陵开始都修建有高大的封土，汉文帝霸陵则是“以山为陵”。

十六国北朝时期帝王墓葬有的有封土，有的则无。墓而不坟、“不封不树”的做法是北

周陵寝的做法。武成二年（560）明帝宇文毓遗诏中有“……葬日，选择不毛之地，因地势为坟，勿封勿树”的内容。1993 年发掘的谯王宇文俭（武帝之弟）墓志中也写道：“其年（建德七年即 578 年）三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葬于雍州泾阳县西乡始义里，率由古礼，不封不树。”其墓上也确未发现封土。由此可见，北周皇帝和皇族成员的陵墓“不封不树”即便不是一种制度也很可能是一种惯例。

唐代位于陕西的 18 座帝陵气势雄伟，大多以山为陵，其规制也是模仿首都长安，以乾陵最典型，有内城、外城之分。

秦始皇陵的建筑是十分雄伟的，有呈“回”字形的两重城垣，四角有角楼；汉代帝陵的保护措施既有城墙也有围沟；隋唐时期的帝陵大多修有围墙。

帝王陵园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礼制建设的，因此生前都城中有的，在陵园中多有体现。有多种功能性的建筑，包括寝殿、便殿、门阙、宫墙、礼制建筑、陪葬坑、陪葬墓等。秦汉时期，这种形制进一步明确，而且开始在陵园以外建设陵邑，作为陵墓的附属机构。现秦始皇陵西门阙，汉景帝阳陵南门阙、东门阙，乾陵的南神门阙等遗址已经发掘，均呈现出三出阙的形态，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蔚为壮观。

陵园中设置寝殿、便殿、庙是为了祭祀的需要。最早的寝殿发现于战国时期的秦东陵。证明蔡邕《独断》中记载的“古不墓祭，秦始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是错误的。汉唐帝王陵墓中也均有寝殿、便殿。《汉书》中记载：“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后汉书》载：“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秦始皇陵寝便殿在陵园内，西汉初年帝陵寝殿大多建在陵园里，高祖和吕后陵的寝殿就在陵墓的一侧。从景帝阳陵开始，寝殿移到陵园以外，一般在帝陵东南，独立成园。目前尚存建筑遗迹的有景帝阳陵和武帝茂陵，两陵寝殿均在陵园外东南方。而经过钻探和发掘的宣帝杜陵和王皇后的寝园均在陵园南侧。

汉代建有陵庙，以供奉皇帝“神主”。《汉书·韦贤传》载：“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陵庙的规模很大，周围筑有墙垣，内有正殿、殿门和阙等建筑。陵庙的修建位置并不一致，汉代初期的陵庙并非建在陵园附近，如高祖的高庙就建在汉长安城中，惠帝的陵庙建在高祖庙西侧，文帝的顾城庙在长安城南。之后陵庙建于陵园附近，如武帝的龙渊庙、昭帝的徘徊庙均在茂陵和平陵东，宣帝乐游庙在杜陵东北，元帝



图 2　秦始皇陵封土　　（编写组供稿）

长寿庙在渭陵西北。陵庙与陵墓的距离远近不一，远者几里，近者几百米。庙寝之间修建“衣冠道”。当时祭庙活动非常频繁，除月祭外，各主要节气庆典都要举行仪式，将衣冠由寝殿迎入庙内，接受祭祀。文武大臣遇到重要事情，也要参谒陵庙。

《礼记·檀弓》上说：“土之高者曰坟，葬而无坟谓之墓。”古人自从迷信灵魂不死以后，凡事都要先向祖先祈祷，在庙堂祷告总不如直接到墓前祷告好，为了更方便辨认出祖先墓穴的位置，他们就在墓穴的上面垒土或者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记载了一段孔子寻找父母之墓的故事。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成人后想去祭祀父亲时，却找不到墓地，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费尽功夫才找到了。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为了方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祖先，他就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孔子说：“古也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在墓穴的表面垒土种树，开始是为了辨识墓穴的位置，但后来就变成了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标志。《周礼》记载：“以爵等为封丘之度，与其树数。”就是说，按照官位的等级来定封土的大小高度和种植树木的种类、数量。墓上开始出现封土，这是墓葬制度上的一大变化。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冢墓的出现在秦献公时期。《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殿。”何为冢呢？扬雄《方言》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礼》也云：“冢，封土为丘垅象冢而为之。”说明献公、孝公陵上已开始筑起封土了。随着墓葬封土的普及与发展，封土堆逐渐变得高大起来，形状好似山丘，因此墓葬的名称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各类墓葬统称为“墓”，到了战国时出现了“陵”“冢”“坟”“丘”等多种名称。秦的陵墓就经过了“墓”“陵”“山”的演变过程，秦始皇陵原名称为“丽山”，以显示其高大雄伟。后来就有了以山为陵的冢墓，



到唐代发展到极致。

从秦始皇陵开始，陵墓制度发生了诸多变化，陵园地上已经出现了石像生，如石麒麟等，在《西京杂记》中有记载。秦始皇陵石料加工厂的发现也提供了佐证。到西汉武帝茂陵时，在陪葬墓霍去病墓上出现大量石刻，即著名的霍去病墓石刻，大多为国宝级的文物。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一些帝王陵上也有石刻，从唐代开始，帝陵前甚至陪葬墓前列置石刻，已成为定制或惯例。其中以乾陵石刻规模最大、保存数量最多，包括石柱、翼马、鸵鸟、仗马、石人、石狮、六十一宾王等，总计120余件；桥陵石刻也颇为壮观，是古代中国最优秀的石刻作品之一，号称“桥陵石刻甲天下”。

在帝王陵园中都设置有众多的陪葬坑与陪葬墓。从秦始皇陵开始，陪葬坑中出现大型陶俑军阵，汉代帝陵得到继承与发展，出现了众多的军阵陪葬。西汉各帝陵都有很多陪葬墓，



图3　汉武帝茂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成为陵寝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帝陵以东司马门外神道两侧，少数在帝陵以北，形成很大的陪葬墓地。这种布局颇似诸侯和大臣朝谒天子。据文献记载，长陵陪葬者有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人，都是汉王朝的开国元勋、文武重臣，至今地面上还保留有30余个高大的坟丘。坟丘多为南北向排列并成组分布，每一组内大多成对排列。陪葬墓附近还有园邑、祠堂之类建筑。陪葬于茂陵的有霍去病、卫青、金日磾、霍光、董仲舒、公孙弘等，多为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宣帝以后各陵的陪葬者则以外戚或者宦官为主。宣帝杜陵陪葬墓已发现107座，分为东南与东北两个区，每个区内又有成组的墓群，但见于文献记载的陪葬大臣只有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丙吉、卫尉金安上和中山哀王刘竟数人。其中，张安世的墓园已考古发掘，墓园规模庞大，有祠堂等建筑遗址。

陵邑的设置始于秦始皇陵设置的丽邑。汉承秦制，由汉初至汉元帝下诏罢置陵邑止，其间各陵都设陵邑。陵邑的作用一是供奉陵园，二是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以便强本抑末、巩固中央集权统治。陵邑大多数分布在帝陵以北、以东。初时相距甚近，从文帝开始距离加大，少者一二里，多者五六里。据文献记载，各陵邑的人口大约为3～5万户，其中许多户属豪强大族，他们广蓄奴婢，因此成为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陵邑的人口成分构成也比较复杂，达官显贵、学者文人、俳优世家、市井子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社会生活。

汉代帝后合葬，但同茔而不同穴，所以后陵多在帝陵之旁，坟丘较帝陵为小。但也有特例，如吕后陵的封土高低大小几与长陵相同。后陵大多位于帝陵之东，如西汉长陵、阳陵、平陵和杜陵。个别也有葬在帝陵之西的，如武帝的李夫人陵、元帝的王皇后陵等。

帝王陵的地宫部分，因现在发掘的极少，故不能详知具体情况。从已经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看，其墓穴为一逐渐收分的敞开式竖穴大坑，规模十分惊人，东西两端有倾斜的墓道，墓葬形制呈“中”字形状，长达300米，深24米。棺椁和诸多陪葬品安放好以后，再加木结构棚架并填土，最后封平地面。棺椁为木制，有代表古代最高级葬式的“黄肠题凑”形制。从秦惠文王开始，秦王陵开始出现“亞”



图4 唐睿宗桥陵神道西侧石兽 （摄影：郑茂良）

字形墓葬，即四个墓道，这在当时就是最高级别的墓葬，按照礼制是周天子才可以享用的，然而秦由于国力的强大和好大喜功，周天子仅成为名义上的共主，所以秦王陵开始使用这种形制。秦始皇陵地宫主体东西长 170 米、南北宽 145 米，开挖范围和墓室均呈长方形。在墓圹边沿建造有一圈巨大而且精细的夯土宫墙，高出地面竟达 30 米，顶部距封土表面最浅处只有 1 米左右[①]。这一围绕墓室筑就的细夯土墙，在所有其他陵墓中从未发现过，无疑是秦始皇陵的一个创举。

汉代的帝陵地宫形制和秦陵一样，也是“亞”字形。隋唐帝陵地宫改变了秦汉时期的墓葬形制，实行“以山为陵”的洞室墓。唐代葬制不像汉代，一些皇后不再单独起陵，而是与皇帝共葬于一个墓穴当中。

北周武帝孝陵是经过考古发掘的，其墓葬形制、规模、随葬的物品与已发掘的其他北周中、大型墓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显示出较多的一致性。其一，均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或有壁龛）、土洞墓室；其二，墓室多有后室、后龛或侧室；其三，多无地面石刻（只有尉迟运墓例外）；其四，随葬物品中均有大量造型风格相同、大小相若的半模陶俑，陶俑的种类和组合也大体相同。这些一致性应为北周大、中型墓葬的一般特征[②]。

唐陵的地宫形制也不相同，大体布局为在山陵南坡开凿墓道，根据情况建地宫。以昭陵为例，据文献记载：自山南边开墓道，寝宫深 75 丈，有石门五重。一般在安葬完毕后用巨石封口，石块之间相互铆死，缝隙用铁水浇灌，因此异常坚固。靖陵是唐僖宗李儇的陵墓，是关中唐十八陵中年代最晚的一座，也是唐陵中唯一一座进行全面考古发掘的帝王陵。由于该陵多次被盗，破坏严重，1995 年经陕西省文物局批准，由省、县文物部门进行科学发掘。该陵地宫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出土文物百余件，主要有石碑、石函、龙凤玉璧、玉佩、哀册玉残片、鎏金铜锁、鎏金宝石铜花等。

秦汉隋唐时期，盛行厚葬制度，因此，帝王陵随葬品极为丰富，玉器、金银器、铜器等精美的随葬品应有尽有。雍城的秦公一号大墓历史上尽管有 200 多次的盗掘，仍然发现了 3500 多件文物，而且不乏玉器和金银器。在被盗掘的秦东陵追回文物中还有精美的漆器。秦始皇陵的陪葬品更为丰富多彩，不仅有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兵马俑，还有被称为“青

①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2 期。

铜之冠”的铜车马，其地宫中的藏品更是令人称羡。汉景帝阳陵已经出土了众多的陪葬品及形象精美的陶俑群，汉武帝茂陵陪葬坑出土的文物更为精美，有鎏金铜马、青铜犀尊和四神玉铺首等。唐代帝陵出土的唐墓壁画以风格独特的建筑、简约传神的人物、特色鲜明的器物、简洁明快的山水与栩栩如生的动植物，描绘了当时的礼仪规范、生活习俗、服饰特色、娱乐方式与建筑风格，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贵族生活和精神追求的真实资料。

二、陕西帝王陵的数量与规模

陕西古代帝王陵，民间有七十二陵之说。有关部门和专家认为，除中华民族公认的始祖轩辕黄帝陵外，经田野调查能基本确定的有 44 座，即春秋战国时代的秦景公、秦惠文王、秦悼武王、秦昭襄王、秦孝文王、秦庄襄王 6 陵；秦朝秦始皇、秦二世 2 陵；西汉 11 个皇帝陵；十六国至北朝时前秦苻坚、大夏赫连勃勃、西魏元宝炬、北周武帝宇文邕、北周静帝宇文阐各 1 陵；隋代文帝杨坚泰陵、隋恭帝庄陵；唐 18 个帝陵。还有虽未确定墓冢，但经多方面考察确认应葬在陕西的，有西周 13 位帝王中的 7 位，秦 23 位秦公，前秦的高祖苻健，后秦的太祖姚苌和高祖姚兴，北魏的孝武帝元修，西魏的恭帝元廓，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和宣帝宇文赟，共计 38 位。以上合计 82 座帝王陵。目前已正式发掘或局部试掘的有春秋战国时期秦公一号陵墓；秦代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百戏俑坑、青铜水禽坑等；西汉阳陵阙址、从葬坑、礼制建筑遗址，茂陵陪葬坑，杜陵陵园遗址等；北周武帝孝陵；唐代的乾陵羡道、三出阙遗址、陪葬墓，昭陵的陪葬坑等，让皇帝惠陵、唐僖宗李儇靖陵等。

古人相信人死后灵魂长生不灭，主张“事死如事生”，因而人死后的另一个世界的物品也应极为丰富，作为古代的最高统治者的帝王，陪葬品更应应有尽有。古代帝王陵是最重要的国家工程，一般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来监督修建，由少府、太常等机构进行管理。秦王嬴政 13 岁刚一即位就开始修建陵墓，并且动用了多达 70 万人，修了近 40 年还没有修完，陵园面积达 56 平方公里有余，要不是秦的迅速灭亡，秦始皇陵还会继续修建，不断扩大。西汉时的帝陵规模、营建费用也很大，据《汉旧仪》记载：

> 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



图 5　隋文帝泰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

《晋书·索靖列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帝陵一般从新皇帝登基的第二年就开始建设，要耗用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因而汉武帝在位 54 年，他的茂陵就修建了 53 年，到晚年他人虽还健在，茂陵地宫内的陪葬品却已塞得满满的了，其陵园面积达 60 平方公里。唐代是中国陵寝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唐代帝陵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高峰时期墓葬制度的代表，也是唐王朝兴衰历程的见证。唐太宗昭陵陵区范围竟达 200 平方公里，由此可以看出陕西帝王陵园气势宏伟，建筑布局严谨，随葬品丰富，蕴涵着极高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陕西众多帝王陵中现有世界文化遗产 1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7 处。

从陕西古代帝王陵的分布看，绝大多数位于关中，主要围绕着古都长安；在关中又主要分布在渭河以北，著名的西汉九陵、唐十八陵都是如此。

2013 年，由百位媒体记者、旅行社负责人、资深旅行家投票评选的“中国最恢宏的十大帝王陵墓”中，陕西省黄帝陵名列榜首。一并当选的陕西帝王陵墓还有秦始皇陵、桥陵、茂陵、乾陵和汉阳陵。可见陕西帝王陵的影响之大。

三、陕西帝王陵的选址和营建

帝陵建设既然是国家重点工程，必然是由朝廷重臣领衔挂帅，并由最优秀的建筑师、礼



图 6　唐高宗乾陵　　（编写组供稿）

仪专家、艺术家和堪舆师团队负责选址和工程设计的。选址是重中之重，其过程非常复杂。选址的重点首先是考虑风水，即周边的自然环境，包括地理、地质、土壤、水文等方面的因素，但同时也须考虑陵址对国家、民族的长远影响，以及政治、军事、交通等多重因素。背山面水、地形高敞是帝王陵的必选因素。

秦始皇陵一墓独尊，南依骊山，北邻渭河，山水地形俱佳。西汉十一陵分别位于高大的咸阳原、白鹿原和少陵原上，地势高敞，山水相依。唐代的帝陵大多依山为陵，气势雄伟高大。可以看出秦汉唐时期的帝王陵选址既考虑到优越的山水地形环境，同时也考虑到帝王的私人爱好、交通等因素。

帝王陵的营建过程更是令人震惊，高大的封土显示出王权与皇权的威严，地下宫殿象征着生前的皇宫，陪葬品应有尽有。从西汉霸陵“依山为陵”开始，唐十八陵中就有 14 座是“依山为陵”，这一数字和比例超过任何其他帝陵组群，这里有其特殊的原因。从整个唐朝其他方面的情况看，唐朝所有的大项目，除了实际的功能需求外，精神需求还占很大比重，如长安城的宏大规模、城中极为宽阔的马路等，都不是单纯的功能需求能解释的。像帝王陵这样的实际功能与精神需求并重的特殊项目，更是有着超乎常规的精神因素。依山而建的帝陵，巍峨的山丘就是墓冢，高耸的山梁就是神道，其俯瞰大地、傲指苍穹的雄强气势，是人工所筑、最多几十米高的土筑陵丘所望尘莫及的。按照唐朝的时代气息和唐人的精神风貌，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帝王们以大山为陵而不是筑小丘为冢，要的就是一种理想境界、一种恢宏气

势，这比单纯建一个死后的栖息之所更重要。这些帝王陵所凝聚的“精”“气”“神”不会随风而逝，反而在漫长岁月的延宕中固化为一种历史的永恒。秦汉隋唐时代气壮山河的帝陵，就是当时帝王好大喜功文化的产物。

修建帝王陵，除了为死后的帝王建栖身之所外，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修建帝王陵来保持原有的政治权威，并且要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秦始皇在选择自己的帝号时，除了要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择出“皇帝”二字外，特意又在前边加了一个“始”字，即从他开始，要二世、三世一直传下去，直到千世、万世，永远无穷。其陵墓也不再称“陵”或者“墓”，完全超越了原来的陵墓制度，而是直称为“丽山”，远比此前的王陵高大得多，是高度中央集权、皇家威严心态的充分流露。

帝王陵的修建与王朝的实力和科技水平有密切的关系，尽管帝王们都有着很高的要求，然而历代帝王陵的规模并非完全一样，有大有小。王朝强盛的陵墓规模都很大，反而则比较小。营建的时间也是有长有短。

四、陕西帝王陵的地位与价值

帝王陵是我们的民族瑰宝，是有着特殊意义的物质文化遗产。古代建造帝王陵往往都需要倾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而帝王陵也就成了展现国家实力和反映当时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帝王陵体现出我国不同时代物质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陕西帝王陵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还是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探寻帝王陵墓的秘密，研究其发展演变历程，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中作用的增强，相信我们定能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

历代帝王陵墓的修建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丧葬文化等的具体表现。不仅要保持原有状况，而且要保持原有政治地位和权威。西汉 11 位皇帝中的 9 位把自己的陵墓选择在咸阳原上，这 9 座陵墓中，又有 5 座设有陵邑，因此咸阳原也称为“五陵原”。陵邑的设置就是要让帝王在入土之后仍然有领地可供统治，并为其服务，实际是将在世的统治延长了。5 座陵邑的住户都是天下富豪或有较高地位的人，从全国各地迁到关中，大学者司马迁

就是同父亲一道从故乡韩城龙门迁到茂陵邑的。这 5 座陵邑都有相当规模，如茂陵邑人口就多达 27.5 万人。因为五陵邑多官宦富户，所以其子弟往往游手好闲、惹是生非，后来的成语“五陵少年”就由此而生，并成为纨绔子弟的代称。实质上，当时长安城周边的陵邑就是汉长安城的卫星城，对宏大的汉长安城起着烘托的作用，从而减少了都城长安城的人口压力。这可以为现代城市发展，特别是田园都市建设提供借鉴。

昭陵、乾陵附近大量陪葬墓都出土有壁画，由于墓主人身份很高，故作画者多为专业画家甚至著名艺术家。就目前所见，唐墓壁画中的优秀作品比之传世的唐代文人画，其水平毫不逊色乃至有所超越，甚至有海内外学者把永泰公主墓壁画中的一位捧杯仕女评价为“中国古代第一美人”。乾陵陪葬墓壁画中，有 5 组被评定为中国最高等级的国宝，这是对这种独特绘画艺术价值的充分肯定。

帝王陵旅游成为陕西旅游发展的主力军，秦始皇陵是目前陕西帝王陵中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其雄伟的气势、深邃的内涵、卓越的陪葬品吸引了世界上数千万人来此参观，更有世界上 200 多个国家元首来这里观光，极大地提高了陕西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知名度；汉景帝阳陵已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文景点，地下陈列形式将古代文明与现代技术巧妙结合，为陕西帝陵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以其雄伟的气势征服了海内外的游客。随着帝王陵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和旅游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帝王陵旅游必将带动陕西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陵墓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重要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地面上的古建筑往往会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而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科学、艺术等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陕西省有 29 座汉唐帝陵，正式对外开放的只有 6 座，分别是西汉阳陵、杜陵、茂陵以及唐乾陵、昭陵和桥陵。不少帝陵由于交通不便，甚至被撂荒在农田里。鉴于此，陕西省出台了《汉唐帝陵文物旅游交通线路规划》，拟用两年时间建设以西安为中心的帝陵旅游道路网，用公路将 29 座汉唐帝陵连接起来[①]。

---

①《用一条路串起帝陵 ——陕西规划修建连接帝陵之路调查》，《陕西日报》2014 年 12 月 8 日。

五、陕西帝王陵墓的特征

纵观陕西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有以下几点特征较为突出：

（一）在中国帝王陵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他不但创立了一套皇帝制度，而且也建立了一套陵墓制度，并且大多被后代继承。

（二）历史上盛世时期的帝王陵多，文化遗存众多。由于周秦汉唐繁荣时期的都城都在陕西，因而强盛时期的帝王陵众多，陪葬品极为丰厚，为陕西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遗产，也有精神遗产。

（三）“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仪。帝王陵墓的建设是以生前的宏伟宫殿和都城为典范进行修建的。统治阶级生前享受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权，死后也同样如此，生前所有的或者希望得到的，在帝王陵园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若都邑”成为陵园建筑遵循的模式。秦汉隋唐的帝王陵建设都是如此。

（四）数量众多。陕西是中国历史上都城最多的省份，先后有 14 个王朝建都在此，按照“陵随都移”的规律，当时的帝王陵墓均在陕西，已经确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帝王陵达 82 座，特别是秦始皇陵、汉唐帝陵的影响非常大。

（五）规模庞大。陕西的众多帝王陵从目前的勘探和调查来看，陵墓规模都是比较大的，这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产物，是地上世界的真实反映。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寝”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秦始皇、汉武帝的陵墓面积达 60 平方公里，唐太宗昭陵面积达 200 平方公里。不管是封土为陵还是以山为陵，都显得非常壮观。

（六）实行厚葬。在陕西建都的朝代多是中国古代的盛世时期，又是古代厚葬盛行的时期，尤其是西周、秦、西汉、隋、唐几个朝代。因此墓葬中的陪葬品数量多、质量高。秦始皇陵已经发现的陪葬坑与陪葬墓达到 600 余处，汉武帝茂陵目前发现的外藏坑就达 401 个。秦始皇陵陪葬坑已经出土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秦陵兵马俑”“青铜之冠——铜车马”、石铠甲、百戏俑、青铜水禽等高质量的文物。汉景帝阳陵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俑陶马、青铜器，汉武帝茂陵出土了鎏金铜马、国宝级的文物石刻作品。尽管唐代皇帝在临终遗言中都讲到陵墓修建、丧葬观念要节俭，但是继承者均未按照遗言办理，而是大操大办。唐代帝陵的大型石刻、壁画等等，无不表现出把当时繁华的地上搬到了地下。最精彩的地下宫殿还没有打开，里面的



图 7　唐顺陵南神门东侧走狮　　（摄影：郑茂良）

金银财宝将不胜枚举。只有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帝王墓葬稍微节俭一些，地面上的封土或者较小、或者没有，这与当时提倡的薄葬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有关。

（七）先秦至西汉，陵园和墓向一般坐西朝东，从西汉末年开始，经过十六国北朝，隋唐时则坐北朝南。这一变化的出现是受到当时丧葬习俗和都城形制的影响。

（八）我国早期的墓葬地面之上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从战国时期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后来君主都以封土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因此封土愈修愈大，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到秦始皇时更称“陵”为“山”，名为“丽山”。从汉文帝开始出现了“依山为陵”。唐代关中的 18 座帝陵中的 14 座“依山为陵”，气势更为宏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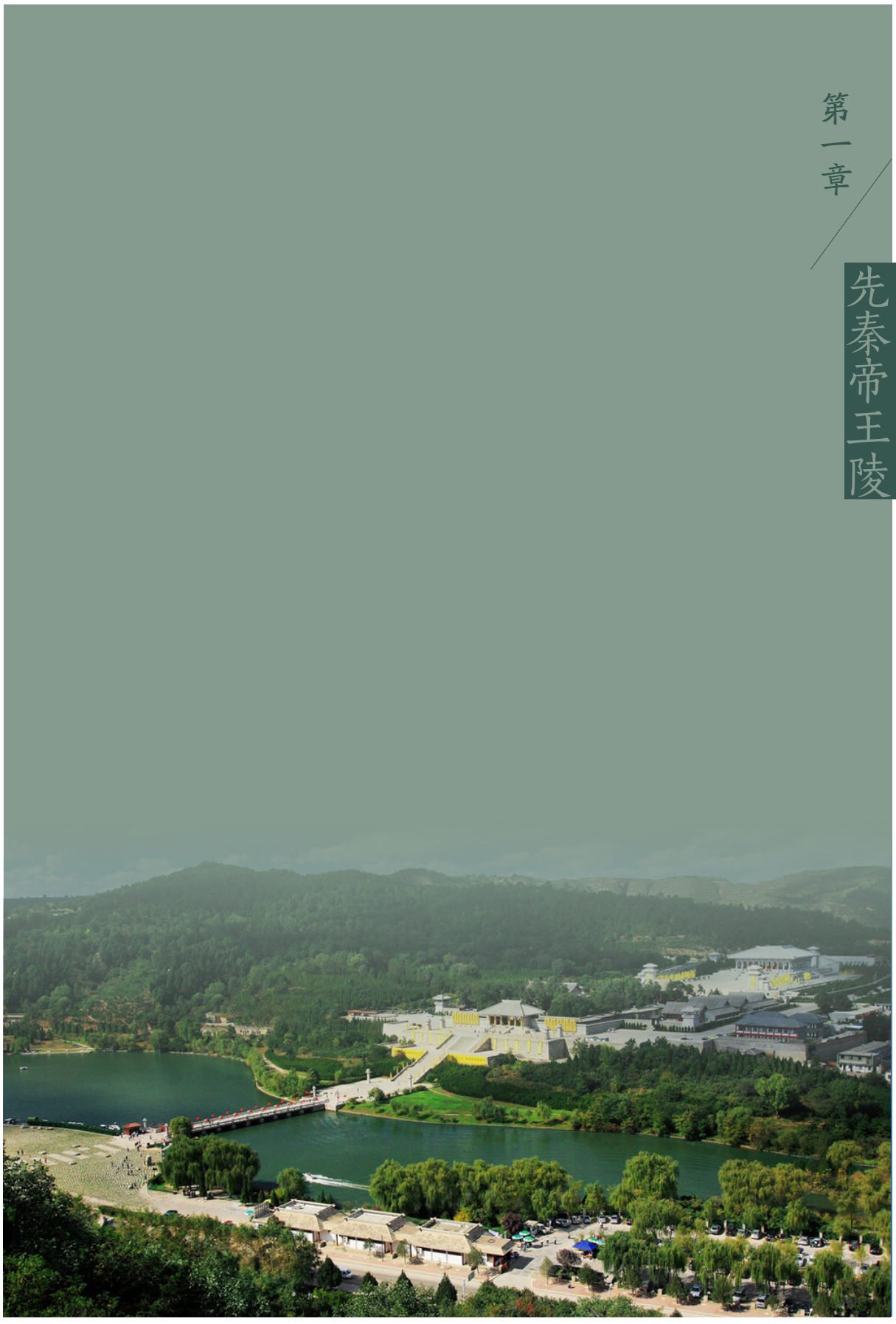
（九）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墓，王与后同葬在一个陵园中，但是在不同的墓穴中。到了唐代则多为同穴而葬。

（十）帝王陵的选址讲究风水，均修建在地形高敞和环境优越的地方。风水的字面含义是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引申义是对优越吉祥环境的勘查与选择。早在先秦时期，基于古人对环境的认知与选择以及早期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思想的形成，丧葬风水思想已开始萌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丧葬风水的形成与发展阶段，帝王们对墓葬选址的要求更高。

总而言之，陕西的帝王陵是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重要表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水准，也充分反映了古代的传统文化，值得我们很好地保护与利用。

第一章

先秦帝王陵



陕西先秦时期的帝王陵既有传说时期的黄帝、炎帝陵，也有西周时期的周天子陵和秦国王公陵，在中国帝王陵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人文初祖”。周王朝制礼作乐，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一环，东周时期的秦国虽然是一个诸侯国，但是国力愈来愈强，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实现了华夏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在中国帝王陵墓制度上创立了多个第一，影响极为深远。

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的桥山上，从春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都在维修与祭祀，成为海内外中华民族共同祭祖的载体。

炎帝陵位于陕西省宝鸡市，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缅怀祖先之地，历代受到高度关注。

西周时期的天子陵墓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虽然未能找到具体位置，但一定在都城丰京、镐京的附近。西周作为长时期的政权存在，有一系列的礼制建设，在帝王陵墓建设上必定有一定的建树和影响。

秦国是在关中发展壮大的，其陵墓在陕西有五大陵区，即平阳陵区，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已经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并进行了勘探，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个“中”字形和一个“甲”字形的墓葬区，应该是宪公等的陵墓。雍城陵区，位于宝鸡市凤翔县东南，埋葬了十多位秦的国君，包括秦穆公、秦景公、秦灵公等，在这里已经发掘了迄今为止先秦时期全国最大的陵墓——秦公一号大墓。栎阳陵区，位于西安市阎良区，埋葬着秦献公与秦孝公。咸阳陵区，位于秦都咸阳的西北方，分布在东西长近10、南北宽约7公里的范围内，先后发现战国晚期大型陵园3座，埋葬着惠文王、悼武王。芷阳陵区（亦称秦东陵），位于西安市临潼区斜口街道办事处以东、

骊山西麓的台塬上，先后勘探发现战国秦陵园 4 座，总面积为 24 平方公里，埋葬有昭襄王、庄襄王等秦王。

先秦时期的帝王陵墓制度表现在：

其一，“事死如事生”，古代人相信灵魂不灭，认为虽然人已经死了，但其灵魂还会继续存在。因而作为帝王来说，一定要把生前享有的全部带到地下继续享有，所以陵园内的陪葬品、陪葬墓、陪葬坑应有尽有，厚葬之风盛行。秦公一号大墓历史上虽然经过 247 次盗掘，仍然有 3500 多件珍贵文物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可见陪葬品之丰富。在其陵园内，还发现了车马坑及众多的陪葬坑、陪葬墓，俨然是其地上世界的反映。

其二，祭祀制度。“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这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祭祀的重视，祭祀活动主要表现在陵墓祭祀上。先秦时期的祭祀活动，最早在陵墓上的享堂进行，后来封土墓出现后，祭祀活动便在陵墓旁的寝殿中进行。

其三，陵随都移。从周秦陵园分布可以看出，所有的王陵所在地都在都城附近，这是人们为了便于修建、管理和祭祀。

其四，陵园规模愈来愈大。帝王陵墓的修建是国家或者王朝的一件大事，设有专门的人员进行管理。由于人们对陵墓的高度重视和国力的逐步强大，陵墓的规模也愈来愈大。特别是秦国，立国较晚，但发展很快，成为诸侯国中有影响的大国，其陵墓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也与秦人“好大喜功”的性格特点有关系。秦公一号大墓长达 300 米，深 24 米，是目前发掘的先秦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陵墓，比商代王墓要大得多。

其五，严格的等级制度。先秦时期的礼制非常重要，特别是周人制礼作乐，在这方面的要求特别多，因而在陵墓制度上反映得特别突出。当时规定天子用 4 个墓道的“亞”字形墓葬、诸侯用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葬，大夫用 1 个墓道的“甲”字形墓葬，不能僭越礼制。对陪葬品的限制也很多，“九鼎八簋”只能天子享用，其他人是不能用的。但是到了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国国君羽翼丰满，墓葬上僭越行为也开始出现了。秦惠文王、秦悼武王已经开始用“亞”字形墓葬了。

其六，陵寝制度。“陵”专指帝王的坟墓，“寝”指帝王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帝王死后，在墓地上，要仿照现实生活中的模式，建宫殿，藏神主，具衣冠，按时进奉生活用具和饮食，这就是当时的“陵寝”制度。中国的陵寝创始于战国中期，成熟于秦汉时代。战国时期的秦东陵就发现了寝殿遗址。

黄帝和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祭祀对象，国家每年清明节都安排祭祀活动，陵墓的保护与管理有条不紊。西周王陵的寻找工作还在进行。同时考古工作者已经对秦平阳、雍城、咸阳、芷阳陵区做了大量的勘探和试掘工作，并对个别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珍贵文物，为研究先秦时期陕西的帝王陵墓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一节　黄帝陵

一、墓主生平

黄帝是中国远古时期的部落首领，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以其文治武功统一了当时的各个氏族部落，成为中华民族最早的一位领袖人物，开创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系列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开启了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先河，因此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

先秦文献诸如《国语》《左传》《逸周书》《易经》《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古籍均辑录了他的事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膑兵法》有“黄帝伐斧（补）遂”之句，199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黄帝四经》，战国齐威王所铸铜器陈侯因咨敦，刻铸有继承“高祖黄帝”事业的铭文。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明言“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所以他不记燧人、伏羲、神农传说之事，而从《大戴礼记》中之《五帝德》《帝系姓》与调查研究相印证，作《五帝本纪》，篇首列黄帝。然《五帝德》和《帝系姓》不纪年数，遂使殷以前不可得其详。周以来尽管颇多著述，但孔子序《尚书》略无年月。司马迁检索古代文献，虽称黄帝以降皆有年数，但又不敢遽以为是，故根据《五帝系牒》和《尚书》集世两书所记，仅作《三代世表》，对黄帝至西周共和这一时期只记世系，仍无年数。

黄帝是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族的共主、五帝之首。是少典之子，本姓公孙，长居姬水，改姓姬，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建都于有熊，也称有熊氏，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以统一中华民族的伟绩载入史册。

黄帝作为中华文明肇始时期代表人物，他开拓进取、海纳百川，包容当时产生在中华大地上以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为中心的各种文明体系，从而使华夏民族凝聚范围越来越大，向



图 1　汉画像石中的黄帝像　　（编写组供稿）

心力越来越强，黄帝也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发展的旗帜。

黄帝具有杰出的才智，《易经·系辞下》载：黄帝“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也就是说他当时带领人们改变了单纯的游猎生活，教大家驯养家畜、建筑房屋、种植五谷、裁缝衣裳、制造器皿等。他还重用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命仓颉造文字，以代结绳记事；命雍父制臼杵，以供舂米；命大挠作干支，以利农时；命伶伦发明乐器，制定音律；命共鼓、货狄做舟楫，以利河中航行；命挥、牟做弓矢，以提高射猎和攻伐能力。黄帝的妻子嫘祖教人养蚕，织绸制衣，后人尊称她为“先蚕娘娘”。从此，天下大治，人民安乐，开始过上较为文明的生活，社会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盛期。后人把黄帝当作我们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赞誉他“能成命百物”，尊奉他为“人文初祖”。史籍中将很多发明都归于黄帝一人身上，其实是当时人们共同创造的文明的结晶。

黄帝曾打败炎帝于阪泉，诛蚩尤于涿鹿，随着战争的进行、社会的进步，国家的雏形开始出现，为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奠定了基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曾“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而可以看出黄帝时代的管辖疆域。

二、营建始末

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桥山。

黄帝死后，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意和怀念，起冢为陵，立庙祭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葬桥山”。黄帝陵古称桥陵。是因为沮水由西向东呈“U”形绕此山而过，站在山上朝下看，东边有河，西边也有河，就像水从山底穿过，故此山名曰桥山。传说轩辕黄帝就

是在这里乘龙升天的。升天时，人们从他身上拽下衣帽、靴子、宝剑等埋葬此处，修成陵墓，以示永久怀念，故此陵墓为衣冠冢。

三、陵墓演变

在桥山脚下有轩辕庙一座，面积约 10 亩。院内有古柏 14 棵，其中黄帝手植柏高 20 余米，胸径 11 米，苍劲挺拔，冠盖蔽空。相传它为轩辕黄帝亲手所植，距今约 5000 多年，是中国最古老的柏树。当地有民谚：“七搂八揸半，圪里圪垃不上算。”谓七人合抱犹不围，充分反映出轩辕庙的历史悠久。

清代毕沅于陵前立碑“古轩辕黄帝桥陵”。

1939 年，陕西省政府令设“黄帝陵园管理处”，对黄帝陵庙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维修，并对庙产进行了清理。

1942 年，陕西省第三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考虑到黄帝声名远播、威名远扬，同时为了与陕西蒲城丰山唐睿宗之桥陵相区别，遂改桥陵为黄帝陵。此年冬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题写“黄帝陵”三个大字，匠人勒石成碑，置于黄帝陵墓之前。自此以后，黄帝陵一名沿用至今。

通往陵区的石道边立有“下马石”，上书“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南面立明代“桥山龙驭”石碑一通。陵区东侧碑廊珍藏历代帝王御制祭文碑 57 通，陵区西侧立有香港回归纪念碑和澳门回归纪念碑；“人文初祖大殿”系供奉黄帝的正殿，“人文初祖”匾额为程潜所题。内有墨玉刻制的黄帝浮雕像，设有神龛，神龛四周饰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纪念亭内陈列有中国近现代领袖人物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题词。

墓前有祭祀亭，用于前来拜祭之人祭祀之处。祭亭中立有一石碑，上书“黄帝陵”三个字，原为蒋中正于抗日战争期间题写，1956 年铲除，1963 年修复时换为郭沫若题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国华侨陈嘉庚首先上书毛泽东主席，建议整修黄帝陵庙。1955 年，毛泽东主席在信上批示说“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并把信转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1956 年 3 月，黄帝陵祭祀亭得到整修，陵墓外新筑砖花墙，庙院内“手植柏”“挂甲柏”周围新做木栅栏，黄帝陵面貌焕然一新。同时请毛泽东主席题字，以便修缮时刻勒立碑。毛泽东将题字一事委托给郭沫若，后郭沫若手书“黄



图 2　黄帝陵碑　（编写组供稿）

帝陵”三个大字，寄黄陵县政府刻碑。

1956 年黄帝陵被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1 年黄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黄帝庙并入黄帝陵保护范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陕西省将黄帝陵列为重点维护整修单位，省政府决定首先以陵区和庙区为重点，配以上山公路，形成两点一线，作为一期工程。1990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在陕西视察期间，对重新规划整修黄帝陵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一定要把黄帝陵整修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为了切实地做好黄帝陵重新规划整修工作，陕西省委、省政府作了认真的研究部署。从 1990 年 5 月上旬开始，由陕西省文物局组织陕西省建筑设计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陕西省规划设计院等有关设计单位，在对黄帝陵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勘测的基础上制定了整修规划。6 月上旬，将规划方案带到北京向中央领导及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等有关单位作了第一次汇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瑞环、王震、习仲勋等，著名的建筑及规划专家戴念慈、郑孝燮、吴良镛、谢辰生、罗哲文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听取了汇报，一致认为陕西提出的“雄伟、肃穆、庄严、古朴”的八字方针非常好。1991 年 9 月，陕西省政府成立了整修黄帝陵办公室，专门负责黄帝陵整修工程。陕西省政府于 1992 年清明节在黄帝陵举行了“陕西省各界公祭轩辕黄帝陵暨整修黄帝陵工程奠基仪式”，正式拉开整修黄帝陵工程的序幕。

1993 年以后新修轩辕庙建筑，占地约 8000 平方米，整个建筑为全麻石结构，气势恢宏。

1999 年 6 月，陕西省政府成立了陕西省黄帝陵管理委员会，由副省长担任主任，进一步加强整修工作。2001 年陕西省黄帝陵管委会办公室与黄帝陵基金会办公室合署办公，将管理、

筹资和工程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整修黄帝陵工程的范围包括黄帝陵所在的桥山及其周围山水、城镇，面积达 3.24 平方公里。一期工程 1992 年 8 月开工，1998 年 12 月竣工，累计投资 8300 多万元。施工单位为陕西省第八建筑工程公司。完成的项目有入口广场、印池、轩辕桥、桥北广场、龙尾道、庙前广场、轩辕庙门、陵区道路、桢星门、陵道、神道，以及绿化工程等 22 项。2001 年 12 月，黄帝陵管理委员会召开了整修黄帝陵二期工程开工新闻发布会，二期工程建设开始。整修黄帝陵二期工程，包括祭祀大院（殿）、古柏防火续建、功德坛及大环境治理等项目。二期工程概算投资 2.5 亿元，其中黄帝陵祭祀大院（殿）工程建设，概算投资 1.5 亿元，预计整个工程完成需 1.9 亿元。其中古柏防火工程已经于 2003 年完成，祭祀大殿和祭祀广场也已于 2004 年清明节公祭活动前完成。

经过整修，黄帝陵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现在走进黄帝陵，青山掩映，碧水泛波，古柏森森，香烟氤氲。宽阔的入口广场，古朴厚重的轩辕桥，倒映青山的印池水，气势高拔的龙尾道，桥山之巅的龙驭阁，雄伟壮观的轩辕殿，能容纳 5000 余人举行祭祀活动的祭祀大院，已初步展现出黄帝陵宏大、庄严的气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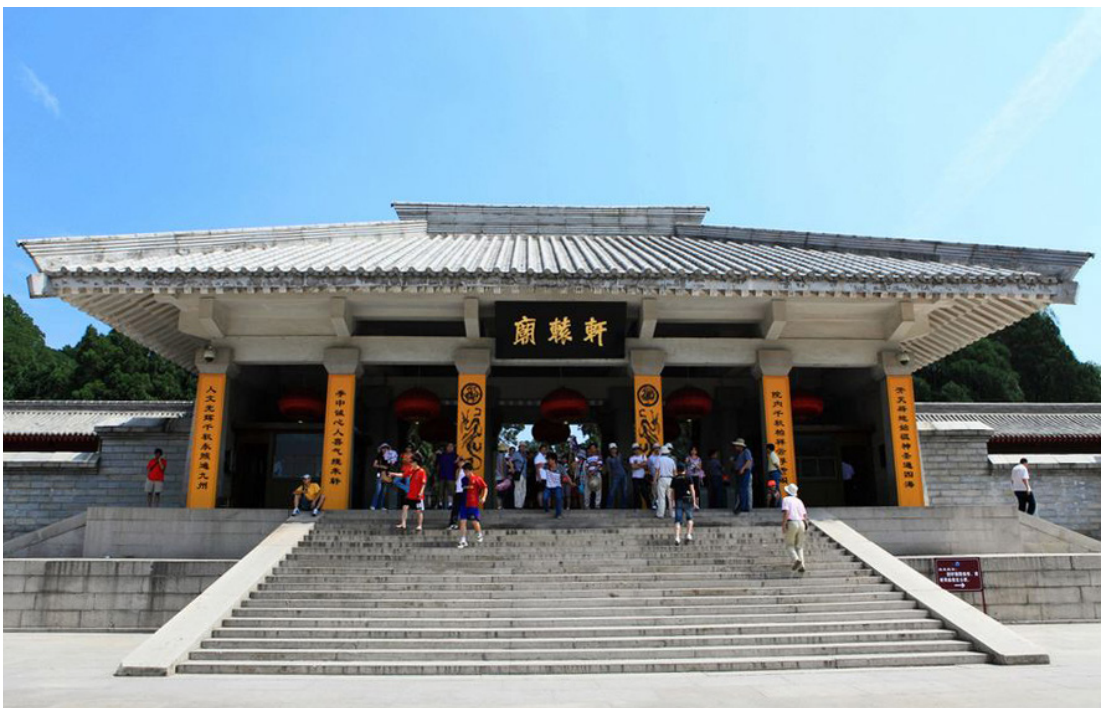


图 3　轩辕庙　　（编写组供稿）

黄帝陵基金会于 1992 年 10 月在北京隆重成立。1996 年，陕西省设立了陕西省清明公祭轩辕黄帝陵典礼筹备工作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着力进行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的策划组织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的组织力量，2008 年 1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将陕西省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筹备工作委员会更名为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单位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省公安厅、延安市、黄陵县政府等有关单位组成，是省政府办公厅的直属机构，负责策划组织实施公祭黄帝活动，以及黄帝文化研究和黄帝祭祀活动研究，协调组织黄帝陵景区规划与建设等工作。2009 年省政府第 28 次常务会议赋予了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新职能，即作为省级黄帝陵管理的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有关黄帝陵保护、管理、规划、建设以及公祭活动等重大问题。

2009 年 12 月 29 日，《陕西省黄帝陵保护管理办法》发布，自 2010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黄陵县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遗址丰富，有 40 余处，遍布大小河川两岸的第二台地上。这些遗址虽未正式发掘，但据调查所见，无论是遗址堆积，还是遗物都相当丰富。其中北靠桥山、西南临沮水的“桥山遗址”面积有 25 万平方米，虽因为长期以来受到严重破坏，但文化层的堆积仍有 1.5 米，可辨器物有尖底瓶、盆、钵、罐、石斧，纹饰有彩绘、绳纹、附加堆纹等。

通过考古调查，可以说黄帝传说所反映的时代就是我国考古上的新石器时代，距今约有 5000 年的历史。

研究成果：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年。

黄帝陵基金会编：《黄帝文化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李学勤、张岂之：《炎黄汇典》（1 ~ 8），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

柏明、李颖科：《黄帝与黄帝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

任景信：《轩辕黄帝与黄帝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年。

五、遗迹与遗存

桥山总面积 8500 余亩，生长柏树 8.6 万余株，多数树龄在千年以上，占地 1300 亩，是我国最大的柏树群。

陵冢，位于桥山山顶正中，为土冢，扁球状，坐北面南，高 3.6 米，直径 16 米，周长 48 米，面积约 200 平方米。土冢下部筑方形墓台，以烘托陵墓的神圣感。方台与圆冢相结合，上圆下方，具有“天圆地方”“天地相合”的象征意义。黄帝陵前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桥山龙驭”四字，意为黄帝驭龙升天之处。落款为“大明嘉靖丙申（嘉靖十五年，1536）十月九日滇南唐琦书”。

汉武仙台，位于陵前正南、陵园围墙以外，距陵冢 45 米，是一座高 24 米的夯筑高台。两条石砌曲径通向台顶，土台边缘由古柏环抱。台旁立一石碑，上书“汉武仙台”四字，为明代嘉靖七年（1528）闰七月所立，落款为“滇南唐琦书”。此台始建于汉元封元年（前 110），《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汉武帝刘彻“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中部县志》载：汉武仙台，“峙黄陵左侧，高出林表，汉武巡朔方，还，祭黄帝，筑台祈仙”。说的是汉武帝刘彻率兵十余万北征朔方，凯旋后，为夸耀武功，祭告祖先，便于归途经黄帝陵时，停兵祭祀。同时为使自己长寿成仙，又令兵士于此起土筑台，后人因此称此台为祈仙台。

六、祭祀活动

后世子孙为了表达对黄帝功绩的怀念与感戴，历史上祭祀活动频繁。据马骕《绎史》引证《竹书纪年》及《博物志》：“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对黄帝祭祀便从此开始，据《礼记》记载，夏、商、周都祭祀过黄帝。《史记·封禅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这是我国最早祭祀黄帝的记载。秦灵公第一次把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供奉祭奠。其后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公祭活动，基本上都保持了较高规格。据《吕氏春秋·安葬篇》《七国考》《山海经》这些书籍记载：“墓设陵园”在秦代开始形成一种制度。刘邦建立大汉后，就在桥山西麓建起“轩辕庙”。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对黄帝陵的祭祀已有比较固定的祭礼、祭器规定。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对轩辕庙进行了历时两年的重修扩建，并栽植柏树 1140 株。宋朝开宝二年（969），因沮河水连年侵蚀，桥山西麓经常发生塌崩，威胁轩辕庙，地方官员上书朝廷，宋太祖赵匡胤降旨，将轩辕庙由桥山西麓迁移桥山东麓黄帝行宫，也就是当今人们前来拜谒的轩辕庙。宋太祖开宝五年（972），遵太祖赵匡胤旨意，规

定桥山黄帝陵三年大祭一次。元代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元典章》中规定：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明代对黄帝陵和黄帝的祭祀也非常重视。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认为轩辕黄帝不仅是医家的祖师，也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朝廷礼部议定祭祀黄帝的地方定在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并规定三年大祭一次,皇帝亲撰祭文,派遣大臣赴桥山祭祀。桥山黄帝陵列为国家祭祀始祖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又特遣中书省管勾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至今所见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的祭文。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坐像一座，以便瞻仰祭祀。今黄帝陵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黄帝陵致祭的碑文。清代沿袭明代定制，在桥山黄帝陵举行国祭，一般三年祭祀一次，此外还有临时祭告。清朝黄帝陵庙的祭祀仪式隆重，规模宏大，次数较多，见于记载的有 30 次。光绪年间，台湾爱国志士丘逢甲在甲午战争后祭祀黄帝陵，留下诗句“袖中一卷英雄传，落日来登黄帝陵”。

宋元以后，历代王朝皆以诏书的形式规定桥山黄帝陵为官方祭祀轩辕黄帝之所在，从而加强了政治统一和文化认同。从此，桥山的黄帝祭祀便从普通的宗教崇拜中升华而出，成为官方文化和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其祭祀规模、祭祀次数、祭祀规格也是空前的。历经数千年而不衰，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先祖的“报功崇德”“继志述事”“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精神和情操。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专程派人赴黄帝陵祭祖，并留下“中华开国五千年……世界闻名，唯有我先”的诗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几度同祭黄帝陵，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祭文，“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蒋中正亲笔题写“黄帝陵”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 ~ 1962 年清明节，陕西省人民委员会都派遣代表到黄陵公祭轩辕黄帝。1963 年之后，未进行祭祀活动。1980 年恢复清明祭祀活动，陕西省人大常委会、陕西省人民政府、政协陕西省委员会都派代表致祭。此后祭祀不断，基本上都是由陕西省主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受到海内外华夏儿女的关注，祭祀规模也日渐隆重，祭祀黄帝已成为传承中华文明、凝聚华夏儿女、共谋祖国统一、开创美好生活的一项重大活动。

现在，每年的清明公祭活动共有七项议程，即：全体肃立，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恭读祭文，向黄帝像行三鞠躬礼，乐舞告祭，瞻仰祭祀大殿，拜谒黄帝陵。祭奠开始时“鸣钟九响，击鼓三十四咚”，前者象征着中华民族传统中的最高礼数，后者则代表着中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和宝岛台湾，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黄帝陵祭祀活动在长期的实践中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格式和祀典礼仪，目前可分为官（公）祭、民祭两种形式。民间祭祀时间一般在清明节前后和重阳节期间。1988 年，黄陵县恢复了一年一度的“重阳民祭轩辕黄帝逸仙盛会”，民祭活动较之公祭活动显得热烈淳朴。在保持了公祭活动中的一些内容外，更突出了民间性，增加了鼓乐队、唢呐队和 56 人组成的仪仗队。

此外，台湾等地也有遥祭黄帝的礼仪，台湾国民党当局于每年 4 月 24 日遥祭黄帝陵。



图 4　黄帝陵祭祀典礼　（编写组供稿）

第二节　炎帝陵

一、墓主生平



图 5　神农氏尝百草图

炎帝即神农氏，姓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远古时代的部族领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是中国历史最早记载炎帝诞生地的史料。

炎帝最初的活动地域在今陕西南部，后来沿黄河向东发展，与黄帝发生冲突。在阪泉之战中，炎帝被黄帝打败，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组成华夏族，所以今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后裔”。炎帝与黄帝共同被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

传说炎帝一生有七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用木材制造两种翻土农具——耒、耜，教人垦荒。

其二，发明农业，种植粮食作物。

其三，炎帝制造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四，发明纺织技术，使赤身裸体的人穿上了衣服，这是人类由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

其五，尝百草。尝百草是为了知道多种草的药性，进而发展用草药治病的技术，炎帝也

因此贡献了其生命。

其六，制作乐器，让百姓懂得礼仪，为后世所称道。

其七，立市廛，开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

神农氏族部落初始活跃地在陕西宝鸡姜水一带，后以姜水为活动中心，向周边地区扩展，因此在天台山、常羊山、蒙峪沟、九龙泉、清姜河、炎帝陵、炎帝祠多个地方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炎帝神农氏从出生到死后安葬的炎帝文化脉络。

后来炎帝部落与南方的蚩尤发生战争，求助于黄帝部落，在涿鹿大败蚩尤。以后炎黄两部落联盟形成了华夏民族的主体。后来，炎帝部落一部分南迁，足迹遍于两湖。一部分仍留在黄河流域融合于其他氏族部落之中，仍奉炎帝为祖。

因此，炎帝并不单是一个人，而是对这一时期多个华夏族杰出部落首领的统称，这些人可能在距今 6000 年至 5500 年之间活动于姜水之岸，其后部落发展扩大，迁徙并活跃于湖北、湖南、山西等地。

二、营建始末

正由于炎帝的活动范围很广，因此在全国流传下多个炎帝陵，有陕西宝鸡的炎帝陵、湖南炎陵的炎帝陵、山西高平的炎帝陵、河南商丘的炎帝陵、湖北随州的炎帝陵等。

陕西宝鸡的炎帝陵具体的修建时间已无从考证，但从其现在留下的遗迹看，学者考证认为可能是唐代。天台山庙院留下的遗迹有半亩多地。从至今留有的柱础石看，曾有大殿、山门等建筑物。在靠原庙址的山崖挖了座石洞，里面塑有炎帝像。洞前有块两米长的青石板，传说这块青石板曾停放过炎帝的尸骨。在庙院周围，传说还有炎帝的多处遗迹，如炎帝沐浴的神农溪、发明燕麦的燕麦岭、歇脚的神农石、避雨的白马关、“日中为市”的杨家滩等。

传说炎帝因误尝“断肠草”，卒于宝鸡天台山莲花峰下，葬于天台腹地。当初准备在天台山重建炎帝陵，但是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而放弃了。后来考虑到炎帝生于常羊山下的蒙峪沟，在常羊山上重建炎帝陵也合乎情理，故由渭滨区神农镇和中铁宝桥有限公司两家联合重建。

1992 年 12 月 15 日，第一期工程正式奠基开工。经过 8 个多月的紧张施工，于次年 8 月

23 日竣工。主要建筑有陵冢、炎帝大殿、东西配殿、牌坊、上山车道、步行台阶、石碑等。陵区和祭祀区共占地 70 亩，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在陵区、祭祀区栽植雪松、女贞、刺柏及各种灌木等两万多株，面积达 8 万多平方米。共投资 220 多万元。

1997 ~ 2003 年，先后树立历代帝王石像 34 尊，栽植女贞 287 棵，修建陵冢仿古围墙 350 米，修复上陵青石台阶 60 米，拓宽上山道路 3 公里。

2004 年，立唐补遗碑 5 座。

2005 年，新修祭祀广场 1 万平方米，种植草坪 3200 平方米，修建广场东西围墙 260 平方米。

2006 年 2 月至 2007 年底，新建 2600 平方米的炎帝大殿。1998 ~ 2007 年，炎帝陵先后投资共约 1700 多万元。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8 级特大地震，受此波及，宝鸡也发生了 6.3 级地震。炎帝陵大殿因地震而部分受损。市政府拨款对大殿及广场进行了维修。

2009 年 7 ~ 8 月，由宝鸡市人民政府和渭滨区人民政府投资 1000 万元，对炎帝陵入口、道路进行了改造。



图 6　炎帝陵　（编写组供稿）

三、考古调查与研究

在宝鸡已发现关桃园遗址（8000 年前）、北首岭遗址（7100 年前）、姜城堡遗址等古文化遗址 40 多处。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反映了炎帝部落在此繁衍生息、发展壮大的过程。

在姜城堡地区发现的姜氏城遗址，面积约有 49 万平方米。遗址中最大的房子长 10.7 米、宽 10.5 米，面积约 124 平方米。北首岭遗址中最大的房子面积 88 平方米，出土的生产工具和陶器与北首岭的相似，并且相对先进。由此可见，姜城堡遗址时期是北首岭氏族部落的繁荣和发展时期，这正是母系氏族公社向父氏族公社的过渡时期，与传说中的炎帝时代相吻合。

研究成果：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 年。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李学勤、张岂之：《炎黄汇典》（1—8），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 年。

霍彦儒等：《炎帝志》，三秦出版社，2009 年。

四、遗迹与遗存

炎帝陵由陵前区、祭祀区、墓冢区三大部分组成。陵前区由神农门、炎帝行宫等建筑组成。神农门位于通往炎帝陵蒙峪沟沟口，石质、牌坊形，高 5 米、宽 12 米，山门上刻“神农门”三个大字，古色古香，雄伟壮观，与祭祀区的羊首亭上下对峙，遥相呼应。距神农门约 50 米处有羊脚亭，亭为四柱方形，檐角上翘，木栏花窗，斗拱叠梁，灵气灿然。右侧为一小院，院内有土窑两孔，洞中供奉着炎帝神位。

在距炎帝行宫约 800 米处的山上，北端耸立着羊首亭。此亭重檐斗拱，雕梁画栋，古朴庄重，内有一碑，为重修炎帝陵碑记。在碑右侧数步远，有一块约 1 米高的石碑，自然天成。此石为清代重修“神农城池”时雕刻的一方镇山之石。镇山石上“嘉庆三年重修城池”八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辨。此石碑是 1992 年建陵时发掘出来的。传说，常羊山自古就有一座庞大的神农城池，城下“十里长街，庙宇相连”，后毁于战乱火灾，唯神农祠、九龙泉残碑仅存。镇山石旁边又立一碑，上书“常羊山”三个大字。在入口处置一重达 20 吨的巨石，上书“炎帝陵”三个大字。巨石对面为高 4.5 米、长 18 米的浮雕墙，上刻绘炎帝教民稼耕、日中为市、发明医药、织麻为布、削桐为琴、耕而作陶等功绩图。

羊首亭后边为新修的宽 9 米、长 30 米的大踏步台阶，直至华夏始祖牌坊，这便是祭祀区。牌坊坐南朝北，高 8 米，宽 18 米，六柱五门，飞檐斗拱，气势宏伟。牌坊正中大匾上刻着“华夏始祖”四个烫金大字，为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牌坊前的小广场上，耸立着两尊石狮和多块石碑。其碑文或记炎帝功绩，或记修陵缘起经过。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左右两边耸立的 5 块由任步武补遗书丹的唐名碑。周围松柏挺拔、郁郁苍苍。

山门牌坊东面便是祭祀广场。广场约有 500 多平方米，可容纳千人凭吊。两侧为配殿，各面宽 15 米，进深 6 米，施彩，琉璃瓦覆顶。殿内为炎帝陵展览室。正南两米高的台基上坐落着高大雄伟的炎帝大殿，面宽 21 米，进深 12 米，周围有 26 根石柱，前后左右各出檐 3 米，琉璃瓦覆顶，殿前置神农鼎和香炉，左右为钟、鼓楼，五角五坡面。整个建筑古朴典雅，带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炎帝大殿内，正中是高大的炎帝坐像，高 4.5 米。炎帝肩披兽皮，腰束叶裙，双手紧握谷穗，目光炯炯有神。大殿两侧是大型彩色壁画。壁画生动地再现了炎帝创世救民的丰功伟绩——“降牛耕田”“制耒作陶”“选种播谷”“百果藏实”“鞭草尝药”，还有炎帝初生时的“人身牛首”“神鸟送禾”“炎帝抱日”等故事彩绘图。

炎帝大殿的后面，是一个占地约 1 万平方米的新建祭祀广场。中间为一巨型火炬圈，内为约两米见方的“炎”字，周围为 9 条巨型浮雕龙。广场的南端，是新建的第二座炎帝大殿。大殿为梯形，两重，面宽 56 米，高 18 米，进深 26 米。殿内 9.5 米高的炎帝塑像，器宇轩昂。

大殿后面便是陵墓区。炎帝陵墓依山起冢，显得十分高大，直逼云天。墓冢底部用青砖围砌，上半部芳草盈顶。陵墓的正北，树立着一座高大的墓碑，碑上刻着“炎帝陵”三个遒劲刚毅的大字，为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写。墓碑的前面，摆放着一尊古朴厚重的四足大香炉，供游人上香祭拜。陵区前两侧，左右各立一石碑，上面分别刻着“福”“寿”两个大字。陵墓四周，松柏森森，十分幽静。

整个炎帝陵区，由一条中轴线贯通南北，牌楼、山门、大殿、墓冢以轴线空间为序列，顺山就势纵向排开，高低起伏，犹如巨龙腾空，气势宏大。

五、祭祀活动

据《国语·晋语》等大量典籍史料记载，以及著名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考证，

地处黄河中游的宝鸡是炎帝的诞生、成长之地。《史记·封禅书》载，早在前 424 年，秦灵公就在宝鸡的吴山祭祀炎帝，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官方祭祀炎帝活动。

传说农历正月十一为炎帝生辰，农历的七月初七为炎帝忌日。所以，宝鸡地区每年这两天及其前后便成了民间祭祀炎帝的日子。除此之外，在民间还有农历每月初一、十五和大年三十日祭祀炎帝的习俗。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民祭在今渭滨区峪泉村九龙泉神农庙、天台山神农庙、金台区先农坛等地进行。50 年代后期，随着神农庙、先农坛的拆毁或移作他用，民间祭祀一度中止。80 年代以后，民间祭祀炎帝的活动又陆续恢复。90 年代初，炎帝陵由天台山迁至常羊山，民间祭祀活动从 1993 年起开始在常羊山举行。祭祀时间除传统的每年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初七外，还有海内外宾客随来随祭的活动。此外，峪泉村 2000 年又在原址重修了炎帝大殿，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一举办民间祭祀活动。天台山也重塑炎帝像、修建祭祀场地，于每年的农历七月上旬举办民间祭祀活动。

1993 年 8 月 24 日上午，重修的炎帝陵庄严肃穆，各界民众祭祀炎帝大典仪式在这里举行。杨参政头戴皇冠、身穿黄马褂，秉烛、上香、敬箸敬馔等一套礼仪下来，用了一个半小时。这套完全继承了周礼的祭祀仪式，成了最初炎帝陵祭典的规范礼仪。后来几年，清明节、七月七的两次祭祀中，神农乡的一班人又在祭典仪式之后添加了乐舞告祭等内容，使祭祀活动更加完善。

1998 年杨参政去世后，又由熟悉礼仪的杨茂林继承了下来，他便成了宝鸡炎帝祭典的第二代传承人。但祭祀礼仪时间过长，最后将时间压缩在十几分钟之内，祭典仪式显得更加紧凑。

宝鸡市政府也从 1993 年开始，每年在位于市区的炎帝祠举行清明节“宝鸡各界民众公祭炎帝仪式”，又称“公祭”。1993 ~ 1995 年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举行公祭炎帝典礼，1996 年以后一般为每年的清明节举行。

1993 年 8 月 23 ~ 27 日，宝鸡市人民政府主办首届中国宝鸡炎帝节。8 月 24 日（农历七月初七），宝鸡市人民政府在刚竣工的炎帝祠隆重举行了公祭炎帝典礼，来自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省上和省级有关部门领导、兄弟地市党政领导、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专家学者等代表 1200 人参加了祭祀，由市长主祭并恭读祭文。

2005 年 10 月 3 日上午，宝鸡市人民政府在炎帝陵祭祀广场隆重举行了“全球华人公祭炎



图 7　炎帝陵祭祀　（编写组供稿）

帝大典”。国家有关部委和省上有关方面代表，世界华人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世界文化总会 、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香港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北美洲、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团代表，港澳台代表，各界群众等代表 5000 多人参加了祭祀。2006 年，宝鸡炎帝陵祭典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 9 月 19 日上午，宝鸡市人民政府在炎帝陵祭祀广场隆重举行了“全球华人公祭炎帝大典”。

第三节　西周王陵

西周天子墓在哪里？据《周易》《汉书》等记载，周代王陵不封不树，即陵墓地面上没有明显标志物，也不栽种树木，这给寻找周陵带来了诸多困难。

清乾隆年间，时任陕西巡抚的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今陕西宝鸡扶风县与岐山县交界处的北部）相传的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穆王姬满、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多有异议。

文献中对西周王陵最权威的说法是司马迁的《史记》，“文、武、周公葬于毕”，那么“毕”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对“毕”的位置众说纷纭，主要有：近丰镐说，京兆长安说，雍州万年说，咸阳北原说，岐周（周原）说，等等。因《史记》有“毕在镐东南杜中”之说，所以相信第一种观点的人较多。

一、周文王陵与周武王陵的讹传

1. 文王与武王

周文王（前 1152 ~前 1056），姬姓，名昌，季历之子，是西周王朝的奠基者。其父季历死后，继承西伯之位，故又称西伯昌，在位共 50 年。

周文王的主要功绩是为灭商做好了充分准备。他是很有作为的君主，勤于政事，重视农业生产，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拜姜尚为军师，问以军国大计，从而使“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在位时，以商朝的一个“方伯”的面目出现，表面上臣服于商朝，然而却积极进行灭商的准备。他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与国，成功地调解了虞、芮两国的争田纠纷，从而使黄河以东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成取代商纣的受命之君。随后文王向西北、西南用兵，为灭商建立了巩固的后方。沿渭水东进，攻占了商朝在渭水中游的重要据点崇（今陕西户县境南），扫除了周在东进道路上的障碍，据有关中的膏腴之地。在伐崇的次年，文王在沣水西岸营建丰邑，把政治中心迁于丰（今西安市西南）。至此，文王已完成了对商都

的钳形包围。

前 1046 年，其子周武王姬发灭商建周时，追尊他为文王。

周武王姬发（约前 1087 ~前 1043），是周文王次子，在位 13 年，为西周王朝开国君主。因其兄伯邑考被商纣王所杀，故得以继位。他继承父亲遗志，于前 1046 年 消灭商朝，夺取政权，建立了西周王朝。他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明君。死后谥号“武”，史称周武王。

2. 遗迹与遗物



图 8　毕沅所立周文王陵墓碑　　（摄影：郑茂良）

传说周文王、周武王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1957 年被陕西省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陵园内现遗存有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各一座，木牌坊一座，献殿两座，配殿两座及宋以后历代皇帝祭祀周陵碑石 40 余通。 是我国御制祭祀碑文最多的陵园，为“咸阳八景之一”，有“小碑林”之称。陵园以西有 2000 多株古柏，郁郁葱葱，蔚为壮观。

周文王陵封土形状为覆斗状，底部边长为：东 103.3 米、南 99.7 米、西 103.7 米、北 90 米，现存高度 14 米。陵北 146 米处为周武王陵，封土形状为覆斗状，底部边长为：东 57 米、南 66.2 米、西 55.5 米、北 65.4 米，现存高度 17.5 米。两陵前均有清代毕沅所立石碑一通。

3.“周陵”辨伪

《长安志》卷十三咸阳云：“周文王陵在县北一十五里毕原上，武王陵在文王陵北。周公墓在文王墓东。”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讹传，是由于古人对“毕原”的所在地存有歧义。

关于毕原及墓葬的所在位置，一说毕原在渭河南丰京、镐京附近。《史记·周本纪》云：“周

公葬于毕，毕在镐东南杜中。”镐指西周都城镐京，遗址在今长安斗门镇附近。杜指周时杜伯国，秦时的杜县，即今西安市西南杜城村附近。《括地志》记载周文王、周武王陵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与《史记》记载位置相近。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毕原在咸阳北。《史记·鲁周公世家·正义》引《括地志》：“周公墓在雍州咸阳北十三里毕原上。”

事实上在古代毕原就有两个，一在渭河以南的镐京一带，一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元和郡县图志》万年县云：“毕原，在县西南二十八里。诗注云：‘毕，终南之道名也。’书序云‘周公薨，成王葬于毕’是也。”又咸阳县云：“毕原，即县所理也……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也谓之毕陌。”

但周文王、武王的陵墓应在其时的都城丰、镐京附近一带，不会放在远离都城的渭河以北地区，这也符合古代陵墓随都迁移的规律。

实质上早在三国时，魏刘劭在《皇览》中已指出这两座陵墓并非周文王、周武王的陵墓，认为“秦武王冢在扶风安陵县西北毕陌中大冢是也，人以为周武王冢，非也。周武王冢在杜中。”唐代的《括地志》也云：“秦悼武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十五里也。”《皇清经解》引孙星衍《毕陌毕原考》指出：“毕陌在渭水北，秦文王、武王所葬，即今咸阳之陵，先诸书甚明，其误自宋人始。”因为宋人对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崇拜，误把秦的墓葬称为周的墓葬。之所以认为是误称，是因为周文王、武王当时的墓是没有封土的，“不封不树”是当时的葬俗，据《汉书·楚元王传》云：“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栎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垄之处。”又指出“及秦惠文、武、昭、孝、庄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其意为秦惠文王以前的秦君主，包括秦诸公、王陵墓皆无封土，到惠文王、武王时才有封土。由此可见，咸阳周陵的封土实为秦王陵，是后代人把渭河南的毕原混淆为渭北咸阳原的毕陌。而周文王、武王等的陵墓区在渭河以南的丰京、镐京附近。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明确指出：“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即在今长安杜曲一带。司马迁是距周代较近的史学家，其治史态度一向以严谨著称，所以其论是可以信服的。

把秦王陵混淆为周陵，也与历史上周文王、武王在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有关。



图 9　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拍摄的周陵镇“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4. 祭祀活动

周文王和周武王，由于继承和发展周族先祖后稷和公刘开创的农耕文化及翦灭残暴的商纣政权的功绩，使他们在中华文明史上享有崇高的威望。三千多年以来，中华土地上的历代统治者无不对他们尊崇备至。文王、武王、周公等人也就成了华夏子孙共同崇拜的偶像，受到后代的祭祀。日久天长，祭祀方式也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庙祭到陵祭的演变。

庙祭　东汉后期，在汉家陵阙衰落的同时，被误以为的周文王陵、武王陵却在民间被尊奉起来。此后，有了《魏书·地形志》所记的“石安县有周文王祠”。北魏时，长安的州牧和郡守常祀周文、武庙。延兴四年（474），北魏孝文帝派东阳王拓跋丕在长安祭周文王和周武王庙，算是秦汉以后对周文、武王的最高规格的祭祀。唐贞观、显庆、天宝等年间，均祭周文王于丰，祭武王于镐。宪宗元和七年（812）敕，“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阳者，宜令有司精加修饰”[①]。

陵祭　咸阳原上的周文王、周武王陵，从开始祭祀到现在，已有约 1800 年的历史。它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由东汉末到五代末，即 220 ~ 960 年。这 700 多年里，是“俗名”阶段。在此阶段内发生的祭祀活动，只能是民间的祭祀活动。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不排除官祭的可能。第二阶段，由北宋初开始，是官方在咸阳祭祀周陵的阶段。宋王朝决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 年。

定对周文、武王陵“各置守陵五户，岁春秋祠以太牢”[①]。金代京兆府对周文、武王三年一祭。明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派人勘察咸阳的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及汉高祖、景帝、武帝等陵。每陵设陵户五人守视，每三年，朝廷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寺乐舞生及有司前往陵前致祭。清代至民国，在明代祭祀制度的基础上，扩大了祭祀范围。由周文、武、成、康四王扩大至周公、太公、毕公等王公陵墓。其次，因咸阳境内陵墓太多，祭祀任务由附近各县分担。其中周文、武陵和周公、太公墓由咸阳分祭，成王陵由周至分祭，康王陵由户县分祭。

“周陵”的陵园，在明、清多次重修的基础上，经过 1929 年、1934 年两次大维修和扩充之后，柏林环绕，殿屋辉映，营造了可与山东孔林相匹敌的、被称为“咸阳祭周，曲阜祭孔”的祭祀和游览胜地。

目前咸阳市文物旅游局在此设有文管所。

5. 考古调查与研究

2002 ~ 2004 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周陵镇附近所谓的周文王陵和武王陵等 4 平方公里区域进行了钻探调查。根据陵园、封土、外藏坑、陪葬墓及遗物的分析研究，该陵的时代应是战国晚期。依据历史文献和秦东陵、秦始皇陵的考古成果，认为所谓的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实际上应是秦惠文王“公陵”、秦悼武王“永陵”其中之一。南面的封土是王陵，北面的封土是秦王夫人的陵墓。考古调查和勘探的详情见本章第四节秦国公王陵之咸阳陵区。



图 10　大宋新修周武王庙碑，现存咸阳市博物馆（摄影：郑茂良）

① 脱脱、阿鲁图：《宋史・礼八》，中华书局，1977 年。

二、周穆王陵

1. 墓主生平

周穆王（约前 1054 ~前 949），名满，昭王之子，周王朝第五位帝王，在位 55 年。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富于传奇色彩的帝王之一，世称“穆天子”，关于他的传说众多，最著名的则是记载周穆王的《穆天子传》。

昭王姬瑕第二次亲征楚国，渡汉水，船至中流落水淹死。周穆王继承王位，史载他曾用吕侯（也作甫侯）为司寇，命作《刑书》，告四方。他曾起兵九师伐楚，为父王报仇，东至九江。后又联楚伐徐。周穆王还在与徐逼近的涂山（今安徽蚌埠东）会合过诸侯。巩固了周在东南的统治。并制定墨、劓、膑、宫、大辟 5 刑，其细则竟达 3000 条之多。后世流传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从汲冢出土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所载，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况，现在被作为研究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

2. 遗迹与遗物

周穆王陵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道恭张村。

封土的形状为覆斗形，其西、北底边各有 23 米，陵东、南两侧因受破坏不规整，已经成直上直下的陡壁。陵顶呈一方形平台，其东西长约 13 米，南北宽约 12 米。陵的南边原有两个小冢，现已被平毁。



图 11 “周穆王陵”文物保护标志碑 （摄影：郑茂良）

陵南原本立有清代毕沅所立“周穆王陵”石碑，今已佚，现存西安市人民政府所立“周穆王陵”文物保护标志碑。从碑正面文字可知，该陵于 1956 年被列入陕西省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碑背面文字介绍：“周穆王陵现存封土呈棱台形，顶面积 4 分 2 厘弱，底面

积 9 分 4 厘，全高 7 米。”

1986 年 4 月该墓曾被盗掘，考古人员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该冢穹隆下为方形前厅，其北为后室，东西有侧室，其砖全系汉代遗物，证实此冢非周穆王墓，应属汉代墓[①]。

三 、周幽王陵

1. 墓主生平

周幽王（前 795 ~前 771），名宫涅。是周宣王（姬静）的儿子，西周末代君主，前 782 年至前 771 年间在位，共 11 年，谥号幽王。《史记》记载他“性暴戾，少思维，耽声色”。

继位后，自然灾害严重，泾、渭、洛三川发生了大地震。但他贪婪腐败，不问政事，重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实行独占山林川泽的“专利”政策。这样一来，限制了占国人多数平民的谋生出路，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又废嫡立庶，废除申后及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为太子，并加害太子宜臼，致使申侯、缯侯和犬戎各部联合攻打宗周。而此时的周幽王为取悦褒姒，数举骊山烽火，失信于诸侯。结果被犬戎兵杀死于骊山之下，前 771 年，西周灭亡。

2. 遗迹与遗物

周幽王陵位于西安市临潼区代王街道办宋家村。

清代史傅远纂修的《临潼县志》记载：“周幽王陵在县东北二十五里戏水原上。《两京道里记》：陵高一丈三尺，周三百步。”1991 年出版的《临潼县志》则称：从现场观看其墓，该墓可能是一座汉代无名氏墓，尚待考证。

目前陵高 3.7 米，其底边、东侧最宽处 17.1 米。已看不出其原来应是什么形状，四面都有明显的被削挖痕迹，特别是南、西两侧已成直立峭壁。陵东南角处立有一小石碑。正面文字为：临潼县文物保护单位，临潼县人民政府 1983 年 10 月 5 日公布。

四、西周王陵何处寻?

那么作为在西安建都的第一个王朝的王陵到底应该在哪里呢？实质上就是要寻找历史上的“毕”地所在。《史记・周本纪》中的正义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原上也”。唐人编著的《元和郡县图志》中关于毕原位置的记载与《括地志》基本一致。

①《长安县志》编纂委员会：《长安县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年。

由此可见，毕与毕原在唐宋时期已经不加区分，周王陵被认为位于毕原之上。那么，唐代的毕原在何处，它与史书中屡次提到的“毕”究竟是何关系呢？

近年来的考古资料对于确认唐代的毕原提供了可靠依据。在长安韦曲及塔坡村一带出土了葬于天宝十四年（755）和大历十年（775）的辩惠和如愿两人的墓志，志铭明确标明葬地就在毕原之上。在西安南郊三爻村出土了魏邈的墓志，葬地也为万年县毕原。此外还有数方出土地点不详，但墓志上明确标明葬于长安县永寿乡毕原、万年县宁安乡毕原及明堂县洪固乡之毕原的韦琼、卫夫人辅氏、韦惜等墓志。据考证，唐长安县永寿乡位于韦曲以北、长安城以南的今姜村一带，宁安乡位于今曲江池以南到三兆镇一带，洪固乡在东三爻村与南、北里王村一带。

从以上出土于毕原的唐代墓志来看，毕原的最小范围最东边已靠近浐河，西边在杜城村附近，北边到达姜村，南至韦曲。这个范围基本属于秦汉时期杜县辖域，而秦汉时期的杜县在辖域上既包括杜伯国又包括毕，杜伯国位于杜陵附近的杜县东部，毕应该位于其西部。《孟子正义·离娄》曰：“毕，文王墓，近丰、镐也。”西周镐京位于唐昆明池遗址北边。丰邑东以沣河为界，西至灵沼河，北至客省庄、张家坡，南至冯村、席王村。而从“毕西于丰三十里（约合今二十里）”的记载来看，毕应该位于长安县西部。

因此西周时期的王陵应该就在长安区，而不在咸阳原上。

研究成果

杨　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罗西章：《西周王陵何处觅》，《文博》，1997年第2期。

岳连建：《西周王陵位置初探》，《文博》，1998年第2期。

郑红利：《与西周王陵有关的几个问题》，《文博》，2000年第6期。

臧　振：《也谈武王葬毕》，《文博》，2004年第5期。

刘卫鹏、岳起：《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与确认》，《文物》，2008年第4期。

附一：周公庙“亞”字形大墓区

2004年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周原遗址进行常规普查时，

在岐山周公庙风景区发现一处西周时期高等级的大型墓葬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周公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大面积钻探和抢救性发掘。共钻探出墓葬22座，其中有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墓10座，三条墓道、二条墓道和一条墓道的各4座，另有陪葬坑14座。

在此以前，由于地下文物出土后难以妥善保管等原因，文物法规定各地不得擅自发掘王陵等高级别墓葬。这次周公庙获准发掘，主要是因为目前掌握的周代资料极其有限，此前也从未发现或发掘过一座周代王陵墓葬。发掘周公庙周代墓葬对于填补、丰富夏商周历史具有重大意义。

不少专家判定10座四条墓道大墓和4座三条墓道大墓应是周代王陵，因为只有周王才能享受到四条墓道。甚至认为这里要么是西周13个王，要么是周公旦及其子孙的墓葬。也有专家认为这些带四条墓道的墓葬规模普遍偏小，不大可能是王陵。

自2004年10月17日开始对18号墓和35号墓进行发掘，至2005年5月下旬，大部分发掘完毕，但是，各墓葬均有历代盗洞多处，被盗掘一空，除见到少数小玉残片和石磬残片之外，几无其他遗物发现。

附二：公刘墓

公刘墓又名“人祖坟”。位于陕西省彬县东40公里龙高镇土陵村南、泾河北岸的山谷之间。

公刘是后稷的后代，周文王的第十代祖先。封土略呈梯形，高约40米，占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墓冢顶部平坦。公刘墓周四山屏合，群峰揖拱，北枕山谷，南控泾水，草色浮动，势如伏龙，故名“周墓蟠龙”，为古邠十二景之一。

《史记·周本纪》载，公刘是后稷的曾孙，周文王的十代祖先。当夏后氏当政时，他的祖父失去了后稷官的职位，出奔到了戎狄。传到公刘，迁至豳，他继承先人事业，不辞劳苦，领导和团结部族群众，着手恢复后稷的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水渡渭河取材用，使行者有资，居民有积蓄，并积极地创造条件，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因此，他一直受到人们的歌颂和赞扬。

清以前，历代政府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一般每年都来这里春祭秋祀，仪式颇为隆重。陵前的公刘祠内现留存明清石碑5通。

公刘墓现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三：周太王陵

古公亶父，姬姓，名亶，是周文王的祖父。其后裔周武王姬发建立周朝时，追谥他为“周太王”。他率姬姓氏族二千乘，从豳循漆水逾梁山来到岐山（箭括岭）下的周原定居。从此姬姓的部落就自称为周人。姬姓氏族在古公亶父的领导下，疏沟整地，划分邑落，开发沃野，造房建屋。并营建城郭，设宗庙，立太社。构建中央机关，设官分职，改变了过去游牧民族的习俗，发展农业生产，使周逐步强盛起来。



图 12　清代毕沅所题“周太王陵”碑　（编写组供稿）

古公亶父约在前 1146 年辞世，他有三个儿子：太伯（也称泰伯）、虞仲和季历。古公亶父在位时，非常喜欢孙子姬昌（即周文王），想让姬昌以后能继承王位，但是周人的传统是长子为裔，而姬昌是他三儿子季历之子。太伯、虞仲明白古公亶父的心思，就欲让位给季历，出游荆楚，在夷蛮之地断发文身，失去了消息。于是古公亶父去世后他的小儿子季历继位，后来季历又传位给姬昌。周武王姬发在位时尊古公亶父为周太王，而太伯最后在东部沿海建立了吴国，在春秋时期曾经称霸一时。

古公亶父是周王朝的奠基人和缔造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政治家，是历史上的著名贤王。其墓位于宝鸡岐山县岐阳村北 300 米处的高地上。

在“文革”时期，周太王陵破坏严重。改革开放以后，岐阳村民自发集资、投工，给周太王陵培土。今陵高 6 米多，周长 150 多米，又竖立起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书的“周太王陵”碑，并增建了高大的碑楼。

2008 年，周太王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附四：王季陵

季历系后稷 13 世孙，太王古公亶父第三子，时周族渐兴，向东发展，季历之兄太伯、虞仲躲至荆蛮，文身断发，让出首领地位。季历继位后，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归顺，周族强盛，号称“西伯”。后季历为殷王文丁所杀。武王灭殷建周后，追封季历为“王季”。

西安市户县玉蝉乡陂头村西南，东距渼陂湖约 500 米处有一座东西长 41.4 米，南北宽 31.8 米，高 12.21 米的覆斗形封土，传说为周文王之父季历之墓。现王季陵陵园总面积为 7000 平方米。其地上建筑早年已毁，唯于封土南约 200 米处尚存土阙两座，高约 5 米，间距 75 米左右。陵前西侧曾出土大量秦汉瓦当等建筑材料，说明曾有过一定规模的殿堂建筑。封土前有清初陕西按察司佥事张宗孟撰文碑及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碑石各一通。



图 13　“周王季陵”封土和清代毕沅所立石碑　（摄影：郑茂良）

1957 年，王季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附五：梁带村周墓

梁带村隶属陕西省韩城市昝村镇，位于市区东北 7 公里黄河西岸的台地上。据考古勘探，在梁带村及其附近地区约 4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发现两周时期墓葬 1300 多座，其中，4 座带墓道的大墓当为诸侯级墓葬，车马坑 17 座。初步确定，梁带村村北一带为一处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大型墓地。

两周时期的墓葬在陕西省发现甚少，所以本次发现的梁带村两周之际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为了解和研究陕西及黄河沿岸周代的考古学文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墓葬制度以及社会历史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发掘清理表明，19 号、26 号、27 号三座大墓是成组分布的墓葬，很可能是两周时期诸侯国国君与两位夫人的墓葬，其出土文物之精美为以前所罕见，为研究两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手工艺以及古芮国的文化内涵、世系、地望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发掘情况看，27 号墓为“中”字形，有南北两条墓道，总长 60 米，与 19 号、26 号墓一样是一椁两棺，棺上有棺罩，随葬品十分丰富，包括了金、玉、铜、漆、石、铁等质料。在该墓中，首次发现了中国两周之际的金扳指，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青铜錞于，首次发现了三角形两面刃有銎戈，发现的铁刃铜削为陕西地区目前年代最早的铁器，发现的漆木建鼓为国内同类器物年代最早的建鼓实物。

26 号墓为“甲”字形大墓，墓道长 26 米，墓室长 7 米，宽 5.8 米。在 26 号墓中同样发现了数目可观的精美随葬品，包括 22 件铜礼器、6 件“弄器”和多组组玉佩饰。值得一提的是，26 号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高 50 厘米的铜方壶，壶盖内侧铸有铭文，为确定梁带村墓地的国别提供了新的证据，而作为玩物的“弄器”的出土，不但体现了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是墓主人生前奢华生活的真实写照。另外，26 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玉猪龙，属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距今 5000 年，器型巨大，保存完好，高 14 厘米，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出土地点最南的大型玉猪龙，充分显示出墓主的生前收藏爱好。还发现了由 189 颗玛瑙珠及 16 颗玉贝、16 颗玉蚕、48 颗玉龟、8 颗玉珠、4 颗玻璃料珠有机编排的玉握，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为复杂和奢华的两周玉握。组玉佩饰中的七璜联珠是目前陕西地区发现的等级最高的组玉佩饰，其人龙合雕璜中人的发束每毫米有 5 根，每根绝不交错，堪称西周时期高超琢玉工艺的代表性作品。

梁带村 3 座大墓的年代应为春秋早期，青铜铭文中数次出现了“芮”，但没有一个“梁”字出现，应该说大墓为周代芮国的可能性很大，从随葬品和墓式等判断，27 号墓的主人是男性，19 号、26 号墓的主人是女性，很可能 27 号墓是国君墓，19 号、26 号是其夫人墓葬，26 号应为正夫人墓。

梁带村所发掘的三座大墓保存之完好、出土物之丰富前所罕见，带铭铜器的出土为判断墓地的国别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多组组合清楚完整的玉组佩为研究西周到春秋时期的礼玉制度、服饰文化和高等级墓葬的青铜礼器与组玉佩的关系提供了特别珍贵的资料。这一墓

地发现的两周墓葬相当一部分保存较好，随着发掘和文物修复整理工作的逐步展开，许多两周时期的历史、文化、礼乐制度以及经济、文化、手工业制作等将逐渐被撩开神秘的面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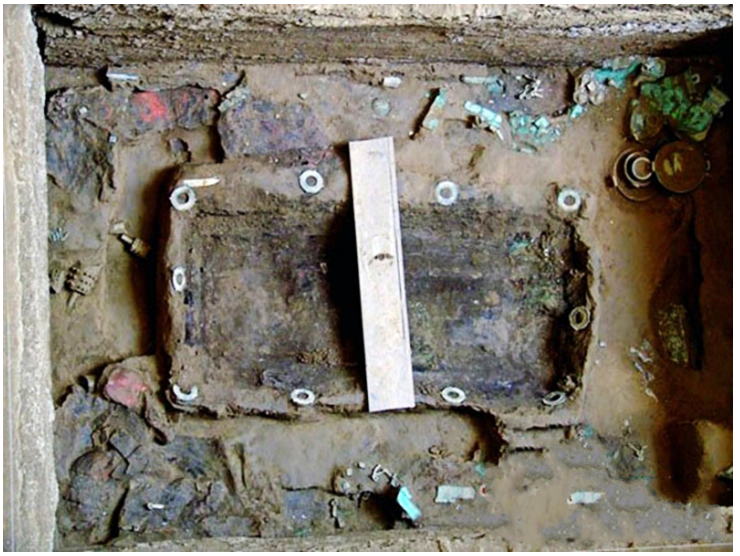


图 14　梁带村两周墓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关于墓地的年代，根据对 K1 和 M19 的形制及出土的青铜车器、青铜礼器和玉器的形制、花纹的分析，并参照以往的研究成果，初步判断其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东周早期。

关于墓地的等级，根据以往发掘的晋侯墓地和虢国墓地的墓葬形制、规模和随葬品，特别是 M27 出土的大量金器和漆鼓、石磬等判断，梁带村 4 座带墓道的大墓当为诸侯级墓葬。

关于墓地的国别，过去在今梁带村南 19 公里处发现有少梁城城墙，有专家认为这是春秋时梁国的都城。根据《史记》等记载，梁国地望应在今韩城市境内，从发掘的 M19、M27 及车马坑出土物的情况和墓地的规模分析，这些文化遗存从时间、空间看，有可能是梁国贵族墓地。但 M19 出土的青铜鬲口沿铸有“内（芮）太子”“内（芮）公”的铭文，M19 为代表的遗存则又有可能属于芮国遗存。而文献记载的芮国地望在今韩城以南约 100 公里的大荔县及附近。鉴于地望问题与所出土遗物存在一定问题，梁带村墓地的具体国别尚有待于确认。

梁带村芮国墓地的发现，是我国第一次发掘芮国遗存，成系统青铜器的出土，特别是“芮公”“芮太子”带铭青铜器的发现，将让有关芮国的文化内涵、世系、地望等重大问题迎刃而解。

梁带村周墓目前已经有一个陈列馆，博物馆正在建设中。

第四节　秦国公王陵

秦国公王陵是秦都城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帝王在驾崩后一般都葬在都城的附近，因而在规划都城时，都要事先考虑规划陵区所在，秦也不例外。按照“秦公陵园建筑，随国都而转移”[①]的规律，秦先后有天水、平阳、雍城、栎阳和咸阳等处陵区，除了天水陵区外，其余陵区均在陕西。

秦公王陵区呈系列化，自西而东延伸，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制度演变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秦的都城是由西而东逐步迁徙并扩大的，在甘肃礼县一带发现了秦国立国以后的大墓，位于甘肃陇南礼县的大堡子山上。后来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秦进军关中，并以关中为根据地，发展壮大，逐步统一了全国。因而其陵园也是由西而东，由天水附近的西垂迁徙到关中的平阳、雍城、栎阳和咸阳。秦灵公等虽从雍城迁往泾阳，但死后仍归葬雍城。

一、平阳陵区

平阳陵区位于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是宪公、出子、武公 3 人的墓葬区。

1. 墓主生平

秦宪公（前 724 ~ 前 704），春秋时期秦国国君。秦静公之子，秦文公之孙，名立。10 岁即位，居西新邑。宪公二年（前 714 年），自“汧渭之会”迁都平阳。宪公死后，其臣下废太子（后为秦武公），立幼子秦出子。

出子，前 703 ~ 前 698 年在位，秦宪公幼子，5 岁即位，在位 6 年，大庶长三父等令贼人杀之，复立旧太子武公。武公是秦出子的大哥，秦武公讨三父等杀出子之罪，灭其全族。

---

① 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秦文化论丛》第一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年。

秦武公（？～前 678），前 697 ～前 678 年在位。初为秦宪公太子，秦宪公卒，弗忌等三庶长另立秦出子为秦国国君。后秦出子被弗忌等杀害，他才得以即位。诛弗忌等三族，集大权于王室。秦武公在位时，在军事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武公元年（前 697），向东讨伐彭戏氏，打到华山脚下。并向西攻打邽、冀戎，设立秦国最早的县。传位于同母弟秦德公。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秦武公墓殉葬的人多达 66 人。

2. 考古调查与研究

关于秦宪公的陵墓，《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纪》云：“葬衙。”《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秦宁（应为宪）公墓在岐州陈仓县西北三十七里秦陵山。”《帝王世纪》也云：“秦宁（宪）公葬西山大麓，故号秦陵山。”

1978 年曾经在宝鸡市陈仓区太公庙发现了一组编钟 8 件。其中秦公钟 5 件，大小不同，角上饰 4 条小龙，干带上有四组变形雷纹，腹部饰兽目单连纹，鼓部饰卷龙纹。秦公镈 3 件，造型雄伟，鼓部齐平，中起四道飞棱，侧旁的两道飞棱，形状是九条盘曲的飞龙，前后两条则是五条飞龙和一只凤鸟。舞部各有一龙一凤，背对背，向后回首。纽上有环。镈身上下各有一条带状花纹，由变形的蝉纹与窃曲纹组成。秦公镈上有铭文，记载了秦早期的世系，对研究秦代先祖的历史极为重要。属于春秋早期制品。由于器形硕大，专家断定是宫廷祭祀用品，并判断附近应该有王陵。

2013 年考古工作者已在此探明一座“中”字形大墓和一座“甲”字形大墓[①]。显示出这里曾经是秦公的一个陵区，是秦人在把平阳作为都邑时建的陵区。由于当地民居很多，勘探工作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二、雍城陵区

雍城陵区埋葬着从秦德公到秦出公以前的 18 位秦公。 雍城作为国都 255 年，此后泾阳曾也作为临时性的都城，但其国君死后仍葬在雍城。这是因为一则这里地理环境优越，二则作为都城时间长，形成传统的墓地，即使后来灵公迁至泾阳，但宗庙仍在雍，所以死后仍归葬在雍城陵区，因而形成庞大的陵墓区。三则泾阳作为都城，时间较短，只是临时性的都城，不具备修建宗庙和陵墓的条件。

①《陕西宝鸡发现“中”字形秦公墓 主人疑为秦武公》，中国新闻网，2014 年 8 月 23 日。

雍城陵区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探已基本清楚，位于都城以南的三畤原上。陵区东西长 12 公里，南北宽 3 公里，面积达到 36 平方公里，成为目前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陵区面积最大，陵墓数量最多的一处[①]。

三畤原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因而土厚水深，地势平坦，是理想的秦公墓地。

目前在此已发现了 14 个大型陵园，49 座大墓，其中 1 座“丰”字形大墓，21 座“中”字形大墓，5 座“甲”字形大墓。1 座刀把形墓作为附葬墓排列在主墓的左前方，8 座“凸”字形和 18 座“目”字形墓和 1 座圆形车马坑、祭祀坑排列在主墓的右前方。占地面积达 36 平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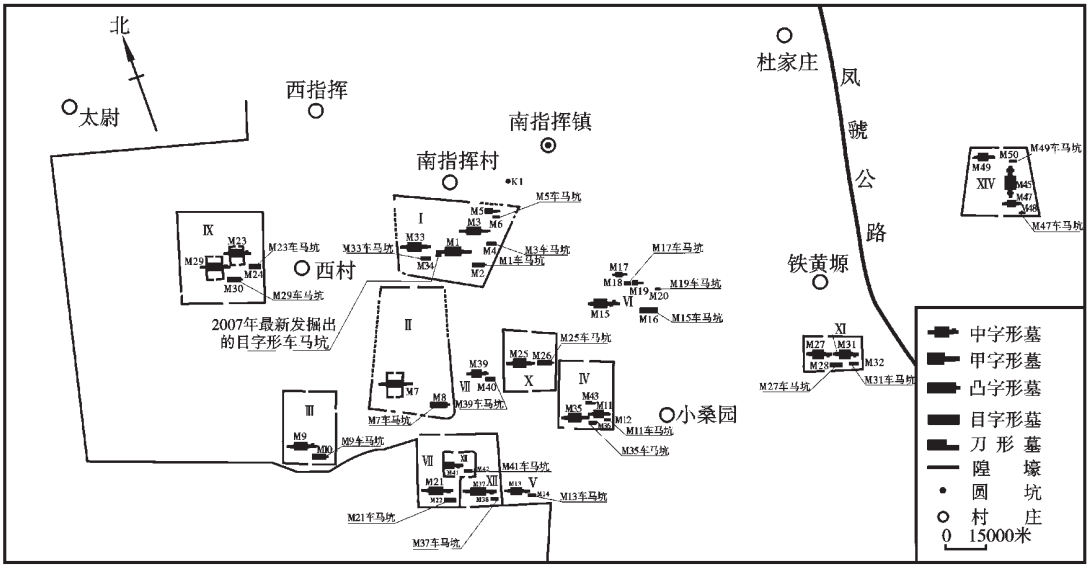


图 15 雍城秦公陵园分布平面图 （采自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经钻探得知，每座秦公陵园由不同数目的大墓组成。陵园平面多作长方形，墓葬集中于陵园南部，根据陵园内“中”字形墓葬数量，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只有一个陵园，陵园内有 3 座“中”字形墓，埋葬的国君在两位以上。第二种陵园内只有 1 座“中”字形墓，即只埋葬一位国君。第三种陵园内有两座“中”字形墓和车马坑，应是国君和其夫人并穴合葬。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4 期。

西边的“中”字形墓和车马坑都大于东边的“中”字形墓，东西并列，应是国君墓葬，东边的“中”字形墓应是国君夫人墓葬。这三种类型陵园以第一种类型最早，第三种类型最晚。

21 座“中”字形墓，无疑为秦公级别的墓，墓室呈长方形，东西各有一条墓道，东墓道较西墓道长而平缓，为主墓道，墓葬均为坐西向东。“中”字形大墓还有无耳室、单耳室及双耳室之分，耳室均开在东墓道，若仅有单耳室，则开在东墓道南壁。

“甲”字形墓发现 5 座。墓室呈长方形，仅有东墓道。

“凸”字形墓 6 座，主室呈长方形，在东壁正中有一短“墓道”，形似“中门”。二号陵园 M8 是最大的“凸”字形墓，全长 111.6 米、宽 25 米、深 23.5 米。“中门”长 4.8 米、宽 9 米。

“目”字形墓发现 15 座，平面呈长方形，最大的凤南六号秦陵园中的 M16，全长 106.4 米、宽 24.1 米、深 14 米；最小的为凤南十一号秦公陵园中的 M38，全长 9.7 米、宽 4.2 米、深 11 米。“目”字形或“凸”形墓按其形状及钻探中发现马骨来推测，可能是车马殉葬坑，排列在主墓的右前方。

另外还有“刀”形墓一座（M43）、圆形坑（K1）一座。

钻探各类大墓时，多发现墓中有填泥用炭的情况。陵园上未见封土，在 I 号陵园 M1 的墓室上，曾发现许多春秋时的筒瓦、板瓦，说明当时有墓上建筑，应为享堂建筑。在不少墓上还发现有绳纹瓦片。由于绝大部分已破坏，只在墓室与东墓道相接部位清理出一排柱洞，并见凹字形板瓦相互衔接叠压的现象。墓室的西端上部，曾发现长 0.82 米、大径 0.28 米、小径 0.21 米的绳纹水管一列。水管大头在北，说明水向南排放。在墓室上部发现绳纹瓦片的还有 M7、M9、M11、M13、M15、M21、M23、M30、M31 等大墓，说明可能均有墓上建筑存在。

从 49 座大墓的形制、布局和隍壕设施来看，每座陵园由不同类型的大墓 2 ～ 8 座按一定布局有机地组成。每座陵园的周围及部分“中”字形墓的周围都设有中隍或内隍，将陵园或“中”字形墓环围其中，其中有双隍形、单隍形、组合形。双隍形即以双马蹄形内隍围绕“中”字形主墓，再以中隍环围主墓、附葬坑及车马坑。单隍形为主墓两侧无内隍，仅以中隍环围主墓和车马坑。组合形即几座陵园共用中隍或陵中套陵。

秦国早期墓葬中的人殉极为严重。《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秦穆公的墓葬中殉葬 177 人。

在九号陵园还发现石俑两件。一件高 22.8 厘米、肩宽 6.4 厘米，躯体粗壮，面部丰满，眼、嘴凿痕依稀可辨；另一件高 21.4 厘米、肩宽 6.4 厘米，体形较瘦，嘴、眼清晰。两个俑前身均显齐平。这是秦代石俑的首次发现。

2009 年，为了配合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者在一号陵园先前探明的中兆沟内占地约 34 万平方米基础上，再次确认陵园中兆沟布局走向、门的结构和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的 8 座墓坑。此外，考古人员在中兆沟外又新探出 446 座同期或稍晚于该陵园的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

在六号陵园，除确认原 6 座墓坑分别为秦公大墓、陪葬墓、车马坑与祭祀坑外，新发现该陵园整个中兆沟布局与门的结构，在中兆沟内还新发现两座“目”字形祭祀坑，并首次确认该陵园中兆沟内占地为 31 万多平方米。在 6 号陵园中兆沟外，也新发现 703 座同期或晚于该陵园的中小型墓葬及车马坑。同时考古工作者对 6 号陵园中兆沟外侧 5 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虽然发掘对象均遭严重盗扰，但布局关系清楚，而且中型墓葬东南方必有一座陪葬车马坑。

据历年来对秦墓的发掘研究，单一车马坑陪葬系秦国贵族墓葬的显著标志。

（一）秦公一号大墓

1. 墓主生平

秦景公（？～前 537），名石，是秦桓公的长子，执政长达 39 年，将秦国势力范围不断推向中原，是春秋中后期秦国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君主，也是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他基本上继承了自秦穆公以来，特别是秦共公、桓公所执行的方针、路线，对内重用世族贤能，巩固中央政权；对外尊重周王室，加强与楚的军事联盟，对蛮戎及较远的华夏诸国采取安抚政策，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的敌国晋。

秦景公治理秦国长达 39 年，秦的国力逐步强盛起来，在军事活动中也屡次取胜，将秦国势力不断推向中原。

2. 考古调查与研究

位于凤翔南指挥乡的秦公一号大墓，是第一号陵园内最大的一座墓葬。1976 年至 1986 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用了 10 年的时间对一号大墓进行了考古发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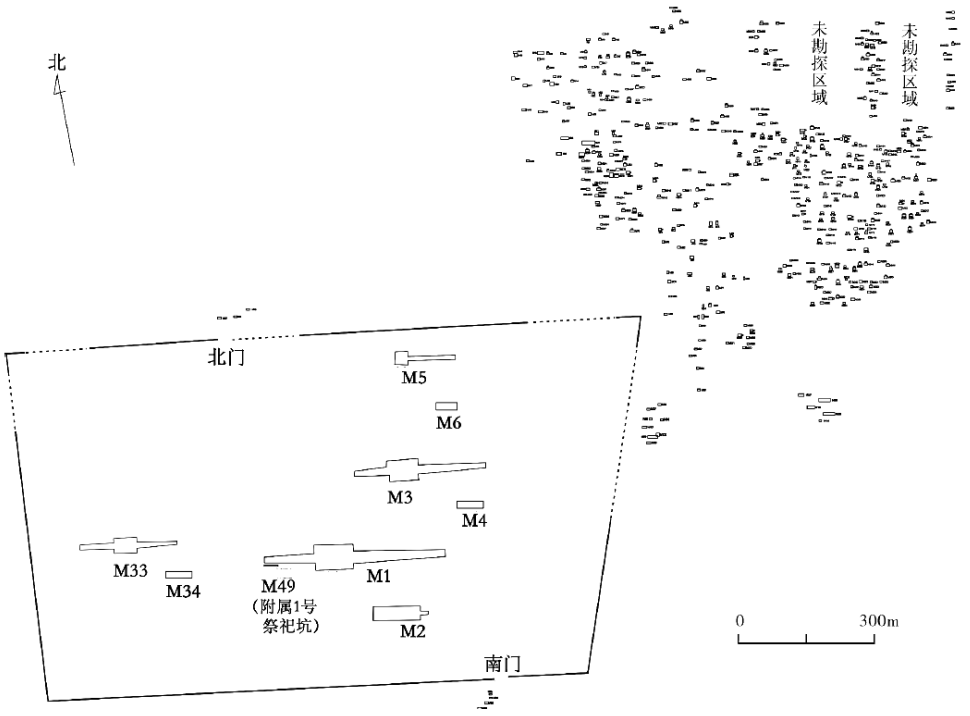


图16　秦公一号陵园平面分布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雍城一、六号秦公陵园第三次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 》2015 年第 4 期）

大墓平面呈“中”字形，墓坑深 24 米，口部宽 38.8 米、长 59.4 米，底部长 40 米、宽 20 米。东墓道长 156.1 米、西墓道长 84.5 米，墓全长 300 米，总面积达 5334 平方米，是我国目前所知先秦时代最大的土圹木椁墓，也是目前全国已经发掘的先秦墓葬中最大的一座。

该墓棺椁结构完整。椁室内有柏木椁具一套，都是用柏木枋（方柱形木材）垒砌而成的长方形木屋，之间有门相通。主椁室中部的地下，还有一个 60 厘米见方的“腰坑”，内有动物骨骼，这是商、周、秦墓葬中常见的一种葬俗。主椁是安放秦公遗体之处，四壁及椁底均为双层柏木枋，椁盖则是三层，中部有一道单层枋木垒砌的隔墙，将主椁分为前后两室，这种布局应该是仿照墓主生前居所“前朝后寝”的样式，似乎就是一个小宫殿。只看整套椁具的用料就足以令人惊叹。这些规整的枋木均由柏木材心做成，每根的横截面都是边长 21 厘米的正方形，两端中心有 21 厘米长的榫头，重逾 300 公斤，长度分为 5.6 米和 7.3 米两种。为了防止地下水沿着木料结节渗入造成腐朽，椁木原有的结节都被挖出，然后用铅、锡和白铁合

金浇注封护。在金属浇注过程中既没有烧坏木质，又浇注得很平整，说明当时把握合金配比和浇注火候的技术已很成熟。在椁室周围和上方填有木炭，外围再填青膏泥，这些保护层可以防止水分和氧气进入以保护椁室。而椁木的木质至今保存完好，这完全称得上是个奇迹。

椁中的墓主棺已被压碎，没有找到墓主完整的骨骸，仅发现一些零散的腭、肢、牙等残骨，以及裹在泥土中的少量绢麻衣物残片。在椁室四周及上部填土中，发现 186 具人殉、人牲的棺椁或箱匣，棺椁盖上有用朱砂写的文字、编号。其中 16 号箱殉保存最完整，长 2.35 米，宽 1.5 米，高 1.4 米，内有一长 1.6 米，高、宽



图 17　秦公一号大墓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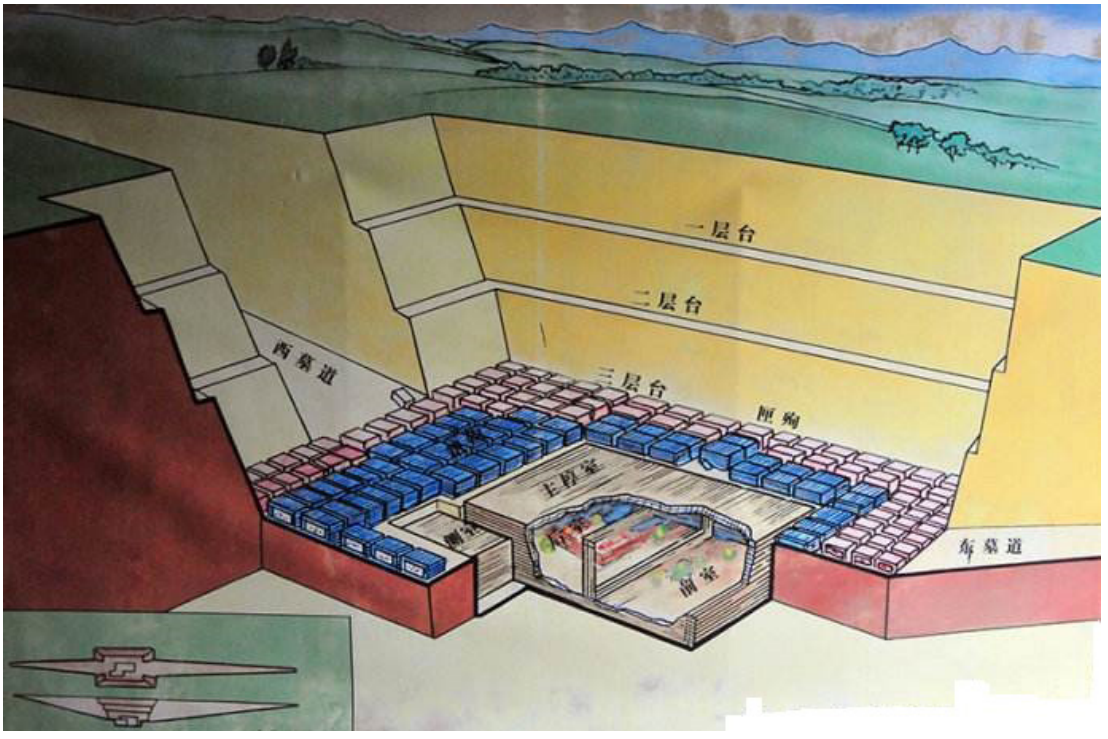


图 18　秦公一号大墓复原图

均为 0.66 米的木框架，木框架内有一蜷曲特甚的完整人骨架，两臂及两腿分别用绳索捆绑，在捆绑处有三根绞棒。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迄今发现墓内人殉和人牲最多的大墓。

该墓是一个上大底小的土圹竖穴墓，由底到顶有三层台阶，宽度在 1.5 ~ 6 米之间，第一与第二台阶垂直距离 5.3 米，第二与第三台阶相距 7.6 米，第三台阶高约 4.2 米，中部即为墓室。台阶环绕墓壁，宽 2 ~ 6 米。第三台阶中部即为椁室，深 4.2 米，椁分主副椁室两部分，平面呈曲尺形。主副椁室各有柏木椁具一套，形成一座长方体的木屋，长 14.4 米，宽、高均为 5.6 米，用截面边长为 21 厘米的枋木垒砌而成。构成主棺的东、西壁及棺底、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在主棺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如同柜子一般的形制。这便是目前发现国内最早的“黄肠题凑”结构墓葬。这一发现，证明了秦人不从周礼、大胆越制的气魄。

该墓虽经历史上 200 多次的盗掘，墓内仍出土文物 3500 余件，文物质地高贵，造型精美。包括金、玉、铜、铁、石、陶、漆木和丝织品等各类珍贵文物，其中椁室有 600 多件。出土物中有镌雕双龙的金带钩、镂孔镶绿松石的金泡、金啄木鸟、各种造型精美的金兽、白玉戈、玉璜、玉璋、透雕玉佩、石鞋、骨钉、陶器及漆器图案，十分精美。出土的 10 多件铁铲、铁锸，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一批铁器。

发掘后的秦公一号大墓，占据了考古学史上五个之最：是迄今发掘最大的先秦墓葬；墓内 186 具殉人是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是迄今发掘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椁室两壁外侧的墓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尤其是大墓中出土的 33 枚石磬是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 180 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

根据墓中所出石质编磬残块上的铭文“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八字，推断墓主可能是春秋晚期的秦景公。

在该墓附近还发现了车马坑和祭祀坑。车马坑坐西向东，平面呈“凸”字形，东西长 86.3 米，南北宽 24 米，深 14.6 米，面积 2088 平方米，是秦公陵园中较大的一座车马坑。内有秦公率领群臣驾驭车马田猎的强大车马阵容，车 60 乘，马 160 匹，驭手、将士百余人，及各种兵器、礼器等。祭祀坑已经发掘，面积 60 平方米，内有珍贵的祭器、祭牲和五组车马。

2006 年底，在秦公一号大墓西南侧又新发现并发掘了“目”字形陪葬坑一座。该坑长 17.5 米，

宽 3.1 米，深 12.5 米。坑底东西向依次放置五组车，每组车前分别有挽马两具。车体结构较小，不见车轮。每组车下各有一个长方形的殉葬坑。坑内有人骨 1 具，头向西，屈肢葬式，当为殉葬的“御手”。初步推断该坑为秦公一号大墓的祭祀坑[①]。

3. 保护状况

1998 年，经文物部门同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遗址所在地的凤翔县南指挥村合作，采取国有民助的方式，对秦公一号大墓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大墓遗址所在地的凤翔县南指挥村党支部书记赵生祥，带领村民集资投劳开始兴建遗址博物馆，历时 3 年，投资 240 多万元建成了全国首家民营遗址博物馆，于 2000 年 8 月 8 日正式对外开放。当时舆论界认为这是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的有益尝试。实际上，对于拥有遗址或者文物的当地居民来讲，一方面出于自豪感和骄傲，希望能对历史文化进行有益的保护与传承，另一方面则是发展当地旅游的梦想，使得村民们寄望于这些祖先的遗物多少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开馆之初，秦国遗址的巨大影响力引来媒体竞相报道，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图 19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编写组供稿）

① 资料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雍城考古队队长田亚岐提供。

然而建馆之初满怀憧憬的村民，却在 6 年运营过程中尝到了苦头。博物馆每年所有收入不到 10 万元，而用于非文物保护的基本维持费用就要 5 万多元。加之大部分出土文物被运到秦俑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内收藏物太少，对游客的吸引力就减弱了。另外，由于先天资金不足，博物馆只是进行保护性的恢复展示，展示方式单一而缺乏互动性，而且由于没钱，博物馆也无力开展市场营销，致使村民投资成本多年无法收回。

2006 年，出于保护文物资源、发展宝鸡文化旅游的目的，宝鸡市政府决定将秦公一号大墓遗址博物馆收归国有，更名为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归属宝鸡市文物局。

2013 年 12 月 17 日，秦公一号大墓车马坑保护展示大棚建设项目奠基，等到大棚建成后，将会申请对车马坑进行考古发掘。

（二）秦穆公墓

1. 墓主生平

秦穆公（？～前 621），一作秦缪公，春秋时代秦国国君。名任好，娶晋太子申生的姊姊穆姬为妻。在位 39 年（前 659～前 621），谥号穆。

秦穆公是秦国著名的国君，秦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是“春秋五霸”之一。随着秦国实力的强大，东方的晋献公为了缓和西边的压力，将女儿嫁与秦穆公为妻，这就是成语“秦晋之好”的来历。然而，秦穆公即位以后，为了开疆拓土，一方面与晋国作战，一方面着力消灭边境和境内的戎狄势力。

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由余、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贤臣良将的辅佐，其内政外交均取得了明显的成绩。他用五张黑羊皮换取楚国的奴隶百里奚为相，重用蹇叔治理国政，国力日益强大。秦国向东拓展遇到强大的晋国抵制，前 645 年与晋国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生俘晋惠公。后应夫人穆姬（晋惠公之姐）的求情，才释放了晋惠公。秦国先后夺得晋国在黄河西岸的土地（今陕西洛水与黄河之间），使国土往东拓展到了黄河边上。前 628 年，派孟明视等大将率兵袭郑国未遂。前 627 年，灭滑国（今河南偃师）。在回师途中，于崤山遇晋国伏兵，秦全军覆没。从此，秦国东进的企图受挫。此后，秦穆公采用谋士由余计策，向西发展，给西戎王送去美女，使其迷恋酒色而荒怠国事。前 623 年，秦穆公率军突袭西戎，戎军不敌，戎王被俘，秦军灭掉西部十二国，开地千里，成为西

戎的霸主，周襄王赐以金鼓致贺。这为四百年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2. 营建始末

前 621 年，秦穆公病逝，葬于雍，用 177 人殉葬。《左传》文公六年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3. 考古调查与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秦穆公墓位于陕西省凤翔县城东南隅的县博物馆西面。秦穆公墓占地近 10 亩，封土呈圆丘形，高约 6 米，边长 38 米，占地约 5000 平方米。大门前树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秦穆公墓”四字的高大碑石，是陕西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然而传统观点认为的秦穆公墓与考古工作者勘探发掘的秦国雍城遗址与秦公陵园的布局与特点存在明显差别。经过考古工作者的勘查和发掘，所谓的“秦穆公墓”实际上是秦国雍城内的一座高台建筑，因为当时的墓葬是不会有高大封土的。由于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这个建筑真实的台阶数目及台高已不清楚，其性质可能是礼仪性建筑或登高休闲类建筑。这一考古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建筑形制，尤其是确定秦国雍城遗址范围、进行大遗址保护与研究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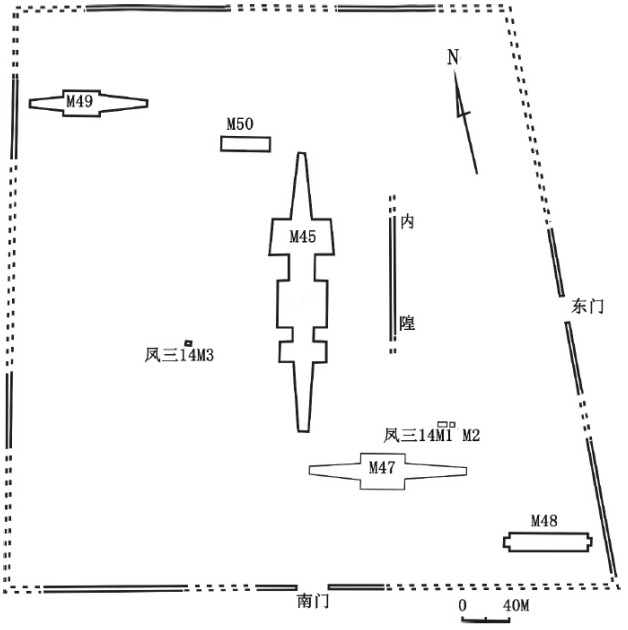


图 20　雍城陵区十四号陵园平面示意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4 期）

至于秦穆公到底埋在秦公陵园内的何处，考古工作者通过对十四号陵园的发掘，推测其应该是秦穆公的陵园。从陵园采集的“橐泉宫当”秦汉建筑材料，结合《史记·秦本纪》附《秦记》“夷公葬左宫",《汉书·刘向传》“秦穆公葬雍橐泉宫蕲年观下”等记载，发现的“橐泉宫当”可能为寻找并确认秦穆公墓提供了新线

索[①]。

研究成果：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文物》，1983 年第 7 期。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秦公陵园第二次钻探简报》，《文物》，1987 年第 5 期。

田亚岐：《雍城秦公陵园围沟的发现及其意义》，《秦文化论丛》第十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田亚岐等：《雍城秦公陵园考古工作获得重要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0 年 1 月 22 日。

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4 期。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三、栎阳陵区

栎阳陵区是秦献公和秦孝公的陵区，位于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

1. 墓主生平

秦献公（前 424 ~ 前 362），秦灵公之子，在位 23 年，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国君。早年流亡魏国，回国继位后在秦国进行改革，改革内容包括废止人殉、迁都、扩大商业活动、编制户籍和推广县制，大大提高了秦国的国力，并且数次发动收复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黄河和洛河之间）失地的战争。为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奠定了基础，是秦国实现再度崛起的奠基人。

前 364 年，献公下令秦军攻魏，夺取了秦国的故土河西地，一直打过黄河，深入魏境到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取得了秦国前所未有的大胜利。周显王向献公祝贺这一胜利，并赐予他与秦穆公一样的“伯”的称号。

秦孝公（前 381 ~ 前 338），名渠梁，战国时代秦国著名君主。一生中干过两件对秦国影响巨大的事情，其一是迁都咸阳；其二是任用商鞅变法。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战，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凤翔县博物馆：《雍城十四号秦公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4 期。

并迁都咸阳（今咸阳东北窑店镇），普遍推行县制，开阡陌。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外，与楚和亲，与韩订和约，联齐、赵攻魏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拓地至洛水以东，自此国力日强，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实行的军功爵制，大大调动了作战官兵的积极性，使秦国在与东方六国的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 考古调查与研究

秦献公二年（前 383）徙都栎阳，直到秦孝公十二年（前 350）迁都咸阳，秦以栎阳为都 34 年，其间只有献公和孝公两位秦公，他们二人的墓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葬嚣圉”“孝公葬弟圉”。

“嚣圉”所在地不详，“弟圉”据《水经·渭水注》云：“白渠又东，枝渠出焉。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栎阳城北……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又东南注于渭。”白渠在栎阳城北，今康桥和关山镇以南，莲芍故城在今渭南市临渭区下吉镇附近，由此可知秦孝公陵所在的弟圉应在栎阳城东、下吉镇以西一带，献公的陵墓应在孝公陵附近。据考古钻探所知，栎阳城的东北郊为王陵，东南郊为为小型墓区，是栎阳的国人墓地[①]。

献公和孝公的陵墓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也有记载：“何为甸人，守孝公、献公冢者殿。”何为冢？扬雄《方言》云：“冢，秦晋之间谓之坟。”《周礼·冢宰》云：“山顶曰冢。”《周礼·序官·冢人》也云：“冢，封土为丘垅象冢而为之。”从上所言，冢就是在墓上筑起了像山顶一样的封土。说明献公、孝公陵上已开始筑起封土了，这在秦帝王陵墓发展过程中是一件大事。

研究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工作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工作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四、咸阳陵区

前 350 年，秦迁都咸阳后在其都城的西北方向营建王陵，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及相关注引记载：“惠文王享国二十七年，葬公陵。生悼武王。”《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北一十四里”；“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正义》引《括地志》云：“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阳县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可知葬于这一区域中最少有惠文王和悼武王两位秦王及其王后。

1. 墓主生平

惠文王（前 354 ～前 311），秦孝公之子，名嬴驷，前 337 ～前 311 年在位。为了巩固自己既得的权利和地位，把商鞅车裂而死，但并没有废止商鞅变法。他继承孝公遗志，继续东进攻魏。魏国在秦军数次强大攻势之下，被迫割让上郡 15 县（今陕西北部地区）给秦。从此，秦国不仅把魏国黄河以西的地盘全部吞并，而且挺进黄河东岸。前 325 年，嬴驷将国君的称号由公改为王，并改元为更元元年，充分显示出秦实力的强大。前 318 年，魏、赵、韩、燕、楚五国联合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樗里疾破魏、赵、韩联军于修鱼，抵挡住东方联军的进攻。但西方的义渠又发兵袭破秦军于李帛。在东西夹攻之下，秦惠文王及时改变战略，于前 316 年，用司马错之策灭蜀。前 313 年，遣张仪自秦赴楚，挑拨齐楚关系，诱使楚国绝齐。然后又设计激怒楚怀王，诱使楚国冒险出兵，在丹阳（今陕西、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大败楚军，得楚地汉中。秦惠文王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扩大了疆域，而且针对东方诸国“合纵”攻秦的形势，采用了张仪的“连横”之策，实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打退了六国的进攻，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为后来秦王嬴政扫灭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悼武王（前 329 ～前 307），惠文王之子，名嬴荡。武王身高体壮，有神力，喜好跟人比角力，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贲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他派甘茂攻打韩国宜阳，攻陷了宜阳孤城，斩杀韩军七万人。韩国元气大伤，急忙向秦国求和。秦军占领宜阳后，东周都城洛阳门户洞开。秦武王亲率任鄙、孟贲等精兵强将大举进攻洛阳。周天子无力抵御，只好出迎秦武王。前 307 年，武王与孟贲比赛举鼎，结果两目出血，绝膑（折断胫骨），气绝而亡，时年 23 岁，周赧王闻报大惊，亲往哭吊。

2. 考古调查与研究

经考古勘探，在秦咸阳都城西北方向，东西长近 10 公里、南北宽约 7 公里的范围内，先后发现战国晚期大型陵园 3 座，分别是周陵镇“周王陵”、司家庄秦陵和严家沟秦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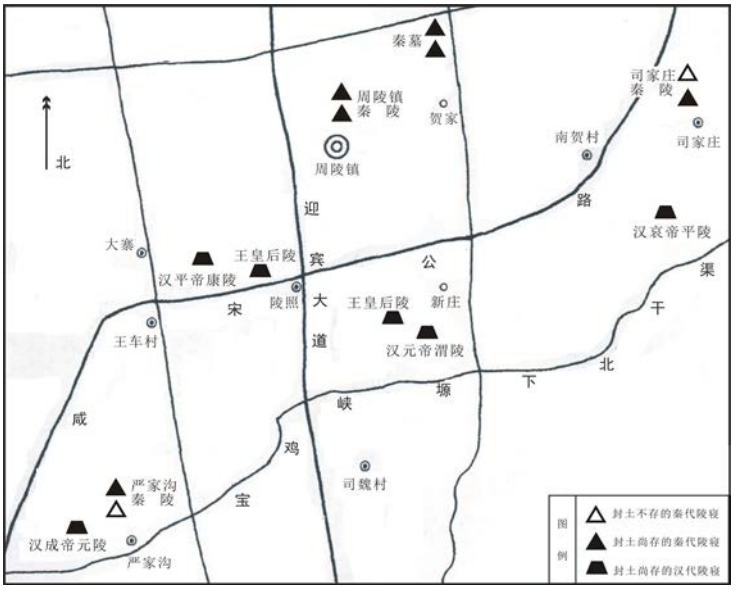


图 21　咸阳原上秦王陵分布示意图

（1）周陵镇“周王陵”

“周王陵”南、北两座封土前分别保存有清毕沅所立的“周文王陵”“周武王陵”石碑各一通，当地百姓亦称之为“周王陵”。2000 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确定这两座墓葬形制为四个墓道的“亞”字形，并发现有外围沟（隍壕），从而认为“周王陵”的时代可能是战国秦王墓。2007 年 3 月至 6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周王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在 0.62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探明“周王陵”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方向 170°，由南北两陵、内外双重围墙、双重壕沟、外藏坑、建筑遗址、小型墓葬等部分组成。以内围墙、内壕沟为界可将陵园分为内、外陵园，内围墙之内为内陵园，内壕沟与外围墙之间为外陵园。内陵园中除南、北两陵位于中部偏南处之外，还有少量的建筑遗址及外藏坑。外陵园内则有较多的外藏坑及建筑遗址，分布较为凌乱，规律性不强；外陵园的西北角、东北角及东侧外围墙、外壕沟之间的北段发现小型墓葬三组。

外围墙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略呈东南—西北走向，方向 170°。南北长 833 米，东西宽 528 米，墙宽 3 ~ 4 米。现存墙体距地面深 0.2 ~ 0.5 米，残存高度 0.6 ~ 0.7 米。墙体用夯土筑成，土质坚硬，夯层清晰。墙基较宽，从墙体两侧分别宽出 0.6 米。外围墙四面各辟有一门，分别位于南陵封土东西轴线的正东、正西及南、北陵封土南北轴线的正南、正北。外壕沟围绕在外围墙之外，二者间距为：东侧 34.5 ~ 39.5 米，南侧 46.5 ~ 50 米，西侧约 37 ~ 40 米，北侧 35.9 ~ 39.5 米。外壕沟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方向同前，长 950 米，宽约 639 米（西侧外壕沟全部叠压在公路之下）。壕沟保存基本完整，在与门址对应处断开。壕沟宽 14 ~ 17 米，深 3.5 ~ 5.5 米，上部较宽，下部逐渐内收，截面呈“U”形。沟内上部填土疏松，夹杂有残瓦片等，底部有较厚的淤土层。

内围墙、内壕沟位于外围墙内中部稍偏南处，各边相互平行，与外围墙、外壕沟构成“回”字形布局。内围墙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方向 170°，长 422 米，宽 236.5 米，墙宽 3 ~ 4 米。现存墙体距地面深 0.3 ~ 0.5 米，残存高度 1 ~ 1.2 米。在内围墙东北角和东南角钻探发现有夯土台基，由此推测，内围墙四角当时可能有角楼之类的建筑。内围墙四周共发现 6 处门址，其中东、西围墙分别设有两门，南、北围墙各设有 1 门。门址分别位于南陵封土的正东、正南、正西及北陵封土的正西、正北、正东位置。内壕沟围绕在内围墙之外，二者间距 1 ~ 3.9 米。内壕沟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方向同前，长 432 米、宽 246.5 米。壕沟保存基本完整，与门址对应处断开。壕沟宽 2.1 ~ 2.8 米、深 1.5 ~ 2 米，上部较宽，下部逐渐内收，截面呈“U”形，靠近内围墙一侧沟壁较缓，外侧沟壁较直。沟内填土较疏松，夹杂有少量残瓦片。内壕沟与外围墙之间的距离为 132 ~ 246.5 米。

内围墙之内的南北向轴线上，地面现有大型封土堆两座，二者南北对应，封土中心间距 221.5 米，边缘间距 146 米。

南陵封土形状为覆斗状，底部边长为东 103.3 米，南 99.7 米，西 103.7 米，北 90 米。顶部边长为东 48.1 米，南 41.4 米，西 46.6 米，北 43 米。现存高度 14 米。封土形状较规整，顶部平台宽阔，四面斜坡的中部略微隆起。封土正南立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的“周文王陵”碑。南陵墓葬形制为“亞”字形，由位于封土底部的墓室及四条斜坡墓道组成。由于封土堆积过厚，墓室情况尚不明确。四条墓道位于封土四面的中部，平面均呈梯形，靠近封土一端较宽，外端较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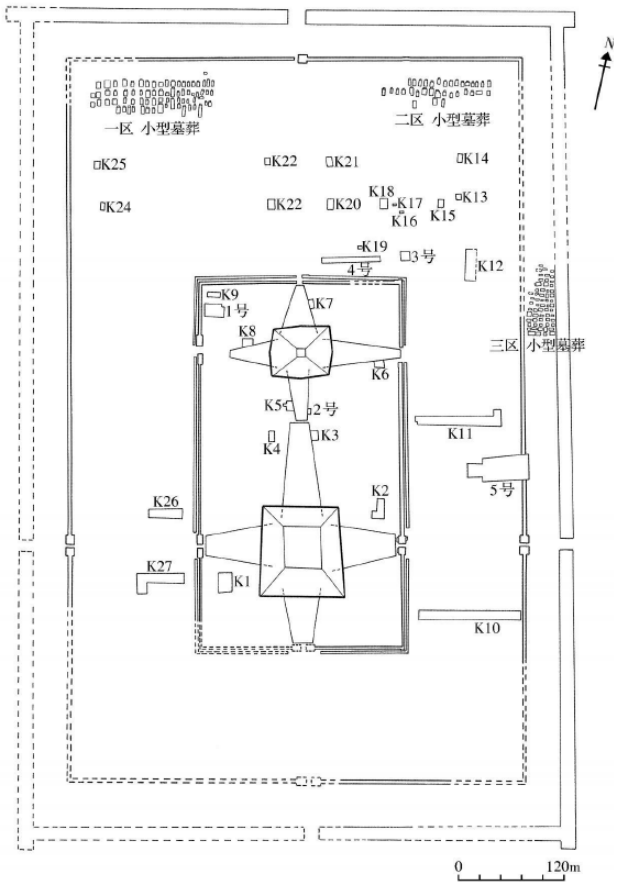


图 22 “周王陵”陵园布局图 （采自《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北陵封土形状为覆斗状，底部边长为东 57 米、南 66.2 米、西 55.5 米、北 65.4 米。顶部边长为东 10 米、南 9.5 米、西 9.8 米、北 9.5 米。现存高度 17.5 米。封土正南立有毕沅书写的“周武王陵”碑。北陵墓葬形制同南陵。

在“周王陵”陵园共发现外藏坑 27 座，其中 9 座位于内陵园（XZK1—K9），18 座位于外陵园（XZK10—K27）。发现建筑遗址 5 处，1、2 号遗址位于内陵园，3 ~ 5 号遗址位于外陵园。在外陵园内和东侧外围墙、外围沟之间共发现小型墓葬 168 座，集中分布在 3 个区，各区的墓葬排列较有规律。Ⅰ区位于外陵园西北部，共有 73 座，东西向排列，南北共 4 行；Ⅱ区位于外陵园东北部，现有 34 座，东西向排列，南北共 3 行；Ⅲ区小型墓位于东侧外围墙、外壕沟之间中部偏北处，墓地的西、北部受到砖厂破坏，共发现 61 座，南北向排列，东西共 5 列[①]。

（2）严家沟秦陵

严家沟秦陵位于汉成帝延陵东北部，距汉成帝陵封土约 600 米左右，现存两座封土，世传为汉成帝嫔妃班婕妤等人的墓葬。勘探发现双重园墙，外园墙外侧有围沟环绕。其陵园整体呈南北长方形，内园墙南北长 473 米，东西宽 236.5 米，墙宽约 3.2 米。园墙设有 6 处门址，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周陵文物管理所：《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

南、北墙各有一处，东、西墙各有两处，均位于两座陵墓的墓道对应处。外园墙保存状况较差，复原后南北长 1043 米，东西宽 526 米，墙宽约 3.2 米。在西墙与内陵园门址相对应处也发现了门址。外园墙之外还设有围沟， 南北长 1154.6 米，东西宽约 630 米， 围沟宽 7 ~ 15 米，深 2.5 ~ 7.5 米。陵园内现存两座封土，间距 160 米。其中南封土破坏严重，仅余高 4 ~ 5 米的平台，底部范围东西长 123 米、南北宽约 90 米。北封土呈覆斗形，底部边长 73 ~ 79 米，顶部边长 34 米，高约 15 米，在其封土南立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树立的“周共王陵”碑和“严家沟战国秦陵保护区”文物保护标志碑。

勘探发现两座墓葬均为“亞”字形，东南西北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南陵墓道长 44 ~ 100 米，宽 14 ~ 49 米，深 1.4 ~ 20.7 米。北陵墓道长 56 ~ 81 米，宽 10 ~ 31 米，深 0.8 ~ 19 米。该陵园共发现陪葬坑 12 座，其中内陵园 7 座，外陵园 5 座。陪葬坑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坑道，另有个别呈曲尺形、正方形。发现建筑遗址一处，位于内陵园南墙外侧，似为一东西向长方形院落。发现了 300 余座小型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围沟与外城垣之间，还有一部分位于陵园外西、南部区域。墓葬形制有竖穴方坑和竖穴洞室两种[①]。

（3）司家庄秦陵

司家庄秦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司家庄村北，南距汉哀帝义陵封土约 1200 米，世传其为汉哀帝大司马董贤之墓，故现今在封土南侧立有“董贤墓”文物保护标志碑。其陵园由三道围沟环绕而成，第一道围沟之内的区域为内陵园，南北长约 560 米，东西宽 536 米；第二道围沟位于第一道围沟之外，南北长 663 米，东西宽约 631 米；第三道围沟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 1285 米，东西宽 1038 米。三道围沟的北、东、南三面与墓道对应处均断开形成通道。主陵一座，居内陵园中部，现存封土平、剖面均不规则，底部东西长 80 米，南北宽 63 米，高约 15 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四面各有一条墓道。墓道长 41 ~ 52 米、宽 24 ~ 56 米；墓室东西长 90.7 米，南北宽 85.6 米，中部深约 23 米。“甲”字形大墓位于主陵北侧，无封土，坐西面东，通长 94 米，墓道位于墓室东部，长 65 米、宽 3.6 ~ 13.4 米，墓室长约 30.5 米，宽约 22 米，中部深 18 米。发现陪葬坑 6 座，其中主陵周围 4 座，“甲”字形大墓南侧 2 座。均为竖穴长方形，长 10.8 ~ 114 米。共发现建筑遗址 5 处，分别位于内陵园东部、西南部和

①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图 23　讹传为“董贤墓”的司家庄秦陵　（摄影：郑茂良）

西部。小型墓葬发现较多，除了主陵园内，三道围沟之间，在陵园东南部也发现了大片小型墓葬[①]。

秦咸阳都城西北的王陵虽然已经发现三个陵区，但是对各个陵区墓主目前还无法得到确认。例如对“周王陵”陵区两座陵墓的墓主，刘庆柱、李毓芳及徐卫民认为是秦惠文王和秦悼武王；王学理认为是秦惠文王与惠文后的公陵；刘卫鹏、岳起将其定为秦悼武王及其夫人的永陵。

研究成果：

阎文儒：《周陵为秦陵考辨》，《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2 期。

刘卫鹏、岳起：《咸阳原上秦陵的发现和确认》，《文物》，2008 年第 4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周王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

焦南峰等：《咸阳“周王陵”为战国秦陵补证》，《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

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王学理：《咸阳原秦陵的定位》，《文博》，2012 年第 4 期。

段清波、朱晨露：《咸阳“周陵”属性研究》《西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期。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①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五、秦东陵（芷阳陵区）

秦东陵区坐落在西安市临潼区韩峪乡东部骊山西麓，南起洪庆沟，北至武家沟，总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1986 年春，当时的临潼县文管会进行文物普查时，油王村村民王学良提供了线索，他们修渠时发现了夯土层，情况颇像西杨村之发现秦俑坑。后经省、县文物考古单位共同勘探，又证以史籍，断定这一带确系秦陵区。

陵区的地面建筑，经过秦末的战乱早已荡然无存。魏晋时，又有进一步的破坏，此后似乎连陵寝的确切位置也不甚了然。宋代《长安志》所记载的管辖四十村的东陵乡，可能大致还在陵区一带。但东陵乡始建于何时不清楚，到清顺治年间修县志时，就已湮没无闻了。甚至连东陵所在地的原芷阳县（汉曾改为霸陵县）县治的旧址，是在灞水西岸还是东岸，也因历代学者各执一词而难以确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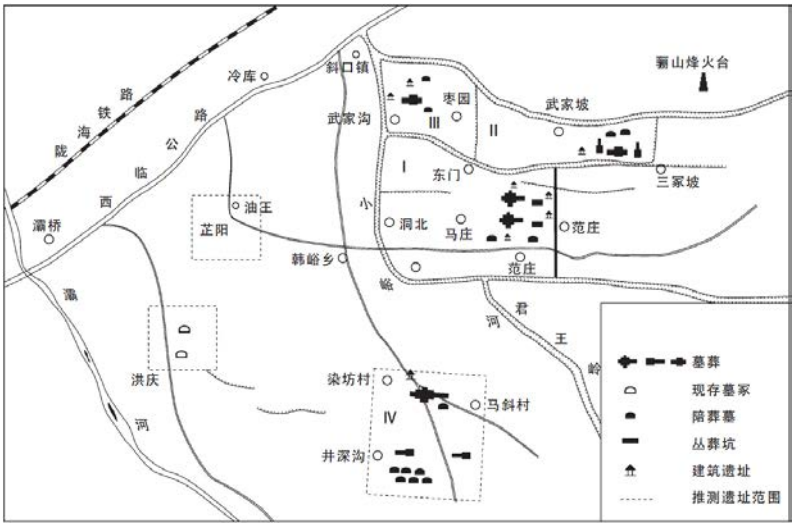


图 24　秦东陵平面示意图　（采自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秦陵区的重新发现，又为何称之为东陵呢？这是与位于关中西部的秦雍城的秦公诸陵相对应的，因此也可以把雍城的秦公陵园称为“西陵”。也有人认为“东陵”也只是就秦都城咸阳后出现的秦陵葬区而言，是相对于“毕陌”陵区而早就有的历史称呼[①]。东陵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汉书·萧何曹参传》：“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长安城东，瓜美，故世谓之‘东陵瓜’，从召平始也。”从而说明先有东陵，后有东陵侯。秦亡后，东陵侯开始在长安城以东种瓜，现西安东灞桥区与临潼区斜口乡交界处有邵平店村，即昔日召平种瓜处。秦东陵所在地就在邵平店之南。直到宋代的咸宁县，仍有“东陵乡”。

① 王学理：《东陵和西陵》，《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6 期。

秦东陵所在地为秦时芷阳县所在地，故史书多记载“葬芷阳”。

秦东陵到底都埋葬有哪些秦王？据史书记载：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年悼太子死魏，归葬芷阳。”

《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四十二年，安国君（昭襄王次子，即孝文王柱）为太子，十月宣太后薨，葬芷阳郦山。”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昭襄王享国五十六年，葬芷阳。”《索隐》云：“十九年而立，葬芷陵也。”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立，“尊唐八子为唐太后，而合葬于先王”。唐八子是孝文王的母亲，“合葬于先王”，即与孝文王之父昭襄王合葬，当然是葬于东陵。

《史记·秦本纪·索隐》云：“孝文王名柱，五十三而立，立一年卒，葬寿陵。”《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史记正义》云：“秦孝文王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唐万年县即宋咸宁县，治所在长安城中，由此推之，寿陵也很可能在东陵内。

《史记·秦本纪》载：“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史记索隐》云：庄襄王“名子楚，三十二而立，立四年卒，葬阳陵”。《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载：“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芷阳。”可知庄襄王的陵寝名阳陵，也在东陵之内。

《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曰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芷阳。”

从文献记载来看，芷阳是一个大的墓葬区，埋葬着秦悼武王以后到秦始皇之前的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宣太后等秦时著名的人物。

1. 墓主生平

秦昭襄王（前 325 ~前 251）：也称秦昭王，名则，又名稷，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其母为宣太后。战国时期秦国著名国君。前 251 年，昭襄王死，享年 75 岁。在位时间是秦历代君王中最长的。

在他统治时期，秦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表现在：第一，对“远交近攻”策略的创造性运用。第二，巩固对巴蜀的统治，巴蜀的稳定对秦以后的统一战争有很大促进作用。第三，消灭了义渠。义渠隐患的解除，不仅消除了秦的后顾之忧，而且戎地骁勇的士兵、众多的牲畜为秦灭六国

提供了雄厚的军事资源。第四，对国家的治理成就显著，长期执政为秦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五，辉煌的军事业绩。秦昭襄王时期除政治廉明、外交军事方针正确之外，还造就了一支能征善战的强大军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昭襄王时期是秦国发展的重要时期，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孝文王（前 302 ~前 250）：秦昭襄王之子，又称安国君。战国时期秦国君主，即位时已经 52 岁，在位仅 3 天就驾崩了。前 250 年，秦孝文王下令大赦罪人，按功表彰先王功臣，优待宗族亲属，拆除王家苑囿。

秦庄襄王（前 281 ~前 247）：也称子楚，本名异人，在位 3 年。他的父亲是秦国的储君安国君，母为夏姬。当时异人母子均不受安国君的宠爱，加上安国君有子 20 多人，异人于是被送往赵国作为质子。由于秦、赵两国关系恶化，不时发生战争，异人不仅倍受冷遇，而且随时都可能因为战争而丧命于赵国。他缺少出行的车马和日用的财物，生活困窘，十分失意。后得到商人吕不韦的资助和游说，成为孝文王的继承人 。

继位后，下令大赦天下，布施于民，并尊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养母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命吕不韦率军攻灭东周，另赐阳人（今河南省临汝县西）之地延续周的祭祀。同年又命蒙骜攻取了韩国的成皋和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并在此设立三川郡。至此，秦国的边界已延伸至魏国的首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攻打赵国，夺取众多城池，既而攻打上党郡，设立太原郡，扩大了秦国的疆域。

2. 考古调查与研究

考古工作者已对秦东陵进行了详细的勘探，在此发现了 4 个陵园。

（1）一号陵园

依山坡而建，地处骊山西麓的阪原地带，地势呈东高西低的坡梁。其范围南至小峪沟，北到武家坡村南无名沟，西界洞北村的小峪河，东达范家庄的人工壕沟。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000 米，南北宽 1800 米，面积 72 万平方米。发现了两个“亞”字形的大墓。墓顶上有封土堆，现高 2 ~ 4 米，东西长 250 米，南北宽 150 米，表面呈鱼脊形，大小基本相同，南北并列，相距 40 米。经钻探得知，其中的一座墓室略呈正方形，南北长 58 米，东西宽 57 米，四个斜坡形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的右壁各有一耳室；另一座的墓室也近方形，东西 58 米，南北 56 米，四个斜坡墓道，东墓道和北墓道右壁也各有一个耳室。在距地表 14 米以下有四

层青膏泥与木炭相间达 11.4 米，可见防护之严密。在一号陵园还有两处陪葬墓区和四处地面夯土建筑台基，陵区南北侧各有一天然壕沟，东面有一人工壕沟，相互连接[①]。



图 25　一条机耕土路南北穿过一号陵园南侧大墓封土东侧　（摄影：郑茂良）

勘探中所获遗物共 46 件，可分为铜、铁、陶器三类，计有铜盖弓帽 1、铜带钩 2、铜环 1、铁镈 1、陶罐 15、陶壶 5、陶鼎 3、陶敦 2、建筑材料 16 件。

2011 年 1 月 12 日，秦东陵一号陵园被盗案告破，追回被盗出土文物 11 件。经鉴定，查获的 1 件“八年造”漆木高足豆为国家一级文物，3 件漆木高足豆底座和 7 件漆木简均为国家三级文物。这些被盗出的文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特别是刻有“八年相邦薛君造”铭文的漆木高足豆更是弥足珍贵，印证了齐国人孟尝君曾在秦昭王时任秦国相的史实，也成为确认被盗陵墓主人的重要物证之一。而众多学者一直争议的相邦和丞相的地位孰高孰低，也在此得到证实，专家认为，“八年相邦”字样在器物左侧，“八年丞相”字样在右侧，按照古代礼仪左高于右，所以“相邦”地位高于“丞相”，西汉刘邦称帝后，因忌讳其名号，相邦这一官职被取消。

出土的漆木高足豆历经 2000 余年，除了底座有少许腐朽外，保存基本完好，漆木豆在古代是一种盛器，可放食物，后来还出现了豆形灯。保存如此完好的漆木高足豆在我国北方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是极其罕见的。在考古中发现的漆木器保存状况都十分差，大多都已腐朽，都只剩下遗存，根本无法提取。此次漆木高足豆保存十分完好，漆的颜色以黑色为主，用红色绘有流云状的花纹，至今色彩还十分鲜艳。保存如此完好，可能与埋葬的特别深有关，也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4 期。

与文物所处的密闭环境有关。在 7 件漆木简上，还保存有一些龙纹，而上面并没有发现文字，由于还没有对简做研究，也不排除这些简经过特殊处理后才能看到文字。



图 26　秦东陵一号陵园出土的漆木高足豆　（编写组供稿）

2012 年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安市临潼区秦东陵文管所对秦东陵一号陵园再次进行大面积考古勘探，目的是搞清“一号陵园”形制结构、地下文化遗存分布情况等信息，为划定一号陵园范围、制订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研究秦东陵陵寝制度等提供科学翔实的基础材料。经过本次大规模考古勘探确认，新发现了陵园四面的壕沟，有陪葬坑 12 座，小型陪葬墓区 3 处，共计 161 座，建筑遗址 11 处。陪葬坑主要分布在主墓墓道夹角处及东西方向。陵园建筑遗址主要分布在主墓南北方向。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陵园壕沟内侧 50 ~ 80 米范围内，形制有长方形竖穴洞室墓和方坑竖穴式墓两种，以陵园东北角及东南角分布相对比较密集。

此次勘探发现的建筑基址中，位于主墓西北的一组建筑范围较大，中部虽经后期冲沟冲毁及后期农业生产破坏，但从勘探结果来看，其结构应为一处规模较大的建筑遗存，其结构可能与秦始皇帝陵园封土西北部发现的陵寝建筑遗址形制相同，可对文献记载的陵寝建筑起到补正作用。东汉蔡邕所著《独断》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但从秦东陵一号陵园勘探发现来看，在帝王陵园中设陵寝建筑很可能要早于秦始皇陵。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一号陵园是秦昭襄王和唐太后的陵园。

（2）二号陵园

位于一号陵园的东北方向 1.5 公里处，即韩峪乡范家村北、骊山西麓阪原之上。陵园东自北沟村，西到枣园村，南至三冢村北无名沟，北达武家沟。东西长 500 米，南北宽 300 米，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有“中”字形大墓 1 座、“甲”字形大墓 3 座、陪葬坑 1 座，陪葬墓区 2 处和地面建筑遗址 1 处。“中”字形墓与“甲”字形墓基本呈“品”字形排列。“中”字形

墓通长 81 米，墓室居东西墓道之中，东西长 27.5 米，南北宽 23 米。东墓道长 23 米，宽 8 ~ 18 米；西墓道长 30.5 米，宽 3 ~ 15.5 米。地面现留有残冢，高 10 米，冢底周长 120 米，占地面积 1213 平方米。钻探中在墓室中心偏西部位发现有盗洞。另对两处陪葬墓区钻探，确知各有陪葬墓 4 座和 31 座，考古工作者清理了个别被破坏的陪葬墓[①]。

陵园有由天然沟道和人工修葺的与天然沟道相通的沟通形成的完整的防御设施。南北两面以天然壕沟作屏障，东面经钻探得知早年系一条大体为南北走向的不规整的天然壕沟，经人工修葺为陵园东界，西界为一天然断崖。

在 2013 年的考古勘探中，考古人员在秦东陵二号陵园新发现了两座“甲”字形大墓和小型墓葬 17 座，至此二号陵园“甲”字形大墓达到 5 座。

出土遗物分铜质、铁质、石质和陶质等四类 32 件，计有铜盖弓帽、带钩、镞、镜及铜饰、铁削、玉璧、陶鼎、陶罐、陶壶、陶盒、陶盆、云纹瓦当、大板瓦、筒瓦等。在一些陶器残片上还发现有陶文。



图 27　秦东陵二号陵园地面上尚保存的墓冢　（摄影：郑茂良）

二号陵园的墓主暂时不详。

（3）三号陵园

位于一号陵园西北约 1.5 公里处，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为一“中”字形墓葬，东西方向，西墓道略长于东墓道。陵园西、北两面利用天然沟壑为其兆沟，而东、南两面兆沟则为人工开凿。陵园有陪葬墓区 1 处，位于陵园东南，发现小型墓 4 座，建筑基址两处，分别位于“中”字形大墓正北及正西处。

① 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二号陵园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4 期。

三号陵园的墓主暂时不详。

（4）四号陵园

位于马斜村，与一号陵园隔河遥相对应，约距 2.5 公里，属骊山西麓的阪原地带。陵区的规模，东起马斜村，西至染房村，南抵井深沟，北到小峪河南岸，总面积 80 万平方米。陵园内有“亞”字形墓 1 座，“中”字形墓 1 座，“甲”字形陪葬墓两座，小型陪葬墓群 1 处。四周有隍壕，北面为造陵时专门开挖的，东、西、南则利用天然壕沟。

“亞”字形大墓地表无封土，东西长 278 米，南北宽 181 米，墓室近于正方形，东西 56 米，南北 55 米。东墓道长 152.5 米，西墓道长 6 米，南墓道长 78 米，北墓道长 54 米。在距地表 14 米以下有四层青膏泥与木炭相间，达 11.4 米，可见密封之严密。

四号陵园这座“亞”字形大墓同一号陵园两座“亞”字形大墓不同的是：四条墓道均有耳室。墓室有四层青膏泥与木炭相间保护。从该墓 4 个墓道都带有耳室这一点看，其时代可能略晚[①]。

2011 年考古工作者新发现了陵园内残存的围绕“亞”字形大墓的东、南、北 3 段内壕沟及南侧外壕沟，同时还发现 1 座“甲”字形墓葬和 4 段壕沟、125 座小型墓葬。秦东陵四号陵园面积达 100 万平方米，是由 1 座“亞”字形大墓居中，双重壕沟围绕的陵园，内外壕沟均为人工修筑而成[②]。

2014 年考古工作者在陵园内部发现了一座礼制性建筑，是考古发现的第一座战国时代秦国陵寝礼制建筑，为研究秦公帝王陵园礼制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次发掘区域位于陵园东南部，为勘探新发现的“中”字形墓葬东墓道南侧。建筑遗址呈“凹”字，总面积达 2230 平方米。根据各种考古材料推断，该建筑应建于战国晚期，和墓葬时代相同，应该是用来祭祀长眠于“中”字形大墓内的某一位秦国贵族的[③]。

2015 年，考古工作者对四号陵园继续做工作，对一座“中”字形墓葬所属的建筑遗址与外藏坑进行了发掘，建筑遗址夯土地基宽 7.5 米，东侧残留夯土墙体宽 3.5 米，墙体两侧有宽 1.5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 年 3 期。

②《华商报》2012 年 1 月 11 日。

③ 腾讯网 2015 年 5 月 4 日。

米的瓦砾堆积。有外绳纹内麻点纹的板瓦、筒瓦，还有内饰布纹的筒瓦遗存，有四叶纹、鹿纹、锚形、太阳纹样的瓦当。这一面朝“中”字形墓葬的建筑遗址，是作为墓葬祭祀类礼制建筑存在的。出土的绳纹板瓦、筒瓦，鹿纹、四叶纹等瓦当，符合战国秦的时代特征。该外藏坑口大底小，符合战国晚期的时代特征。同时首次在秦东陵发掘了一大型的车马坑，经发掘，东墓道南侧的外藏坑埋藏 3 辆木车，每辆车有两匹马。特别的是这座外藏坑底部，也就是木车和马放在坑底后，上部用大量的大块料姜石填埋，料姜石十分坚硬，难以挖掘，专家推测，可能是为了防盗。该外藏坑为口大底小的敞口形，无二层台结构，符合战国晚期的时代特点。随葬的车马为“中”字形墓葬的车马坑，是近年来秦车马坑的首次发掘。

研究成果：

陕西省考古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3 期。

程学华、林泊：《秦东陵第二号陵园调查钻探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4 期。

陕西省考古所秦陵工作站：《秦东陵第四号陵园的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3 期。

张海云、孙铁山：《对秦东陵有关问题的几点看法》，《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5 期。

徐卫民：《秦东陵考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第 5 期。

赵化成：《秦东陵刍议》，《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3 期。

刘云辉：《论秦国君墓葬名称演变的原因》，《文博》，1990 年第 5 期。

陈治国：《秦东陵称谓考辨》，《文博》，2012 年第 2 期。

焦南峰：《秦陵的形制特点及其演变》，见《梓里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马振智：《秦国陵寝制度研究》，见《梓里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七七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朱学文：《秦东陵出土漆豆研究》，《文博》，2013 年第 2 期。

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附一：韩森冢

位于西安市东郊韩森寨附近。关于韩森冢的主人，虽然有是庄襄王墓的民间传说，但到底是谁的墓，已经争议了上千年。

汉代赵岐的《三辅旧事》认为是“子楚母冢”，也就是秦庄襄王母亲夏太后的墓。

三国时期的《皇览》断定其为“吕不韦冢”。

唐代韦述的《两京道里记》称其“在通化门东二里”，为秦始皇父亲秦庄襄王的“寿陵”。

唐代刘悚所著笔记小说集《隋唐嘉话》载：“望京城东有冢极高大，俗谓吕不韦冢。以其锐上，也谓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禅师，言见鬼物，云：秦庄襄王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冢，而后代人妄云不韦也。”

宋代宋敏求《长安志》也将韩森冢称作“尖冢”，认为，“其冢制度广大，岂人臣所宜”，应为“秦庄襄王寿陵”。

葛慧认为，“韩森冢”是汉武帝孙子刘进的墓，人称“皇孙冢”。随着时间推移，由于谐音，人们误传为“韩森冢”。

周志学认为，韩森寨西北高地上的大冢是汉武帝之孙、汉宣帝父亲刘进的“皇孙冢”。皇孙冢的西南方向不远处过去有胡同道，原来的地势和皇孙冢所在的地势相同，上面有一个周秦时代的大冢，叫韩森冢。汉建“皇孙冢”后，冢高且大，与韩森冢相比特别显眼。后来就把“皇孙冢”讹传为韩森冢。那不大显眼的小冢，于20世纪60年代修建西安动物园时被毁掉。

王学理虽然不赞同是汉代刘进墓的观点，他认为刘进和王夫人的悼园在今西安市北郊张



图28　韩森冢封土　（摄影：郑茂良）

家堡一带。同时也否定了前述史料记载。因为吕不韦冢在今河南洛阳北邙山，夏太后墓在秦杜城遗址以南的长安区王曲街道贾里村。“秦庄襄王寿陵”之说，显然是把秦孝文王陵与秦庄襄王陵混而为一。从韩森冢雄壮的外观上还难断定其时代，因为它属于秦汉陵墓流行的那种覆斗形。但是，它正处于汉长安城东郊墓区范围之内。从该冢附近已发掘的墓葬看，在迎祥堡、金花北路、互助路、幸福路等地都有汉墓群的存在，但无一秦墓出现。韩森冢属于秦陵的可能性很小，而属于“恭皇”刘康陵寝的可能性最大。

为配合新城区韩森冢周边改造，受西安市文物局指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对“韩森冢”及周边近 8 万平方米区域进行了整体考古勘探调查。在封土以外采取 1 个平方米 5 个孔的梅花状布孔方式，在封土周边的核心区域灵活布孔。因此，他们虽然至少打了 15 万个孔，但在封土上只打了 80 多个孔。一般普探孔平均孔深只有 1 米，有些三五厘米，所有的孔都没有打穿墓室。经过勘探，韩森冢封土为覆斗形，底边东西长 73 米，南北宽 75.5 米，以现周围地表为标准高度 20 米，比初建墓时地表下降了 5 米。说明 2000 多年来，人类活动把陵周围的土向下挖了 5 米。封土过去可能还高。主墓坐西朝东，为有 4 个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周围发现陪葬墓 3 个、陪葬坑两座。除韩森冢西部因有堆积建筑垃圾等障碍未能彻底勘探调查外，其他三面都进行了勘探，但没有发现壕沟、城墙等陵园遗迹，其一可能是和历史上破坏有关系；其二，这里是个高地，东、北、南都是断崖，如果这个地形变化不大的话，当时可能就利用自然断崖作为陵园的界线。从墓葬形制等来判断，基本上能确定它应是战国秦时期王侯级别的墓葬[①]。

据《史记》，昭襄王四十年以后葬芷阳的有悼太子（昭襄王四十年）、宣太后（昭襄王四十二年）、昭襄王与唐太后（昭襄王五十六年）、庄襄王（庄襄王四年）与帝太后（始皇十九年），另孝文王与华阳太后“葬寿陵”。结合目前关于秦陵的调查情况，“韩森冢”为秦孝文王寿陵可能性更大。张海云、孙铁山二位对此有较充分的论证。“韩森冢”规模小于秦东陵发现 3 座“亞”字王陵应与秦文王在位极短有关，据《史记》载（孝文王）“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

另外根据 1930 年西京筹备委员会测绘的西安地区地形图和 1968 年卫星图片，“韩森冢”正西侧 127 米处有一高 6.5 米覆斗形封土，从其相对位置与规模看或为王后墓，但还需要进一

①《考古专家称韩森冢是秦王陵，墓主是谁曾争议千年》，《西安晚报》2012 年 4 月 28 日。

步调查。由于勘探调查范围有限，“韩森冢”作为秦王陵的诸多因素尚不清楚，如陵园布局、王后陵墓、陵寝建筑等等，这些均有待进一步调查[①]。

附二：神禾原秦大墓

2004 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市长安区神禾原贾里村东发现并发掘一座规模巨大、级别很高的陵园。该陵园南北长 550 米、东西宽 310 米，占地面积约 260 亩。园区外设兆沟，内筑夯土围墙，四面围墙中部各置一门，建有门阙。园内有隔墙将陵园分为南北两区，隔墙中部开设一门。其中北区南北长 410 米，有带 4 个斜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一座，墓道旁分布了 12 座陪葬坑；南区有房屋建筑和灰坑（或祭祀坑）遗迹。“亞”字形大墓墓圹位于陵园中心，整个陵园是迄今为止发掘过的规模最大的战国秦陵园遗址。

大墓墓圹东西总长约 140 米、南北宽约 110 米，深 15 米，椁室东西长 12.1 米、南北宽 10.5 米、深 4.3 米。近似方形，椁室位于墓室中部，四周用枋木堆筑椁壁，有木质椁盖、底板和枕木，因被盗焚，棺椁关系已难详知。但从残余椁木印痕和炭灰榫卯结构观察，似可见有棺椁三重，应为内、外棺及椁。墓道、墓室填土均经夯筑，坚硬致密，夯窝直径在 8 厘米左右，夯层堆积较为水平，厚约 0.4 ～ 0.5米。

尽管墓室在早年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盗掘并被大火焚烧过，但在墓室的发掘中，还是出土了近千件文物。出土有刻字石磬、刻字茧形壶、青铜器、银饰、金饰、错金银饰、玉饰、琉璃以及大量棺钉等文物。墓室东南角处的盗洞内撒落金银柄铁刀、青铜带钩、错银青铜底座、珍珠、玉璧、玉玦、玉瑗、玉环以及算筹、刻字陶罐等大量文物，由此可见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共出土 600 多件以青铜为主的车马器，青铜车马器上发现刻有“五十九年”“左厩”等重要文字，另外陪葬坑中出土的十多件巨型茧形壶上刻有“三十四年”的铭文。这个大墓是迄今发掘的中国第二大墓，仅次于 20 多年前发掘的秦景公大墓。墓室及墓道周围，还分布有规整的 13 座长方形条状陪葬坑。

有的器物上发现了对判断大墓的时代以及墓主人身份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字，如在石磬上发现“北宫乐府”及“卫”的刻文；其中一件茧形壶上发现“私官”的刻字；出土“内史之印”封泥一枚。在大墓周边陪葬坑中发现 4 套六马驾车。我国目前只有在洛阳东周王陵、湖北九

①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东郊“韩森冢”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15 年第 2 期。

连墩战国古墓群内和神禾原战国秦陵园遗址发现了“天子驾六”实物，再一次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天子六驾”的记载是存在的，也可看出墓主地位之显赫。



图 29　神禾原秦代大墓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考古工作者首次在陵园发现了一个埋有动物活体的 K12 坑陪葬坑，称为珍禽异兽坑。在坑内，发现了许多珍禽异兽的骨骸，共有 16 个个体，有豹、熊、猿、羊、鸟等动物。用这么多珍贵的动物陪葬，显得十分罕见。在 K7 陪葬坑中出土了 20 多组大型的茧形壶，高达六七十厘米。修复好的灰陶茧形壶非常气派，壶上还刻有弓箭、官署、纪年、地名等文字。其用途可能是装水、酒或者粮食的，一次出土如此多茧形壶在全国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①]。

该墓发掘后引起高度关注，特别是对墓主人的身份问题争论激烈。

通过对该陵园的相关资料分析，多数学者的意见是该陵园的时代具有战国晚期秦陵的特点。参与发掘的专家初步断定墓主人是秦始皇帝祖母夏太后的陵园；有人从大墓形制与后来出土的各类文物判断，认为应是秦代的陵墓，推测为秦二世之墓；田亚岐等从秦国葬制传统方面考察，认为夏太后不可能享有四出墓道王制的墓葬规格；段清波从这座陵园的形制、布局、结构、墓室、陪葬坑的形状和结构以及出土物诸方面考察，判断该陵园及大墓的时代晚于战国晚期，早不过秦始皇陵园建设时期，其下限为西汉早期，约属文帝时期，墓主人可能是汉惠帝的张嫣皇后[②]。

总之，神禾原秦陵园完整地考古发掘，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秦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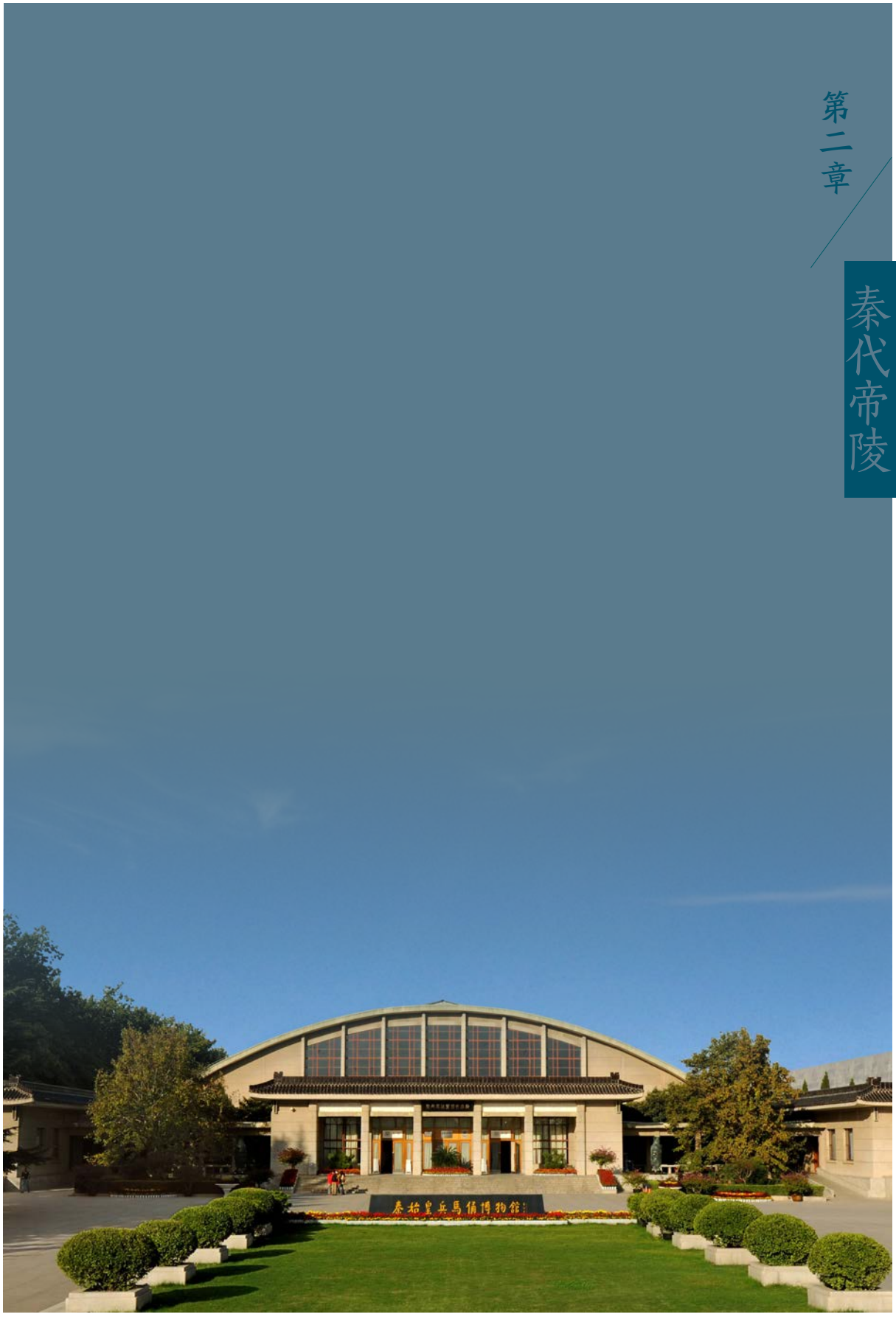
---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长安神禾原战国秦陵园遗址田野考古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5 期。

② 段清波：《关于神禾原大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009 年第 4 期。

第二章

秦代帝陵



前 221 年，秦王嬴政平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尽管秦王朝只存在了 15 年的时间，但是秦始皇陵所开创的陵寝制度、陵邑制度、陪葬墓与陪葬坑等制度对以后历代帝王陵寝建筑影响是巨大的。

秦代存在的时间很短，只有两座帝王陵，其一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其二是秦二世陵。而且秦二世还是以老百姓的葬仪埋葬的，陵园规模很小。两个墓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秦始皇陵园的布局来看，既继承了战国时期秦国的陵寝制度，同时又吸收了东方六国陵寝的一些做法，但规模更加宏大，设施更加完备。秦始皇陵总体上仿照都城宫殿的规划布置，充分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度下皇权的至高无上。

秦人好大喜功，因此陵墓制度大都超越当时的礼制规定，修得很高大，秦始皇陵随着秦国国力的增强在不断扩大，已经突破了过去的“章程”，越修越大。秦始皇陵园从秦王政 13 岁刚一即位便开始修建，最多时动用 70 余万人，直到死时还未完工，修了近 40 年时间。要不是农民战争爆发，秦始皇陵还会修建得更大。陵园的陪葬品极为丰富，目前已在陵园内勘探出 600 多处陪葬坑、陪葬墓，既有生前军队的缩影——兵马俑、帝王的乘御——铜车马、宫廷娱乐——百戏俑，又有宫廷苑囿——马厩坑、珍禽异兽坑，还有供祭祀用的寝殿、便殿、饲官等遗址，其生前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在这里都可以找到。

秦代的帝陵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其建立的一系列陵墓制度既有继承，更有发展。特别是陵寝制度、陵邑制度、陵墓祭祀制度等都对后代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秦陵也是秦朝历史的一个缩影，为后人了解秦代社会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陵邑制度开始于秦始皇陵时。《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东平宪王刘苍云：“园邑之兴，始自强秦”。文献记载，秦始皇十五年（前 232）设置丽邑，三十五年（前 212）又迁

三万家于丽邑，考古勘探与发掘也证明秦始皇陵确实有丽邑，在陵园内多次发现刻有“丽邑”文字的陶器和砖瓦。

秦始皇陵发现了目前最早的三出阙建筑，表明这种代表当时最高规格的建筑形式最晚在秦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门阙状建筑物，是构成秦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在整合西周以来阙制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新的建筑形式，影响古代中国两千多年。

秦始皇陵是当时厚葬制度的代表，秦始皇生前享有的、希望得到的等在秦始皇陵园中均得到了体现。这在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有详细记载：“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夫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吕思勉指出：“春秋以前，敢于违礼厚葬者，盖也寡矣。礼制未亡，而人莫敢自恣也。及战国之世，则有难言者矣。当时之制度，牵于流俗，以厚葬为荣，薄葬为辱。”[①] 充分反映出厚葬现象在这一时期的盛行。

另外还有陵园建城垣、筑覆斗形封土、建有众多陪葬坑、陪葬墓等都被后代继承。汉唐宋等王朝的帝陵陵园布局结构，不论在基本组成单位以及这些单位的构筑形制方面，还是在总体格局上，都表现出与秦始皇陵的一致性或相似性，充分说明秦始皇陵对后代帝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百代皆行秦政事”“汉承秦制”这是人们对于后代对秦制度延续的总结性概括。秦始皇陵的陵寝制度影响深远，直到明清帝王陵都能看到这种制度的影响。

① 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第一节　秦始皇帝陵

秦始皇帝陵位于今西安市临潼区东 5 公里处，南依骊山，北临渭水，风景秀美，气势雄伟，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嬴政的陵墓。秦始皇帝陵历来以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内涵丰富和设计完善而著称。秦始皇陵筑有内外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都城的皇城和宫城。陵冢位于内城南部，呈覆斗形。其陵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也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埋藏最丰富的帝王陵园之一，它不仅是因为其壮观的规模、巍峨的建筑、丰富的埋藏品称著于世，更因其蕴含着巨大的社会和文化、科技等价值而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1987 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单位之一。



图 1　秦始皇帝陵远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稿）

一、墓主生平

秦始皇嬴政（前 259 ~ 前 210），秦庄襄王之子，前 259 年正月出生于赵国首都邯郸。前 246 年庄襄王去世，嬴政即位为秦王，年仅 13 岁，因此国家一切大事均委托母亲赵太后和吕

不韦等大臣处理，直到前 238 年，他 22 岁时才开始亲理朝政。

秦始皇亲政后，“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①]，进一步加速了统一全国的进程。他广纳贤士，为己所用。在此期间，他任用了尉缭、姚贾、李斯、蒙恬、王翦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这些人士在秦的统一过程中出谋划策、八方征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前 230 年到前 221 年，秦王政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离间、连横的策略，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先后于秦始皇十七年（前 230）灭韩、十九年（前 228）灭赵、二十二年（前 225）灭魏、二十四年（前 223）灭楚、二十五年（前 222）灭燕、二十六年（前 221）灭齐。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诸侯割据、战乱频仍的局面，在其 39 岁时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

同时秦始皇为了扩大战果，发动了对北方匈奴和岭南地区的战争。前 218 年，秦始皇命大将屠睢和赵佗率 50 万大军，发动了征服岭南越族的战争。秦军兵分五路，经广西北部的越城岭、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以及江西南康和余干等地，向今天两广地区的越族进军。但是由于粮食匮乏、主帅被杀、数十万的秦军伤亡，使战争陷入了对峙阶段，前后相持达 3 年之久。为了扭转兵力不足、粮草供给的困难局面，前 217 年，秦始皇命监御史史禄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沟通湘水和漓水的长达 34 公里的人工运河灵渠，从而沟通了湘水和珠江水系，秦军的粮饷通过水运络绎不绝地运到岭南，为秦始皇完成岭南的统一大业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前 214 年，秦始皇命任嚣和赵佗再次进攻百越各部族。秦军势如破竹，很快击溃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族和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族的反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郡，整个岭南地区从此划入了秦朝的版图。秦平岭南的战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将岭南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使越族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从而大大促进了对岭南地区的开发。

在南征的同时，秦始皇遣将军蒙恬率军在北方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这一带设置了 34 县，并筑了县城，设置九原郡管辖这一地区。还将一些有罪的官吏及中原地区部分群众迁徙到这些地方，开垦种植，充实边郡。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西北斥逐匈奴”“筑亭

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51 页。

障以逐戎人”。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①]。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是时蒙恬威振匈奴”[②]。为了保证内地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秦始皇命令把秦、赵、燕三国原来修建的防御匈奴的长城加以修缮并连接起来，形成了西起甘肃岷县、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采取筑长城这一军事设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于阻止游牧民族侵扰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对后世影响巨大。

秦王政在统一全国以后，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过五帝”，遂改变了以前周王朝采用的“天子”称号，自称为“皇帝”。为了使皇帝的地位神圣化，秦始皇又采取了一系列“尊君”的措施：诸如取消谥法；宣布皇帝自称“朕”；皇帝的命令叫作“制”或“诏”；在文字中不准提及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只限皇帝使用的、以玉质雕刻的大印才能称为“玺”。这些规定，目的在于突出皇帝的特殊地位，强化皇权在人们心目中的神秘感。秦始皇想借助这些措施，使他的皇位千秋万代地在其子孙后代中传下去。

与此同时，他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皇帝之下，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有左右二员，是百官之首，掌政事。太尉掌军事，不常置。御史大夫掌图籍秘书，监察百官。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以下，是分掌具体政务的诸卿，其中有掌宫殿门户的郎中令，掌宫门卫屯兵的卫尉，掌京畿警卫的中尉，掌刑法的廷尉，掌农业的治粟内史，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的少府，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国内民族



图2　1914年，法国人维克多·谢阁兰拍摄的秦始皇陵封土

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页。

②《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6页。

事务和外事的典客，掌宗庙礼仪的奉常，掌皇室属籍的宗正，掌舆马的太仆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与诸卿议论政务，由皇帝作裁决。秦王朝建立的这套中央集权机构的政权机构，以后一直被历代王朝所仿效。

在地方废除了西周以来实行的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分封制，而实行以地域为主的郡县制。从而避免了分封诸侯之间的战争。重要的是三公九卿和郡守、县长都由皇帝亲自任命，他们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守、尉、监。郡守掌治其郡，郡尉辅佐郡守，并管理兵事。秦始皇把刚刚统一的全国分成三十六郡，以后随着国土面积的不断增加，又陆续增设至五十余郡。近年来新发现的里耶秦简和岳麓书院秦简，使过去史书中没有出现的一些新郡，如“洞庭郡”等得以重见天日。县，万户以上者设令，万户以下者设长。令、长主要管理政务，县尉掌管军事，县丞掌管司法。县以下有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诉讼和赋税，游徼掌治安。乡下有里，是最基层的行政单位。里有里典，设置严密的什伍户籍组织，以便支派差役，收纳赋税。此外还有管理治安、防御盗贼的专门机构，叫作亭，亭有长。

这样从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体制，保障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为了巩固统一的成果，秦始皇从统一中国之时起，采取一系列措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初并天下，便“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③]。把所有民间的兵器销毁，铸成钟鐻和金人，放在咸阳宫前，消灭了隐患。

还实行了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改革措施，用小篆、隶书代替原来的大篆，用方孔圆钱代替了六国时期各国所使用的货币，从而保证了国家政令的通行和商品交换的便利。并修建和整修了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直道等道路工程，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④]。在经济上推行“令黔首自实田”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大大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在内政方面，秦始皇贯彻既定的各项法制及军功爵制度，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又礼待李斯、尉缭、王翦等重臣大将，赐以高官厚禄、田宅园池，从而使谋臣竭智、将士归心。他采纳李斯的建议而废止逐客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改善了政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39页。

④《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566～2567页。

治形象。他重视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兴修了郑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使陕西的渭北高原这一靠天吃饭的贫瘠地区一变而成为旱涝保收的地区，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提高，起到了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安定民生的作用，也使关中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区。

前 210 年，秦始皇在东巡途中驾崩于沙丘（今河北省邢台），葬在位于西安临潼骊山北麓的秦始皇陵。

二、营建始末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缔造者，嬴政不仅要他的基业传至万世，而且还要在死后继续享受他生前的荣华富贵，这一切都在他的陵园整体规划和建设中得以体现。同时，他的臣下也不遗余力地将他的这一想法表现在陵墓的选址、营造、规划上。最终，陵址选在了骊山之北、渭水之南的山水俱佳之地，总体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这里成为秦始皇的永久归宿。秦始皇帝陵极其壮观且内涵丰富，营造它则耗费近 40 年的时间。

（一）陵园选址

出于现实和心理的双重需要，古人常选择地势较高、环境优美的地方来设置陵寝，特别是帝王陵。秦始皇帝陵位于骊山北麓的洪积扇上，地势高拔，环境秀美。骊山林木葱郁，谷峰相间，山体在陵南略作弧形展布，状似盛开的莲花，秦陵犹如莲蕊居于正中，呈祥瑞之象。在帝陵北部，可见渭河横贯关中平原，至此处迂回流转，似银蛇横卧。秦陵依山傍水，从当时的实用角度和风水观念来看，此处均为设置陵园的理想之地。

另一方面，陵墓位置的确立也与秦国前几代国君墓的位置有很大关系。秦始皇祖父、父亲及太后的陵园选在西安市临潼区以西的芷阳一带，秦始皇陵园选在芷阳以东的骊山北麓是当时的礼制所决定的，因为古代帝王陵墓往往按照生前居住时的尊卑、上下排列。《礼记》《尔雅》等书记载，“南向、北向、西方为上”“西南隅谓之隩，尊长之处也”。东汉《论衡》也记载：“夫西方，长者之地，尊者之位也，尊者在西，卑幼在东。……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饮食；宅，人所居处。三者于人，去凶宜等。”即葬在芷阳的宣太后也希望其陵墓能选在她丈夫与儿子之间，即“西望吾夫，东望吾子”，也是按长者在西、晚辈居东的原则。秦始皇先祖已确知葬在芷阳的有昭襄王、庄襄王和宣太后。既然先祖墓均葬在临潼以西，而作为晚辈的秦始皇只能埋

在临潼以东了。若将陵墓定在芷阳以西，显然有悖于传统礼制。可见秦始皇陵园选在骊山北麓完全符合晚辈居东的礼制。

其次，从堪舆学上讲，秦始皇帝陵南有骊山，北有渭河，是背倚山峰、面临平原的山冲之地，恰恰处于骊山北坡大水沟与风王沟之间的开阔地带，位当渭河南岸三级阶地与骊山山地之间的台塬上，不但地势较东西为高，而且受东西两侧水流的拱卫，是一处极为理想的墓地。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

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

当秦王政 13 岁刚刚登上国王宝座时，陵园营建工程也就随之开始了。古代帝王生前造陵并非秦始皇的首创。早在战国时期诸侯国王生前造陵已蔚然成风。如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还有战国中山国王的陵墓也是生前营造的。秦始皇只不过是把国君生前造陵的时间提前到即位初期。陵园工程一直至秦始皇临死之际尚未竣工，二世皇帝胡亥继位，接着又进行修建，后因农民战争爆发被迫终止，因而秦始皇陵是一个尚未完成的陵墓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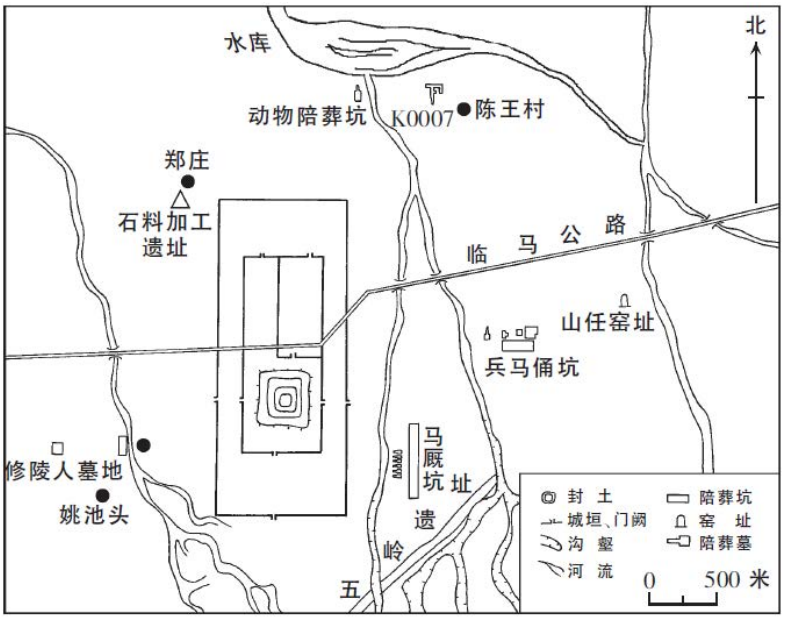


图 3　秦始皇陵陵区重要遗址分布图　（采自焦南峰、孙伟刚、杜林渊：《秦人的十个陵区》，《文物》2014 年第 6 期）

纵观陵园工程，前后可分为三个施工阶段。自秦王即位开始到统一全国的 26 年为陵园工

程的初期阶段。这一阶段先后展开了陵园工程的设计和主体工程的施工，初步奠定了陵园工程的规模和基本格局。从统一全国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历时 9 年，此当为陵园工程的大规模修建时期。最多时动用 70 余万劳工参与大规模的修建，基本完成了陵园的主体工程。自秦始皇三十五年到秦二世二年冬，历时 3 年多，是为工程的最后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从事陵园的收尾工程与覆土任务。尽管陵墓工程历时如此之久，整个工程仍然没有最后竣工。当时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军已经打到了距陵园十余里的戏水附近（今临潼区新丰镇东）。面临大军压境、威逼咸阳之势，少府令章邯建议："盗已至，众彊，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①] 二世当即迎合，并让章邯率领修陵劳工去回击起义军，至此尚未完全竣工的陵园工程才不得不中止。

（二）陵园设计与建造

秦始皇帝陵园布局缜密、规模宏大，皇权至上的理念充分表现在陵园的整体规划中，通过国君陵园"若都邑"的设计思想，对"事死如事生"这一丧葬习俗进行了形象的阐释。"事死如事生"的理念源于原初的宗教观念，反映出先民以强烈的心灵感受和微弱的理性对自然进行阐释和把握的一种心态。灵魂不灭是这一观念的核心，表现在葬俗上则是要为死者在地下营造如生前的生活图景。秦与关东六国在"事死如事生"的葬俗理念上是相同的，而秦陵的设计不仅继承了前代的这一理念，而且还有所发扬。同时，在秦始皇建立帝国伟业的基础上，皇权至上的理念以极端的形式反映在陵园设计中，成为秦陵设计思想的又一特点。追溯秦始皇帝陵的渊源就会发现，它的基本形制承继了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冢墓制"，并把"冢墓制"发展到巅峰。事实上，随着冢墓制的发展演变，秦始皇时期封土的大小和高低已成为墓主权力和身份的重要象征，同时，通过秦始皇帝陵与战国中晚期中山王陵、魏王陵，以及秦公陵园的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的渊源关系。然而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帝王的陵园，它的独特性和开创性则主要表现在规模的宏大、内涵个性的鲜明，以及陵邑等制度的创建上。

秦始皇帝陵区内的各种陪葬坑与先秦的陪葬制也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如车马坑、马厩坑、兵马俑坑、石铠甲坑、珍禽异兽坑、百戏俑坑以及各类府藏坑等，均能在先秦的墓葬形制中发现其相似或类同的形式，而嬴政因崇奉至高、至大、至尊的皇权，对从葬物的种类和数量

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70 页。



图 4　秦俑一号坑全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供稿）

均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展，先秦时期本来置于墓穴内部的陪葬物，在这里演化为“外藏”。诸如此类的继承与发展在秦始皇帝陵区内屡见不鲜，这也正是中央集权制在全国确立以后，葬仪制度也因皇权至上观念的确立而随之变化的必然反映。

为国君修建陵园是国之大事，其设计与督造均应由权力高层参与完成。秦始皇帝陵园的规划蓝图最早应该由丞相吕不韦受王命主持设计，由于吕不韦是主张薄葬的，因此最初的秦始皇陵规模并不大。但是等吕不韦被处死后，李斯成为丞相，秉承秦始皇的旨意，重新规划秦始皇陵的规模，《汉旧仪》记载的秦始皇帝陵“凿以章程”，这“章程”应该就是当朝丞相李斯主持陵园工程时，奉皇帝旨意修改后的陵园规划图，可以推测，陵园规模在此时得以扩大。秦始皇帝陵园的整体修建工程以统一六国为标志，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工程的主持人应是吕不韦，统一之后大规模修建时的主持人，先是隗状和王绾，后期是冯去疾和李斯。这 5 人均在秦担任过丞相一职。在秦始皇帝陵的修筑过程中，丞相作为除皇帝本人之外的最高督造者，他们的职责是“总理其事”，即规划统筹、总体负责陵园修筑过程中的各项事宜。此外，从秦始皇帝陵区出土的陶盆残片和砖瓦上，发现了“东园主章”和“大匠”的刻文和印文，

“东园主章”是“将作大匠”的属官，说明秦始皇时代已经有了“将作大匠”之称，并且他们还参与了陵园的修建。另有“寺工”“寺水”“左司空”“右司空”等铭文和陶文相继发现，这些都是少府的属官。据此，袁仲一先生认为，“将作大匠”和少府的长官均是修陵工程的重要参与者，“将作大匠”主要负责土木工程，少府则主要负责所需各类器物的制作兼烧砖瓦。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秦的丞相和上述官员一同构成了秦始皇帝陵修建工程的组织和管理团队，确保了工程的顺利实施。而有关秦始皇帝陵工程组织管理机构的详细情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与研究[①]。



图5　错金银乐府铜钟。钟通高13厘米，鼻形纽，纽部刻有“乐府”二字，证明秦代已经设有乐府机构　（编写组供稿）

据史料记载，秦陵中还建有各式宫殿，陈列着许多奇异珍宝。秦陵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陵园内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吏寺舍等遗址。其中在园吏寺舍遗址范围内出土的错金银乐府铜钟，纠正了《史记》中关于“乐府”出现于汉武帝时期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三）陵园布局

秦始皇陵陵区分陵园区和从葬区两部分。秦始皇陵陵园区占地56.25平方公里，可分为4个部分，即内外城、封土、地宫、礼制建筑，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形制及设计主导思想。可以说，封土是按照“象山”的设计思想建造，地宫是按照宇宙模型设计，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秦始皇陵园设计的构想，可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墓向选择、平面布局和地宫结构。这三方面的布局都是在战国时期各国君王的陵寝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秦始皇时期，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大的变化，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等级制度的推行，也使坟墓的等级制逐渐形成，在坟墓的形制、高低、大小上，已成定制。秦始皇为显示自己的皇权至高无上，将自己的陵

①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墓修得规模宏伟。他的陵园称为“丽山”，平面布局则是按照咸阳都城设计的，在陵园的东面有兵马俑陪葬坑、马厩坑及 17 座杀殉墓；西面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北面有寝殿、便殿等建筑物。封土在陵园的南半部，为夯土所筑，封土周围有两道城垣。这样的布局结构完全体现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秦始皇帝陵的出现，为后代帝王陵园树立起一个典范。汉唐及至明清帝王陵园的建筑布局大体都按照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建筑结构及陪葬坑、陪葬器物设计的。对后代帝王陵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考古发现与研究

秦始皇帝陵园的野外考察工作最早始于明代，都穆是最早实地考察秦始皇帝陵园的学者。在他的考察成果《骊山记》中，忠实地记录了陵园内外城门址的具体尺寸。1906 年，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来到秦始皇帝陵，实地测量了封土的高度、形状及底边尺寸；1917 年后，一位叫维克托·萨加伦的法国学者也对封土进行了调查，他观察到封土外形有高低不同的三层台阶。

对秦始皇帝陵园第一次全面的考古勘察工作于 1962 年在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组织下展开。王玉清、雒忠如和临潼县文化馆的彭子健对陵园进行了为期数月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测绘出第一张陵园平面布局图，对内外城墙的夯层厚度及城墙的长度进行了测量，钻探出内城的东西北三门和外城的东门，测量了封土的高程和底边尺寸。

位于陵园东侧的上焦村一带，曾在 1948 年就发现过两件跽坐俑。1958 年，在始皇陵东侧的安沟村又出土了一件丽山园铜钟，底部有铭文十七字，即“丽山园，容十二斗三升，重二钧十三斤八两”，这是第一件证实文献上秦始皇帝陵园原名为“丽山园”的实物证据。1964 年，赵康民、丁耀祖又在此发现一件跽坐俑。

1974 年 3 月当地农民打井发现秦兵马俑后，临潼县图书馆赵康民等即来到现场勘察、清理，收集了



图 6　秦始皇陵跽坐俑　（编写组供稿）

陶俑残块，并将其运回修复。秦始皇帝陵园的第一支考古队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指导下，于1974年7月15日进驻工地，袁仲一、屈鸿均、崔汉林、赵康民、杭德洲及稍后一同前来参战的程学华、王玉清、杜葆仁等成为世纪考古幸事的第一批参与者。考古工作者一方面清理已经暴露出的兵马俑遗迹；一方面对此陪葬坑进行范围和内涵的勘探，几乎与此同时，对陵园的考古调查工作也开始启动。

自1974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帝陵园考古调查和发掘从未间断过。勘探研究表明，秦始皇陵陵园东起戏水河，西至临潼城区，南到骊山，北达新丰原下。目前陆续发现了数百万平方米的建筑基址，大小形状不同的陪葬墓、从葬坑600余处，并出土了各类珍贵文物5万余件。

整个陵园为两重城垣组成的南北向狭长的长方形结构，相互套合的内城中部有一条东西向的隔墙，将内城分为南、北两部分，内城北半部的中间又有一条南北向的隔墙，将内城北半部分为东、西两部分。封土位于陵园内城的南半部，占陵园内城南部约三分之二的面积，为整座陵园的核心。在内城垣以内、封土以下及东、南、西三侧分布密集的陪葬坑，封土以北西侧为建筑遗址区，东侧东北小城内为陪葬墓区和一些建筑遗址，东、南、西内外城垣之间靠近封土的区域也分布着较为密集的陪葬坑和建筑遗存。陵园外城垣东侧分布有兵马俑坑、马厩坑，在南侧发现为阻挡南部骊山山洪侵袭而夯筑的防洪大坝，外城垣西侧为陪葬墓区和修陵人墓地等，西北侧为石料加工厂遗址，在北侧发现了动物坑和含青铜水禽的陪葬坑[①]。



图7 青铜鹤　通高77.5、通长101厘米，于2000年7月出土于秦陵东北5里陈王村K0007陪葬坑　（编写组供稿）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一）建筑遗址

1. 封土和地宫

秦始皇陵封土堆是古代帝王陵中最为高大的。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汉时一丈折合今天 2.3 米，那么秦始皇陵原高应为 115 米余。原封土堆的底部近似方形，南北长 515 米，东西宽 485 米。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和人为破坏，现存封土堆较原封土堆已大大缩小。现存封土呈覆斗形，中腰部有一缓坡状阶梯，顶部为一平台。经实测，封土堆基部现南北长 350 米，东西宽 345 米。封土顶部的平台东西长 24 米，南北宽 10.4 米，面积为 249.6 平方米。封土堆的现存高度仍有 76 米高[①]。这些土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传说是经过烧炒后从咸阳运来的。经对封土堆土质分析，不是经过烧炒的，否则不会有西汉时的“树草木以像山”，也不会有今天封土上郁郁葱葱的石榴树林，而是从秦始皇陵东北的鱼池遗址运来的。据《水经·渭水注》记载：“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积成池，谓之鱼池。”

经过考古工作者勘探，证实墓室周围确实存在一周夯层厚约 6 ～ 8 米的细夯土台，台的顶面高出秦代地面，最高处达 30 米。细夯土台的顶面上距封土表面最低处仅 1 米左右。东西南北四侧台阶式墙状夯土台外侧均为渐次收缩的台阶状，各为 9 级。经过实测，细夯土台的基础随地势走向高低不一，但墙体起于同一海拔高度。在外侧台阶的上部还发现了筒瓦、板瓦遗物，各台阶上没有发现红烧土，木炭痕迹少见。个别台阶上还发现类似柱洞的遗迹，柱洞内有木炭痕迹。考古勘探出台阶式墙状夯土台顶部内侧东西长 124 米、南北宽 107 米，外侧东西长 168 米、南北宽 142 米，南墙顶宽 16 米、北墙顶宽 19 米、东西墙顶宽 22 米，勘探数据和物探数据几乎一致。封土堆下墓室周围建造一周体量巨大且伸出地面如此之高的台阶式墙状夯土台，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和崭新的墓葬形制，它出现的原因及意义对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研究所能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现在还无法预知[②]。

---

① 在封土不同的地方测量出的数据不一样。在封土西侧 277.7 米处测量，陵现高为 43 米；在封土西北角的缓坡处测量，或在封土西侧中部测量，陵高为 46 米；在封土西北角的西外城垣中部测量，陵高为 76 米；在封土的北边沿中部测量，则陵高为 52.5 米。如果把测点移到陵园内城北垣的中部测量，陵封土现高 77 米；如果把测点再往北移到陵园外城北垣的中部测量，则陵封土现高 87 米。

②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西北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

封土下为地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地宫“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①]。其意为秦始皇陵地宫挖得很深，直穿地下水多层后用铜液浇灌封堵，并涂以丹漆，上面再放棺椁。地下宫殿中有文武大臣的位次，并有大量的珍宝器皿、珍禽异兽。地宫门上安有弩机装置，以防盗掘。墓室顶上绘有天文星宿图像，地面上模拟山岳九州的地形，又灌大量的水银做成江河大海，以机械动力使之川流不息。用娃娃鱼膏做成油灯，来照亮地宫。1981 年和 2002 年两次探测量的成果一致，即在封土堆中部发现了明显的高汞异常现象，这与《史记》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的记载一致，表明地宫内存在大量的水银。

2002 年度的国家高技术发展研究计划（863 计划）首次将秦始皇帝陵遥感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列入其中，共动用 8 大类 22 种方法，以科学数据的方式描述了秦始皇陵地宫的立体形式。考古钻探得知：地宫位于封土堆中部下方。开挖范围主体约东西长 170 米、南北宽 145 米。开挖范围主体和墓室均呈矩形；封土堆中细夯土墙东西长约 145 米、南北宽约（外沿）125 米、高约 30 余米；石质宫墙顶深约 469 米（海拔高度），高约 14 米、厚度 8 米、东西长 145 米、南北宽 125 米。石质宫墙之上的细夯土墙与石质宫墙位置、范围基本一致，高约 30 余米。墓室位于地宫中央，顶深约 475 米（海拔高度），高 15 米、东西长约 80 米、南北宽约 50 米，主体尚未完全坍塌。两千年来阻排水渠的阻水效果仍然存在，墓室尚未进水。地宫中存放有大量的水银，墓室中可能存有金属制品，地宫没有发现类似东西墓道结构的南北墓道[②]。

文物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应用高精度重力测量，确定了秦始皇帝陵地宫的东西、南北开挖范围约 170 米 ×145 米，发现地宫的西向墓道。通过对重力异常的定量拟合计算，推测秦始皇帝陵地宫可能存在墓室，墓室东西长约 50 米，南北宽约 40 米，埋深约 43 米，高约 10 米。地宫四周可能存在石质宫墙，宫墙的中心线范围为 145 米 ×125 米，墙体宽 8 米，高约 14 米。宫墙上部有一细夯土墙，墙宽约 15 米，高约 30 米。认为秦始皇陵封土堆之下经过大规模开挖

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65 页。

②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西北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存在墓室、宫墙、墓道等配套的地下古墓建筑群，从一个侧面为证实秦始皇帝陵地宫位于现存封土堆之下提供了证据。在分别距封土下 56 米、48 米、52 米处均发现人为加工的石质板材，这些石质板材可能属地宫墓室顶部的覆盖材料，也可能属地宫墓室周壁的建筑材料，或者是主墓道上的覆盖材料。这种石质板材的质地，不同于来自陵墓南侧骊山上的石质，也不是封土堆中夹含的石块，其产地在渭河以北的山上[①]。

关于秦始皇陵地宫的深度，历史文献记载修建秦陵时曾“穿三泉”和“下锢三泉”，考古勘探发现在秦陵墓圹外围存在着规模巨大的地下阻排水系统，这是同一项工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具备排水和阻水的两大功能。阻排水系统东侧起于陵墓封土东西中轴线偏北，向南至封土东南角后西折，再从原封土的西南角向北拐至铜车马陪葬坑处，如此一来，阻排水设施将封土也即地宫以东、以南、以西区域与地宫全部隔断，使得不同深度的外围潜水不能进入地宫。此段阻水渠全长 778 米，最宽处上口宽达 84 米，底宽 9.4 米，渠中心处深 39.4 米。水渠的上层为 21 米厚的填土夯筑层，下层为厚 17 米、质地细密的青膏泥夯层。后段排水系统目前已发现的明井暗渠遗迹平面呈“Z”字形，始于陵墓封土西边的东西轴线处，全长 525 米，明井间以口大底小、顶部为拱形的地下暗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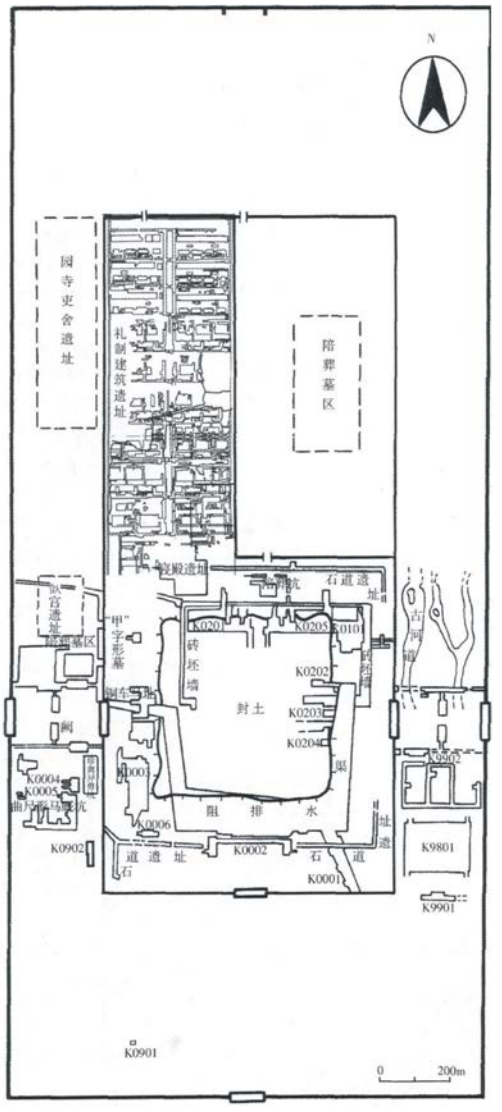


图 8　秦始皇帝陵园遗址分布示意图　（采自《2010 年度秦始皇帝陵园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2 期）

① 袁炳强、杨明生、刘士毅、段清波：《高精度重力测量探测秦始皇帝陵地宫》，《地球科学》，2005 年第 4 期。

相通，暗渠顶部已基本坍塌，渠底宽约 1 米，渠内没有发现排水管道。地下阻排水系统的走向是随陵园自然地势布设的，我们曾推测当年的设计者和施工者对陵区地质状况的了解已达到相当的程度，并具备高超的测量技术，推断选用青膏泥这种质地细密、隔水性强的材料作为前段阻水渠下层的封堵材料，有效地解决了陵墓设计者担心陵墓建成后地下水进入地宫的后顾之忧[①]。

2. 城垣和城门

陵园的城垣分为内、外两重，系夯筑而成，宽均为 8 米。外城垣南北长 2188 米，东西宽 970 米，总面积达 213 万平方米，四面各有一城门；内城墙东西宽 580 米，南北长 1355 米，周长 3870 米，占地面积为 78.59 万平方米。内城的东北角还有一南北长 695 米、东西宽 330 米的小城。在内城的东西南三面各有一门，北垣设有两门，内外城共有 10 座城门。南边和东、西两边城垣上的门址保存完好。东西内外城的四座城门规模巨大，形制相近，南北长 77 米、东西宽 23 米左右；内外城南门较之东西门稍逊一筹，东西长 68 米，南北宽 15 米左右。在内城一周的城墙内外，还发现环绕城墙连绵不断的廊房建筑。内、外城垣相套合成回字形。南北二垣与内城南北相互间距各为 410 米。外城东、西两边的城垣与内城东、西两边的城垣相互间距为 180 米。从而形成内外城东、西、南、北四区。在西区内，发现有马厩坑、跽坐俑坑、珍禽异兽坑等陪葬坑，以及大片房屋建筑基址。

在陵园内、外两重城西城垣之间，发现了建筑遗迹，而且分布比较密集。

当时的城门采用的是三出阙。在东西内外城门之间的中部，分别发现的三出阙遗址，两两相对，规模相当，结构一致。残留的夯土基础呈“凸”字形，东侧内外城间三出阙的北阙，南北长 46 米、东西宽 4.6 ~ 14.6 米；南阙与北阙形制及结构大体一致，建筑基础平面呈“凸”字型，南北全长 46.9 米、宽 3.2 ~ 15.3 米。在内外城西门之间的封闭区域内，发现一组南北相对的三出阙，三出阙位于司马道中部的南北两侧，东距内城城垣 90 米，西距外城城垣 85 米，呈南北对称的阙台夯基，南、北主阙之间相距 29 米。司马道北侧的三出阙布局与南侧略同，但建筑遗存保存状况较差。南侧三出阙夯土遗存南北通长 44 米、宽 15.5 ~ 5 米，母阙台南北

①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的物探考古调查——“863”计划秦始皇陵物探考古进展情况的报告》，《西北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长 29.5 米、宽 15.5 米，第一子阙台南北长 12.5、宽 8.5 米，第二子阙台南北长 7 米、宽 5 米。在三出阙的遗址中部发现有一处“甲”字形夯土基础，南北长 34.5 米、东西宽 4.5 ~ 10 米，距地表深 1.4 米，夯土基础厚 2.3 米。在“甲”字形夯土基础周边宽两米的范围内，虽然也发现有夯土基础，但夯土基础的厚度不如“甲”字形基础，其夯土基础距现地表 1.1 米，厚度仅 0.8 米。在三出阙遗址范围内，发现大量的板瓦、筒瓦、红烧土、木炭等遗迹。从夯土基础的厚度变化情况分析，中部“甲”字形夯基应为三出阙建筑的主体，四周较薄的夯基部分为散水基础。秦始皇帝陵园发现的三出阙形状相似、规模相当、结构相同，均由一个主阙和两个副阙构成，主副阙的基础为夯土筑建的高台形式。这是勘探发现的迄今时代最早、代表最高等级的三出阙遗址[①]。

3. 礼制建筑遗址

蔡邕《独断》记载：“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三辅黄图》说：“高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寝殿是皇帝灵魂起居饮食的场所，按照“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寝殿内设皇帝起居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供后人祭祀。

秦始皇帝陵园寝殿遗址位于内城的北半部、封土的北侧，共发现四处建筑基址，平面近方形，总面积达 3000 余平方米，基址四周有粗砂铺就的散水，基址上还残留有瓦片、瓦当、铜铺首、陶灶门、红烧土、灰烬等物，室内发现有用方形或长方形石板铺的地面。这里应该是当年祭祀秦始皇的重要场所。在建筑基址中出土有青石板、瓦当、板瓦、筒瓦、脊瓦以及直径



图 9　秦始皇陵寝殿遗址发现的夔纹瓦当，直径达 61 厘米。这种大瓦当的应用，一方面表明史载秦始皇好大喜功的脾性属实，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当时秦始皇陵园建筑的规模和宏伟气魄　（编写组供稿）

①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46 ~ 147 页。

达 61 厘米的大瓦当，可见当初建筑之宏伟。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封土北部进行了调查和部分勘探，勘探发现的建筑遗址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内城垣以内西北部区域，位于 1976 年发掘的寝殿遗址、1995 年发掘的寝殿建筑群正北部，与这几处建筑遗址连为一体，应为一处统一的庞大建筑群。20 世纪 70 年代曾在封土北侧发掘了编号为甲组的陵寝建筑遗址，其距离现封土北部边沿仅 53 米，这种与陵墓封土距离如此之近的建筑遗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010 年勘探发现的建筑遗址群为十进式的建筑结构，其北侧为九个通道组成的九组东西对称结构的建筑单元。通道之间用门址相隔但又互相贯通，最北端门址与内城垣北墙西侧门址相通。每组建筑结构不完全相同，根据不同的功用或象征意义构筑不同的建筑形式，通道及不同组建筑之间有石道相通。九个通道最南端为这一建筑遗址群的主体建筑空间，连同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发掘的建筑共同构成了这一建筑群的主体建筑结构。从建筑所处的位置和规模来看，这些建筑遗址共同组成了秦始皇帝陵园的陵寝建筑遗存[①]。

4 . 园吏寺舍遗址

园吏寺舍遗址是管理陵园官吏的寺舍建筑，在陵园西侧共发现三处夯土建筑基址，位于内、外城之间西门的北部，由南北排列的三组建筑组成。建筑已经局部清理，在一号建筑遗址内清理发现了一组四合院式的房屋建筑基址。东侧房屋基址呈南北向长方形，残长 24.5 米，东西宽 6.1 米；南侧房屋基址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37 米，南北宽 14 米。室内西端有渗水井一眼，连接一条五角形陶水道，以便把水排出室外。西侧、北侧房屋基址因残破严重，未做清理。房屋基址上出土大量的板瓦和筒瓦残片、云纹瓦当。出土的铜权上有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和秦二世元年（前 209）的诏书铭文。在遗址范围内还出土有错金银乐府铜钟、青铜雁足灯等秦代珍贵文物。

“丽山飤官”建筑遗址，位于秦始皇陵西侧内外城墙之间。在遗址发现的陶器上有“丽山飤官左”和“丽山飤官右”等陶文。饲官即食官，是陵寝内掌管供奉饮食的官吏。《后汉书·百官志》：“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掌望晦时节祭祀。”刻有“丽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0 年度秦始皇帝陵园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2 期。



图 10　秦始皇帝陵饲官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山飤官”陶文之器在始皇陵西侧地面建筑遗址内的出土，正好说明了这个遗址的性质，说明了它确属秦始皇帝陵寝园总体的一部分，刻文中的“左”及“右”似应为供厨的分工编号。“六厨”“八厨”则反映了厨的数量之多和膳食供应的规模之大。出土的鸭蛋壶、大陶缸、陶盆、陶罐等器，也都是厨房的用具[①]。他们如同侍奉活着的皇帝一样，负责每天四次皇帝灵魂享用及祭祀活动的膳食。

（二）陪葬坑

在秦始皇陵区已经发现 181 座各种类型的陪葬坑，其中陵园外 104 座，陵园内 77 座。

1. 兵马俑陪葬坑

兵马俑坑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秦兵马俑也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坑位于陵园外城墙之外的东侧，由排列有序的三个坑组成，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其间大约埋藏着 8000 件陶质兵马俑。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①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丽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 年第 6 期。

（1）一号坑

一号坑是秦俑三坑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当你站在一号坑的前方阅兵台上，一定会为秦始皇军阵的雄伟气势所震撼，你不禁会联想起秦始皇当年率领千军万马平天下的浩大场面。从目前的发掘和钻探情况来计算，一号坑全部发掘大约可出土陶俑、陶马约6000件，战车40余乘。

从勘探及发掘出土的情况得知，一号兵马俑坑坐西面东，呈东西向的长方形阵列，纵深长约184米，宽约57米。其排列组合的情况是：俑坑东端的长廊部分，有步兵俑204个，排列成三列南北向的面朝东方的横队，每列68个。这是一号坑的前锋部队，所持的兵器主要是弓弩，其中有少数俑持戈、矛、吴钩等长柄兵器。在三列横队的左右两端各有一个头戴板冠的军吏俑，可能为这三列横队的统帅。按照古代军阵“末必锐，本必鸿”的原则，末即是指前锋部队，前锋部队要十分精锐，前锋部队的士兵必须是能够逾高绝远、轻足善走、疾如锥矢、战若雷电的虎贲之士，能以最快速度杀入敌军阵列，打乱敌军的部署。在俑坑西端的长廊部分，



图11　秦兵马俑一号坑全景　（编写组供稿）

也有三列呈南北向横队的步兵俑，其中两列面东，一列面西，是身穿铠甲的重装步兵俑。其面西的一列应为这个长方形军阵的后翼部队。俑坑左右两侧的边廊内，各有两列步兵俑。其外边的一队呈东西向的横队排列，分别为面南和面北，其里边的一队呈面东方向的纵队排列。每队长约 184 米，有步兵俑 184 个左右。这些俑除东端部分轻装步兵俑外，其余均为身穿铠甲的重装步兵俑。配备的武器主要为弓弩，部分俑腰际佩剑。

从以上来看，这个阵列的前后左右均有士兵把守，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方阵队形。在四面有保护的内部，为战车和步兵相间排列的面朝东方的 38 路纵队，他们依次排列在第二至第十过洞内，每队长约 178 米。其主体部分是战车和步兵的相间排列，步兵分为独立步兵和隶属于战车的附属步兵，第 4、6、8 过洞内的为独立步兵俑，四个一列，排成四路纵队。隶属步兵俑有的在车前，有的在车后，车前的 12 个俑排成三列横队，每列 4 个，各车后跟随的步兵俑的数量不等，如第二和第十过洞东端的车后有步兵俑 80 个。第三和第九过洞东端的车后的步兵俑则达 100 个。

一号俑坑的兵器配置为：前锋、后卫和左右翼手持的大多为弓弩，只有少数俑持长柄的矛、戈等兵器。而阵中的步兵俑持戈、矛、钺、戟等长柄兵器的数量居多。弓和弩是当时的先进武器，射程较远，配置于军队四旁，是符合古代兵书上所说的“长兵在前，短兵在后”“材士强弩，翼我左右”的兵器配置原则的。可以看出，一号坑是一个组织严密、排列有序的长方形军阵，即古代兵书所说的“前后整齐，四方如绳”的方阵。具有进攻、防卫、应变、凝聚、疏散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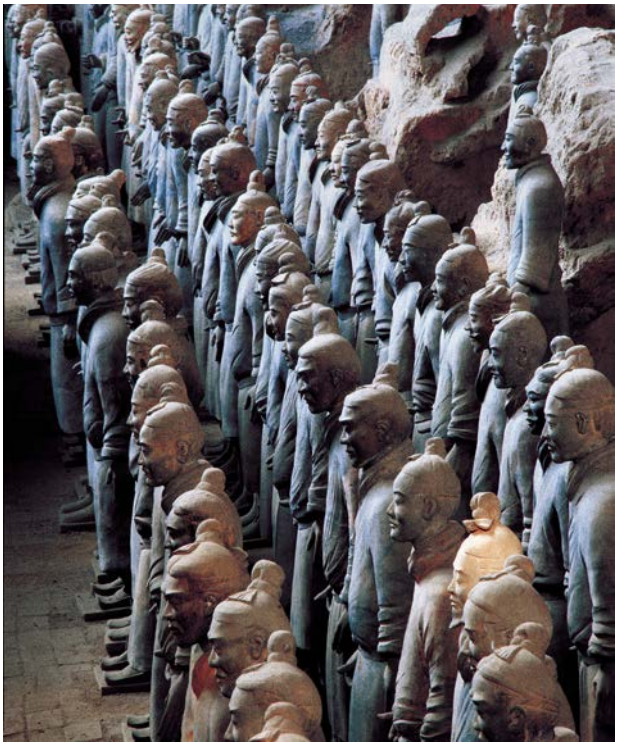


图 12　秦兵马俑一号坑前锋部队　（编写组供稿）

一号坑的军阵编成，突出了秦军主力步兵阵严整威武、气势宏伟、实力强大的特点。其军阵攻守兼备，以攻为主。军阵主体面向东，显示其东向警戒、作战的特点。它的纵队阵形，又反映出将作进攻作战的态势。军阵四周配置较多的阵表弓弩兵，对于护卫军阵、稳定阵脚、保障进攻起着重要的作用。军阵各部相间，多路编成。2、3 过洞和 9、10 过洞配置了隶属步兵，构成军阵左、右两翼，4、5、6、7、8 过洞部队组成军阵的中路主体。而其 5、7 过洞的前部隶属步兵，与 4、6、8 过洞的独立步兵也形成相同排列，组成多路。这样既可使多路齐出，又可令各路分出，并始终保持军阵的稳定。全阵车前兵后，梯次分明。从纵向看，战车多数集中在军阵的前半部，步兵则多位于后半部。以战车为标志，在军阵前半部构成四条横向作战线。军阵分别由第一横列战车区域，第二、三横列战车区域，第四、五横列战车区域，第六、七横列战车区域部队组成，梯次配备，军阵前后两部也形成梯次配备。军阵可以整体开出，也可梯次投入作战。

从一号坑的军阵排列，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兵力部署上的对称性。一号坑是用土筑的 10 道夯土墙而把其隔成东西向的 11 个过洞。以第六过洞为中心，武士俑和车马的排列是向两侧展开的，作战单位和各兵种的位置几乎都具有对称性。二是行列的规整性。表现在一号坑阵体步兵同战车的关系上。除过横向的对称排列外，纵向的则作间隔排列。尽管每辆战车后的步兵数多寡不一，但前后安置却是相当整齐的。三是总体上的统一性。从一号坑的阵形来看，不但俑、马的高低，战车的大小相差无几，而且姿态神情几乎是相同的，车已服驾，御者全神贯注握辔，士卒执兵，军吏入位，俨然整装待发。

从一号坑内容可看出当时作战已经以步兵为主，改变了春秋时期前以车兵为主的情况。随着生产关系的演变，士兵的成分由奴隶逐渐变成农民。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铜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和改进，武器制造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改善，步卒的装备大大增强，数量也日益增多。

（2）二号坑

二号兵马俑坑长 96 米，宽 84 米，面积约 6000 平方米，其平面呈曲尺形，由四个单元组合而成。第一单元即曲尺形东端的突出部分，由手持弓弩的步兵组成，是一个弩兵阵；第二单元即曲尺形的南半部，是由战车组成的方阵；第三单元即曲尺形的中部，是车、步、骑结

合的一个长方阵；第四单元即曲尺形的北半部、弩兵阵的西部，是一个骑兵长方阵。由此可以看出，二号坑是一个由多兵种组成的集团军阵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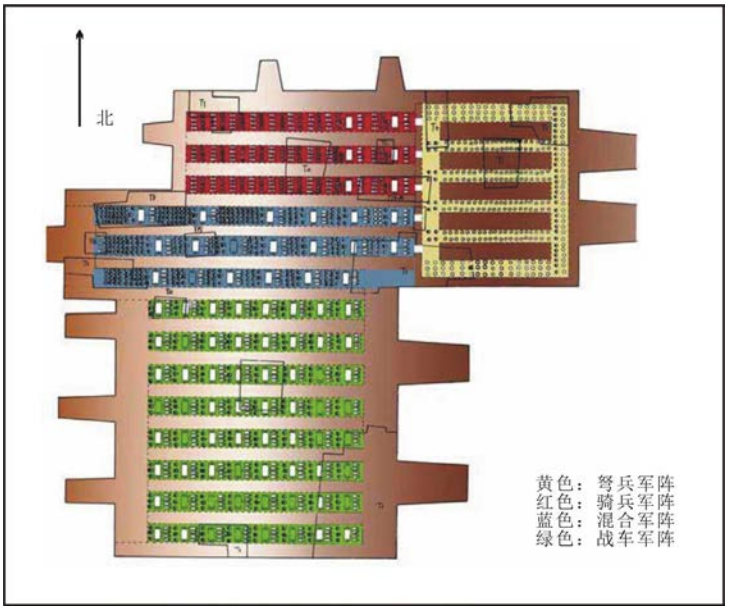


图 13　秦兵马俑二号坑平面示意图

弩兵阵：从试掘情况得知，弩兵方阵共有步兵俑 332 个。排列成一个方形的军阵。这个方形军阵分为阵心、阵表两部分。阵心由八路面东的身穿铠甲的蹲跪式步兵俑组成，每路 20 个，共 160 个。方阵的四旁都是立式的步兵俑。其前边的步兵俑排成两列面东的南北向横队，每列 30 个，共 60 个。以上编列与弩兵的特点有关。弓和弩的射击方法有立姿和跪姿两种。当要对敌人进行射击时，为了避免误伤己方人员，要求前无立兵，因而前边的士兵只有跪下。同时由于弩张缓慢，临敌不过三发，为了弥补此不足，必须轮番射击，矢注不断，才能使敌人措手不及，无可乘之机，无法逼近，从而大大增加杀伤力，弩兵阵的排列正好反映了古代弓弩轮番射击的实际。

立射俑共有 172 件，身穿短褐，束发挽髻，身着轻便战袍，腰系革带，胫着护腿，足蹬方口翘尖履，整个装束显得轻便灵活。右足向左前方斜出半步，双足成介乎“丁”字和“八”字间的形状，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臂向左侧微举，四指并拢，手掌伸张，掌心向下。右臂横曲胸前，手掌向内，或手掌上仰，头微向左侧转，昂首注视前方，这种姿势正是弩兵持弩待发的姿势。

跪射俑上体伸直并将头略转向左侧，双目凝视左前方，双手在胸的右侧一上一下握着弓弩。这种俑在秦俑坑中显得很独特，因为是跪姿，高度在 1.2 米左右。其姿态优美，英俊潇洒，神态庄严，目光炯炯有神。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绾一发髻，髻根用朱红色带束扎。足蹬方口翘尖齐头履。从一鞋底外露处可以看到，鞋底的针脚因为人脚着地后摩擦的轻重而



图 14　秦兵马俑二号坑跪射俑　（编写组供稿）

疏密不同，其绳结痕迹清晰可见，其写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跪射俑的塑造上，工匠们费尽心机，可谓匠心独具。把跪射俑的形体塑得非常精美，惟妙惟肖，力求使静态的雕塑给人以动的感觉，使其身上的甲片随身体的转动而转动，脚上的鞋子随着脚掌的着地而折曲，衣服的纹理也伴随体态的变化而曲折飘浮。上身挺直，臀部紧贴左足跟，从而使身体的重量落在右膝、右足和右足尖上，这样射击时则重心稳、用力省，便于瞄准，易射中目标。

像这种类型的兵俑，在考古上是罕见的，正是秦时弩兵作战形象的再现，对于我们研究两千多年前弩兵作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秦步兵射击技术承前启后，对整个中国的射击技术影响很大。它的基本格局——立射和跪射，两千年来被沿袭不改，其在中国古代步兵射击技术史上的地位是重要的。

战车阵：战车方阵是由 64 辆战车组成的。车由四马系驾，车后一字排列着身高 1.8 米至 1.9 米的陶俑 3 个，其中一个为御手，另两个为车左和车右。御手两臂向前平举，双手作揽辔状，车左和车右一手持长兵器，一手作按车状。御手身穿长襦，外披铠甲，臂甲长及腕部，手上有护手甲，胫着护腿，颈上围有颈甲；头上戴有巾帻及长冠。车左和车右姿态相反，装束相同，是整装待发的状态。

二号坑的战车方阵明显不同于一号坑战车的特征，一是车后没有跟随徒兵，这是罕见于文献记载的新特征。二是 8 列战车，每列 8 乘，正好两两相对成双，体现了双车编组的战车编列原则。三是 8 车为列，与史书记载的 5 车为列、10 车为聚、20 车为屯的编组方法不同。四是车左和车右俑都手持长柄兵器，与古兵书所云“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的说法不同。因此二号坑战车方阵为我们研究古代战车阵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从二号坑的车兵方阵来看，车兵在这一时期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车兵退出历史舞台是西汉初年的事情。车兵之所以退出历史舞台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战车本身的局限性，较之步兵，战车受地域地形的限制较大；较之骑兵，他又显得笨重和不灵活，骑兵既保持了战车的机动性，又避免了战车的缺陷，可适应全天候、在各种地理环境下作战。其次铁制兵器的广泛使用，使战车失去了原有的抵御能力。最后作战对象的改变也是车兵退出战场的原因，西汉初年的最大敌人是匈奴，长距离的跋涉作战是车兵无法完成的，需要快速而且灵活的骑兵。

车步骑混合阵：位于二号坑的中部，是由战车 19 乘、徒兵俑 264 件、骑兵 8 组组成的一个长方形军阵。19 乘战车排成三路纵队。第一路纵队有战车 6 乘，战骑 4 匹；二路有战车 7 乘，战骑 4 匹；三路有战车 6 乘，其中最后一车出土将军俑 1 件。每乘车上除甲士 3 人外，车后均跟随徒兵。且跟随的徒兵数多少不一，和前面讲到一号坑的车兵方阵不同。一般是每乘车上有甲士 3 人，后跟徒卒 8 人，但阵尾部分的战车跟随的徒卒是 28 人，出土将军俑的战车及此车的前两乘战车跟随的徒卒是 32 人，这当是为了加强后方力量。其战车与徒卒的排列办法是战车居前，徒卒在后。这种编列办法，疑为古文献中提到的先车后伍的“鱼丽阵法”。

骑兵阵：位于二号坑的北侧，是一个车骑混合的阵形。计有战车 6 乘，鞍马 108 匹，骑兵俑 108 个。在安排上是车前骑后，可分作前线和后线。前线为两列战车夹一列骑兵作为阵头，后线由八列骑兵组成阵体。这种编阵方法反映出骑兵固然在战国末期已经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种，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构成独立的骑兵之阵。骑兵用的作战武器是弩机，而且骑的马还是没有脚镫的低鞍马，显然带有早期骑兵的特征，其行动迅速、机动性大的特长与张弩费时、矢射匆忙的特点，决定了在战场上需同其他兵种配合作战。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正符合兵书上的以车为正，以骑为奇。骑兵以迅速、不受地形限制为优势，机动性很大。秦时用骑兵“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在战国时期的最大的一次长平之战中，秦军有效地使用骑兵 5 千，突然插入赵军间，将赵军分而为二，断绝了赵军的粮道，从而配合战车和步兵歼灭赵军 40 余万，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为秦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用车、步、骑三军结合作战的典型战例。



图 15　秦兵马俑二号坑鞍马骑兵俑　（编写组供稿）

二号坑的骑兵俑，形象逼真生动，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骑兵实物，对于我们研究秦时的骑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骑兵用的鞍马，身长 2.03 米，通首高 1.72 米，枣红色，黑鬃，白蹄，剪鬃辫尾。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反映秦时对骑马的要求很高，和秦俑坑的骑马基本相同，反映了秦俑坑的骑马符合秦对骑兵的要求。对骑士的选拔也是严格的，秦俑坑中的骑士身高在 1.8 米以上，体形匀称修长，神态机敏，英姿勃勃。兵书《六韬·武骑士》指出充当骑士的条件为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青壮年；身体健壮，行动机敏轻捷；骑射艺术娴熟；能控制住坐骑，周旋进退自如，能够越险阻，绝大泽；机智勇敢。秦俑坑的骑士已具备了以上要求，反映出秦军骑兵选拔的严格性。

骑兵的出现是古代兵种的一大革命，反映出古代战争已进入一个新阶段。秦人以善于养马驭车而著称，早期又与少数民族西戎杂居，有过逐水草而居的历史时期，因此，秦国骑兵的产生应是较早的。在秦穆公时，秦已有“畴骑五千”。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在赵国推行“胡服骑射”政策，使赵国迅速强大起来。但关于骑兵的实物资料发现较少，出土于洛阳金村的一面铜镜上，有一个可供参考的骑兵图像资料。一个披甲带胄的骑士一手持缰、一手持剑正与老虎搏斗。马具是马头有辔、胸前有鞅，马背有鞯无鞍。可见当时马具还是比较原始的。

后来咸阳出土了两件战国时期骑马俑，马头有朱彩画的络头，在颈的两侧，各有朱绘两条辔绳。俑头戴宽折沿帽，身穿交领右衽短褶，下着短裤，脚蹬长筒靴，两手半握，左手前伸似在牵辔绳，右手下垂似执一物，两腿前屈骑于马背上。这两件俑是我国迄今为止在古代中原地区出土最早的骑马俑。秦俑二号坑中骑兵军阵的出现，提供了古代骑兵形象的实物资料，展现了两千多年前骑兵的装束、装备及战术特点，是研究古代骑兵的十分珍贵的资料。

骑兵俑与步兵、车兵的装束显然不同。秦代的车兵和步兵戴尖形或圆形巾帻，而骑兵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颌下，以防骑马奔跑时帽子被风吹掉，身着紧袖交领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扣连裆下裤，足蹬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甲，衣服短小轻巧。这种服装便于举足抬腿上马，坐在马上双腿易于叉开，比较灵便。在防护装备方面，骑士的铠甲较短，甲的前片长度仅及胸腹之际，后片长不及臀部。骑士的铠甲若和车兵、步兵的一样长，下摆就会和马体接触，既活动不便，又显得臃肿，而且骑士双肩无披膊，也不像有些战车上的驭手那样有颈甲和护手甲，这样便于骑士战斗。

俑坑中的鞍马的络头、衔镳和缰绳都是真实的。其络头是由铜节、铜环、扁平石管串联而成，有项带、额带、咽喉带、鼻带、颊带等。络头上连接着铜衔、铜镳。其缰绳是由圆形、扁平石管及铜件构件串联成的，共两根，各长约 1 米。两根缰绳，一端分别和马口两侧的铜衔相连，另一端各有一截把形铜环，以便骑士把握。通过络头、铜镳、缰绳相连接，骑士可以自如地控制马匹。马背上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扬起，鞍面上雕有八行鞍钉，质地为皮革，鞍后有鞦，下有肚带，但未看到马镫。马镫出现的时间较晚，湖南长沙西晋三年墓中出土的彩陶骑俑的镫，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镫。这时还是单镫，仅在鞍的左侧系镫，右侧无，供上马时踏足用。到东晋十六国时才出现了双镫。鞍的两侧及前后端缀有叶形及长带形的彩带作为装饰。鞍上有条类似皮质的扣带环绕马腹，把鞍紧紧固着于马背上。鞍后有鞦攀于马臀，以防鞍向前滑动。鞍的使用对于骑兵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使骑士的双手进一步解放，从而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

骑兵的出现是古代战争的一场革命，改变了战场上的力量对比，骑兵既有车兵的速度，又弥补了战车的不足，既有步兵的灵活，又弥补了步行迟缓的缺陷，而它所具有的冲锋陷阵的威力，是车兵、步兵所不能及的。因此，骑兵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号坑的四个小阵有机地结合，从而组成一个曲尺形军阵，即古兵书中的讲的方、圆、曲、直、锐五种阵中的曲形阵。其左翼即弩兵阵，突出于左前方，成为军阵的前角；其中军部分的后尾突出于曲尺形之后，成为军阵的后犄。四个小阵组成一个大阵，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连。分而各自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合而浑然成为一个整体。

（3）三号坑

三号坑的规模较小，东西长 17.6 米，南北宽 21.4 米，由南、北厢房及开间三部分构成。三号坑较小，已全部发掘，俑坑呈“凹”字形，分为车马房和南北厢房。在车马房出土指挥车一乘，前有四马系驾，后有武士俑四件，在南北厢房出土陶俑 64 件，其中南厢房 42 件，北厢房 22 件。南北厢房的武士俑沿坑壁相间排列，作夹道欢迎状。从发掘情况看，兵器大多为仪仗用的铜殳。

三号俑坑是兵马俑坑中最小的一个，然而它的建筑形制特殊，结构复杂。东边为一条长



图 16　秦兵马俑三号坑全景　　（编写组供稿）

11.2 米、宽 3.7 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车马房两侧各有一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三号俑坑是按古代军事指挥部形状构筑的，它的建筑特点体现了古代幕府的基本特征。车马房为一东西向的长方形，东与门道相对，北与北厢房相连，南与南厢房相通。其中置有彩绘木质战车一乘。这乘车的形制与一号俑坑发现的战车有所不同。车舆不仅彩绘着华丽而鲜艳的纹饰，同时于车左侧还发现一个直径 42 厘米的彩绘花盖。车后陶俑数量也不同于一号坑，一号俑坑出土的战车上往往只有 3 件陶俑，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战车上为 4 件陶俑，中间的御手俑和军吏俑呈一前一后排列，其余两件车士俑位于左右两侧。军吏身穿短褐，上披彩绘花边的前胸甲，头戴单卷长冠，右臂微举，手作按剑状。从它的冠式、铠甲、手势分析，其身份高于御手，但似乎又低于一号俑坑车后出土的将军俑。其余两件陶俑似为车左与车右。

（4）“四号坑”

1976 年 6 月至 7 月底，在一号兵马俑坑的中部北侧，二号与三号兵马俑坑之间，考古工作者又探出一个坑。坑呈南北向横长方形，坑的北边及东、西两边的北段十分整齐、清晰，坑的南部被河流冲垮，南边线不清。坑东西长 48 米，南北宽 96 米，深 4.8 米，面积 4680 平方米。坑内充满了淤积的泥沙和砾石，未见回填的五花土，也未见砖铺地、土隔梁、棚木等建筑遗迹以及陶俑、陶马等文物。

对于这个土坑，目前的看法截然不同。一部分人认为就是俑坑，称之为四号坑，一部分人则持反对意见，认为根本就不是俑坑，而是一处掩埋残次陶俑、陶马及建筑垃圾的填埋坑。

2. 石铠甲坑

石铠甲坑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位于秦始皇陵封土堆东南约 200 米处，东西长 120 米，南北宽 128 米，面积略小于秦兵马俑一号坑，达 1.3 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秦始皇陵园外城墙以内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陪葬坑。

在坑南北两边缘的东西端各有一条平面呈梯形的斜坡门道。坑内全为红烧土，坑底铺有一层厚 10 ~ 20 厘米的木板。考古工作者在陪葬坑挖了 5 个探方试掘，结果 4 个探方的过洞底部出土了大量的石质铠甲和石质头盔。目前共清理出石质铠甲约 90 领，石质头盔 36 顶、石马缰 3 组，一件青铜锸以及一些青铜镞。这些石铠甲和头盔均用质地均匀、颜色灰青的石灰岩石片和扁铜条连缀而成，可称为铜缕石甲胄。



图 17　石铠甲坑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石质铠甲和头盔史书上未见记载，其发现弥补了史书的不足，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铠甲的大小是按原大比例制作的，其制作方法类似于玉衣的制作，这为研究古代铠甲的制作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资料。甲片主要有长方形、近方形、舌形、等腰梯形、直角梯形、圆形等。甲片上钻有一些圆形或方形的小孔，用扁铜条连缀在一起。根据甲片特征和甲胄外观特征的差异，可将铠甲分为三大类：鱼鳞甲、札甲和特大型甲。特大型甲，只发现了一领，身甲已烧成白灰状，颈甲保存较好，该甲纵长 1.8 米。从甲衣到甲片都特别大，甲片有长方形身甲甲片、长笏形和长孤凸刃形颈甲甲片等。从其形体和结构判断，这副甲可能是马的铠甲，即后世所谓的“马铠”或甲骑具装中的“具装铠”，但据史料记载到东汉末年才有较完整的具装铠，而本次发现的这副“马铠”，由颈甲、身甲、当胸和搭后组成，已经是非常完备的形制了，要比文献记载早 400 多年。与铠甲同时出土的石胄约 36 顶。这些胄与燕下都发现的铁胄形制相似，但又比燕下都的铁胄更完美、大方，可以保护颈项并披搭于铠甲的肩部之上，顶片布孔规律也有区别。所有石胄均由一整片圆形顶片和若干板瓦形或等腰梯形不带弧度的侧片组成，而燕下都的铁胄顶片则由两个半圆形片参接而成。目前修复的胄由圆形顶片和各类型的侧片组成。胄通高 32 厘米，底部宽度 32 厘米，现重 3168 克。这是第一顶完整的秦代石胄，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石质铠甲和头盔穿戴起来厚重，又不结实耐用，所以当时只是作为明器，不具有实用功能。

石质铠甲的制作并非易事，要经过切割、打磨，并钻孔用铜丝片连接，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像玉衣那样在全国发现很少，铠甲坑中的石铠甲数量惊人，制作这些石质铠甲必须有加

工机械，充分反映出当时秦国手工业者的高超技艺。

该陪葬坑的地下建筑类同于秦兵马俑坑，是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形式，有斜坡门道，坑内有用夯土筑成的多条东西、南北向隔墙，坑底铺有木板，坑上有棚木，也被火烧过，地下全为红烧土和黑木炭。由于该坑的所在位置比秦兵俑坑更优越，距离秦陵地宫更近，处在秦始皇陵的内外城之间，从情理上来讲，其陪葬品的水平要高于秦兵马俑。随着对该坑的继续发掘，必定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图 18　复原后的石铠甲　（编写组供稿）

石质甲胄的大面积发掘出土，在世界考古学史上实属罕见，填补了我国古代军事装备的空白，改变了过去认为秦代无胄的记载，对研究秦时的军事装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3. 百戏俑坑

百戏是中国古代民间表演艺术的泛称，百戏一词产生于汉代。但在秦始皇陵园中发现了百戏俑坑，就是被考古工作者命名为 K9901 的坑。其平面略呈“凸”字形，内设三条过洞，是一个总面积近 700 平方米的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陪葬坑。

为了对 K9901 的性质、内涵以及建筑结构等一系列问题作进一步了解，考古工作者在 K9901 陪葬坑的中部布设了一条 4 米宽、17 米长的南北向探沟，对该遗址进行了试掘。试掘工作开始于 1999 年 5 ~ 6 月[①]。2011 年秦始皇陵博物院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坑全长 72 米，宽 12 ~ 16 米，由三个过洞构成，东西各有一斜坡门道。其中三号过洞底部出

① 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园 K9901 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 年第 1 期。



图 19　百戏俑坑发掘现场局部　　（编写组供稿）

土了真人大小的彩绘陶俑，二号过洞出土有陶马的残片、青铜马蹄和石质马缰饰；原大的彩绘百戏俑雕塑精细，造型准确，是秦帝国宫廷娱乐活动的生动反映。形态健硕瘦削不等，姿态各异，其风格、特点与兵马俑不同，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活动的百戏俑为我们揭示了秦代陶俑的新类别，形象地展现了秦代斑斓多彩的杂技世界，将活泼清新的宫廷娱乐文化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在此坑的中部过洞内出土了一件青铜大鼎。青铜鼎出土于棚木层之上，保存完整无损，出土时表面布满绿色铜锈，鼎内发现有 3 枚铜镞。鼎体为双耳三足直肩环底形，耳部、肩部、腹部有繁缛精美的纹饰；鼎底部外侧有一周圈足形环棱。肩部较竖直，外部布满精美纹饰，其中以交替蟠虺纹为主纹饰，另以绞索纹、“S”纹、谷芽纹等填充；三只鼎腿均为短粗壮的兽足形，腿根部均为变形鹰面纹，酷似猫头鹰，双目圆睁，口中衔着一块状物。此鼎双耳间宽度为 94 厘米、口径 64 厘米、通高 59.5 厘米、腹外径 75 厘米，重 212 公斤，是迄今为止所知最大的秦鼎。从其出土位置和鼎本身的气势、风格、工艺分析，应该是秦王朝的宗庙重器。

坑内发现 4 只青铜马蹄，比真马蹄略小，中空，内有木炭残迹，应是木马铜蹄，被焚烧后仅留下四只马蹄，在马蹄西侧发现一些用铜丝和方形小石块连缀的石马缰构件，同时还有陶俑的一些残片，包括手臂、头等部位，可能是牵马俑。

值得欣喜的是，在坑内发现了布满过洞底部的内涵丰富新颖的彩绘陶俑，出土时虽已倒塌碎裂，但每件陶俑个体仍大体可辨，共发现 40 余尊陶俑个体。这些陶俑均为彩绘俑，现场观察到俑面部和身体肌肤裸露部分均为浅粉红色。这些俑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有的呈双手

卷衣状，有的一手叉腰一手高举、双腿前弓后箭步状；有的呈半跪状等，它们均有方形或长方形脚踏板。所有陶俑只穿着陶塑彩绘超短裙，其他部位裸露，裙上绘有各种纹饰，其中以菱格纹为主，另有星象纹、谷芽纹、“S”纹等，由于火烧等原因，彩绘大部分脱落。彩绘下涂有一层黑色生漆作为底色。在百戏俑坑第三过洞里，发现一件胸肌硕大、颜色发黑的陶俑。这件陶俑体形硕大，根据测量和推算，他的身高应该在 2.2 米以上，脚长 32 厘米。



图 20　百戏俑坑发掘出土的百戏俑　（编写组供稿）

百戏俑坑的发现和发掘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欣喜的。首先，丰富了陵园内陪葬坑的种类和形制，为研究秦始皇陵园的陵寝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其次，出土了一批内涵全新的珍贵文物。铜鼎是至今所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秦代铜鼎，是研究秦代礼仪制度、丧葬制度以及秦鼎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及青铜文化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所发现的姿态各异的半裸俑，生动活泼，反映的是秦代宫廷百戏场面，与兵马俑所表现的军事阵容形成鲜明的对比，对研究秦王朝丰富的宫廷文化和我国先秦角抵俳优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同时又有极强的观赏性。

4. 跽坐俑坑和珍禽异兽坑

位于石铠甲坑北侧 35 米处，由七条宽约 6 米的坑道组成一平面呈“巨”字形的大型陪葬坑，东西长 153.4 米，南北宽 38.4 米；钻探中发现有二层台、棚木、铺地木及少量的被焚烧的骨块。出土的陶俑系男性，脑后梳圆形发髻，面目清俊，有髭无须，身穿交领右衽长襦，双臂下垂，双手半握，自然置于膝上，双腿跽坐状，似一年轻的圉人，象征管理马厩以及饲养珍禽异兽的人员，造型生动，体型完整，面部表情拘谨，表现了一个宫廷养马人温顺恭敬、细心认真

的性格。出土跽坐俑的马厩坑多为人俑与马俑同坑，有的在马俑坑附近有一人俑坑，反映了秦宫廷厩苑内每匹马有一个饲养员，与《周礼》的记载是吻合的。

在两内外城垣之间发现了 31 个陪葬坑，分三行排列，自西向东分别是 6 个跽坐俑坑、17 个动物坑、8 个跽坐俑坑。出土有瓦棺及跽坐陶俑，瓦棺内有鹿、麂等动物遗骸。跽坐俑坑与珍禽异兽坑似为一整体，拟或象征的是始皇生前宫内豢养珍兽的情况，学者们认为是为死者灵魂的游猎场所而设置的。

5. 青铜水禽坑

位于陵园外城东北约 900 米处，该陪葬坑平面略呈“F”形，是由两条南北过洞及一条东西向过洞组成的地下坑道式木结构陪葬坑，总面积约 925 平方米。

青铜水禽共出土 46 件，分为站姿和立姿两种，包括青铜天鹅、青铜鹤及青铜鸧雁三个种类。其中青铜天鹅 20 件、青铜鹤 6 件、青铜鸧雁 20 件，这些青铜水禽有的水中觅食，有的伏卧小憩，有的曲颈汲水，栩栩如生。由于盗扰及坑体焚毁坍塌，这些水禽均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出土时青铜水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白色彩绘，可见当时青铜水禽制作完成时，表面也施有彩绘。文保专家在修复的过程中发现，青铜水禽所有部位以及附件均为铜锡二元合金；在铸造工艺上，分铸技术广泛使用，并以融化焊接以及榫卯连接法进行连接；表面的工艺缺陷及铸造缺陷均以铜板镶嵌法进行补缀。其中，铜板镶嵌补缀工艺是目前该工艺在中国的最早应用实例，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该工艺在地中海地区古埃及、古希腊以及罗马时期青铜雕像上广泛使用。铜板镶嵌补缀工艺在水禽上的出现，可能受到地中海地区古文明的影响。通过对部分样品微量元素分析，铜矿矿料和先秦时期青铜器可能来自同一矿区。但同一件青铜水禽，颈部泥芯与身体部位泥芯或许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分别制作，或是由不同的工匠完成，水禽泥芯微量元素与秦陵地区土壤的微量元素明显有别，可能表明青铜水禽的生产地点并非秦陵地区[①]。

6. 车马坑

位于封土西侧 20 米处，平面呈“巾”字形，长和宽各 55 米，面积达 3025 平方米。铜车马的发现可以说是继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是奇迹中的奇迹。无论是铸造技术还

①《陕修复一批秦陵青铜水禽铸造工艺疑中西合璧》，中国新闻网 2014 年 5 月 5 日。

是雕塑艺术，都高于兵马俑，凡看过铜车马的人，无不为秦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所折服，有些技术即使现代人也不得其解。甚至有人认为是天外来客制作的，实质上这正是秦帝国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再现，是秦统一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反映。



图 21　秦始皇帝陵铜车马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从坑中提出土的一组两乘铜车马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结构最完整的车马。这两辆铜车马被称为“青铜之冠”。一号车重 1061 公斤，二号车重 1241 公斤。它们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两乘车的零部件近七千件之多，极为细致复杂。以二号车为例，其大小零件 3462 个，其中包括金质装饰 737 件，银质装饰 983 件，每乘车上的金银装饰就达到 7 公斤之多[①]。

车上的最大零件是二号车上的那个龟背形的车盖，长达 246 厘米，面积约 2.5 平方米，最小的零件不足 0.5 平方厘米。从重量上来讲，最重的铸件为马，达 230 公斤，最轻者为辔缰的销钉，重量尚不足克。一、二号车虽然车制不完全相同，但在车的零部件结构、系驾关系等方面基本是相同的。

古代帝王车驾专用，自有一套銮驾制度。秦始皇在车制上进行了较大的改革，并形成一套制度，他一生 5 次出巡，车队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众多的车乘，有前导，有后卫，有护从，有伴驾，各按一定的礼仪紧紧相随。难怪项羽在看到秦始皇车队路过浙江时，遂产生了取而

①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 年。

代之的想法；刘邦在看到秦始皇威武壮观的出巡场面后，曾不由自主地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这也激励他夺得政权，建立西汉王朝，形成自己的銮驾制度。

秦始皇帝乘坐的为金根车，装饰豪华，前驾六匹马。《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乘六马”的记载，《后汉书·舆服志》中也有“天子所御驾六，余皆驾四”的记载，充分说明当时秦始皇所乘之车一定驾有六马。之所以把秦始皇所乘之车称作金根车，是因为根是栽养万物的，只有皇帝才配得上乘这种车，加之用金装饰，显得很豪华，实质上可以从秦陵铜车马这种属车的豪华中看出来。这种金根车是秦始皇帝首创的。这种六匹马拉的车子，目前在西安和洛阳均有考古发现，因此在秦始皇陵是有可能发现六匹马拉的金根车的。

铜车马上使用了众多的金银装饰件，铜马的络头、缰、项圈、靽等大部分都由金银制成。两乘铜车马的金银饰件加在一起达 3500 件左右，约占两乘铜车马零件总数的 50% 以上，充分反映出这两乘铜车马的高雅华贵和豪华奢侈，也反映出古代乘舆等级制度的一般情况。

7. 文官俑坑

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之南偏西，距现封土堆南边沿约百米。平面呈东西向的“中”字形，总面积约 410 平方米，是一座地下坑道式土木结构的陪葬坑。编号为 K0006。该坑坐东向西，由西、中、东三部分组成，西侧为斜坡道。与其他陵园陪葬坑不同的是，此坑未曾遭焚烧。

2000 年 7 ~ 12 月，秦陵考古队对该陪葬坑进行了全面发掘，从而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该坑的形制与内涵。在中部（也称前室）清理木车 1 辆，发现陶俑 12 件，另外还发现陶罐、铜钺、盖弓帽、马具等文物。在东部（也



图 22　文官俑　　（编写组供稿）

称后室），主要发现的是真马骨架，可辨认出马头9具，根据排列密度，估计当年共葬马约20匹。

由于在该坑的陶俑身上发现有佩戴饰物，发掘者认为它们应是象征古代削刀和砥石的文具，所以将这些陶俑定为文官俑，将该陪葬坑的性质也认定为文官俑坑。有学者推断为秦王朝中主管监狱和司法的廷尉机构[①]。

8. 马厩坑

目前在秦始皇陵园已经发现三个马厩坑，充分显示出马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秦始皇陵园中的马厩坑象征着秦王朝的中央厩苑。

第一处是在秦始皇陵园外城以外的东侧的上焦村，在东西宽50米、南北纵长1900余米的范围内，共发现98座。从内涵上看，这些从葬坑包含马厩坑、跽坐俑坑、俑马同坑等三类。已试掘的坑内埋有马骨、跽坐陶俑、铜洗、铁工具等。并发现有“中厩”“官厩”“左厩”“大厩”“三厩”等刻有5种秦王朝中央厩苑名字的刻文。这些陪葬坑象征了中央政权和皇宫机构内的养马状况。马厩坑内出土的马骨骼复原后长1.5～1.6米，高1.4～1.5米，与秦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大小相似，证实了兵马俑坑的陶马确系来源于真实生活的艺术佳作。

第二处位于内外城之间的西门南侧，平面呈方形，设有两个斜坡门道坑体，面积约580平方米。

第三处位于内外城之间的西门南侧，坑南端东西长117米，南北宽6.6～8.4米，东端南北宽84.4米，东西宽8.6～9.4米。其主体部分为宽6～9米的长条形坑道，马以两匹一组置于方盒状的木椁内，一组组密集地排列，还有为数不少的陶俑。

9. 动物坑

位于外城的东北部750米处，由主室和斜坡门道组成，平面呈南北向“甲”字形，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地下式建筑。主室南北长23.5米，东西宽10米，深6米，总面积近300平方米。因坑内遭严重火焚，被烧陶俑都已变形破碎，有俑头、俑腿、俑手、躯干等残片。根据残片分析，当时坑内至少有坐俑2件、站俑3件，还出土了一枚铁铤铜镞和一枚秦半两铜钱。主室中间为甬道，甬道两侧为8道相互对称的夯土隔墙，甬道南端又有一道夯土隔墙，这九道夯土隔墙将主室分为8区，形成16个对称的小房间。建筑方式与秦俑坑类似，也是在隔墙上搭设棚木，

①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K0006陪葬坑性质刍议》，《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2期。

棚木上覆盖着细密的竹席，其上又以夯土填实。坑内埋藏着 10 余种禽兽及鱼鳖一类的动物。

（三）陪葬墓

陵区内的墓葬发现了 9 处。

秦始皇陵园中目前发现最大的陪葬墓是位于封土西北的“中”字形大墓，正在发掘过程中，内涵尚不清楚。内城封土的西北角有一“甲”字形大墓，学者怀疑是公子高的墓葬。内城的北部小城内发现有 33 座中小型墓，可能是后宫中陪葬的嫔妃墓。西部的内外城垣之间发现有 61 座中小型墓。东部的内外城之间东门北侧发现 3 座小型墓葬。

在外城的东侧上焦村发现了 17 座中型墓葬，考古工作者曾对第四处上焦村西陪葬墓群中的 8 座进行了试掘，共发现 7 具骨架，其中女性 2 人、男性 5 人，除其中一女性为 20 岁左右外，其余 6 人均在 30 岁左右。墓主大多身首异处，其中 M15 墓主头骨上还插有一支箭镞，显然死于非命。这 8 座墓葬都有棺椁，且有一定数量的陪葬物，但这些也只是徒增粉饰，散乱的尸骨才是对墓主悲惨宿命的说明。因此学者怀疑是公子和公主被杀后作为陪葬而埋在此地的。

另外还发现四处修陵人的墓地，一处位于赵背户村西的墓地，南北长 180 米，东西宽 45 米，面积约 8100 平方米，探出墓 103 座，对其中的 32 座墓进行了清理。墓穴为长方形土圹，大小不一，非常简单。大者长 10.6 米，宽 1.1 米；中者长 1.1 米，宽 0.56 米；小者长 0.8 米，宽 0.6 米。小型墓坑最多，大型墓坑中往往又挖成若干小墓坑。有一大墓坑长 3.6 米，宽 2.4 米，内有 4 座小坑，每个小坑内都埋着尸骨。一个土圹内，有的葬 1 人，有的葬 2 ~ 3 人，最多的达 14 人，尸体叠压乱放。已清理的 32 座墓内挖出人骨架 100 具，其中仰身直肢葬 4 具，其余均为蜷曲特甚的屈肢葬。多数为侧身屈肢，少数为仰身屈肢及俯身屈肢葬。尸骨放置的头向不一。1 个墓坑内埋有多具尸骨者，有的平放，有的叠压，有的仰身，有的侧身，有的俯身，说明埋葬非常草率。除 1 个用残板瓦片砌成长方盒状的瓦棺外，其余均无葬具，也没有陪葬品。经过对 100 具人骨的鉴定，其中有女性 3 人，其余为男性。6 ~ 12 岁的儿童 2 人，其余均为二三十岁的青壮年。100 具中有 94 具骨架基本完整，死因不明。其余 6 具，有的下肢残断；有的腰部残断，头骨上有刀伤痕迹；有的身首异处；四肢骨与躯干骨分离叠压。由以上可以看出，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夭折，要么如上所云是死于非命，要么是残酷的徒役使青壮年劳累过度，早早死亡。可见秦陵工程是何等的艰苦。在这些尸骨上放置着刻有瓦文的残瓦片，共计有 18 件，

其中一瓦片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共有 19 个人的名字。这些劳役者来自全国各地，来自三晋地区的有东武、平阳、杨民、平阴、武德等；来自齐国者有博昌；来自楚国者有邹、赣榆；大部分来自秦。100 具人骨中有这么多地方的修陵者，那么七十余万修陵者，肯定会来自全国的各个地方。19 人中有 10 人是服居赀劳役，所谓“居赀”是指以服劳役的方式来抵偿因故而被罚令缴纳钱财的人。这 100 具人骨中，仅有 19 人有刻文瓦志，而大多数则无瓦志，反映出有瓦志者的地位较高，他们人身较自由，而无瓦志者可能均为刑徒了。从这批瓦志中使我们对秦始皇陵的修建者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为我们研究秦代历史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墓地出土的瓦志墓志可以说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墓志铭，为研究中国墓志史增添了新材料。瓦文的字体为小篆，但草率，不规整，有的字勾连变化，变异较多，对于研究我国的文字发展史具有重要的价值[①]。



图 23　秦始皇陵修陵人墓葬中出土的瓦志　（编写组供稿）

第二处位于姚池头村北，属于乱葬性质的坟地；第三处位于五砂厂东侧，有 220 座墓。2003 年在陵园外西侧砖房小学一带，发现墓葬 19 座（大型墓葬 5 座、小型 14 座），窑址 3 处，陪葬坑 12 处。第四处位于秦兵马俑坑东北。2003 年 2 月，秦始皇陵考古队开始对一处秦代烧制砖瓦窑址进行清理。一个多月后，考古队在窑址旁边一个距地表约 10 米深的大坑中发现了百余具人体骨架。根据现场专家们初步推测，他们是因修建秦始皇陵工程而死去的劳动者。为进一步判断这些人骨，2004 年 9 月，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 121 具遗骨中，随机抽取了 50 个样本进行 DNA 检测，成功提取的 15 个遗骸样本中有一个具有“欧亚西部特征”，而且属于比较典型的欧亚西部 T 类群个体。按照考古学界定，欧亚西部便属于欧洲范围。

①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秦刑徒墓》，《文物》，1982 年第 3 期。

在考古界看来，这次发现“洋劳工”在2200年前已来到中国腹地，其意义犹如在金字塔修建者中发现了东方人一般，在东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另一方面可以作为解开秦始皇陵谜团的有力证据[①]。

秦始皇陵确立了独立陵园制，陵园内设置专门的陪葬墓区，虽因其国祚太短、亡国较快、以及几处墓地均未进行发掘而无法进行系统讨论。但其对以后西汉帝陵陪葬墓区设置及陪葬制度确立的影响不容忽视。

秦统一之前的国君墓除车马陪葬坑之外，其他的随葬器物都葬在墓室之内或墓道的耳室内。秦始皇陵园的陪葬坑却是与墓室相对独立的。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分布范围广泛，排列富有规律。陪葬坑有的位于地宫之旁，有的位于内外城垣之间，有的位于陵园外城垣东侧，有的位于外城垣之北。陵园所有陪葬坑不仅分布范围广，而且排列极有规律。这是秦始皇陵园陪葬坑的特点之一。



图24　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青铜大鼎，通高61厘米，外口径71厘米，两耳间宽94厘米，重达212千克。整个铜鼎造型精美厚重，通体铸刻有精美复杂的纹饰　（编写组供稿）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富于独创性。先秦国君墓传统的陪葬坑多为车马坑，而秦始皇陵园的陪葬坑除车马坑之外，首创了大型兵马俑军阵陪葬坑。这是先秦陵园陪葬坑从未发现过的，这一制度又为其后的西汉帝王及大臣陵墓所继承。还有陵园内外的珍禽异兽陪葬坑也是秦始皇陵园的独创，这一葬俗也为西汉帝陵、太后陵所继承。在山东齐国的大贵族墓附近曾发现殉马坑，秦始皇陵园发现的不是单纯的殉马坑而是马厩坑，其中模拟的有饲养马匹的跽坐俑，还有饲养马匹的陶盆和大量的真马，俨然模仿的是皇帝生前的宫廷养马场。秦始皇陵园这三

① 新浪网2006年7月17日。

种类型的陪葬坑都不见于先秦其他国君陵园。秦陵陪葬坑富于创新，这是它的又一个特点。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第三个特点，即内容相似的陪葬品以不同形式，分布在陵园内外的不同地方，如珍禽动物坑、马厩坑均是如此。这也是其他国君陵园陪葬坑中鲜见的。

秦始皇陵园陪葬坑第四个显著特点是内涵丰富、规模宏大。秦始皇陵园各类陪葬坑、府藏坑多达数百余座，这是古代任何一个国君陵园无法比拟的。同时无论是先秦陵园陪葬坑，还是汉代陵园陪葬坑都无法与秦始皇陵园陪葬坑的规模相比较。单就兵马俑陪葬坑而言，它占地多达两万平方米，与真人真马相仿的陶俑陶马 7000 余件，青铜兵器数十万件。这样规模宏大的陪葬坑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陵寝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四）陵园附属设施

1. 防洪堤遗址

位于始皇陵南侧的大水沟前，从骊山北麓的大水沟西边山脚开始，为西南东北方向，终止于庞家沟西南，全长约 3500 米。现残存东西长约 1700 米，宽约 90 米，残高 2 ~ 8 米。堤身用土夯筑而成，土中含有大量的砂石。这条防洪大堤是陵园工程的一部分，它的修建，使秦始皇帝陵封土堆及上焦村马厩坑、兵马俑坑和陵园里的一些地面建筑，都免遭水患。虽然防洪堤过去也曾被大水冲垮，但水从兵马俑坑西侧流过，使俑坑幸免于难。

秦始皇帝陵位于骊山北麓的洪积扇上，它和骊山北侧最大的峡谷——大水沟南北相对。为了防止骊山的季节性洪水及大水沟的水流冲垮秦始皇帝陵，便在陵南修筑了一道防洪大堤，使“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流入渭河。因防洪堤南侧有五条沟壑，沟壑之间有五个山岭，故而又称“五岭遗址”。

2. 鱼池建筑遗址

位于秦始皇帝陵北侧，距秦始皇帝陵封土约2.5公里。遗址位于黄土原上，东西长2000余米，南北宽 800 米，总面积 160 多万平方米。遗址横跨鱼池堡、鱼池村、吴东和吴中 4 个自然村。经过勘察，这里发现断续相连的夯土墙垣、房屋建筑基址、排水管道、水井等大量遗迹遗物。遗址的地面上堆积大量残砖碎瓦。历年来发现的铜、铁、陶等各类遗物近千件。其中铜质遗物有刀、戈、矛、盂、半两钱等，铁器中有斧、铧、铲、锄、刀、锸。陶器中除钵、盘、罐、瓮等生活器皿外，主要是带各种图案花纹的方砖、瓦当、下水道、筒瓦、板瓦等。特别引人

注目的是出土了大批陶文。一类是有官署名和人名的陶文，如“左司空尚”“宫水”等；一类是在人名前加上县邑名称的陶文，如“美阳工苍”“蓝田工癸”等。从鱼池遗址发现的遗迹、遗物和陶文可知其时代为战国晚期至秦王朝时代。鱼池遗址位于陵北通往都城咸阳和关东的大路旁，应该是当时修陵时的官邸遗址所在。

3. 石料加工厂遗址

位于始皇陵园外城垣西北角的郑庄村南。其东西长约 1500 米，南北宽约 500 米，总面积约 75 万平方米。分为石料堆放区、材料加工区、房屋建筑区等。遗址西边与南边，分别发现两处房屋基址，有的房屋基址上堆积着瓦砾和灰土。这里可能是石料厂监护看守的居住房屋。在石料堆放区内有大量没有加工过的石料。石料加工区内有大量的石质建筑材料，以及半成品和废品等，如石下水道、石渗井盖、石门墩等。在石料加工场遗址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石料、石质建材，出土了铁、石、陶质遗物 200 余件。铜器有矛、半两钱等，铁器中主要是打石用的生产工具，如铁锤、铁錾、铁铲、抬石头用的铁钩以及锸、镰、匕、削等工具，陶器中有罐、钵、盆、釜、瓮等生活器具，还有打磨工具的磨石和加工粮食的石磨以及许多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铁刑具 10 件，其中钳 9 件、桎 1 件。在石料加工场的灰坑里还发现肢体不全的人骨两具。结合出土的铁刑具来看，石料加工场还使用了大批的刑徒。另外，多年来在秦始皇帝陵园范围的建筑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石材，像门墩石、石门槛、铺地用的青石板、砌台阶用的青石条等，它们都出自石料加工场[①]。



图 25　1998 年在秦始皇陵 9801 号坑出土的石胄，此为石胄首次出土。石胄用青石片制作成真实的胄的形状，没有实际的防护作用，应是为陪葬制作的明器　（编写组供稿）

郑庄石料加工厂出土的石料、石材，以及陵园内出土的各种石质遗物，大都是青石。始

①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郑庄石料加工厂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1 期。

皇陵南侧骊山的石质是砂石，比较粗劣，而距始皇陵 55 公里的渭河以北的北山石质是青石，很适宜作建筑用材。秦始皇帝动用大批人力北山采石，通过人工从渭水甘泉口搬运到陵园，工程之艰巨，影响之大，在一首长期流传的民谣中有生动的描述：“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金陵余石大如堰。”

4. 刘寨丽邑建筑遗址

秦王政十六年（前 231）置丽邑，汉高祖十年（前 19）改丽邑为新丰。由此而知，汉新丰是在秦丽邑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秦在此设置丽邑，主要是为了负责陵园的修建，并侍奉陵园。秦始皇帝修建陵墓前后动用人力最多时达数十万，这么多人集中一起从事陵园建设工程，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以及组织、管理、治安等事宜，是十分复杂艰巨的，除有将作大匠、少府等相关官署负责修陵工徒的组织、管理，建材的供应等，其他相应的服务事项绝不是官府所能全部承包的。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陵邑的创建应运而生。所以，陵邑是因陵而设，服务于陵园，是秦始皇陵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皇陵原名丽山，陵园为丽山园，陵邑的名称就叫丽邑。正是修陵工程的需要，始皇三十五年，迁徙 3 万家以充实丽邑的人口。等陵园修建完成后，丽邑仍将为陵园提供常年服务，供其所需。秦始皇帝开创的在帝王陵附近设置陵邑的建制，为西汉王朝所继承。

丽邑遗址位于陵园北侧约 2.5 公里的新丰街道办事处刘家寨村附近，南北长 1000 米、东西宽约 500 米，面积 50 万平方米。遗址内出土大量板瓦、筒瓦残片、云纹瓦当及成排的五角形陶水管道，还有陶罐、陶盆、豆等一些生活用品，并发现大量陶文。陶文内容可归纳为三类：一类为“大匠、北司、都船将”等中央官署类；二类为“安邑禄、宜阳工武、杜秦、下邽”等官营徭役类。这两类陶文大都见于砖瓦上，属于中央官署制陶作坊和从各郡县征调的徭役性制陶作坊的印记。三类是市亭类，如“丽亭、丽市”等。

研究成果：

秦始皇陵由于其雄伟壮观的建筑，深刻的科学文化内涵，特别是兵马俑和铜车马的出土，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于是研究高潮不断涌现，召开了多次大型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形成了“秦俑学”，这在中国帝王陵研究历史上是空前的。下面简要介绍一些重要成果：

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1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0），文物出版社，2006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3），文物出版社，2007 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2009 ~ 2010）》，科学出版社，2012年。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发掘报告》（上下），文物出版社，1988 年。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 年。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 年。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 年。

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年。

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王学理：《秦俑专题研究》，三秦出版社，1994 年。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俑学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年。

田静：《秦始皇陵及兵马俑》，三秦出版社，2004 年。

袁仲一：《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辞典》，文汇出版社，1994 年。

袁仲一：《秦文字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

袁仲一、刘钰：《秦陶文新编》，文物出版社，2009 年。

张仲立：《秦陵铜车马与车马文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年。

张文立：《秦俑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张志军：《秦始皇陵兵马俑文物保护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张卫星：《礼仪与秩序：秦始皇帝陵研究》，科学出版社，2016年。

陈　直：《秦陶券与秦陵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

王玉清：《秦始皇陵调查报告》，《考古》，1962年第8期。

临潼县文化馆：《秦始皇陵附近新发现的文物》，《文物》，1973年第5期。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秦中行：《秦始皇毁灭文化可以休矣——评临潼新出土秦俑的艺术成就》，《文物》，1975年第3期。

闻枚言、秦中行：《秦俑艺术》，《文物》，1975年第11期。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其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第11期。

王仁波：《生气勃勃的秦代养马业——初评临潼秦俑出土的马俑》，《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王学理：《秦兵与秦卒——由秦俑谈起》，《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王学理：《秦俑军阵浅析》，《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托平著，叶正沛译：《中国最难以相信的发现——秦始皇的地下卫队》，《国家地理》，1978年第4期。

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秦俑坑考古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赵康民：《秦始皇陵北二、三、四号建筑遗迹》，《文物》，1979年第12期。

王学理、秦勇：《秦始皇陵工程与兵马俑从葬坑浅探》，《人文杂志》，1980年第1期。

袁仲一：《秦俑艺术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秦俑考古队：《临潼上焦村秦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出土的花纹砖》，《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赵康民：《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洪　致：《 秦始皇陵东侧马厩坑钻探清理简报》，《陕西文献》，1980年第11期。

秦俑坑考古队：《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刘情等：《秦俑艺术》，《中国美术》，1981年第1期。

徐毓明：《古陶雕塑技术的杰出成就——秦兵马俑的发现》，《科学实验》，1981年第1期。

袁仲一等：《秦俑坑青铜兵器工艺标准化》，《陕西标准化》，1981年第2期。

王学理：《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绘彩》，《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白建钢：《秦俑军阵初探》，《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王子岗：《略论秦皇汉武陵》，《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无　戈：《关于始皇陵与兵马俑诸问题》，《理论研究》1，981年第4期。

陈英德：《中国写实雕塑的成就——秦陶俑》，《雄狮美术》，1981年第11期。

王学理：《“秦始皇陵原名丽山”的再议》，《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刘骁纯：《 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美术史论》，1982年第2期。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刑徒墓地》，《文物》，1982年第3期。

孙英民 ：《“秦皇陵西侧赵背户刑徒墓”质疑》，《文物》，1982年第10期。

袁仲一：《秦俑坑的修建和焚毁》《秦俑馆开馆三年文集》，1982年。

屈鸿钧等：《秦俑陶塑制作工艺的探讨》《中国古陶瓷论文集》，1982年。

张文立：《从秦俑坑说秦时标准化》，《大众标准化》，1983年第1期。

李亚东：《秦俑彩绘颜料及秦代颜料史考》，《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韩汝玢等：《秦始皇陶俑坑出土铜镞表面氧化层的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83年第4期。

王学理：《秦俑兵器刍论》，《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陕西临潼鱼池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5期。

傅天仇：《兵马俑的雕塑艺术》，《美术之友》，1983年第6期。

刘开渠：《灿烂的古代雕塑　广阔的创作方法》，《美术之友》，1983年第6期。

陈华昌 ：《秦始皇的陶俑军阵》，《美术之友》，1983年第6期。

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研究》，《考古》，1983年第7期。

王子云：《关于秦兵马俑》，《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王临乙：《中国古代雕塑发展的一个高峰》，《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王朝闻：《不知为不知》，《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叶浅予：《霸业促，谁记马前卒》，《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刘开渠：《灿烂的古代雕塑》，《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张仃：《秦俑——中国土生土长的雕塑》，《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何正璜：《从秦始皇兵马俑坑想到的》，《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吴作人：《联想到的几点》，《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金维诺：《歌颂统一的纪念碑群雕》，《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常任侠：《说秦俑》，《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傅天仇：《兵马俑的雕塑艺术》，《中国历代雕塑·秦始皇陵俑塑群》，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曾　**埙**：《秦俑：兼论中国雕塑传统》，《故宫文物月刊》1卷6期，1983年。

楚　戈：《秦俑的时代意义》，《故宫文物月刊》1卷6期，1983年。

秦　零：《关于始皇陵封土建筑问题》，《考古》，1983年第10期。

刘占成：《对秦俑的几点新认识》，《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第三号》，1983年。

王学理：《秦俑军服考》，《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第

三号》，1983 年。

王玉清：《 秦俑面形和表情》，《文博》，1984 年第 1 期。

陈孟东：《秦陵兵俑衔级试解》，《文博》，1984 年第 1 期。

杨　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 年 3 期。

陈景元：《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大自然探索》，1984 年第 3 期。

刘占成：《郦山与丽邑》，《文博》，1984 年第 3 期。

吴子荣：《论秦俑与秦亡》，《文博》，1984 年第 3 期。

林剑鸣：《秦俑发式和阴阳五行》，《文博》，1984 年第 3 期。

郭淑珍：《秦俑雕塑艺术》，《新疆艺术》，1984 年第 5 期。

孙　特：《秦始皇不是兵马俑坑的主人》，《光明日报》，1984 年 10 月 10 日。

呼林贵：《秦俑艺术的流派及渊源》，《文博》，1985 年第 1 期。

李鼎铉：《秦兵马俑写实主义风格》，《文博》，1985 年第 1 期。

聂新民：《秦俑铠甲的编缀及秦甲的初步研究 》，《文博》，1985 年第 1 期。

张文立 ：《近年秦俑研究述评》，《文博》，1985 年第 1 期。

林剑鸣：《秦俑之谜》，《文博》，1985 年第 1 期。

秦　鸣：《秦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文博》，1985 年第 1 期。

陈孟东、卢桂兰：《秦陵兵马俑爵级考》，《文博》，1985 年第 1 期。

张占民、何欣云：《秦俑坑年代考辨——与陈景元同志商榷》，《人文杂志》，1985 年第 1 期。

庞　齐 ：《观秦俑，谈方阵》，《文博》，1985 年第 1 期。

祖国庸 ：《临潼出土的秦代陶马考察》，《农业考古》，1985 年第 1 期。

刘修明：《秦俑坑的主人究竟是谁》，《社会科学》，1985 年第 2 期。

裘　沙 ：《从秦俑和汉墓石刻看以形写神的途径》，《工艺美术参考》，1985 年第 2 期。

白建钢：《 秦俑步兵的射击技术 》，《文博》，1985 年第 2 期。

程学华：《始皇陵东侧又发现马厩坑》，《文博》，1985 年第 2 期。

田旭东：《略论秦汉时期军队的发展——秦俑与杨家湾汉俑军阵的比较》，《文博》，1985 年第 2 期。

刘　炜：《秦始皇陵布局浅谈》，《文博》，1985 年第 2 期。

王玉清：《秦俑的发髻》，《文博》，1985 年第 4 期。

刘占成：《秦俑带钩浅述》，《文博》，1985 年第 6 期。

马先醒：《骊山秦俑之须发冠中》，《简牍学报（一）》，1985 年。

石兴邦：《秦始皇陵考古研究简说》，《学术动态》，1985 年第 11 期。

程学华：《秦始皇陵区发现的“明琼”》，《文博》，1986 年第 2 期。

林剑鸣 ：《秦俑主题何处觅——〈秦俑之谜〉之二》，《文博》，1986 年第 2 期。

刘占成：《秦俑的造型和焙烧技术初探》，《陕西省科学技术史学会论文集》，西安交大出版社，1986 年。

袁仲一：《秦陵兵马俑的作者》，《文博》，1986 年第 4 期。

春　材：《跪射俑考》，《文博》，1986 年第 4 期。

张占民：《秦俑一号坑与古代方阵》，《文博》，1986 年第 5 期。

聂新民：《也谈秦兵马俑的主题》，《文博》，1986 年第 5 期。

李　铨：《秦陵布局与兵马俑坑》，《文博》，1986 年第 5 期。

刘云辉：《秦俑与秦代军人的形体特征——高大与鼓腹》，《文博》，1986 年第 5 期。

曾布川宽：《试论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东方学报》58 册，1986 年。

刘云辉：《秦陵地宫之谜》，《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呼林贵：《早期秦俑简述》，《文博》，1987 年第 1 期。

王　恺：《秦汉兵马俑的几个问题》，《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吴晓丛 、张文立：《主题、意志、逆反心理——再论秦俑的主题思想》，《文博》，1987 年第 1 期。

贺西林：《继承、融合和时代精神的结晶——兼探秦俑写实主义艺术渊源》，《文博》，1987 年第 1 期。

王子今：《秦始皇陵复土工程用工人数论证》，《文博》，1987 年第 1 期。

聂新民：《秦俑彩绘技法及其源流》，《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呼林贵：《秦代与西汉陶俑制作工艺浅析》，《文博》，1987 年第 1 期。

高景明：《秦俑修造之谜》，《文博》，1987 年第 1 期。

郭淑珍：《“将军俑”与秦代的军队组织》，《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张文立：《秦俑的冲击波》，《文博》，1987 年第 1 期。

陈孟东：《跪射俑、立射俑新说》，《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张占民：《关于秦俑兵器时代的问题》，《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张仲立：《秦俑二号坑军阵与轻车锐骑材士》，《文博》，1987 年第 1 期。

郭兴文：《以秦陵论秦亡的反思》，《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尚志儒；《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渊源浅谈》，《文博》，1987 年第 1 期。

始皇陵考古队：《秦俑一号坑第二次发掘简报》，《文博》，1987 年第 1 期。

武利华：《秦汉帝王陵墓俑群不宜统称兵马俑——论秦墓陪葬俑群意图的异同》，《陇海论坛》，1987 年第 2 期。

白建钢：《论秦陵军阵的基本战术》，《唐都学刊》，1987 年第 4 期。

张文立：《论秦俑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新华文摘》，1987 年第 4 期。

郭淑珍：《秦陵工程督建考》，《文博》，1987 年第 6 期。

秦始皇陵考古队：《秦始皇陵西侧“丽山飤官”建筑遗址清理简报》，《文博》，1987 年第 6 期。

白建钢：《论秦俑军阵的轻、重装步兵》，《西北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单暐、赵西晨：《秦兵马俑彩绘成分的再探》，《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1 期。

林剑鸣 、张文立：《秦陵墓上石刻探微》，《宝鸡师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

程学华：《秦陵秦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2 期。

王学理：《浅论丽山》，《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3 期。

王学理：《指挥系统与指挥权——秦俑阵营里透漏的信息》，《文博》，1988 年第 3 期。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5、6 期。

王玉清：《秦俑坑中战车及相关问题》，《文博》，1988 年第 6 期。

张仲立：《关于秦俑坑战车》，《文博》，1988 年第 6 期。

党士学：《秦兵马俑三号坑战车初探》，《文博》，1988 年第 6 期。

张志军：《温湿度对秦俑影响情况的实验研究》，《文博》，1988 年第 6 期。

张占民：《秦俑二号坑编制考述》，《文博》，1988 年第 6 期。

白建钢：《论秦俑军队的铠甲》，《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3 期。

张仲立、党士学：《也谈秦俑坑的洗劫与焚毁》，《文博》，1989 年第 5 期。

党士学 ：《四号坑是未建成之俑坑说质疑》，《文博》，1989 年第 5 期。

孙嘉春：《秦始皇陵之谜地学考辨》，《文博》，1989 年第 5 期。

张志军：《浅谈秦俑文物的保护问题》 ，《文博》，1989 年第 5 期。

王学理 ：《“丽山飤官”（东段）复原的构思》，《考古与文物》，1989 年第 5 期。

刘凤君：《世界古代陶塑艺术的明珠——秦始皇陵兵马俑艺术特色分析》，《文博》，1990 年第 2 期。

刘荣庆 ：《“秦置丽邑”考辨》，《文博》，1990 年第 5 期。

郭兴文 ：《关于秦始皇陵建造的三个问题》，《文博》，1990 年第 5 期。

李鼎铉 ：《秦始皇陵考古谈片》，《文博》，1990 年第 5 期。

邵友程：《从水文地学看秦陵地宫深度》，《文博》，1990 年第 5 期。

陈春辉：《秦俑服饰二札》，《文博》，1990 年第 5 期。

许卫红：《秦陵陶俑军服纽扣初探》，《文博》，1990 年第 5 期。

申茂盛：《浅论秦俑铠甲》，《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刘占成：《秦俑战袍考》，《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周铁、张志军：《 秦俑表面彩绘的保护研究》，《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张志军：《秦俑彩绘质地再探》，《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周　铁：《秦俑文物保护实验与研究述评》，《文博》，1990 年第 5 期。

高景明：《秦兵马俑与秦的统治思想》，《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张占民：《秦始皇陵园渊源试探》，《文博》，1990 年第 5 期。

黄留珠：《秦俑、秦俑学与秦之管理》，《文博》，1990 年第 5 期。

王学理：《一幅秦代的陈兵图——论秦俑坑的性质及其编成》，《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吴小强：《从秦简看秦俑的社会内涵》，《文博》，1990 年第 5 期。

张仲立：《秦俑三号坑性质刍议》，《文博》，1990 年第 5 期。

贺西林：《对秦俑的艺术价值及地位的再认识》，《文博》，1990 年第 5 期。

王宝玲、张宁：《秦俑雕塑与古希腊雕塑的几点比较》，《文博》，1990 年第 5 期。

田　静：《秦俑雕塑与秦人的悲剧意识》，《文博》，1990年第5期。

李自智：《试论秦始皇陵园布局对后代帝陵的影响》，《文博》，1990年第5期。

高维华、王丽玖：《秦始皇陵工程地质述评》，《文博》，1990年第5期。

瓯　燕：《秦始皇陵封土上建筑之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

吕智荣：《秦始皇兵马俑陪葬之制渊源探索》，《文博》，1992年第2期。

刘　林：《秦俑的发式与头式》，《文博》，1992年第2期。

刘占成：《秦俑制作标准化浅述》，《文博》，1992年第3期。

张仲立：《长平之战与秦俑坑军事建筑》，《文博》，1993年第1期。

徐卫民：《秦陵兵马俑艺术特色浅谈》，《艺术贵族》，1993年第2期。

李淑萍：《由秦俑到秦文化——秦俑研究及其辐射概述》，《文博》，1993年第5期。

申　羽：《从秦俑坑中的胡人形象说起》，《西北史地》，1994年第1期。

邱紫华:《秦俑是中国先秦审美文化的结晶: 兼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文化研究》,1994年第3期。

白建钢：《论秦俑军队“长矛手”及其战术》，《文博》，1994年第4期。

孙嘉春：《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文博》，1994年第6期。

范大鹏：《从秦俑学研究看中国军事考古学》，《文博》，1994年第6期。

黄今言：《秦代中央军的组成和优势地位—兼论秦兵马俑所反映的军事内涵》，《文博》，1994年第6期。

王辉强：《秦兵马俑与秦军阵法》，《文博》，1994年第6期。

刘德增：《秦始皇陵兵马俑军职实即八阵中的方阵》，《文博》，1994年第6期。

郭宝发：《秦俑军事指挥系统初探》，《文博》，1994年第6期。

郭淑珍：《试论秦俑坑弩兵在中国军事史上的意义》，《文博》，1994年第6期。

斯维至：《秦兵马俑所见的羌戎文化》，《文博》，1994年第6期。

田　静：《由秦俑透视秦军之作战能力》，《文博》，1994年第6期。

许卫红：《秦俑下体防护装备杂探》，《文博》，1994年第6期。

尚志儒：《秦陵及其陵寝制度浅论》，《文博》，1994年第6期。

李秀珍：《秦俑服饰配备问题试探》，《文博》，1994年第6期。

贺西林：《秦俑艺术研究——探索方法的意义》，《文博》，1994 年第 6 期。

张　敏、张　宁：《秦人审美意识与秦兵马俑》，《文博》，1994 年第 6 期。

徐卫民：《秦俑二号坑揭秘》，《历史月刊》，1994 年第 10 期。

袁仲一：《对〈秦始皇陵墓向与布局结构问题研究〉的一点商讨意见》，《文博》，1995 年第 3 期。

党焕英：《秦俑服饰及其礼仪初探》，《文博》，1995 年第 3 期。

张文立：《秦俑与秦俑学》，《文博》，1995 年 5 期；《新华文摘》，1995 年第 12 期。

张占民：《秦始皇陵北寝殿建筑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考古》，1996 年第 11 期。

程学华、王玉龙：《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综述》，《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1 期。

袁仲一：《秦俑的彩绘颜色》，《秦俑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

袁仲一：《对秦始皇陵园门阙遗址的初步认识》，《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4 年。

李开元：《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 年。

张仲立：《神仙文化对始皇陵丧葬影响试探》，《秦文化论丛》第十二辑，三秦出版社，2005 年。

王关成：《秦陵石马甲与秦汉骑兵装具研究》，《秦文化论丛》第十三辑，三秦出版社，2006 年。

刘庆柱：《秦始皇陵墓规模的考古解读——关于学术研究中的“过度”解释问题》，《群言》，2008 年第 10 期。

刘占成：《秦始皇陵内水银研究》，《秦文化论丛（十五）》，三秦出版社，2008 年。

党士学：《秦陵铜车马的舆底结构、牵引关系与力学应用》，《周秦汉唐文明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柯羽阳：《秦始皇陵与汉阳陵陶俑比较及成因分析》，《新视觉艺术》，2009 年第 1 期

刘九生：《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唐都学刊》，2009 年第 2 期。

王学理：《秦俑是“兵”还是“郎”？——一个貌似学术性的常识问题》，《唐都学刊》，2009 年第 4 期。

孙伟刚：《戏、丽邑与丽山园—兼论秦始皇帝陵丽邑的功能与作用》，《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4期。

张卫星：《试论秦始皇陵葬制的突破》，《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5期。

徐卫民：《秦帝陵制度研究》，《唐都学刊》，2010年第1期。

张卫星：《秦汉帝陵陵寝制度及其象征研究的思路深析——以秦始皇陵的研究为例》，《中原文物》，2010年第3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北门勘探简报》，《文物》，2010年第6期。

张卫星：《“骊山之作未成”的考古学观察》，《文物》，2010年第6期。

朱学文：《试论秦始皇陵园选址的有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6期。

徐卫民：《也谈秦始皇陵的石刻雕塑》，《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兵马俑一号坑后五方遗物清理简报》，《华夏考古》，2012年第1期。

申茂盛：《秦俑是“兵”是“郎”——与刘九生先生商榷》，《文博》，2012年第3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内城陵寝建筑勘探简报（二）》，三秦出版社，201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陵区北部Ⅰ区2010年钻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三秦出版社，201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园内城东西向墙垣城门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三秦出版社，201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K201002陪葬坑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三秦出版社，2012年。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帝陵封土西侧三号陪葬坑勘探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二》），三秦出版社，2012年。

王学理：《秦始皇陵墓中的水银及其来源》，《文博》，2013年第3期。

刘九生：《秦始皇帝陵总体营造与中国古代文明：天人合一整体观》，《唐都学刊》，2013年第2期。

张卫星：《秦始皇陵陪葬坑建筑形式研究》，见《西安文物考古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13年。

王志友：《“其旁行三百丈”新探》，《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2011—2012年度秦始皇帝陵K9901考古简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三）》，三秦出版社，2013年。

四、陵墓变迁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秦始皇陵也随着历史发展而浮沉。

最早记载地宫被盗的是《史记》，刘邦列举了项羽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就是“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

《汉书·楚元王传》云：“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人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

《水经注·渭水》也云：“项羽入关，发之，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关东盗贼，销椁取铜，牧人寻羊烧之，火延九十日不能灭。”

最早保护始皇陵墓的是汉高祖。据《汉书·高祖本纪》载：“十二年（前195）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隐王、魏安釐王、齐缗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

王莽时期以后，其陵墓被任意践踏耕牧，无人过问。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曾下令保护古帝诸陵，在所有帝王坟陵四面各五十步内禁止耕种。

隋炀帝即位初年，在保护帝陵方面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据《隋书·炀帝纪》记载，大业二年（606）炀帝下诏护陵。认为前代帝王顺应时事，创建绩业，应受到尊敬，而时代推移，年代愈久，坟墓残毁，茔冢堙荒，感到悲伤，下令给帝王陵墓附近的十户人家免除杂役，让他们守护陵墓。

唐太宗贞观年间要求不得在陵区放牧，春秋二季要进行祭祀，高宗时又认为“始皇无道，所以弃之”。放弃了对始皇陵的保护和祭祀。唐玄宗时又给秦始皇以合法祭祀的地位，增加配享。

历代王朝中最重视对“前代帝王陵寝、忠臣贤士丘垄”保护的是北宋王朝。宋太祖赵匡胤刚一登基就下令置户守陵，对陵墓损毁的予以修缮，给秦始皇陵及各代帝王陵墓各设置二



图 26　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保护展厅　（编写组供稿）

户人家守陵，要求“三年一祭一太牢”。在宋初的 44 年里就大规模修过 6 次古代帝王陵墓，使秦始皇陵也受到了保护。

北宋以后的 900 多年历史中，再也没有看到对秦始皇陵进行保护的记载了，虽然明、清二代也曾遣使查访先代陵寝，多次享祭历代帝王，但都以“功德昭著”的标准，把秦始皇排除在外。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在秦始皇陵立碑。

对秦始皇陵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是从 20 世纪开始的。1956 年 8 月，秦始皇陵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 年 3 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了保护范围，并树立了保护标志，进行了考古钻探调查，获得了大量的有关陵园形制、建筑遗迹等文物资料。1962 年 3 月修建了秦始皇陵碑亭，同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人员考察秦始皇陵园，测绘出第一张陵园平面图。公布了陵园的范围、图形。

1973 年 11 月，陵北发现郑家庄秦始皇陵石料加工场遗址。



1974 年兵马俑被发现后，考古工作者又对陵园作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先后发现 600 余处陪葬坑、陪葬墓、建筑遗址，引起世界轰动，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国内外观众来此参观游览。

1987 年 12 月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以其恢宏的气势、丰富的文化遗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单”，成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随着合理利用、科学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秦始皇陵将进一步得到保护。

五、保护管理

秦始皇陵历史上遭受各种破坏较为严重。据史书记载，项羽入关以后，就曾大规模破坏。再加上两千多年的自然损坏，封土堆仍为四方锥形，地宫似未遭受大规模毁坏，地面上的寝殿、便殿、门阙以及园吏寺舍等建筑物都被焚烧，毁坏极为严重，地面遗存很少。内外城垣破坏严重，个别地方仍高出地表 1 ～ 3 米，其余仅存墙基，兵马俑坑遭受过焚烧和人为破坏。根据近些

年的考古探查、发掘，目前已发现的陵园东侧内外城之间的石铠甲坑、百戏俑坑、府藏坑，外城东北角铜水禽陪葬坑都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焚烧和人为破坏。

1961 年 3 月，秦始皇陵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4 年 3 月，发现秦兵马俑，陕西省革委会文化局成立秦俑考古队，负责秦俑坑考古勘探、发掘事宜。

1979 年 10 月 1 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开馆。一号坑对外开放。

1984 年，成立了秦陵文管所。

1987 年 12 月，秦始皇陵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89 年 9 月 27 日，秦俑三号坑对外开放。

1994 年，秦俑二号坑和秦始皇陵陈列厅对外开放。

2005 年 10 月 1 日，陕西省立法机关制定的《秦始皇陵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是陕西省为严格保护秦始皇陵及兵马俑而首次专门订立法规，也是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行政许可法》之后，第一个由地方立法机关审议批准的文物保护专项立法。

2009 年初，经陕西省政府批准，在秦俑博物馆的基础上成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同时，被列入国家、陕西省重点建设项目的秦始皇陵考古国家遗址公园建设工程也加快了进度。

2010 年 10 月 1 日，占地 3386 亩位于秦始皇陵陵区核心区的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2011 年 10 月 1 日，秦始皇陵 K9901、K0006 陪葬坑陈列厅建成开放，这是目前为止秦陵遗址公园内最先建成的两座遗址陈列厅，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秦兵马俑博物馆一起初步构建起秦始皇陵遗址区的公共展示体系。

第二节　秦二世皇帝陵

秦二世墓是秦代的第二任皇帝、秦始皇少子胡亥的墓葬，地处西安市雁塔区曲江街办曲江村西。墓冢为半圆形，封土堆直径 25 米，高 5 米，墓北有清代毕沅立石碑一通。



图 27　秦二世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一、墓主生平

胡亥（前 230 ~ 前 207），即秦二世，前 210 ~ 前 207 年在位。

胡亥是秦始皇的第 18 子。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秦始皇率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胡亥等人，进行第五次出巡，勒石颂功。但在出巡途中，病故沙丘（今河北省邢台市附近），秦始皇临终前，令赵高起草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诏书及印玺封好后，未及交给侍者，秦始皇就驾崩了。这时，扶苏正在陕北边境监军。于是赵高便乘机唆使胡亥，共同威逼左丞

相李斯就范，然后合谋，密不发丧，篡改遗诏，捏造罪名，逼死了长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等人，胡亥因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称为秦二世，时年 21 岁。

胡亥称帝后，为了防止其他兄弟反对他的篡位，便与赵高合谋，将秦始皇的 20 多位王子全部杀死，并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对他不满的 10 多位公主肢解。上至朝廷重臣，下至郡县守尉，凡不能与其苟合者，皆惨遭诛杀。一时，全国上下相连坐者不可胜数。

胡亥昏庸无能，即位不久便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朝政大事全由赵高左右。赵高素有野心，乘机肆意残害文臣武将。胡亥继续大修阿房宫和驰道，赋税徭役比秦始皇在位时更加繁重，“用法益刻深”，不听劝谏。李斯被杀后，胡亥封赵高为中丞相。赵高更加势重，权至倾国，遂导演了“指鹿为马”的闹剧。由于胡亥横征暴敛，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赋税、残酷的刑罚，使人民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终于在秦二世元年（前 209）七月，爆发了由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

秦二世三年（前 207）八月，刘邦率 10 万大军，进了武关，逼近咸阳，派人收买赵高做内应。赵高也妄图与刘邦分治关中，于是和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派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去杀掉二世。阎乐带兵包围了地处泾阳的望夷宫，以缉盗为名，冲入宫内，杀死宫院护卫，命令胡亥自杀。胡亥跪地哀求：“愿得一郡为王”“愿为万户侯”“愿与妻子共为黔首”，但均遭拒绝。胡亥无奈，只好自尽，死时仅 23 岁。

二、营建始末

秦二世死后，赵高召诸大臣，立二世之侄子婴为秦王。子婴设计杀死了赵高，并灭其三族。同时，以“黔首之仪”将胡亥葬于长安南郊的宜春苑中。

三、保护管理

1950 年 4 月至 1951 年 2 月，西北文化部社会文化处对西安市和附近各县的古迹进行了调查，秦二世胡亥墓也在这次调查之中。

1956 年 8 月 6 日，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政府立保护标志碑。

1986 年前后西曲江池村筹资了 12 万余元，租用土地约 20 亩，当年筑了围墙、修建了 3

间宽的山门、5 间宽的正殿以及偏殿等，后殿内塑“指鹿为马”泥塑像，整修加固了坟冢，并给毕沅立的碑包裹上砖，园内栽了几百棵泡桐等树，内设日常工作人员 4 人。1987 年春节对外开放。刚开始还有一些游人，但由于该景点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诸多原因，一直入不敷出。

1991 年，村上将经营权转给二组村民王树发。王树发又对景区进行维修，并种植了松树等树木，但一直赔钱。1996 年，经协商，转包给西影厂李镇东，租期 12 年。但经济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2010 年曲江新区以保护历史遗址为宗旨，整饬陵地，修园植绿，建博物馆，遂成“秦二世遗址公园”。秦二世陵遗址公园是以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二世胡亥的墓地为基础扩建而成的，是西安曲江新区六大遗址公园之一，也是曲江唯一的秦风园林。占地面积约 70 亩，其中建筑面积 4714 平方米。园区的主要建筑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展览馆主楼、展览馆副楼、秦二世陵墓等。功能内容上则集遗址保护、秦文化展示、观光游览、公共公园、消费休闲等多种功能于一体。园区的建筑风格具有秦风特色，以直线、几何、阵列等简洁的手法体现秦文化的壮美、力量和宏大，与其他唐韵园林形成明显区别，成为曲江独具特色的遗址公园。



图 28　秦二世陵园山门　（摄影：郑茂良）

展览馆区以全面回顾表现秦族、秦国、秦朝的历史文化为主线，展现辉煌灿烂的秦文化，给游客带来回归体验大秦文明的震撼感。展览馆区由两大展馆组成，其中展览馆主楼秦殇馆以秦二世一生中经历的主要历史事件作为叙事主线，以秦国文明的兴起及衰落作为整个故事的背景线索，以实物复原和场景再现的手法，在展示秦代文明的同时，也客观的描述了在秦二世统治下秦文明从极盛到衰败的历史过程。秦殇文化展览馆位处秦二世冢西北方位，形简

色灰，以经岁月磨砺的秦砖残砾状，凝聚秦朝历史。展馆建筑面积 2338.9 平方米，展览面积 1384.65 平方米，整个展览馆的展陈空间共划分为 8 个相对独立的场景，充分利用展览馆建筑提供的功能空间，安排相关的展陈故事及场景，并采用声、光、电、影像、模型、道具文物等一些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历史故事与当代技术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化展览馆。秦殇馆中的八个场景分别为秦人起源、秦国崛起、沙丘矫诏、二世登基、二世政事、帝国终结、文明劫难、文明反思，在这些场景中分别展示了商鞅变法、工程建设、统一度量衡、大一统政治制度、秦代律法、秦代音乐等一系列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化事件。

曲江新区出土文物精品展以近几十年曲江区域内出土的精品文物为主体，对曲江的历史文化进行整体展示，该展馆分为遗址展厅、陶器展厅、青铜玉器展厅、壁画复原展厅四部分。这四个展厅陈列的文物共 150 多件，图片及文字介绍资料 3 万多字，采用文字、模型、实物、图片、影视及多媒体系统等多种形式，融知识性、优美性、娱乐性于一体，发挥研究和展示功能，通过这些文物展示出曲江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对历史文化学习的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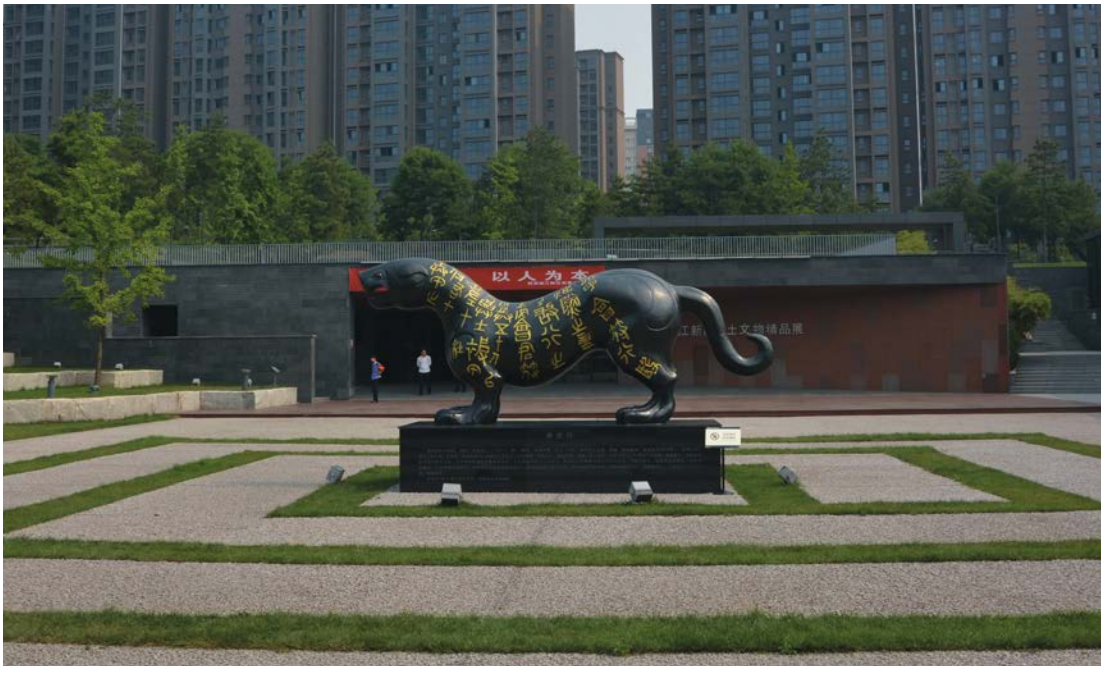


图 29　曲江新区出土文物精品展馆外景　　（摄影：郑茂良）

第三章

西汉帝陵



前 202 年，刘邦在山东定陶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并定都洛阳。不久即接受娄敬和张良的建议，迁都关中，以长安为都，史称西汉。至 8 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西汉共历时 210 年，经 11 代 15 帝，分别是高祖刘邦（前 202 ~前 195）、惠帝刘盈（前 195 ~前 188）、前少帝刘恭（前 188 ~前 184）、后少帝刘弘（前 184 ~前 180）、文帝刘恒（前 180 ~前 157）、景帝刘启（前 157 ~前 141）、武帝刘彻（前 141 ~前 87）、昭帝刘弗陵（前 87 ~前 74）、昌邑王刘贺（前 74）、宣帝刘询（前 74 ~前 49）、元帝刘奭（前 49 ~前 33）、成帝刘骜（前 33 ~前 7）、哀帝刘欣（前 7 ~前 1）、平帝刘衎（前 1 ~ 5）、孺子刘婴（5 ~ 8）。15 位帝王中，除前少帝刘恭被吕后所杀、后少帝刘弘在吕后死后被大臣所杀、昌邑王刘贺被废黜、孺子刘婴在王莽代汉后为乱兵所杀，葬处不明外，其余 11 位帝王去世后皆葬在都城长安周围。此外，西汉有些皇帝还按帝陵规格修建其父或其母之墓，或以皇帝、皇后的礼仪安葬，高祖父太上皇陵，文帝母薄太后南陵，昭帝母钩弋夫人云陵，宣帝父母史皇孙和王夫人的陵墓均属此类。

西汉的 11 座帝陵可以分为渭北咸阳原和长安城东南两大陵区。其中，有 9 座位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自西向东依次是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元帝渭陵、哀帝义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另外两座，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分别位于都城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东北隅和鸿固原最高处。两大陵区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传统礼仪、昭穆制度和地形条件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旧唐书·吕才列传》云：“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域。”帝陵葬于都城北部，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礼议。而文帝霸陵和宣帝杜陵却未遵循此制，主要是因为文帝刘恒和惠帝刘盈为兄弟辈分，同属穆位，惠帝既已葬高祖长陵之西（右），文帝若再葬入渭北的咸阳原陵区，位置便无法安排，只好另辟茔地；同样，宣帝刘询为武帝曾孙、昭帝堂孙，与昭帝同属昭位，继位后也就不能在咸阳原上预建寿陵。无论是咸阳原陵区，还是长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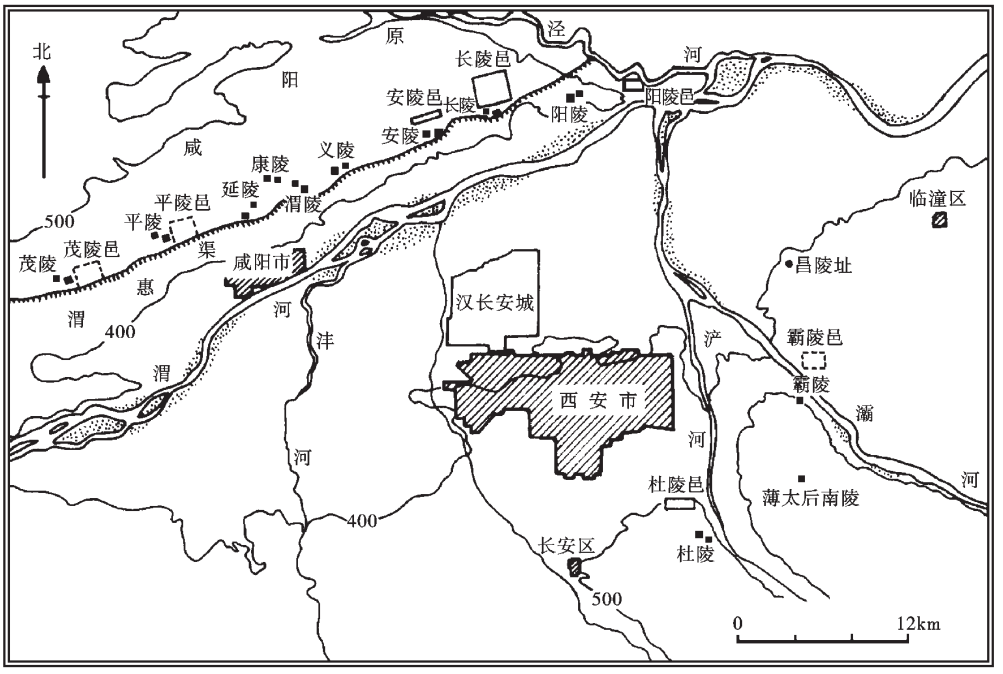


图 1　西汉十一陵分布示意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东南陵区，这些帝陵都毫无例外地位于原上靠近原边的位置。《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云：“诸陵皆据高敞地为之，县即在其侧。”陵墓建于原上且靠近原边，不仅地势高敞，可以居高临下，俯视群庶，充分体现皇权的威严和高大，还由于帝陵的葬埋比较深，能有效防止地下水对玄宫的侵害。

西汉皇帝在位时即为自己选择陵位，营建陵墓。《汉旧仪》载前汉诸帝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①]《晋书・索靖传》也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似乎西汉皇帝即位次年即为自己建造陵墓。但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景帝作寿陵是在五年（前 145）春正月[②]，武帝作寿陵是在建元二年（前 139）[③]，

①（南朝）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刘昭注补引，中华书局，1964 年，第 3144 页。

②《汉书》卷五《景帝纪》：“五年春正月，作阳陵邑。”注引张晏曰：“景帝作寿陵，起邑。”第 143 ~ 144 页。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建元二年）初置茂陵邑。”注引应劭曰：“武帝自作陵也。”第 158 页。

宣帝作寿陵是在元康元年（前 65）春[①]，元帝作寿陵是在永光四年（前 40）冬十月[②]，成帝作寿陵是在建始二年（前 31）闰正月[③]，哀帝作寿陵是在建平二年（前 5）七月[④]，分别是在其即位后的第 5 年、第 2 年、第 9 年、第 5 年、第 2 年、第 2 年，建元后的第 4 年、次年、第 8 年、第 4 年、次年、次年，都不在即位的次年。如果说是建元后的次年更准确，但也仅武帝、成帝、哀帝 3 位皇帝。高祖、惠帝、文帝、昭帝、平帝寿陵起建时间未见明确记载，据《汉书·文帝纪》载："赞曰：……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以及《汉书·张释之传》载：

> 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铟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

说明文帝即位后也为自己营建寿陵。又据《三辅黄图》载："昭帝平陵，在长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寿陵，令流水而已。石椁广一丈二尺，长二丈五尺，无得起坟。陵东北作庐，长三丈五步，外为小厨，裁足祠祝，万年之后，扫地而祭。"[⑤] 可见昭帝在位时也作寿陵。由此说，西汉诸帝即位后为自己营建寿陵是通行的惯例。

西汉皇帝和皇后合葬，同茔不同穴。《史记·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云："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所谓同茔，是指葬在同一陵域。西汉初期，皇帝陵和皇后陵位于同一个陵园内，如长陵、安陵均如此。从文帝霸陵开始，帝、后陵墓开始各自筑陵园，但两者相邻，仍属同茔。关于帝、后陵的相对位置，学界多倾向于"帝西后东"之制，即帝、后陵的相对位置，皇帝陵一般在西，皇后陵在东。但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

---

①《汉书》卷八《宣帝纪》："元康元年春，以杜东原上为初陵，更名杜县为杜陵。"第 253 页。

②《汉书》卷九《元帝纪》："（永光四年冬十月）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第 292 页。

③《汉书》卷十《成帝纪》："（建始二年春正月）闰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第 305 页。

④《汉书》卷十一《哀帝纪》："（建平二年）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吏，使得自安。"第 340 页。

⑤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卷六《陵墓》，三秦出版社，2006 年。

为，西汉帝后合葬，帝西后东和帝东后西者皆有之[①]。目前，可以确定属于“帝东后西”之制的有太上皇万年陵、惠帝安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皇后陵均位于皇帝陵的西北方。可以确定属于“帝西后东”之制的有文帝霸陵、景帝阳陵、宣帝杜陵、哀帝义陵，皇后陵一般位于皇帝陵的东北方[②]。



图 2　1935 年，德国汉莎航空飞行员卡斯特尔由西南向东北方向航拍的汉茂陵封土，远处墓冢为茂陵陪葬墓之一的卫青墓

西汉帝陵茔域规模很大，包括帝陵陵园、皇后陵园以及亲属功臣的陪葬区。帝陵的墓室称为“方中”，平面呈方形。其营筑方法是从平地向下挖好墓穴，然后在穴中构筑成殿堂形状，其上置炭石，堆沙，复土。方中的中心建筑是“明中”，也即通常所说的墓室，也称“玄宫”，用以放置皇帝的葬具等。西汉皇帝的葬具主要有梓宫和用柏木制作的黄肠题凑。明中之外，则放置漆缯绮金宝米谷及车马禽兽等随葬品。其外筑城，设置各种防盗机关。《汉旧仪》载：

> 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

① 曾青：《关于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1987 年第 1 期。

②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79 ~ 180 页。

黄肠题凑，以次百官藏毕。其设四通羡门，容大车六马，皆藏之内方，外陟车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已营陵，余地为西园后陵，余地为婕妤以下，次赐亲属功臣。

《皇览》曰：

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扞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发近郡卒徒，置将军尉候，以后官贵幸者皆守园陵。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①

除文帝霸陵“因其山，不起坟”外，其余西汉帝陵皆筑有高大的封土。封土皆夯筑，外观呈覆斗形，平面形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平面呈长方形的覆斗形，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长方形，当即所谓的“坊”形封土，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和平帝康陵皆如此；一种是平面呈正方形的覆斗形，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近方形，当即所谓的“堂”形封土，景帝阳陵及其以后帝陵封土基本如此。另外，昭帝平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平帝康陵封土的上中部四面皆内收，形成层台状，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仿造“山”形筑坟所致②。皇后陵的封土形状一般与其合葬的帝陵封土形状相同。

西汉各帝陵的封土规模有所差别，文献记载也不尽相同。上引《汉旧仪》云“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关中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③西汉营建帝陵的工程量十分浩大，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去世后，“郎中令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臧郭穿复土属将军武”。《汉书·酷吏传》记载，“昭帝大行时，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至方上。”

西汉帝、后陵园皆筑有垣墙，有内外两重。内墙垣是帝、后陵墓本身的墙垣。汉初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帝、后陵墓位于一个陵园内，陵园平面呈长方形，陵园内设置陪葬坑和寝园等建筑。从文帝开始，皇帝和皇后的陵墓各自筑成一座陵园，陵园平面基本呈方形，陵墓基本位于陵园的中部，寝园位于陵园外西北或东南部，陪葬坑区位于陵园外面。因为一般帝陵在西，

① 《后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刘昭注补引，中华书局，1964年，第3144页。

②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57～162页。

③ 刘庆柱：《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图 3　复原后的汉阳陵帝陵南门门阙　（编写组供稿）

后陵在东，所以帝陵陵园称“西园”，皇后陵陵园称“东园”。

《续汉书·祭祀志》云：“古不墓祭，汉诸陵皆有园寝，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①] 西汉帝陵和皇后陵皆设有寝园，甚至皇帝的父母、祖父母或兄弟的墓葬，有些附近也筑有寝园，以供祭祀之用。寝园是以寝殿为中心，包括便殿的一组建筑群。建筑群周围营筑垣墙，所以称“寝园”，或简称为“园”。《汉书·韦贤传》载：

> 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一岁祠，上食二万四千四百五十五，用卫士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乐人万二千四十七人，养牺牲卒不在数中。[②]

所谓寝殿，是寝园中的主体建筑，也是皇帝或皇后陵墓的正殿，象征着皇帝平生正殿路寝，殿堂内陈放着墓主的“神坐”供人祭祀，所以又称“神寝”。帝陵的重大礼仪祭祀活动在寝殿中举行。便殿是寝殿旁边休息和闲宴的场所。《三辅黄图》载：“高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

①《后汉书》志第九《祭祀志下》，第 3199 页。

②《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 3115 ~ 3116 页。

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①]《汉书》颜师古注云：“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处，所以就便安也。园者，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为休息闲宴之处耳。”[②] 刘庆柱、李毓芳认为，便殿功能有四点：第一，存放皇帝或皇后生前用过的衣物，以及为皇帝和皇后举行葬仪时所用的器物。第二，进行祭祀活动。第三，寝殿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前后，供参与者“休息闲宴”。第四，寝园中主要官员办公之地。

《汉书·韦贤传》载：

> 初，高祖时，令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庙。至惠帝尊高帝庙为太祖庙，景帝尊孝文庙为太宗庙，行所尝幸郡国各立太祖、太宗庙。至宣帝本始二年，复尊孝武庙为世宗庙，行所巡狩也立焉。凡祖宗庙在郡国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并为百七十六。[③]

《三辅黄图》云：“宗，尊也；庙，貌也，所以仿佛先人尊貌也。汉立四庙，祖宗庙异处，不序昭穆。”[④] 宗庙是天子、诸侯祭祀祖先的处所。按古代宗法制度，宗庙的神主以辈次排列，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用来分别宗族内部的长幼、亲疏和远近。《三辅黄图》载：“太上皇庙，在长安西北长安故城中，香室街南，冯翊府北。”“高祖庙，在长安西北故城中。……孝惠更于渭北建高帝庙，谓之原庙。”“惠帝庙，在高帝庙后。”“文帝庙，号顾成庙。……在长安城南。”“景帝庙，号德阳宫。”“武帝庙，号龙渊宫，今长安西茂陵东有其处，作铜飞龙，故以冠名。”“昭帝庙，号徘徊。”“宣帝庙，号乐游，在杜陵西北。”“元帝庙，号长寿。”“成帝庙，号阳池。”[⑤] 可见太上皇庙、高祖庙、惠帝庙汉初都建在汉长安城中、文帝庙建在长安城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又在其陵旁建原庙，庙建陵旁应是从景帝开始创立的一个制度。

西汉的陵庙和宗庙一样，周围筑有垣墙，所以陵庙又称“庙园”。有的陵庙的庙园和寝、

---

①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卷五《宗庙》，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359 页。

②《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59 页。

③《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 3115 页。

④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卷五《宗庙》，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357 页。

⑤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卷五《宗庙》，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357 ~ 368 页。

便殿的寝园合称“寝庙园”。庙园四面各辟一门，称司马门，根据门的不同方位，分别置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空心砖和瓦当。庙园的主体建筑是“正殿”，四面与庙园四门相对处各开一门，称“庙门”或“殿门”。正殿四门也是以“四神”图案的建筑材料显示其方位[①]。

西汉诸陵多设有陪葬坑，尤以西汉前期和中期为盛。从大的空间来看，帝陵的陪葬坑可分为陵墓外独立的陪葬坑区、围绕陵墓及封土的陪葬坑和陵墓内的陪葬坑三类，陵墓外独立的陪葬坑区象征着西汉拱卫宫城的苑囿、卫戍部队等，围绕陵墓及封土的陪葬坑象征着宫观百官等机构，陵墓内的陪葬坑象征着宫内侍从及其衙署仪卫等设施。帝陵中的这些陪葬坑，或即文献记载中的“外臧椁”[②]。西汉帝陵陪葬坑中的陪葬品有实用物和明器两种，类型繁多，有车马坑、兵马俑坑、珍禽异兽坑、家畜家禽坑、粮食坑、钱物坑、乐器坑等。武帝时，曾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如淳注曰：“瘗，埋也，埋钱于园陵以送死也。”[③] 元帝即位，贡禹为谏大夫，曾极力批评当时社会上的奢侈浪费，指出：“及（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也随故事，甚可痛也！”[④] 直到元帝竟宁元年（前 33）五月元帝去世后，“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⑤]。帝陵的陪葬品才有所减少。

除帝陵有陪葬坑外，皇后陵及帝陵陪葬墓也有陪葬坑，只是陪葬坑的数量和规模要小得多，而且陪葬坑的建筑结构也有明显的不同，从已发掘的西汉帝陵和其陪葬墓的陪葬坑来看，杜陵两座陪葬坑构筑成木室，而陪葬墓的陪葬坑大多为砖坑或土坑，甚至皇后陵的陪葬坑也是如此[⑥]。

西汉帝陵除康陵外，其余均有陪葬墓。陪葬墓大多分布在帝陵以东，也有的在帝陵以北。

---

①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99 ~ 200 页。

②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04 页。

③《汉书》卷五十九《张安世传》，第 2643 ~ 2644 页。

④《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第 3070 ~ 3071 页。

⑤《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302 页。

⑥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04 页。

分布在帝陵以东的陪葬墓位于东司马道南北两侧，其中尤以南侧的陪葬墓数量较多。西汉帝陵陪葬墓的这种布局颇似皇帝召见文武百官的情景，应该是仿照京师和皇宫。西汉时能够入葬诸帝陵陪葬茔域的均属统治集团内的上层人物，有的是开国元勋、鼎柱之臣，有的是皇亲国戚、妃嫔宫人。西汉帝陵陪葬墓的封土形状受当时帝、后陵封土形状影响比较大，可分为长方覆斗形、覆斗形、圆丘形、山形等形状。长方覆斗形的封土底面和顶面均为长方形，多出现于西汉早期，尤其是长陵陪葬墓中，这种长方覆斗形的封土很多。陪葬墓中采用这种封土形制的多属于夫妻合葬墓，通常在封土南面伸出两条墓道，二者共用一座封土。覆斗形的封土底面和顶面皆为方形，是西汉陪葬墓封土的主要形式，阳陵及其以后陪葬墓的封土基本都采用这种形制。西汉中晚期，圆丘形封土开始流行，渭陵、延陵、义陵的陪葬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形状。圆丘形封土的等级一般要低于覆土形封土，规模也较小。



图 4　汉阳陵封土东侧 K11 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汉书》云：高祖十年（前 197）“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万年”，颜师古注引《三辅黄图》曰：“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①] 万年邑的设置开创了西汉因陵设县的先河，是继承了秦始皇陵设邑的先例。自高祖长陵开始，遂正式确立了陵邑制度。《汉书·地理志》载：“长陵，高帝置。”此后直至元帝永光四年（前 40）因各地灾害频仍，社会矛盾加剧，汉元帝下令废除为帝陵置邑徙民的做法。此年十月，元帝“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诏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陵园，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

①《汉书》卷一下《高帝纪》，第 67 ~ 68 页。

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又罢先后父母奉邑。”①

但其子成帝时又有反复，在其二次营建的昌陵附近设立昌陵邑，后因最终放弃昌陵，昌陵邑也成昙花一现。所以自高祖为其父太上皇置万年邑，至宣帝置杜陵邑和奉明县，西汉共置陵邑11座，分别是高祖长陵邑、惠帝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宣帝杜陵邑，以及太上皇万年邑、高祖薄姬南陵邑、武帝钩弋夫人云陵邑和宣帝父母奉明县。



图5　形制独特的安陵邑西北城角　（摄影：郑茂良）

西汉设置陵邑，直接原因是为了供奉陵园，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迁徙关东大族、达官巨富，消除不安定因素，巩固中央统治，繁荣陵邑附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汉书·地理志》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也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②武帝时，主父偃也曾建议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③得到武帝的采纳，于元朔二年（前127）夏“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于茂陵”④。此外，

①《汉书》卷九《元帝纪》，第292页。

②《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1642页。

③《汉书》卷六十四上《主父偃传》，第2802页。

④《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0页。

陵邑的设置还有突出执政皇帝权威的作用。执政皇帝的陵邑是当时朝廷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云集的地方，随着皇帝的更替，权贵和名流纷纷迁居到新皇帝的陵邑，无疑有助于强化皇帝本人至高无上的权威[①]。

帝陵的修筑营造主要由将作大匠和少府分工负责。《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将作少府，秦官，掌治宫室，有两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将作大匠。属官有石库、东园主章、左右前后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长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东园主章为木工。成帝阳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后中校五丞。"[②]实际上将作大匠的职能不只是"掌治宫室"，帝陵的修筑也是其重要职责，《汉旧仪》即载"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③]。

帝陵陵园、寝园、庙园皆设有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其长官分别称园令、寝园令、庙园令。《关中记》载：汉诸陵"守陵、溉树、埽除凡五千人，陵令、食官令各一人，寝、庙令各一人，园令一人，门吏三十二人，候四人"[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陵令、食官令、寝令、庙令、园令等皆为太常属官，由太常管理。陵令或即陵园令，而非陵邑令。食官令的职责是"给陵上祭祀之事"，史载冯参曾"以王舅出补渭陵食官令"[⑤]，传世铜印中有"渭陵食官令印"[⑥]。寝园令简称寝令，负责寝园里的日常工作，韦贤长子韦方山曾为"高寝令"[⑦]，传世铜印中有"高寝郎印""高寝令印"[⑧]。庙园令也简称庙令，其职责是"守庙，掌案行扫除"[⑨]，传世有"孝文庙令"封泥。"园令"当即"陵园令"的简称，汉代帝、后陵园一般称"园"。园令的职责

①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26 页。

②《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33 页。

③《后汉书》志第六《礼仪志下》刘昭注补引，第 3144 页。

④ 刘庆柱：《关中记辑注》七"汉陵"条，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119 页。

⑤《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第 3306 ~ 3307 页。

⑥ 汪启淑：《汉铜印原》，西泠印社，1996 年，第 31 页。

⑦《汉书》卷七十三《韦贤传》，第 3107 页。

⑧ 汪启淑：《汉铜印原》，西泠印社，1996 年，第 31 页。

⑨《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第 3573 页。

是“掌守陵园，案行扫除”[①]，司马相如曾拜为“孝文园令”[②]，汉代封泥中有“孝昭园令印”“孝昌园令”。令之下，又各设佐贰官，如“丞”“校长”等，分工负责具体事务[③]。

为了实施国家大遗址保护，西汉帝陵于2006年9月开始了新的考古勘探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汉陵考古队，展开了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与试掘工作。采取“全方位调查、大面积普探、重点地区详探、关键部位试掘、高精度测绘及资料数据化”的工作思路，田野工作与资料整理齐头并进，取得了较大成果。截至目前，已先后完成汉武帝茂陵、“周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惠帝安陵、汉哀帝义陵等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以及茂陵1号建筑遗址和15、26号外藏坑的发掘工作的。调查区域近100平方公里，普探面积逾2200万平方米。

①《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第3574页。

②《汉书》卷五十七下《司马相如传下》，第2592页。

③《后汉书》志第二十五《百官二》，第3573～3574页。

第一节　汉高祖刘邦长陵

一、墓主生平

高祖刘邦（前 256 ~ 前 195），沛郡丰邑（今江苏省丰县）人。原名刘季，称帝后改名刘邦。曾任泗水亭长，秦末农民起义中，他率兵攻克沛城，始称“沛公”。前 206 年，刘邦率军攻入秦都咸阳，亡秦。在废除秦朝苛法的同时，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以此得到京畿地区人民的积极拥护。鸿门宴之后，刘邦考量了他与项羽悬殊的军事力量，为保存实力，接受项羽的分封，在巴蜀和汉中地区称“汉王”。此后，刘邦积极蓄积力量，开始了与项羽长达 5 年的楚汉相争。

前 202 年，刘邦打败项羽，即位于汜水之阳的定陶（今山东省定陶县），建立汉王朝。后接受娄敬和张良的建议，迁都关中，定都长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令齐、楚、燕、



图 6　汉高祖刘邦长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赵等国的贵族和关东 10 余万豪杰落户关中，又先后平定了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的叛乱，还制定了《九章律》。为平复战后国家的疮痍，高祖任用萧何、曹参为相，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这些举措，为西汉王朝日后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前 195 年，汉高祖病逝于长乐宫，葬长陵。

高祖皇后吕雉（前 241 ~前 180），字娥姁，祖籍单父（今山东省单县），后迁居沛县。吕后“为人刚毅”，辅佐高祖平定天下，汉初诛杀异姓诸侯王多赖吕后为之。刘邦去世，惠帝即位，尊吕后为太后，朝廷实权为吕后所控制。惠帝逝世后，吕后临朝称制，封吕姓亲属 4 人为王、6 人为列侯，为以后宫廷政变埋下了祸根。吕后当政时期，顺应民众久历战乱、亟待休整的需要，推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使得“民务稼穑，衣食滋繁”[①]。前 180 年，吕后逝于未央宫，与高祖合葬于长陵。

二、营建始末

长陵又称“长山”或称“长陵山”，是汉高祖刘邦和吕后的合葬墓。西汉继承并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厚葬习俗，皇帝的陵墓尤为突出。长陵在刘邦即位后第 5 年开始修筑[②]，其设计和主持施工者很可能是萧何，他在汉王七年（前 200）设计营造未央宫[③]。《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记载：阳成延“以军匠从（刘邦）起郏。”说明阳成延跟随刘邦起义前就是一名专业技术人员。阳成延后来连续主持长乐和未央两座皇宫以及长安城墙的修建工程，并因此而封梧侯，由此推断，阳成延应该也主持了长陵和安陵的营建。

前 195 年，汉高祖刘邦病逝，葬于长陵[④]。前 180 年，吕后逝世，与高祖合葬长陵，不合陵[⑤]。长陵位于今咸阳市秦都区窑店乡三义村附近[⑥]，陵墓附近曾经出土过西汉瓦当“长陵东

---

①《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 412 页。

②《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 1545 页。

③“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汉书》卷一《高帝本纪》，第 64 页。

④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高祖长陵在渭水北，去长安城三十五里。”三秦出版社，1995 年，第 348 页。

⑤“高后崩，合葬长陵”。《集解》引《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汉帝后同茔，则为合葬，不合陵也。诸陵皆如此。”《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 1970 页。

⑥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5 页。



图 7　汉长陵附近出土的“长陵东当”和“长陵西当”　　（编写组供稿）

当”“长陵西当”和“长陵西神”[①]。

长陵内两座陵墓东西并列，清代毕沅以为，东边陵墓为高祖陵，西边陵墓为吕后陵，但两座陵墓的名实辨正在史学界仍有较大的争议[②]。二封土南北相错，东西间距 240 米，南北间距 60 米。汉代的帝陵都没有做过考古发掘，墓室的结构尚不清楚，根据已发掘的北京大葆台西汉燕王墓的形制来看[③]，考古专家推测西汉帝陵可能是大型的木椁墓，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之制[④]。

① （清）程敦撰：《秦汉瓦当文字》卷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年，第 32 页。

② 岳起，刘卫鹏：《由平陵建制谈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5 期，文章根据东边的陵墓封土周围陪葬坑比较密集，而西边的陵墓周围几乎未发现陪葬坑；东边陵墓的东墓道正对陵园的东门阙，西边陵墓的东墓道没有正对东门阙；以及《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末年，赤眉军进入长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说明吕后陵是遭到了较大的破坏，现今长陵西边的一座封土东面塌陷很深，而东面的封土相对保持较好。根据这些分析，该文章作者倾向于东边的是高祖陵，西边的是吕后陵。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观点相反。主要根据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集解》引《关中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970 页。《三辅黄图校注》：“吕后陵，在高祖陵东”，第 350 页。

③ 北京市古墓发掘办公室：《大葆台西汉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6 期，第 23 页。

④《后汉书·礼仪志》下刘昭注引《汉旧议》所载前汉诸帝寿陵，有“内梓棺柏黄肠题凑”。《汉书·张释之传》记文帝曾对群臣说：“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故也可能用石椁。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汉以后流行砖室墓，而黄肠题凑也改用方石，《后汉书·礼仪志》下记大丧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河北定县发掘的东汉中山简王焉墓的黄肠石即是一例。

在对陵墓封土四周钻探后得知，长陵东西两座陵墓的东、南、北面均有一条墓道，而西面则皆未有发现。东边陵墓的东墓道宽 13 ~ 56 米、东西长 150 米；南墓道位于封土中部偏西，宽 12 ~ 23 米、长 96 米；北墓道位于封土北部偏东，宽 12 ~ 27 米、长 58 米。西边陵墓的东墓道宽 13 ~ 69 米，长 170 米，其墓道西端接近封土的位置有宽 54 米、长 144 米的活土带，不知是构筑于地下的宫城还是破坏的孑遗。北墓道和南墓道皆位于封土的东北、东南角，对称分布，北墓道宽 16 ~ 34 米、长 32 米，南墓道宽 14 ~ 40 米、长 28 米。

长陵陵区分布着众多的陪葬墓，陪葬区的范围大致是，西起窑店镇的三义村和韩家湾镇的怡魏村，东至红旗镇的九张村和泾阳县境内的高庄村，东西约 5 公里，南北约 2 公里。1970 年调查时地表之上还保存有 70 多个封土，现在地表之上保存封土 40 多座。陪葬长陵的大多都是当时的达官显贵、开国元勋、后妃及其家族和关东大族，萧何、曹参等以开国元勋之故陪葬长陵。萧何生前功绩卓著，死后葬于长陵陪葬区中最显要的位置长陵东司马门道北侧，西邻长陵。曹参也是西汉王朝勋臣，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死后葬在“在长陵旁道北，近萧何冢”。

陪葬墓之外，长陵邑也是高祖长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徙郡国民以奉园陵”[①]为目的。长陵邑设于高祖十二年（前 195）[②]，但是城垣迟至前 182 年才开始修建。汉时盛行的卜择吉



图 8　位于东史村南侧的“双冢”，传说为萧何夫妻墓　（摄影：郑茂良）

①《汉书》卷九《元帝纪》，第 292 页。

②《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 1127 页。

地的风气[①]，影响了长陵及陵邑的选址。长陵邑所在的咸阳原地势一平如砥，居高临下，南滨渭河，北靠北山，遥望终南，是一块“累世隆兴”的宝地。

长陵邑位于长陵陵园北部的怡魏村、彭王村和马家堡一带。长陵邑的兴建除继承了“奉山园”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强干弱枝的考虑。徙民实邑既有助于西北地区的稳定，也有利于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汉初经济不景气也是设置长陵邑的原因之一。西汉初，长年征战，百业凋零，甚至陷入“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②]的窘境。关东贵族和豪杰徙入陵邑、增殖人口的同时，还改变了京师民生凋敝的状况。长陵邑之内分布有官署、市场和里居等，具体的分布状况现在还不清楚，需要今后进一步发掘研究。

三、陵园变迁

《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西汉末年，赤眉起义军进入长安，长陵的墓地，尤以吕后陵遭受的破坏较为巨大，“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③]。

《南史·宋本纪》：南朝宋武帝拜谒长陵，“谒汉长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④]。

《隋书·礼仪志》：“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以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⑤]

《旧唐书·礼仪志》：“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⑥]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对西汉诸陵进行了实地考察，成果集结于《长安史迹研究》一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针对西汉诸陵的保护和调查工作逐渐展开。1965 年，当时的咸阳红旗公社社员在整理梯田时，在杨家湾的北原上发现了一批彩绘陶俑，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协同咸阳市博物馆对其作了清理和保护，发掘从葬坑 11 个，出土陶俑近 3000 件。20 世

① 刘伟：《西汉陵寝概谈》，《中原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②《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 1127 页。

③《后汉书》卷十一《刘盆子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483 页。

④（唐）李延寿撰：《南史·宋本纪》卷一《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0 页。

⑤（唐）魏征撰：《隋书》卷七《礼仪二》，中华书局，1973 年，第 137 页。

⑥（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中华书局，1975 年，第 915 页。



图 9　发掘后的杨家湾汉墓墓室　（摄影：郑茂良）

纪 70 ~ 80 年代，针对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全面展开。1970 年 11 月至 1976 年 11 月，由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和咸阳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杨家湾汉墓进行了发掘。

1982 年，孙德润等人对长陵作了实地勘察。2001 年 7 月 ~ 2005 年 10 月，受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的委托，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咸阳原上的西汉陵墓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勘察，为长陵等西汉帝陵的保护范围的划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2004 ~ 2005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两次运用了 GPS 测量技术对长陵、阳陵两座帝陵的地面现存遗迹以及地下遗迹进行了测量。

研究成果：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 年第 3 期。

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方炉的发现》，《文物》，1973 年第 5 期。

陕西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展力、周世曲：《试探杨家湾汉墓骑兵俑——对西汉前期骑兵问题的探讨》，《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 年第 2 期。

王人聪：《论咸阳出土“皇后之玺”的年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五卷，1984 年。

孙德润：《汉长陵陪葬墓又发现陶马》，《考古与文物》，1987 年第 5 期。

［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

焦南峰等：《西汉长陵、阳陵 GPS 测量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6 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

五、遗迹和遗物

根据《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可知，长陵陵园呈长方形，陵园西墙长 944 米，东墙长 943 米，南墙长 829 米，北墙长 842 米。墙基宽 9 米，个别地方如拐角处宽达 14 米。四面均有夯筑垣墙，西墙、北墙还存有一些残垣，最高处可达两米，南墙、东墙没有地面遗存。垣墙四面均有门，东、西、北四面皆发现一门，南面发现两门。东门位于东墙南部正对东部封土的位置，门阙宽 34、门道宽 22 米；西门位于西墙中部，正对西部封土，门阙宽 26 米、门道宽 14 米；北墙位于北墙西部，正对西部封土，门阙宽 27 米。南门有二，一位于南墙西部，门址距西墙 210 米，门阙宽 20 米、门道宽 12 米，此门同北门南北正对；另一位于南墙中部，距东墙 290 米，正对东部封土，门阙宽 34 米、门道宽 22 米。陵园西墙距离高祖陵 80 米，北墙与高祖陵和吕后陵分别是 400 米和 650 米，南墙与高祖陵和吕后陵分别相距 350 米和 80 米，东墙距离吕后陵 180 米。陵园墙垣的宽度为北墙 15 米，其余三面均为 7 ~ 9 米。

陵园中部偏南东西排列着两座封土，西侧为帝陵封土，后陵封土位于东侧。二者南北相错，东西间距 240 米、南北间距 60 米。封土均为顶小底大的四棱台形，顶部与底部平面为东西向长方形，顶部中间略向上鼓出。两座封土东侧向下凹陷，尤以西部封土较为明显，可能是墓道内的木结构腐朽后塌陷所形成。经测量计算得知，长陵封土底部各边长分别为：东边的封土底边东西长 164 ~ 166 米、南北宽 132 ~ 134 米，高 24.6 米，距离南墙 160 米，距离北墙 660 米，位置偏南。西边的封土东西长 162 ~ 164 米、宽 134 米，高 24.5 米，距离南墙 360 米，距离北



图 10　站在长陵帝陵封土上东望后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墙 455 米。

陵园内共发现建筑遗址 4 处，分布于陵园的东南、西南角，东北和西北部，推测应属于防御性建筑。Ⅰ号遗址位于东南角，东西长 112 米、南北宽 70 米，距离东墙 30 米，其中发现砖瓦、夯土、瓦当残块及五角形下水道残块。东北部的Ⅱ号遗址东西宽 160、南北长 178 米，钻探发现多处曲折的夯土墙、红烧土块、砖瓦残块及瓦当残片等。西北部的Ⅲ号遗址东西长 194 ~ 203 米、南北宽 156 ~ 173 米，其中发现有夯墙、砖瓦残块、云纹瓦当等。Ⅱ号、Ⅲ号遗址东西间距 270 ~ 300 米。位于陵园西南角的Ⅳ号遗址东西长 179、南北宽 180 米，在此发现砖瓦、夯土等，该遗址的西南部已被汉陵村破坏。另外，陵园南墙外也发现有建筑遗址的痕迹，但大多被破坏，残存无几。

长陵陪葬墓基本位于长陵东部的徐家寨至费家新庄一带，南至高干渠附近，东到费家新庄的东部，北到泾阳费家新庄西北的台地边缘，西到西史村与东史村之间。尤其以徐家寨至费家新庄之间分布最为密集。长陵陪葬墓多为南北方阵排列，成组分布。每一组墓内的墓冢大多并列成对。前者属于“族墓”，后者则为“同茔不同穴”的夫妻合葬墓。现在长陵以东分布的墓冢，并不一定都是陪葬墓，祖居长陵的豪杰巨富，死后也葬于此。如孝宣王皇后，“其先高祖

时有功赐爵关内侯，自沛徙长陵”[①]。其本族王林卿的家族墓地就在长陵。

表一　长陵陪葬墓统计表[②]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单位：米）			备注
			位置	长度	宽度	
1	东史村南60米	覆斗形。底边27米×30米、顶边12米×12米。高14米	东部	82	2～10	据说是萧何夫妻墓。封土前树立一块石碑，上有“双冢”二字
2	1号墓南30米	覆斗形。底边32米×29米、顶边12米×12米。高15米	东部	92	2.5～17	
3	高干渠北100米处	覆斗形。底边37米×50米、顶边15米×8米。高15米	南部偏东	60	2～21	据说是曹参墓
7	东史村东150米	覆斗形。底边18米×9米、顶边6米×5米。高4米	东部	35	2～10	—
8	东史村东	覆斗形。底边34米×18米、顶边16米×7米。高5～7米	东部	60	2～15	—
6	东史村东南	覆斗形。底边15米×10米、顶边8米×4米。高5米	东部	30	3～10	—
4	高干渠北10～50米处	封土残存四分之一，长20米、宽15米、高4米	南	100	—	习称“杨家湾汉墓”，可能是周勃夫妻或周亚夫夫妻的墓葬
5	4号墓北26米处	覆斗形。底面积400多平方米	北	82	—	—
9	高干渠南240米、杨家湾北	三连封土相连。底边100米×30米。高10米	南部	80	2～11	仅有一条墓道
10	徐家寨村南200米处	覆斗形。底边14米×33米，顶边6×20米。高6米	南部	20	3～10	—
11	徐家寨村南300米处	覆斗形。底边20米×27米、顶边8×18米。残高7米	东部	45	2～27	—
12	徐家寨村南、高干渠北80米	覆斗形。底边45米×46米、顶边11×11米。高9米	东部	49	2～13	—
13	徐家寨村东南500米	覆斗形。底边22米×24米、顶边16×16米。残高4米	北部	30	2～10	—
14	徐家寨村东南600米	覆斗形。底边55米×18米。残高5米	南部	50～60	2～12	有两条墓道，相互平行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3969页。

②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5～17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单位：米）			备注
			位置	长度	宽度	
15	14 号墓北 120 米处	覆斗形。底边 34 米 ×43 米、顶边 8×24 米。高 6 米	南部	33	5	—
16	15 号墓北 200 余米处	覆斗形。底边 22 米 ×24 米、顶边 15×40 米。高 4 米	南部	32	28	—
17	16 号墓北 20 米	覆斗形。底边 25 米 ×35 米、顶边 6×19 米。高 6 米	南部	30	4 ~ 16	—
18	17 号墓北 300 米处	长方形覆斗。底边 37 米 ×18 米、顶边 28×10 米。高 4 米	南部	32 ~ 33	2 ~ 19	有两条墓道，相互平行
19	18 号墓北 150 米处	长方形覆斗。底边 40 米 ×20 米、顶边 28×9 米。高 5 米	南部	34 ~ 35	2．5 ~ 13	有两条墓道，相互平行
20	19 号墓北 92 米处	长方形覆斗。底边 48 米 ×23 米、顶边 29×11 米。残高 5 米	南部	28 ~ 29	2 ~ 11	有两条墓道，相互平行
21	15 号墓东 120 米处	覆斗形。底边 18 米 ×18 米、顶边 7×7 米。高 5 米	北部	40	2 ~ 12	—
22	21 号墓北 60 米	长方形覆斗。底边 54 米 ×29 米、顶边 29×4 米。高 10 米	东部	33	2 ~ 12	—
23	22 号墓北 60 米	覆斗形。底边 24 米 ×17 米、顶边 17×10 米。高 4 米	东部	50	2 ~ 11	墓道偏北
24	23 号墓北 100 米	覆斗形。底边 40 米 ×20 米、顶边 7×5 米。高 6 米	南部	50	3 ~ 11	—
25	24 号墓北 120 米	覆斗形。底边 35 米 ×20 米、顶边 5 米 ×7 米。高 4 米	东部	35	3 ~ 19	—
26	25 号墓北 100 米	覆斗形。底边 50 米 ×31 米、顶边 33 米 ×13 米。高 6 米	南部	33 35	2 ~ 10 2 ~ 12	有两条墓道，相互平行
27	26 号墓北 50 米	封土已被平	南部	33	3 ~ 16	墓室上口 10×5 米
28	27 号墓北 56 米	覆斗形。底边 35 米 ×14 米、顶边 23 米 ×7 米。高 4 米	南部	36	2 ~ 14	—
29	费家新庄西南 100 米	覆斗形。底边 60 米 ×31 米、顶边 20 米 ×11 米。高 9 米	北部	40	3 ~ 13	—
30	39 号墓北 50 米	覆斗形。底边 34 米 ×20 米、顶边 18 米 ×10 米	东部	38	2 ~ 12	—
31	30 号墓北 120 米	覆斗形。底边 30 米 ×20 米、顶边 20 米 ×9 米。高 4 米	南部	46	3 ~ 12	—
32	31 号墓北 200 米	已平。底部残长 11 米 ×10 米	南部	26	3 ~ 10	—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单位：米）			备注
			位置	长度	宽度	
33	32 号墓北 90 米	覆斗形。底边 30 米 ×21 米、顶边 20 米 ×13 米。高 6 米	北部	40	2 ~ 13	—
34	29 号墓东 130 米	覆斗形。底边 44 米 ×16 米、顶边 30 米 ×10 米。高 3 米	南部	25	3 ~ 10	—
35	34 号墓北 260 米	已破坏。底边 12 米 ×12 米、顶边 3 米 ×4 米	东部	31	2 ~ 9	—
36	费家新庄西南 230 米	覆斗形。底边 41 米 ×32 米、顶边 21 米 ×12 米。高 5 米	东部	36	3 ~ 14	—
37	36 号墓北 110 米	覆斗形。底边 44 米 ×23 米、顶边 22 米 ×10 米。高 6 米	东部	28	2 ~ 12	—
38	费家新庄西南 400 米	已破坏，不详。残高 4 米	东部	20	2 ~ 10	—
39	38 号墓北 200 米	覆斗形。底边 34 米 ×24 米、顶边 24 米 ×12 米。高 5 米	东部	32	2 ~ 12	—

此外，考古人员在长陵的陪葬墓区采集的“齐一宫当”“齐园宫当”“齐园”3 种瓦当，为过去著录所未见，是长陵陪葬区出土仅有的文字瓦当。“齐一宫当”，瓦面直径 16 厘米，“齐园宫当”，瓦面直径 15 厘米，二瓦文字均沿外弧为弧形，沿双分线为平直，从文字上看，属小篆与隶书之间。“齐园”瓦当，瓦面直径 16.5 厘米，“齐”字点下横笔，顺弦纹弧度下垂，几乎将“园”字包括进去，“园”字最末一笔平划，也沿弦纹有弧度。“齐一宫当”在周氏曲东，成国故渠北，即今徐塘村原头“三连冢”（传说为“三母冢”）北一大冢附近采集。“齐园宫当”和“齐园”在今高干渠北岸，杨家湾汉墓东，徐家寨子南一大冢采集。考古人员认为，它们的出土证实了在长陵陪葬区有史书未记载的“齐园”寝园建筑[①]。

陪葬墓之外，还有大量陪葬坑的存在。经过在陵园内大面积的普探和重点钻探，共发现陪葬坑 33 个。陪葬坑基本围绕东边一座陵墓的封土分布，其东北部是陪葬坑分布的密集区，有 20 多座，坑均为东西向，南北平行排列，平面基本呈长方形，宽 4 ~ 7 米、长 20 ~ 40 米，地面盗洞遍布，陶马和陶俑的残块偶有发现，皆是现代盗墓贼所为。东墓道的南北各有一条长

① 王丕忠，李光军：《从长陵新出土的瓦当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人文杂志》，1980 年第 1 期。

110 米、宽 6 ~ 7 米的陪葬坑，坑内均发现兽类骨骼。封土南部偏东位置有两条长 60 米的陪葬坑，北端深入封土下，坑内发现兽骨、漆皮等。另外，在封土东南西南部发现几个陪葬坑，坑内发现漆皮及陶器残块。



图 11　杨家湾汉墓出土的兵马俑　（摄影：郑茂良）

在长陵杨家湾汉墓陪葬坑中，发现埋藏兵马俑的竖穴土洞式陪葬坑，7 座一穴一洞，3 座一穴二洞，形成 13 个方阵，东西相对，排成两列。共清理出土兵俑 1965 件，骑马俑 583 件，盾版模型 410 件，号称“三千人马”。从俑坑地望分析，这些遗物应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的杨家湾汉墓的陪葬品。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大规模兵马俑群，它塑造了我国西汉皇家卫队的形象。骑兵组成 6 个方队，有甲骑和轻骑两类。甲骑的骑士和马匹都较高大，通高 68 厘米，骑士多数身穿铠甲手执戟；轻骑的骑士和马匹都较矮小，通高 50 厘米，不披铠甲，手执弓弩背负箭囊。步兵组成了 7 个方队，有队率、队史、千卒、乐卒、蹶张士、戟矛手等不同职能的将士，他们的服饰、姿势、神态各不相同。庞大的军阵现存咸阳市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

西汉帝陵陪葬制度自长陵陪葬墓的格局确立后，其后的诸陵均以此为制。或有细微的改变，但不影响整体格局[①]。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长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8 年 1 月，长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长陵文管所。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陵冢；一般保护区为整个

① 曹龙：《西汉帝陵陪葬制度初探》，《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5 期。

陵园范围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200 米。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其保护范围为：东至孙家屹崂村，西至怡魏村，北至彭王村北 400 米，南至高干渠，东西 2300 米，南北 313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

2017 年 4 月，国家文物局批准了陕西省文物局《关于长陵博物馆项目选址涉及秦咸阳城遗址和长陵建设控制地带选址》的批复，长陵博物馆开建。长陵博物馆位于秦汉新城境内汉高祖刘邦长陵陵园以东，占地约 106 亩，建筑面积约 6700 平方米，博物馆总投资约 1 亿元，由建筑设计大师崔愷院士主持设计，设计理念遵循汉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功能设计集文物保护、展示、科教、文创产品开发为一体，系统地保护展示刘邦及长陵历史遗迹，是一座功能完善、技术先进的现代化科技博物馆。根据不同功能划分、建筑空间分为公众区域、业务区域和行政区域。公共区域建筑包括展陈区、影视报告厅等，业务区域建筑包括文物库房、文物登记室、研究室等，行政区域建筑包括办公室、会议室、附属用房等。

第二节　汉惠帝刘盈安陵

一、墓主生平

惠帝刘盈系高祖与吕后之子，生于前 210 年，虽幼于齐悼惠王刘肥，但因嫡长子之故，于汉王二年（前 205）立为王太子。楚汉之争结束后，刘邦即帝位于汜水之阳，尊王后吕雉为皇后，王太子刘盈为皇太子。前 195 年，高祖逝世，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

惠帝在位期间，实施仁政，和亲匈奴，稳定边境形势；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减轻赋税，“复十五税一”[①]“弛商贾之律”[②]以繁荣工商业；提拔曹参为丞相，仍旧沿用萧何时抚民以静的主张；修筑长安城城墙，继高祖建立长安大市（即东市）以后，于前 189 年修筑西市，完成了长安城的主要商业市场的建设。并将皇宫从长乐宫移至未央宫，由此终西汉一代，未央宫成为天子皇宫。惠帝时，长安城的大体格局基本确定下来。



图 12　由东北向西南方向拍摄的汉安陵帝陵、后陵封土

①《汉书》卷二《惠帝纪》，第 85 页。

②《史记》卷三十《平淮书》，第 1418 页。

惠帝仁弱[①]，在位期间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吕后手里，司马迁作《史记》时甚至不设惠帝本纪，惠帝的事迹只在《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吕太后本纪》中提及。他目睹其母吕后将戚夫人弄成“人彘”[②]的事实，因此患病，积年不愈。前188年八月戊寅，逝于未央宫，谥孝惠皇帝，九月辛丑，葬安陵。

惠帝的皇后张嫣，是刘盈的姐姐鲁元公主和张敖之女。刘盈与张嫣是甥舅成婚，这大概还是原始社会婚姻习惯的孑遗。对这门亲事，吕后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惠帝死后，吕后临朝，诸吕掌握汉朝大权。吕后死后，诸吕被翦灭，孝惠张太后也被牵连，“废处北宫”，前163年，孝惠张皇后去世，合葬安陵。

二、营建始末

安陵位于咸阳市秦都区韩家湾乡白庙村。陵园内东西两座封土，其中东南部一座高大雄伟的是惠帝刘盈的安陵，中部偏西的一座低矮较小，为孝惠张皇后陵。

两座陵墓全为夯土堆积而成。钻探发现，安陵周围5～7米深的部分全部为夯土堆积。其东部、北部封土外未发现墓道，南部、西部封土外各发现墓道一条。南墓道位于南边偏东位置，南端宽18米，北端宽49米，长108米。墓道内填土为红褐色的五花夯土。西墓道位于西边偏南位置，西端宽8米，东端宽32米，长60米，墓道填土为较黑的五花夯土。孝惠皇后墓在安陵西北260米处，其封土南边同安陵封土基本位于一条水平线上，封土南部、北部均未发现墓道，东部、西部各发现一条墓道。张皇后陵周围钻探至5米以下发现生土。南部、北部封土外面未发现墓道，东部、西部各发现一条墓道，填土均为黄褐色的五花夯土。东墓道位于东边中部位置，东端宽10米，西端宽25米，长28米。

安陵陵区的陪葬墓，现存封土者均在安陵以东，主要分布在咸阳市秦都区窑店镇和韩家湾乡白庙村一带。地面上现仍保存十几座墓冢，封土大多为圆锥形，基本呈东西一线分布。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两种资料，鲁元公主、陈平、张苍、爰盎、杨雄等人死后均陪葬安陵。鲁元公主是高祖长女，其女张嫣又为惠帝皇后，逝世后陪葬安陵。墓地封土位于安陵以东900

①《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395页。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397页。

米，形制小于帝陵，但远大于一般陪葬墓。赵王张敖，鲁元公主之夫，也陪葬安陵，墓冢在鲁元公主墓东 60 米，规格远小于鲁元公主墓。张苍，擅长律例，对西汉时代典章制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死后也陪葬安陵。



图 13　鲁元公主墓，封土东北角依旧树立着“赵王如意陵”的文保碑（摄影：郑茂良）

安陵邑也是惠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惠帝置，位于陵园北部，平面略呈“凸”字形。与长陵不同，安陵邑中的关东徙民多来自楚国，而非齐地，文献记载中的安陵爰氏、籍氏、闳氏、班氏等，均系楚人。在这些迁徙的楚人中，很少有昭氏、屈氏和景氏等楚国大姓，不少人出身寒微，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跻身于汉代统治阶级之列，并成了朝廷显赫人物。爰盎之父为楚国人，属于当地豪杰，后被迁到安陵。吕后当政时，他从政于吕禄门下。文帝即位后，因直言敢谏而“名重朝廷”，先后任郎中和中郎将。此外像出身平民的籍孺、闳孺曾为高祖和惠帝的佞信宠臣，“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以致他们的服饰都为朝官所仿效。

三、陵园变迁

《汉书》卷九十九下《王莽传》：更始三年夏，赤眉军攻入长安，“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①]。

《后汉书·五行志》：延熹八年“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②]。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惠帝安陵在长陵之东，其西临景帝阳陵，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

①《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4193 页。

②《后汉书》志第十四《五行二》，第 3296 页。

张家湾村。陵墓南面现在还保存着清代毕沅书写的“汉惠帝安陵”的碑石。刘庆柱根据考古调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认为西汉帝王陵墓的分布，实行昭穆制度，昭位居左，穆位在右。惠帝为穆，景帝为昭，惠帝安陵应在长陵之右（西），景帝阳陵应在长陵之左（东）。安陵不应在长陵之东，真正的安陵应在长陵之西。《水经注》卷八记载：成国故渠“东迳惠帝安陵南，……又东迳渭城北，……又东迳长陵南”。渭城即秦咸阳城，汉武帝时更名。秦咸阳城遗址中心地区在今咸阳市秦都区窑店镇。窑店镇西北的白庙村适有一座大墓，应为惠帝安陵。此墓南邻的聂家沟村考古发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的“四皓庙碑”。这就是说，唐代的四皓庙故址就在此地。宋代的文献记载，安陵附近有四皓庙[①]，进一步证明了白庙村的大墓应为安陵。

2002 年 3 月 6 日至 5 月 9 日，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陵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调查，对安陵和张皇后陵的陵园、封土及墓道、陪葬坑以及建筑遗址都进行了深入的考古调查，并采集了日用陶器、瓦当等标本。

研究成果：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7 页。

张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 年，第 29 页。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安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4 期

孙铁山：《关于西汉安陵的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4 期

咸阳市博物馆：《汉安陵的勘查及其陪葬墓中的彩绘陶俑》，《考古》，1981 年第 5 期

段清波：《关于神禾原大墓墓主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009 年第 4 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

五、遗迹和遗物

汉惠帝刘盈同孝惠张皇后合葬于一个陵园。陵园呈东西略长的长方形，四面均有夯筑围墙，现地面无保存，基本被农田所覆盖。原墙西南角分别有 66 米和 44 米长的一段，现也被毁无存。

①《长安志》卷十三：“四皓庙在县（咸阳）东二十五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9 年，第 316 页。

南墙外中部发现不少绳纹板瓦、筒瓦残片。原墙东墙长 845 米，西墙长 852 米，南墙长 950 米，北墙长 932 米，墙宽 6 ～ 10 米。

陵园四面各辟一门。东门位于东墙中部偏北位置，距离北墙 304 米、距离南墙 511 米，门宽 19 米。在距离地表 1 ～ 1.2 米的位置，探孔内发现有路土、瓦片、砖块等。顺东墙有 8 米宽的路土往北延伸，可能为绕陵路。南门位于南墙中部偏东，基本正对着安陵封土中部，距离东墙 317 米、距离西墙 584 米，门宽 48 米。在南门附近发现大量绳纹板瓦、筒瓦残片和数块青石。西门位于西墙南部，距离南墙 220 米，门宽 24 米。北门位于北墙中部偏东，同陵园南门基本正对，距离东墙 350 米，门宽 38 米。在门址附近发现大量绳纹瓦片、砖块及瓦当残块、陶片等。其中的路土直通陵园和陵邑。

陵园内东西并列两座封土，西汉帝陵一直有帝西后东之说，可安陵例外，孝惠皇后张嫣陵墓在惠帝安陵西北。为什么皇后张嫣之陵不在安陵之东呢？孙铁山先生认为原因有三：其一，孝惠皇后张嫣系鲁元公主之女，吕后外孙女，诸吕被翦后，张皇后受其牵连被迫退居北宫，皇后之名虽未被废，死后也合葬安陵，但不起坟丘，可知并未完全按照皇后礼制给以安葬。其二，张嫣死前，惠帝早已安葬，整个安陵的布局早已定位，惠帝的陵墓距陵园东墙仅有 287 米。间距太小，东墓道是安陵主墓道，不可能将皇后陵埋在皇帝陵墓道上。皇帝与皇后共用一个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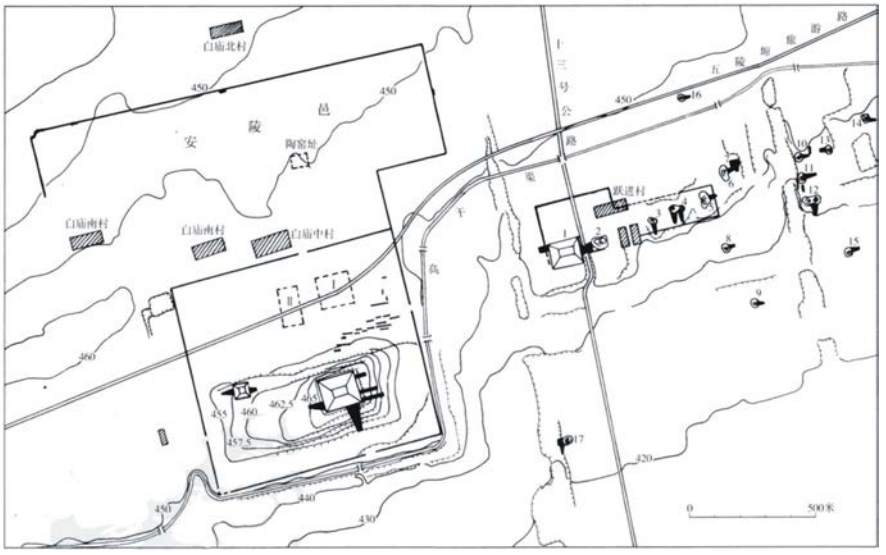


图 14　安陵陵园钻探平面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陵园与陵邑共用一墙（陵园北墙也为陵邑南墙）。陵园位置恰在陵邑南部正中，如将张嫣陵墓改在惠帝陵东，不在东墓道上，就出陵园范围，这就破坏了安陵的原有布局。其三，安陵东是安陵的陪葬墓区，离其最近也是最大的陪葬墓是鲁元公主墓。张嫣是皇后，应在陵园内而不应在陵园外，更不能在陪葬区内，加之鲁元公主为皇后张嫣之母，已先入陪葬区占据最近位置，因此皇后张嫣只有埋在帝陵之西才是合理的，陵园内西边空地较大。这样的位置也可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①]。



图 15　封土低矮的孝惠张皇后陵　（摄影：郑茂良）

安陵封土保存较好，四面及顶部无塌陷迹象，仅西面南边的中部略有下凹，底部西边有一部分被取土挖掉。封土所在位置较高，东、西两面为平缓的坡地，南、北两面为梯级断崖。封土距离东墙 270 米、距离南墙 200 米、距离西墙 480 米、距离北墙 492 米。现存封土底边呈长方形，东边长 142 米、西边长 139 米、南边长 167 米、北边长 163 米。封土顶部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60 米、南边长 30 米。封土现存高 28 米，其中西部稍微隆起。

孝惠张皇后陵在安陵西北 260 米处，其封土南边同安陵封土北边基本位于一条水平线上。封土距离西墙 154 米、距离南墙 340 米、距离北墙 427 米、距离东墙 702 米。封土东北角立有“孝惠张皇后陵”标志碑。封土呈覆斗形，四面斜坡基本没有塌陷，顶部却塌陷了一个直径 22 ~ 23 米、深 3 米的锅底状深坑，北边底部取土被挖掉，形成断崖。封土地面四边长度，东边长 68 米、西边长 70 米、南边长 65 米、北边长 70 米。封土的顶部东西长 30 ~ 32 米、南北长 33 米。封土现存高度 10.6 米。

① 孙铁山：《关于西汉安陵的新发现》，《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4 期。

安陵的陪葬墓基本上分布于安陵东部的跃进村至狼家沟一带，现在地面上还保存有十几座封土。封土大多数呈覆斗形，多残缺。钻探发现，这些墓葬的墓道以东向居多，有 12 座；南向者次之，有 5 座；西向者仅两座，未发现北向者。有两座墓葬的封土为两个封土相连的“二连冢”，封土南部并列两条墓道，当属于夫妻合葬的一种形式。跃进村西部、安陵东部第一座墓葬的封土特别高大（1 号陪葬墓），陵墓北侧立有“赵王如意陵”标志牌。不少学者认为实为鲁元公主墓。封土平面呈长方形，底边东西长 131 ~ 136 米、南北宽 108 ~ 110 米。陪葬墓的具体情况详见“安陵陪葬墓统计表”。

表二　安陵陪葬墓统计表[①]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1	跃进村西的 13 号公路西侧、安陵东面	长方覆斗形，顶呈马鞍状，顶部中心塌陷一大坑。底边东西长 131 ~ 136 米、南北宽 108 ~ 110 米，顶边东西长 43 米、南北宽 14 米。高 19 米	长 40 米、宽 20 ~ 30 米，墓道两壁有台阶，台阶宽 0．9 ~ 1．1 米。封土西部偏北发现以陪葬坑	东部	封土北部树立有“赵王如意墓”标志牌。传说为“鲁元公主墓”
2	13 号公路紧东侧，1 号墓东部	覆斗形，南部被破坏。底边 46 米 ×52 米，顶部 9．5 米 ×9 米	长 17 米、宽 12 ~ 20 米	西部	传说为张敖墓
3	跃进村东部	大多被破坏。长方覆斗形。残存底边为 20 米 ×34 米、顶边 15 米 ×20 米、残高 4 米	长 48 米、宽 4．5 ~ 20 米	南部	—
4	3 号墓东侧 50 余米	长方覆斗形。底边 37 米 ×69 米、顶边 19 米 ×40 米。高 6 米。略呈马鞍形。	两条。墓道 1 长 42 米、宽 3．6 ~ 19 米，墓道 2 长 39、宽 3 ~ 16 米	南部	两条墓道相互并列，平行
5	4 号封土东侧 100 米	覆斗形。底边 42 米 ×56 米、顶边 27 米 ×32 米。高 5 米	长 28 米、宽 9 ~ 20 米	东部	—
6	5 号墓东北 100 米	覆斗形。底边 22 米 ×59 米、顶边 18 米 ×49 米。残高 4 米	长 30 米、宽 10 ~ 21 米	东部	墓道偏北

①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25–26 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7	6 号墓东 20 余米	已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上口长 32 米 ×42 米	长 26 米、宽 4 ~ 18 米	南部	—
8	5 号墓南 200 米	覆斗形。底边 22 米 ×17 米、顶边 9 米 ×10 米。残高 6 米	长 23 米、宽 8 ~ 18 米	东部	—
9	8 号墓东南 300 米	覆斗形。残存底边 14 米 ×12 米、顶边 7 米 ×4 米。高 5 米	长 20 米、宽 5 ~ 16 米	东部	—
10	狼家沟东侧北部	覆斗形。底边残 12 米 ×23 米、顶边 6 米 ×11 米。高 4 米	长 26 米、宽 4 ~ 12 米	东部	墓道北侧有一长 24 米、宽 4 米的陪葬坑
11	10 号墓南	覆斗形。残存一半。底边 20 米 ×47 米、顶边 12 米 ×20 米。高 6 米	长 52 米、宽 6 ~ 16 米	东部	封土南有一长 17 米、宽 7 米的陪葬坑
12	11 号墓南	覆斗形。顶中心塌陷有一大坑。底边 42 米 ×76 米、顶边 15 米 ×52 米。高 8 米	长 32 米、宽 5 ~ 25 米	南部	封土南部发现两个盗洞，疑为陪葬坑
13	10 号墓东侧 20 米	覆斗形。仅存南半部。底边残长 11 米 ×27 米，顶边 9 米 ×21 米。高 6 米	长 18 米、宽 12 ~ 21 米	西部	封土东南发现一盗洞
14	13 号封土东北 230 米	覆斗形。底边残长 24 米 ×19 米、顶边 8 米 ×16 米。高 6 米	长 24 米、宽 6 ~ 16 米	东部	—
15	12 号墓东南 300 米	覆斗形。仅余东北部，底边残长 12 米 ×13 米、顶边 7 米 ×8 米。高 7 米	长 24 米、宽 5 ~ 16 米		—
16	高干渠北 50 米	覆斗形。底边 10 米 ×10 米，顶边 5 米 ×6 米。高 7 米	长 20、宽 4 ~ 14 米	东部	—
17	秦遗址博物馆西北、13 号公路西 150 米	覆斗形。一半被破坏。底边 9 米 ×15、顶边 5×10 米。高 3 米	长 22、宽 3 ~ 14 米	南部	—
18	安陵西部、南壕村西南	园丘形。一半被破坏。底径 30 米 ×35 米、顶部 8 米 ×10 米	长 23 米、东端宽 8 米，西端为现代坟，无法钻探	东部	—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19	南壕村西部	覆斗形。东西长 8 米、南北长 63 米、高 6 米	两条墓道。北道长 38 米、宽 6 ~ 24 米；南道长 36 米、宽 8 ~ 21 米	东部	封土东部为现代民房，墓道位于民房下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安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陵冢；一般保护区为整个陵园范围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200 米。

2001 年 6 月，安陵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成立安陵文管所。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其保护范围为：安陵陵园及陵邑区保护范围为北至白庙北村南 150 米，东至白庙中村东侧耕地，西至白庙南村，南至高干渠，东西、南北距离均为 165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陪葬墓区保护范围为东至 13 号公路以西 200 米，北至跃进村北 150 米，南至跃进村南原下 400 米，西至狼牙沟东 400 米，东西 1500 米、南北 100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边各外延 200 米。

第三节　汉文帝刘恒霸陵

一、墓主生平

刘恒（前200～157），汉高祖第四子，母薄姬，汉惠帝庶弟。高祖于前196年诛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前180年，吕后去世，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和朱虚侯刘章等发动宫廷政变，迎立为人宽容平和的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汉文帝即位后，励精图治，重视农业，减少租税，兴修水利，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与其子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文帝当政的23年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①]。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缊无文”[②]。即使他的宠姬慎夫人，也还是“衣不曳地”[③]。在厚葬盛行的秦汉时代，文帝要求“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④]。后元七年（前157）六月己亥，汉文帝崩于未央宫，葬霸陵。



图16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　（摄影：郑茂良）

①《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34页。

②《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2858页。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34页。

④《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433页。

文帝曾有王后青宁周氏，后因催生之术，难产而死（一说死因不明）。第二任王后为窦漪房。窦皇后，原籍赵地清河（今河北衡水），曾作为“良家子”被吕后选入皇宫，称为窦姬。后来，吕后挑选宫女赐予诸侯王，窦姬被分配到代地，并成为很受代王刘恒宠爱的姬妾，生子刘启。刘恒即位时，代王王后已死，刘启为太子，窦姬为皇后。刘启即位后，窦姬为太后，窦太后深受文帝“无为而治”黄老思想的影响，文帝政治路线得以在景帝时继续推行并发扬光大，窦太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窦太后逝于建元六年（前 135），与文帝合葬霸陵。

二、营建始末

霸陵，因位于灞河西岸而得名，传统观点认为，霸陵位于汉长安城未央宫前殿遗址东南 57 里，白鹿原东北隅，即今西安市灞桥区毛窑院村东南的“凤凰嘴”。

霸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玄宫的帝陵，对六朝及唐代依山为陵的建制影响巨大。汉文帝崇尚节俭，“文帝葬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①]。长期以来，认为霸陵是利用了一个向灞河河岸突出的黄土原阶，在原头的断崖上凿洞为玄宫，中以石块砌筑，坚固异常。因地面上没有封土，修筑起来比平地起冢的长陵、安陵省工。文献记载当时朝廷任命“郎中令武（张武）为复土将军，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发内史卒万五千人，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②]。据此分析仍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由于霸陵是斩原为冢，凿崖为墓，所以陵墓排水成了个重要的问题。《长安志》卷十一引《关中记》记载：霸陵上“为池，池有四出道以泄水”，这应该是霸陵的部分排水设施。

文帝霸陵“因山为陵”，除了力求节俭外，也是为陵墓的安全考虑。有一次，文帝携带慎夫人看到修筑中的霸陵，不无感慨地说：“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亡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③] 文帝十分赏识张释之这番话，可见，文帝“节葬”“因山起陵”“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其中无可欲”，确保其陵墓安全，既不被盗掘

①《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

②《史记》卷十《孝文本纪》，第 434 页。

③《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列传》，第 2753 页。

又可以达到节约的目的。

窦皇后陵在霸陵东南 2400 米的白鹿原上，北距原边约 400 米。《咸宁县志》卷十四记载：“窦皇后陵在窦林村，周围一百八十一丈。”“窦林村”应该就是“窦陵村”。“林”为“陵”音之讹。“窦陵”即“窦皇后陵”之简称。



图 17　霸陵窦皇后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文帝母薄太后，是高祖刘邦的妃子，代王刘恒即位后，太后被尊为皇太后。薄太后于“孝景前二年（前 155）崩，葬南陵。因吕后已合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文帝”。颜师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称南陵，今所谓薄陵。”[①] 因南陵西隔渭水遥望汉高祖长陵，故史书有“东望吾子，西望吾夫”的说法，当地人称为“望子冢”。

关于霸陵现在的位置，长期以来就有学者怀疑，因为现在认为的墓地据窦皇后墓地太远，而窦皇后的墓地位置是没有问题的。据近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正式公布的西汉阳陵、茂陵、渭陵、义陵考古勘探成果及其他见诸报道的相关勘探信息，西汉帝陵陵园应均为帝后同茔异穴，位于“大陵园”中。霸陵虽“不起坟”，但窦皇后陵仍是传统的覆斗形，在今白鹿原东北端，可眺灞水。西汉其他帝后陵相距均不超过 900 米（最远为昭帝平陵，帝后陵相距约 850 米），且帝陵与后陵为斜向相邻模式。综上所述，推测文帝陵位置，应在距窦皇后陵不远处的台塬上，并同在一个大陵园中，而非目前远离后陵且原顶狭窄、巨壑相隔的“凤凰嘴”。

据 GoogleEarth 发布的一张拍摄于 2004 年 5 月 19 日卫星照片显示，在位于窦后陵西一处平坦台塬的边缘，原有长近 600 米的斜坡地，平面呈规则的方形，颇有人工修整的迹象。而图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3942 页。

上显示其东、北缘竟也各有一道夯墙痕迹（颜色泛浅，为因夯土而不利植物生长形成），与前述两墙构成一正方围合的空间，且边长恰为汉代一里（约 415.8 米），正是西汉帝陵陵园的尺度。且其东南西面外正中，均有与之垂直的疑似道路向外延伸，当即帝陵神道。其中东神道延至后陵南侧，西神道更在整个白鹿原西部延伸，下部与一道较直的沟壑相对，直达原脚，总长达 3800 米，此道也正是通向长安之道，故而最长。此正方空间正中，则有一方形建筑遗迹，推测其下当即帝陵墓室所在，该地面遗迹或为陵上因“不起坟”而设置的有别于其他帝陵的某种礼制建筑遗存。《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一文又言窦后陵“西南里许有大型建筑基址。在园内及西坡多有鹅卵石路面、散水及西汉筒瓦、板瓦、云纹瓦当”，据其方位正与阳陵、茂陵、杜陵庙相类，推测当为霸陵陵庙。因而推断文帝霸陵就在窦皇后陵的西边。

据 2015 年 9 月 8 日的西安晚报披露：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曹龙和杨武站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认为霸陵帝陵陵址可能并非“凤凰嘴”，而是 2001 年发现的江村大墓。曹龙指出，对于霸陵的墓室结构，学界一直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霸陵“因山为藏”，从外表上看是“因其山，不起坟”，“凤凰嘴”的高崖就是霸陵陵址，其墓室结构应当是一种崖墓。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文献上记载的“因其山，不起坟”，可以理解为将墓修在山中，故不另修封土，墓室形制则同汉代的其他帝陵一样，是竖穴土坑墓。

历史上对霸陵形制记载的文献有很多。《史记》《汉书》《水经注》《三辅黄图》等史书中都有过霸陵“不治坟”的记载。但曹龙和杨武站认为，由于古代帝王陵墓的保密性，文献对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仅有“不治坟”的简单记载，真正的认知则有待于考古认证。距汉文帝埋葬时间最近的《史记》记载：“（霸陵）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说明霸陵帝陵无封土，缘由不是有山，而是“欲为省，毋烦民”。

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安帝陵传统，曹龙推测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应该是带 4 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西汉帝陵并无二致，只是没有封土而已。从地貌上看，霸陵坐落在黄土台塬上，并非山地，西汉帝陵选址除考虑传统习俗、风水、稳固政权外，地质条件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因素。霸陵的选址恰好说明其仍然是按照西汉帝陵传统修建的，并无“异想天开”之举，当然也不会是依山为建的崖墓。而学界对于崖墓观点的支撑，普遍来自

于历史文献中对“西京霸陵，因山为藏”“霸陵因山不起坟”之说，使考古界对霸陵帝陵墓葬形制认识形成了崖墓说。西汉实行帝、后同茔的合葬制，若帝陵为崖墓，后陵则不可能为竖穴土坑墓，但已考的窦皇后陵为带封土的竖穴土坑墓。曹龙和杨武站因此认为，帝陵的形制肯定也是竖穴土坑墓，只是没有封土罢了。

据西汉帝陵传统，陵园一般建于黄土台塬的边部，除帝陵陵园较为高隆外，整个陵园内较为平整，高差不大。但曹龙说，“凤凰嘴”与陵园内最低处高差达 230 米， 在建陵过程中难以建设外藏坑、礼制建筑等设施，且“凤凰嘴”与窦皇后陵封土相距 2100 米，比西汉国力最强的武帝茂陵帝后陵墓之间的距离还大，这显然不可能。根据西汉帝陵的陵园规模，霸陵帝陵不可能位于“凤凰嘴”。西汉帝陵、后陵一般东西排列，“帝东后西”或者“帝西后东”。曹龙和杨武站研究了霸陵地貌条件后发现，从地貌条件上看，霸陵帝陵肯定位于窦皇后陵西南侧。

2001 年，位于灞桥区的江村东侧，有一座大型墓葬（简称“江村大墓”）多次被盗，其墓葬位于江村东侧、窦皇后陵西侧，墓室长、宽各约 40 米，深约 30 米，有 3 道回廊。盗墓者当时共盗出 300 件文物，有专家推测被盗墓葬可能是馆陶公主墓。汉代公主、长公主、大长公主墓葬皆类比诸侯王。但目前已发现诸侯墓的规模，与江村大墓相比都小了许多。而馆陶公主葬于武帝时，其葬制不可能超越诸侯王。因此，曹龙认为江村大墓不可能是馆陶公主墓，他和杨武站推测，江村大墓位置显赫、规模大、外藏坑数量多，远远超过了诸侯王墓的等级，墓主有可能是汉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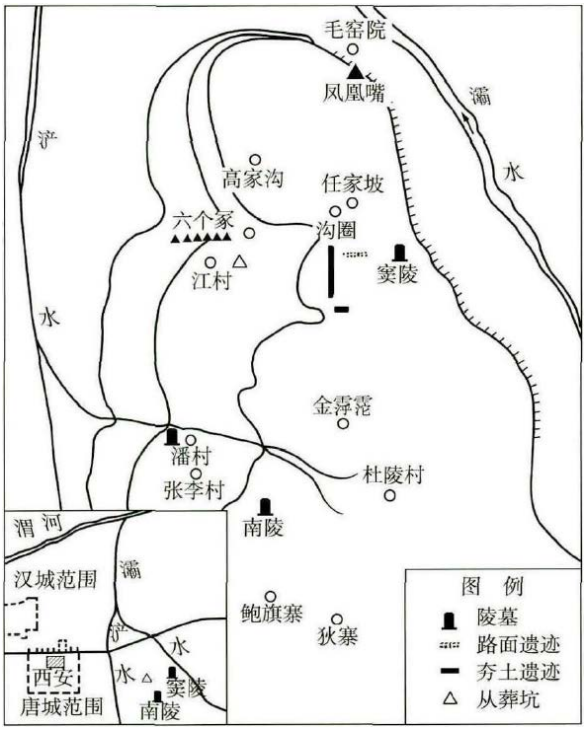


图 18　霸陵陵区遗址分布图　（采自杨武站、曹龙：《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考古》，2015 年第 8 期）

霸陵帝陵无封土，是两千年来不争的

事实。曹龙说：“我们研究推测，汉文帝个人有偏好节俭的习惯，是霸陵帝陵不建封土的主要原因，而文献中的记载，由于时代的变迁，在传抄过程中发生偏差，导致学界很多人根据文献得出霸陵帝陵为崖墓的观点。但随着西汉帝陵、诸侯王墓研究的深入，崖墓说的缺陷已经逐渐显露出来。”

据此，曹龙和杨武站研究，根据霸陵陵区地质、地貌条件，结合西汉帝陵制度、墓葬形制，霸陵帝陵应为带 4 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并根据江村大墓的位置、规模、设施，判断其为霸陵帝陵陵址，即汉文帝陵墓[①]。

位于霸陵陵区内的陪葬墓，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孝武陈皇后、窦太主、董偃，以及更始帝刘玄等。孝武陈皇后是孝文窦皇后的外甥女，即窦太主和陈午的女儿。窦太主仰仗其母权势，横行朝廷，做主将其女嫁给当时的太子刘彻。刘彻即帝位后，窦太主的女儿被立为皇后。孝武陈皇后“擅宠娇贵”于后宫，后因“惑于巫祝”被废，退居长门宫，死后“葬霸陵郎官亭东”[②]。窦太主是孝文窦太后的女儿，即馆陶公主。其夫堂邑侯陈午死后，50 多岁的馆陶公主与卖珠少年董偃厮混。董偃也仗其权势，贵宠朝廷，三十而终。几年后，窦太主逝世，“与董君合葬于霸陵”[③]。孝景薄皇后是薄太后家的女儿，因无子，不受宠。薄太后去世后，孝景薄皇后就被废。4 年后她逝世，安葬在长安城东平望亭南，疑其墓应在霸陵陵区。王奉光是孝景王皇后的父亲，被封为邛成侯，死于前 47 年，葬在长门之南。长门属霸陵县界之内。坟墓附近“置园邑二百家，长丞奉守如法”[④]。刘玄，字圣公，系西汉皇族，南阳蔡阳人。西汉末年农民起义中，先参加平林军，并被推为更始将军。后来又合并于绿林军。23 年称帝，年号更始。王莽政权灭亡后，他移居长安，背叛起义军，杀害农民军将领。25 年，赤眉军攻破长安，消灭了刘玄政权。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刘恭夜往收臧其尸。光武闻而伤焉，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⑤]。据《水经注》卷八记载，刘玄墓应在霸城县东北，即今陆旗营东北一带。

---

① 杨武站、曹龙：《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考古》，2015 年第 8 期。

②《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3949 页。

③《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第 2875 页。

④《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3969 ~ 3970 页。

⑤《后汉书》卷十一《刘玄刘盆子传》，第 476 页。

文帝前元九年（前 171），在芷阳乡建置了霸陵邑，《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孝文九年，以芷阳乡为霸陵。"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霸陵，故芷阳，文帝更名。"芷阳为秦县，县治在今西安灞河以东洪庆村一带，那里曾出土过不少有"芷"字的陶文砖瓦及陶器。芷阳乡为芷阳县所辖，乡界包括芷阳县城及其附近。这就是说，霸陵县邑与芷阳县城相距不远。新莽时改为水章县，东汉时复名霸陵，魏晋时代，改汉霸陵县为霸城县，县城北移至铜人原北部，约在今陆旗营一带，南距汉霸陵邑 28 里。后周时废去此县。霸陵城在历史上的交通地位和军事价值非常重要，它是关中腹地的秦咸阳和汉长安东出函谷关或东南出武关的必经之地，而且又扼制着灞河的渡口。所以秦汉时期它的名声非常显赫。

关于霸陵邑的具体地点，有人据《长安志》"霸陵县东南距文帝陵十里"的记载，考证其位于灞河对岸的田王村一带，与陵相距 5 公里。而《长安志》所定县邑在浐、灞二水之间，《史记》正义："霸陵城，在万年县东北二十里。"上述二地都距陵 5 公里左右。《水经·渭水注》载："（渭水）又东过霸陵县北，灞水从县西北流注之。"《三辅黄图》也说浐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灞。据此推测，霸陵在灞河之东距离浐灞合流处稍偏北。

三、陵园变迁

《汉书·五行志上》："永始四年（前 13），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①]

《晋书·孝愍帝纪》："建兴三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②]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霸陵至今没有发掘，其具体情况不得而知。目前也未发现陵邑的遗迹。

1996 年，在窦皇后陵园西墙以西 1000 米处，即江村村东，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陪葬坑，并发掘了其中的 47 座。这些陪葬坑分布集中，东西规则地排列为 8 行，均为土圹，每行少则 1 座，多则 11 座。坑内或置陶棺，或筑砖栏，也有的只有土坑而已。陪葬坑的长度多为长 0.7 ~ 1.75 米、宽 0.3 ~ 1 米、深 0.2 ~ 0.4 米，最长的才 3.31 米。坑内出土彩绘女陶俑、陶罐、半两钱、

①《汉书》卷二十七上《五行志》，第 1337 页。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五《孝愍帝纪》，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29 页。

禽兽遗骨和谷物等。这一批陪葬坑应是汉武帝初年窦太后死后安葬时所建[①]。

这里出土的陶俑全是彩绘女侍俑，还有发掘到一些禽兽遗骨，经鉴定确认者，有马、羊、猪、狗、鸡、鹅、鹤等。

南陵陵园西墙外发现20座陪葬坑，分为南北3排，南面两排各7座，北面一排6座，均为口大底小的长方形竖穴坑，坑内置陶棺、木椁或以条砖砌筑框栏，坑长1.42 ~ 3.1米、宽0.96 ~ 1.6米、深2.15 ~ 4米。坑内放置动物、陶俑、陶罐等，经过对动物骨骼的分析，确定有犀牛、大熊猫、马、羊、狗等。陪葬坑壁的条砖上，有的有“东园”陶文戳记。薄太后之南陵也设有陵邑，位于陵西南3公里。今西安灞桥区狄寨乡大康村附近发现了许多西汉砖瓦残块，南陵邑遗址当在此地[②]。

研究成果：

李健超：《被遗忘了的古迹——汉成帝昌陵、汉傅太后陵、汉霸陵城初步调查记》，《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

王学理：《汉南陵从葬坑的初步清理》，《文物》，1981年第11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王子今：《霸陵薄葬辨疑》，《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

秦建明：《西汉文帝霸陵》，陕西省文物局主编《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二）》，三秦出版社，2003年。

张佳：《霸陵墓室可能并非崖墓：江村大墓墓主或为汉文帝》，《西安晚报》2015年9月8日。

五、遗迹和遗物

今“凤凰嘴”霸陵陵前山麓多平整为多级台地，其上第二阶宽度较大，长度约80米见方，地面可见少量汉瓦和卵石，原有历代祭祀碑群，现仅存有8通清代碑石[③]。大多因长年风化侵蚀，所刻字迹难以辨认，其中一块碑仅剩下残破的碑桩。杂草中，一块断碑中央隐约刻着“御祭”

①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②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

③ 秦建明：《西汉文帝霸陵》，陕西省文物局主编《陕西文物古迹大观（二）》，三秦出版社，2003年

两个大字，其下小字刻有“……雍正元年，……皇帝遣通政使司……”等字样。

窦皇后陵墓周围原面平整，现皆为耕地，其西侧有一条村级公路向南通向狄寨乡。窦皇后陵平地起冢，形如覆斗。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近方形。底部东西长 137 米，南北长 143 米；顶部东西 30 米、南北 35 米，封土高 19.5 米。陵园的西墙和南墙部分墙垣遗迹尚存，西南部有大型建筑基址，并发现有卵石路面、散水与瓦片。

薄太后南陵北距霸陵 4500 米，位于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乡鲍旗寨村西北 800 米，封土为覆斗形，底部东西长 140 米、南北宽 173 米，底部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55 米，高 24 米。陵冢四周有夯土筑成的陵园垣墙，垣墙正中建有门阙。



图 19　当地人称之为“簸箕冢”的薄太后南陵　（摄影：郑茂良）

薄太后是汉高祖刘邦的侧室、汉文帝刘恒的生母。薄氏出身低微，秦末诸侯纷起，魏豹称王，薄氏家将她献入魏宫。刘邦灭魏，她成为汉军俘虏，以后纳入后宫，生子刘恒。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凡被刘邦所宠幸的妃子多被杀戮或监禁。薄氏因在刘邦生前早已失宠，所以得免于难。吕后允许她和儿子代王刘恒同去代国，成为代国太后。前 180 年，吕后死，大臣们议立汉嗣，他们鉴于吕后时期外戚专权，对继嗣外家选择非常严格，终于以“薄氏仁厚”为理由，迎立刘恒为皇帝，尊奉薄氏为皇太后。

景帝二年（前 155），薄太后去世，因刘邦与吕后已合葬长陵，景帝刘启按照薄氏的意愿，将薄太后陵营建于汉文帝霸陵以南，以便“左望”其夫高祖刘邦的长陵，“右望”其子文帝的霸陵。当时人称“南陵”。唐代称“薄陵”，近代称“薄姬冢”，当地群众称之“簸箕冢”。陵墓南侧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碑石 1 通，上书“汉薄太后南陵”。1975 年，考古

工作者在陵冢西北清理从葬坑 20 座，出土有彩绘女侍俑、陶罐、兽骨等，大型兽骨有大熊猫、犀牛和马等。以犀牛、大熊猫从葬，在我国考古发现中尚属首次。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霸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帝陵、后陵及其碑刻为中心的 39100 平方米范围；一般保护区为重点保护区外延 10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100 米。2001 年 6 月，霸陵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7 年 5 月，薄太后陵和窦皇后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两陵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均为墓冢；一般保护范围均为重点保护区外延 10 米；建设控制地带均为一般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2013 年 3 月，薄太后陵和窦皇后陵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四节　汉景帝刘启阳陵

一、墓主生平

景帝刘启（前 188 ~前 141），系文帝和窦皇后之子，生于汉惠帝七年（前 188），文帝后元七年（前 157）即位。刘启继承其父的政策，遵奉黄老之学，与民休息。对内，严厉打击地方割据势力，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平息了以吴王刘濞、楚王刘戊为首的七国之乱，巩固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重本抑末”“劝农桑、益种树”；对外与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为全面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文帝和景帝执政期间，国内政治局面安定，“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①]。

前 146 年，景帝崩于未央宫，葬阳陵[②]。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父名王仲，京畿槐里（今陕西兴平）人，母臧儿，故燕王臧荼之孙。王仲死后，臧儿改嫁长陵田氏，她也随母亲到了长陵邑。长大后，她嫁给长陵邑的金王孙，已生一女，其母卜筮得知两女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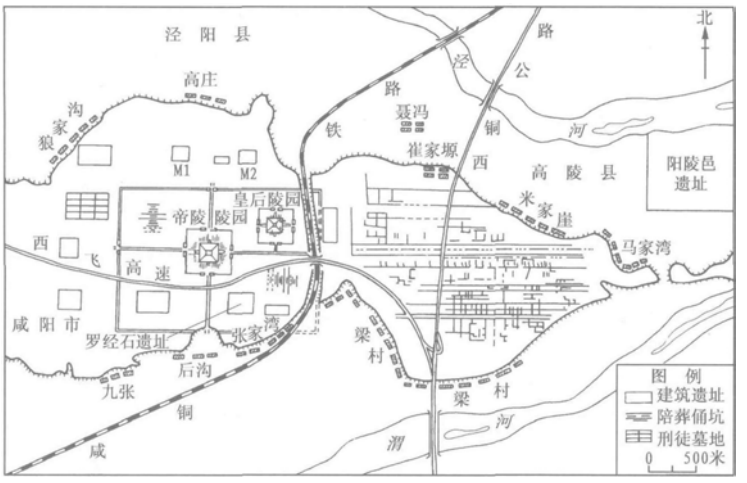


图 20　汉阳陵陵区遗迹平面示意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①《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第 1135 页。

②《汉书》卷五《景帝纪》，第 153 页。

贵，冀其贵而依之，逼其改嫁，出于无奈，她到了太子宫中当宫女。进宫后，颇受太子刘启宠幸，先后生了三女一子，子即后来的武帝刘彻。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帝位，她被立为皇后，其子刘彻被立为太子。元朔三年（前 126），王皇后崩，合葬阳陵。

二、营建始末

景帝生前就已开始营建寿陵，前元五年春正月（前 152），“作阳陵邑。夏，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①]。中元四年春三月（前 146），“起德阳宫”“秋，赦徒作阳陵者”[②]。

景帝在当时的弋阳县修筑寿陵，因此取名为“阳陵”。阳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北，西南距未央宫前殿遗址 34 里，西距汉高祖长陵 12 里，其东为泾渭汇流处。阳陵是咸阳原上西汉 9 座帝陵中最东面的一座，在今咸阳市秦都区肖家村乡张家湾村。陵区范围，向北伸进泾阳县高庄乡，向东至高陵县马家湾乡。

阳陵的主要工程大约在景帝中元四年（前 146 ）秋季完工。景帝陵封土为覆斗形，底部和顶部平面近方形，底部边长 170 米，顶部边长 50 米，封土高 31 米。景帝陵东北 450 米有个陵墓，毕沅在此墓前立“汉惠帝安陵”碑。前已述及，此陵并非安陵，应为孝景王皇后陵。此陵墓封土形制与景帝陵相同，唯规模略小。

阳陵陵园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417.5 ～ 418 米，四面有夯筑垣墙，地面基本无存，墙宽 3.5 米，垣墙四面中部各开一门，并筑有三出阙。1997 年 3 ～ 6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对阳陵南阙门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面积 3100 平方米，出土了板瓦、筒瓦、铁夯头等遗物 583 件。南阙门遗址由一组两座三出阙相连接而成，三出阙的平面由大小依次递减的 3 个长方形组成，东西面阔 131.5 米，南北进深分别为 25.4 米、17.4 米、11 米。阙门的中间为中央门道，长 25.5 米，宽 5.5 米。门道的两侧为东、西和内、外四塾，平面为长方形，南北宽 19.8 米，东西长 10.7 米。塾内地面铺有方砖，塾外侧为主阙台，东西长 27.5 米、南北宽 8.2 米、残高 6.21 米，上部中间有东西向柱洞一列 5 个。主阙台外侧是副阙台，东西长 14 米、南北宽 4 米、残高 0.4 ～ 4.3 米，主、副阙台均为夯土筑成，夯土外壁抹有 1 ～ 2 厘米的草拌泥，草拌泥上先施白灰面，然

---

①“张宴曰：‘景帝作寿陵，起邑’”《汉书》卷五《景帝纪》，第 143 ～ 144 页。

②《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华书局，1964 年，第 147 页。

后涂朱。塾、阙台周围绕以回廊，回廊地面铺设方砖，南、北塾廊均长 19.1 米、宽 1.5 米。主阙廊南北均长 31.3 米、宽 3.3 米，南北副阙廊均长 18.6 米、宽 2.1 米。回廊之外砌有鹅卵石散水，散水呈鱼脊形，内高外低，全长 141.6 米、宽 0.9 米。南阙门的塾和主、副阙台，其基础夯土颜色明显不同，塾为黄褐色，主、副阙台呈红褐色，显然不是一次修建。在两部分夯土基础连接处，靠近主、副阙台的一侧施有草拌泥、白灰面和朱色。可见，主、副阙台的年代略早，塾是稍后补建的。主、副阙台的年代应与阳陵的修建同期，即汉景帝年间，塾的补建年代可能在武帝时期。



图 21　汉阳陵南门阙台内景　（摄影：郑茂良）

孝景王皇后陵位于景帝阳陵的东北。陵园平面为正方形。四面皆有夯筑垣墙，四面中部皆有门。陵墓形制为“亞”字形，东、南、西、北各有一条墓道，其中东侧墓道最长、最宽。景帝王皇后陵园内封土四周发现陪葬坑 28 座，围绕封土呈放射状分布，可能代表了皇后所属的后宫系统的有关机构和设施[①]。

阳陵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阳陵陵园东司马门以东 1550 米，东西排列在东司马门道南北两面。陪葬墓区的范围，大约东西长 1100 米，南北宽 500 米，位于今高陵县马家湾乡崔家原村东南和米家崖村西南。阳陵北面只有两座陪葬墓。陪葬墓中现存封土共 11 座，另有 20 多座陪葬墓的封土已被夷平。据文献记载，栗姬、李蔡、苏建家族的墓葬，均在阳陵陵区。栗姬，景帝妃，废太子临江王生母。今阳陵以北 830 米，泾阳县高庄村南有一大冢，覆斗形，底部东西 60 米、南北 55 米，封土高 20 米。当地群众形象地称此墓为“升子冢”，即形如“升”。疑此冢即栗

①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7 年第 7 期。

姬之墓。李蔡，系著名将领李广从弟。因盗取阳陵土地之事败露，自杀身亡，可能归葬于阳陵的家族墓地[①]。苏建，任校尉，跟随卫青争战边陲，反击匈奴侵略，被封平陵侯。后出镇朔方、定襄，因军事失利，当处斩而赎为庶人，后出任代郡太守，死于任上。生有子苏嘉、苏贤和苏武。苏建家族墓地在阳陵。



图 22　汉阳陵帝陵北侧陪葬墓，当地人称之为“升子冢”，传说为栗妃墓　（摄影：郑茂良）

阳陵的陪葬墓区，其东、西各有南北向壕沟一条，作为陪葬墓区的东西界限。西侧壕沟已探明长 440 米、宽近 8 米，深 6.2 米。东侧壕沟长 570 米、宽近 40 米，深约 10 米。中部有一条东西向道路（阳陵的东司马道）横贯陪葬墓区，西起帝陵陵园东阙门，向东直通阳陵邑。司马道南北宽 110 米，东西长 3500 米，路土厚 10 ~ 24 厘米，距离地面 0.7 米。司马道南北两侧排列有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墓园平面多为正方形，少数为长方形，其中有数量不等的墓葬和陪葬坑。墓园之间有壕沟分隔。目前已钻探发现东西向壕沟 22 条，南北向壕沟百余条。由这些壕沟分隔而成陪葬墓园 16 排 107 座。其中司马道南侧 10 排 92 座，北侧 6 排 15 座。这些墓园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呈棋盘状分布。墓园内已探明各类大中小型墓葬 5000 余座。1997 ~ 1998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司马道南侧的部分墓葬进行了清理，共发掘墓葬 337 座，

①《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第 2446 ~ 2449 页。

其中汉墓 280 座，唐墓 23 座，宋、元、明、清墓 34 座，共出土各类文物 5516 件。280 座汉墓共出土各类文物 5292 件，其中有竖穴土洞墓 158 座，竖穴土圹墓 9 座，斜坡墓道土洞墓 77 座，其他的 36 座。

根据这些墓园的布局、墓葬形制以及出土遗物，可将墓园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墓园已探明 30 座，司马道南侧和北侧各两排。平面多为东西向长方形，有的近方形，大多无规整的门道，靠近司马道一侧多无壕沟。有的墓园内有建筑遗址，个别的还有烧造建筑材料的陶窑。墓园面积 4200 ~ 13000 平方米，发现东西向主壕沟 8 条，一般宽 6 ~ 8 米，深 12.2 米；最宽的达 30 米，最深的 16 座。一座墓园内有 1 ~ 5 座墓葬不等，主墓皆呈“甲”字形，墓旁一般有从葬坑。司马道南侧墓园的主墓道多为北向，司马道北侧的墓园主墓道多向南。在此区墓园内清理汉墓 60 座，出土各类文物 1652 件。其中在位于司马道南第一排的 97YPIY9—GYM130 发现“周应”铜印一枚，可能和景帝时的绳侯或郸侯周应有关。在位于司马道南第一排的 97YPIY 9 —GM144 出土锺、钫、盆等铜器数件，铜锺上刻有“般邑家铜锺容十斗重卅五斤第二家工造”铭文四行 17 字，可能是某一诸侯或公主家所用之器。结合史书有关丞相李蔡[①]、苏建陪葬阳陵的记载，可以认定此期墓园的墓主是以诸侯、公主、朝廷显贵等高级贵族为主，属于阳陵的陪葬墓园。早期墓园的特点是距离司马道近，墓园规模宏大，壕沟宽而深，排列有序，墓主级别高。

中期墓园位于早期墓园的南北两侧，与早期墓园间隔 10 米。中期墓园发现 55 座，司马道南侧 5 排，北侧两排，布局规整，排列整齐。墓园平面多呈方形，边长 50 ~ 70 米，门道多朝北，宽 5 ~ 25 米。个别墓园内有建筑遗址或陶窑。墓园东西向壕沟笔直，南北向壕沟多在一条线上，有的东西错位。东西向的主沟有 9 条。壕沟一般宽 2 ~ 4 米、深 3.2 ~ 6 米，断面多呈平底槽形。墓园内的墓葬以中小型居多，数量不一。墓园内最多有百余座墓葬，最少的也有十几座。有的墓园墓葬排列整齐有规律，有的方向不一，排列无序。墓葬类型较多，有早晚打破关系，未发现陪葬坑。其中共清理汉墓 120 多座，出土各类文物 1850 件。中期墓园的特点是距离司马道较远，

①“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汉书》五十四《李广传》，第 2449 页。

布局较规整，壕沟较窄，墓葬数量较多，形制多样，规模较小，墓主级别较低。

晚期墓园位于中期墓园的南北两侧，与中期墓园相隔 10 米。共发现墓园 22 座，其中司马道南侧 3 排，北侧两排。墓园平面方形、长方形皆有，面积不等，还有大墓园内套小墓园的现象。边长多在 50 ~ 70 米之间，门道方向不一，宽 3 米左右。晚期壕沟共有 9 条，一般宽 1.8 ~ 4 米，深 2.8 ~ 3.2 米。壕沟较前变窄、变浅。墓园内墓葬较多，方向不一，形制复杂多变，砖室墓数量增加。此区内共清理汉墓近百座，出土各类文物近 1800 件。晚期墓园的特点是距离司马道最远，布局较规整，壕沟变窄，墓葬数量较多，排列不太规整，墓主级别较低。

阳陵陪葬墓园的上限应为景帝年间，即西汉早期，其下限一直延续到东汉中期。早期墓园的时代相当于汉景帝始建阳陵到汉武帝年间，中期墓园的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晚期墓园的年代应从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早期的墓园无疑属于阳陵的陪葬墓园，西汉中晚期，阳陵可能还有陪葬墓，但部分墓园应是不以陪葬阳陵为目的的家族墓地。到了西汉晚期以后，独立的家族墓地应该是墓园的主体。

阳陵陪葬墓有 5 座墓葬发现陪葬坑，其中北区的两座墓葬平面均呈“中”字形，距离帝陵最近，分别有 13 条和 17 条陪葬坑，墓主可能为皇室成员，当地村民称“妃子墓”。东区陪葬墓中的 3 座也有陪葬坑，平面均为“甲”字形，各有一座陪葬坑，墓主可能是非皇室的高级官僚和贵族。此类陪葬坑的设置，应为皇帝特别赏赐，代表或象征墓主同皇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所享有的特殊地位[①]。

阳陵邑位于阳陵以东，约在今高陵县马家湾乡一带。东西长 4500 米，南北宽 1000 米，总面积 4.5 平方公里。陵邑内钻探发现南北向街道 31 条，东西向街道 11 条，组成了 200 多个里坊。主街道宽 62 米，路面上还发现有车辙痕迹，从车辙痕迹得知，当时有的车宽 1.3 米左右。这条主街将陵邑分为南、北两个部分。钻探与发掘结果表明，北部建筑规模较大且内涵丰富，应为官署区；南部建筑规模较小而且遗存简单，应为民居区。在陵邑的南部探明一段长 970 米的城墙，墙外有护城壕。《古诗源》卷三蔡邕在《樊惠渠歌》序中写道：樊惠渠在“阳陵县东，其地衍隩，土气辛螫，嘉谷不殖，而泾水长流。”樊惠渠虽早已废弃，但从记载的相对位置来看，

①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7 年第 7 期。

它应在泾河西南、原地东北的泾河河谷谷地。阳陵邑位于樊惠渠西南的原地上。文献记载，阳陵邑与阳陵东西相距二里。景帝前元四年（前 153 ）“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第二年夏天，“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①]。当时的徙民主要来自关东，其中的大家有田氏、革氏、爰氏、单父氏、秘氏、郦氏、奚氏、周氏、张氏和翟氏等。此外，景帝和武帝时期有些达官显贵、豪杰巨富也徙居阳陵邑。

三、陵园变迁

《汉书·武帝本纪》：元鼎三年“正月戊子，阳陵园火”[②]。

《后汉书·孝安帝本纪》：延光元年“八月戊子，阳陵园寝火”[③]。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1906 ~ 1910 年，受聘于陕西高等学堂教习的日本人足立喜六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实地调查和简略的测绘，并在日本出版了《长安史蹟わ研究》一书。2003 年，三秦出版社以《长安史迹研究》为名在国内出版，其中第五章《汉代陵墓》对西汉十一陵的调查情况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书中配有足立喜六当时拍摄的照片。足立喜六受毕沅的影响，把咸阳原上的 9 座陵位置大多搞错[④]。

真正对阳陵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勘察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1972 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发现了阳陵的刑徒墓地，并进行了发掘[⑤]。1978 年，咸阳博物馆派人对阳陵进行了调查，勘测了帝陵、后陵和部分陪葬墓[⑥]。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力对阳陵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⑦]。1990 ~ 199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至咸阳国际机场专

---

①《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 442 ~ 443 页。

②《汉书》卷六《武帝本纪》，第 183 页。

③《后汉书》卷五《孝安帝本纪》，第 235 页。

④（日）足立喜六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

⑤ 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发现》，1972 年第 7 期。

⑥ 王丕中、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1 期。

⑦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 6 辑，1982 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图 23　汉阳陵帝陵封土　（编写组供稿）

用高速公路建设的工作中，对阳陵的南区陪葬坑进行了钻探和调查，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南区陪葬坑的发掘被评为 1990 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①]。1995 年，新组建的阳陵考古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对帝陵的结构布局以及陪葬墓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大致掌握了帝陵的形制，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墓园。同时发掘了帝陵南阙门遗址，清理了一批中小型陪葬墓，出土了各类文物 9300 余件，取得了重要收获[②]。1999 年 9 月 30 日，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

研究成果：

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发现》，1972 年第 7 期。

王丕中、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1 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 6 辑，1982 年。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 年第 4 期。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 年第 4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 年第 6 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中国汉阳陵彩陶》，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 年。

②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李岗等：《汉景帝阳陵发现陪葬墓园》，《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1 月 14 日。《汉阳陵园内发现大批陪葬坑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1 月 28 日。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中国汉阳陵彩陶》，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 年第 6 期。

董鸿文等：《阳陵罗经石的实测和研究》，《测绘通报》，1995 年第 6 期。

焦南峰、王保平、马永赢、李岗等：《汉景帝阳陵发现陪葬墓园》，《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1 月 14 日；《汉阳陵原内发现大批陪葬坑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9 年 11 月 28 日。

［日］足立六喜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

杨林仁：《汉阳陵》，三秦出版社，2003 年。

汉阳陵博物苑：《汉阳陵博物苑》，文物出版社，2006 年。

焦南峰：《汉阳陵丛葬墓初探》，《文物》，2007 年第 7 期。

五、遗迹和遗物

阳陵陵园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417.5 ~ 418 米，四面有夯筑垣墙，地面基本无存。孝景王皇后陵位于景帝阳陵的东北。陵园平面为正方形。四面皆有夯筑原墙，四面中部皆有门。门外筑双阙，在门两边对称分布。门阙址大小、形状基本相同。以南门外阙址为例，每个阙址底部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16 米，高 4 米。每座门门外二阙址间距 12 米，这应与其陵园门的门道宽度相近。门阙遗址附近也发现了与景帝陵园门阙遗址基本相同的建筑遗迹。垣墙边长 347.5 ~ 350 米，四角无角楼之类的建筑。封土位于陵园的中部，呈覆斗形，底边长度分别为东边长 157 米、南边长 167.5 米、西边长 156 米、北边长 151 米，顶部边长为东 61.5 米、南 48 米、西 64 米、北 52.5 米。封土高 26.49 米，四面底边距离各门皆为 110 米。

陵园内陪葬坑总共发现 86 座，基本围绕阳陵封土作放射状排列，东侧和西侧陪葬坑均作东西向排列，南侧和北侧为南北向排列。四面陪葬坑与封土的距离除个别外，绝大多数为 10 米左右，其靠近封土的一端东西或南北形成一条直线，与封土底边平行，各坑间距最小 2 米，最宽 7 米，一般在 4 米左右。坑的宽度为 3 ~ 4 米，绝大多数在 3.5 米。最长的坑超过 100 米，最短的只有 4 米，坑深 3 米左右，坑底距现地表 8 米，堆积层较厚的达 14 米。东侧有陪葬坑

21 座，墓道以南 11 座，墓道以北 10 座，坑长 5 ～ 92 米，坑内有骑兵、步兵、动物等各式陶俑，陶、铜、漆器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器等。南侧有陪葬坑 19 座，坑均较短，内涵不大清楚。西侧有陪葬坑 20 座，坑内已知有骑兵、步兵、动物陶俑，陶、铜、漆器等。北侧有陪葬坑 21 座，坑内有各式兵器、车辆、步兵俑等生活用具及兵器、车马器等。东北角有 5 座陪葬坑，呈南北“一”字形排列，其北端紧贴陵园北垣墙，坑内发现有朱砂、漆器、板灰等遗迹和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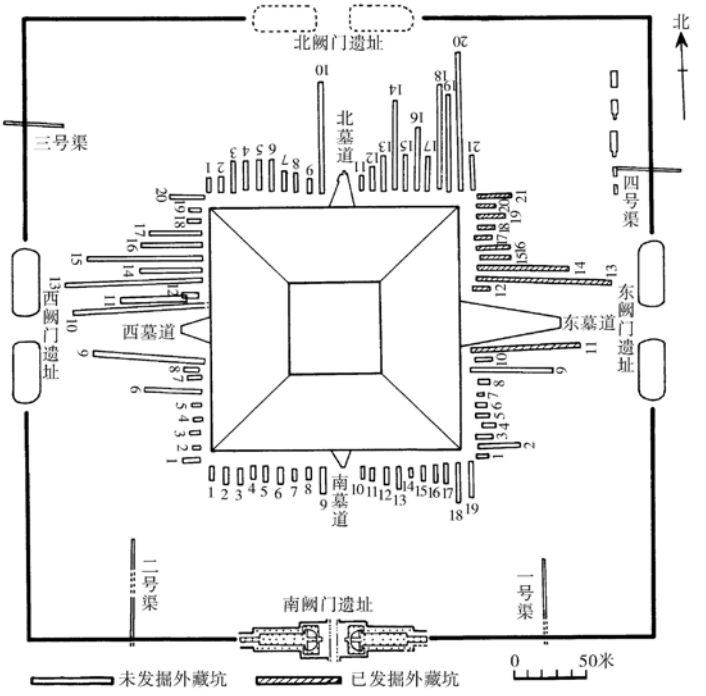


图 24　汉阳陵帝陵陵园平面布局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5 期）

1999 年以后，对陵园封土东北部的 11 座陪葬坑进行了发掘，编号为 DK11 ～ DK21，出土器物有包括官吏、武士、男侍从、女侍从、宦者等各种身份的陶俑，猪、狗、羊、牛、鸡等陶家畜，原大或缩制为三分之一的木马车，陶罐、仓、壶、盆、钵、甑、釜，铁釜、锛、灯、刀、戟、剑、矛，铜钵、斗、印章、钱币，以及粮食、肉类、纺织品等，种类齐全，数量可观。其中 11 号坑南北两侧分别为两列陶人木马骑兵俑，中间为两列木马车，陶骑俑身旁大多出有铁戟、铁剑、铜弩机等兵器。12 号坑出有“宗正之印”龟钮银印、“大泽津印”鼻钮铜印。13 号坑西端发现“大官丞印”封泥一枚。15 号坑发现“导官令印”封泥 6 枚，鼻钮铜印 3 枚，印文分别为“仓印”“甘泉仓印”“别臧官印”。16 号坑出土铜印 5 枚，分别为“大官之印”“内官丞印”“府印”“左府之印”“右府”。17 号坑出土鼻钮铜印 2 枚，分别为“宦者丞印”“长乐宫印”。18 号坑出去宦者俑、白衣女俑等陶俑百余件，以及鼻钮铜印 4 枚，分别是“永巷丞印”“永巷厨印”“府

印”“西府”。19 号坑发现“徒府”鼻钮铜印一枚。20 号坑主要出土陶俑、木车马、陶质动物及少量铁器等。21 号坑发现鼻钮铜印 3 枚，其中一枚无印文，另外两枚分别为“山府”“东织寝宫”，还出土了“东织令印”封泥一枚。发掘者认为，这 11 座坑分别代表和象征了西汉王朝的宗正，以及少府下属的导官、徒府、太官、宦者、东织室、永巷及卫尉等官署机构[①]。

1998 ~ 199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对帝陵东侧的 13 号、11 号和 19 号坑进行了部分试掘。13 号坑为竖穴式长条形土圹，东西长 92 米，南北宽 3 米，深 3 米，坑口距离地表约 8 米。坑为地下隧道式木结构建筑框架，坑内放置排列密集的动物陶俑，按动物的种类可分为 4 个区间。第一区间位于坑的东部，长约 7 米，均为彩绘陶山羊，共 19 排，每排 14 件左右，共计 235 件。陶山羊分黑色和橙红色两大类，体长约 0.4 米，高 0.25 厘米，躯体肥壮，表情温顺，颌下有长长的胡须。第二区间位于第一区间的西侧，长约 7 米，放置彩绘陶狗 28 排，每排 19 ~ 20 件，共计 458 件。陶狗身长 0.3 米，高 0.18 米，躯干粗短，丰满圆润。陶狗从性别上可分为雌、雄，从物种上分为狼狗和家狗两类，有黄、白、灰、黑、橙五色，部分陶狗嘴巴和鼻子上还涂有红彩。第三、四区间在第二区间的西部，长度相当，近 8 米。北半部为第三区间，出土 6 排 33 件彩绘陶绵羊，绵羊身长 0.41 米，高 0.44 米，有黑色和橙红色两种，肥硕可爱，栩栩如生。第四区间位于第三区间的南侧，出土两



图 25　汉阳陵陪葬坑发掘出土的动物俑　（编写组供稿）

① 焦南峰：《汉阳陵从葬坑初探》，《文物》，2007 年第 7 期。

排 54 头小乳猪，小乳猪长 0.16 米，高 0.06 米，分为黑色和白色两种，竖耳长嘴，憨态可掬。在此层动物之下有木板相隔，木板之下还有一层彩绘陶动物俑，因第一层动物俑没有提取，故不能进行下层清理。

第 11 号坑长 74 米，深度、宽度、结构等与 13 号相同。试掘了其中的 24 平方米，发现面向东门的骑兵 4 列、木车两列。其中木车居中，骑马分列两侧，出土骑马俑 26 件，彩绘木马 17 件，木车 4 辆，铜、铁质兵器和车马器百余件。第 19 号坑长 20 米，深度、宽度、结构等与 13 号坑相同。试掘了其中的 12 平方米，出土木马 4 匹、木车 1 辆、武士俑 20 件、动物俑 10 多件，铜、铁质兵器和车马器及陶器等 30 余件。排列顺序是木马在前，木车居中，武士俑两边护卫，动物俑及陶器等放置在车后两侧。

此外，在 16 号、18 号坑上部的盗洞中清理出“太官之印”、宦者俑等，为确定这些从葬坑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

陵园外陪葬坑，分为南区陪葬坑和北区陪葬坑两处。南区陪葬坑位于帝陵东南 400 米、王皇后陵正南 300 米处。其范围东西长 320 米，南北宽 300 米，共有陪葬坑 24 条。坑皆为南北向的长条形和“中”字形，共 14 行，行距 20 米，每行坑数不一，最少 1 个，最多 6 个。坑宽一般为 4 米，个别的宽 10.5 米，深 7 ~ 8 米。长度分为三级，其中长 120 ~ 291 米的 8 座、长 68.7 ~ 86.8 米的 3 座、长 25.3 ~ 50 米的 13 座。陪葬坑均为地下隧道式木框架结构，竖穴式的坑体中部稍向内收分，南北两端有向外延伸的斜坡。

6、8 号坑位于南区陪葬坑的东半部，分别长 291 和 288 米，是最长的两个坑，其中斜坡道和一部分坑体被压在公路路基下，长约 15 ~ 23 米。1990 年 5 ~ 8 月对其进行了清理，出土陶俑头 527 个，仅能复原 27 个。此外还有铜、铁质的兵器、农具、工具、车马器、衣饰和铜钱等文物 3500 余件（枚）。17 号坑位于南区的西部，属于第 12 行，总长 37.4 米、宽 3.14 ~ 5.2 米、深 7.2 米，其南、北两端各有长 7.6 米和 6 米的斜坡道。坑内的遗迹和遗物可分为两区，北区放置马、车、俑，南区为粮仓，两区之间以木板相隔。北区长 5.2 米、宽 2.8 米，其中放置两乘彩绘木马车，每车驾 3 马，均面向东。一号车后和两侧有武士陶俑随从，均持戟拥盾，身佩长剑，横行排作 8 行，面东，车右为粮食残迹。二号车位于一号车的后面，车前有一组 22 件

成套的铜量器，后面排列陶井和灶各一件，还有朱红漆的木柄 1 件，似为旗杆。两乘木车马中，二号车被压得非常散乱，车轮和车軎严重移位，舆侧挂着合拢的伞，车上有铜弩机两件和箭镞等。一号车较完整，驾 3 匹马，车上有铜弩机两件和承弓器 1 副、木俑两件。车复原为双辕带圆形伞盖的轺车，通长 160 厘米、宽 100 厘米。舆平面为长方形，宽 54 厘米，进深 65 厘米，底为网状结构。

20、21、22、23 号陪葬坑位于南区陪葬坑最西一排，由南向北依次排列，间距 11 米。均为竖穴式条形土圹，坑体为隧道式的土木结构。坑的南北两端有斜坡通道。从葬坑的构筑方法是：坑底东西两侧设有纵向的地栿，木栿上立方柱（截面 35 厘米 ×33 厘米），柱间距 3 ~ 4.2 米，嵌以侧木，垒高 0.5 ~ 1.8 米，同柱顶齐；坑底横铺木板，长 2.5 ~ 3.75 米、宽 0.13 ~ 0.26 米、厚 0.03 ~ 0.05 米，两侧的枋木上横架棚木，棚木上铺设芦席，上填黄土，粗略夯筑，填土同汉代地面平齐。在 4 个从葬坑中，第 22 和 23 号坑盗扰严重。共出土完整陶俑 368 件，俑头 320 个。完整陶俑一般高 62 厘米，均头戴武弁，身穿战袍铠甲，肩膀处有圆孔连接木质胳膊，个别陶俑的木手还依稀可辨。陶俑头扎朱红色丝绸陌额，腿裹朱红色行滕，战袍覆于膝盖之下，用米黄、白、灰、橙红、棕褐色的丝绸制作，下宽上窄，有一宽 0.8 厘米的袍带束腰，有的袍带以很小的贝壳串成两排。战袍之外套铠甲，铠甲片原用木片制作，现已朽，仅存棕红色和黑色的痕迹。



图 26　汉阳陵陪葬坑出土的陶俑　　（编写组供稿）

第 20 号坑南北全长 49.6 米，其中主坑体长 29.49 米、宽 4.5 米、深 8 米，南、北坡道分别长 6.93 米和 12.72 米。坑内遗存分南、北两部。南部为排列整齐的车马武士俑群，坑长 14.89 米、宽 3.4 米，其中横向排列穿袍擐甲彩绘陶俑 55 行，每行 3 ~ 16 件，共 363 件，另有木俑 21 件。陶

俑左右前后间距均为 0.1 米，其脚下设 0.17 米见方的木质踏板，个别陶俑的左侧配铁剑，或背着铁凿、铁锛、锯、刨刃等工具。前、中部俑均站立，后面的陶俑有站、步行、弯腰奔跑等姿势。陶俑胳膊为木质，或下垂、或前伸、或曲臂。坑西南有一南北向放置的兵器架遗迹，上面有 10 件带铜镦的长柄铁戟。东南角还出土了一件形似炉台的陶器。整个俑群是拥车而行。坑北部长 14.6 米、宽 3.4 米，内置 4 个朱红色的长方形大漆木箱，木箱南北两两相对，长 6.6 ~ 7.27 米、宽 1.1 ~ 1.33 米、高 0.3 ~ 1.2 米。箱外侧用铁条作网状固定，内、外均涂红漆，箱内有佩剑执盾的陶武士俑、成捆的带柄长矛、兵器架及兵器、生产工具、农具等。21 号坑平面呈“中”字形，主坑体南北长 10.4 ~ 12.4 米、宽 10.8 米、深 7 米，南、北坡道分别长 10 米和 7.5 米。主坑体内置一四角竖立柱的方形大木椁，其中用木板隔成许多木框和区间，每个木框内所置器物各不相同。一般均有漆盘或盘数件，多者达 16 件。盘内盛放的多为生活用具，有陶罐、温酒器、鉴、带钩、杈、量、铁管、铁削和红色颜料、蓝色琉璃珠等。有的木框中有成组的陶器，如罐、盆、甑、盘、温酒器等，有的器内还装有粮食，并放置铜量器。有的木框内的陶俑佩剑拥盾，背有成串的半两铜钱。有的框内分置家畜家禽。另外，坑体西南另附有一木箱，内置车马。箱呈东西向的长方形，长 2.43 米、宽 1.66 米、高 1.2 米，在其内东部清理出 4 匹枣红色木马，马后有车迹及铜车饰等。在木车中部偏北的车舆之上，有一副撑开的圆形大伞，车舆左前方出土承弓器两副，右侧出土铜弩机 4 件、铜镞 61 枚。从残存的现象看，箱内有两车 4 马，车后有陶俑两件，似为驭手。

阳陵北区陪葬坑位于帝陵西北，其面积、坑数、行数、排列均同南区。这些陪葬坑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可能与西汉时的“南军”“北军”有一定关系。汉代列侯、大将军等勋贵大臣死后，皇帝往往赐冢地葬具，发轻车介士列阵送葬至墓所，阳陵出土的武士俑群正是“御林军”为景帝送葬的模拟图。西汉一代，至少有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张安世、孔光、王凤等 6 人享此殊荣[①]。

阳陵南部和西部分布有 5 处建筑遗址。其中罗经石遗址位于帝陵东南。此处地形隆起，外貌呈缓坡状。遗址平面近方形，边长 260 米，外围有壕沟环绕。遗址中心部分的最高处放置着

① 黄展岳：《秦汉陵寝》，《文物》，1998 年第 4 期。

一块方形巨石，当地群众称之为“罗经石”，罗经石是用整块黑云母花岗岩雕凿而成，南北长183厘米、东西宽180厘米、厚40厘米，石面上刻有直径140厘米的圆盘，其中刻有十字凹槽，槽宽、深均为2.3厘米。经测定，十字线所指为正南北方向。遗址中部是一夯土台基址，边长54米，共12个门，每边3门，四周有砖铺地面、卵石散水、四神空心砖以及瓦片堆积层。罗经石遗址是汉阳陵陵园中最重要的礼制性建筑之一。关于罗经石遗址的性质有多种说法，一说它是汉代修建阳陵时的测量基点[①]，一说它是建于陵园内的“社”[②]，一说它是陵庙[③]，一说它是寝[④]，一说它是一处祭祀遗址[⑤]，一说它属于明堂式建筑[⑥]。



图27　汉阳陵“罗经石”遗址同帝陵（左侧）、后陵（右侧）封土　　（摄影：郑茂良）

阳陵邑内发现有大量烧造的建筑材料和生活用具的陶窑，出土大量的砖、瓦、井圈等建筑材料，清理出多处房屋建筑遗迹[⑦]。此外还发现有“阳陵泾乡”“泾置阳陵”瓦当，以及阳陵丞印、

① 董鸿文：《阳陵罗经石的实测和研究》，《测绘通报》，1995年第6期。

② 韩伟：《罗经石乎？太社乎？》，《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

③ 王学理：《太社乎？陵庙乎？》，《文博》，2001年第5期。

④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⑤ 王占奎：《试论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祭祀性特征》，《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⑥ 李零：《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⑦ 汉阳陵博物馆：《汉阳陵博物苑》，文物出版社，2006年。

阳陵令印、栎阳丞印、霸陵左尉、南乡、渭等封泥，还发现有儿童墓地。

1997 年 3 ～ 7 月和 2000 年 10 ～ 12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阳陵考古队先后两次对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总面积 4200 平方米，发现大型建筑遗址一组，出土了以各类建筑材料为主的陶、铁、铜质文物 700 余件，取得了较为重大的科研成果。经过发掘得知，汉景帝陵园南门遗址东西全长 134 米，南北宽 10.4 ～ 27.2 米，总面积 2380 平方米。整个遗址布局规整，结构严谨，东西对称，气势宏大。南门遗址由门道、门道东西两侧对称的建筑群及廊道、散水等组成，门道位于遗址的正中，与帝陵陵园的南北向中轴线重合，平面呈长方形，南北进深 27.2 米，东西面阔 5 米。由于长年的人为破坏和自然雨水的冲刷，门道处曾形成一条东西宽约 3.5 米，南北贯穿的自然排水沟，使其细部结构难以得知。但从现存迹象分析，门道和其东西两侧的建筑物大致应处在同一平面上，底部为建筑之夯土基础，地面有方砖铺地，其上应有屋顶葺盖，中部还可能设置有门槛、门户。南门遗址东西两侧的建筑群以门道之中线为对称轴，夯土台、廊道、散水乃至踏步台阶、柱槽的位置相互对应，形制结构完全相同，规模大小基本一致，充分体现了汉代建筑的对称原则。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平面形制从陵园围墙向中央门道有三次从小到大递增的凸出，也即“三出阙”，是当时最高级别的门阙结构[①]。

阙是中国古代设置在城垣、宫殿、祠庙、陵园大门的高层建筑物。因这种建筑一般左右分列，对称建设，中间形成缺口，好似建筑物的大门，故称阙门或阙楼。它最初的功能为军事防御、登高望远，后来逐渐演变成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此外，据古书记载，古代的人臣上朝经过阙门时，总要自省、反思自己的缺点。这种说法虽然有些“望文生义”，但却透露了阙门作为礼制性建筑在精神方面的功用。汉代帝陵封土四周均有垣墙，每面垣墙中部均筑有阙门。这些阙门多为土木结构，楼基和墩台均系夯筑，外用砖包砌，然后在墩台上面建楼。汉阳陵南阙门是由一组两座三出阙相连接构成，三出阙的平面由大小依次递减的三个长方形组成。所谓三出阙，就是由高低大小不同的三个阙组成的三重阙，是古代阙门的最高等级。在汉代，一般官员只能用一对单阙，诸侯王可用一对二出阙，三出阙只有皇帝才能使用。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 5 期。

2011 年 4 月考古工作者对汉阳陵“正门”东阙门进行发掘，也是三出阙。共发掘 400 平方米面积，发现了 26 米长的草拌泥墙皮，上面还带有 3 层彩绘，这清楚地表明这里曾经历大规模维修或重建，后被一把大火烧过后废弃。挖掘结果显示：东阙门比南阙门保存状况好，据了解，这些草拌泥墙皮是当时回廊的墙面，呈青色。这层墙皮厚度约 10 厘米，由两层构成，每层厚度约 5 厘米，由此可推测出东阙门在使用过程中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维修或重建。



图 28　汉阳陵东门阙遗址　（摄影：郑茂良）

目前汉阳陵是考古工作者进行考古调查发掘最多的陵墓，基本上了解了汉代帝陵的布局，以后的汉代帝陵也基本上遵从阳陵布局结构，故被称为“阳陵模式”。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阳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72 年，陕西省博物馆发掘清理阳陵刑徒墓地，揭开了阳陵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

1990 年 5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修建的考古钻探中发现从葬坑数座，随即组建汉陵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和进一步的钻探，发掘出大量彩绘裸体陶俑，并发现了南区从葬坑。

1991 年春，汉陵考古发掘成果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1997 年 6 月开始，阳陵队为配合高陵县泾河工业园区的建设，对阳陵陪葬墓区进行了大

规模的考古钻探，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陪葬墓园，并发掘了其中的部分墓葬，出土了大批汉代珍贵文物。

1997 年 10 月，阳陵队与斯洛文尼亚文物保护中心合作在阳陵南区 8 号从葬坑（局部），进行文物保护示范工程。

1998 年 9 月 14 日，阳陵考古陈列馆破土动工。

1999 年初，陕西省政府投资 1.6 亿元征用了汉阳陵封土周围 2894 亩文物保护用地，将土地使用权和征地投资债务一并移交陕西旅游集团公司。

1999 年 8 月，陕西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筹建处和筹备处成立，主管上级是陕旅集团公司。

1999 年 8 月，陕旅集团公司汉阳陵筹建处开始修建景区围墙、硬化司马道和馆前停车场、道路等。

1999 年 9 月 30 日，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

2000 年 2 月，受陕西省林业厅委托，太白林业局正式入驻汉阳陵，专门从事汉阳陵的绿化工作。

2000 年 4 月陕西省政府批准《汉文化旅游景区——汉阳陵规划》。陕西省文物局、陕西旅游集团公司联合成立了汉阳陵博物苑规划设计招标领导小组。

2000 年 6 月 30 日，陕旅集团公司发文正式成立汉阳陵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0 年 10 月，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厅建设工程动工。

2000 年 10 月 13 日，省文物局任命焦南峰为汉阳陵考古陈列馆馆长。

2001 年 6 月 25 日，阳陵作为“西汉帝陵”的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 年 5 月 20 日，帝陵发掘现场正式停止对外开放。

2003 年 5 月 1 日，阳陵南阙门遗址保护展示厅正式对外开放。

2003 年 5 月 9 日，经省政府批准，省文物局正式成立汉阳陵博物苑工程指挥部。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汉阳陵考古陈列馆和汉阳陵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3 年 6 月 6 日，国家文物局批准了汉阳陵保护规划中的核心建筑——汉阳陵帝陵外藏

坑保护展示厅的设计方案。

2003 年 11 月 24 日，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试桩工程破土动工。

2006 年 3 月 31 日，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和礼制建筑遗址（罗经石）保护工程正式建成开放。



图 29　汉阳陵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外景　　（摄影：郑茂良）

2008 年 5 月，在全国首次一级博物馆评估活动中，汉阳陵博物馆荣获“国家一级博物馆”称号。

2010 年 10 月 9 日，国家文物局公布汉阳陵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第五节　汉武帝刘彻茂陵

一、墓主生平

武帝刘彻（前 156 ~前 87），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九子，为景帝皇后王娡所生，4 岁时被立为胶东王，7 岁时立为皇太子，在景帝后三年（前 141）正月他 16 岁时即位，到后元二年（前 87）二月他 70 岁时驾崩，在位 54 年，是汉代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汉武帝在位期间，是西汉的鼎盛时期，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但在其在位后期由于徭役兵役的增加，人民负担加重，引起农民激烈的反抗。



图 30　汉武帝茂陵和李夫人陵　（摄影：郑茂良）

文景之治为汉武帝的统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

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人，开拓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西汉联系西域以至中亚等地的通道——丝绸之路。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农轻商政策，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还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在思想上，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长安设太学，使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并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使用人才上，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利用，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形成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格局。

但是汉武帝的晚年，迷信求神仙方士，又因巫蛊之祸造成父子相残、太子刘据自杀，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严重，种种打击使武帝心灰意懒，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颇有悔意。在登泰山、祀明堂之后，武帝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承认自己犯下了错误，改弦更张。天下也因此又逐渐归于和谐，为昭宣中兴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前 88 年，汉武帝叫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下狠心找借口处死了钩弋夫人。前 87 年二月丁卯，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 70 岁。三月甲申葬于茂陵，庙号是世宗。

李夫人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出身梨园世家，父母兄弟都以音乐为业。李夫人兄长李延年，以能歌善舞而为汉武帝赏识，再加上平阳公主的推荐，李夫人得幸于武帝。后生子昌邑哀王刘髆。不久，李夫人罹患重病，武帝亲临病榻看望。但是李夫人认为“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①]。直至逝世都没有以枯槁的病容与武帝相见。李夫人死后，武帝十

①《汉书》卷九十七《李夫人传》，第 3951 ~ 3952 页。

分思念，命画师绘像之外，还邀来方士祈仙求神，作赋哀悼。李夫人生前虽未有皇后之名，但武帝仍以皇后之礼安葬李夫人，并把其陵墓破格置于茂陵之西，称之为“英陵”。

二、营建始末

茂陵，位于汉长安城以西 53 里今兴平市南位乡策村，是咸阳原上西汉帝陵中最西的一座。此地汉代为槐里县之茂乡，武帝在此营建寿陵，故称茂陵。建元二年（前 139）开始修建陵墓，“初置茂陵邑”[①]。建元三年，“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②]。后元二年（前 87）二月丁卯日，汉武帝“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宫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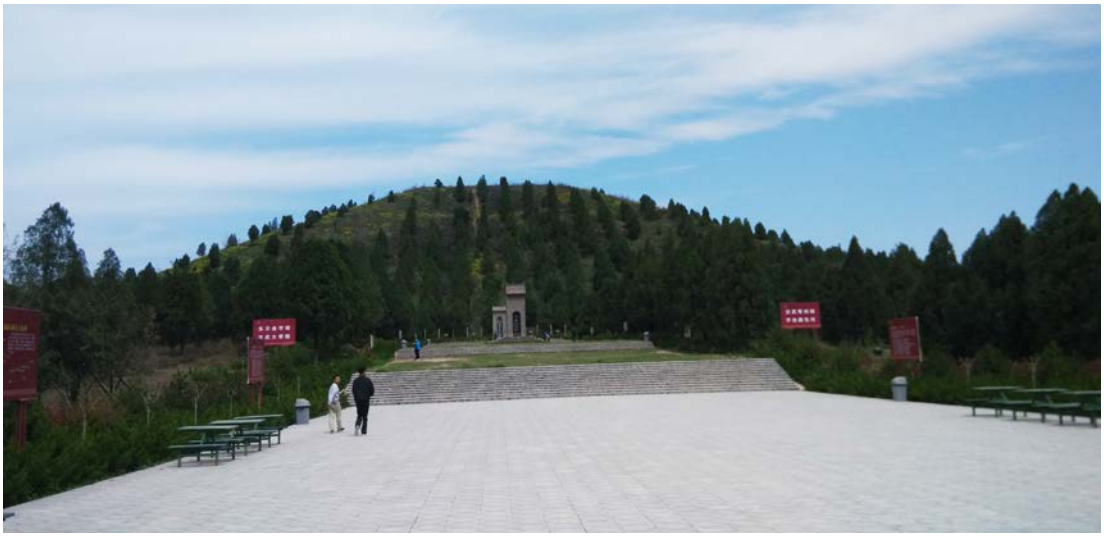


图 31　汉茂陵帝陵封土　（编写组供稿）

茂陵是西汉帝王陵中修建时间最长的一座，汉武帝执政 54 年，茂陵就修了 53 年，汉武帝下葬时，封土上的树木已经可以合抱。茂陵也是西汉帝王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关中记》记载：“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④] 关于茂陵玄宫内的情

① 武帝自作陵。师古曰：“本槐里县之茂乡，故曰茂陵。”《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158 页。

② 关于茂陵邑的位置，《汉书·武帝纪》（第 158 页）苏林注曰：“去长安四十里。”服虔曰：“在长安西北，茂陵东。”师古曰：“便门，长安城北面西头门，即平门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于此道作桥，跨渡渭水以趋茂陵，其道易直，即今所谓便桥是其处也。”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第 211 ~ 212 页。

④ 刘庆柱：《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119 页。

况，《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①]。由于茂陵营筑时间很长，武帝死时，茂陵内的陪葬品多得已经放不进去。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打开了茂陵的羡门，成千上万名起义军兵士搬取陵内陪葬品，搬了几十天，但“陵中物不能减半”[②]，由此可见茂陵陪葬品之多。

茂陵陵园平面基本呈正方形，垣墙现地面基本未存，从东边的断面上可以看到一部分垣墙的夯土，夯层厚 5 ~ 8 厘米。经钻探，垣墙均夯筑而成，宽 6 ~ 8 米。东墙长 426 米、南墙长 414 米、西墙长 425 米、北墙长 420 米。垣墙四面中部皆有门阙，现东、北、西三边地面仍保存有鱼脊形的门阙基址，上面有瓦片等遗物密布。阙均呈三出结构，东门阙之南阙长 50 米，宽 10 ~ 32 米，北阙长 50 米，宽 9 ~ 27 米，门道宽 10 米。南门阙之东阙长 44 米，宽 16 ~ 28 米，西阙长 43 米，宽 16 ~ 26 米，门道宽 11 ~ 12 米。西门阙之南阙长 48 米，宽 12 ~ 30 米，北阙长 44 米，宽 12 ~ 30 米，门道宽 9 米。北门阙之西阙长 55 米，宽 11 ~ 29 米，东阙长 54 米，宽 12 ~ 30 米，门道宽 8 米。在距离封土底边 5 ~ 10 米的位置，以 3 ~ 5 米的距离布设探孔，在封土东面、南面中部各发现墓道一条，北面、西面钻探没有发现墓道。东墓道平面呈梯形，长 28 米（封土外面的长度），东端宽 8 米，西边靠近封土处宽 20 米。南墓道平面略呈刀形，长 62 米，南端宽 6 ~ 11 米、北端宽 12 米，南半部突出一道，可能是后来破坏的孑遗。

李夫人墓称“英陵”，在茂陵西北 525 米，位于今兴平市南位乡范家村。据《长安志》卷十四引《三辅黄图》记载：“李夫人墓东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墓冢外形为两层台，古代“英”有“重”的意义，“山形两重者名英”，也就是“再成”为“英”。李夫人墓称“英陵”，当源于此。经钻探，在李夫人陵封土东部偏南发现墓道一条，墓道长 33 米，东端宽 21 米，西端宽 30 米。另外，在其封土南部钻探出陪葬坑 4 条，坑口距离地表两米，北端直接伸入封土底下，宽 4 ~ 6 米，长 6 ~ 18 米。

据文献记载，陪葬于茂陵的有卫青、平阳公主、霍去病、金日磾、霍光、董仲舒、公孙弘、

①《汉书》卷七十二《贡禹传》，第 3070 ~ 3071 页。

②（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三十《索綝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51 页。



图 32：李夫人“英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李延年、上官安、上官桀、敬夫人，以及京兆尹曹氏等。此外，象大侠原涉这样的豪杰也在茂陵“买地开道”、“治冢舍、奢僭逾制”[①]。这些陪葬墓的方位，有的文献记载比较具体明确，如卫青、平阳公主、霍去病、金日磾、霍光及上官氏家族等。其余则不太清楚。茂陵陪葬墓主要分布在茂陵以东，位于陵园东司马门道的南北两侧。

卫青墓在茂陵以东 900 米，是离茂陵较近的陪葬墓之一。该墓坟丘形如庐山，庐山也名颜山，系当时匈奴辖境内的大山，卫青曾在此立下赫赫战功，把卫青墓修成庐山状，是对卫青战功的纪念。霍去病墓的封土建成祁连山的形状。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上陈列着石人、石马、石虎、石象、石牛、石鱼等。茂陵以东 4000 米，兴平县西吴乡陈阡村有今传霍光墓，墓前原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的碑石。在该墓以东 500 米曾发现大面积西汉时代的建筑遗址，还有部分壁画遗迹，以及云纹和文字瓦当。其中出土的“加气始降”“屯泽流施”和“道德顺序”等文字瓦当，为过去所少见。霍光生前预作寿墓，其茔制已经超过规定，是按照当时皇帝葬仪的规格营建的。今兴平县南位乡策村东南 250 米，茂陵东北 652 米有一墓冢，当地群众称“次冢”，相传为董仲舒墓。公孙弘墓在茂陵东北约一里处。《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七记载：李延年墓在兴平县东北 18 里。除了朝廷的达官显贵、皇亲国戚陪葬茂陵，一些大官和豪富也争相

①《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中华书局，1964 年，第 3716 ~ 3118 页。

葬在茂陵附近，如京兆尹曹氏和巨豪原涉。

茂陵陪葬坑分陵园内陪葬坑和陵园外陪葬坑两处。

陵园内陪葬坑共钻探出150条，围绕茂陵封土呈放射状分布。其中封土东面37条，南面34条，西面39条，北面40条。坑平面为长方形，最长的98.5米，最短的仅3米。宽度大多在4米左右，最宽的7米，最窄的仅1.4米。坑内发现的遗迹遗物有板灰、木炭、漆皮、烧土、陶器残片、铜锈、铁锈等。陵园外陪葬坑共发现244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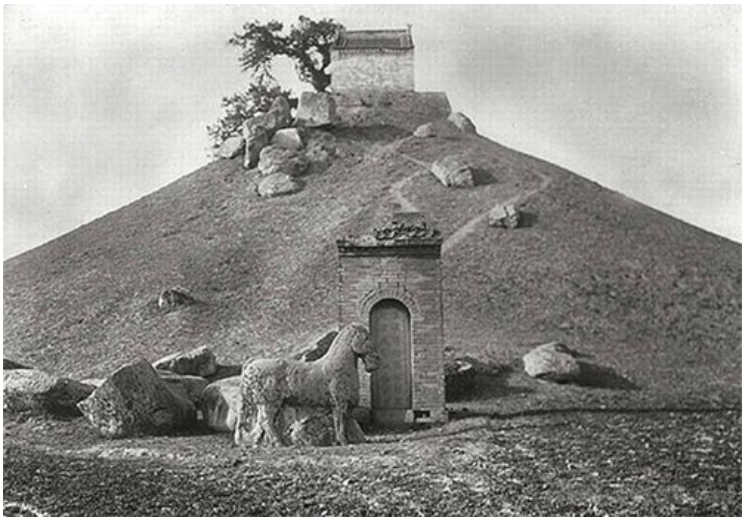


图33 1914年法国诗人和考古学家维克多·谢阁兰拍摄的霍去病墓

陪葬坑坑口一般距离地表1.3米，其中的填土经过夯打。陪葬坑的平面基本上为长方形，也有少数梯形者和极个别曲尺形者。根据其相对于茂陵所处的位置，可分为西部、西南和东北三区。

西部陪葬坑区位于茂陵陵园外西部200米处，共钻探出陪葬坑两组22条，以西门道路为中心，基本呈对称分布，皆东西向平行排列。两组陪葬坑间距108米。其中路北一组有9条，呈南北向一列分布；路南一组有13条，作南北向的两排分布，两排间距8～34米。这个区的陪葬坑一般宽3米、长31～42米，其中最长的14号坑长91.5米。坑与坑的间距多在9～12米。

西南陪葬坑区位于茂陵陵园外西南部，共钻探出陪葬坑56条，以南北向排列为主，可分为北、东、西三组，其中北组陪葬坑距离茂陵最近，位于茂陵陵园南墙外60米左右的南司马道两侧，东西向平行排列，同陵园的南墙相互平行。大体以南司马道为中心对称分布，共发现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2期。

5 条，平面皆为一端宽、一端窄的长条形，宽端向外，窄端居内，呈发散状。其中东部三坑的东端均被现代公路所压，具体长度无法得知。这一组中的 23 号坑最长，东西达 150 米，西端宽 8.5 米、东端宽 3 米。72 号坑略呈西北—东南向，东端伸入公路下。

东组陪葬坑位于茂陵西南、南司马道的西侧，距离陵园西南最近 150 米，距离南司马道最近约 60 米。这一组陪葬坑基本上南北向平行排列，坑的平面多为长方形，长度多在 62 米以上，大体上可分为南北两排，其中穿插有 29、31 号两条长达 174 米和 169 米的长坑。这一组陪葬坑以南端 66、67、68 三条东西向的长坑作为边界，东端的 25、65 号坑基本连成一体，似为东边的边界。其中的 66 号坑东西长 242 米、宽 4 ~ 5.5 米。

西组陪葬坑位于东组陪葬坑紧西部，由 15 条排列整齐、长短相近、平行排列的南北向陪葬坑和 4 条东西向陪葬坑组成，现地面残留有废弃的现代砖瓦窑和大面积的取土坑，将第 6、7 条陪葬坑破坏，断面上还残留有陪葬坑的形状和两侧的洞室。

东北陪葬区位于茂陵陵园外的东北部，共钻探出陪葬坑 37 条，可分为东、北两组。东组距离东司马道及陵园东墙最近均 90 米，钻探出陪葬坑 16 条，共有四排。前三排皆呈东西向平行排列，最后一排只有一条，为南北向的长坑，长 221 米、宽 4 米，距离陵园最远，也代表着东边的界限。距离陵园较近的三排东西向陪葬坑间距很近，甚至相互穿插，第一排 4 条，坑与坑之间的距离较大；第二排 8 条，排列整齐，间距均匀，坑的长度相当；第三排 3 条，坑间距 8 ~ 10 米，长 57 ~ 60 米，宽 3 ~ 3.5 米。北组距离北司马道最近约 50 米，离陵园北墙 150 米，其靠南偏西位置分布两排南北向的陪葬坑 14 条，两排之间最近距离仅 5 米。南排 8 条较长，北排 6 条较短，坑间距 10 米左右。其中靠近公路的 98 号坑已被现代民居所覆压。这组陪葬坑的最北部分布着两排东西向的长坑，标志着陪葬坑的北界。靠西的一排有 3 条坑，西端距离现在的 13 号公路 65 米，长 111 ~ 124 米，宽 2.5 ~ 3.5 米。靠东的一排有 3 条坑，距离西排仅 9 米，其中的 107、108 号坑长度分别为 252 米、259 米，宽 3 ~ 4 米。最北边的 109 号坑平面呈曲尺形，长度为 50 米、18 米，宽 2.5 ~ 4 米。另外在这组坑最南端偏东位置的 89 号坑，南北长 15.5 米、东西宽 3 米。

茂陵邑位置，据《长安志》卷十四记载，以兴平县为基点，茂陵在其东北 17 里，茂陵邑

在其东北 19 里。这就是说，茂陵邑应在茂陵以东 2 里。今兴平市南位乡道常村东窑匠沟以西，白鹤馆遗址以东，渭惠渠以北，茂陵至霍去病墓东西路以南，以瓦碴沟为中心一带常出土大量汉代文物，其中砖、瓦建筑材料最多。过去认为，茂陵邑或许就在这一带，从这一带的西汉建筑遗迹和遗物分布情况来看，其范围东西 1500 米，南北 700 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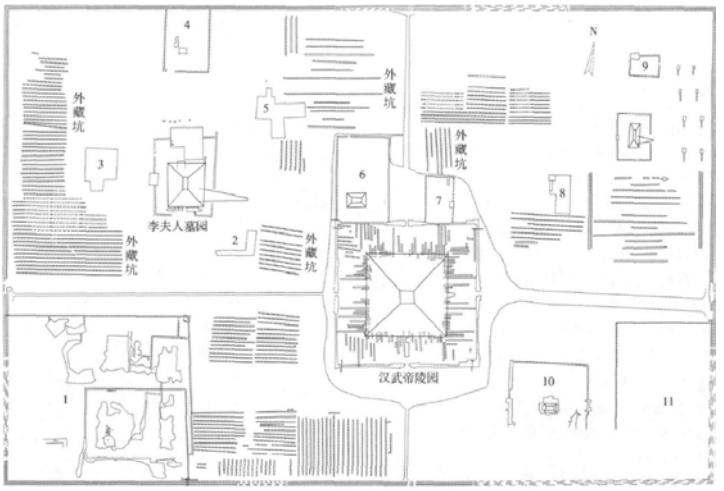


图 34　汉武帝茂陵陵园平面示意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2 期）

据最新钻探材料，茂陵邑应位于茂陵的东北。茂陵邑平面呈曲尺形，四周没有围墙而是围绕有沟渠。南渠西端在道常村西北的大土壕内，基本上沿着东司马道的走向向东延伸，一直到最东端一座陪葬墓的紧西端，保存比较完整。东西长 1830 米，渠宽 3 ~ 6 米，深 4 米，两壁较平直。其中的堆积为红褐色的淤土等，包含物较少，为粗绳纹瓦片。西渠从道常村西北的土壕起点，经过金日磾墓东侧，往北一直到史村东北，南北长 1650 米，然后又折而向西延伸 1300 米，再折而向北 810 米，基本上是在茂陵北司马道的东部。渠宽 4 米，距地表深 1.8 ~ 2.2 米，填土中钻探发现棕褐色胶泥土和泥沙，以及绳纹瓦片。东渠南北长 2450 米、宽 4 ~ 6 米，南边从陪葬墓的东端向西 300 余米、东司马道的北部 70 多米处，往北经过陈仟村东部一直到陈村的东部。北渠在宇家庄北部 250 余米处，同东、西渠相连接的部分长 3150 米，其走向同南渠一致，相互平行，渠宽 8 米、深 4 米，其中的堆积同南渠一样，泥沙土层较厚，土色红褐，往东一直延伸至夏家寨东部后又折向东北 800 余米，至一大片低洼地处消失。往西渠道逐渐变浅，一直通至南位乡南韩北村西部380米处的一个大土壕而消失。北渠总长达11.53公里，宽6 ~ 8

①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66 页。

米，深 3 ~ 4 米。渠内填棕褐色胶泥以及泥沙土，夹杂少量黑灰点、粗绳纹瓦片及陶盆残片等，土质密实坚硬，渠底及两边有 15 ~ 20 厘米的水渗土。北渠同南渠南北相距 2450 米，经钻探，北渠南部发现有较多的瓦片、路土等，渠北土层则比较纯净。

在其东南角往西 292 米处的南渠内侧，钻探发现了一个蓄水池，水池形状不规则，南部同南渠相连，东西最长 96 米，南北最宽 90 米。有一沟道从水池的中部南北穿过，沟道西侧的断面上发现汉代陶俑十余座。

结合《水经注》的记载和其他汉陵的钻探成果，应该就是西汉的茂陵邑遗址。茂陵邑周长 11190 米，总面积 5536500 平方米。陵邑的设置是经过事先规划的，与陪葬墓、建筑遗址等统一而协调地分布于茂陵陵区内。陵邑的西北钻探发现两条平行的南北向道路，道路间距 60 米、宽 6 米，距离地表 1 米。路土厚 1 ~ 2 厘米，路土下为红褐色土层及原始黄土。道路两侧发现不相连的局部踩踏面[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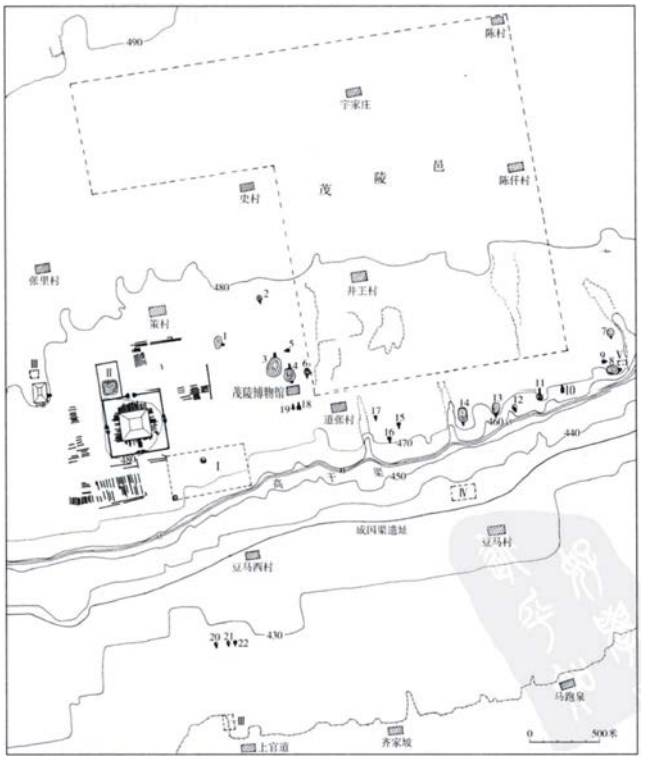


图 35　汉茂陵钻探调查平面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三、陵园变迁

建元二年（前 139），汉武帝征募工匠、徭役数万人，在槐里县（今陕西省兴平市）茂乡，开始修建茂陵。

元狩六年（前 117），骠骑将军大司马冠军侯霍去病病逝，葬茂陵东侧 1 公里处，墓像祁连山。

① 刘卫鹏、岳起：《茂陵邑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1 期。

元封五年（前 106），大司马大将军长平侯卫青病逝，葬茂陵东北一公里处，墓像庐山，与霍去病墓并列。

后元二年（前 87）二月，武帝巡游，病逝于周至五柞宫，殡未央宫前殿，逝后 18 日，葬于茂陵。“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李夫人墓迁至茂陵。

《汉书·元帝纪》：“元帝初元三年（前 46）茂陵白鹤馆灾。”①

《旧唐书·虞世南传》：新莽地皇四年（23），赤眉军入长安，破茂陵取物，犹不能尽②。汉建武二年（25），赤眉军退走长安，西行途中盗掘茂陵。

《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建武六年（30）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③。

《后汉书·郎顗传》：顺帝永建元年（126）秋，茂陵园寝灾。炎光炽猛，惊动神灵④。

《后汉书·五行志》：顺帝永建三年（128）七月丁丑，茂陵园寝灾⑤。

汉初平元年（190），董卓遣吕布盗掘茂陵。

唐僖宗中和元年（881），黄巢率农民起义军攻入长安，派兵盗掘茂陵。

《明史·五行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月壬子，茂陵火⑥。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地方官吏在霍去病墓前竖石碑一座，保存至今。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孟秋，陕西巡抚毕沅为茂陵和李夫人、卫青、霍去病、霍光等墓前各竖石碑一通。今霍光墓碑已损，其余完好。

1931 年，西京筹备委员会负责人张继在霍去病墓北设立茂陵小学，于校内设立茂陵办事处，胡际平为主任，负责管理文物，并在墓南面两侧，修建两座瓦房，将 9 件石刻移至室内。

---

①《汉书》卷九《元帝纪》，第 282 页。

②《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第 2568 页。

③《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 48 页。

④《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传》，第 1055 页。

⑤《后汉书》志第十四《五行志二》，第 3294 页。

⑥（清）张廷玉撰：《明史》卷二十九《五行志二》，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68 页。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茂陵位于兴平市南位乡张里村、策村和道常村之间。1962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人对茂陵进行了勘察[①]。1973 ~ 1975 年，茂陵周围村民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于茂陵东部发现四神空心砖、青玉铺首、琉璃璧以及大量的文字瓦当[②]。

1981 年 5 月，兴平市西吴乡豆马村社员在一号无名冢南边 60 米处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座从葬坑（编为一号坑）。陕西省文物局随即组织发掘，并在一号无名冢周围进行了大面积的钻探和勘察工作，得知周围尚有 38 个坑和 4 座墓葬，并发掘了一号坑。一号坑为土洞式结构，这种形式在已发掘的西汉从葬坑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对研究西汉墓葬营建方式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料。出土了鎏金铜马和鎏金鎏银竹节熏炉等 230 多件文物。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 2003 年 6 月 23 日开始，对茂陵及其周围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调查，至 12 月 30 日结束，历时 6 个多月。完成了茂陵陵园、陵园内外的陪葬坑、建筑遗址、陪葬墓的钻探任务，明确了茂陵各个遗迹的具体范围和大体形制，并且发现了茂陵邑，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茂陵邑问题。



图 36, 汉茂陵出土的鎏金铜马　（编写组供稿）

2009 年 9 月开始，考古工作者对汉武帝茂陵的两座陪葬坑进行考古发掘，陆续发掘出 80 具成年马骨。两个陪葬坑的发掘是汉武帝茂陵 400 余个陪葬坑中的两个，其形制一个是由斜坡通道与坑体两部分组成，另一个则是由斜坡通道、坑体与洞室三部分组成，各自出土了 40 具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兴平县茂陵勘察》，《考古》，1964 年第 2 期。

② 王志杰、朱捷元：《汉茂陵以及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 年第 7 期。

马骨。编号为 MDNK26 的有洞室的陪葬坑是一个具有 20 个洞室的巨大坑体，其四壁向下内收，坑体东西两壁下部各开挖 10 个窑洞，相对错位排列，其中每个窑洞内放置着两具马骨，大多数的窑洞内放置着 1 件陶俑。



图 37　汉茂陵出土的砖阙　　（编写组供稿）

研究成果：

咸阳地区文管会、茂陵博物馆：《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从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 年第 2 期。

王志杰、边希贤：《茂陵志》，三秦出版社，1997 年。

王志杰：《汉武帝与茂陵》，三秦出版社，2007 年。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6 期。

刘卫鹏、岳起：《茂陵邑的探索》，《考古与文物》，2008 年第 1 期。

焦南峰、杨武站、曹龙：《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文物》，2008 年第 12 期。

王志杰：《茂陵名胜》，陕西旅游出版社，2009 年。

雷百景、王亚庆、李雯：《霍去病墓石雕刍议》，《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2 期。

张文玲：《茂陵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铭文铜器》，《文物》，2012 年第 2 期。

五、遗迹和遗物

国家“十一五大遗址保护规划”西汉帝陵保护项目之一的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和勘探取得了丰硕成果。探明了茂陵陵区的基本布局和组成部分以及文物遗迹的性质内涵等，发现了埋藏有各类陪葬品的外葬坑 394 座，包括陵庙、寝殿在内的大小遗址 14 处，确定了为汉武帝守陵而设置的茂陵邑的位置和范围，探明大中型陪葬墓 120 余座，此外，还发现了修陵人的墓地，面积约 4 万平方米，估计埋葬尸骨两万具以上，对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茂陵所在位置明显高出周围地面，封土呈覆斗形，位于陵园的正中，封土四个斜坡面上遍植翠柏，东面、南面正中略有下陷，北面正中靠近顶部有一道冲沟，西面保存相对完整。封土底边东长 243 米、西长 243.2 米、南长 238 米、北长 240 米，高 48.5 米。顶面中部下凹，东边长 36 米、南边长 41.6 米、西边长 39.2 米、北边长 41.7 米[①]。陵园平面基本呈正方形，园墙现地面基本未保存，从东面的断面上可以看到一部分园墙的夯层，夯层厚 5 ~ 8 厘米。园墙四面中部皆有门阙，现东、北、西三边地面仍保存有鱼脊形的丘状门阙基址，上面瓦片密布，荆棘丛生。南面门阙地面没有保存。

茂陵南边有石碑二通，标志一通。碑一上题铭：中为“汉孝武帝茂陵”；上款为“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陕西巡抚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级毕沅敬书”；下款为“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知兴平县事顾声雷立石”。碑二上题铭：中为“茂陵汉武帝刘彻之墓”；上款为“国务院 1961 年 3 月 4 日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款为“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1963 年 3 月立”。标志上题铭：中款为“茂陵”；上款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下款为“时代：西汉”“国务院总编号：第 165 号”“古墓葬分类：第 4 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 1962 年 12 月 9 日”。

茂陵东南一公里，今瓦渣沟一带，曾出土琉璃璧、玉铺首、画像砖和各种文字瓦当。画像砖的纹饰有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的“四神”图案。半透明的深蓝色琉璃璧，面饰谷纹。十二字瓦当面径 19.3 厘米，四周文字为“与民世世，天地相方”，中央为“永安中正”。青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2 期。

玉铺首，面饰浮雕，其高 34.2 厘米，宽 35.6 厘米，厚 14.7 厘米。这种巨型青玉铺首，应是大门上的装饰性物品，但绝非一般建筑上所使用的。上述物件可能是茂陵寝园中的建筑遗址。



图 38　汉茂陵四神纹玉铺首　　（编写组供稿）

茂陵众多陪葬墓中，霍去病墓最重要，而它又以其墓前雄伟的成组石刻而闻名于世。霍去病墓前共有 17 件石刻，除了墓前陈列着“马踏匈奴”和“跃马”两件外，其他陈列在霍去病墓东西两侧的石刻廊内，这些石刻原来都放在陵墓之上，后因地震等自然原因散落在陵墓周围。石刻题材多样，雕刻手法十分简练，造型雄健遒劲，古拙粗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工艺品，也是汉代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95 年，国家文物局派出专家组对霍去病墓前石刻进行鉴定和审评，依据每件石刻文物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这 17 件石刻中马踏匈奴、卧马、跃马、石人、人与熊、怪兽吃羊、野猪、伏虎、卧牛、卧象、蛙、蟾等 12 件被评定为一级甲等文物，即俗称的国宝文物。其余石鱼两件、石刻题记三件，鉴定为一级乙等文物。在已发现的石刻中，有两件分别刻着“左司空”官署名称的文字题铭，说明这些石刻应该是出于官府工匠之手。以下简要叙述霍去病墓石刻：

1. 马踏匈奴　高 1.68 米，长 1.9 米

这件石刻原位于墓冢之前，公认是霍去病墓石刻群中的主体雕刻。作品题义含蓄而意境博大，可视为朝廷当时决心击溃匈奴主力的象征，是最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它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深刻地揭示出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思想。

雕刻匠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在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剑，双腿蜷曲作狼狈挣扎状，蓬松零乱的须发更显得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带着既不甘心就缚又无可奈何的表情。这一戏剧性的造型，以及如此生动细腻的刻画，显然是用以歌颂霍去病这一英雄人物的业绩，对战败的匈奴给予无情的挞伐，昭示出来犯者的下场。其构思超逸，耐人寻味。 从表现技法上看，马踏匈奴作品是运用了圆雕、浮雕以及线刻的综合手法，使其显得朴实、浑厚，题材处理得相当大胆且巧妙，有丰富的表现力和高度概括性。



图 39　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刻　（摄影：郑茂良）

2. 卧马　高 1.14 米，长 2.6 米

这匹卧马的形象，显然是一匹转战千里、久经沙场的精骑。那修剪得很整齐的短鬃，短而尖的双耳，及惊觉的神态，都流露出作者的此番寓意。马头上仰，似乎在静听远方传来的声音，注视着前面的动静。它迈出一只前蹄、蹄尖紧扣住地面，另一只前蹄略微抬起，后腿也正在用力，这是从卧着姿态转入起身时一瞬间的动作。作品特意选取了由静到动过程中的一刹那，把转瞬即逝的情景捕捉下来，让人感到静中有动，动中有力，浮想联翩，有强烈的艺术效果。

卧马采用的是立体圆雕，躯体丰满，藏着无穷无尽的内在力量。而勾画出肩胛与四肢的那几笔锐利的长线条，技法更为出色，刀痕刚劲并富于弹性，表现出积蓄已久的力量即将迸发的状态，作品格调明朗，洋溢着奋起的健美感。

3. 跃马　高 1.5 米，长 2.4 米

这件大型石刻，将马的体型与顽石的天然形状配合得十分妥帖，有神工鬼斧、巧夺造化之妙。马的胸前用“分层减地”法雕凿成型，其他部位则运用线刻技法，用刀活脱成熟，准确而

生动，一匹骏马腾跃时的一刹那间动作，被刻画得惟妙惟肖。这种锐敏的艺术观察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曾博得无数观者的赞美。跃马的雄姿，唤起人们对古代塞北风光的联想，把视野引向辽阔的草原。这匹骏马四蹄生风，正欲在白云与大漠上奔驰。这件形神兼备的佳作，线条流畅，结构清晰，对马的习性刻画入微，有强烈的动感。

4. 石人　高 2.22 米，宽 1.2 米

石人的艺术风格，带有浪漫主义气息，似一幅漫画。这件石人的比例关系夸张得厉害，它的头和一只右手显得特别大，使人感到奇怪，咧着嘴露出一排牙齿，脸部表情相当奇特，石人的神情似乎是在哀叹，摆着手，仰头望天，眼睁得特别大，但却呆滞无神，这种漫画式的形象令人费解。当然，在霍去病墓上放置这样的石刻，不会是偶尔即兴之作，但它的寓意至今仍像谜一般，有许多不同的揣测，曾有人认为这是描写被缴械后的匈奴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设想具有一定的道理。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件石刻有它独到的地方，它突出了要表现的重点部位，对形体作了极度的概括与大胆的夸张，刀法奔放，似不受任何约束。但细看起来却是一件很认真的作品，即使像手掌上那些纹理，都用线刻勾画得清晰不苟。随意变形而不失形象特征，是这件石刻的一个显著特色。

5. 人与熊　高 2.77 米，宽 1.72 米

一件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石刻作品，以人与熊格斗为题材，描绘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生动画面，由于作了过分的局部夸张，在紧张的气氛里颇带有幽默色调。人在急促之间徒手去击野兽，于荒僻的山间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选用这一题材，也许是为了表现祁连山深处当时那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形势，以比喻霍去病的战功来之不易。

石人体形粗壮，高颧深目，隆鼻大嘴，耸起双肩，以铁钳般的巨手用力抓住一头野熊，熊则紧咬住此人的下唇，斗得难解难分，人被咬的表情，由咧开的大嘴表现出来，显得形象逼真。熊的体型略小，比例关系较为紧凑，和对人夸张雕刻的手法有明显的对比效果。最后收场必然是野兽失败。作者用刀的功力很深，充分发挥线雕的表现力，堪称别具一格。人与熊的雕刻几乎全部采用线刻浮雕的手法，与汉画像石的风格略显相似，但它仍属于借用石块外形制作的圆雕一类。

6. 伏虎　长 2 米，宽 0.84 米

虎的神态机警而威猛，俨然是只吊睛白额大虎，它的项部花皮绷得很紧，肢爪强劲有力，长尾巴卷搭在背上，沉着冷静，突出了猛虎在猎物前的最显著特征。虎的头部，刻画得分外精彩，几道线条，便将这只兽中之王的脸谱勾描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虎的身躯，虽然是利用石块本来的起伏变化略加勾勒而成，但各个细部都交接得很周到，通体采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再加上顺着天然石块的纹理，以线刻勾勒出的斑条，增添了虎身上那特有的彪纹，看上去柔美圆润，给人以雄健、丰满的感觉，此作品属于这群石雕中的精品。



图 40　霍去病墓伏虎石刻　（摄影：郑茂良）

7. 怪兽吃羊　高 2.74 米，宽 2.2 米

由一块天然岩石就石依势雕凿而成，刻画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生死搏斗场面。怪兽为一个庞然大物，显得贪婪而凶残，它正在吞吃一只活羊，羊的一只角尚在怪兽的嘴边，小羊正在用尽气力作殊死的挣扎。通过这样形象对比，在人们面前展示出了一幅以强凌弱、以大欺小、挣扎与反抗的场面，对于两种动物的性格刻画得很动人，是一件艺术感染力很强的作品。

8. 野猪　长 1.63 米、宽 0.62 米

野猪是经常活动在荆棘丛林间的动物。作品摄取的环境，可能是祁连山中人迹罕到之处，山深林密自然会隐藏着一些凶猛的野兽。在这群石刻中，配置野猪的石雕，最能使人们想象当年祁连山战役之艰险。野猪是一块从山岩上崩裂的条石，棱面交接得很清楚，选用这块石头来造型，光与形的对比效果强烈，艺术风格明朗而粗犷。体型大部分采用凿刻手法完成。对野猪头部的加工简略，但却传神，那三角形深陷的眼窝，显得凶残而狡猾，突出很长的尖嘴，伏贴在地上，对口鼻作了一些变形夸张，刻画出窥探动静、随时准备突袭的状态。野猪的背雕刻得

相当锐利，把刚硕的鬃、毛与坚韧的皮质表现得很醒目。整体的比例和结构都处理得很协调，生动逼真。

9. 卧象　高 0.58 米，长 1.89 米，宽 1.03 米

卧象石刻以小圆圈雕出了象的双眼，用弧线勾出耳廓，刀法简练灵活。这些变形之处，更有助于表现小象那憨厚的神态，活泼而又带有几分狡黠，达到了艺术上真实。卧象的身躯，要做到形神兼备，往往需精工雕凿。这头卧象处理得天衣无缝，形态气质皆足，立意简单而新颖，是石刻群中的妙品。

10. 卧牛　长 2.6 米，宽 1.6 米

这尊躯体健硕的石牛，塑造得非常雄大，意态却安详而闲适，正侧首远眺，带着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看到这件作品，自然会领略到《敕勒歌》中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和平景象。由于霍去病的战无不胜，使大漠以南无复烽火，出现了和平稳定的环境。作者通过牛的形象，从侧面赞颂祁连山战役的胜利和霍去病的功绩。作品着力于对牛的性格刻画，对它的蹄角作了适当夸大，以此来显示其矫健顽强有力的一面。同时也略微增宽了额部的比例，由头部神态和嘴的弧度来衬托出一副温顺的表情。牛项下那些松弛的皱纹，被雕刻得格外传神，是牛在饱食之后的反刍现象。牛背上所刻的鞍和镫，表明了此牛是一头用于驮载的快牛。牛的体型和谐，比例匀称，艺术风格朴实淳厚，是这批石刻中有代表性的作品。



图 41　霍去病墓卧牛石刻　（摄影：郑茂良）

11. 蛙　高 0.55 米，长 2.85 米，宽 2.15 米

石蛙是一件匠心独运的雕刻艺术品。蛙的身形利用了石块的平面轮廓，其特征部位却作了精雕细刻，一对鼓得圆圆的眼睛，张着小小的嘴巴。盘石的底色似乎是蛙的天然保护色，“荷塘清且浅，处处听蛙鸣”的夏日景象，通过石刻，就会浮现在眼前，其意境含蓄典雅。作品实

中有虚，以实拟虚，在虚虚实实的创意之外，显露出一种清新的情趣。

12. 蟾　高 0.7 米，长 1.55 米，宽 1.07 米

石刻利用了一块形状和色泽都与蟾相似的岩石，略微加了一些雕琢，看起来酷似一只蹲踞着的蟾的形象，其匠意经营确有独到之处，它不仅只是形状像只蟾，而且具有即将跳动的态势。蟾的眼睛、鼻口，都刻得非常真切，且带着一排锯齿般的尖牙，它的前后肢则略事勾勒，似有似无，在形象上完整而浑厚。

13. 石鱼（1）　高 0.55 米、长 1.12 米，宽 0.45 米

14. 石鱼（2）　高 0.5 米、长 1.12 米，宽 0.41 米

这两件描摹“鱼”的石刻，采用的两方条石，各在其一端用极为简练概括的手法，刻画了鱼的头部。有眼有口、有鳃，看起来生动活泼。修长的石条代替了鱼身，并略去了鱼的尾部，洒脱洁净，富于装饰味道，其他部分棱面整齐，分析认为可能是当时用于承重的基座石。

15. 石刻题记（1）“左司空”　长 2.34 米、宽 2.13 米，厚 0.64 米

这通巨大的石刻字迹以雄健苍劲见胜。“左司空”三个大字，是刻在一尊巨石的右上侧，以表示此石的雕作出于“左司空”官属匠人之手。以此类推，茂陵群雕中大部分作品也为左司空属下雕刻。

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少府属官中有左、右司空令丞。司空为司工的假借字，汉瓦中有“右空”瓦当和“右空”瓦片，就是“右司空”的简称。秦始皇陵地上曾出现“左司空”瓦片，这就表明西汉的“左司空”与秦代官名相同。

汉武时期的少府左、右司空，都是工程管理部门，主要是管理制造砖瓦、雕刻石品等工艺匠人的。至于汉代时铜器、兵器的制造，则由考工令、尚方令主管；木器等的制造由长丞主管；金银漆器等则由各郡国工官主造。西汉此类石刻传世极少，因此这通“左司空”石刻非常可贵。

16. 石刻题记（2）：“左司空”　长 1.24 米，宽 1.14 米，厚 0.39 米

在霍去病墓东南角发现。石面上有竖式篆体“左司空”三字。

17. 石刻题记（3）“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

花岗岩厚 0.43 米，长 2.18 米，宽 0.85 米，正面右下侧刻有“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益”10 个大字，题字严谨，属八分书，惟不带挑法。据《汉书・地理志》：平原郡有乐陵县。这通石

刻出土时，有些字迹非常模糊，一时难以辨认，因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的著述中，有的认为是 8 个字，有的将“牙’误以为‘耳”，有的将“霍巨益”误认为“造”，还有的将“益”误认为“孟”。这不足为奇。随着对此石刻的清理保护和研究，这 10 个刻字被认为当为汉代平原郡乐县的两位官吏或者有些身份的人士在参观霍去病墓时留下来的刻记。此石历经风雨沧桑传至今日，也属十分珍贵。

在阳信公主墓随葬坑中出土了鎏金铜马、鎏金鎏银竹节铜熏炉，以及铜提链炉、温手炉、灯、钟、甗、甑、盆、匜、鼎、温酒器、斗、虎镇等铜器。

鎏金铜马：高 62 厘米，长 76 厘米。铜马昂首站立，张口，竖耳。马的肌肉和筋骨匀称合度，造型朴实稳重。鎏金铜马作站立状，情态神骏。昂头，口微张，有牙齿 6 颗。兔颔龙眼，劈竹形双耳，耳间有鬃毛，颈上也刻鬃毛。腹部卷缩，马尾根高耸成弧形下垂。前腿刻三角纹两处，马蹄坚实有弹性。马尾和生殖器是另铸铆接或焊接的，肛门有一小通气孔。马身中空。马的肌肉和筋骨的雕刻符合解剖比例，马体匀称适度，造型朴实稳重。铜马通体鎏金，表面光洁度很高，鎏金匀厚，通体金光灿烂，达到了高超的艺术水平。从铜马工整的外貌、紧缩的腹部、端正的肢体来看，是乘用马品种的体形。尤其两耳及两耳间的鬃毛以及劲健而稳重的体态，尚保留秦俑坑兵马俑的一些风格，鎏金铜马是西汉时马的标志。鎏金铜马的创作时代应在西汉中期前后。西汉以来，由于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需要大量骑兵，又需要大量马匹从事耕作和运输，故而在中央王朝的提倡下，中原各地大规模养马，养马之风渗透到了西汉社会的各个阶层。这种风尚也影响到了埋葬制度。一些比较富有的贵族，在朝廷不允许随葬马匹的情况下，就在墓葬中大量随葬马俑。这件鎏金的马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茂陵一号陪葬墓的。从作品的造型艺术上来讲，匠人的手法严谨，工艺精湛，鎏金均匀，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造型罕见的艺术瑰宝。熏炉通高 58 厘米，底径 13.3 厘米，口径 9 厘米，盖高 6 厘米。熏炉炉盖形如博山，透雕多层山峦，加之金银勾勒，给人一种云雾缭绕、恍若仙境之感。支撑炉体的是竹节形高柄，共五节，每节有竹叶枝杈。柄上端铸有三条蟠龙，龙头承托炉盘。龙身鎏金，龙爪鎏银，线条流畅活泼，形象生动自然。底座上透雕的两条蟠龙，翘首张口。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 35 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

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刻铭文 32 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从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前 136），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



图 42　熏炉炉盖口外侧刻铭文一周　（摄影：郑茂良）

李夫人陵位于茂陵封土西北 504 米处。所在地势东面较高，北面、西面相对较低。封土呈覆斗形，中部四面留有二层台，台面东宽 5 ~ 7 米，南宽 5 ~ 10 米，西宽 3 米，北宽 3 ~ 5 米。二层台距离顶面的斜坡距离为 32 米。二层台距离地面的斜坡距离为 28 米。二层台外边封土的边长为 84 ~ 89 米，内面边长 65 米。封土的底边东西长 114 米，南北长 131 米，顶部东西长 21 米，南北长 40 米。

李夫人陵西北 48 米处发现一建筑遗址，遗址南北长 50 米、东西宽 38 米。西半部基本被毁，断面上暴露出一段宽 8.6 米、高 3.1 米的夯土台基，台基上保存有一块长 0.8 米的天然卵石柱石。台基下面的夯层比较厚，为 12 ~ 25 厘米，上面的夯层很薄，一般为 5 ~ 8 厘米，有的仅厚 3 厘米；夯土台基北面为厚 12 ~ 40 厘米的夯层，往北一直延伸至边缘，表面呈斜坡状。夯土台基南面 1.4 米处有一道宽 4 米的夯土墙，夯层厚 5 ~ 10 厘米，均匀密实。夯土墙往南 1.15 米处距离地表 1.05 米的位置，有一道宽 0.85 米的卵石散水，散水下 0.6 米处残存用条砖铺成的地面。散水再往南 8.3 米处，是一段宽 2.05 米的方砖铺地面，砖面距地表 1.3 米。周围散见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残片、砖块及卵石等建筑材料。

茂陵周围也发现几处建筑遗址。其中 1 号遗址位于茂陵陵园外东南部，其范围东西长约

550 米，南北宽约 260 米，遗址内现存有“压石冢”“白鹤观”两个高台建筑以及“瓦渣沟”遗址，地面上多见绳纹瓦片、砖块、卵石等，钻探还发现有夯墙等。此地原来是一个北高南低的斜坡，1973 ~ 1975 年平整土地时，将北部较高的地点削低，将南部垫高，形成现在的形状。“压石冢”位于茂陵东南部的台地边缘，略呈覆斗形，底边东西长 49 米，南北宽 45 米，顶部东西长 6 米，南北宽 5 米，高约 9 米。上面有数块巨大的天然卵石，应为柱础石，高台上及周围散见大量的绳纹瓦片、砖块等。在“压石冢”东北 300 米处，也有一高台建筑，底边东西长 47 米，南北宽 35 米，高约 3.5 米；顶部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30 米。台上及周围散见大量绳纹瓦片。武帝时修建的白鹤观可能位于 1 号遗址内。《汉书・五行志》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园白鹤馆灾。……明年，白鹤馆灾。园中五里驰逐走马之馆，不当在山陵昭穆之地。”师古曰：“五里者，言其周回五里。”[①]5 号遗址位于茂陵封土南部偏东 2000 米处的上官道村西北部，遗址范围东西长 150 余米，南北宽 100 米，其西部被砖厂取土破坏。在遗址内发现不少灰坑和数座陶窑。其中一座陶窑平面呈长方形，窑门朝东，窑室东西长 3.2 米、南北宽 1.4 米，窑壁厚 14 厘米，窑室内摆放着近 10 排堆放整齐的叠筑范，同汉长安城西市遗址出土的叠筑范[②]相同。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残片、云纹瓦当、空心砖、陶器口沿残片等。

在陈仟村南面的沟道西侧断面 170 米长的范围内，发现 8 座陶窑残存。陶窑的南部为一形状不太规则的水池遗迹，可能是专为陶窑提供水源的蓄水池。陶窑平面均为馒头形，窑床平面呈长方形，后面设 3 个烟道。窑 1 残高 2.3 米，火膛距离窑床最深 0.8 米，窑床长 2.4 米，烟道内宽 0.86 米，壁厚 12 ~ 19 厘米。窑 4 保存比较完整，窑前有较长的斜坡道，窑体总长 5.6 米，底部最宽 2.6 米，顶部宽 1.08 米，残高 3.86 米。窑门高 0.9 米。火膛为斜坡凹底形，最深 0.8 米，水平长 1.5 米。窑床比较平整，长 3 米。窑后设 3 个烟道，烟道上窄下宽，底部最宽 0.44 米，残高 2.25 米。烟道内壁用砖垒砌，砖宽 21 厘米，厚 8 厘米。窑 5 残存高 2.36 米，顶部宽 1.2 米，底部宽 2.8 米，有 2 个烟道，分别为宽 0.44 米、高 0.31 米和宽 0.34 米、高 0.26 米。窑 6 残长 4.1

①《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第 1335 ~ 1336 页。

②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81 页。



图 43　汉茂陵“压石冢”遗址　　（摄影：郑茂良）

米，高 1.75 米，仅保存有窑的底部和一部分烟道。窑 7 南北向，窑内朝北，从窑门至烟道长 5 米，残高 2.5 米。窑门宽 0.8 米，高 1.26 米，拱形顶。火膛长 1.18 米，最深 0.5 米，窑床长 2.5 米，烟道底部内径 0.55 米。另外，在陶窑蓄水池西南 170 米、茂陵东司马道紧南部，发现 3 座陶窑，其形状与陈仟村沟道内的陶窑基本相同。

陵邑遗迹在东距茂陵 1.1 公里的陪葬墓的东侧、茂陵东司马道的北部，包括今道常村的北部、井王村、陈仟村、宇家庄的广大范围内，均发现有丰富的绳纹瓦片、云纹瓦当、砖块、陶器口沿残片、井圈、下水道等遗物，断面上暴露出大量的灰坑，其中的包含物均为常见的汉代建筑材料、生活器具，尤以井王村、陈仟村、道常村东北部最为丰富。

陪葬墓主要分布于茂陵东司马道南北两侧和陵邑的东西两边，墓道以南向为主，东向、北向常见，西向仅一座。司马道南侧是主要陪葬区，共有包括霍光墓在内的 12 座墓葬，墓道以南向为主。司马道北侧有陪葬墓 7 座，墓道以北向居多，其中包括卫青、霍去病、上官桀、金日磾等名臣的冢墓。

卫青、霍去病墓的墓道均朝北。卫青与长公主平阳合葬，“起冢象庐山”[①]。卫青墓的封土为覆斗形，封土北面有一二层台，底边东西长 87 米，南北长 110 米，封土南面有毕沅树立的“汉大将军大司马长平侯卫公青墓”石碑。

①《汉书》卷五十五《卫青传》，第 2490 页。



图 44　汉茂陵陪葬墓—金日磾墓　　（编写组供稿）

霍去病墓前保存有大量石刻[①]。霍去病墓的南面、茂陵东司马道南部有两座大型墓葬，墓道皆朝北，其中东部的一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过发掘，西边的一座 2003 年钻探调查时发现，地面封土已不存。霍去病墓东部的一座封土，据说是金日磾的墓葬，封土为覆斗形，底边东西长 34 米，南北宽 44 米。

在茂陵陪葬墓区的最东部、司马道的南边靠近原边的位置，有一座覆斗形封土，突兀高耸，可能就是霍光的墓葬。《东观汉记》云：“霍光墓在茂陵东司马道南四里。”[②] 墓冢封土底边东西长 58 米，南北宽 50 米，高约 20 米。南边的断面上发现大面积的夯土层，最高处达 3 米，夯层厚 6 ~ 15 厘米。可能是墓室的填土或者是保护封土的设施。在霍光墓东北部，现地表残存有一南北长 35 米、东西宽 32 米、高 0.6 ~ 1 米的高台，上面及周围发现有大量的绳纹瓦片、素面砖块、卵石及回纹铺地砖等。据当地村民讲，原来平整土地时，曾在霍光墓周围发现大面积的壁画和不少柱础石等，应当是祠堂内的装饰。汉书记载霍光死后，“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

① 王子云：《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1 期。

②《后汉书》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 104 页。

五十篋，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藏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左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阵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①]。

霍光墓对面的一座墓葬据说是上官桀的，封土为覆斗形，顶部比较浑圆，底边东西长 49 米，南北宽 27 米，高约 7 米。墓道在封土南部偏西，长 36 米、宽 6 ~ 14 米。

另外，在茂陵西部的陈王东坡和西坡、陈王村发现不少墓葬，封土基本被平，其中有的可能是茂陵的陪葬墓。在茂陵南部偏东 1000 多米处，有 3 座墓葬东西排列，间距很近。其中两座有封土，最东边的一座封土被平。钻探发现，3 座墓葬的墓道皆在南边，其是否是茂陵的陪葬墓，有待进一步的资料证明，陪葬墓的具体情况详见“茂陵陪葬墓统计表”。

表三　茂陵陪葬墓统计表[②]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	备注
1	茂陵封土东北 600 米处，策村东南 400 米处	覆斗形，底边南北 72 米、东西 31 米，顶部南北 28 米、东西 1 米，高 15 米	东西偏南。长 24 米、宽 8 ~ 12 米	—
2	卫青墓正北 300 余米处	覆斗形，底边南北 16 米、东西 27 米；顶部南北 8 米、东西 13 米，高 15 米	南向偏东。长 26 米、宽 2 ~ 6 米	—
3	茂陵东部略偏北 850 米处	覆斗形，北部有二层台。底边南北 110 米、东西 87 米，顶部南北 15 米、东西 4 米	北向。长 20 米、宽 3 ~ 8 米。封土东面北边有一长 10 米、宽 3.5 米的陪葬坑	卫青墓
4	卫青墓紧东侧 50 余米处	覆斗形，封土东、西两面有天然大卵石。底边南北 95 米、东西 60 米；顶部南北 16 米、东西 9.5 米	北向偏东。长 36 米、宽 6 ~ 24 米。封土南面偏东有一陪葬坑，坑宽 6.5 米，伸出土外 13 米，北端深入封土下	霍去病墓
5	霍去病墓后 100 米，茂陵博物馆宿舍区内	已平	西向。长 32 米、宽 8 ~ 14 米，位于墓室西边北端	传说是霍去病的衣冠冢

①《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第 2948 页。

②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56 ~ 57 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	备注
6	霍去病墓紧东侧	覆斗形，底边东西 34 米、南北 44 米，顶部东西 3 米、南北 10 米，高 5 米	南向偏西，墓道呈曲形，南北长 87 米、宽 10 ~ 22 米	传说是金日磾墓
7	陪葬墓区最东侧北部，茂陵东 3．3 公里处	覆斗形，顶部较圆。底边东西 49 米、南北 27 米，顶部东西 16 米、南北 7 米，高约 7 米	南向南北长 36 米，南端宽 6 米、北端宽 14 米	传说是“上官桀”墓
8	陪葬墓区最东侧南部，茂陵东 3．3 公里处	覆斗形，底边东西 58 米、南北 50 米，顶部东西 17 米、南北 13 米，高约 20 米	东向，长 54 米，东端宽 8 米、西端宽 16 米	封土北部偏东残存一建筑遗址。据说是“霍光墓”
9	8 号墓西 60 米处	已平。墓室上部塌陷一直径 5 米、深 2 ~ 3 米的大坑	东向。长 25 米、宽 3 ~ 6 米。墓道同墓室之间有两米宽的隔梁	墓室平面为正方形，边长 8 米
10	8 号墓西 200 米处	残存太少，形状不明。仅余一东西 30 米、南北 11 米，高 2 ~ 4 米的平台	北向。宽 2.5 米，长度被毁不详	—
11	8 号墓西 300 米处	圆丘形。底径 35 ~ 41 米，高约 10 米。北部 1/3 被毁	北向。长 25 米、宽 2 ~ 8 米	—
12	10 号墓西 150 米处	圆丘形。残存底径 60 ~ 64 米，顶部 5 ~ 8 米	南向。长度被毁不详，宽 4 米	东侧偏南发现一宽 4 米的陪葬坑
13	12 号封土西 100 米处	覆斗形。底边东西 53 米、南北 50 米，顶部东西 8 米、南北 7 米，残高约 11 米	南向。长 26 米、宽 3 ~ 6 米	—
14	13 号墓西 180 米处	覆斗形。南高北低。底边东西 64 米、南北 95 米，高 22 米	南向偏东。长 50 米、宽 7 ~ 16 米。周围发现陪葬坑 38 条	俗名“羊头冢”，1981 年发掘，出土鎏金铜马、竹节熏灯等珍贵文物
15	道常村东边沟道的东部台地上	已平	南向。长 18 米、宽 2 ~ 4 米	墓室 7 米 ×9 米
16	15号墓西南，靠近原边	已平	南向。长 23 米、宽 2.5 ~ 4 米	墓室 7 米 ×8 米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	备注
17	道常村东边沟道的紧东侧	已平	南向。长 18 米、宽 2 ~ 4 米	墓室 7 米 ×8 米
18	茂陵博物馆门前偏东位置	已平	北向。数据不详	省考古所曾进行过发掘
19	茂陵博物馆门前偏西位置	已平	北向。长 30 米、宽 3.8 ~ 5 米	墓室 6 米 ×7.2 米，深 11 米
20	上官道村北 300 米处	覆斗形。底边 36×33 米，顶边 10×15 米	南向。长 30 米、宽 6 ~ 12 米	—
21	20 号封土东 60 米处	覆斗形。底边 35×33 米，顶边 12×11 米，高约 10 米	南向。长 26 米、宽 3 ~ 8 米	—
22	21 号封土东 27 米处	已平	南向。长 28 米、宽 2 ~ 4 米	墓室东西 8 米，南北 9 米
23	留位村南 300 米处	覆斗形。底边 30 米 ×32 米，顶边 5 米 ×8 米，高约 8 米	南向。长 36 米、宽 4 ~ 8 米	—
24	陈王西坡东 200 米处	已平	南向。长 12 米、宽 2 ~ 6 米	墓室边长 14 米
25	陈王西坡西部	已平	东向。长 19 米、宽 2 ~ 4 米	墓室边长 10 米，当地俗称“太阳冢”
26	陈王西坡西南	已平	南向。长 16 米、宽 1.5 ~ 3 米	墓室 7 米 ×8 米

另外，茂陵附近的建筑遗址，主要分布于茂陵东南部。白鹤馆遗址是其中之一。此地现存夯台基址一处，附近遍布汉代砖瓦残块、红烧土等。这个基址西南 50 米，曾出土过玉圭、玉璧等。茂陵东南 350 米的“压石冢”遗址，可能是白鹤馆中一座重要的高台建筑。白鹤馆周围五里，用于“驰逐走马”。汉元帝初元三年（前 46）曾遭火灾。白鹤为“仙禽”，又是长寿象征，陵寝之地的建筑，取名“白鹤”恐与此有关。

武帝的陵庙称“龙渊宫”，或名“龙渊庙”“孝武庙”。龙渊宫建于汉武帝元光三年（前 132）。传世的元朔二年（前 127）制造的“龙渊宫行壶”“龙渊宫壶”和元朔三年（前 126）制造的“龙渊宫鼎”，都应是龙渊宫的遗物。据说，武帝放入茂陵的西胡康渠王所献的玉箱和

玉杖，以及他生前喜爱的几十卷图书，后来都被人盗走。查获后，宣帝把它们也送到孝武庙中。据历史文献记载，龙渊宫位于茂陵以东，平陵以西。在茂陵邑以东 5 里，毗邻平陵。

茂陵的寝园遗址位于茂陵陵园外西北 140 米处，同陵园相连，其南墙利用了陵园的北墙，西墙同陵园的西墙相连，稍微朝内收缩，东墙位于北司马道西 40 米处，走向同陵园西墙基本平行。平面呈长方形，四面有夯筑垣墙，现地面没有保存，经钻探得知，南墙宽 6 米，东墙宽 5 米，北墙宽 3 米，西墙宽 7 米。寝园南北长 243 米，东西宽 154 米，遗址内南部偏西位置现存一东西长 55 米、南北宽 43 米、高 5 米的高台建筑，上有天然柱础石、绳纹瓦片等。

修陵人墓地位于茂陵陵园以西约 4 公里的南位镇陈王村南。20 个世纪 70 年代，当地群众在平整土地时发现大量戴铁制刑具的骨架，据当时在场的人讲，这些骨架埋葬凌乱，头向不一，有的甚至几具骨架叠压在一起，还有个别为半跪半蹲姿势。茂陵博物馆收藏有少量当年在此采集的铁刑具。2007 年 10 月考古工作者在陈王村南约 1500 米处展开了调查和钻探，在大约 4 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大量埋葬密集的小型墓葬。这些墓葬长 1.8 ~ 2 米，宽 0.4 ~ 0.6 米，深约 2 ~ 3 米左右，墓葬间隔 0.2 ~ 0.5 米，按此密度推算，估计这片墓地埋葬尸骨在 2 万具以上[①]。

通过对茂陵及其周围遗迹的钻探，茂陵的大体布局基本清晰。从陵园形制、陪葬坑的设置、陪葬墓和陵邑的安排等方面来看，茂陵多沿袭阳陵建制但又有较大突破，帝陵的中心地位格外突出，具体地表现为墓葬封土的高大、陪葬坑数量的增多、陵邑形状的变化等方面，这同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加强、儒术的独尊息息相关，也同武帝在位日久、国力强盛有关。茂陵的建制应该是代表了西汉帝陵设计和建设的高峰，它既是集其以前西汉帝陵的大成，又深刻影响着其后西汉帝陵的规划和布局[②]。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茂陵博物馆：《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2 期 。

②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6 期。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茂陵文管所成立。所址位于茂陵东侧 1 公里处霍去病墓前。

1961 年 3 月 4 日，国务院公布茂陵、霍去病墓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63 年 1 月 11 日，兴平县豆马村村民赵振秀在村北土壕起土时，发现西汉珍贵文物铜犀尊，积极交献国家，后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一级甲等文物。

同年 5 月，茂陵文管所陈列室整修完毕，16 件西汉大型石刻开放展出。

1967 年 6 月上旬，一伙“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人员抢占霍去病墓作为据点，并扬言“破四旧”，企图砸烂文物，茂陵文管所工作人员为保护文物安全，在当地群众帮助下，挖三处深 9 米，面积均为 15 平方米的地窖，并在石刻周围用土坯砌墙，以使石刻免遭毁坏。

1976 年 7 月，国家文物局在茂陵文管所召开全国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

1977 年，由国家投资，对茂陵文管所进行了整修、扩建。盖起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文物陈列室一座，陈列面积 315 平方米。

1979 年 12 月，茂陵文管所升格为茂陵博物馆。

1980 年，茂陵博物馆自筹资金 45000 元，修建第二座仿汉建筑风格的文物陈列室。

1980 年 3 月，法国考古学家密特朗参观茂陵博物馆，并将其父 1914 年拍摄的霍去病墓及墓前石刻照片两幅转交茂陵博物馆收藏。

1981 年 5 月 1 日下午，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群众在茂陵三号无名冢南 60 米处平整土地时，



图 45　汉茂陵寝殿遗址　（摄影：郑茂良）

发现汉从葬坑一座，茂陵博物馆对该从葬坑进行发掘清理，共发掘出文物 236 件，其中有一级甲等文物鎏金铜马、竹节熏炉两件，一级乙等文物 37 件。

同年，在茂陵博物馆附近 16 个村及厂矿、机关、学校，先后建立文物保护小组 55 个，发展文物通讯员 269 人，形成了一个以茂陵陵区为重点的文物保护网络。

1989 年 2 月 19 日，武帝陵派出所成立，主要负责茂陵田野文物安全和周围自然村的治安工作。2 月，霍去病墓东西两侧石刻长廊建成。

1989 年 3 月 8 日，茂陵博物馆珍贵文物展览正式对外开放。

2000 年 6 月 16 日，霍光墓文管所成立。

2006 年 8 月 11 日，李夫人墓文管所成立。

2007 年 8 月 16 日，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陕西段专家考察团考察茂陵。

2008 年 4 月 8 日，《汉茂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经咸阳市政府 2008 年第 37 次常务会议通过，代市长庄长兴签署第 42 号令，于 2008 年 5 月 1 日施行。

2008 年 12 月 10 日，《汉茂陵保护管理规划》经陕西省专家评审通过，并报国家文物局审批。

2012 年 5 月 23 日，汉茂陵遗址保护工程建设项目开工仪式在茂陵举行。

第六节　汉昭帝刘弗陵平陵

一、墓主生平

刘弗陵（前 94 ～前 74），是汉武帝和赵婕妤之子。武帝晚年，身染重病，为了稳定政局，匆匆立年仅 8 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武帝遣侍中奉车都尉、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佐少主。武帝去世后，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昭帝于公元前 87 ～前 74 年在位，当时霍光左右朝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副焉”。

昭帝初年，北方的匈奴对西汉王朝大举入侵。加之连年自然灾害，社会越发动荡不安。汉昭帝遵从武帝遗诏，由霍光辅政。燕王刘旦等阴谋叛乱时，刘弗陵和霍光君臣相互信任，在朝廷安危的关键时刻，平定了政变，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其后，昭帝在霍光辅助下，沿用武帝末期的严刑峻法，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及冤案、官吏失职等事宜，处置纵容反叛的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等人。并先后四次察举贤良，任命杨敞为相，隽不疑为京兆尹等，明经治狱。因内外措施得当，使得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退趋势得以扭转。西汉自文景之治后被武帝穷兵黩武政策所耗空的国力开始得到了恢复，为“昭宣中兴”揭开了序幕。

汉武帝时期施行的盐铁官营、酒榷均输等经济政策，是在反击匈奴、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这些政策逐步使一部分财富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及大商人手中，而剥夺了中小阶层的利益。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始元六年（前 81）二月，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双方就民间疾苦的原因、对匈奴的政策、施政方针和治国理念等多方面展开了激烈交锋，史称“盐铁之议”。会议虽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争论双方的观点对昭宣时期汉王朝的统治政策还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



图 46　汉平陵“东陵”封土　　（编写组供稿）

主流上看，大权在握的霍光基本上坚持了汉武帝轮台罪己诏中所制定的政策，推行“与民休息”的措施，将公田让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提出的“行仁政 ，以德治国”的意见。贤良文学也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政治舞台上一股活跃的力量。在昭帝一系列措施下，汉武帝奢侈无度、连年征战所导致的“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形势终于得以显著扭转。因此，昭帝之世，“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元平元年（前 74）夏四月癸未，昭帝刘弗陵暴死于未央宫，年仅 21 岁，六月壬申，葬平陵。

孝昭上官皇后生于前 88 年，始元四年（前 83），由霍光和上官桀立为皇后。上官皇后是霍光外孙女、上官桀孙女，15 岁开始守寡，宣帝即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建昭二年（前 37）病逝，合葬平陵。

二、营建始末

传说汉昭帝平陵在咸阳市秦都区周陵乡新庄，陵前有毕沅树立的“汉昭帝平陵”碑石。关于昭帝平陵地望，文献记载很清楚，上述传说和碑文显然是张冠李戴。平陵应与茂陵毗邻。《水经注》卷八记载：成国渠由西向东流过咸阳原南面，沿途所经的西汉诸陵，依次为：茂陵、平陵、

延陵、渭陵等。再说夏侯胜被“赐冢茔、葬平陵”[①]，该墓与茂陵最东面的上官桀、上官安墓只距 20 步。茂陵位置可以肯定，今传平陵与茂陵之间尚有两组大汉陵，与《水经注》记载不同。今传新庄的平陵与茂陵东西相距 33 里，与《汉书・外戚传》中颜师古注引《庙记》记载的距离相差悬殊。茂陵东邻的一组汉陵，在咸阳市秦都区大王乡大王村，今传为汉哀帝义陵和汉平帝康陵，陵前并有毕沅书写的哀帝义陵和平帝康陵的碑石。从西汉时代帝陵制度来看，帝、后合葬，同茔不同穴。今传义陵与康陵相距 700 米，可能是一位西汉皇帝与其皇后的合葬陵墓，这就排除了它们是两座帝陵的可能性。根据这组汉陵与茂陵的相对位置来看，它们应为昭帝和孝昭上官皇后的合葬陵墓——平陵。

平陵的所在地在咸阳二道原较靠近原边的一块稍微突出的平地上，海拔在 481 ~ 483 米之间。两座封土东西相距 685 米，南北间距 2 ~ 15 米。由于帝、后的位置存在争议，所以在一些文献中分别称之为东陵、西陵。现今经文物考古部门调查勘探，已基本明确东陵为汉昭帝陵、西陵为上官皇后陵。

东陵陵园所在地势中部高、四周低，高差 1.5 米左右。陵园的地面均经过夯筑，层层提升，钻探至距离地表 6 ~ 7 米才发现生土。陵园平面为四方形，四面皆有夯筑垣墙。东墙、南墙的墙基在断面上有部分暴露，其余的地面无存。经钻探，垣墙宽 4 ~ 6 米，外边东墙长 404 米，西墙长 429 米，南墙长 416 米，北墙长 428 米。垣墙四面中部建有门阙，东、南二门阙地面尚存高近两米的鱼脊状堆积，上遍布荆棘和瓦片。以东门阙最宽大，东门阙长 70 米，宽 14 ~ 60 米，门道宽 6 米；西门阙长 40 米，宽 15 ~ 30 米，门道宽 8 ~ 10 米；南门阙长 48 ~ 54 米，宽 18 ~ 34 米，门道宽 9 米；北门阙长 50 米，宽 16 ~ 36 米，门道宽 10 米。封土位于陵园中部，现南面和东面的中部自上而下均有条状凹陷，封土底面边长 164 ~ 170 米，顶部边长 40 ~ 42 米，高 32 米。封土底边距离垣墙 115 ~ 126 米。经钻探，封土外四面中部均发现有平面呈梯形的墓道，东墓道长 66 米，东端宽 10 米，西端宽 30 米；北墓道长 51 米，北端宽 8 米，南端宽 13 米。墓道内填土为红褐色的五花夯土，其中杂有个别小陶片和灰渣。

西陵陵园和封土的形制皆同东陵。陵园东边长 380 米，西边长 386 米，南边长 370 米，北

①《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第 3159 页。



图 47　汉平陵“西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边长 381 米，垣墙宽 4 ~ 6 米。垣墙四面中部开有门阙，东、南门阙现地面有高 0.5 ~ 1 米高的鱼脊状堆积。门阙长 30 ~ 60 米，宽 10 ~ 30 米，以东门阙最为宽大。东门阙长 49 ~ 56 米，宽 10 ~ 28 米，门道宽 18 米；西门阙长 30 米，宽 12 米，门道宽 12 米；南门阙长 36 ~ 40 米，宽 12 ~ 20 米，门道宽 26 米；北门阙长 52 米，宽 8 ~ 23 米，门道宽 17 米。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底面边长 159 ~ 163 米，顶面边长 45 ~ 48 米，高 30 米。封土底边距离垣墙 100 ~ 108 米。

在平陵周围，曾经分布着上百座古代墓葬，这些是否均为两汉时代墓葬，现在无法断定。但是可以认为，其中相当一部分墓葬不属于平陵陪葬墓，可能是徙居平陵的豪富、官吏们的墓葬，或属于平陵陪葬墓的附葬墓。见于文献记载的平陵陪葬墓有夏侯胜、朱云、张禹和韦贤墓等。其中夏侯胜墓，位于平陵陵区最西面，与茂陵陪葬相邻。朱云墓，在平陵东郭外。张禹墓在延陵西面的肥牛亭部。还有韦氏家族的韦贤、韦玄成悉葬平陵。

平陵邑为汉昭帝所置。西汉宣帝本始元年（前 73）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本始二年（前 72）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①]。《长安志》云，平陵故城在咸阳界。《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陕西二》记载，“平陵县与茂陵城相距二里。”东汉以后，曹魏黄初元年（220）改平陵县为始平县。西晋泰始二年（266）又设置了始平郡，领始平、槐里、武功、户县等。苻坚当政时，把始平县城迁到茂陵县城，平陵地逐渐废弃。

①《汉书》卷八《宣帝纪》，第 239 ~ 242 页。

平陵邑位于平陵东，其范围西自平陵，东至北上照村，南起渭惠渠，北到庞村一带。东西和南北长约 1500 ~ 2000 米。“王氏一斗”铜鼎出土于庞村一带。主人“王氏”应是平陵邑的豪富或贵族。考古调查发现，在西陵陵园以东，上帝王村以西，渭惠渠以北，东西 900 米、南北 400 米范围内，有大量西汉砖瓦遗物和汉代建筑遗迹。这里可能是平陵邑的中心地带。

三、陵园变迁

《后汉书·孝桓帝本纪》，桓帝延熹六年（163）“秋七月甲申，平陵园寝火”[①]。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1978 年和 1980 年，咸阳市博物馆曾派人对平陵、平陵邑及其陪葬墓进行过两次调查[②]。2001 年 6 ~ 12 月，为配合过塘至双照的公路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位于过双公路上的 3 座陪葬坑进行了发掘[③]。2001 年 7 月 9 日，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平陵进行钻探调查，10 月 2 日结束，此次调查基本上弄清了平陵的大体布局和基本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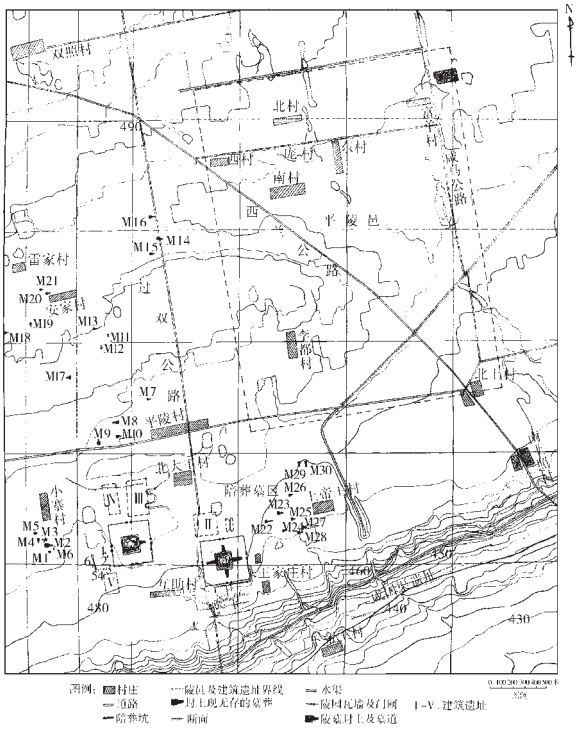


图 48　汉昭帝平陵平面布局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5 期）

研究成果：

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汉平陵考古队：《巨型动物陪葬少

① 《后汉书》卷七《孝桓帝纪》，第 311 页。

② 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③ 汉平陵考古队：《巨型动物陪葬少年天子——初探汉平陵丛葬坑》，《文物天地》，2002 年第 1 期。

年天子——初探汉平陵丛葬坑》，《文物天地》2002 年第 1 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5 期。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年。

五、遗迹和遗物

平陵西边陵墓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其边长分别为 160 米、49 米，封土高 29 米。封土上部距顶垂距 2.25 米处，封土四边内收形成二层台，东西台宽 4 米，南北台宽 3 米。东边陵墓封土底部为方形，边长 150 米。顶部平面东西长 25 米，南北长 30.5 米，封土高 26.2 米。

建筑遗址共发现 5 处，其中 1 号和 2 号是东陵的寝园遗址，3 号和 4 号是西陵的寝园遗址。1 号遗址南北长 90 米，东西宽 40 米，其中发现大量涂朱的绳纹瓦片以及砖块、云纹瓦当等，经钻探发现有夯土。2 号遗址东西长 210 米，南北宽 206 米，钻探发现大面积的夯墙、砖瓦等，地面上发现有大量绳纹瓦片及卵石、墙皮等。3 号和 4 号遗址位于西陵陵园外北司马道东西两侧。3 号遗址南北长 320 米，东西宽 190 米，东面已延伸至大王村西的土壕内，断面上暴露出 5 个灰坑和两段夯墙，钻探发现多重曲折的墙体，经过对其中一座灰坑的清理，出土有大量陶盆、瓮的口沿残片以及陶罐、壶、石磨盘等。其中不少陶盆口沿和陶瓮肩部刻有文字和符号，文字以吉语为主，如“山石大吉”“金公大吉”“日富昌”等，符号以抽象的“鱼”形和数字为主。此外，还发现了用朱砂在陶盆上绘画星宿或者书写文字。4 号遗址南北长 270 米，东西宽 100 ~ 130 米，北部突出。遗址内发现大片夯土、数量众多的绳纹瓦片、砖块，钻探还发现地下有沙层以及石质柱础等。5 号遗址位于西陵的西南部，南北长 140 米，东西宽 110 米，瓦片、砖块较多，夯土很少。

在平陵以东和东北，还分布着一些陪葬坑，目前尚未进行详细钻探。陵园外陪葬坑钻探共发现 21 座。基本分布于陵园外南部及西南部，其范围东起南门阙东 50 米一线，西到互助村东 50 米，北起陵园南墙，南到台地的边缘，在东西长 450 米、南北宽 300 ~ 400 米的区域内。陪葬坑平面基本为长条形，一般长 10 ~ 40 米，宽 4 ~ 7 米，长度超过 100 米的有 3 座。大致可以分为 3 排，靠近陵园的两排基本为南北向，分布较为密集。以两条分别长 61 米和 107 米的南北向陪葬坑作为陪葬区的东界。最外面的一排数量稀少，以一座长 104 米的东西向陪葬坑作

为陪葬区的南界。此陪葬坑位于路基上的一段已发掘，该坑内发现 10 余匹橙红色的漆木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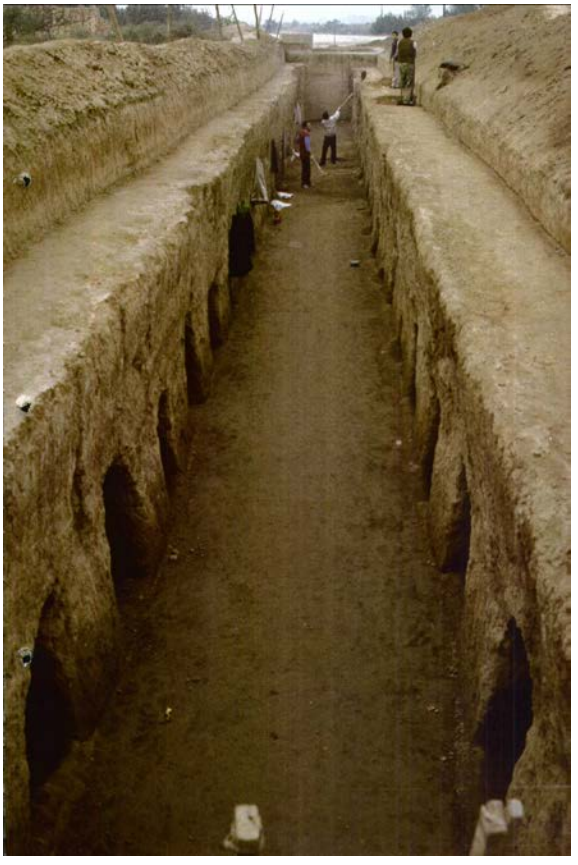


图 49　汉昭帝平陵陪葬坑　（编写组供稿）

《三辅黄图》载：“昭帝庙号徘徊。”《水经·渭水注》云，成国渠“又东迳平陵县故城南。……故渠之南有窦氏泉，北有徘徊庙”。在马泉镇肖家堡村北的二道原的南边，发现一处汉代夯土建筑遗址。夯土范围南北长 60 米，东西宽 56 米。中心区为一个高 3 米的夯土台，夯层厚 6 ~ 9 厘米，夯窝圆形，平底，直径 5 ~ 6 厘米。遗址的北部已被平掉。在地表和夯土上面的堆积层内，发现有大量汉代筒瓦和板瓦残片，还有“长生无极”瓦当残片、方格纹铺地砖和凤纹空心砖残块等。肖家堡村位于平陵故城正南，村西魏家泉村有一泉，现已干涸。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肖家堡遗址的地理位置推测，可能是昭帝的徘徊庙。

平陵邑范围北起庞北村北部 300 米的二支渠下，南到三号公路南 50 ~ 100 米处，东到富羊村至北上召一线，西到庞西村西部一线，东西长 2400 米，南北宽 3100 米。陵邑四面皆有夯墙围绕，在庞北村北部 300 米的二支渠下的断面上，暴露有一段夯墙和大量的瓦片堆积。在北上召东北 600 米的取土壕内，暴露有东墙的断面，墙宽 6 米，墙体上和左右两侧皆有丰富的瓦片堆积。在庞西村西北部的断崖上，有西墙的断面。陵邑墙宽 4 ~ 10 米，夯层厚 6 ~ 10 厘米。其中心区域在庞村和李都村的土壕和断崖上，分布着大量的灰坑，其中的绳纹瓦片、陶器残片俯拾皆是。庞村曾出土“王氏”铜鼎一件，器盖和口沿有四处刻铭，盖刻“庚”“王氏重一斤十四两”，器身刻“庚”“王氏容一斗，重十斤十一两”。庞村还出土有铁铧、镢、镂角等，

以及王莽时期的“货布”残陶范等。富羊村出土一件铜壶[①]，壶杯口外侈，束颈，圆鼓腹、圈足，腹上饰 3 道弦纹，附有两个铺首衔环。口径 14.8 厘米，腹径 25.2 厘米，底径 18.4 厘米，高 34 厘米。李都村西南也有不少大灰坑，其中包含丰富的瓦片和烧骨堆积。

平陵周围陪葬墓的封土绝大部分已被平掉，其具体的数量不详，根据以前的文物普查资料得知，其数量近百座。在平陵东部、上帝王村西部和北部钻探调查发现 9 座墓葬，墓道长 20 ~ 60 米，墓室宽 10 ~ 20 米，其中 7 座墓道朝东，2 座朝南，排列比较整齐，可以确定为平陵陪葬墓。在上帝王村西南角的土壕断面上发现有瓦片和陶俑残片[②]。俑为男性裸体，个别俑身上有尚存织物的残迹，原来应穿有衣服。肩的两侧各有一圆孔，为安装上肢用，其形制同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裸体俑基本相同。在平陵邑的西部、大王村西北部零星地分布着数十座墓葬，大多两三个一组，墓道以东向为主，其中可能有属于平陵的陪葬墓。在平陵西部、小寨村南部发现 6 座墓葬，其中的一座墓道朝东，长 50 米，墓道宽 17 ~ 30 米，可能属于陪葬墓之一。平陵南的蒋家村至苏家寨的二道原上，原有 57 个冢，墓冢现存不到 10 座。可能有平陵的陪葬墓，史书记载西汉成帝时，太傅张禹自治冢茔，“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处地，又近延陵，奏请求之”。由于此地属于平陵的寝庙衣冠所出游道，虽然曲阳侯极力反对，但成帝还是赏赐给了张禹[③]。苏家寨周围有数座大冢，其地又靠近延陵，张禹墓可能在苏家寨附近。另外，东距平陵 4000 多米的黄家寨—西石村墓群一直被认为是平陵的陪葬墓。根据最近的钻探资料，这一墓群应该属于延陵的陪葬墓。

表四　平陵陪葬墓及疑似陪葬墓钻探统计表[④]

编号	位置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尺寸	备注
1	小寨村南部	长 12 米、宽 3 ~ 4 米	东部	东西 7 米、南北 8 米	俗称“三家冢”。墓室上部有一塌陷坑
2	小寨村南部	长 50 米、宽 4.5 ~ 11.5 米	东部	东西 30 米、南北 17 米	
3	小寨村南部	长 15 米、宽 2 ~ 2.6 米	北部	东西 9 米、南北 7 米	

① 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② 咸阳博物馆：《汉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③《汉书》卷八十一《张禹传》，第 3350 页。

④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77 ~ 78 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尺寸	备注
4	小寨村西南部	长 53 米、宽 3 ~ 5 米	南部	东西 20 米、南北 22 米	—
5	小寨村西南部	长 30 米、宽 3 ~ 4 米	东部	东西 15 米、南北 20 米	—
6	小寨村南部	—		南北 12 米、东西 2.5 米	可能为 2 号墓之陪葬坑
7	大王村西北部	长 28 米、宽 2 ~ 3 米	东部	东西 8 米、南北 12 米	—
8	大王村西北部	长 39 米、宽 1.5 ~ 2 米	西部	东西 12 米、南北 8 米	—
9	大王村西北部	长 20 米、宽 3 ~ 6 米	北部	东西 24 米、南北 40 米	—
10	大王村西北部	长 19 米、宽 3 ~ 4.2 米	东部	东西 28 米、南北 19 米	—
11	张安家东南部	长 3 米、宽 1 米	南部	东西 6 米、南北 9 米	—
12	张安家东南部	长 10 米、宽 1 ~ 1.3 米	北部	东西 4 米、南北 3.6 米	—
13	张安家东南部	长 46 米、宽 2 ~ 5 米	东部	东西 16 米、南北 12 米	墓室上有塌陷坑
14	张安家东部	长 22 米、宽 3 ~ 5 米	东部	东西 20 米、南北 16 米	—
15	张安家东部	长 20 米、宽 2 ~ 4 米	东部	东西 18 米、南北 14 米	——
16	张安家东部	长 16 米、宽 2 ~ 4 米	东部	东西 16 米、南北 12 米	—
17	张安家南部	长 60 米、宽 2.5 ~ 5 米	西部	东西 16 米、南北 13 米	—
18	张安家西部	长 60 米、宽 4 ~ 7 米	东部	东西 19 米、南北 16 米	—
19	张安家西部	长 20 米、宽 1.5 米	南部	东西 9 米、南北 9 米	—
20	安家北部	长 60 米、宽 2 ~ 5 米	东部	东西 16 米、南北 9 米	—
21	安家北部	长 46 米、宽 1 米	东部	东西 6 米、南北 4 米	—
22	上帝王村西部	长 5 米、宽 4 ~ 6 米	东部	东西 18 米、南北 12 米	墓室上有盗洞
23	上帝王村西部	长 46 米、宽 1.5 ~ 3 米	东部	东西 10 米、南北 7 米	—

续表

编号	位置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尺寸	备注
24	上帝王村西部	长 31 米、宽 4 ~ 6 米	东部	东西 18.7 米、南北 10 米	—
25	上帝王村西部	长 20 米、宽 1.5 ~ 4 米	东部	东西 8 米、南北 8 米	—
26	上帝王村西部	长 26 米、宽 2 ~ 4 米	东部	东西 20 米、南北 1 6 米	—
27	上帝王村西南	不详	东部	不详	位于果园内，靠近断崖，无法钻探
28	上帝王村西部	不详	东部	不详	
29	上帝王村北部	长 40 米、宽 2 ~ 3 米	南部	东西 7 米、南北 15 米	—
30	上帝王村北部	长 35 米、宽 2 ~ 4 米	南部	东西 6 米、南北 16 米	—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平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0 年 10 月，平陵文管所成立。

2001 年 6 月，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的平陵保护区包括汉昭帝陵、上官皇后陵、平陵邑、1 区陪葬墓、2 区陪葬墓 5 个部分。其中汉昭帝陵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120 米、向南 140 米、向东 150 米、向西 13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100 米。上官皇后陵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120 米、向南 100 米、向东 110 米、向西 11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100 米。



第七节　汉宣帝刘询杜陵

一、墓主生平

宣帝刘询（前 91 ～前 49），原名刘病已，字次卿，后改刘询。汉武帝的曾孙，祖父为戾太子刘据，父亲为史皇孙，母亲为王夫人。生于汉武帝征和二年（前 91）。刘询刚生下几个月，因巫蛊之祸，就被下狱，后被祖母收养，流落民间，直到武帝下诏掖庭养视，上属籍宗正。前 74 年，霍光等大臣将他从民间迎入宫中，被上官太后封为阳武侯，同年 7 月继皇帝位，时年 17 岁。

宣帝即位后，由于有自幼生长于民间的经历，体恤民情，因此相继实施了一些有益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举措。政治上，他励精图治，改革吏治，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经济上，躬行节俭，轻徭薄赋，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多次下令节省开支，重视发展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军事上，大破匈奴，击败西羌，设立西域都护府，使天山南北这一广袤地区正式归属于西汉中央政权。在他统治时期，西汉社会经济出现了复苏的景象，他被誉为“中兴之君”。

黄龙元年（前 49）冬，刘询病逝于未央宫，在位 25 年，享年 43 岁，谥号孝宣皇帝，庙号中宗，葬杜陵。



图 50　由西向东航拍的汉宣帝杜陵　（编写组供稿）

许平君（约前 90 ~前 71），昌邑（今山东金乡）人，汉宣帝刘询的第一位皇后。许平君与刘询于前 75 年成婚，前 74 年生下刘奭（后来成为汉元帝），同年刘询被拥戴为皇帝，许平君进宫为婕妤，后立为皇后。因霍光的妻子霍显一心想让女儿霍成君做皇后，本始三年（前 71），趁许平君在坐月子时施毒加害，许平君不久毒发逝世，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霍成君如愿成为宣帝第二任皇后。

王皇后（？ ~前 16），汉宣帝刘询的第三位皇后，沛县人，父王奉光，爵关内侯，又封邛成侯。地节二年（前 68 年）霍光去世，前 66 年，霍家设谋欲乱，尚未实施便被发觉，霍氏尽诛，霍成君被废黜。前 64 年立王氏为皇后。因无子女，刘奭托其抚养。黄龙元年（前 49），宣帝驾崩，元帝刘奭尊王氏为皇太后，竟宁元年（前 33），汉元帝驾崩，汉成帝刘骜尊王氏为太皇太后，世称“邛成太后”，以和皇太后王政君区别。永始元年（前 16），70 岁余的邛成太后王氏逝世，与宣帝合葬杜陵，称东园。

二、营建始末

杜陵位于西安市东南的鸿固原，因为在秦汉时期的杜县以东，所以杜陵及其附近地区称“杜东”或者“杜东原”。宣帝少时好游于原上，他即帝位后，遂在此选择陵地，建造陵园。

杜陵陵区南起长安县大兆乡东伍村、甘寨村，北至西安市雁塔区曲江乡马腾空村；西自三兆村西，东到浐河西岸，东西宽 3 公里，南北长 4 公里。杜陵所在地的海拔远高于西安市，登上杜陵，南边的终南山似一近在咫尺的翠屏，北边的渭河犹如脚下的一条玉带，京师故地尽收眼底。东临浐水白鹿原，西傍宜春下苑，实为京畿胜地。

杜陵遗址地跨雁塔、长安两区。主体封冢为汉宣帝的陵墓，围绕宣帝陵，分布有王皇后陵、杜陵邑及 107 座王公大臣陪葬墓。宣帝陵墓承袭了武帝和昭帝的随葬制度。陵墓内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应有尽有[①]。杜陵遗址所处的少陵原属武帝时上林苑的一部分。杜陵是目前汉陵形制保存最完整的陵园之一，陵园、寝殿、便殿、祭祀用的寝庙及专门的游乐场所均具备。

杜陵封土形如覆斗，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边长分别为 175 米与 50 米。封土高 29 米。

①《晋书·索琳传》记载：三秦人盗发杜陵时“多获珍宝”。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651 页。

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 430 米。封土居陵园中央。地面上的陵园墙垣已荡然无存，但墙基尚在，宽 8 米，厚 2.5 米。陵墓四面正中各有一条羡道通向地宫。四条羡道大小、形制基本相同。每条羡道一般宽 8 米。羡道底部在封土旁边深达 20 米。门址面宽 82 ~ 84 米，进深 20 ~ 22 米。四门之中，以东门遗址保存较好。东门和北门已进行了考古发掘，西门和南门也进行了试掘钻探。汉代陵园四门，时称“司马门”或“阙”[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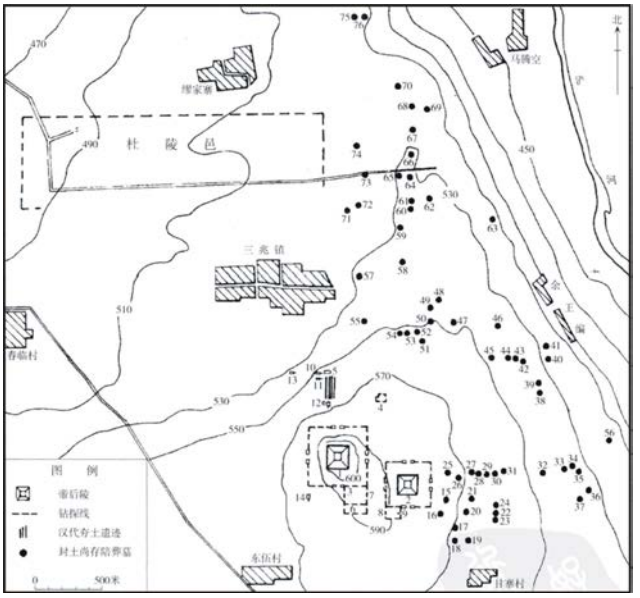


图 51　汉杜陵陵区遗迹分布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王皇后陵位于杜陵东南 575 米[②]。王皇后陵园东门遗址（四号遗址）也是比较重要的遗迹，孝宣王皇后陵园四个门址均经钻探、试掘，四个门址形制、大小基本相同，而东门遗址保存较好，所以对其进行了全面发掘。发掘面积为 2280 平方米。东门遗址中部位于王皇后陵墓以东 83 米，距陵园东南角和东北角各 120 米。门址通宽 68.55 米，进深 19.2 米。陵园门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进深 19.2 米，宽 10.7 米。门道内外居中处，两边对称各置一门墩，门墩大小、形制相同。每个门墩间距 5.6 米，中置大门两扇，大门将门道分为内外两部分。门道中部宽 5.6 米，为行人通道，左右两边各宽 2.5 米，似为列置仪仗处。左右塾在门道两边对称分布。二塾形制、大小相同。每塾面宽（南北）8.4 米，进深（东西）13.65 米。塾的中间隔墙将其分为内塾和外塾，隔墙宽 1.97 米。内、外塾大小、形制相同，在隔墙两边对称分布。内、外塾均为面宽 8.4

①《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三年十一月“朕望长陵东门，见二臣之垅”。注引《东观记》曰：“萧何墓在长陵东司马门道北百步。”第 172 页；《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东观汉记》曰：“霍光墓在茂陵东司马门道南四里。”《汉书·五行志》：“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门南方灾。”宣帝陵园四门之外均无“阙”，以上文献所载“东阙”，应为帝陵陵园东门。《后汉书·五行志上》，第 1336 页。

②《长安志图》卷中：杜陵“东南数十步又一陵，形制差小，皇后王氏之陵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米（3 间），进深 5.81 米（2 间）。左右塾的内、外塾，各有一座便门。四座便门分别位于左右塾与配廊交接处。人们进入门道，沿檐廊绕行可至便门，进入塾内。四座便门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便门宽 1.2 米，进深 0.5 米。门道有踏步两级。塾外有檐廊，廊宽 1.02 米。塾的地面比檐廊和门道地面约高 0.5 米。左右配廊对称分布在左右塾的外侧。左右配廊大小、形制相同。配廊中间有隔墙，墙宽 3.2 米。隔墙将配廊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外配廊大小、形制相同。配廊廊道宽 7 米，通长 19.5 米。王皇后陵园门址出土的瓦当文字，一般为“长生无极”，也有为数不多的“长乐未央”，还有少量云纹瓦当。瓦当面径 18 厘米左右。据上所述，王皇后陵园门址形制与宣帝陵园门址相近，只是规模小些，建筑也较简陋。



图 52　汉杜陵王皇后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许皇后陵尽管西北距杜陵 13 里，仍应属于杜陵茔域，因此史称其墓为“杜陵南园”。因为与宣帝杜陵相比，许皇后陵墓规模小，所以后者又称“小陵”[①]。古代“少”“小”二字通假，所以许皇后陵俗称“少陵”。故其陵墓所在地的原区则称之为“少陵原”。

根据钻探所知，杜陵的北面和南面分布着一些陪葬坑，主要是在陵园以北。其中一号坑位于杜陵以北 520 米处，坑室为近似方形的竖穴，分为主室和车室。平面为圆角方形。此坑早

①《汉书·孝宣许皇后传》载：“许后立三年而崩……葬杜南，是为杜陵南园。”颜师古注：“即今之谓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汉书·外戚传（上）》，3967 页。

年曾遭盗掘，坑内面积只有 140 平方米，就有 12 个盗洞，劫余之物主要是数以百计的陶俑。主室内还发现了铜锏、铜管形器、铜量器、铜珠、铜镦，铁质的锛、凿、剪、剑、矛、戟等，以及陶制盘、罐、盆、茧形壶等。四号坑位于一号坑以西 130 米处，为带一斜坡坑道的长方形竖穴坑，方向 93 度，深 4.4 米，坡长 5.5 米，水平长 2.5 米，宽 1.4 米。坑的平面东西 8.5 米，南北 4.2 米。坑道有 10 级梯台。坑底放置了长方形木椁。椁室东西 6.64 米，南北 2.8 米，高 0.78 米。此坑有 7 个盗洞，坑内仅存少量残俑，以及小铜带钩、小五铢钱、小铜环、铜镦和铁戟等。这些遗物形制与一号坑所出同类随葬品完全相同。四号坑内出土的“大仓”半通铜印章引人注目。大仓系官署名，其公用印章与“弩府”“冶府”“市府”等半通印章作用一样。大仓，也称太仓，为京城储粮的总仓库。太仓令为司农属官，主持收受郡国漕粮。

杜陵陪葬墓地上现存有封土的有 62 座，原来有封土的陪葬墓可能更多。杜陵陪葬墓中，陵区东南的陪葬墓数量较多。王皇后陵附近的陪葬墓，其封土大多为覆斗形，规模大者犹如皇后陵墓。如第一号墓，封土底部长 77 米，宽 74 米，高 20 米。杜陵东司马道以北，即杜陵和王皇后陵的东北部，今赵家湾村附近，陪葬墓也比较集中，但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离杜陵也较远。陵区北部的陪葬墓，分布在今三兆村北、缪家寨和马腾空村附近。这里的陪葬墓封土规模较小，但数量甚多。大司马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丙吉、建章卫尉金安上、中山哀王刘竟等均陪葬杜陵。



图 53　杜陵陪葬墓，其中最大一座即为 1 号陪葬墓，因距杜陵最近、形制最大，故传为宣帝之子中山哀王刘竟之墓　（摄影：郑茂良）

杜陵邑遗址，经勘察在今三兆村北、缪家寨南，西至曲江化工厂，东至杜陵北部陪葬区以西。遗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2100 米，南北宽约 500 米。据三兆村群众报告，过去在三兆村北的杜陵邑遗址内平整土地中曾发现过有“杜邑”陶文的汉砖。现在杜陵邑遗址上已见不到陵邑城墙遗迹；埋在地表之下的陵邑墙在原西安殡仪馆西 270 米处，现存长 490 米。陵邑东墙在穿过杜陵南北直线以西 100 米处，现存长 500 米。根据文献记载，杜陵邑当时相当繁华，人口众多，户数多达 3 万 ~ 5 万户[①]。很多当时的达官显贵和豪富巨商都迁居于此，根据《汉书》的记载，御史大夫张汤，大司马张安世，历位九卿的张延寿，右将军苏建，典属国苏武，丞相朱博，御史大夫杜周、杜延年，丞相韦贤、韦玄成，后将军赵充国，太守韩延寿，御史大夫萧望之，执金吾肖育，大司农肖咸，太守肖由，右将军冯奉世，大鸿胪冯野王，太守冯逡，右将军史丹，丞相王商等均居住于杜陵。

三、陵园变迁

《汉书·五行志》载：“（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园东阙南方灾。”[②]

《汉书·王莽传》载：“（建武元年，赤眉军入长安）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③]

《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④]

《后汉书·孝安帝纪》载：“（永初四年）三月戊子，杜陵园火。”[⑤]

《晋书·孝愍帝纪》载：“建兴三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多获珍宝。”[⑥]

---

①“《索隐》引《汉旧仪》云：‘武、昭、宣三陵皆三万户。’”《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 2512 页。

②《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第 1336 页。

③《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第 4193 页。

④《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 48 页。

⑤《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 215 页。

⑥《晋书》卷五《孝愍帝纪》，第 129 页。

《长安志图》：“杜陵，今在奉元城东南二十五里三赵村，陵在高原之上，即所谓鸿固原也。陵之制正方，询之居人，每方百二十步，据地六十亩，四面去陵十余步皆有观阙基址。其东南数十步又有一陵，形制差小，皇后王氏之陵也。其东陪葬数十冢，环拱森列，大小不等，其北里许，乱冢百余，自是以北直至城南，东西延亘，高原之上，累累皆是，但不知其名耳。”①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到目前为止，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直接以汉杜陵遗址或其区域为对象，开展了有关考古和开发利用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关成果 。

对杜陵的考古调查与研究主要有三个阶段：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杜陵工作队对杜陵展开了较大规模的勘查，同时发掘了帝陵陵园的东门阙、北门阙、寝园，皇后陵园的东门阙、寝园及杜陵第一、第四号陪葬坑等，极大地推动了西汉帝陵的研究工作。

20 世纪 80 至 9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杜陵工作队通过对杜陵的从葬坑、门阙、寝园遗址的发掘，大致掌握和了解了杜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资料整理工作也有了较大进展，发表了《汉杜陵陵园遗址》考古报告和考古简报。

21 世纪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市考古所一直对杜陵大遗址进行考古勘探工作，进展顺利，已勘探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新发现了大量文物遗址。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②，在这次考古钻探中，确定了杜陵大陵园南墙、西墙和北墙遗址位置；在帝陵封土的四周发现外藏坑 38 座，平面大小、形制各有差异，有长方形土圹竖穴结构、梯形斜坡道结构、“甲”字形结构、“凸”字形结构。专家估计杜陵陪葬墓数量远大于先前勘探的 107 座。

研究成果：

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1 期。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 年第 6 期。

①（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图志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 490 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1 月 11 日，第 A02 版。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刘庆柱、李毓芳:《汉宣帝杜陵陵寝制度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5年。

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第5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汉考古研究部:《陕西秦汉考古五十年综述》,《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6期。

焦南峰:《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新收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0日。

焦南峰:《西汉帝陵田野考古工作的新进展》,《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3期。

刘云辉、刘思哲:《汉杜陵陵区新出土的玉杯与玉舞人》,《文物》,2012年第12期。

五、遗迹和遗物

杜陵是西汉诸帝陵中规模较大、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帝王陵寝。杜陵陵园内有宣帝陵、王皇后陵、陵庙、陵邑遗址等7处,陪葬坑5处,陪葬墓100多座。根据汉阳陵、汉茂陵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些遗存仅占杜陵地下遗存的极小部分,大量的遗址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验证。但就目前对杜陵的钻探勘查,也提升了各界对汉代帝王陵墓的陵区以及礼制建筑布局、形制的认识。

杜陵封土形如覆斗,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边长分别为175米与50米。封土高29米。杜陵陵园为平面方形,边长430米。陵墓居陵园中央。地面上的陵园墙垣已荡然无存,但墙基尚在,宽8米,高2.5米。

王皇后陵位于杜陵东南575米。陵墓封土为覆斗形。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底部与顶部边长分别为145米和45米。封土高24米。陵园平面呈方形,边长330米,墙基宽3.5米,陵园四面墙垣中央各辟一门。从已试掘的三座门址和发掘的一座门址来看,四座门的形制、大小基本相同,距封土均90米。

许皇后陵的封土呈三层台，通高 22 米。封土底部东西长 134 米，南北长 139 米。底台台面宽 8 米，台高 7 米；中台台面南、北各宽 10 米，东、西各宽 12 米，台高 7 米；顶台东西 38 米、南北长 44 米，台高 8 米。



图 54　汉杜陵许皇后“少陵”　（摄影：郑茂良）

封土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陪葬遗迹。主要有杜陵的一号遗址、二号遗址（东门遗址）、三号遗址（北门遗址）、八号遗址、九号遗址、十号遗址等。

一号遗址位于杜陵东南 187 米，遗址已被严重破坏。夯土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 51.2 米、南北宽 29.6 米，现存夯台仅高出廊地面 10 ～ 25 厘米。台基东边有三处壁柱遗迹，其中与东门门道西边相交处有二壁柱遗迹，另一壁柱遗迹北距台基东北角 4.8 米处，三处壁柱柱槽底部均有残碎础石。另外在台基南边和西边也有几处柱槽遗迹，但均无础石及碎石块遗物。台基四周为廊，廊宽一般为 2.1 米。东、西廊长均为 55.4 米，南、北廊长均为 33.8 米。廊地面铺方砖。廊外为卵石散水，一般宽 1 米。散水外沿线砖以外又铺设一排方砖。一号建筑遗址南北各三个门，东西各一门，每门又分为左右门道。一号建筑遗址由于平整土地被破坏，所留遗物甚少，主要遗物为砖、瓦建筑材料，其形制、大小与东门遗址砖瓦遗物基本相同。除此之外，与建筑物有关的遗物有鎏金铜构件、八棱形铜柄、铁钉等，其他遗物还有铁铤铜镞、铁镞和大泉五十、货泉等。

二号遗址（东门遗址）位于杜陵陵墓以东 110 米，门址的门道与陵墓东墓道相对。门址通

宽 85 米，进深 20 米。陵园门由门道、左右塾和左右配廊组成。门道正对陵墓羡道，进深 20 米，宽 13.2 米。门道内外居中处，左右置门墩。两门墩大小、形制相同，均夯筑。大门将门道分为内外两部分。门道内外各有一对明柱，距门墩均为 5.64 米。门道地面铺设素面方砖。门道虽宽 13.2 米，但人行通道仅宽 6 米。通道左右两边似为列置仪仗的地方。

三号遗址（北门遗址）保存较差，门址的前半部和右配廊几乎全部因取土被挖掉，现已成为高 2 ~ 2.5 米的断崖。北门遗址的隧宽 12.8 米，存长 10.6 米，复原宽度 18 米。隧左、右各有一门阙，分别与左右塾相连。门槛将隧分为内外两部分。二门墩间是通道，通道两边是门庭。隧两侧为左右塾，两塾大小和形制相同。右塾南壁之上发现大面积的贴瓦，贴瓦均为西汉时代的板瓦或筒瓦瓦片，瓦片绳纹均朝外。塾的壁上均有壁柱，壁柱下有础石，础石大小不一，左右内外塾各有一个便门。

八号遗址位于杜陵东北 400 米处。遗址高出周围地面 1 ~ 3 米，中央为一夯土台基，东西长 73 米，南北宽 70 米，深 5 米。台基东北有一长 3 米、宽 2 米的缺口。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汉代砖、瓦等建筑材料，同杜陵寝园出土的相同。比较特殊的是，该遗址内出土了大量龙、凤纹空心砖残块，而这种图案的空心砖，在杜陵诸遗址中仅见。在夯土台基的东西两边，各钻探出一条南北向道路，向南通至杜陵陵园东边与孝宣王皇后陵园西边。

九号遗址位于杜陵东北 550 米处，其夯土基址东西长 40 米，南北宽 20 米，深 2.9 ~ 4.7 米。遗址南边有 3 条平行排列的南北向带状夯土，东西间距各为 18 米，东西宽约 47 米，与九号遗址的中心建筑的面阔相近。

十号遗址位于帝陵寝园遗址以南 7 米处，东西长 174 米，南北宽 70 米。遗址的东西界基本与寝园东、西墙南北相对。遗址内多为小型房屋和庭院。遗址内出土的砖瓦等建筑材料与杜陵寝园、陵园出土的砖瓦相同。十号遗址可能属于“园吏寺舍”一类建筑。

遗物方面，陵园东门和北门遗址出土遗物数量以砖、瓦和瓦当最多，其次为铁器，再次为铜器。陶制遗物均为砖、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砖又分为方砖、长方砖和长条砖。方砖一般边长 33 ~ 35 厘米，正面略大于背面，厚 4 ~ 5 厘米。砖的纹饰有小方砖（或称乳钉砖）、几何纹，以素面占绝大多数。长方砖一般长 31 ~ 34 厘米，宽 20 ~ 29 厘米，厚 4 ~ 5 厘米，其砖

面纹饰种类和用法与方砖相同。长条砖一般长 34 ~ 37 厘米，宽 16 ~ 22 厘米，厚 5 ~ 10 厘米，均为素面砖。

瓦的种类有板瓦和筒瓦。表面均饰绳纹，板瓦里面为素面，筒瓦里面为布纹。其中板瓦个体大，瓦身长 59.5 厘米，一端宽 50 厘米，另一端宽 43 厘米，厚 2 ~ 4 厘米。瓦的表面通体饰粗绳纹，绳纹斜行，排列疏朗。筒瓦的表面均饰直绳纹，纹宽 0.3 厘米。部分筒瓦的一端附带瓦当，瓦身之上有插瓦钉的圆形洞。

在杜陵各遗址中出土的瓦当均为圆瓦当。瓦当分为文字瓦当和云纹瓦当，文字瓦当数量占绝大多数。文字瓦当有“长乐未央”和“长生无极”两种。长乐未央文字瓦当共 146 件，其中东门遗址出土 118 件，北门遗址出土 28 件。瓦当表面分为四区，长乐未央四字分置其中。四区中央饰圆泡纹，圆泡纹周围一般有 12 枚乳钉纹。长生无极文字瓦当 11 件，其中东门遗址出土 9 件，北门遗址出土 2 件。瓦当文字和饰纹布局与长乐未央文字瓦当基本相同。另有云纹瓦当 4 件。

2010 年 8 月 25 日晚，西安市长安区大兆甘家堡村民在杜陵保护区盗挖瓦当，盗掘出西汉圆雕玉舞人和金扣玉杯，随后将四件珍贵玉器高价倒卖。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局获知后，立即立案侦查，抓获了盗掘文物犯罪嫌疑人，追缴被倒卖的玉器并移交文物管理部门收藏。经文物部门认定，均为国家一级文物。玉舞人通高 10.2 厘米，底边长 8 厘米。玉舞人采用圆雕技法，两人联袂并肩伫立，长裙拖地，实属罕见。玉质为和田青白玉。两舞人身材修长，发式、衣着、鞋履相同。鸭蛋形脸，宽眉细眼，嘴角露出恬淡的微笑，长发挽高髻盘于头顶，一缕发梢下垂于肩胛。削肩膀，身穿左衽交领长袖衣，腰间系带，下裳即通常所称的长裙，前襟下摆略短，露出圆头履，后襟长而拖于地。个矮舞女左臂向空中甩长袖，右臂向后甩长袖；个高舞女双臂扶腰，长袖下垂，随风而飘。三件玉杯其一高 13.5 厘米，口径 6.8 厘米，底径 4.5 厘米，口沿和底沿镶嵌金扣；其二高 12.4 厘米，口径 6.3 厘米，底径 4.9 厘米，口、足没有镶嵌金扣；其三高 12.8 厘米，口径 6.5 厘米，底径 4.7 厘米，口沿和杯身腰部、腹部、底足边缘共镶嵌四道金扣。三件玉杯形制相同，通体打磨光润。玉杯直口圆筒形，喇叭形高足，杯身口部、腰部、



图 55　杜陵出土的玉舞人、玉杯　（编写组供稿）

腹部均刻宽双凹线夹宽凸线。玉质为和田青白玉。现藏西安博物院[①]。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杜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8 年 1 月，杜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 年 9 月，杜陵保管所成立。主要负责杜陵保护区内古遗址、古墓葬的保护管理及保护区文物的征集和相关文物资料的收集整理，文物藏品的陈列保管，组织群众加强文物保护工作。

1997 年 12 月 31 日，杜陵保管所及时与曲江派出所联系，一举抓获盗墓犯罪嫌疑人 6 人，同时缴获一批炸药、雷管、通风机、罗盘等作案工具。

1998 年 6 月 22 日，在大兆乡大府井村，保管所配合大兆乡派出所，抓获盗墓嫌疑犯 4 人，其中主犯为市公安局正在通缉的要犯，并缴获汽车一辆。

2001 年 3 月，西安市雁塔区农水局在陵区开始进行万亩生态林绿化工程。

2003 年 11 月，西北大学城市建设与区域规划研究中心完成了《汉杜陵遗址保护规划》草案。

2004 年 7 月 1 日，由西安市文物局牵头，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省文保中心、西安名城研究会、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校的有关专家、教授及陵区所在地的政府领导在西北大学召开了《汉杜陵保护总体规划》评审会。这次评审会为《规划》文本的

① 刘云辉、刘思哲：《汉杜陵陵区新出土的玉杯与玉舞人》，《文物》，2012 年第 12 期。

进一步修改、完善提供了更全、更新的思路。

2004 年 7 月 14 日凌晨，在宣帝陵东南约 600 处的甘寨村，杜陵保管所配合大兆派出所抓获盗挖瓦当的犯罪嫌疑分子 3 人。

2005 年 11 月 18 日，杜陵保管所对杜陵陵园遗址、寝园遗址、杜陵陵庙、王皇后寝园、石头沟遗址、杜陵陵邑、73 号陪葬墓立保护标志碑 7 通。

2005 年 11 月 30 日，杜陵保管所完成 73 号陪葬墓的围栏保护工程。

2006 年 4 月 28 日，杜陵保管所在宣帝陵陵园南墙遗址旁栽立界桩 18 个。

2006 年 7 月 15 日，杜陵保管所在宣帝陵寝园遗址旁栽立界桩 26 个。

2007 年 5 月 26 日凌晨，杜陵保管所协同大兆派出所民警在大兆乡新赵村当场抓获盗墓犯罪嫌疑人 6 名，有力地保护了田野文物安全。

2007 年 6 月 8 日，完成了宣帝陵陵园东墙的界桩栽立工作及杜陵 42 号和 65 号陪葬墓的围栏保护工程。

2007 年 8 月 24 日，西安市文物局主持召开了《杜陵文物保护规划（2007 ～ 2025 年）》评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市政协、市文物局、长安区、雁塔区、杜陵保管所、省文物局、省考古所、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省建设厅、市规划局、市社科院、市考古所、中国社科院汉城考古队、西北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领导和专家及教授，共约 30 多人。

2008 年 6 月中旬，完成了对杜陵 48 号、50 号两座陪葬墓围栏保护工程。在宣帝陵北面雁翔路口设置了杜陵大型宣传牌一个，在保管所内设立了介绍杜陵及杜陵保管所发展情况的大型宣传栏一个。为了保护院内明代石刻文物，杜陵保管所组织安装了电子报警器 8 个，加强了安全措施。

2008 年，杜陵保管所征集散失文物 50 余件。

2008 年 8 月，凤栖原西汉家族墓地开始发掘工作，考古勘探墓地面积达 6 万多平方米，规模大，规格高，主从分明，序列整齐，时代自西汉中晚期延续至王莽时期。墓地核心区域是一平面为方形的墓园，是皇帝给张安世的墓园。墓园由两座“甲”字形大墓及从葬坑、祠堂建筑基址、道路、排水道以及兆沟等构成。墓园周围有中、小型墓葬，墓园及其附葬墓共同构成

了家族墓地。出土物包括金器、青铜器、鎏金银错金银青铜器、铁器、原始瓷器、陶器、玉器、建筑材料、钱币、车马器、近1000件彩绘陶甲士俑等在内的3000多件文物，比较重要的是一枚大型篆书“张”字青铜印。凤栖原汉墓群是一处以墓园为核心的家族墓地，是在早期张安世墓园的基础上，逐代向周边延续扩大的家族墓，对研究西汉晚期丧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7月9日，国家文物局对《杜陵保护规划》进行了批复（文保函[①]787号）。

2009年8月中旬，完成了对杜陵18号、19号两座陪葬墓围栏保护。在宣帝陵南侧栽立了大型宣传牌一个，更新了帝陵北面雁翔路口杜陵大型宣传牌内容。

2010年3月19日，西安市编委同意将西安市杜陵保管所更名为西安市西汉帝陵保护管理中心（市编办函[②]31号），隶属于西安市文物局管理，全额事业单位，机构规格相当于县处级，核定编制12名。2010年3月24日，由西安市杜陵保管所、陕西上林苑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筹办的西安（杜陵）秦砖汉瓦博物馆申报建馆专家评审会在杜陵召开，通过专家组验收。

2010年4月初，管理中心完成了汉杜陵文物保护展、秦砖汉瓦专题博物馆的陈列布展工作，并协助博物馆完成了馆藏文物的建档工作。

2010年7月底，完成了杜陵19、23号陪葬墓围栏工程，在帝陵栽立了保护标志界桩18个。

① 2009年。

② 2010年。

第八节　汉元帝刘奭渭陵

一、墓主生平

元帝刘奭（前 76 ~ 前 33），宣帝长子，孝宣许皇后所生。前 49 年，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刘奭多才多艺，善史书，鼓琴吹箫、“柔仁好儒”“号令温雅”“宽宏尽下”，在位期间，对内“征用儒生，委之以政”，如任用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为丞相，力图稳定政局。为缓和关东豪强与西汉朝廷的紧张关系，元帝甚至大胆地放弃了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以充实关中帝陵的制度；对外多次出兵击溃匈奴，消灭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后又以宫女王嫱（昭君）嫁与匈奴单于，恢复了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

但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激化，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又由于汉元帝过于放纵外戚、宦官，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宣帝开创的西汉中兴局面很快过去，西汉历史进入到晚期。汉元帝在位 16 年，前 33 年 5 月，病逝于未央宫，终年 43 岁，葬渭陵，谥号为元帝，庙号高宗。



图 56　由南向北拍摄的汉渭陵帝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孝元王皇后（前 71 ~ 13），名政君，祖籍山东平陵。元帝即位后，王政君为皇后。元帝死后，成帝即位，尊王政君为皇太后。成帝崩，哀帝即位，王政君的远房侄子王莽开始辅政。哀帝即位仅 6 年就去世，死后无子，太后任命王莽为大司马，“与共征立中山王奉哀帝后，是为平帝”。平帝即位两年便逝世，王莽篡位并向太后索要传国玉玺，太后起初不给，后经安阳侯王舜劝说，勉强交出传国玉玺。新莽建国五年（13），王政君去世，享年 84 岁，合葬渭陵。班彪评价孝元王皇后：“孝元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①

孝元傅昭仪，原籍河内，少年时为上官太后的才人。元帝为太子时，得进幸。元帝即位后，立为婕妤。由于她备受元帝宠爱，又有才略，善于为人处事，后来又生了一男一女，被封为昭仪。元帝死后，傅昭仪随其子定陶恭王去封国，被称为“定陶太后”。成帝无子，定陶太后多方为其孙子刘欣活动，刘欣终于被立为皇太子。刘欣即帝位后，定陶太后又被封为“帝太太后”。元寿元年（2），帝太太后去世，合葬渭陵。

二、营建始末

元帝渭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新庄村南，靠近原边，其东北 2400 米处为汉哀帝义陵，西北 2600 米处为汉平帝康陵。永光四年（前 40）汉元帝“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开始陵墓的修建，前 33 年 5 月，元帝病死，秋七月丙戌，葬渭陵②。

渭陵陵园呈东西向长方形，渭陵陵园外垣墙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 1775.7 米，南北宽 1617.7 米。由外围沟、外垣墙、帝陵陵园、王皇后陵园、傅昭仪墓、陵园内建筑遗址、陪葬墓园等组成。其中帝陵陵园、王皇后陵园、傅昭仪陵大体位于渭陵陵园的中南部。建筑遗址没有明显的分布规律，基本位于帝陵陵园和王皇后陵园的北侧。陵园内的陪葬墓位于陵园的东北角，排列规整，南北 5 排，东西 7 列。其中最南侧的一排陪葬墓东侧的 4 座墓葬有相对独立的墓园，每座墓园南墙均开一门，并筑有门阙。每座墓葬的墓道西侧均有建筑基址。

渭陵封土呈覆斗形，位于陵园的中部，封土四面保存较好，南面中部略有下凹。底边东长

①《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 4013 ~ 4036 页。

②《汉书》卷九《元帝纪》，第 298 页。

169 米，西长 160 米，南长 168 米，北长 163 米，顶部边长 42 ~ 44 米，高 30 米。在距顶 3 米处，封土四面各留一二层台，二层台至顶部坡度平缓。台面东宽 6 ~ 10 米，西宽 8 米，南宽 6 米，北宽 7.6 米。关于二层台外面的边长，东边、北边均长 85 米，南边、西边均长 88 米。二层台内面，东边长 65 米，南边长 64 米，西边长 62 米，北边长 66 米。封土顶面略隆起，其正中心塌陷一个直径 26 米、深 1.8 ~ 2.4 米的锅底状坑。

孝元王皇后，新莽建国五年（13）二月癸丑崩，享年 84 岁。三月乙酉，合葬渭陵[①]，与元帝合而沟绝之。如淳曰：“葬于司马门内，作沟绝之。”立庙于长安，新室世世献祭，莽为太后服丧三年[②]。在渭陵西北约 350 米，存有一座陵墓的封土，此墓封土为覆斗形，四周围着陵园墙垣，每墙中央各辟一门，门外置双阙。这些都是西汉陵墓与陵园的形制特点。门阙遗址附近，至今仍保存西汉晚期大量砖瓦遗物，这说明其陵园建筑时期与元帝渭陵相近。按照西汉时代制度，皇帝与皇后合葬，但同茔不同穴，因此推测其墓为孝元王皇后陵墓。二者封土东西间距 340 米，南北间距 200 米。陵园四面都有夯筑垣墙，现地面无存。钻探得知垣墙墙基宽 4 ~ 6 米，垣墙东边和西边均长 376 米，南边长 380 米，北边长 379 米。垣墙四面中部开门并且设有门阙，现东门阙的基址在地面有保存。经钻探，东门阙长 30 ~ 50 米，宽 9 ~ 15 米，门道宽 10 米；西门阙长 32 ~ 33 米，宽 12 米；南门阙长 32 ~ 46 米，宽 9 米，门道宽 8 米；北门阙长 38 ~ 40 米，宽 9 ~ 10 米，门道宽 9 米。



图 57　王皇后陵封土南侧立有清代毕沅碑一通。现已断成两节，上部分扑倒于地，所刻文字据资料记载应为“周康王陵”　（摄影：郑茂良）

王皇后陵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封土底边距离垣墙的距离东为 140 米，西为 138 米，南为 138 ~ 140 米，

①《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第 4034 页。

②《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第 4132 页。

北为 135 米。封土呈覆斗形，底边东长 90 米，西长 87 米，南长 92 米，北长 91 米。顶部东、南两边均长 34 米，西、北两边均长 33 米，高 13.5 米。封土顶面南部中间位置下凹，略成马鞍形，其余部分皆平缓隆起。经过钻探，在王皇后陵封土东、西两面各发现墓道一条。东墓道位于东面中部，长 76 米，宽 5 ~ 16 米；西墓道位于西面偏北位置，长 30 米，宽 6 ~ 13 米，墓道距离封土北边仅 27 米。另外，在封土南部偏东 28 米处，钻探发现一座陪葬坑，坑南北长 18 米，东西宽 8 米，坑内的填土经过夯筑，为夹杂有黑褐色斑点的黄褐色土，探孔内发现泥质灰陶片。

孝元傅昭仪陵，据《长安志》卷十三记载，咸阳县有“汉傅太后废陵”“今其处积土犹高，谓之增墀，又谓之增阜”。在今渭陵东北 360 米处，有一个残冢，东西长 170 米，南北宽 150 米，高 2 米，当是孝元傅昭仪的废陵。《汉书 · 外戚传》载：“（孝元傅昭仪）元寿元年崩，合葬渭陵，称孝元傅皇后。”汉哀帝下令以皇后礼仪将其祖母合葬于渭陵。因其陵墓在元帝陵东边，所以又称“渭陵东园”。汉哀帝死后，王莽秉政，又以“民礼”[①]改葬傅昭仪。

傅昭仪陵其封土已无存。陵墓所在位置为一块高出周围地面 2 ~ 3 米的土台，土台经过夯筑处理，东边的夯层尤为清晰坚硬。经钻探，墓葬位于土台的中部，墓道在南，墓室在北。墓室平面呈方形，东西宽 55 ~ 60 米，南北长 58 米。墓道位于南边中部，南北长 50 米，东西宽 6 ~ 26 米。墓葬周围经钻探，未发现垣墙。

渭陵陵园四面均有夯筑垣墙，现地面无存。东墙的南端在断面上有暴露，夯层清晰，厚 6 ~ 8 厘米，垣墙宽 6 ~ 8 米，东墙、西墙均长 426 米，南墙长 416 米，北墙长 414 米。垣墙四面正中开门并设有门阙，现在的东、西门阙基址保存较好，地面有高近 3 米的鱼脊状堆积。东门阙长 34 ~ 37 米，宽 8 ~ 9 米，高 2 ~ 2.4 米。西门阙地面仅余南边一阙，北门阙地面无存。经钻探，门阙皆位于垣墙以内，平面呈长方形。东门阙长 38 米，宽 15 ~ 16 米，门道宽 15 米；西门阙长 36 ~ 38 米、宽 15 米，门道宽 10 米；南门阙长 40 米，宽 14 米，门道宽 12 米；北门阙长 36 米，宽 17 米，门道宽 13 米。

此外，经钻探，在渭陵帝陵封土东面中部发现墓道一条，墓道长 50 米，宽 18 ~ 26 米。其南部发现一座陪葬坑。坑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70 米，南北宽 10 米。另外，在封土南部发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4004 页。

现南北向陪葬坑两个，宽均9米，长分别为34米和65米。

外门阙在渭陵东部、距离渭陵陵园东墙800米处，发现门阙一处及南北向夯土墙一道。该门阙同渭陵陵园东门阙正对，附近发现大量绳纹板瓦、筒瓦残片及砖块、石块等。门阙南北宽17～19米，东西长20米，门道宽10米，其中的路土厚达15厘米，路土纯净坚硬，层理清晰密集。门阙的南北均筑有夯墙，夯墙往北延伸，同二十八宿陪葬墓园的东墙相连，长490米，往南延伸160米后消失，总长700米。墙内侧发现大量瓦片，顺垣墙延伸，可能属于墙上用瓦。这应该就是渭陵的外城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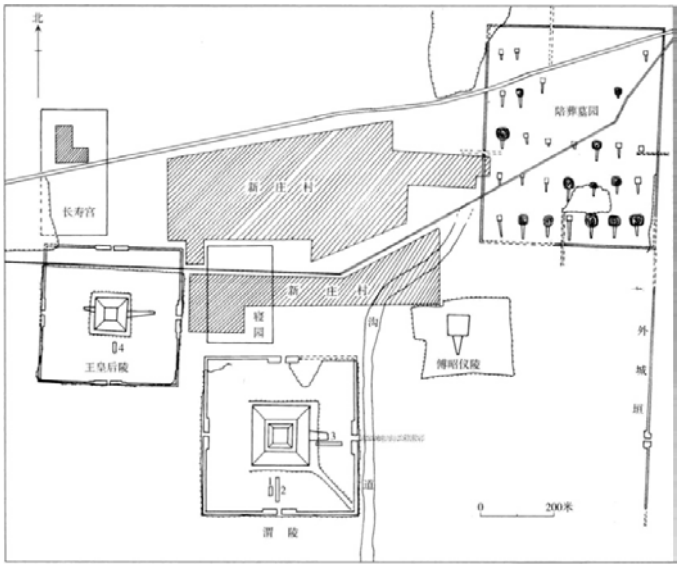


图58　渭陵陵园钻探平面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

渭陵封土东北部500余米处的“二十八宿”，实际上是渭陵的陪葬墓园，墓园周围有夯筑垣墙。东墙长599米，宽5米，其南部30米长的一段被破坏，北端位于咸宋公路的紧北侧。东墙朝南同渭陵外城垣的东墙相接。西墙长590米，其北端60米长的一段被毁，南段有几处被新庄村的现代民房所压。墙体在北部土壕的断崖上暴露出一部分，土色红褐，夯层平整坚硬。北墙长488米，其西端40米长的一段被毁，东端接近咸宋公路。南墙长482米，其西半段基本被毁，东段基本保存。垣墙四面各开一门，东门、西门分别位于东、西垣墙中部偏南，基本正对，门道宽7米，其中的路土直通里外，西门的路土往西延伸200余米。北门位于北墙由西往东170米的位置，门道宽6米，其中的路土直通墓园内。南门可能位于南墙中部偏西位置，被毁无存。在附近发现大量的绳纹瓦片、陶器和瓦当残片等，其往北有一条南北向道路，直通墓园内。墓园内整齐地排列着墓葬28座，南北5排，东西7列，其中12座封土现在还存在。前三排（由南往北）墓葬排列整齐，间距均匀，每排7座，前后正对。第四排4座，第五排3座。

其中第一排封土大多保存较好，封土间距 27 ~ 30 米，最东边一座封土（7 号）距离墓园东墙 31 米，距离墓园南墙 56 米，2、3、5、6 号封土距离南墙 44 ~ 50 米，1 号墓墓室距离墓园西墙 38 米。第一排同第二排墓葬封土的间距为 70 ~ 80 米，第二排同第三排墓葬封土的间距也为 70 ~ 80 米。第一列、第二列（由西往东）均有 5 座墓葬，前后基本排列整齐；第三列中的 24 号墓向北偏出近一个墓位，第七列中的 21 号墓封土没有保存，墓室为竖穴土圹，没有发现墓道。其余的 27 号墓葬均发现有墓道，墓道皆在南。墓园内不少地点发现有绳纹瓦片、卵石、砖块等，其中 19 号墓墓道钻探发现有青灰色的瓦片堆积。

渭陵的陪葬墓基本上分布于渭陵的东部和南部。其东部有所谓的“七妃墓”，位于渭陵东门外东司马道的南北两侧、高干渠以北，其中 5 座封土仍存。封土均呈圆丘形，底边直径 7 ~ 15 米，高 3 ~ 5 米，形状相同。7 座墓葬中，除一座墓道西向外，余皆南向。29、30、31 号墓道填土均有塌陷，有的墓道已经显露，墓道两壁平整光滑并且留有窄小的生土台阶，墓室口均发现有盗洞。关于“七妃墓”，《咸阳县志》记载：“七妃墓在县东北 15 里新庄里，未详汉代何帝之妃。”



图 59　汉渭陵“二十八星宿”陪葬墓　（摄影：郑茂良）

另外，在渭陵南部及东南部的原下，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墓葬，其中能够调查的多是封土有保存的。其封土多呈覆斗形，钻探发现墓道大多朝南，也有一部分朝东。这些墓葬往往几个一

组聚集在一起。例如羊角寨村东的一组 4 座，东西排列整齐；司魏村东部和南部有两组墓葬，每组两个。这些成组的墓葬可能是以夫妻或父子为主的家庭或家族合葬墓。

渭陵陪葬墓的情况参见“元帝渭陵陪葬墓和疑似陪葬墓统计表”。

表五　元帝渭陵陪葬墓和疑似陪葬墓统计表 ①

编号	位置	封土（东西 × 南北）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	备注
1	墓园第一排第一座	无存	长 42 米、宽 2 ~ 8 米	南部	竖穴土圹。长 14 米、宽 12 米	—
2	墓园第一排第二座	覆斗形，底边 28 米 ×29 米、顶部 10 米 ×9 米、高 10 米	长 35 米、宽 4 ~ 9 米	南部	—	—
3	墓园第一排第三座	大多被破坏掉。残存底边为 23 米 ×33 米、残高 3 米。长方覆斗形。	长 28 米、宽 2 ~ 8 米	南部	—	—
4	墓园第一排第四座	无存	长 56 米、宽 3 ~ 7 米	南部	竖井土圹。长 15 米、宽 13 米	墓道夯层显露
5	墓园第一排第五座	覆斗形。底边 32 米 ×35 米、高 12 米	长 30 米、宽 2 ~ 5 米	南部	—	—
6	墓园第一排第六座	覆斗形。底边 32 米 ×27 米、顶边 6×7 米、高 12 米	长 33 米、宽 3 ~ 7 米	南部	—	—
7	墓园第一排第七座	覆斗形。底边 29 米 ×25 米，高 12 米	长 28 米、宽 3 ~ 8 米	南部	—	—
8	墓园第二排第一座	已平，无存	长 23 米，宽 3 ~ 6 米	南部	东西 11 米、南北 16 米	—
9	墓园第二排第二座	已平，无存	长 20 米、宽 3 ~ 6 米	南部	东西 6 米、南北 8 米	—
10	墓园第二排第三座	已平，无存	长 32 米、宽 1.5 ~ 3.5 米	南部	上部有一盗洞。暗券	—
11	墓园第二排第四座	腹斗形。底边 25 米 ×31.11 米	长 35 米、宽 4 ~ 7 米	南部	—	—
12	墓园第二排第五座	大部分被毁。残长底边 21 米 ×10 米、残高 2 米	长 25 米、宽 2 ~ 6 米	南部	—	—

①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107 ~ 110 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东西 × 南北）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	备注
13	墓园第六排第五座	覆斗形。底边残长 20 米 ×24 米、顶边 4 米 ×5 米，高 6 米	长 25 米、宽 1.5 米 ~ 5 米	南部	—	—
14	墓园第七排第一座	已平	长 28 米、宽 3 ~ 8 米	南部	东西 13 米、南北 16 米	—
15	墓园第三排第一座	覆斗形。底边 35 米 ×26 米、高 8 米	长 25 米、宽 2 ~ 8 米	南部	—	封土南面钻有三孔窑洞
16	墓园第三排第二座	已平	长 17 米、宽 2 ~ 5 米	南部	正方形。边长 10 米	—
17	墓园第三排第三座	已平	长 5 米、宽 4 米	南部	暗券	竖井式墓道
18	墓园第三排第四座	已平	不详	不详	不详	被压于水渠下，无法钻探
19	墓园第三排第五座	覆斗形。底边 25 米 ×22 米、顶边 3 米 ×6 米，高 7 米	长 30 米、宽 3 ~ 6 米	南部	—	—
20	墓园第三排第六座	已平	长 28 米、宽 3 ~ 6 米	南部	东西 14 米、南北 13 米	—
21	墓园第三排第七座	已平	无	未发现	东 13 米、南北 14 米	竖穴土圹墓
22	墓园第四排第一座	已平	长 30 米、宽 2.5 ~ 7.5 米	南部	东西 11.2 米、南北 12 米	墓室上有一盗洞
23	墓园第四排第二座	覆斗形。底边 16 米 ×19 米、高 7 米	长 26 米、宽 2 ~ 7 米	南部	—	—
24	墓园第四排第三座	已平，无存	长 27 米、宽 1.5 ~ 3 米	南部	暗券	位置比较偏北
25	墓园第四排第四座	覆斗形。比较浑圆。底边 16 米 ×23 米、顶边 4 米 ×2 米、高 6 米	长 10 米、宽 2 ~ 4 米	南部	—	—
26	墓园第五排第一座	无存	不详	不详	—	位于果园内，无法钻探
27	墓园第五排第二座	已平，无存	长 16 米、宽 3 ~ 7 米	南部	东西 11、南北 11 米	墓室上有一边长 8 ~ 9 米、深 1 米的塌陷坑
28	墓园第五排第三座	已平，无存	长 18 米、宽 2 ~ 5 米	南部	东西 10、南北 11 米	—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东西 × 南北）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	备注
29	渭陵东司马道南、高干渠北	圆丘形，底径 11 ~ 15 米、高 5 米	长 13 米、宽 1.3 ~ 2.2 米	南部	墓室口有一盗洞	墓道塌陷中空
30	渭陵东司马道南、高干渠北	圆丘形，底径 8 ~ 14 米、高 3. 5 米	长 7 米、宽 1 ~ 2 米	南部	墓室口有一盗洞	墓道塌陷中空，略向西南倾斜
31	渭陵东司马道南、高干渠北	圆丘形，底径 7 ~ 9 米、高 3 米	长 8 米、宽 1 ~ 2 米	南部	墓室口有一盗洞	—
32	渭陵东司马道南	圆丘形，底径 12 ~ 15 米、高 3.2 米	长 8 米、宽 1 ~ 2 米	西部	—	—
33	渭陵东司马道北	圆丘形，底径 9 ~ 14 米、高 4 米	长 10 米、宽 1 ~ 2.5 米	南部	—	—
34	渭陵东司马道北	已平，无存	长 8 米、宽 2 ~ 3 米	南部	东西 9 米、南北 11 米	—
35	渭陵东司马道南、高干渠北侧	已平	长 8 米、宽 1.4 ~ 3.5 米	南部	东西 9 米、南北 7 米	墓道略偏向东南
36	35 号墓东南 100 米高干渠下	圆丘形，底径 10 ~ 12 米、高 5 米	长 10 米、宽 12 ~ 15 米	南部	—	封土顶部比较平缓
37	羊角寨村东第一座	圆丘形，底径 21 ~ 27 米、高 8 米	长 29 米、宽 2 ~ 7 米	南部	—	4 座墓东西一线排列比较整齐，间距均匀，可能为一处家族墓地
38	羊角寨村东第二座	覆斗形。底边 29×29 米、顶边 4×5、高 9 米	长 28 米、宽 3 ~ 8 米	南部	—	—
39	羊角寨村东第三座	覆斗形。底边 40 米 ×35 米、顶边 6×7、高 11.5 米	长 30 米、宽 3 ~ 7 米	南部	—	—
40	羊角寨村东第四座	覆斗形。底边 45 米 ×45 米、顶边 9 米 ×9 米、高 12 米	长 25 米、宽 2 ~ 7 米	南部	—	—
41	龚家湾沟西	覆斗形。底边 14 米 ×16 米、顶边 7 米 ×8 米	长 15 米、宽 2 ~ 6 米	东部	—	—
42	龚家湾沟西	覆斗形。底边 16 米 ×16 米、顶边 7 米 ×7 米	长 26 米、宽 2 ~ 9 米	南部	—	—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东西 × 南北）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墓室	备注
43	羊角寨村南 300 米	残存一半。底边残长 18 米 ×21 米、残高 7 米	长 25 米、宽 3 ~ 12 米	南部	—	—
44	养过村西南 500 米	覆斗形。底边 30 米 ×33 米、顶边 8 米 ×9 米、高 10 米	长 24 米、宽 3 ~ 10 米	南部	—	封土破坏严重
45	司魏村东 300 米	覆斗形。底边 23 米 ×24 米、顶边 5 米 ×7 米、高 8 米	长 18 米、宽 3 ~ 7 米	东部	—	45、46 号墓相距很近，二者可能有一定联系
46	45 号墓封土西南 12 米	覆斗形。底边 18 米 ×21 米、顶边 6 米 ×7 米、高 7 米	长 20、宽 2 ~ 7 米	南部	—	—
47	44 号墓封土西 400 米	覆斗形。底边 24 米 ×27 米、顶边 5 米 ×6 米、高 7 米	长 15 米、宽 2 ~ 8 米	南部	—	—
48	185 勘探队东 600 米	覆斗形。底边 34 米 ×37 米、顶边 9 米 ×9 米、高 12 米	长 20 米、宽 2 ~ 10 米	北部	—	48、49 号墓相距很近，二者可能有一定联系
49	48 号墓南 8 米	覆斗形。底边 42 米 ×43 米、顶边 11 米 ×12 米、高 13 米	长 25 米、宽 3 ~ 12 米	东部	—	—
50	48 号墓西 85 米	覆斗形。底边 12×15 米、顶边 6×6、高 6 米	长 12 米、宽 1.5 ~ 3 米	东部	—	—
51	咸阳师院东边近郊公路	覆斗形。底边 30 米 ×32 米、顶边 4 米 ×5 米、高 11 米	长 51 米、宽 8 ~ 18 米。最深 19.5 米	西部	—	可能有陪葬
52	司魏村北、高干渠南	覆斗形。底边 33 米 ×35、顶边 9 米 ×10、高 10 米	长 15 米、宽 4 ~ 6 米	南部	—	封土破坏严重
53	52 号墓封土西 250 米	覆斗形。底边 40 米 ×44 米、顶边 9 米 ×9 米、高 11 米	长 15 米、宽 2 ~ 5 米	南部	—	封土保存较好
54	陵召导航台南、公路紧西侧	圆丘形。底边 16 米 ×18 米、高 5 米	长 18 米、宽 1.5 ~ 3 米	南部	—	—
55	贺家村西南 500 米，新庄村北 500 米	圆丘形。底边 18 米 ×20 米、高 8 米	长 18 米、宽 3 米	南部	—	其时代可能在汉以后

三、陵园变迁

《汉书·王莽传下》："读军书倦，因冯几寐，不复就枕矣。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①

《汉书·外戚传》载：

> 元始五年，莽复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与元帝山齐，怀帝太后、皇太太后玺绶以葬，不应礼。礼有改葬，请发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玺绶消灭，徙共王母及丁姬归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复如故。"太后以为既已之事，不须复废。莽固争之，太后诏曰："因故棺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谒者护既发傅太后冢，崩压杀数百人；开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莽复奏言："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宫，皇天震怒，灾其正殿；丁妃死，葬逾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见变以告，当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请葬丁姬复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宫，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请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开傅太后棺，臭闻数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钱帛，遣子弟及诸生四夷，凡十余万人，操持作具，助将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间皆平。莽又周棘其处以为世戒云。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③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考古工作者已对渭陵做过大量的考古调查和钻探。1965 年至 1973 年，渭陵陵园内共出土 6 件圆雕玉器，这些玉器是前后 4 次发现的，发现过程都纯属意外。1965 年年底，咸阳市周陵乡新庄、陵召村民在两村之间修水渠时，在新庄村土壕挖土，于地下深约 2 米处发现了一个被烧焦红土裹着的东西，清洗后发现是一件白色羽人乘马玉雕，驻村干部卢道明将其收回，交给

---

①《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下》，第 4186 页 。

②《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4003 ~ 4004 页。

③《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 48 页。

了咸阳市博物馆。与此同时出土了“长乐未央”瓦当和粗绳纹板瓦片。1966 年 3 月，周陵乡新庄村民在渭陵北约 400 米处发现羽人骑马玉雕不远的地方挖土筑墙，又挖出了圆雕蹲姿玉辟邪和玉熊，一月后又发现了圆雕玉鹰，当时村民在此处取土筑墙，玉鹰裹在土中，后在刷墙时意外发现了它。1973 年，当地村民在此处取土时，又发现了一件戴冠玉俑头和一件通高仅 8 厘米的带盖鎏金铜鼎，铜鼎里放着两枚大小不同套在一起的鎏金铜编钟，以及一件呈走姿的玉辟邪。



图 60　汉渭陵出土的玉仙人奔马　（编写组供稿）

1979 年，陕西省文管会和咸阳博物馆对渭陵进行了调查[①]。

2002 年 8 月 5 日至 10 月 9 日，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渭陵及其周围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最新的调查、钻探资料分析，其两座“亞”字形、一座“甲”字形的墓葬形制、双重陵园的布局结构、较为规整的道路系统，加之采集的遗物标本都说明这是一座西汉中、晚期的帝陵[②]。在没有更为可靠的资料发现之前，《水经注》的有关记载应是较为可信的，认为是渭陵推论也可以成立。近年来，王建新从对汉平帝康陵的质疑入手，提出渭陵为义陵，引起了学界不小的争议[③]。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6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汉元帝渭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工作。本次调查、勘探面积约 5 平方公里，确定了汉元帝、王皇后陵以及傅昭仪墓的墓葬形制，新发现了渭陵陵园及其较为完备的道路系统和大量的建筑

① 咸阳博物馆：《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1 期。

② 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 年。

③ 王建新：《西汉后四陵名位考》，见《古代文明》（2），文物出版社，2003 年。

遗址、外藏坑等，基本掌握、了解了其形制、布局及结构[①]。

研究成果：

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近年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

张子波：《咸阳市新庄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器》，《文物》，1979年第2期。

咸阳博物馆：《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王建新：《西汉后四陵名位考》，《古代文明》（2），文物出版社，2003年。

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三秦出版社，2012年。

五、遗迹和遗物

渭陵寝园遗址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以及众多的绳纹瓦片、铺地砖残块等。在新庄村北部遗址内的断面上，发现数处绳纹瓦片堆积层和踩踏面。在遗址内的民房内，也发现大量绳纹瓦片、铺地砖残块。1966～1976年，在遗址北部出土玉奔马、玉熊及鎏金铜鼎、编钟和瓦当等文物。咸阳博物馆曾对其进行了部分试掘，清理出部分墙基、路面、居住面以及“长生无极”“长乐未央”、云纹瓦当等[②]。

《汉书·成帝纪》记载：汉元帝去世后办理丧事时，“有司言：‘乘舆车、牛马、禽兽皆非礼，不宜以葬。’奏可。”[③]由此看来，或许汉元帝渭陵玄宫不再陪葬“乘舆车、牛马、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元帝渭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2013年第11期。

② 咸阳市博物馆：《咸阳市近年发现的一批秦汉遗物》，《考古》，1973年第3期；张子波：《咸阳市新庄出土的四件汉代玉雕器》，《文物》，1979年第2期。

③《汉书》卷十《成帝纪》，第302页。

禽兽”之物。但渭陵西北发现的上述精美文物表明，作为明器的“乘舆车、牛、马”和真正的“禽兽”不葬于陵墓之内，但其仿制品则贮藏于帝陵（或皇后陵）的礼制建筑中。后者价值之昂贵，可能不下于前者。

其中玉器有马、熊、辟邪、鹰和人头像。

玉奔马：由奔马、骑者和底座组成。通长 8.9 厘米，高 7 厘米。出土时用朱砂包裹。马呈奔驰腾空状，胸刻飞翼。骑者头束帛巾，身着短衣，双手按着马颈。奔马下衬以底座。底座上线雕相互缠绕的云纹图案，犹如浩瀚的云天。玉奔马应是“天马”的象征，可能被作为“神”物存于帝陵礼制建筑中。

玉熊：高 4.8 厘米，长 8 厘米。熊体肥胖，线条圆润。熊是威武的象征，汉代公卿、列侯都乘坐有熊轼的车；熊又是珍贵动物，熊毛暖而御寒，熊掌系美味佳肴。

玉鹰：长 7 厘米，宽 5 厘米。两翼平伸，尾羽散张。鹰又名鹗鸠，《尔雅·释鸟》疏云：“《春秋》曰，鹗鸠氏司寇，鹰鸷故为司寇”“司寇主盗贼是也。”玉鹰在这里可能象征保护帝陵安全。还可能有另一种意义，古代统治阶级养鹰用于田猎，汉代皇帝常爱狩猎。

玉辟邪：大小各一件。小者长 5.8 厘米，高 2.5 厘米；大者长 7 厘米，高 5.4 厘米。辟邪其实由狮子演变而来。渭陵出土的玉辟邪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辟邪。东汉陵前置石狮或辟邪，可上溯到西汉元帝。东汉宗资墓前有二石兽，在其前腿上部一刻“天禄”、一刻“辟邪”文字。《急就篇》卷三认为：“射魅辟邪除群凶。”可见辟邪是作为神兽置于帝陵附近的。



图 61　汉渭陵出土的玉辟邪　（摄影：郑茂良）

玉俑头像：高 8.5 厘米、宽 4 厘米。

鎏金铜器有鼎和钟。鎏金错银铜鼎 1 件，高 8 厘米、宽 9.6 厘米。鼎身饰鸟纹、云纹

和三角纹。鼎内有玉辟邪和编钟各两件。鎏金铜编钟大小各一件。大者高 6 厘米、宽 4 厘米，小者高 4.2 厘米、宽 2.9 厘米。上述玉器和铜器小巧精致，做工考究，均非实用物品，应是明器或祭品。

此外，还有元帝渭陵寝园遗址、王皇后的寝园和亿年园遗址。

渭陵寝园遗址位于渭陵陵园外北部偏西位置，南北长 300 米，东西宽 180 米。其南边利用了渭陵陵园北墙偏西的部分，西边不超过陵园西墙的延长线，东边不超过北司马道。

王皇后的寝园位于陵园外西北部。遗址南北长 340 米，东西宽 180 米。其西界在陵园西墙的延长线稍微偏西一带，东界在北司马道以西，南界基本至陵园北墙附近，北界在今咸宋公路北部 100 米处、周陵交警队后面。

王皇后寝园遗址北部近几年几乎被破坏殆尽，在这里（咸宋公路北）发现大量绳纹瓦片、砖块和“长生无极”瓦当残块，长条砖、拱形砖、方格乳钉纹铺地砖、下水道残块等建筑材料，以及部分陶盆口沿残片、夯土墙基、砂石柱础等。

瓦当共 21 件，其中云纹瓦当一件，余皆文字瓦当。文字瓦当中有 16 件是“长生无极”瓦当。

罐口沿一件，外面均饰有绳纹，内面饰布纹。

条砖有两种规格。一种宽 19.3 厘米、厚 9.8 厘米，长度不详。另一种宽 18.4 厘米、厚 9.2 厘米，长度不详。

铺地砖按纹饰分为素面、乳钉纹和回纹三种，以乳钉纹和素面发现的最多，回纹相对较少。素面铺地砖边长 32 ~ 33 厘米，厚 4.5 ~ 4.7 厘米。乳钉纹铺地砖发现两种规格，一种厚 4.3 厘米。另一种厚 5.2 厘米，下面边长 33 厘米，上面边长 34.3 厘米。

五角形下水管道残片一件，其外面饰绳纹，内面饰布纹。厚 1.6 ~ 1.8 厘米。

在遗址西南部土壕的断面上，发现有数段夯墙、灰坑和丰富的瓦片堆积。

渭陵附近曾出土“亿年无疆”文字瓦当，这或为“亿年陵”遗物[①]。在周陵镇陵召发现一处遗址，位于迎宾大道和咸宋公路相交处的东北部，西侧被压于迎宾大道路基下，南边距离咸宋公路 100 米。遗址南北长 315 米，东西宽 110 米，钻探发现有夯土、砖瓦等，该遗址中出土

①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12 页。

了不少“永奉乌江”和“亿年无疆”的瓦当。此遗址刚好位于渭陵王皇后陵长寿园的西面，根据其地望、规模和出土的瓦当等物来看，基本上可以断定，这处遗址就是王莽妻子的“亿年园”。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渭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 6 月，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的渭陵保护区包括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傅昭仪陵、一号建筑遗址、二号建筑遗址、二十八星宿陪葬墓园和渭陵陵园外门阙 7 个部分。其中帝陵陵园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150 米、向南 140 米、向东 150 米、向西 15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后陵陵园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150 米、向南 130 米、向东 150 米、向西 14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

第九节　汉成帝刘骜延陵

一、墓主生平

刘骜（前 51 ～前 7），元帝嫡子，母为孝元王皇后。竟宁元年（前 33）即帝位，即汉成帝。成帝在位期间，以王凤为代表的外戚势力进一步膨胀，控制了朝廷大权，政局动荡，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危机四伏。前 22 年，颍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①]。在这种形势下，汉成帝仍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同时大兴土木，挥金如土。绥和二年（前 7）三月丙戌，成帝崩于未央宫，四月乙卯，葬延陵。成帝 20 岁即位，即位 26 年，享年 46 岁。



图 62　由南向北拍摄的汉延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赵飞燕，原是长安的官奴婢，后被赐予阳阿主家，善歌舞，因体态轻盈，被称“飞燕”。汉成帝常到阳阿主家寻欢作乐，见到赵飞燕后召入宫中，后把她妹妹赵合德也纳入皇宫。赵氏

①《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314 页。

姐妹二人同时被立为婕妤，贵倾后宫。许皇后被废，立赵飞燕为皇后。赵氏姐妹在宫中飞扬跋扈，作恶多端。成帝暴亡后，赵合德被迫自杀，赵飞燕幸免。哀帝即位，她还被尊为皇太后。后来王莽掌权，她被迫徙居北宫，不久又被废为庶人，赵飞燕闻讯后自杀身亡。“就其园”而葬于延陵附近。

孝成班婕妤，祖籍楚人，其父班况为左曹越骑校尉。她是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姑母、班固的姑祖母。成帝即位之初，她被选入后宫，始为少使，后因颇得成帝宠爱和太后赏识，升为婕妤。鸿嘉三年（前 18），由于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因而许皇后被废。班婕妤据理反驳，才免于罹难。为了躲避赵飞燕姐妹的迫害，她要求“共养太后长信宫”中。成帝死后，她又以婕妤的身份“充奉园陵”，死后葬于延陵附近[①]。

二、营建始末

延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周陵镇严家沟村西北。

建始二年（前 31）闰正月，“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②]。因筑陵于渭城延陵亭部，故陵取名于其所在地，称之为延陵。传世的汉代“成山”文字瓦当，疑即成帝延陵的遗物。而到初陵已建 10 年之后，成帝决定放弃初陵，另建昌陵。鸿嘉元年（前 20），“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③]。

《水经注》卷八引《关中记》曰：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鸿嘉二年（前 19）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④]。然而在昌陵修建 5 年后，它的营建引起大臣们的群起反对，永始元年（前 16）秋七月，汉成帝停止了昌陵的修建，继续修建延陵[⑤]，昌陵则废弃至今。

---

①《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第 3983 ~ 3988 页。

②《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305 页。

③《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316 页。

④《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317 页。

⑤ 永始元年（前 16）秋七月，诏曰：“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过听将作大匠万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天下虚耗，百姓罢劳，客土疏恶，终不可成。朕惟其难，怛然伤心。夫‘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汉书》卷十《成帝纪》，第 320 页。

据调查，昌陵位于今西安市灞桥区和临潼区交界处的灞桥区吕家堡北、临潼区董家村南，按行政区划属临潼区。关于昌陵陪葬墓情况，目前还不清楚，但据文献记载，当时汉成帝曾“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于昌陵。后来由于“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光禄大夫刘向于成帝永始元年（前 16）上奏《谏营昌陵疏》，力谏成帝停建昌陵。昌陵修建工程半途而废，可能昌陵附近的达官显贵们受赐的“冢地”以后也废而不用，但昌陵工程罢修之前，那些“冢地”可能已有使用的了。

按文献记载的昌陵遗址应为一高十余米的巨大土台，在台中间有不规则形状凹坑，坑底有夯土层，当地人俗称“八角琉璃井”。近年来附近村庄纷纷在此采土烧砖，近十个砖厂在快速蚕食着昌陵遗址，原土台几乎荡然无存，当年巨大土台仅存十之一二，已经看不出一点“八角琉璃井”的样子，所见情景触目惊心。



图 63　汉昌陵遗址现状　　（摄影：郑茂良）

延陵陵园平面呈南北较长的长方形，四面垣墙现地面基本没有保存。经钻探，垣墙宽 6 ~ 8 米，东墙长 506 米，西墙长 528 米，南墙长 410 米，北墙长 408 米（均指外围）。垣墙四面皆设有门阙，门阙均正对封土中部，除西阙地面无存外，其余的门阙皆有保存。门阙皆向垣墙内面凸出，门阙长 40 ~ 42 米，宽 14 ~ 17 米，门道宽 8 ~ 16 米。

延陵封土位于陵园中部略偏南位置，其北边距离陵园北墙 218 米，南边距离陵园南墙 116 ~ 120 米，西边距离西墙 125 ~ 130 米，东边距离东墙 105 米。通过对延陵封土四周全面

钻探，在其南部偏西位置发现墓道一条。墓道南部平面呈梯形，长 30 米，宽 30 ~ 63 米；北部平面基本呈长方形，长 70 米，宽 63 ~ 65 米。墓道南北总长 100 米（指封土外面暴露部分），其中的填土为红褐色五花土，夯筑，两壁发现有台阶。封土外其余三面经钻探未发现墓道暴露。另外，在陵园内北部中间距离封土北边 120 米处发现陪葬坑一条，坑南北宽 5 米，东西长 8 米。

据记载，葬在延陵附近的成帝后妃有许皇后、赵皇后、班婕妤和马婕妤等。许皇后，位居皇后多年无子，她的姐姐便“祝诅后宫有身者王美人及（王）凤等”，事情败露后，“许后坐废处昭台宫”。后来为了恢复皇后之位而私下贿赂定陵侯淳于长，又被发觉，“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①]。所谓交道，即一横一纵的十字大道，古代城门外多有交道，陵园门外置交道可能是仿效城门交道而建。交道厩即位于十字路口附近的马厩，刘庆柱认为延陵交道厩应在延陵陵园南门外，北（或西北）距延陵约 2 里，延陵以南 2 里的一个墓冢或许为许皇后之墓[②]。但是从咸阳原上西汉后陵的排列位置来看，这一位置经不起推敲。“延陵以南二里”之地已经超出了延陵陵区的范围，属于臣民的葬区，许皇后虽被废贬，但也不会混葬于一般的臣民葬区，应该在距离延陵更近的地方。交道厩的位置是确定许皇后陵位置的一条重要线索，延陵交道厩可能位于延陵陵园北门北部 600 余米处的位置，此地刚好是延陵北司马道同陪葬墓园北墙外的东西大路相交之处，在这一交道的西部有三座圆丘形封土，其中之一可能就是许皇后的陵墓。另外两座可能是赵飞燕姊妹的墓葬。赵飞燕姊妹同许皇后皆为自杀身亡，她们三人埋葬在一起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上述结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延陵的后陵也位于帝陵的西北部。

延陵封土东北部 500 多米处有两座大型墓葬，南北排列，过去一直被认为是汉成帝的后妃陵墓，北面的一座被当作班婕妤墓[③]。根据钻探调查的结果，参照凤翔、临潼发现的秦公王陵，并结合文献的记载，考古工作者认为是秦国王陵，南边的是王陵，北边的是秦王夫人陵。两座陵墓皆有四出墓道，周围有大型围沟环绕，陵园内有类似寝园性质的建筑遗址和陪葬墓。在清

---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3982 ~ 3983 页。

②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15 ~ 116 页。

③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16 ~ 117 页。



图 64　被误传为“班婕妤墓”的秦国王陵　（摄影：郑茂良）

代该墓被误认为是周共王墓，墓前还有毕沅立的“周共王陵”碑一通。

班婕妤为了避免受到赵飞燕姐妹的迫害，要求“共养太后长信宫”，成帝死后，班婕妤“充奉园陵，薨，因葬园中”[①]。说明班婕妤死后葬于延陵陵园或寝园附近。在延陵东南 700 多米、严家沟遗址东南 160 多米处有 5 座墓葬，封土皆为圆丘形，可能为成帝的嫔妃的墓葬，其中之一可能是班婕妤的墓葬，此地基本位于二道原的边缘，距离严家沟遗址很近，属于“近园”之地。

马氏二婕妤，茂陵邑人，系赵国大将赵奢之后。赵奢有功，被赵惠文王赐以爵号“马服居”，其子孙因以为氏。汉武帝时，赵奢的后代以吏二千石的身份，从赵国邯郸迁到茂陵。马氏二婕妤的祖父马通，被封重合侯。马通之子马宾，号使君，汉宣帝时以郎持节。汉成帝时，马宾的两个女儿被选入皇宫，并为婕妤，死后陪葬于延陵。延陵以东 550 米有一墓，封土已被破坏，残高 2 ~ 5 米，封土底部东西长 110 米，南北宽 120 米。就其位置来看，似为成帝后妃的坟墓。

陪葬墓园位于距离延陵陵园西墙 460 余米处的黄家窑至西石村一带，墓园四面皆有夯筑垣墙，现地面基本没有遗存。经钻探，在距离地表 0.5 ~ 1 米的位置发现夯筑墙基，墙基宽 3 ~ 4 米，大多为 4 米，夯层厚 6 ~ 10 厘米。墓园呈南北较长的长方形，南北长 1420 米，东西宽 606 ~ 642 米。范围从今西石村南的旅游路一直到原边高干渠北 50 ~ 100 米处。墓园南部 200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3983 ~ 3988 页。

多米宽、500 多米长的部分已被砖场取土而毁坏无存；墓园西墙保存较多，除南部被挖掉 200 多米长的一段外，余皆有保存；东墙由北往南断断续续，多有保存，其南端已经延伸至咸阳殡仪馆门前的咸宋公路上；北墙东部 200 米长的一段被取土毁坏；南墙仅余东部 80 米长的一段和西南角。西墙由北端往南 400 米处的垣墙上开有一门，门宽 8 米；在东墙相对位置有 100 多米没有发现墙基，探孔内发现不少瓦片及部分踩踏痕迹，此处也应开有一门。南、北二墙因毁坏太多，门的情况无法得知。

墓园中部及北部分布有排列整齐的墓群，地面现存封土 11 座，钻探又发现 4 座封土无存的墓葬，共计 15 座。这些墓葬由南往北共分为 5 排。第一排 1 座，封土呈覆斗形，最为高大，其底边距离西墙 76 ~ 82 米。封土底部边长 83 ~ 84 米，顶部边长 25 ~ 26 米，高 18 米。距离顶部 3 米处封土四面各留一平台。在封土西面钻探发现墓道一条，长 26 米，宽 10 ~ 20 米。封土西南部发现一长 51 米、宽 26 米的陪葬坑。封土南部原立有“许皇后陵”文物保护标志碑，后不知其踪。

从西汉帝陵的陵区布局来看，皇后和嫔妃有专门的陵地，不会同其他人混杂在一起。从前后承继的顺序和陵区的排列看，元帝和成帝为父子关系，二者的陵墓均设置有大型的陪葬墓园，所以，延陵同渭陵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渭陵陵墓西北为王皇后陵，东北为傅昭仪陵。渭陵陪葬墓园位于傅昭仪陵的东北，皇后陵没有被安排在陪葬墓园内，陪葬墓园当为西汉王朝的



图 65　汉延陵陪葬墓园中所谓的“许皇后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皇室、外戚、重臣等所设。所以，延陵陪葬墓园内的这座陵墓不会是成帝的“许皇后陵”。

墓园内第二排 4 座墓葬，封土皆有保存，均为覆斗形，距离第一排封土 147 米，2 号、3 号封土间距 30 米，3 号、4 号封土间距 40 米，4 号、5 号封土间距 122 米。这一排中位列两边的 2 号、5 号墓葬的墓道均呈曲折形，基本对称，3 号、4 号墓的墓道均南向。

第三排 3 座墓葬，同第二排的 2、3、4 号墓葬南北基本正对，其中两座墓道南向，一座墓道西向（6 号），7 号、3 号墓葬的封土南北间距 100 米。

第四排有 4 座墓葬，同第三排墓葬的封土间距 120 米，墓道均南向，最西边的一座（9 号）的封土无存，其余 3 座封土皆存。第五排 3 座墓葬，封土均遭平毁，钻探发现墓道皆南向，13、14 号墓葬的墓室距离墓园北墙仅 6 ~ 10 米。

延陵的陪葬墓多分布在延陵的东部、南部一带，西部也有一部分，其中的一部分应该是陪葬于延陵的墓葬，这些墓葬多两个或三个成组分布。

三、陵园变迁

《水经注》卷十九：“汉成帝建始二年（前 33），造延陵为初陵，以为非吉，于霸曲亭南更营之。”①

《关中记》：“延陵，在长安西北四十里，渭陵之东，延乡之地也。成帝起延陵，城邑以成，而言事者以为不便，乃更造昌陵，在霸城东二十里。运沙渭滨，取东山土。东山土与粟同价，所费巨亿，数年而陵不成。”②

《三辅黄图》：“成帝延陵，在扶风，去长安六十二里，一曰成帝于霸陵北步昌亭起寿陵，即成帝之废陵也。王莽时，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罘罳，曰毋使民复思也，又以墨色涔其周垣。”③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西汉成帝在位期间修建了两座陵墓，延陵与昌陵。延陵位于咸阳原上的西汉主陵区内，地

---

①（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卷十九，中华书局，2007 年，第 463 页。

② 刘庆柱：《关中记辑注》，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114 ~ 115 页。

③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卷六，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438 页。

理形势和历史传统十分优越；昌陵位于汉长安城东南的戏乡，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昌陵是在延陵建设了近十年之后开始修建的，由于其所在地势等原因，建设了 5 年即被放弃，又返回延陵。昌陵的修建致使国库空虚、民力疲乏。

为何要营建昌陵呢？主要原因是成帝欲恢复已经停止的陵邑。因为当时延陵所在的位置已经无法再设置一个陵邑了。据《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决定兴建昌陵后，即于当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汉书·陈汤传》云：

> 汤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于是天子从其请，果起昌陵邑，后徙内郡国民。①

如果不考虑解万年、陈汤的个人用心，仅从徙关东豪杰，以强京师、衰弱诸侯的角度来讲，正符合成帝当时所处社会环境的需要，或者说，这样做对成帝来说既是效祖宗之法，也是摆脱困难局面的一项积极措施。徙关东民以强京师，是自高祖以来就采取的一贯做法，移民不仅可以增强京畿地区的经济实力，而且也可以削弱诸侯的地方势力，这样做对稳定中央政权的统治有积极作用。

《汉书》记载，成帝鸿嘉元年（前 20）始筑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工程浩大，动工 5 年后“天下虚耗，百姓罢劳”，未竟而废。与昌陵同时开工营建的昌陵邑，因昌陵罢修，徙居陵邑的“大臣名家皆占数于长安”，繁华一时的陵邑遂销声匿迹。昌陵邑遗址位于临潼区斜口街道窑村北侧，约覆盖斜口街道的窑村、于李村、代张杨村、西泉街道椿树村等区域，在遗址范围内发现大量汉代板瓦、筒瓦、“长生无极”瓦当残片，并有多处夯土遗迹。遗址区域内曾有多座封土墓，现多已被平毁，仅在温家寨东现存有一高约 5 米、直径约 22 米的圆形封土大墓冢。该遗址区域内地表以下有较厚的砖瓦堆积层，出有大量文字瓦当②。

---

①《汉书》卷七十《陈汤传》，第 3024 页。

② 呼延思政：《临潼发现窑村遗址 疑为荒淫皇帝汉成帝昌陵邑遗址》，《西安晚报》，2008 年 12 月 4 日。

2001年7月至2004年9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延陵进行大规模的钻探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将其调查结果以简报的形式予以公布[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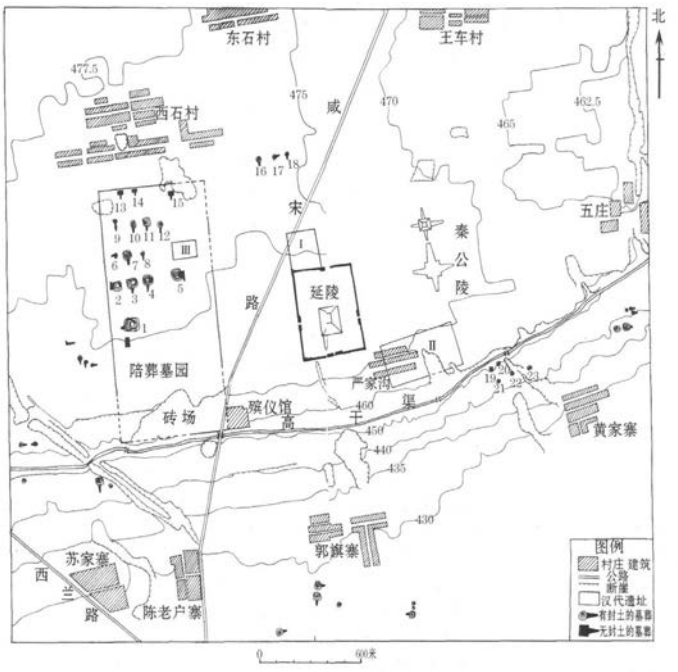


图66　西汉延陵钻探调查平面　（采自《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研究成果：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王建新：《西汉后四陵名位考》，《古代文明》（2），文物出版社，2003年。

尚民杰：《汉成帝昌陵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

刘卫鹏、岳起：《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五、遗迹和遗物

延陵封土位于陵园中部略偏南位置，其北边距离陵园北墙218米，南边距离陵园南墙116～120米，西边距离西墙125～130米，东边距离东墙105米。封土呈覆斗形，平直规整，南面、西面各有两道塌陷凹痕，北面、东面保存较好。封土南面有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所立的“汉成帝延陵”石碑一通。封土底部东边、南边均长162米，西边长170米，北边长160米。顶部东、西两边均长56米，南、北两边皆长53米，高25.70米。顶面正中心塌陷有一直径25～30米

① 刘卫鹏、岳起：《陕西咸阳市西汉成帝延陵调查记》，《华夏考古》，2009年第1期。

的大坑，坑最深达 4 米。

陪葬墓园位于距离延陵陵园西墙 460 余米处的黄家窑至西石村一带，墓园四面皆有夯筑垣墙，现地面基本没有保存。延陵的陪葬墓多分布在延陵的东部、南部一带，西部也有一部分。这些墓葬多两个或三个成组分布。在延陵东司马道南部、严家沟东南 300 米处有一组 5 座墓葬，封土均为圆丘形，底径 15 ~ 23 米，高 3 ~ 5 米，其规模和位置同渭陵东部所谓的“七妃冢”极为相似，应该属于陪葬延陵的墓葬，钻探均未发现墓道，可能被封土覆压。再往东的五庄村南有一组 5 座墓葬，其中 3 座为覆斗形封土，两座为圆丘形封土，覆斗形封土的墓道均东向，圆丘形封土钻探未发现墓道。



图 67　清代毕沅所立“汉成帝延陵”碑　（摄影：郑茂良）

在延陵南部、西部也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墓葬，大多两个一组、三个一群。大型墓葬均有覆斗形的封土，中小型的多为圆丘形封土，钻探发现墓道多东向和南向，也有一部分西向者。

较为突出的遗迹有：寝园遗址、东南部遗址、建筑遗址。

寝园遗址（1 号）位于陵园外西北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16 米，东西宽 190 米。其南墙利用了延陵陵园的北墙，西界在陵园西墙的延长线一带，东界位于延陵北司马道以西。遗址内发现大量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回纹和素面铺地砖，卵石以及瓦当残块等。探孔内发现大面积夯土、砖瓦堆积等。

东南部遗址（2 号）位于延陵东南严家沟村东部和南部，东西长 450 米，南北宽 250 米。其西界在距离延陵陵园东墙 100 米的位置，遗址西部大部分被压于严家沟村的民房下，在严家沟村东南发现一道东西向夯墙，墙宽 5 ~ 6 米，往西延伸 150 米后，再往北折，延伸 160 余米中断。遗址东部大部分被砖场取土毁坏，在砖场取土场的一个断面上发现一道南北向夯土墙，附近发现数量极其丰富的绳纹瓦片、素面条砖、拱形砖，素面、乳钉和回纹铺地方砖，豆绿色

砂石块，下水道残块，“长生无极”瓦当残块以及陶罐、盆、瓮的口沿残片等。

建筑遗址（3 号）在墓园内北部偏东，正对第三排陪葬墓的东部。遗址东西长 140 米，南北宽 100 米，其西部地面仍残存一块高 0.2 ~ 0.6 米的台地，上面暴露出一段夯墙和大量绳纹板瓦、筒瓦残片，素面及回纹铺地砖，回纹空心砖、卵石、红烧土等，遗址内还发现有“长生无极”瓦当残片。

延陵钻探调查采集的遗物标本主要集中于延陵东南部的遗址（2 号），即严家沟遗址，种类有陶质的生活器皿罐、盆、瓮口沿残片，以及券砖、条砖、铺地砖、下水道、瓦当、板瓦和筒瓦等建筑材料。罐口沿 3 件，皆侈口，束颈。楔形砖 1 块，断面呈梯形。长 34.5 ~ 36.5 厘米，宽 9.5 ~ 12.5 厘米，厚 10 厘米。条砖 1 块，平面呈长方形。长 35.5 厘米，宽 19.4 厘米，厚 9.5 厘米。铺地砖 3 块，分为素面和回纹两种。素面铺地砖边长 30 ~ 31.8 厘米，厚 4.5 厘米。回纹铺地砖一面饰回纹，一面素面，按其形状可分回纹方砖和回纹条砖两种。回纹条砖实际上是回纹方砖的二分之一。回纹铺地条砖长 35 厘米，宽 17.5 厘米，厚 4.5 ~ 4.6 厘米。回纹铺地方砖边长 34.7 ~ 35 厘米，厚 4.5 ~ 4.7 厘米。瓦当均为“长生无极”文字瓦当残块，多者存三字，少者仅存一字。当面中心均为圆圈乳钉纹，双线四分界格。板瓦外面皆饰绳纹，内面多素面，个别有纹饰。瓦多厚 0.8 ~ 1 厘米，个别的厚达 1.3 厘米。保存较完整的板瓦宽度基本为 39 厘米，长度不详。筒瓦外面饰绳纹，内面饰布纹或麻点纹。瓦厚 1 ~ 1.2 厘米，保存较完整的瓦唇长 4.8 ~ 5.3 厘米。

表六　成帝延陵陪葬墓和疑似陪葬墓统计表[①]

编号	位置	封土（南北 × 东西）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1	陪葬墓园第 1 排第 1 座	覆斗形，底边 83 米 ×84 米、顶边 25 米 ×26 米、高 17.97 米。近顶处封土四面留有台阶，台高 3 米	长 26 米、宽 10 ~ 20 米。封土南部偏西发现一陪葬坑，坑南北长 51 米、东西宽 26 米、深 7.5 米	西部	封土南部原竖立有“许皇后陵”标志牌
2	陪葬墓园第 2 排西边第 1 座	覆斗形，底边 60 米 ×55 米、顶边 9 米 ×8 米	南北总长 45 米、宽 3 ~ 21 米；东西宽 14 ~ 21 米、南北长 24 米	西部	墓道呈曲尺形，往南曲折同 5 号墓墓道相对

①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119 ~ 121 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南北 × 东西）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3	陪葬墓园第 2 排西边第 2 座	覆斗形，底边 56 米 ×58 米、顶边 8×8 米	长 20 米、宽 2.5 ~ 7 米	南部	—
4	陪葬墓园第 2 排西边第 3 座	覆斗形，底边 56 米 ×52 米、顶边 8×7 米	长 34 米、宽 1.5 ~ 6 米	南部	—
5	陪葬墓园第 3 排最东边第 1 座	覆斗形，底边 60 米 ×62 米、顶边 7×6 米	总长 67 米、宽 3 ~ 17 米	东部	墓道呈曲尺形，朝南曲折，同 2 号墓墓道相对
6	陪葬墓园第 3 排西边第 1 座	覆斗形，破坏较甚底边残长 18 ~ 20 米、顶边 7 米 ×4 米	长 30 米、宽 3 ~ 10 米	西部	—
7	陪葬墓园第 3 排西边第 2 座	覆斗形，破坏较甚，底边 47 米 ×45 米、顶边 10 米 ×10 米	长 33 米、宽 6 ~ 12 米	南部	—
8	陪葬墓园第 3 排西边第 3 座	仅底部余 0.5 ~ 1.2 米高的部分，残长 20 ~ 24 米	长 28 米、宽 2.5 ~ 8 米	南部	墓室上发现一盗洞
9	陪葬墓园第 4 排西边第 1 座	已平	南半部长、宽 3 ~ 4.5 米，中间过洞宽 3 米；北半部长 21 米、宽 2.3 ~ 6 米，北半部有一天井	南部	竖穴墓室，墓口南北宽 10 米、东西长 15 米
10	陪葬墓园第 4 排西边第 2 座	覆斗形，一半已废，底边 56 米 ×37 米、顶边 35×3（残）米	长 33 米、宽 2 ~ 8 米	南部偏西	—
11	陪葬墓园第 4 排西边第 3 座	覆斗形，底边 54 米 ×54 米、顶边 6×7 米	长 30 米、宽 3 ~ 7 米	南部	封土保存较好
12	陪葬墓园第 4 排最东第 1 座	覆斗形，底边 36 米 ×36 米、顶边 8×7 米	长 36 米、宽 3 ~ 6 米	南部	封土保存较好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南北 × 东西）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13	陪葬墓园第 5 排最西第 1 座	已平	长 26 米、宽 2 ~ 8 米	南部	墓室暗券
14	陪葬墓园第 5 排中间第 1 座	已平（被盗）	长 21 米、宽 2.5 ~ 8 米	南部	墓室暗券
15	陪葬墓园第 5 排东边第 1 座	已平	长 30 米、宽 2 ~ 7 米	南部	墓室上塌陷一长方形坑
16	西石村东南西边 1 座	圆丘形，底径 28 米、高 6 米	长 26 米、宽 2 ~ 8 米	南部	3 座墓东西排列整齐，间距 50 米、75 米
17	西石村中间 1 座	圆丘形，底径 17 ~ 22 米、高 5 米	长 24 米、宽 3 ~ 10 米		
18	西石村东南东边 1 座	圆丘形，底径 22 ~ 23 米、高 5 米	长 23 米、宽 2 ~ 4 米		
19	严家沟东南北排西	圆丘形，底径 14 ~ 16 米、残高 3 米	未发现，可能被封土覆盖		—
20	严家沟东南北排东	圆丘形，底径 23 ~ 27 米、残高 4 米	同上		—
21	严家沟东南南排西	圆丘形，底径 20 ~ 23 米、残高 4 米	同上		—
22	严家沟东南南排中	圆丘形，底径 17 ~ 20 米、残高 5 米	同上		—
23	严家沟东南南排东	圆丘形，底径 15 ~ 16 米、高 3.5 米	同上		—
24	煤校东北偏西	底边 20×16 米、高 5 米	长 18 米、宽 4 ~ 8 米	东部	—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南北 × 东西）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25	煤校东北偏东	覆斗形，底边 16 ~ 17 米、顶边 3 ~ 5 米，高 5 米	长 10 米、宽 1 ~ 2 米	东部	—
26	邮校东北	圆丘形，底径 22 ~ 32 米、高 5 米	未发现		三墓呈“品”字形分布
27	邮校东北	覆斗形，底边 43 米 ~ 52 米、顶边 12 ~ 15、高 9 米，	现代坟地覆压，无法钻探	东部	
28	邮校东北	圆丘形，底径 9 ~ 11 米、高 4 米	长 8 米、宽 1 ~ 3 米	南向	
29	郭旗寨南	覆斗形，底边 42 ~ 44 米、顶边 7 ~ 8 米、高 15 米	长 16 米、宽 2 ~ 6 米	西部	—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延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 6 月，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的延陵保护区包括帝陵陵园、建筑遗址、陪葬墓园等。其中帝陵陵园又分为帝陵、1 号建筑遗址、3 号建筑遗址、1 区陪葬墓和 5 区陪葬墓 5 个部分。帝陵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230 米、向南 120 米、向东 120 米、向西 14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

第十节　汉哀帝刘欣义陵

一、墓主生平

刘欣（前 35 ～前 1），系元帝庶孙，定陶恭王之子，为丁姬所生。3 岁时嗣立为定陶王。元延四年（前 9），刘欣随祖母（孝元傅昭仪）来到京师长安。由于他“通习能说”诗书经典，颇受成帝器重。“成帝也自美其才，为加元服而遣之，时年十七矣”[①]。傅太后在长安多方为其孙子活动，通过成帝宠妃赵昭仪和骠骑将军王根，劝说无嗣的成帝，让刘欣续嗣。绥和元年（前 8），刘欣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成帝去世，四月丙午，刘欣即位，是为汉哀帝。哀帝即位时，贵族大量兼并土地，导致国家财源枯竭，中央政权日渐削弱，阶级矛盾激化，西汉的统治已经危机四伏。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汉哀帝曾下令规定封建官僚占有耕地和奴婢的数量。但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土地兼并日趋激烈，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元寿二年（前



图 68　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拍摄的汉义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①《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 333 页。

1）六月戊午，哀帝崩于未央宫，同年九月壬寅葬义陵。

孝哀傅皇后，系傅晏之女，是定陶太后（即孝元傅昭仪）的侄孙女。绥和二年五月（前7），立为皇后。哀帝死后，傅氏失势，孝哀傅皇后退就桂宫，“后月余，复与孝成赵皇后俱废为庶人，就其园自杀。”[①] 她可能被合葬于哀帝义陵。

二、营建始末

《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二年（前5），哀帝“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②]。渭城在今咸阳市秦都区窑店镇附近，义陵应在窑店镇西北的原上。汉代渭城西北原上的“永陵亭部”，取名当源于秦悼武王永陵。这一带即西汉时代渭城县的永陵亭部。汉哀帝预建的义陵，也当在此。

义陵位于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周陵办南贺村东南，东眺惠帝安陵，西临元帝渭陵。哀帝墓封土形如覆斗，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均为方形。

义陵陵园外垣墙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1857米，宽1540米，墙体宽3.5米。东墙至坡刘—阎家寨公路，南墙至咸阳原边缘，西墙至南贺村东公路处，北墙至司家庄村北约150米处。墙基掩埋于现代地面之下，距地表0.5～1米，残存高度0.4～0.8米，夯层厚0.08～0.1米，土质密实坚硬。

外垣墙对应帝陵西、北墓道的位置分别设有一门；对应东、南墓道的位置破坏严重，门址遗迹无存。西门址保存完整，为南北对称的三出门阙，通长73.8米，宽9.5米，门道宽2.4～2.9米；北门址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通长72.8米，宽5米，由于破坏严重，门道形制不清。垣墙之外有壕沟围绕，二者间距16～34米。壕沟断面呈梯形，开口距地表0.6～1米，宽2～4.4米，深2.5～2.8米，填土黑褐，土质较软。外垣墙、外壕沟的南段、东段南部破坏无存，其余部分保存基本完整。

帝陵陵园平面呈方形，四周有垣墙围绕，中部各设一门。帝陵封土位于陵园的中部，墓穴压在封土之下。封土周围未发现外藏坑。陵园垣墙边长418米，东墙宽3.5～3.9米，南墙宽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4005页。

②《汉书》卷十一《哀帝纪》，第340页。

2.3 ~ 6.6米，西墙宽3.1 ~ 4.7米，北墙宽3.8 ~ 4.8米。墙基掩埋于现代地面之下，距地表0.4 ~ 1.4米见夯土基址，残存高度0.4 ~ 2米，夯层厚0.06 ~ 0.1米，土质坚硬密实，为纯净生黄土。垣墙四面正中各设一门，东、南、西门址所处位置略高于周边地表。门址形制皆为三出门阙，垣墙四角建有角楼或角阙之类的建筑，其夯土基础平面均呈曲尺形。

封土位于陵园中部，现存形状呈覆斗状，封土为五花土夯筑而成，封土四侧的中部分布四条墓道，平面均呈梯形，靠近墓室一端较宽，外端较窄。墓道内填土为五花夯土，土质坚硬，包含大量红土及料姜石。墓葬形制为“亞”字形，由封土底部的墓室及四条斜坡墓道组成，由于封土堆积过厚，帝陵墓室的形制结构尚不明确。

后妃墓，在义陵东北620米，有个墓冢，封土为覆斗形，底部东西100米，南北85米，顶部东西30米，南北17米，高19米。疑此墓即孝哀傅皇后之墓。傅皇后陵园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四周有垣墙围绕，垣墙中部各设一门。封土位于陵园的中部，墓穴压在封土之下。陵园垣墙长179米，宽164米，墙体宽2 ~ 3.2米。夯土基础掩埋于现代地面之下，破坏严重，仅保存有与门址连接的部分。垣墙四面正中各设一门。陵墓封土位于陵园的中部偏东，现存形状呈覆斗状，东、北部破坏较严重，底部边长东78.3米、南72米、西78.2米、北72. 6米；顶部边长东20.4米、南17.5米、西20.2米、北18米，现存封土高19.3米。五花土夯筑，土质密实坚硬。封土南侧正中有斜坡墓道一条，平面呈梯形。填土为五花夯土，含大量红烧土块。形制为“甲”字形，由封土底部的墓室及南侧墓道组成，由于封土堆积过厚，墓室的形制结构尚不明确。

义陵陪葬墓现存封土者有15座，分布在义陵东北的3座，南边5座，西部4座，另有3座分别在义陵东、北和西南。

陪葬于义陵见于文献记载的有董贤。董贤，字圣卿，云阳（今陕西淳化县铁王镇）人，颇受哀帝信任，“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尝赐累钜万，贵震朝廷”。哀帝又把他妹妹纳为昭仪，地位仅次于皇后，下诏为董贤在未央宫北阙之下兴建宅第。据记载，其宅第之豪华不亚于皇宫，“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哀帝又在义陵旁，为董贤修筑冢茔，其规格仿照天子陵墓，“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



图 69　由南向北拍摄的孝哀傅皇后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门阙罘罳甚盛”[①]。董贤生前被封高安侯，义陵附近出土汉代“高安万世”文字瓦当或即董贤茔地建筑的遗物。哀帝死后，王莽掌握了朝廷大权，董贤及妻子自杀而亡，被王莽“羸诊其尸，因埋狱中”。《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六记载的咸阳县东北十八里的董贤墓，可能是哀帝为董贤所修的“寿墓”，而董贤本人并未葬于此地。

经钻探，义陵陵园内除了帝陵、傅皇后陵之外，另有墓葬 7 座，西南部 4 座，东北部 3 座，现存有封土的仅 1 座。朝向南、北、西均有，南向 5 座。竖穴墓 5 座，洞室墓两座。墓葬规模不一，东北部 3 座墓葬位于相对独立的墓园内，墓园为南北向长方形，长 616 米，宽 481 米。西侧与南侧存有垣墙、壕沟，并利用义陵外陵园北墙东段和东墙北段。钻探发现，西墙、南墙及其壕沟未完工，西墙实际长 350 米，南墙实际长 294 米、宽 2.2 ~ 3 米，南墙中部发现有宽 29.5 米的通道。西壕沟实际长 215 米，南壕沟实际长 302 米、宽 2.3 ~ 3.7 米、深 2.5 ~ 3 米。垣墙与壕沟间距为 3 ~ 3.5米。

①《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董贤》，第 3733 ~ 3734 页。

三、陵园变迁

《汉书·平帝纪》：“义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发。”①

《汉书·佞幸传》：“哀帝又令将作为贤起冢茔义陵旁，内为便房，刚柏题凑，外为徼道，周垣数里，门阙罘罳甚盛。”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③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义陵开展过两次较有影响的田野考古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包括义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进行了考古调查；2002 年 7 ~ 8 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义陵及其周围遗迹进行了调查和钻探，探明了帝陵陵园、寝园遗址及部分陪葬墓。上述考古工作大体确定了义陵的部分遗迹，但由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对陵区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和勘探，难以反映出整个陵区的布局和结构。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西汉帝陵考古工作方案〉的批复》（文物保函【2006】1087 号）文件精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2 月对汉哀帝义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重点勘探，调查、勘探总面积约 4 平方公里。此次田野考古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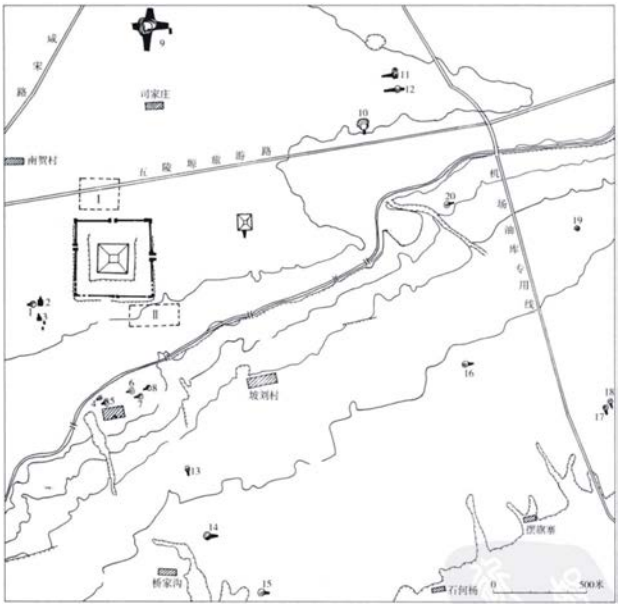


图 70　义陵钻探调查平面图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①《汉书》卷十二《平帝纪》，350 页。

②《汉书》卷九十三《佞幸传·董贤》，第 3734 页。

③《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 48 页。

查清了义陵的陵区范围和布局，新发现了义陵陵园外垣墙、壕沟，帝陵的四条墓道，6 处建筑遗址，多座外藏坑及陪葬墓，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本次勘探调查，基本掌握了义陵陵区的范围、布局、结构及主要内涵，为义陵的大遗址保护和汉陵制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研究成果：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王建新：《西汉后四陵名位考》，《古代文明》（2），文物出版社，2003 年

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哀帝义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5 期

焦南峰、杨武站、曹龙：《神道、徼道、司马门道——西汉帝陵道路初探》，《文物》2008 年第 12 期

焦南峰：《宗庙道、游道、衣冠道——西汉帝陵道路再探》，《文物》，2010 年第 1 期

五、遗迹和遗物

义陵封土位于陵园中部，现存形状呈覆斗状，底部边长东 161 米、南 172.4 米、西 166.4 米、北 173 米；顶部边长东 54 米、南 57.2 米、西 56.3 米、北 57.8 米；现存封土高 29.7 米。封土底部与陵园围墙之间的距离为 115.5 ~ 126.7 米。

陪葬墓的详细状况见“哀帝义陵陪葬墓和疑似陪葬墓统计表”。

表七　哀帝义陵陪葬墓和疑似陪葬墓统计表 ①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1	义陵西南 230 米处	覆斗形，底边 24 米 ×23 米、顶边 4 米 ×6、残高 7 米	长 20 米、宽 2 ~ 12 米	南部	—

①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 年，第 135 页。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2	义陵西南	已平，无存	长 24 米、宽 3 ~ 13 米	北部	墓室 33 米 ×30 米
3	义陵西南	已平，无存	长 6 米、宽 1 ~ 3 米	北部	墓室边长 8 米 ×5 米。墓葬南 18 米和 40 米处有两座陪葬坑，一座边长 5 米 ×5 米，深 6 米，一座边长 3.5 米 ×7 米，深 4 米
4	戚家山村西北	圆丘形，底径 16 ~ 20 米、高 7 米。西部、南部被破坏、其中夯层暴露	长 8 米、宽 3 米	西部	墓道、墓室有部分暴露
5	戚家山村西北，4 号墓封土东南 20 米处	圆丘形，底径 16 ~ 17 米、残高 6 米。仅余东北一角。封土中部有一瓦片坑	长 12 米、宽 1 ~ 2 米	西部	—
6	戚家山村北	圆丘形，底径 27 ~ 30 米、残高 8 米	长 17 米、宽 2.5 ~ 5 米	西部	—
7	6 号墓封土东南 40 余米处	圆丘形，底径 16 ~ 18 米、残高 5.5 米。南部被破坏	长 12 米、宽 1.5 ~ 3 米	西部	封土西南墓道、墓室内夯土层显露
8	7 号墓封土东北 20 米处	圆丘形，底径 19 米、高 6 米	长 10 米、宽 1.5 ~ 2 米	西部	—
9	司家庄北	覆斗形，残存底边 80×63 米、高 13.4 米。东部、南部残，东北部往内挖有一大坑	北墓道长 58 米、宽 35 ~ 50 米，南墓道长 60 米、宽 35 ~ 42 米，东墓道长 60 米、宽 38 ~ 46 米，西墓道长 36 米、宽 27 ~ 40 米	四出	传说为董贤墓。封土四周向外钻探 100 米发现垣墙。东墓道偏南发现一陪葬坑，坑长 15 米、宽 5 米
10	岩村南 1000 米	状如簸箕，当地群众称“簸箕冢”。底边残长 36 ~ 40 米、高 4 米	长 14 米、宽 1.5 米	南部	其时代可能在汉代以后

续表

编号	位置	封土	墓道尺寸	墓道位置	备注
11	岩村砖场南 20 米	圆丘形，现存底径 26 米，南部被破坏	长 77 米、宽 11 ~ 26 米	西部	—
12	11 号墓封土南 40 米处	圆丘形，底径 25 米	东墓道长 35 米、宽 10 ~ 26 米。西墓道长 70 米、宽 12 ~ 26 米	东部和西部	平面呈“中”字形，有东、西两条墓道

义陵陵园内共发现建筑遗址 6 处。这些建筑遗址分布在帝陵陵园北侧及东北部，规模、形制不一，其性质、用途应存在差别。分别是：

1 号建筑遗址，位于帝陵陵园北侧西部，南墙和帝陵陵园北墙西段共用，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 332 米，宽 159 米。遗址周围有垣墙围绕，墙宽 2.8 ~ 4 米，距地表 0.8 ~ 1 米见夯，残存高度 0.8 ~ 1 米，夯层厚 0.08 米。中部偏南有一道东西向的垣墙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判断其应为寝殿建筑。南部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159 米，宽 103 米。在东、北垣墙上分别开有宽 4 米的门道。中部有两处夯土基址，平面均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相距 20 米。西侧夯土基址长 68.5 米、宽 29.7 米；东侧夯土基址长 17.8 米、宽 11.8 米。距地表 0.5 ~ 0.6 米见夯，残存高度 1.3 ~ 1.5 米，夯层厚 0.08 ~ 0.1 米。西侧夯土基址周围有大量瓦片、灰土和红烧土堆积，东侧夯土基址南侧有长 9.9 米的散水遗迹。北部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 229 米、宽 159 米。东墙中部开有宽 6 米的门道，其内侧，间距 5 米有第二道垣墙形成的闭合院落。在这两周垣墙内的南部，有一周垣墙形成的闭合院落，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其西部有夯墙形成的小型院落。

2 号建筑遗址，位于帝陵陵园北侧东部，和 1 号建筑遗址相对分布，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94.6 ~ 98.2 米、宽 86 米。遗址周围有垣墙围绕，墙宽 1.5 ~ 2.3 米。西墙中部开有宽 4 米的门道，距地表 0.8 米见夯，残存高度 0.5 ~ 0.7 米，夯层厚 0.08 米。遗址内有多处夯土基址及瓦片堆积。初步判断其应为便殿建筑。

3 号建筑遗址，距 2 号建筑遗址 97.5 米，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 46 米、宽 19.8 米。遗址周围有垣墙围绕，墙宽 1.6 ~ 2.4 米，西墙中部开有宽 2.8 米的门道，距地表 0.8 米见夯，残存高度 0.7 米，夯层厚 0.08 米。中部有一道东西向夯墙，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

4 号建筑遗址，西南距 3 号建筑遗址 8 米，坐东朝西，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长 48 米、宽 33 米。遗址西部为南北向长方形夯土基址，长 48 米、宽 13 米，距地表 0.5 米见夯，残存高度 0.5 米，夯层不清；东、南、北三面有垣墙围绕，墙宽 1.6 ~ 2 米，东墙北端开有宽 1 米的门道，距地表 0.9 ~ 1 米见夯，残存高度 1 米，夯层厚 0.08 米。

5 号建筑遗址，南距 4 号建筑遗址 63 米，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54 米、宽 39 米。遗址周围有垣墙围绕，墙宽 2.8 ~ 3.8 米，西墙中部开有宽 2.8 米的门道，距地表 0.9 ~ 1 米见夯，残存高度 1 米，夯层厚约 0.08 米。在遗址中部、南部有两处直径为 2.5 米、3.4 米的遗迹，深 10 米不及底，填土灰褐色，包含大量瓦片、灰渣、红烧土屑等。

6 号建筑遗址，位于帝陵陵园东北部，距帝陵封土 467 米，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190.8 米、宽 162.3 米。遗址周围有垣墙围绕，墙宽 1.5 ~ 2.5 米，西墙北端有 23.4 米的缺口，距地表 0.5 ~ 1 米见夯，残存高度 0.2 ~ 0.5 米，夯层厚 0.08 ~ 0.1 米。除西墙外，其余三面垣墙的外侧间距 2.3 ~ 5.5 米有壕沟围绕，宽 2.5 ~ 3 米，开口距地表 0.6 ~ 1.1 米，填土为五花土，含少量瓦片。遗址的东北、东南部各有一处夯土基址，南部有瓦片堆积。东北部夯土基址，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74.5 米、宽 16.4 米，外围有大面积踩踏面，并有零散的瓦片堆积；东南部夯土基址，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长 47 米、宽 30.5 米。距地表 0.5 ~ 0.6 米见粗夯，残存高度 0.4 ~ 0.5 米。

六处建筑遗址之外，还有道路遗迹。义陵陵园内的道路分别称为神道、徼道。神道是指帝陵陵园四门与义陵陵园四门之间的道路。徼道是指帝陵、后陵外围，外陵园内侧的用于“徼巡”的环形道路。义陵东神道的中、东段被破坏，保存长度 674 米，宽 24 ~ 63 米；南神道仅保存有北段，保存长度 78 米，宽 60 ~ 66 米；西神道中段破坏，通长 484 米，宽 33 ~ 50 米；北神道北段破坏，南段保存至五陵路，保存长度 216 米，宽 23 ~ 38 米。距地表 0.5 ~ 1.1 米见神道踩踏面，厚 0.05 ~ 0.2 米，坚硬，呈黑褐色片层状。皇后陵园南门址外，向南有神道和帝陵东神道连接，长 40 米，宽 5 ~ 8 米，距地表 0.6 ~ 1 米见踩踏面，厚 0.05 ~ 0.1 米。帝陵陵园徼道宽 6 ~ 40 米，东、西、北三侧较宽，南侧较窄，距地表 0.4 ~ 1 米见踩踏面，厚 0.1 米，从垣墙向四周呈缓坡状。在傅皇后陵园南、西侧北段有徼道遗迹，东、北侧由于地层破坏，情况不明。南侧徼道保存长度 151.7 米，宽 18 ~ 24 米；西侧徼道保存长度 143 米、宽 94 ~ 98 米，

其西南有宽 5.5 ~ 6 米的南北向道路与东神道相连接。距地表 1 ~ 1.1 米见踩踏面，厚 0.05 ~ 0.1 米，坚硬，呈青黑色片层状。义陵陵园外司马道未勘探，情况不明。

经调查、勘探采集到的文物有建筑材料、陶器等，共 21 件。建筑材料有条形砖、空心砖、铺地砖、陶排水管、板瓦、筒瓦及瓦当，陶器有陶缸等。建筑材料及陶器多为泥质灰陶，陶质细密，烧制火候较高。这些文物采集自义陵陵园，部分陶器残片采集自陪葬墓旁。具体情况如下：

铺地砖 3 件。分为二型：素面，残存平面近长方形，正面饰乳钉纹，背素面；边长 35 厘米，厚 4.5 厘米。

空心砖 1 件。空心砖残块，残存平面近三角形，饰菱形方格纹，内饰四组变形卷云纹，与乳钉纹相间分布。

陶排水管两件。喇叭口状，外部饰粗绳纹。残长 40 厘米，口径分别为 19 厘米、21.5 ~ 23 厘米，厚 1.5 厘米。五角形水管，仅残存一侧面，面饰粗绳纹，长 33 米，宽 19 米，厚 1.7 厘米。

板瓦 1 件。外饰粗绳纹，厚 2.5 厘米。采集于 1 号遗址。

筒瓦 3 件。外饰粗绳纹，内饰布纹。厚 1.4 ~ 2 厘米，末端残。残长 36 厘米，厚 1.8 ~ 2 厘米，瓦唇长 7 厘米。

楔形砖 1 件。素面，平面呈楔形，一侧磨制痕迹明显。长 36 厘米，宽 10 ~ 17 厘米，厚 8 厘米。采集于 1 号遗址西部。



图 71　汉义陵采集瓦当纹饰拓片　（采自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 年）

葵纹瓦当 1 件。瓦当残块，内饰逆时针方向葵纹，形似漩涡纹，外饰逆时针方向葵纹，形成浪花纹。采集于义陵东北，应为战国时期瓦当。

文字瓦当 8 件。其中有“长生无极”瓦当。内区当心为大乳钉，大乳钉外饰一周小乳钉。外区双线分四格，残存篆书“长生”二字，字体纤细。直径 17.3 米，厚 2 ~ 3 厘米。采集于 1 号遗址北部西南。内区当心为大乳钉，大乳钉外饰一周小乳钉；外区双线分四格，残存篆书“安”字，判断为“高安万世”文字瓦当，字体纤细。厚 2.3 厘米。采集于义陵陵园北门址附近。

陶缶 1 件。修复完整，宽折沿，尖唇，广肩，折腹，肩部有刻画符号并有数周暗弦纹，下腹弧收，平底。通高 34.2 厘米，口径 12.8 厘米，腹径 38.4 厘米，底径 21.4 厘米。采集于义陵东南部战国秦墓 211 盗洞旁。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义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 6 月，义陵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的义陵保护区包括帝陵陵园、后陵陵园、帝陵北侧建筑遗址以及 1 ~ 9 区陪葬墓等。其中帝陵陵园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340 米、向南 140 米、向东 140 米、向西 14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边各外延 100 米。

第十一节　汉平帝刘衎康陵

一、墓主生平

刘衎（前 9 ～ 5），系元帝庶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卫姬所生。3 岁时嗣立为中山王。元寿二年（前 1）哀帝去世，王莽迎立年仅 9 岁的中山王刘衎为帝，即汉平帝。当时“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①]。元始三年（3），王莽把女儿嫁于平帝，立为皇后。元始五年（5）冬十二月丙午，平帝崩于未央宫，葬于康陵。



图 72　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拍摄的汉康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平帝刘衎 13 岁纳王莽女儿为皇后，一年后被王莽毒死。王莽篡位后，改孝平王皇后为黄皇室主，逼她再嫁，但她拒从父命。王莽末年，汉兵诛莽，烧未央宫，她说：“何面目以见汉家！”[②]

①《汉书》卷十二《平帝纪》，中华书局，1962 年，第 348 页。

②《汉书》卷九十七下《外戚传下》，中华书局，1962 年，第 4011 页。

自投火中而死。东汉皇帝曾多次到长安祭祀西汉十一个皇帝的陵墓，平帝康陵是其中之一。东汉朝廷可能会把忠于汉家的孝平王皇后合葬于康陵。

二、营建始末

据《陕西通志》卷七十云：“康陵，在咸阳县西二十五里。”西汉帝王崇厚葬，帝陵多陪葬有大量珍贵物品。陵园内还分布有大量建筑物。《西京杂记》称：“汉诸陵寝，皆以竹为帘，皆为水纹及龙凤之像。”[①] 帘子已经如此精美，那么康陵的寝殿与其他陵园设施便可想而知。

康陵陵园平面基本呈正方形，四边均有夯筑垣墙，现地面无存。经钻探，垣墙墙基宽 6 ~ 8 米。陵园四面边长分别为东边 376 米、西边 370 米、北边 378 米、南边 374 米。垣墙四面中部均设有门阙，现地面均没有保存。东阙长 24 米，宽 14 米，门道宽 10 米；西阙长 25 米，宽 13 ~ 14 米，门道宽 10 米；南阙长 18 ~ 20 米，宽 11 ~ 12 米，门道宽 12 米；北阙长 20 ~ 21 米，宽 10 米，门道宽 8 米。

康陵封土位于陵园的中部略偏北，呈覆斗形。封土的底边距离南墙 66 ~ 70 米，距离北墙 46 米，距离东墙 82 ~ 85 米，距离西墙 54 ~ 55 米。封土南边正中略下凹，四面近底处坡度平缓，同上面封土有一定角度。其底边南长 221 米，北长 226 米，东长 243 米，西长 238 米，高 28.7 米。顶部北边长 58 米，南边长 62 米，西边长 56 米，东边长 53 米。封土近顶处四面各留一级平台，平台宽 11 ~ 13 米，其外边北长 88 米，南长 91 米，东长 88 米，西长 89 米。封土四周 5 ~ 7 米深全部为夯土，7 米以下见生土。南部、东部的部分探孔内发现有沙层。陵墓形制为“亞”字形，在封土四面的中部各有一条墓道，平面均为梯形。

王皇后陵位于康陵东南 570 米今咸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院内，陵墓封土为覆斗形，封土底部和顶部平面为方形。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在陵前立“周成王陵”石碑一通，刘卫鹏则认为，可能是秦孝文王的寿陵[②]。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应为汉墓，不但封土形制可以说明这一点，封土附近出土的大量西汉时代砖瓦等遗物也是重要的佐证。从其位置来看，它应是与平帝康陵合

---

①（晋）葛洪撰，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卷二《陵殿之帘》，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90 页。

② 刘卫鹏：《秦孝文王寿陵位置蠡测》，《秦俑发现三十五周年暨秦俑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讨论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10 年。

葬的后妃陵墓，即孝平王皇后陵墓。

王皇后陵有内外两重陵园，均筑有园墙。封土底边边长78 ~ 82米，顶部边长33 ~ 34米，高14.08米。封土四周大部分被现代建筑物所压，钻探仅能取得部分资料。经钻探发现四面均有墓道一条，东墓道西端宽20米，东端宽度和长度无法钻探；南墓道北端宽30米，南端宽度和长度无法钻探；西墓道东端宽20米，西端宽度和长度无法钻探；北墓道长30米，北端宽8米，南端宽度无法钻探。



图73　王皇后陵前所立文物保护标志碑　（摄影：郑茂良）

皇后陵距离康陵陵园垣墙362米，陵园四周皆筑有垣墙，其封土基本上位于陵园中部偏西位置，底边距离东墙240米，距离西墙98米，距离南墙160米，距离北墙178米。南墙东部现在还保留有80余米长的一段，墙体最高达4.5米。其东部还残存一凸出的门阙和一座宽3米的小门。这段墙体已经变成陵召村靠近公路最北一排村民住房的后院墙，破坏比较严重。陵园南墙西段被咸宋公路所压。西墙在今农科所西加油站的紧西边，稍微隆起的西门阙及部分垣墙还残存。北墙及东墙现地面无存，经钻探，在距地表0.8 ~ 1米的深度发现，垣墙外围东长432米，西长425米，南长441米，北长420米，夯墙宽5米，夯层厚6 ~ 8米，均匀细密，十分坚硬。

垣墙四面皆筑有门阙，门阙朝内、外均有突出。东、西门阙基本正对封土的中部，位于东、西垣墙的中部。东门阙长28米，宽22米，门道宽9米。西门阙长26米，宽14米，门道宽9米。北门阙位于北墙偏西位置，基本正对封土的中部，其南墙相对的位置被公路所压，不得其详。北门阙长21 ~ 28米，宽12米，门道宽12米。南墙偏东置一门，门道仅宽3米，门阙长30米，宽18 ~ 20米。垣墙外发现大面积的路土顺垣墙延伸，可能属于围绕陵园的道路。

三、陵园变迁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六年）夏四月丙子，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①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汉平帝康陵是西汉王朝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园，考古成果显示，相对于早、中期的西汉帝陵，其形制布局与陵园结构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2002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0 日，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平帝康陵及其周围遗迹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和调查。本次调查、勘探面积约 5 平方公里，确定了汉平帝和王皇后陵的墓葬形制，探明了康陵陵园、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的两重陵园、“围沟”及相关遗迹，还发现了 10 处建筑遗址，7 座外藏坑。康陵陵园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1691.5 ~ 1696.5 米，东西宽 1418 ~ 1420 米，陵园面积 2.4 平方公里。康陵陵园四周有夯筑垣墙，墙外有围沟环绕。围沟与垣墙间距为 5.5 ~ 5.8 米。康陵陵园在东、西、北三面均未发现门址。仅在南墙中部有一门址，长 82.5 米，宽 9 米，中间为门道，宽 12.5 米。

2008 年 3 ~ 11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汉陵考古队，对汉平帝康陵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勘探，本次调查、勘探面积约 5 平方公里。确定了汉平帝和王皇后陵的墓葬形制，探明了康陵陵园、汉平帝陵园、王皇后陵的两重陵园、围沟及相关遗迹②。

西汉帝陵在早、中期的陵园方向应为坐西面东。汉平帝康陵虽然仍沿用西汉中期以来的双重陵园制度，但陵园却由东西向长方形变为南北向长方形，而且仅在康陵陵园南侧正中开有一门，显示其陵园似乎由原来的坐西面东变为坐北面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康陵在设计规划和开始营建时正是王莽秉政时期，而王莽是一个笃信儒学的理想主义者，他建立新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托古改制”措施。汉平帝年间，王莽在都城长安主持修建了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而西汉帝陵的建设在当时是封建国家的一件大事，王莽作为摄政大臣肯定会介入，甚至主持此事。因此其思想观念也会对康陵规划和建设产生影响。同时，相对于汉景帝阳陵、武帝茂陵的

---

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 48 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14 年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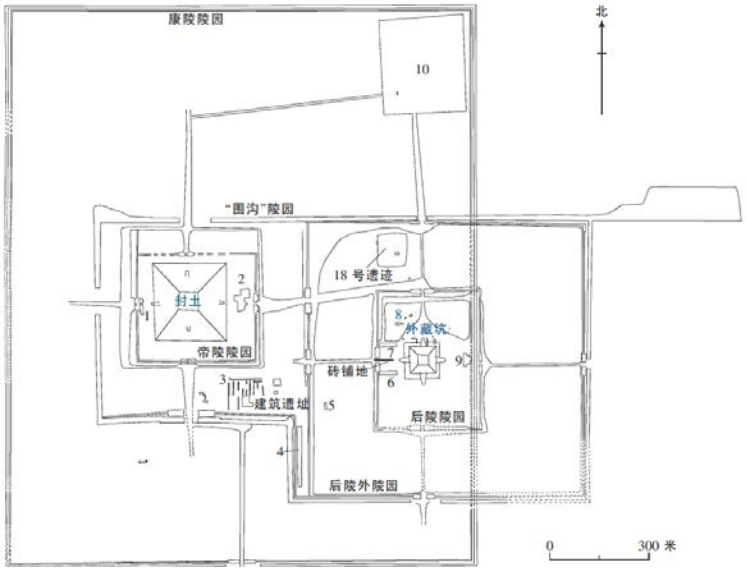


图 74　汉康陵陵区遗址分布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14 年第 6 期）

布局宏大、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帝陵模式，作为西汉末代皇帝的汉平帝康陵，陵区规模大幅缩小，帝陵组成部分也有很大缺省。与阳陵、茂陵相比，康陵的占地面积大幅缩小，仅及阳陵的五分之一和茂陵的二十七分之一。而且康陵陵区没有陪葬墓。

王莽摄政后，康陵不再可能按原来规划的西汉帝陵建制修建，反而有可能扩大平帝王皇后的陵墓建制。此时原来的皇帝已变为臣民，皇后则变为新王朝的公主，因此，陵墓的地位也随着主人身份的变化发生了逆转。王皇后陵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而一跃成为陵区的主体建筑，以显示新王朝皇室的尊贵，王皇后陵的建制与规模应当有大幅度提高，这样便出现了王皇后陵单独的双重陵园[①]。

研究成果：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王建新：《西汉后四陵名位考》，见《古代文明》（2），文物出版社，2003 年。

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三秦出版社，2006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平帝康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文物》，2014 年第 6 期。

马永赢：《汉平帝康陵布局试析》，《文物》2014 年第 6 期。

① 马永赢：《汉平帝康陵布局试析》，《文物》，2014 年第 6 期。

五、遗迹和遗物

康陵封土保存较好，呈覆斗形。封土南边正中略下凹，四面近底处坡度平缓，同上面封土有一定角度。康陵陵区共发现建筑遗址 18 处，其中帝陵陵园内 9 处，后陵陵区内 4 处。王皇后陵园正北处的遗址面积最大，南北长 290 米，宽 250 米。遗址中有大面积的夯土、夯墙、柱石、汉代瓦片堆积等。经过对康陵周围大面积的钻探，在其南部偏东距离陵园南墙 36 米区域内，发现建筑遗址一处，遗址东西长 180 米，南北宽 115 米，在此发现大量的绳纹板瓦、筒瓦残片，砖块，卵石，以及铜器残片等。探孔内发现大面积夯土，还有部分路土。

在康陵陵园东北角采集到文字瓦当残块两件，在东南遗址内采集到陶豆柄 1 件。其中文字瓦当残块有：其一，当面残存一“奉”字，边轮宽 1.2 ~ 1.4 厘米。应为“永奉无疆”文字瓦当。其二，当面残存一“无”字，双线界格，中心为一大乳丁，周围饰连珠纹。

豆柄残块。平底，足部饰突出的叶纹。底径 9.2 厘米，残高 7.5 厘米。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康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 6 月，康陵作为“西汉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的康陵保护区包括帝陵、后陵、帝陵东南处的建筑遗址。其中帝陵陵园保护范围为：封土北侧向北 70 米、向南 80 米、向东 110 米、向西 80 米；后陵陵园保护范围为南至陵召村北、咸宋公路南，东至周陵公路西 100 米，西至农科院西生产路。



图 75　康陵封土南侧仆倒于地的“汉元帝”毕沅碑，现已扶立并建碑楼保护　（摄影：郑茂良）

附一：汉太上皇陵

汉太上皇陵位于陕西省富平县杜村镇姚村南 2000 米。

刘邦父亲名煓，又称太公。其母称刘媪，“媪”是古代对老年妇女的尊称。汉王五年（前 202 ）二月，刘邦于汜水之阳（今山东曹县）即皇帝位，颁布诏令，“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①。刘邦的父亲仍称“太公”。同年五月，刘邦“入都关中”。当时长安刚开始营建，刘邦及朝廷仍在栎阳（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汉高祖六年（前 201），“尊太公曰太上皇。”根据颜师古的解释，“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②。高祖七年（前 200 ）二月，刘邦“自栎阳徙都长安”，太上皇仍留居栎阳。他不习惯关中地区的生活，十分想念丰沛故地。高祖就在栎阳之南，依照丰邑修了一座城市，取名“新丰”（今陕西临潼县东北新丰镇以西四里）。刘邦把他父亲平生所喜好的屠贩少年、酤酒卖饼之徒、斗鸡蹴踘之辈，迁徙到这里，以取得太上皇欢心③。高祖十年（前 197 ）七月，太上皇在栎阳宫去世，“葬万年”④。“万年”是吉祥语，“万年陵”亦称“太上皇陵”。

《三辅黄图》云：“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因置万年县于栎阳大城内，以为奉陵邑。其陵在东者太上皇，西者昭灵后也。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北原。”⑤

太上皇陵封土呈覆斗形，陵墓底部平面为方形，边长 68 米。封土高 17 米。陵墓顶部有个坑，深 2.5 ~ 3 米，疑是陵墓被盗掘后墓室塌落所致。陵墓每面正中各有一条墓道通向墓室，南、

---

①《汉书》卷一《高帝纪》，第 52 页。

②《汉书》卷一《高帝纪》，第 62 页。

③《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 387 页。

④《汉书》卷一《高帝纪》，师古曰：“《三辅黄图》云高祖初居栎阳，故太上皇因在栎阳。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万年邑，置长丞也。”臣瓒曰：“万年陵在栎阳县界。”第 67 ~ 68 页。

⑤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卷六，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438 页。《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曰：《王陵传》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又项羽归太公、吕后，不见归媪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媪为昭灵夫人，高后时乃追尊为昭灵后耳。”《汉书》卷一《高帝纪》，第 68 页。



图 76　汉太上皇陵　（摄影：郑茂良）

北、西三条墓道大小、形制基本相同。墓道平面呈梯形，墓道口宽 6 ~ 7.5 米，接近封土的墓道部分宽 14 ~ 15 米，封土外墓道长 31 ~ 34 米。墓道底部为台阶状坡道。东墓道比上述三条墓道规模大，墓道平面形状近似梯形。墓道口宽 10 米，接近封土处墓道宽 35 米。封土外墓道长 82 米。墓道底部也为台阶状坡道。封土南 20 米处有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树立的“汉太上皇陵”碑一通。

昭灵皇后陵位于太上皇陵西北 120 米处，封土保存甚差。《三辅黄图》记载：“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其陵在东者太上皇，西者昭灵后也。”刘邦起兵时，其母死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陈留城）小黄北，后于此建陵庙。汉王五年（前 202），刘邦追尊其母为昭灵夫人。《后汉书・虞延传》也载，光武帝刘秀东巡，经过陈留小黄，见到昭灵后的陵园。因此，太上皇陵西边的合葬墓，或为昭灵后的衣冠冢，即所谓招魂之葬。封土现存东西长 22 米，南北宽 26 米，高 8 米，未经夯打。封土之下为墓室，由地表往下 1.5 米为掺有料姜石的五花填土，再往下为夯筑五花土，比较坚硬，距离地表 9 米深仍是夯土。墓室平面呈方形，南北长 27 米，东西宽 26 米。墓道位于墓北正中，平面为梯形，墓道口宽 6 米，另一端宽 20 米。墓道长 41 米。墓道底部为台阶状，坡度 22.5 度。墓道内填土为夯筑的五花土。

经初步勘察，在太上皇陵东部发现两座陪葬坑。一个在太上皇陵东墓道东南 25 米，坑口



图 77　汉昭灵皇后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东西 7 米，南北 10 米，深 14.9 米。耕土下即夯筑五花土，夯土下为木板，板下即放置陪葬品的坑室。从探孔中发现，坑内有红色漆皮、木炭等。坑深约 0.9 米。另一陪葬坑在太上皇陵东墓道东北 12 米，坑口东西长 4 米，南北宽 8 米，深 7.1 米。坑内也为五花土夯筑。

在昭灵皇后墓附近发现三座陪葬坑。其一在墓南 3 米，东西长 4 米，南北宽 8 米，深 7.1 米。其二在墓西南 2.5 米，东西长 4 米，南北宽 14 米，深 7 米，探孔内发现鎏金铜管络和铜泡等马饰。其三在墓东北 6 米，东西长 5 米，南北宽 6 米，深 6.95 米。

西汉初年，有一些皇亲国戚死后葬于栎阳北原，均分布在太上皇陵以东，大多在今临潼区康桥乡和关山乡一带。见于文献记载的有魏媪、薄昭等人的墓。魏媪，高祖薄姬的母亲，为大家闺秀，出自秦时故魏王宗室。其夫早丧，葬于浙江绍兴。西汉王朝建立以后，薄姬地位显赫，去世后，葬于栎阳故城北原，称为灵文夫人，“致园邑三百家，长丞以下使奉守寝庙，上食祠如法”①。薄昭是薄姬的弟弟，高帝七年（前 200）为郎。高帝死后，他跟随其外甥刘恒和姐姐薄姬到了代地。吕氏宫廷政变被粉碎之后，周勃、陈平和刘章等迎立刘恒为帝。刘恒即帝位后，薄昭出任车骑将军，被封为轵侯。文帝前元十年（前 170），薄昭因“坐杀使者，自杀”②。薄昭死后，文帝亲临吊唁，安排后事，把其舅父葬于他外祖母魏媪墓附近。

①《汉书》卷九十七《外戚传》，第 3924 页。

②《汉书》卷十八《恩泽侯表》，第 683 页。

《汉书·地理志》记载，高祖置万年县。万年县设在栎阳城中。汉代栎阳故城在今阎良区武屯乡关庄、南丁村和御宝屯村一带。城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 2500 米，南北宽 1600 米。这与文献记载一致[①]。城门东西各三座，南北可能各两座。城门门道宽 6 米。城内道路纵横，东西向横贯全城的干路 3 条，宽 15 米左右。南北向大街 3 条。宫殿区主要分布在城址中部，即今南丁村南，关庄东北，御宝屯村西北。手工业作坊分布在城内东北和东南部。一般居址比较分散，手工作坊杂处其间。万年邑和栎阳城实际是一城两名（或一城内设两个县署机构）。西汉诸陵邑均有令丞，唯万年县邑没有行政官员，或许“栎阳令”即万年邑行政长官。文献记载，汉太上皇陵附近曾经迁徙有“赀三百万以上”的富人千余户，赐予他们田宅，其任务就是守护太上皇陵。太上皇陵西北 950 米，有座小城，城址东西 75 米，南北 130 米，部分城墙至今尚存。或许此城就是守陵者的住地。

1980 年 4 月至 1981 年 12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对秦栎阳城址及万年陵进行了勘探[②]。

陵区附近地面上现在没有垣墙的痕迹。经钻探，在太上皇陵东、南和北面发现垣墙。东墙位于太上皇陵东 185 米处，长 85 米，宽 4.3 米，距离地表 1.1 ~ 1.8 米；南墙位于太上皇陵南 96 米处，长 204 米、宽 3 米，距离地表 1.7 ~ 2.28 米；北墙位于陵北 82 米，长 175，宽 3.1 米，距离地表 0.8 ~ 1.4 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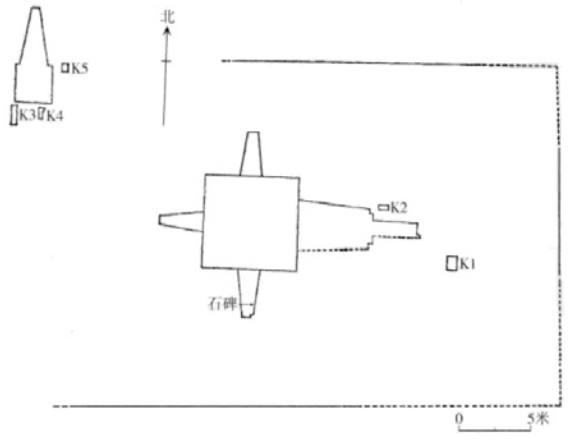


图 78　汉太上皇陵及昭灵后陵平面图　（采自《考古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另通过勘探调查，在太上皇陵

①《长安志》卷十七记载：栎阳故城“在县北，东西五里，南北三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204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 年第 3 期。

和昭灵皇后墓的北面、西面发现 4 处面积较大、文化层堆积较厚的遗址。其中一处在太上皇陵北 200 米处，遗址东西长 100 米，南北宽 50 米，文化层厚 1.5 ~ 2 米。另一处在昭灵皇后墓北 150 米处，遗址东西长 80 米，南北宽 30 米，文化层厚 1 米。昭灵皇后墓西北 240 米处还有一处遗址，东西长 50 米，南北宽 40 米，文化层厚 1 ~ 1.5 米。此外，在昭灵皇后墓西部 110 米处也有一处遗址，南北长 110 米，东西宽 80 米，文化层厚 1 ~ 1.5 米。以上 4 处遗址，地表均散布有较多的汉代砖瓦建筑材料。另外遗址内出土了西汉初期的云纹、四叶纹瓦当，还有少量汉初沿用的秦代葵纹瓦当。在这个建筑遗址与太上皇陵之间，还曾出土过为数不少的墨绿色玉圭，这些是当时的祭祀用品。

2003 年 9 月，汉太上皇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帝陵封土以东 250 米，以南 200 米，以北 500 米；后陵封土以西 30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 米。

附二：云陵

云陵是西汉昭帝刘弗陵母钩弋夫人赵婕妤的陵墓，位于今淳化县北铁王镇大圪塔村。

钩弋夫人（？ ~前 87），姓赵，西汉东武垣（今河北省河间市行别营村）人。汉武帝东巡过河间，望气者向武帝报告说此处有一奇女，武帝召见。此女容貌美丽，但两手紧握，皆似拳形，武帝轻轻一掰，手即伸开，自此伸缩自如，因而得宠，称为“拳夫人”。后封婕妤，因居钩弋宫，亦称钩弋夫人。

关于云陵和钩弋夫人，史书记载比较多。《史记·外戚世家》载：“钩弋夫人姓赵氏，河间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括地志》记述云陵：“陵在云阳县西北五十里。”《三辅黄图》又记：“昭帝母赵婕妤云陵，在云阳甘泉宫南，今人呼为女陵。”《关中胜迹图志》记：“钩弋夫人墓在淳化县北三十里。”乾隆《淳化县志》记载；“旧志昭帝发卒二万人筑陵，号云陵， 自汉始元迄今一千七百六十余年，遗冢巍然，俗呼大圪挞。”

《汉书·外戚传上》记载：“钩弋婕妤从幸甘泉，有过见谴，以忧死，因葬云阳。”《史记·外戚世家》记述钩弋夫人死的经过较为详细：“上居甘泉宫，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欲立少子也。后数日，帝谴责钩弋夫人。夫人脱簪珥叩头。帝曰：‘引持



图 79　汉云陵　（摄影：郑茂良）

去，送掖庭狱。’夫人还顾，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云阳宫。”这是因为汉武帝晚年发生了“巫蛊之祸”，太子刘据死，武帝欲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为太子，又怕子幼母少，女主恣意乱国，而采取立其子、杀其母的无奈之举。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钩弋夫人死云阳宫（甘泉宫）曰：“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识其处。”《汉书·昭帝记》文颖注曰：“婕妤先葬云阳，是以就云阳为起云陵。”“夜持棺往葬”当是“婕妤先葬云阳”了。由“夜持棺往葬”，看出汉武帝秘而不宣的意图，葬仪无疑是简易的，葬时应在死年，即后元元年（前 88）。《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昭帝更葬之”。更葬在昭帝即位的后元二年（前 87）。《汉书·外戚传》记载：“昭帝即位，追尊钩弋婕妤为皇太后，发卒二万人起云陵，邑三千户。”从钩弋夫人墓在“甘泉宫南”“在汉云陵城南”等著录与云陵现存遗迹看，昭帝更葬只是整修、加大墓冢和设陵邑，仍然保持原墓地。从《括地志》著“昭帝更葬之，棺但存丝履也”文意分析，更葬时曾启棺，不仅墓冢封土加大，而且对墓室、棺椁，也进行了整修。

墓冢在陵园内偏东南处，形状为覆斗形，东西长 166 米，南北宽 154 米，高约 35 米，夯土筑。陵冢四面尚存门阙遗迹，西阙、北阙在过去农田基建中破坏。东阙和南阙至今保存比较完好。阙高 1.5 米至 4 米，长 20 米左右。距冢 38 米至 113 米，东阙距冢最近，北阙最远。门阙遗迹外今为农田，若以四面门阙遗迹左右延伸至交叉点计为垣墙，则垣墙周长 1220 米。1978 年调查中，在邑城南、陵冢西，发现南北走向道路遗迹，长约 400 米，路面用卵石铺，附近有五角形和圆形

水管道出土。道路遗迹南端，为一东西走向夯土墙，长 200 米，下有散水设施。这一带的道路、夯土墙，大约是寝园、陵庙和“月游衣冠”的礼制建筑所在。云陵、云陵邑附近，建筑残件分布非常密集，以板瓦、筒瓦、铺地砖、水管道为多；瓦当数量多，纹饰也很丰富。陵园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有略高于地面的土丘，其下埋有砖瓦残件和夯土，从其位置看，为角楼建筑遗迹。南阙外有南北走向的道路痕迹，宽约 10 米，疑为陵前司马道。云陵西偏南，曾发现南北走向的宽约 3 米、长约 300 米的卵石铺地，这或许是“月游衣冠”的道路，连接寝园和陵庙。这条道路附近，分布密集的瓦砾，有圆形和五角形下水管道出土，看来这一带有大型建筑。道路之南有一处建筑遗迹，东西长达 200 余米，这有可能是寝庙建筑物所在。

云陵邑城遗址在云陵西北约 500 米，俗称“故城”，夯土墙周长 2140 米，城墙的布局为南北向长方形，四阙可见位置。西汉平帝元始四年（4）“王莽奏请，撤除南陵（文帝刘恒母亲薄太后坟）、云陵（昭帝刘弗陵母亲赵钩弋墓），改成两个普通县。下诏批准。”云陵邑从昭帝后元二年（前 87）建立，到平帝元始四年（4）撤除，共存在 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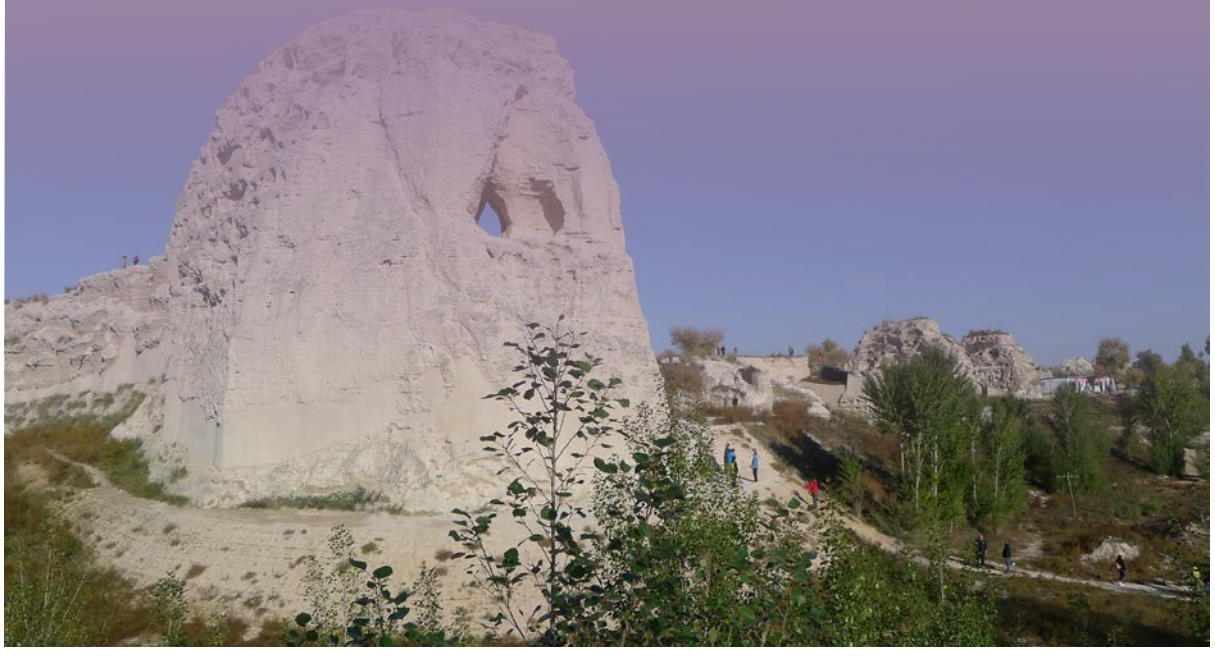
1957 年 5 月，钩弋夫人墓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墓冢封土；一般保护范围为重点保护区向西面外延，东 38 米、西 94 米、南 67 米、北 113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范围外延 50 米。2013 年 3 月，云陵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 80　汉云陵邑文物保护标志碑　　（摄影：郑茂良）

第四章

十六国北朝帝王陵



西晋末年，统治阶级为争夺政权引起了“八王之乱”，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乘机崛起，在北方争城略地，相继建立了很多政权，其中较重要的16个，史称十六国时期。后来北魏政权建立，又分裂为东、西魏，东、西魏又被北齐、北周取代，历史上称为北朝，与南朝政权宋、齐、梁、陈对应。故本章名为“十六国北朝帝王陵”。

在十六国中，以氐族苻氏在长安建都的前秦最为强盛。前秦自351年至394年，历四世六主，44年。后为羌族姚苌的后秦所灭。前秦六主中苻坚有经国济世之志，其自幼深受汉族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博学有大志，初被封为东海王，357年发动兵变，废杀苻生（苻健之子），自称大秦天王。383年，苻坚不听王猛生前遗言以及众臣的劝阻，一意孤行，妄图一举灭晋，与晋军淝水交战，前秦战败。之后北部中国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各族贵族乘机反秦自立，鲜卑族贵族慕容垂乘机叛乱，在河北恢复燕国；羌族首领姚苌也起兵反叛。不久慕容冲攻打长安，苻坚慌忙率骑数百带领妻子儿女逃出长安城，企图积聚力量，东山再起。但不久被姚苌所擒，后缢死在新平，即今彬县大佛寺南静光寺内。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坚为姚苌所杀于新平城，遂葬焉。”《十六国春秋前秦录》载：“初长安之将败也，坚中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定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及苌害坚，嵩等以王礼葬坚于二堡之间。”《邠州志》载：苻坚墓“在州西三十里”。经考察苻坚墓位于今彬县西南三十里的水口镇九田村。茔域占地面积约四五百平方米。墓冢保存较好，为斜长形，当地群众称为“长角冢”。

后秦太祖姚苌（330 ~ 393），后秦创建者。姚苌先祖世代为羌族酋长，苻坚时归前秦，官至龙骧将军，封益都侯，屡立战功。383年苻坚于淝水之战大败，次年姚苌反叛，起兵渭北，自称大将军、大单于。386年姚苌称帝，国号大秦，都长安，改年号建初。史称后秦。建初八年（393）死，谥武昭皇帝，庙号太祖。葬原陵。

据明代吕柟《高陵县志》载：“姚苌原陵在县西北十里，积灰为之，方几一里，俗称灰堆坡”。经考察即今高陵县通远乡灰堆坡村西南，位于田地内，封土已无存。

后秦高祖姚兴（366 ~ 416），继姚苌为后秦国君。在位 22 年，勤于政事，治国安民。由于实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有效措施，遂使关中经济取得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使后秦国力日益强盛。随着国家的富强，姚兴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辉煌战果，他先后消灭了前秦苻登、西秦乞伏国仁、后凉吕光的势力，使西方安宁；同时东与北魏、东晋抗衡。姚兴死后，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经考察即今高陵县东药惠乡麦张村附近。

大夏世祖赫连勃勃（？ ~ 425），匈奴族铁弗部，十六国时期夏国创建者。407 ~ 425 年在位。赫连勃勃骁勇剽悍，善骑射，多智谋，称雄漠北。407 年反叛后秦，起兵自立。称大单于、大夏天王，年号龙升，并改姓赫连氏，取名勃勃。413 年营建都城，名曰统万（今靖边县北白城子），寓“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425 年赫连勃勃病死，谥武烈皇帝，庙号世祖，葬嘉平陵。



图 1 大夏统万城　（摄影：郑茂良）

赫连勃勃葬地据清嘉庆《延安府志》载：“赫连勃勃疑冢，在延川县东南六十里白浮图寺前。有七冢，相传为夏王疑冢云。”

439 年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统一了北方。由此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开始了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朝指依次更替的宋、齐、梁、陈四个王朝；北朝指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个王朝。南北朝的分界大致以秦岭、淮河为界，对峙达 170 年之久，直到隋文帝杨坚统一为止。在南北朝时期建都陕西的有西魏和北周两个王朝，均为鲜卑族所建政权。

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曾统一北方近 100 年之久。后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心当高欢的傀儡，于 534 年逃奔长安，投靠长安将领宇文泰。高欢另立北魏宗室元善见为傀儡皇帝，将都城迁往邺城。从此，北魏一分为二，都邺城者称东魏，都长安者称西魏。524 年北魏孝武帝元修被宇文泰毒死于长安（十余年后葬云陵），另立北魏孝文帝元宏之孙、京兆王元愉之子元宝炬为帝，元宝炬在位期间，实为傀儡，但他能够和宇文泰默契配合，使西魏很快富强起来。



图 2　迁展于碑林博物馆的西魏文帝永陵神道东列石兽　（摄影：郑茂良）

西魏文帝元宝炬永陵，位于今富平县东留古乡何家村东北。冢高 13 米，周长 230 米，陵园地面建筑无存，仅有石兽一对，位于冢南 200 米处，西侧的头向东，高 1.9 米，身长 1.93 米，胸阔 0.72 米，东侧的已迁展在西安碑林石刻馆内。

554 年西魏废帝元钦被宇文泰毒死于长安，葬地史无记载；557 年西魏恭帝元廓被宇文觉杀于长安，葬地不详；578 年北周灭北齐，北齐后主高纬被俘，后被杀于长安，葬长安北原的洪渎川。

556 年宇文泰病死于今淳化县西北云阳宫，次年其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称周天王，都长安，史称北周。追遵宇文泰为太祖，谥文皇帝。宇文泰成陵，据《周书·文帝本纪》载：“太祖文皇帝，魏恭帝三年冬葬于成陵”。

《关中胜迹图志》载：文帝成陵“在富平县凤凰山南”。在今富平县宫里镇宫里小学院内。

北周建国之初，局势不稳，朝廷大权由宇文护（宇文泰侄子）把持。宇文护专横跋扈，于 557 年废孝闵帝宇文觉，后杀之，死年 16 岁。又拥立宇文毓（宇文泰长子）为帝。宇文毓聪明有胆识，待人宽厚，有人君之量，宇文护忌之，置毒于糖饼中，毒死，死年 27 岁。560 年宇文毓临死遗诏传帝位于宇文邕（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即位后，对朝廷大权独揽且连杀自己两个兄长的宇文护心怀不满，更不甘心当傀儡皇帝，忍辱 12 年之久，于 572 年联合宇文直杀宇文护及其子弟亲党，得以亲理朝政。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经过几年的努力，北周国力日渐强盛，但他于 578 年 6 月病故在亲征突厥的途中，死时 36 岁，在位 19 年。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孝陵。孝陵位于今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东南约 1000 米处，西距唐顺陵约 1500 米。墓葬总体坐北向南，墓道全长 68.4 米，由斜坡墓道、5 个天井、5 个过洞、4 个壁龛及甬道、土洞式单墓室组成。这样的形制，与已发现的北周皇室、贵族、大臣的大、中型墓大体相同。孝陵虽经多次盗掘，但出土物仍很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数百件之多[①]。

十六国北朝陵墓石刻艺术作品今天并不多见，这些艺术品都显示着文化融合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王陵由于受到秦汉时期厚葬之风的影响而导致盗墓现象严重，有些墓葬是不封不树的，从而为现在寻找当时的王陵带来困难。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2 期。

第一节　前赵刘渊永垣陵

永垣陵位于今渭南市白水县林皋镇赵尧村，北依雁门，有方山森林公园之天然氧吧；南邻白水河，有林皋湖景区之绮丽风光，规模宏大。

一、墓主生平

据史料记载，永垣陵是前赵主刘曜为其父所建。“曜将葬其父及妻，亲如粟邑（汉时白水古称）以规度之。……葬其父，墓号永垣陵”。那么，永垣陵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史书中只提到，曜葬其父，具体指谁，言之不详。在古代，“父”有“对男性长辈通称”之意，可以解释为伯父、叔父、岳父等。纵观刘曜一生，入主永垣陵的可能是亲生父亲刘绿，也有可能是其叔父汉皇帝刘渊。因此，该陵墓的主人具有不确定性。

陵墓大约修建于永昌元年（322）前后。墓主是其父刘绿可能性最大。刘绿在刘曜7岁前已经过世，当时葬于何地，史料没有记载。刘曜建立赵国后，以单于为祖，既然早逝的刘绿能被儿子尊为宣成皇帝，入主永垣陵就不无可能。太兴元年（318），靳准之乱平息后，“曜迎其母胡氏之丧于平阳，葬于粟邑，号曰阳陵，谥曰宣明皇太后”。刘曜先葬母亲于粟邑，随后修建永垣陵，可能就为了双亲死后能在一起。营建陵墓时，贤臣游子远进谏，“曜不纳，乃使其将刘岳等帅骑一万，迎父及弟晖丧于太原”。刘曜叔父刘渊墓号永光陵，在今临汾市洪洞县东南，离太原很远。太原在西晋末年为匈奴聚居地，因此，刘曜迎回的很有可能就是其父刘绿的尸骸。

汉皇帝刘渊是刘曜的叔父。刘曜自幼丧父，由刘渊抚养，刘曜为其修建陵墓以报答也在情理之中。刘渊去世后葬于永光陵，史料中有记载。荡平动乱之后，石勒派部将裴宪、石会修缮永光、宣光二陵。石勒与刘曜在汉主刘聪朝同为握有重兵的臣子。当时，刘曜为丞相，

石勒为大将军。太兴元年（318），刘曜在长安称帝，但“石勒占地比刘曜多，兵力也较强盛”[①]，因此，石勒不甘俯首称臣。太兴二年，石勒在襄国（今河北邢台）即赵王位。永昌元年（322），刘曜平息关陇叛乱之后，最大的对手就是势力强大的石勒。而此时，永光陵所在地洪洞县属石勒控制范围，刘曜想得到汉主刘渊旧臣更多的支持，在与石勒对抗中处于优势，为刘渊在粟邑修建陵墓是政治的需要。

刘渊是有相当汉化程度的匈奴人，他曾师事上党儒生崔游，习《易》《诗》《书》三经，尤好《春秋左氏传》及《孙吴兵法》，并博览《史记》《汉书》、诸子书，文学武事，无不精通。他冒姓汉族的大姓“刘”，仿照汉族方式建立政权，以反晋为号召定国号为“汉”，并采取了一些尊儒兴学的措施，“轻财好施，招纳党徒”，取得了汉族士人的支持。但出于长期的民族仇恨，他对待汉人非常残暴，杀戮成性。

白水县处于关中平原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距汉、唐国都长安城较远，加之地势不甚平坦，在选择陵地时，不为历代统治者所看重，唯独永垣陵是个例外。早在 316 年，刘曜部将平西将军赵染攻袭长安时，刘曜就来到过粟邑。他镇守长安后，粟邑成了他的屯兵重镇。史书中多次提到他前往粟邑，足见他对这块土地特别留心，其地势北靠雁门山，南有白水河，实为一块风水宝地。其时，附近屯有他的重兵，修建陵墓的劳动力不用发愁，戍卫也不成问题。陵墓边的赵尧村，村中以赵姓为主，村民们称其陵为冢，可能就是守墓人的后裔。

二、陵墓概况

永垣陵修建过程极为豪奢，费工、费钱以亿万计，“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工程无比浩大。但最后实际达到何等程度，史无明载；今陵冢遭到多次盗掘，内部情况不明，所以无从验证究竟如何。唯残存陵冢规模在同时期陵墓中尚称宏大，保存也较完整。

陵墓封土原为圆丘形，由于历年取土耕作，现呈不规则形状。墓高约 15 米、南北长 96 米，东西宽 81 米。冢上遍植树木，多为槐树。原陵寝建筑现已无存。墓冢北侧 30 米处有 2006 年所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图 3 前赵永垣陵 （编写组供稿）

三、保护管理

2003 年 9 月，永垣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为：墓葬封土边沿东、西外延 30 米，南、北外延 6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西外延 90 米，南、北外延 140 米。

2013 年 3 月，永垣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节　前秦苻坚墓

一、墓主生平

苻坚（338 ~ 385），字永固，氐族，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人，前秦的君主，357 ~ 385年在位。苻坚在位前期励精图治，重用汉人王猛，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终令国家强盛。他大力提倡儒、佛，使长安成为北方最大的佛教中心。苻坚除颁布了一系列减省奢侈品、鼓励农业、停止征战措施外，更设立学校，重视文教，尤其留心儒学。苻坚曾下令广收学官，郡国学生只要通晓一经就获授职，也表彰有才德和努力营田之人，令人们都希望得朝廷劝励。苻坚每月都要亲临太学选拔学生。消灭前燕后，在长安祭祀孔子。而王猛也助苻坚整顺风俗，令全国学校渐兴。在苻坚治下的关陇地区工商业兴盛，一片繁荣景象。

从360年到376年，前秦经过17年的征讨，先后灭前燕、略仇池、占晋汉中取成都、克前凉、定代地，用武力统一了黄河流域及长江上游地区，其版图“东及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①]。域外62个国家遣使来长安和前秦通好，“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②]。只有东晋占有东南一隅，与前秦隔江对峙，分庭抗礼。

苻坚于383年发动战争意图消灭东晋，史称“淝水之战”，但最终前秦大败，国家也陷入混乱，各民族纷纷叛变独立，北方再一次处于分裂之中，苻坚最终也遭羌人姚苌杀害，终年48岁，谥号宣昭，庙号世祖。

二、陵墓概况

苻坚墓位于彬县水口乡九田村。封土南北24米，东西3米，高约2 ~ 3米，占地面积约216平方米，呈斜长形，俗称“长角冢”。墓冢北侧有高约4米的碑楼，内嵌彬县人民委员

① 《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中华书局，1996年。

② 《晋书》载记第十四《苻坚下》，中华书局，1996年。

会于 1957 年 12 月立“前秦国王苻坚之墓”石碑一通，系用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立碑加工而成。墓冢南侧有 1981 年彬县人民政府所立第二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一通。



图 4　前秦苻坚墓　（编写组供稿）

墓北三里处，有佛寺名清光寺，旧名清泰寺，相传即姚苌缢死苻坚处。

三、保护管理

1957 年 5 月，苻坚墓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以墓为基点，东西各外延 8 米，南至根底，北至硷畔 70 米。

2011 年，当地政府围绕苻坚墓征地 100 亩，筹划保护开放事宜。

第三节　后秦姚苌原陵

一、墓主生平

姚苌（330 ~ 394），后秦开国君主，字景茂，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西）人，羌族。384 ~ 393 年在位。淝水之战后姚苌在关中羌人的推举下自称万年秦王，建立后秦，并与苻坚领导下的前秦作战。姚苌后来杀害了苻坚，并乘西燕东退而进驻长安，不久称帝。前秦宗室苻登在关中氐族残余力量支持下继续与姚苌作战，姚苌一度处于不利形势，但最终大败苻登，渐处优势，但在消灭前秦势力前去世，直至儿子姚兴即位后才完全消灭前秦势力。

在位期间修德政，布惠化，重节俭，显人才，兴太学，国势有所增强。死年 64 岁，谥武昭皇帝，庙号太祖，墓称原陵。

二、陵墓概况

其陵墓位于陕西高陵县通远镇灰堆坡村，位于一高敞田地上。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古迹・郊邑・西安府》：“姚苌、姚兴墓，在高陵县西北十里”。《高陵县志》：“在县西北十里，积灰为之，方几一里，俗称灰堆坡。”

所谓原陵，实际只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文化层厚约 4.5 米，房址、灰坑及墓葬时有暴露，陶片遍地皆是。

《关中胜迹图志》称原陵、偶陵同在“县西北十里”，而《太平寰宇记》称“二主冢在县东十三里”，显然矛盾。揆以情理，无论如何父子陵不可能同在一处，显然早在《太平寰宇记》编纂的北宋时，该处地貌已遭到破坏或不清楚，已不能确指二冢故址，故有含混不清或互相矛盾的说法。

第四节　后秦姚兴偶陵

一、墓主生平

姚兴（366 ~ 416），字子略，羌族，赤亭（今甘肃陇西西）人，姚苌长子。394 ~ 416 年在位。姚兴在前秦时任太子舍人。后秦建国后立为皇太子。姚苌每次出征都命姚兴留守。393 年姚苌死时正值苻登攻打后秦，姚兴密不发丧，待至次年击败苻登后才即帝位，改元皇初。

姚兴在位 22 年，为政宽明，知人纳谏，勤于政事，治国安民。有一言之善者即授美官，并确立郡国岁贡清行孝廉的制度，以有效选拔人才。他减轻刑罚，常亲自听决疑狱，号无冤滞。他重视教育，在长安兴建官学，召请关中名儒讲经，使境内儒风大盛。他还颁令郡国，悉免因荒自卖为奴婢者为良人，重视发展经济，兴修水利，关心农事；并劝励农桑，敦尚清素节约。先后灭前秦、西秦及后凉，形成与北魏、东晋相抗衡的三强局面。

他特别提倡佛教，曾迎西域名僧鸠摩罗什至京城长安草堂寺讲经、译经，奉其为国师，对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陵墓概况

姚兴偶陵位于西安市高陵区药惠乡麦张村。

根据前节对不同资料互相矛盾说法的辨析，可知原陵、偶陵故址久湮，无法确指。唯《西安府志》称原陵在县西而偶陵在县东，较二冢同在一处的说法显得合理，故今天文物部门也是如此判断；但又因无肯定线索，故未划出陵址范围，也未树立保护标志。

第五节　大夏赫连勃勃嘉平陵

一、墓主生平

赫连勃勃（？～425），原名刘勃勃，字屈孑，是匈奴右贤王去卑的后代，属刘渊家族。其父卫辰原为西单于，管辖河西诸部落，后被魏杀死，国遂灭。赫连勃勃率余众南逃，依附后秦姚兴，受封为五原公，407 年拥众自立，后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国号大夏，建年号为龙升，史称夏，413 年定都统万城。东晋攻灭后秦后，他又击败东晋，攻占关中，占据长安，于 418 年 11 月称帝，改年号为昌武，又在长安设置南台，任太子赫连璝为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自己率军返回统万城，不久他欲废去赫连璝太子的储位，赫连璝愤而起兵，自长安攻打赫连勃勃，被弟赫连昌击败斩杀，赫连勃勃又立赫连昌为太子。

赫连勃勃在位期间，残暴嗜杀，关中百姓深受其害，425 年 8 月，赫连勃勃病死于统万宫中的永安殿。庙号为世祖，葬嘉平陵。

二、陵墓概况

延川赫连勃勃墓在县城南 30 公里的稍道乡东风原（又叫古里）白浮图寺遗址前，北有交口河水流其下。《延川县志》记载：“白浮图寺在县南六十里，寺前有冢，前人以为夏王疑冢云。”《延安府志》载“大夏王赫连勃勃葬于白浮图寺”，《延绥览胜》有“白浮图寺在城南七十里处，相传赫连勃勃葬此”。墓地北临交河水，东西南三面环山原。原有七冢（含疑冢），今存其一。封土夯筑，底面呈圆形，高约 8 米，周长 60 米，现处白浮寺最高处。墓冢北侧立有“嘉平陵碑记”石碑和延长县人民政府 2013 年 7 月所立县级重点文物保护标志碑各一通。

冢北 200 米处为白浮图寺遗址。近年村民建起一座简易庙宇。白浮图寺建于何朝，兴于何代，毁于何时，现已无从考证。据当地人讲，从前这里的寺院非常大，僧人百余，气势十分雄伟，寺院在方圆数百里享有盛名。



图 5　延川县赫连勃勃嘉平陵　　（摄影：郑茂良）

关于赫连勃勃嘉平陵所在地的传说颇多，除了前文记载的这处之外，还有山西省赵城县东霍山、甘肃省镇原县方家沟、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乡和统万城西等说，但目前均未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

三、保护管理

1991 年 9 月，延川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编号 YC011。

第六节　西魏元宝炬永陵

一、墓主生平

永陵为西魏文帝元宝炬同乙弗氏、郁久闾氏皇后合葬的陵寝。

西魏文帝元宝炬（507 ~ 551），鲜卑族，北魏孝文帝元宏之孙，京兆王元愉之子，南北朝时期西魏皇帝。535 年，他由宇文泰拥立为帝，改年号为大统，定都长安。在位 17 年，551 年驾崩，死后谥号文皇帝，葬于永陵。太子元钦继位。

元宝炬即位后，任用宇文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军政大权实际操纵在宇文泰手中，但元宝炬能够与宇文泰默契配合。从史家的评论看，元宝炬虽然是傀儡皇帝，但能在极为混乱的政局中保住帝位达 17 年之久，并得以善终，这在中国古代还是很少有的。而死后掌权的宇文泰能为他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墓，这也是很少见的。



图 6　西魏文帝永陵全貌，陵侧小冢即为传说中平原公主陪葬墓　（摄影：郑茂良）

西魏文帝元宝炬在位 17 年，不仅无实权，而且为了避免北方柔然进攻，被迫废掉自己心爱的皇后乙弗氏，改立柔然敕连头兵豆伐可汗阿那瓌之女郁久闾氏为皇后。由于郁久闾氏对

乙弗氏留在宫中产生猜疑，元宝炬只好让乙弗氏到担任秦州刺史的儿子那里出家，但还是密令她留着长发。540 年，柔然南侵，不得已之下，元宝炬只好令乙弗氏自尽。乙弗氏死前与太子元钦诀别，言辞凄怆，之后自尽，时年 31 岁。乙弗氏死后“凿麦积崖为龛而葬，神柩将入，有二丛云先入龛中，顷之一灭一出，后号寂陵”[①]。在元宝炬陵寝营建完毕之后“手书云，万岁后欲令兵配飨。公卿乃议追谥曰文皇后，祔于太庙。废帝时，合葬于永陵”[②]。至于郁久闾氏，史书记载：“产讫而崩，年十六，葬于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当会横桥北，后梓宫先至鹿苑，帝辒辌后来，将就次所，轨折不进。”[③] 因此可以得知，永陵为西魏文帝元宝炬同二位皇后的合葬陵寝，但该陵没有发掘，所以三人在墓中的葬式，目前并不清楚。

二、陵墓概况

陵墓位于渭南市富平县留古镇大众村。

永陵封土呈圆丘形，高 13 米、底径约 80 米，周长 230 米，占地 3886 平方米。陵园地面建筑无存。仅有石刻古兽一对，伫立、昂首、张口、瞋目，腹下及肢间镂空，造型古朴、庄重，位于冢南 200 米处。西侧的头向东，高 1.9 米，身长 1.93 米，胸阔 0.72 米，东侧的已迁展在西安碑林石刻馆内。石兽的雕刻技法粗犷，几乎借助石头本身的形状顺势雕成，但石兽体态庞大，肥硕而厚实，却是那一时代鲜卑人所崇尚的作风体现。王子云在《陕西古代石雕刻》中指出：“永陵石兽，昂首挺立，头类狮虎，身躯四肢却类骡马，并且前后上端都用阴线刻有火焰纹，以示神异。”[④] 这种形象，与南朝和汉代的墓兽很少有共同之处。整个造型质朴厚重，并无精雕细凿。与它同时代雕刻得很精美的南朝墓兽相比，正体现了北朝雕刻雄浑、朴实的地区和民族特有的风格。

宋以后许多人误认为永陵系北魏孝文帝元宏长陵。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历代帝王陵寝”对此作了辨析。《大清会典》则载：“陕西西安府富平县孝文帝陵，宋开宝中为魏文帝葬衣冠之地。”魏文帝即曹丕，因之此说又是将三国曹魏时的魏文帝同北魏孝文帝、

① 《北史》卷十三《列传一》，中华书局，2003 年。

② 《北史》卷十三《列传一》，中华书局，2003 年。

③ 《北史》卷十三《列传一》，中华书局，2003 年。

④ 王子云：《陕西古代石雕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

西魏文帝三者混为一谈。考北魏孝文帝长陵在洛阳瀍河以西，魏文帝曹丕墓在洛阳首阳山，故此处应为西魏文帝元宝炬永陵。为此清顺治八年（1651）的进士朱廷璟撰文辨析此事，并在大众村东北立“魏陵辨碑”，可惜此碑已佚，碑文收录于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富平知县吴六鳌主修，胡文铨纂辑成书的《富平县志》[①]。



图 7　现今依然矗立在永陵神道西侧的石兽（摄影：郑茂良）

永陵南侧原辟神道，神道两侧原置石人、石兽等石刻，这些石刻为北朝时期的石刻艺术珍品。之后清人入关后，遵崇元氏，故多次修缮永陵，传历年所立碑石达百余通。当地村民回忆，当年冢南三四分地大一片，全部立的石碑，非常密集。平整土地时，在石碑四周挖出盖房的基石、顶柱石、墙基，因此推测石碑都立在房子内。从冢向南将近一里路，都是石碑、石供桌、石兽、石马、石羊和石人，光石羊就有十几个。但这些石刻、碑石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修建贺兰水库时被用作填坝石材，多数损毁。

永陵东侧约 24 米处，有陪葬冢一座，冢高 5 米，周长 112 米，已遭到破坏。陪葬者谁，说法不一，或说是帝妹平原公主明月，或说是废帝元钦，亦说是恭帝元廓。据永陵附近民间传说：文帝埋葬时，平原公主去送葬，不幸暴死在永陵，随即葬在陵侧。

三、保护管理

永陵现今保护尚好，并划有一定保护范围，由县文物局、文化馆专职保护。

1992 年 4 月 20 日，永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陵墓封土；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重点保护区外延 30 米。

1996 年 11 月 20 日，永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1 年在永陵东南建平房 3 间，供文管所办公用。

① 刘兰芳：《富平碑刻》，三秦出版社，2013 年。

第七节　西魏宇文泰成陵

一、墓主生平

成陵建于西魏恭帝三年（556）十月，为宇文泰与原配元氏的合葬陵。

宇文泰（507 ~ 556），字黑獭，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鲜卑族，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和实际统治者。534 年北魏孝武帝元修不甘心当高欢的傀儡，投奔宇文泰，不久被害。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政权。从此专政西魏 20 多年。他依靠关陇地主的支持，用苏绰、卢辩等，改革官制，建立计账（租赋预算）、户籍制度，颁行均田制，并收编关陇豪族武装为十二军，由八柱国统军，创立府兵制，从而形成由多民族共同组成的“关陇集团”，对以后中国历史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556 年宇文泰病死于今淳化县西北云阳宫，时年 50 岁，葬于成陵，谥号文公。是月，其子宇文觉嗣其位为太师、大冢宰，由宇文护辅政。次年，宇文觉称帝，国号周，是为北周孝闵帝，北周建立。宇文泰先后被追尊为文王、文皇帝，庙号太祖。

宇文泰原配元氏（？ ~ 552 年），北魏广平王元怀女，北魏孝武帝元修之妹。元氏初封平原公主，下嫁开府张欢。张欢性贪残，对待公主无礼。孝武帝杀张欢，改封元氏为冯翊公主，改嫁宇文泰。元氏生北周孝闵帝宇文觉，逝世于西魏大统十七年（551）。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与宇文泰合葬成陵。孝闵帝登后，追尊母亲元氏为王后。武成初年（559），又追尊为皇后。

二、陵墓概况

陵墓位于富平县宫里镇宫里小学内，圆丘形封土，残高 9.6 米，底径约 40 米，周长 149 米。陵冢南侧 1966 年被红卫兵挖了一大缺口。封土南立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陕西巡抚毕沅书“北周文帝成陵”碑一通。陵前原还立有北宋开宝六年（973）“大宋新修后周太祖文皇帝



图 8　由北向南拍摄的成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庙碑”，赵孚书，碑文书法流畅、遒劲，系古碑中的珍品。1966 年被毁成数段，残石现存校内。

三、保护管理

1992 年 4 月，成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墓冢；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至学校教室、西至粮站边墙、南至学校会议室墙下、北至学校北墙。

2013 年 3 月，成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八节　北周宇文邕孝陵

一、墓主生平

孝陵为北周武帝宇文邕和皇后阿史那氏的合葬陵。

宇文邕（543 ~ 578），字弥罗突，太祖宇文泰第四子。代郡武川人，鲜卑族。在位期间（560 ~ 578），灭亡北齐，统一北方，后北讨突厥，卒于军中。遗诏“丧事资用，须使俭而合礼，墓而不坟，自古通典。葬讫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嫔以下无子者，悉放还家”。

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宇文邕性格深沉，有远识，继承其父的改革事业，努力经营关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均有大建树。亲政以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力求富国强兵。在政治上他几次下诏释放奴婢和杂户，解放社会生产力；在军事上废除自西魏以来府兵完全由鲜卑人充当的民族限制，吸收广大汉族人民参加军队，扩大了兵源，加强了军事力量，同时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禁佛、道二教，罢沙门、道士，皆令还俗，从而减轻了农民负担，扩大了国家收入；颁发《刑书要制》，严惩贪污盗窃；提倡节俭，常穿布衣，寝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拆除华丽宫殿，将建材赐予贫民。为日后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努力，北周国力日渐强盛，完成父亲宇文泰统一北方未竟事业的条件已经具备。576 年，亲率十万大军渡河东征，次年正月攻陷邺城，擒北齐王高纬，北齐亡。宣政元年（578）与南朝的陈军战于彭城，俘其主帅吴明彻，全歼陈军，尽取陈之淮南及江北等地，把疆域扩展到长江沿岸。接着又北伐突厥，但积劳成疾，宣政元年（578）6 月病逝，时年 36 岁，在位 18 年。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葬孝陵。

阿史那皇后（551 ~ 582），阿史那氏，突厥族，突厥木杆可汗阿史那俟斤之女，天和三年（568）立为皇后。宣政元年（578），宇文邕去世，宇文邕之子北周宣帝宇文赟即位，尊奉阿史那氏为皇太后。大象元年（579），宇文赟传位给长子北周静帝宇文阐，自为太上皇，自称天元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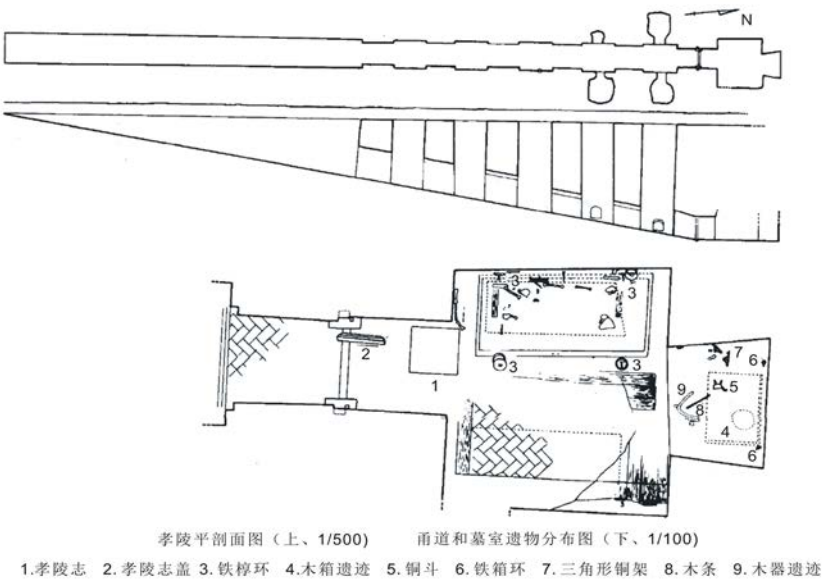


图 9　孝陵平剖面及遗物分布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2 期）

尊阿史那氏为天元皇太后。大象二年（580），宇文赟改尊阿史那氏为天元上皇太后。同年五月，宇文赟逝世，宇文阐又尊阿史那氏为太皇太后。隋朝开皇二年（582），阿史那氏去世，时年 32 岁，与宇文邕合葬于孝陵。

二、陵墓概况

孝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陈马村东南 1000 米处，西距唐顺陵约 1500 米。

孝陵原无封土，也无建筑遗迹，与《周书》记载吻合。陵于 1993 年 9 月和 1994 年 9 月两度被盗，1994 年 9 月 31 日至 1995 年 1 月 20 日正式发掘，在发掘过程中，为了使已朽的易散乱的遗物得到妥善的清理和保护，对壁龛和部分墓室近底部存有遗物的土层采用了分割切块、石膏封固提取、X 光透视摄影、室内清理保护的技术。墓葬总体坐北向南，为斜坡墓道五天井五过洞四壁龛带甬道单室土洞墓，全长 68.4 米。墓道南偏东 10 度，长 31.5 米、宽 2.7 米。天井均呈长方形，长 2.9 米、宽 2.6 米。甬道长 3.6 米，宽 1.7 米。墓室平面呈“凸”字形，南北全长 5.6 米，东西宽 4.3 ~ 4.5 米，因遭破坏，顶部及周壁 1.5 米以上全部坍塌。甬道、墓室底部均铺砖。南距甬道口两米处有门槛、门砧朽木遗迹，因此可推断此处原有木质墓门。墓室内东西并列两套木质棺椁，仅有棺椁各一层。棺长 2.35 米、宽 1.05 米，椁长 2.9 ~ 3.0 米，宽 1.5 米。棺椁曾被盗扰，残存有下颌骨、肱骨、肋骨、盆骨、股骨等残骨。棺壁外侧近南北两端各有一对抬棺时用的铁椁环。

孝陵虽经多次盗掘，但出土物仍比较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有数百件之多。其中有各类陶俑150多件、陶瓷器近40件、玉器8件、铜带具1套、金器21件及志石两合。出土有陵志，铜带具、镜、剑，陶武士俑、具装骑马俑、鞍马骑俑、笼冠俑、风帽俑、小冠俑、仕女俑、犬、鸡、仓、屋、井、磨、碓、灶以及大型玉璧、琥珀、珍珠和金或玉小饰件等。

孝陵是陕西省抢救发掘的第一座帝陵，墓葬形制清楚，遗物丰富，特别是陵志、直径29厘米大型玉璧等，均属国内鲜见，为研究北周史、北朝考古、北朝至隋唐陵墓制度的演变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天元皇太后玺：纯金，重802.56克，獬豸钮，正方形玺面，边长4.45厘米，宽4.55厘米，合钮通高4.7厘米；玺面篆书阳刻“天元皇太后玺”6字，是北周武帝孝陵的陪葬品。1993年被盗出后踪影全无。直到1996年咸阳市渭城区公安分局获悉其线索后，经13天的连续作战，才使这件稀世珍宝完好无缺地回到国家手中。

周武帝陵墓志：置于甬道北端，一合，方形，边长85厘米，志盖盝顶，素面无字，志石阳篆“大周高祖武皇帝孝陵”九字。



图10　北周天元皇太后玺印　　（编写组供稿）

武德皇后陵墓志：1993年陵冢被盗出土，后追回。一合，志盖阳篆“周武德皇后志铭”七字；志文为“大隋开皇二年（582）岁次壬寅四月甲戌朔二十三日乙未，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殂，谥曰武德皇后，其月二十九日壬寅，合葬于孝陵”。

研究成果：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

负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三、保护管理

2003年9月，孝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为：墓圹及墓道外延50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200米。

第九节　北周宇文阐恭陵

一、墓主生平

宇文阐（573 ~ 581），原名宇文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孙子、北周宣帝宇文赟的长子。为北周第五帝，也是北周的末代皇帝。579 年，受宣帝内禅即位，时年 7 岁，由隋国公、外祖父丞相杨坚辅政。大象三年（581）禅让帝位于丞相杨坚，杨坚登基。至此北周灭亡，隋朝建立。开皇元年（581 年），杨坚派人害死宇文阐，时年 9 岁，谥号静皇帝，葬于恭陵。

二、陵墓概况

民国期间，由咸阳县长刘安国监修，由吴廷锡、冯光裕主编的《重修咸阳县志》有载：“恭陵在县东二十里南贺村东里许”。在咸阳市渭城区上召窑村南现今还存有一墓冢，封土呈圆丘状，高 6 ~ 7 米、周长 200 余米，在封土北侧立有“恭陵”文物保护标志碑。



图 11　北周静帝恭陵封土　（摄影：郑茂良）

北周自孝闵帝宇文觉开始，历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宣帝宇文赟、静帝宇文阐，共5帝，25年而亡。《北史》和《周书》关于北周帝陵的记载极为简单，仅可知孝闵帝葬静陵、明帝葬昭陵，武帝葬孝陵，宣帝葬定陵，静帝葬恭陵。但具体位置不详，岁月流逝，后世全不知其踪迹了。孝陵的发掘和发现，为我们寻找北周其他四座帝陵提供了重要线索。从武帝孝陵地望来看，北周帝陵均应在孝陵附近，即今底张镇一带，该处墓冢位于孝陵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但是否就是北周静帝的恭陵，还有待考古部门进一步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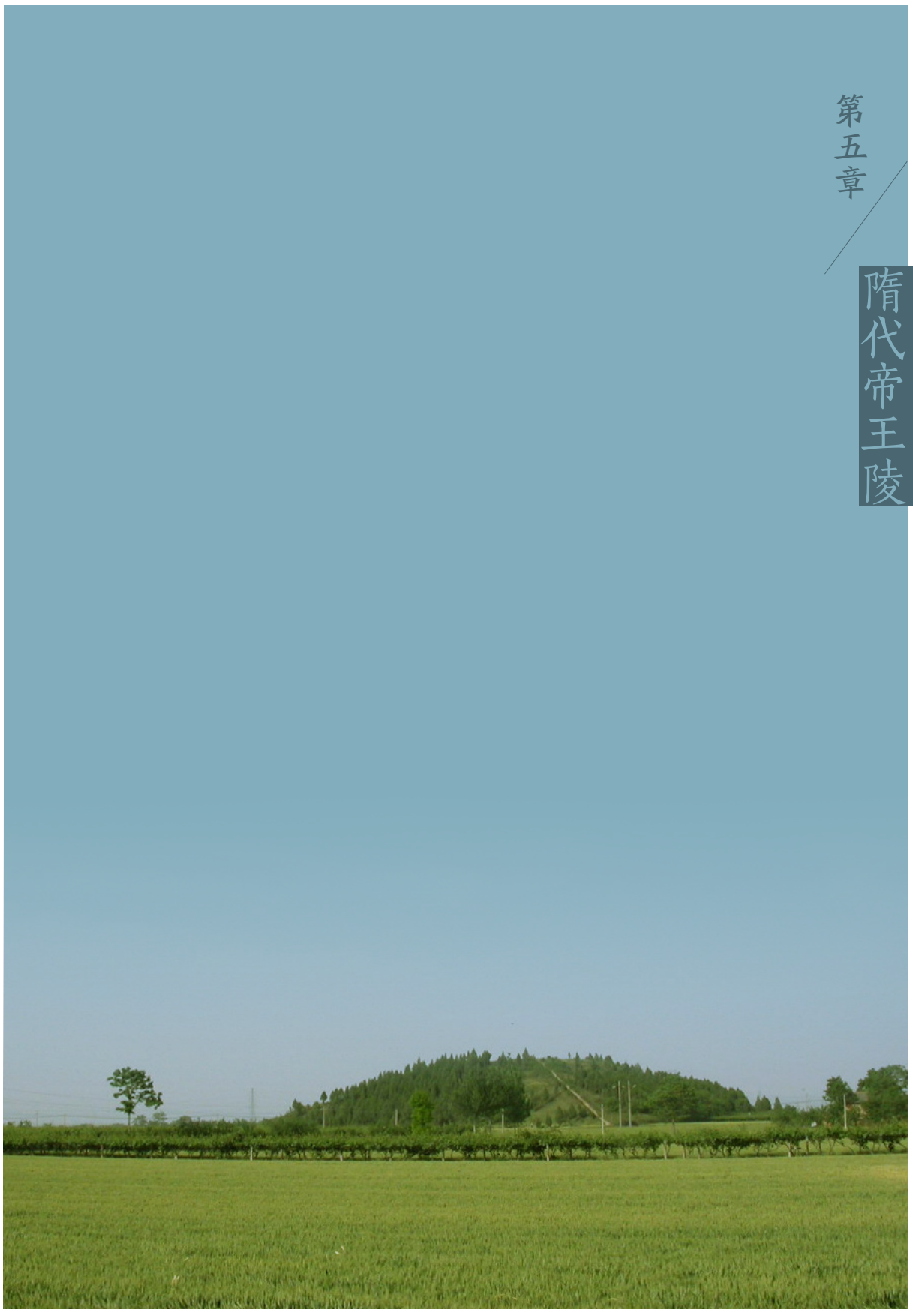
三、保护管理

1963年4月，恭陵被咸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6月，渭城区人民政府在封土北侧立碑保护。

第五章

隋代帝王陵



隋朝脱胎于北周政权，通过宫廷政变建立政权，虽然仅存在了 30 多年，二世而亡，但在一些领域中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完成了由南北朝割据分治向唐朝全国统一的过渡。社会管理上逐渐成熟的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租庸调制、府兵制等制度，影响巨大，甚至成为隋唐时代社会进步的标志性符号。不仅如此，隋朝建立后经济迅速发展，“开皇之治”以仓廪充实、海晏河清而著名，“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民物殷阜，朝野欢娱，出现了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国富民足现象，可惜只是昙花一现。有隋一朝，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决策密集出现，诸如开凿南北大运河、经营丝绸之路、营建大兴城和洛阳城等等，这些措施不仅对其国内社会带来巨大变化，也通过一些途径对当时东亚和周边地区造成影响。随着隋朝的建国，作为皇室的杨氏和独孤氏家族也由西魏北周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之家华丽转身，进入皇族序列，其身后也就留下数座帝王之陵，遂成为隋代留给关中地区的重要文化遗产，其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有待于今后一段时间内充分地发掘和研究。

隋文帝陵原名为“太陵”，清时改为“泰陵”，是隋朝开国皇帝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的合葬陵墓，营建于隋仁寿二年（602），位于今陕西省杨凌示范区五泉镇王上村东北方向的三畤原上。

隋恭帝杨侑庄陵位于乾县。大业十三年（617），李渊攻入长安，拥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次年李渊废黜杨侑，自立为帝，降封杨侑为酅国公。武德二年（619），杨侑遇害（一说病死），年仅 15 岁，谥号恭皇帝，葬于今陕西省乾县阳洪乡乳台村南 500 米处。

另外在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洛阳村东北、罗家堡西，有一圆丘状土冢，高约 3 米，直径 7 米，传为隋炀帝陵。

隋代虽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是隋代帝陵在中国陵寝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它为以后唐宋陵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隋文帝泰陵

一、墓主生平

泰陵是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夫妇合葬之陵，为同坟异穴。

隋文帝杨坚（541 ~ 604），小名那逻延，弘农华阴（陕西省华阴）人，是隋朝（581 ~ 618）开国皇帝，581 到 604 年在位。其父杨忠曾任北周柱国将军，赐姓普六茹氏，封隋国公。杨坚 16 岁娶独孤伽罗为妻，乃北周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之女。二人共有 5 子，分别是：杨勇、杨广、杨俊、杨秀、杨谅；长女杨丽华被北周武帝纳为太子妃，即周宣帝天元皇后。

北周大象二年（580），因为新即位的周静帝幼冲不能亲理政事，在大臣郑译、刘昉等人的拥戴下，杨坚以皇后之父入宫辅政，都督内外诸军事。为防变杜乱，杨坚铲除北周诸王，又镇压了公开对抗的三总管叛乱。以大丞相总百揆，取周祚而代之，即皇帝位于临光殿，改国号为隋，定都长安，改元开皇，建立隋朝。开皇二年（582），以汉长安城制度狭小，水多碱卤为由，下诏委任高颎、宇文恺为营新都总监、副监，规划营建大兴城，开皇三年（583），迁入新都。

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等开漕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转运通利，解决京城租调粮食的供应问题。开皇八年（588），隋军 50 余万，在杨广、杨素、高颎等的指挥下，在东接沧海、西尽巴蜀的数千里长江防线上向陈朝发起进攻。其中韩擒虎部、贺若弼部攻破陈都建邺（今江苏南京），于宫城俘获后主陈叔宝，结束自西晋乱亡近三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开皇十年（560），杨素率军平定南方余乱，完成国家统一。隋文帝杨坚在位期间，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后世誉为“开皇之治”。隋朝疆域一度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九千里，南北万四千余里，全国在编户口达到 890 余万户、4600 余万口。

隋文帝建立隋朝后，内修制度，外抚四方，逐渐确立以三省六部制为主体的官僚体制，推行以租庸调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继续完善西魏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在选官用人方面，探

索选官新法。在外交政策上接受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边疆问题趋于和缓。在法律上，更定新律，颁布开皇律，轻法缓刑。在风俗方面，躬行节俭，淳风励俗，变革绮丽不实之文风。又命牛弘等修撰五礼，郑译等议定新乐，开献书之路，重问道之仪，南北兼融，学者负笈京师，讲学不辍。及其暮年，专尚刑名，不悦诗书，废除学校，仅留京城国子学一所。又唯妇言是用，独孤皇后每天与隋文帝同辇上朝，于阁后参政，“使宦官伺上，政有所失，随则匡谏，多所弘益，”甚至一度形成帝、后共政之格局，“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①]。同时杨坚晚年颇受诸子的困扰。先是软禁三子秦王杨俊；接着在开皇二十年（600），将长子太子杨勇贬为庶人，改立次子杨广为太子；又于仁寿二年（602），将四子蜀王杨秀贬为庶人。

仁寿四年(604)七月，杨坚出行麟游仁寿宫，崩于大宝殿，终年64岁，在位23年。庙号高祖，谥号文皇帝，葬于泰陵。



图1　隋文帝泰陵　　（张建林供稿）

文献皇后独孤伽罗（544 ~ 602），河南洛阳人，汉化鲜卑人，北周卫国公独孤信嫡女，母清河崔氏。14岁嫁给杨坚。同年父亲政斗失败被杀，家道中衰，丈夫亦遭权臣猜忌。独孤伽罗保持低调谦恭作风，以期为夫消祸；周隋交替之际，亲自劝勉杨坚定下立隋大计；之后拜为隋王妃、隋王后；隋朝开国乃为皇后。独孤皇后深度参与朝政，终身对隋文帝保持了强

① 《隋书》卷三六《后妃·文献独孤皇后传》，第1108 ~ 1109页。

烈影响力，于开皇之治功不可没，宫中并尊帝后为“二圣”。晚年主导罢黜宰相、废易太子引发史学界争议评价。隋文帝和皇后夫妻恩爱，“誓无异生之子”，共诞育有十个儿女。仁寿二年（602）八月皇后崩逝，谥曰“文献”。隋文帝命人营建泰陵，并亲自为其送葬，又营造天下最盛佛寺为皇后祈福，临终前企盼和爱妻“魂其有知，当地下相会”。仁寿四年（604）七月文帝病逝，数日后发丧，自仁寿宫载隋文帝梓宫回到京城大兴宫之大兴前殿，同年十月，与独孤皇后合葬于泰陵，同坟而异穴。

二、营建始末

泰陵位于今杨凌示范区五泉镇王上村。

仁寿二年（602）八月，隋文帝将营葬独孤皇后之事委托于时任左仆射、仁寿宫大监的杨素，杨坚称泰陵之地为神皋福壤，表明他对杨素营建山陵工作的态度，事后杨素因此而得到重赏。令隋文帝如此满意的泰陵营建是如何完成的，既与杨素竭尽全力的工作分不开，也与杨素用人得当密切相关，更与分工协作的工程管理制度不无关系。

史载杨素承担葬礼事务后，将葬礼仪注专委大儒牛弘，把葬所卜择交给术士萧吉，而山陵营建则责成宇文恺、何稠、杨达等人，众人分工协作，各项事务如期而就。首先是葬礼仪注。牛弘所制定的独孤皇后葬礼仪注深得杨素称赞。其实牛弘之所以能迅速决定独孤皇后葬礼仪注，是因为有得力助手参谋，据《隋书·裴矩传》记：“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裴）矩与牛弘据《齐礼》参定之。”《北史·裴矩传》记：“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由此可知，葬礼仪注撰定除裴矩之外，还有李百药等。

其次是卜择葬所。萧吉卜择葬所之“历筮山原”与诏文称杨素“遍历川原”一致，说明术士萧吉正是陪伴杨素选择葬所的关键人物，萧吉卜葬选址引入望气祥瑞之说正符合雅好符瑞的杨坚之意，成为隋泰陵选址的重要依据。

最后是山陵营建。《隋书》记时任将作少匠的宇文恺，“文献皇后崩，恺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①] 曾经主持过营建大兴城等多项工程的隋代建筑大师宇文恺是营建泰陵的实际主持者，与主持营造东京洛阳城、避暑离宫仁寿宫的杨素参典泰陵之山陵制度，再加上以智慧巧妙著称的何稠、杨达等能工巧匠的参与，隋泰陵可能是当时最高建筑水平的代表之一。

① 《隋书》卷六八《宇文恺传》，第1588页。

仁寿四年（604），隋文帝与文献皇后合葬于泰陵，《北史》记载：“同坟而异穴。士庶赴葬者，皆听入视陵内。”[①] 参加文帝葬礼的人员均有机会到陵内参观，显见此次营葬时间相对宽裕。隋文帝山陵的营建者就有曾经参加独孤皇后山陵制度的何稠与杨达等人。《隋书》记载，何稠不仅参加文献皇后葬礼，还主持隋文帝葬事。

隋文帝生前对泰陵称善有加，其原因既与营建者萃集一代建筑巨匠有关，又与泰陵选址符合流行一时的祥瑞之说，更与山陵制度得礼之中等方面密切相关。

三、历代变迁

《元和郡县图志》记三畤原：“高五十丈，西入扶风县界。……隋文帝泰陵，在县西南二十里三畤原上。”[②] 古书中“畤”为祭天地和古帝王之所，将陵设于此，本有承祭受尊之意。

隋代就有立法保护前代陵墓的传统，唐承隋制，对隋泰陵等前代陵墓大加保护，不仅如此，唐代还对隋代皇室后裔给予二王后待遇。唐人杜佑《通典》记武德元年（618）诏：“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为酅公，行隋正朔，车骑服色，一依旧章。”唐朝将隋代杨氏与北周宇文氏、西魏元氏等皇室后裔并称为二王三恪，分别称为酅公、介公和韩公，要求他们为前代政权承祀祭飨，其中酅公就成为隋代帝陵的实际管理者和守护者。

唐朝建立后，立法保护前代帝陵，隋文帝泰陵也在保护之列，太宗贞观四年（630）诏：

> 爰自上古，洎于隋室，诸有明王圣帝，盛德宏功，定乱弭灾，安民济物，及贤臣烈士，立言显行，纬武经文，致君利俗，丘垄可识，茔兆见在者，各随所在，条录申奏，每加巡检，禁刍牧。春秋二时为其致祭，若有隳坏，即宜修补，务令周尽，以称朕意。[③]

不仅立法保护茔兆，还专门有春秋致祭、随时修补等规定。大体而言，唐朝管理隋泰陵涉及四个方面：亲祭或致祭、给丁看守、祭物官给、量置国官。

1. 亲祭或致祭。除了常规性春秋二季致祭外，唐朝皇帝亲祭或命人专门致祭泰陵就有多次，如武德七年（624），唐高祖幸楼观，以太牢祭隋文帝陵；贞观六年（632），太宗以少牢祭隋文帝陵；贞观十五年（641），太宗行经隋文帝陵，祭以太牢；次年，狩于岐山，使人祭隋文

① 《北史》卷十一《隋高祖纪》仁寿四年十月条，第428页。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二·京兆下》武功县条，第33页。

③ 《册府元龟》卷一七四《帝王部·修废》，第2099页。

帝陵等。其祭礼前后也有变化，由最初的太牢，一度减为少牢，后又恢复太牢之规格。

2. 给丁守护陵园。如《唐六典》奉陵邑户数记："周文帝、隋文帝陵，各置二十人，周、隋诸帝陵，各置十人。"注："皆取侧近下户充，仍分作四番上下。"[①] 隋文帝泰陵的奉陵邑户达到 20 人，较其他隋陵只有 10 人的条件，泰陵略显优越。如果当地官府未按制配给，鄾公就会申诉。

3. 祭物官给。唐朝规定隋陵由鄾公助祭主祀，飨庙所须之祭器祭物均由官给，除此而外，隋朝皇室子孙还享有官供绢粮的特殊待遇。

4. 量置国官。以隋皇室杨氏主祭隋陵，唐朝特为其营立庙宇，设置国官，同样显示出唐朝对先朝的尊重。

四、遗迹与遗物

泰陵始建于隋仁寿二年（602），完成于仁寿四年（604），适值隋朝国力鼎盛时期，虽然隋文帝遗诏有"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之文，但陵园仍然是当时最高规格。

经初步探测，陵墓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东南的位置，为堆土夯筑而成，盝顶覆斗形，现高 27.4 米，基部东西长 166 米，南北宽 160 米，基础部分呈倒凸字形，覆盖墓道。顶部稍平坦，东西长 48 米，南北宽 38 米。封土南方有两条基本平行的墓道，墓道之间相距 23.8 米，均有 7 个天井和 7 条过洞，西侧墓道长78.7米，宽3.4 ~ 5.6米，东侧墓道略短也稍窄，墓道均直通封土下的两个墓室。证实《隋书》所记"同坟而异穴"的准确性，这种同坟异穴的帝王陵墓，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处于由皇帝、皇后各有封土到二人共用一个封土的过渡期，是研究中国古代帝陵



图 2　宋"隋文帝庙碑"　（张建林供稿）

① 《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第 78 页。

葬制变化的典型代表。

清《扶风县志》记：“隋文帝泰陵，在县东南四十五里三畤原上，地九顷余，城垣遗址尚存，殿、庭、门、库久废，历代碑碣碚折，镌诸朝神像犹有存者，今并亡矣！”提及泰陵城垣内之相关遗存，如陵园四周原筑有夯土墙垣、围沟，现地面部分毁坏严重，仅残存北城垣墙一段和角楼阙楼基址数处，其中，北城残存部分墙体，长约130米，最高处约1.2米，墙基宽约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隐约可见当时陵城外墙规模。另陵园城墙四角和中部均曾发现过不少砖瓦残片，可能属陵城的角楼和门阙遗迹，说明陵园四面各有一门，其中南门门址保存较完整，门外分别有一对门阙，门阙平面呈梯形，砖瓦残片还能证明门阙可能外包砖瓦。经初步测量，陵园东西长约756米，南北长约652米，总面积约492912平方米，与清代《扶风县志》所记“陵地九顷余，城垣遗址尚存”之说相去甚远。按旧顷百亩来计算，9顷约59万平方米，如果将陵园外的另一处面积约135936平方米的遗址也包括在内，则二者约略相当。该遗址周围有长方形垣墙，南北384米，东西354米，其中南墙宽10.1米，东墙宽16.4米，南北两面的垣墙分布有马面6处，南墙4处，北墙两处，南墙正中保存有门址。但历代碑碣镌像已荡然无存。

五、考古调查与研究

在多次考古调查中，工作人员在泰陵遗址上采集到相关文物多件，以砖瓦类建筑材料居多，有铺地砖、砌墙砖和一些瓦当残片。如铺地砖有莲花方砖和菱形纹砖两种，砌墙砖分成粗绳纹和素面条砖两种，火候较高，质地坚硬。出土的瓦有板瓦、筒瓦和瓦当，其中板瓦和筒瓦均为轮制，多为粗布纹，厚薄不一。瓦当主要有单瓣莲花瓦当、双瓣莲花瓦当、兽面当、云纹当和菩萨瓦当，图案风格生动逼真，工艺考究。个中菩萨纹瓦当最为特别，瓦当面用弦纹和联珠纹组成一个桃心形符号，桃心中间出现一尊双手合十结跏趺坐的菩萨图形，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另外，多次勘察均提及隋文帝祠遗址曾有柱础，如，1953年调查时曾见7个柱础，1970～1984年间勘察时得知农民平地曾见柱础两排，间隔3米，挖出过七八十个，为正方形砂石，分大、中、小三种，边长分别是78、55、45厘米，厚均为20厘米左右，还有少量陶脊饰物和其他建筑材料。

研究成果：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申秦雁：《论中原地区隋墓的形制》，《文博》，1993 年第 2 期。

李健超：《周秦汉唐帝王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 年第 2、4 期，又载于《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三秦出版社，2007 年。

樊一：《历代帝后的合葬及其类型》，《成都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六、保护管理

唐代以后，历代均曾对隋泰陵加以保护，陵园东南原下遗址上曾有一通宋代石碑，螭首圭额，虽经风雨侵蚀，依稀可辨“隋文帝庙”字样。现在陵前仍立有清代一块石碑，碑上用隶书镌刻“隋文帝泰陵”，右侧楷书“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敬书”22 字，左侧落款为：“大清乾隆岁次丙申孟秋知扶风县事熊家振立石”20 字，碑高约 3.5 米，宽 0.95 米，厚 0.28 米，石质为石灰岩，圆首方座，背面光洁无字，保存较完好。



图 3　毕沅立隋文帝墓碑　（张建林供稿）

1957 年 5 月，隋文帝泰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二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机构设置在扶风县，1984 年划归杨陵区。

1991 年，咸阳市杨陵区设立泰陵文管所，落实专人看护。

1996 年 11 月，国务院将泰陵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陵冢封土；一般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为陵冢封土外延，东西各 400 米、南北各 800 米。

2010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泰陵的陵园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保护规划。

第二节　隋炀帝陵

一、墓主生平

杨广（569 ~ 618），隋文帝杨坚第二子，母独孤皇后。始封晋王，曾指挥隋平陈之役，防御突厥犯边，颇著声绩。开皇二十年（600）隋文帝废太子杨勇为庶人，以晋王杨广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即皇帝位于仁寿宫，次年改元为大业。在位期间（604 ~ 618），政治上，改革官制，创立科举制度；边防上，经营西域，维护丝路；国计方面，营建东京洛阳，开通大运河；民生方面，减免妇女、奴婢课税，延迟男子成丁之限；外交上，招抚流求，经略林邑，用兵辽东；内政上，改州为郡，修筑驰道；文化上，恢复学校，扶持佛教等。但也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严重偏差，如为满足其四方巡游的需要，广建离宫别殿，为南下江都而营造水殿龙舟，为征服辽东而扫地为兵，为开疆拓土而广置军府，为夸示外蕃而疲民废业，为修造大型工程而频频征发，政策朝令夕改而脱离现实，加以拒谏独裁，用人不当，致使民众怨声载道，天下土崩，隋朝二世而亡。隋炀帝杨广的一生毁誉参半，但开凿京杭大运河、创立科举制度和经营丝绸之路等事，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

隋炀帝在位期间，隋朝国力强盛一时，控制范围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东西 9300 里，南北 14815 里，隋炀一代，极盛于此。

大业十二年（616），炀帝第三次巡幸扬州，随从骁果谋归而叛，炀帝于义宁二年（618）被缢杀于江都宫，一说崩于温室，一说在彭城阁，两存之，时年 50 岁。皇泰帝杨侗为其追谥明帝，庙号世祖。而李唐奉隋代王为酅国公，追谥杨广为炀帝。

二、营建始末

隋朝在炀帝统治下戛然而止，炀帝本人的葬礼和陵墓选择自然就失去政权保障，无法按常理举行，故隋炀帝陵出现一次草葬、二次改葬、多次祭葬和一次合葬的情况。

草葬，杨广被叛军将士缢杀，同时被杀者还有一些随从大臣和炀帝子孙，皇后萧氏令宫

人撤床篑为棺以埋之，将炀帝与赵王杲同殡于江都宫西院流珠堂。

改葬有两次，第一次改葬由部将陈稜主持，在叛军北返后，留守江都的部将陈稜将隋炀帝君臣改葬吴公台，《隋书·炀帝纪》载："右御卫将军陈稜奉梓宫于成象殿，葬吴公台下。发敛之始，容貌若生，众咸异之。"此事《隋书》卷六四《陈稜传》记载稍详："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军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哀杖送丧，恸感行路，论者深义之。"据此知留守江都的陈稜为隋炀帝举行了首次迁葬。此次葬礼在江都宫成象殿举行，全军缟素，仪卫齐备，以皇帝之礼葬炀帝于吴公台下。而于炀帝同时遇难的王公将士，则陪葬于帝茔之侧。吴公台位于江都县境内，尽管吴公台与扬州城、江都宫、雷塘的相对位置也并不明确，但吴公台成为最初的炀帝陵。

第二次改葬发生在唐武德年间。《隋书》记："大唐平江南之后，改葬雷塘。"隋炀帝柩从吴公台改葬雷塘之事由李唐完成，但改葬时间却出现几种说法，《新唐书·高祖纪》武德三年（620）六月，"诏隋帝及其宗室柩在江都者，为营窆，置陵庙，以故宫人守之。"但同书又于武德五年条："八月辛亥，葬隋炀帝。"《旧唐书·高祖纪》也记是年"葬隋炀帝于扬州"，一次改葬出现两个时间，一为武德三年，一为武德五年。除此之外，还有武德二年说。对于雷塘之位置，史书也言之不确，胡三省认为隋之雷塘，即汉之雷陂，位于宋元之际扬州城北平冈上。

多次发丧祭葬。隋炀帝遇难于江都后，各地纷纷讨伐叛逆，其中有多支力量曾为隋炀帝发丧、举行葬祭，也会出现衣冠冢。如《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记：义宁二年（618）三月，"于是隋主崩问至，帝乃率文武群贤僚佐，从少帝举哀于大兴后殿。帝哭哀甚。"李渊之举哀，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很得当时之称赞。类似李渊者不乏其人，或举哀，或发丧，或缟素，不一而同。以帝礼改葬隋炀帝来表达尽忠之节，而其他人只能借助发丧、举哀、缟素等形式致祭，各种方式的葬礼都有可能以建造陵墓为终点。

一次合葬是指贞观二十一年（647），萧皇后崩逝，享年八十一岁。唐太宗以后礼将萧皇后葬于炀帝之陵，并上谥愍皇后。

三、历代变迁

隋炀帝虽然在江都宫遇难，又从吴公台迁葬于雷塘，但因为遭遇政权更迭，隋炀帝陵出

现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多次改葬和多次祭葬的结果是一帝多陵，不仅江苏扬州出现隋炀帝陵，陕西武功县、河南永宁县也出现隋炀帝陵。



图 4　咸阳市武功县“隋炀帝陵”　（摄影：郑茂良）

据明代修《武功县志》载“隋炀帝墓在西原，武德五年八月辛亥，唐高祖葬帝于此。”清代修《陕西通志》也有类似记载，“隋炀帝陵，在咸阳县东北三十五里，”又记“在武功县西原。”是在当时的咸阳县，还是武功县境内，并不一致，但应指一处，其位置应该是指今天陕西省武功县武功镇洛阳村东北的一处墓冢遗址，冢前立有“隋炀帝陵”文物保护标志碑，此处遗址就是志书所记所谓的隋炀帝陵。

另据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二九《河南府》陵墓条有“隋炀帝陵。”自注曰：“在永宁县（今河南洛宁县）东北，炀帝崩于江都，唐太宗为迁葬于此。”而清代修《河南通志》也有“隋炀帝陵：在永宁县城东北，炀帝崩于江都，唐太宗迁葬于此。”二者或许存在因袭之处，认为河南省永宁县之隋炀帝陵为唐太宗迁葬有何依据，不得而知。

宋代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淮南道扬州江都县条两处提及隋炀帝陵，一处记雷陂，“隋炀帝葬于其侧。”一处记雷塘，“在县东北十里。炀帝葬于其地。”宋代王存等撰《元丰九域志》淮南路扬州江都县之古迹有“隋炀帝陵”。清代修撰《江南通志》舆地志淮安府有：“隋炀帝陵，在府城西北十五里雷塘。大业时葬于西院，唐武德中奉诏改葬在此。宫人冢，在府城西吴公台下，一名玉钩斜，也名宫人斜。”此处不仅提及扬州隋炀帝陵，也记载了宫人冢，可能属于隋炀帝陵的陪葬墓。清代毕沅有《修隋炀帝陵记》记录了寻访经过、积土栽树、立碑刻字等细节，但仅凭村民口述与皇墓墩之俗称就下判断，是否科学也有待检验。现在江苏省扬州邗江区槐泗镇槐二村隋炀帝陵的景点，就是在毕沅确指基础上的保护开发点。

2013 年 3 月，在扬州市西湖镇司徒村曹庄发现两座砖室墓，其中一号墓出土两颗男性牙

齿骨以及一方墓志、一套十三环蹀躞金玉带、四件鎏金铜铺首等百余件随葬品；二号墓室出土女性遗骸，以及玉器、铜器、铁器、陶瓷器、木漆器等随葬品 200 余件，其中有编钟 16 件、编磬 20 件、白玉璋 1 件等。据出土文物中“隋故炀帝墓志”记载，一号墓主可能是隋炀帝，二号墓主为谁，尚不清楚。墓志文提及隋炀帝杨广卒于大业十四年（义宁二年、618），贞观元年（627）葬于此地。新发现的隋炀帝陵距离原来对游人开放的隋炀帝陵约六公里。

四、遗迹与遗物

陕西省境内的隋炀帝陵位于咸阳市武功县武功镇洛阳村东北，罗家堡西，遗址为覆斗形土冢，高约 3 米，直径 7 米。按《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记唐文宗太和五年（831），鄜国公杨元凑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凤翔一所，扬州两所，京兆府一所，准去年四月九日敕，二王后介国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给看守丁三人。凤翔府已蒙给丁讫，其京兆府及扬州，未蒙准敕例给。敕旨，各令州府准元敕处分。”此言唐代认可的隋陵有 4 所，凤翔 1 所，扬州 2 所，京兆府 1 所。但《册府元龟》卷一七三《帝王部·继绝》记载稍有不同：

“太和五年正月，鄜国公杨元凑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凤翔，一所在扬州，两所在京兆府，准去年四月九日敕，二王后介国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给看守丁三人。凤翔府已蒙给丁，其京兆府及扬州未蒙准敕旨。’各令州府，准元敕处分。”

此处所提及的隋代 7 所帝陵就无法理解，应以《唐会要》为确。

五、保护与研究

武功县之隋炀帝陵在 1957 年列入陕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重新公布了省文物保护单位，隋炀帝陵也名列其中。

武功县文管所下辖有隋炀帝陵管理所，专门负责调查与保护工作。

研究成果：

韩隆福：《论隋炀帝陵的变化及其价值》，《益阳师专学报》，2001 年第 5 期

韩隆福：《论隋炀陵在扬州的必然性和修复开发的价值》，《武陵学刊》，2010 年第 1 期

张赛娟：《扬州陵墓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初探》《东南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 年。

胡戟：《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胡阿祥：《有关扬州隋炀帝陵“质疑”的质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束家平等：《江苏扬州曹庄隋炀帝墓考古成果专家论证会纪要》，《东南文化》，2014年第1期。

第三节　隋恭帝庄陵

一、墓主生平

杨侑（605 ~ 619），为隋炀帝杨广之孙，元德太子杨昭之子。义宁元年（617）十一月，在李渊拥立下，杨侑即位于大兴殿。次年五月，逊位于唐高祖李渊。即位之前曾任陈王、代王，邑万户，在隋炀帝东征辽东期间担任京师留守，以京兆内史卫玄为师。时杨玄感起兵反隋，围攻东都洛阳，杨侑使卫玄率步骑七万增援，击败并捕杀杨玄感于阌乡。后从隋炀帝幸晋阳，任太原太守。炀帝幸江都，留杨侑镇守京师长安，杨侑委任卫玄镇守京师，赐予玉麟符，任命屈突通守河东以卫关中，将所乘之马赐予屈突通。李渊兵起太原，挥兵入关攻破潼关，代王属僚阴世师、骨仪等令京兆郡毁掘李渊五世祖庙及其坟茔，组织大兴城内留守将士坚守京城。李渊兵攻破大兴城后，李渊奉代王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

次年三月，杨广在扬州被杀之消息传到长安，唐王李渊为其举哀于大兴后殿，有人谏止唐王哭泣，他边哭边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①] 唐王逢场作戏也好，真心哀伤也罢，隋代政权在众叛亲离中走完最后一程，史载：“少帝年未胜衣，不经师傅，长于妇人之手，时事茫然。既知炀帝不存，惟求潜逊。”[②] 少不更事的杨侑不能控制时局，只好下诏逊位于李渊。完成禅代手续后的杨侑退归旧邸，受封酅国公，《册府元龟》卷一七三《帝王部·继绝》武德元年五月诏：“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为酅公，行隋正朔，车旗服色，一依旧章。仍立周后介公，共为二王后。二年五月，酅公薨，追崇为隋帝，谥曰恭。”杨侑退位后到去世之前，唐朝划出莒地（山东莒县）为其封邑，其邑置在莒国故城中。莒城周回 3 里，只开南门，城墙均规整崇峻，有子城、郭城[③]。直到武德二年（619），年仅 15 岁的杨侑无疾

① 《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高祖武德元年四月条，第 5791 页。

② （唐）温大雅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义宁二年三月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53 页。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一《河南道七·密州莒县》，第 300 页。

而终，谥曰隋恭帝。据唐人段成式《寺塔记》长安宣阳坊之静域寺：“佛殿东廊有古佛塔，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设，悉是石作，相传云隋恭帝终此堂。”[①] 段成式记载杨侑死于长安佛堂，应有一定的依据，因杨侑无后嗣，唐高祖命选立杨氏族子杨行基为其继嗣，其后嗣相继称酅公，同时以后周宇文氏之嫡嗣称介公，并称二王后，再后来又增加后魏之继嗣元氏为韩公，享受二王三恪之国宾待遇。杨侑禅位于唐，虽未能使自己免祸，却为其后代换来二王后之国宾待遇。

二、营建始末

武德二年（619）五月，隋恭帝杨侑去世，唐《高祖实录》记：“武德二年六月癸巳，有诏葬隋帝及子孙。”[②] 此诏应是在隋恭帝葬礼时发出，既针对恭帝杨侑，也涉及隋朝帝室子孙之未及收葬者。《旧唐书·太宗纪》贞观十七年（643）六月条：“改葬隋恭帝。”但隋恭帝前后两次葬礼由谁主持，陵墓由谁营建，诸书均未记载，甚至连其陵墓之位置也不得而知。只有《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记唐文宗大和五年（831），酅国公杨元凑奏：“臣先祖隋文帝等陵四所，在凤翔一所，扬州两所，京兆府一所，准去年四月九日敕，二王后介国公先祖陵例，每陵每月合给看守丁三人。凤翔府已蒙给丁讫，其京兆府及扬州，未蒙准敕例给。敕旨，各令州府准元敕处分。”[③] 杨元凑奏文提及凤翔之隋陵应是隋文帝泰陵，扬州之陵系隋炀帝陵，那么京兆府辖属之陵可能就是隋恭帝杨侑之陵，但具体位于京兆府之何县，却言之不确。幸而《唐会要》卷七十《州县改置上》关内道京兆府好畤县记：“武德二年二月五日，置于隋庄陵城。”隋恭帝杨侑去世时间存在争议，一说为武德二年五月，一说为此年八月，但在武德二年二月杨侑还在世之时就有其陵城的可能性很小。是否此庄陵为隋炀帝太子杨昭之墓，也未可知，据《隋书·杨昭传》记虞世基为杨昭撰写的哀册文：“（大业）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将迁座于庄陵，礼也。”因无法判断，故两存之。虽庄陵之主人有争议，但隋庄陵之位置却有迹可循，可能就位于京兆府好畤县境内。这种说法也得到唐人杜佑之证实，《通典》卷一七三《州郡典·古雍州》好畤县：“好畤县城在县南十三里，隋太子庄陵城。”证明隋恭帝杨侑之庄陵就建在京兆府好畤县。北宋宋敏求之《长安志》卷十九《好畤县》记：

① （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宣阳坊静域寺条，第762页。

②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高祖武德五年八月条，《通鉴考异》引《实录》，第5953页。

③ 《唐会要》卷二四《二王三恪》，第463页。



图 5　隋恭帝陵　（张建林供稿）

“今奉天县西北六里隋太子庄陵城是。”唐宋时代之好畤县城的方位多以隋庄陵为参照。

三、历代变迁

隋恭帝去世后，唐朝以帝王之礼为其营建庄陵，又在其陵城设好畤县。同时，庄陵也得到唐代的多方保护。首先是营建陵庙，五代后唐的太常礼官曾经提到：“武德故事，祀隋之三帝。”[①] 说明唐朝武德年间曾经为隋朝三帝立庙宇，这三帝当然包括隋恭帝在内；其次是给丁看守，唐前期隋文帝泰陵给丁 20 人，周隋诸帝陵各置 10 人。中唐以后，隋代诸陵各给看守丁 3 人；再次是定时修祭，隋室后人享受二王后之待遇，每年四时飨庙，由唐政府供给其祭器、祭服、牺牲之物；复次是量置国官，鄢国公享受国宾之礼，可置国官，为其祖宗享陵主祭；最后是茔域禁刍牧樵采，如，唐太宗贞观四年（630）有诏保护汉陵、隋陵，“禁刍牧，春秋二时，为其致祭，若有隳坏，即宜修补”。唐中宗神龙二年（706）也诏：“自古帝王及圣贤墓，并禁樵采。”在保护历代先贤帝王陵墓的同时，也保护了隋陵。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隋恭帝杨侑庄陵位于陕西省乾县阳洪镇乳台村南 500 米处，靠近底旦村，周围是麦田和果园。陵冢呈覆斗形，底边长 82 米，上部残边长 28 米，高 15.8 米，当地百姓称之为方陵，

① 《册府元龟》卷一七四《帝王部·修废》，第 2102 页。

四角有门阙，南有门址。封土堆周围偶见唐代瓦片，封土为平夯而成，夯层厚 18 ~ 20 厘米，史籍所载之陵城现基本未见，未见有石碑类标记。陵西南的唐宫酒店，其东围墙距陵之封土仅数十米，一条乡间柏油路紧贴陵封土之北边穿过，北边部分封土遭到侵蚀，情况堪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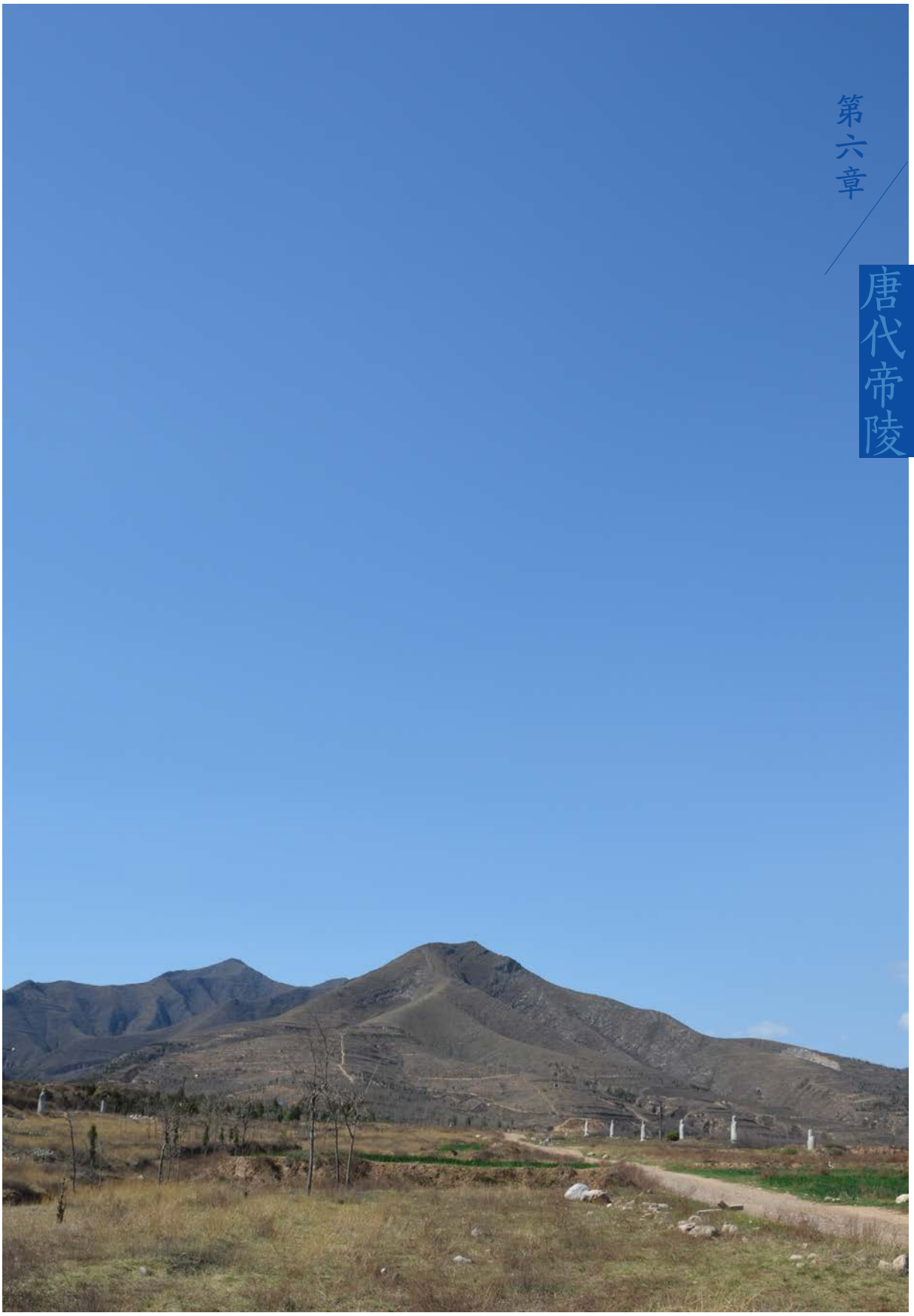
研究成果：

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 年第 2 期。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年。

第六章

唐代帝陵



唐代共有 18 座帝陵在陕，若以长安城为中心，东连泰陵，西连乾陵，东西长 140 公里，总面积将近 3000 平方公里。其分布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以现在的政区来说，分布在蒲城、富平、三原、泾阳、礼泉、乾县等六县境内。蒲城境内有 4 座唐陵，即睿宗桥陵、玄宗泰陵、宪宗景陵和穆宗光陵。富平境内有 5 座唐陵：中宗定陵、代宗元陵、顺宗丰陵、文宗章陵和懿宗简陵。三原境内有 3 座唐陵：高祖献陵、敬宗庄陵和武宗端陵。泾阳境内有两座唐陵：德宗崇陵和宣宗贞陵。礼泉境内有两座唐陵：太宗昭陵和肃宗建陵。乾县境内有两座唐陵：高宗乾陵和僖宗靖陵。

关中十八陵中修建于初唐时期的 4 座，即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和中宗定陵。盛唐时期修建的帝王陵墓主要是桥陵，此外，玄宗泰陵和肃宗建陵大体上也可以划分在这个时期以内。中唐时期修建的帝王陵墓计有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和敬宗庄陵。修建于晚唐时期的帝王陵墓有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和僖宗靖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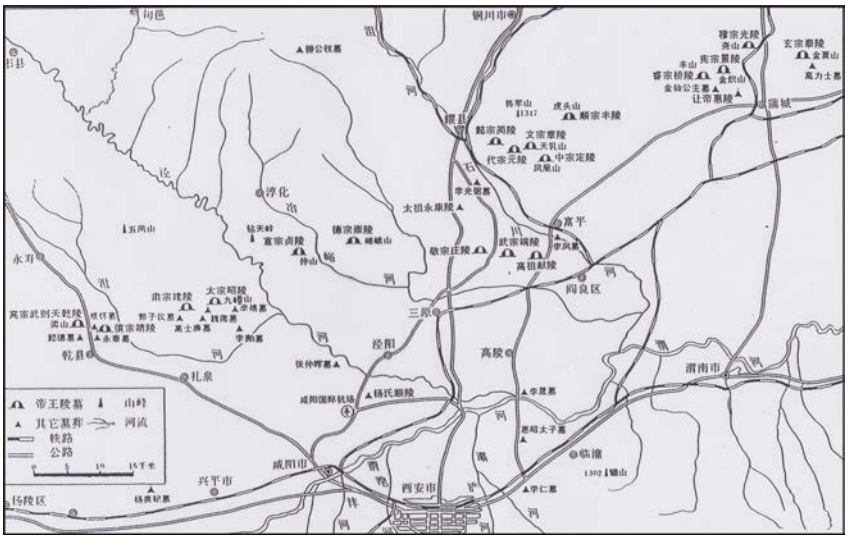


图 1　唐代关中帝陵分布示意图

关中唐陵的分布有下列特点：一是十八座陵墓都分布在首都长安以北的渭北地区；二是十八陵中有 14 座因山而筑，4 座堆土成陵，大部分位于山上，小部分山下；三是这些陵墓在排列上没有明显的昭穆关系。

从 2006 年开展的“唐陵大遗址保护”考古调查项目先后对 10 座唐代帝陵进行了地面调查、考古钻探、局部发掘和全面测绘，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唐代帝陵不同时期的陵园布局和结构逐渐清晰，为进一步了解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演变以及陵园设计理念提供了重要资料。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献陵、昭陵为第一阶段；乾陵、定陵、桥陵为第二阶段；泰陵至光陵等 7 个陵为第三阶段；庄陵至靖陵等 6 个陵为第四阶段[①]。

关中十八陵范围大小不一，但陵园的结构基本相似，都是由地下宫殿和地面建筑构成的。

唐代帝王陵园均有围墙。堆土为陵者城垣大体上呈方形。因山为陵者因各陵均是坐北朝南，故南墙所处位置多在山下，都比较平直，而东、西、北三面陵墙则多顺山脉而筑。城垣四面中部各开一门，称为“司马门”或“神门”，门外有三出阙一对，阙上建有土木结构的楼阁。此外，唐陵城墙四角均筑有角阙，上建楼阁，有如城墙四角的角楼。鹊台和乳台上是三出阙。无论是门阙、角阙还是台阙，都是十分醒目的建筑，造型独特，雄壮美观。

关中唐陵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堆土为陵，一种是因山为陵。堆土为陵即在平地上开挖墓室，修筑地宫，上面堆土，建成覆斗形的封土。因山为陵就是把自然的山峰作为陵山，在南面山腰开凿地宫，修建陵园。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章陵、贞陵、简陵都模仿昭陵，采用了因山为陵的形式。只有庄陵、端陵和靖陵，仿效献陵，采用了堆土为陵的形式。覆斗形唐陵与秦汉帝王陵墓没有什么差别，符合“以方为贵”的思想。

寝宫又称下宫，基本位于陵山、陵寝的西南方向，象征帝王生前临朝和居住的宫殿，也是上陵朝谒和举行隆重祭祀礼仪的地方。

除了上述建筑，关中唐陵中还有一些设置。比如祭坛、栈道、神游殿、陵署等等。

唐帝陵的地下宫殿由于外部结构有些区别，其内部构造也可能有所差异，但这些差异并

① 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

不很大，可以肯定它们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关于墓室的形状，从唐人的宇宙观念和已发掘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及六朝五代帝王陵墓分析，当是上圆下方，顶部为穹隆式，底部呈四方形的。



图 2　乾陵南神门东侧石狮　　（摄影：郑茂良）

在十八陵中，有数以千计的石刻。这些石刻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或鬼斧神工、玄妙莫测，或造型逼真、栩栩如生，都是珍贵的艺术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陵墓石刻，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唐陵石刻组合的基本模式是从乾陵确定的。

唐代十分重视帝王陵墓的修建。每座陵寝都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封域”少则 20 里，多则 80 里，有的甚至达到 120 里。对于建好的帝王陵寝，唐代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直接管理陵寝的机关，主要是设在诸陵的陵署。

唐朝灭亡以后，关中唐陵的地位一落千丈。陵署解散了，守军逃亡了，原来的陵户也不复存在。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关中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也给关中唐陵带来了悲惨的命运。在五代战乱的过程中，关中唐陵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部分陵墓都被华原（今陕西耀县）贼帅温韬盗掘。《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冬十月，“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①]。后唐末帝李从珂《修奉列圣陵寝诏》也说：“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

① 《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十月，第 8705 页。

陵有所阙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给日食 ，祭告下太常宗正寺能参详奏闻。”[①] 这些事实都说明，温韬用了短短 7 年时间，便将大部分唐陵盗掘。其贪欲之大、手段之高、行为之猖獗，在古今中外的盗墓贼中是罕见的。宋元时期，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极目四望，依然是一片残破的景象。

不过，宋初的统治者对前代帝王陵墓还是比较重视的。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墓的过程中，也对关中唐陵进行了保护。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诏先代帝王陵寝，令所属州县遣近户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也加修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赵匡胤下诏：给唐高祖献陵、太宗昭陵各置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唐玄宗、肃宗、宪宗、宣宗各给守陵二户，三年一祭。唐高宗、中宗、睿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诸陵常禁樵采者著于令[②]。不久又令地方官员对历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察。开宝三年（970）九月六日，河南府、京兆、凤翔府、耀州上言：唐高祖、太宗、中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等二十八陵曾遭开发。宋太祖下诏：“每帝制造礼衣一幅，帝服一袭，具棺椁重葬。……当用金宝，以假者代之。”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诏：“先代帝王陵寝曾经开发者已令重葬，所役丁夫恐妨农务，宜以厢军一千人代之。”三月，又诏：“先代帝王陵寝修创庙宇，唐高祖置守陵庙七户。唐太宗、肃宗、明皇、宪 宗、宣宗五户，



图 3　大宋新修唐玄宗庙碑　　（摄影：郑茂良）

① 《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二十，第 1127 页。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八一九八《礼三八之一・守陵》。中华书局，1957 年，第 1358 页。

岁添植林木。”[①] 由此可见，宋太祖在保护唐陵方面是很有功绩的。不仅下诏对被盗唐陵进行了重葬，填补了盗洞，为献、昭、泰、建、景、贞等陵设置了陵户，在献、昭、景诸陵修建了庙宇，而且禁止在关中唐陵中樵采，并对关中唐陵进行了绿化。

宋辽夏金时期，来唐陵凭吊者不乏其人，或在乾陵无字碑上篆刻题记。据无字碑上的题记，金太宗时，“大金皇弟”也曾对乾陵进行过整修。明朝统一全国后，对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明代规定祭祀的唐代帝王有四位：唐高祖，三原县祭；唐太宗，礼泉县祭；唐宪宗，蒲城县祭；唐宣宗，泾阳县祭。除县祭外，对一些重要的陵寝还曾遣使祭祀。如洪武三年（1370）遣使祭太宗昭陵，御制祝文，遣之以白金二十五两具祭物。其后洪武四年（1371）、三十五年（1402）、洪熙元年（1425）、宣德元年（1426）、正统元年（1436）皆曾祭祀[②]。清代前期，清政府曾多次派人至礼泉祭祀昭陵。当时的地方官也比较注意对唐陵的保护。毕沅在乾隆年间出任陕西巡抚，撰写《关中胜迹图志》和《关中金石记》等书，对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都划出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并派专人进行管理，尤其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唐陵又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遭受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当时修纂的《蒲城县志》记载：“昔唐盛时，寝园秘殿，楼阁峥嵘，今则荒原寥落，无复凤翥鸾翔之巨观，惟陇上闲云往来卷舒于复道御碑间耳。”时人吴玉在《晚过乾陵》诗中也说：“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唐陵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

20 世纪前期，关中地区兵荒马乱，唐代帝王陵墓继续处于被破坏的状态。这一时期对唐陵最严重的破坏是昭陵六骏被盗的事件。三十年代，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撰写《长安史迹考》前，曾对关中 6 座唐陵进行过实地考察。五十年代以后，政府重视文化遗产，关中唐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1953 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关中唐陵进行了普查。重点勘查了昭陵、乾陵、桥陵和建陵。1961 年，国务院将昭陵和乾陵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他诸陵也都被确定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加强对关中唐陵的保护和研究，1961 年成立乾陵文物保护管理所，1972 年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1978 年，又分别成立了乾陵博物馆和昭陵博物

① 《宋会要辑稿》卷八一九八《修陵》，第 1358 ~ 1359 页；《宋史》卷二《太祖本纪》，第 32 页。

② 曹骥观：《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二。

馆。昭陵博物馆收藏昭陵文物 4500 多件，其中包括 500 平方米的唐墓壁画和四十余通唐代墓碑。乾陵博物馆收藏乾陵文物 4598 件，其中一级品 27 件。其他诸陵则由陵寝所在各县的文教局管理。通过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唐陵保护的力度。因此，除“文革”时期外，唐陵很少受到人为的破坏。通过五六十年代的重点勘查，对昭陵、乾陵、桥陵和建陵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对这些陵墓的石刻及其他设施进行了若干修整。此外，还对唐陵的一些陪葬墓进行了发掘，如献陵的李凤墓，昭陵的尉迟恭墓、张士贵墓、郑仁泰墓、李福墓、李勣墓、李震墓、阿史那忠墓、临川公主墓、安元寿墓、李贞墓、李冲墓，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薛元超墓和李谨行墓，桥陵的金仙公主墓等。



图 4　整修一新的唐昭陵北司马门祭坛　（摄影：郑茂良）

作为国家文物局正式确定的全国 100 个大遗址保护项目之一，“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于 2006 年正式启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建唐陵考古队承担该项目的考古调查工作。调查对象包括 18 座帝陵，两座祖陵（永康陵、兴宁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顺陵。目的是全面了解陵园遗址的范围、布局和内涵，为划定保护范围和制定保护规划提供依据，同时进一步推进唐代帝陵考古研究。目前已完成献陵、昭陵北司马门、乾陵、桥陵、泰陵、建陵、崇陵、庄陵、贞陵、顺陵等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下一步的研究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唐高祖献陵

一、墓主生平

唐高祖李渊（566 ~ 635），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祖父李虎，西魏八柱国之一，追封唐国公。父李昞，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唐国公。因出自贵族家庭，又是隋朝皇帝的近亲，李渊 7 岁时，即袭封唐国公。隋文帝时，曾担任谯、陇、岐等州刺史。炀帝即位后，他担任荥阳、楼烦太守、弘化留守、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等职，可以说，一直受到了隋王朝的重用。大业十三年（617）初，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留守，把镇守北边的重任交给了他。也就在这一年，李渊开始起兵反隋，最终建立了唐朝。



图 5　唐高祖献陵封土和南门东列石虎　（摄影：李川）

李渊在攻克长安以后，“率百僚，备法驾，立代王杨侑为天子，遥尊炀帝为太上皇”，以杨侑为傀儡皇帝而自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总录万机”，在“尊隋”的幌子下，李渊同时进行着代隋的准备。一方面，以武德殿为丞相储，加强政权建设；另一方面，“以书谕诸郡县”，招抚东自商洛、南到马蜀的郡县长史氐羌酋长和农民起义领袖，打击入侵关中的金城军阀薛举，着手向东进军。待时机成熟，杨侑被迫

逊位，李渊即皇位，改元武德，建立唐朝，仍以长安为都。

李渊称帝后，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李唐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李密、窦建德、杜伏威所率领的农民军和王世充、宇文化及等军阀仍有很大的势力。他们或独霸一方，或挟隋朝皇室以发号施令，都威胁着新生的李唐政权。李渊又经过 10 年备战，先后消灭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割据势力，才使唐王朝巩固下来，最后确立了李氏的统治地位，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

李渊晚年未能妥善处理皇位继承问题，太子集团与秦王集团矛盾尖锐。武德九年（626）六月，次子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李渊遂立李世民为太子。同年八月，传位于太子，自称太上皇。

《旧唐书 • 高祖纪》载：“（贞观）九年（635）五月庚子，高祖大渐，……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年七十。群臣上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当年十月，葬于献陵。之后高宗于上元元年（674）八月，追尊为“神尧皇帝”。玄宗于天宝十三载（754）二月，又追尊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

二、营建始末

献陵位于三原县东 20 公里的徐木原上。徐木原南宽北窄，西高东低，海拔高度约 500 米左右。献陵位于徐木原东西居中位置。陵墓系堆土而成，封域 20 里。

献陵修建于贞观九年（635）。唐高祖在遗诏中虽说“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陵园制度，务从俭约。”[①] 而唐太宗为了行孝，决定按西汉长陵的故事给高祖修建陵寝，要求丧事“务在崇厚”。按照唐太宗的旨意，献陵由匠作大将阎立德设计，并如期开工。由于陵园工程浩大，又为葬期所迫，“功役劳敝”，秘书监虞世南两次上书请求依照高祖遗诏务从节俭，太宗内心很矛盾，不能自决，遂将虞世南的奏章交给大臣讨论。司空房玄龄等人认为，长陵高九丈，过于宏侈，而以二丈立规，又伤矫俗。光武帝是中兴明主，行事多依典故，其原陵高六丈。宜依原陵制度行事。太宗采纳了这建议，于是山陵制度，颇有差减省[②]。

①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②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

献陵是唐代的第一座帝王陵墓，在陵墓制度上尚属于草创阶段。宋敏求《长安志》载：“献陵封内二十里，下宫去陵五里。”献陵系堆土成陵，封土夯筑，为覆斗形，位于陵园中部偏东处。陵园四面筑有墙垣。每边各置一门。四角各有角楼一座。陵园四门外有石虎四对。南门外为神道，即所谓“司马道”。神道南北长576米，宽39.5米。其两侧列置大型石刻犀牛一对、石人三对、石柱一对。此外，陵园中还有献殿、寝殿、下宫等重要建筑。



图6　献陵神道东侧石柱　　（编写组供稿）

经过1300多年的风雨沧桑，献陵的地面建筑已荡然无存，但陵冢基本上还保持了原来的面貌。献陵石刻数量较少，现今在陵区所能看到的只有一只石虎和一个石柱。另有一只南门石虎和一只神道石犀陈列于碑林博物馆。石犀体形高大，凝重自然。石虎造型别致，颇为凶悍。

2011年，唐陵考古队对分布于献陵北部和东北部的陪葬墓区进行考古勘探，该地旧称荆山原，地势高敞开阔，土层深厚，旧时墓冢成群。陪葬墓区西起富平县吕村乡的新庄和道理村，东至褚家塬双堡村，北至北吕村，南到贺家塬、王家庄一带，东西长约5000米，南北宽约2000米。考古队共计探出各类古墓葬289座，探明了献陵陪葬墓的分布范围和详细数量，发现了多处有规律排列的集中墓园和不同类型分散排列的陪葬墓墓园。依据其墓园结构和墓葬形制、规格，其中93座墓葬可以确定为献陵陪葬墓，这些墓葬的特征是规模较大，外围有围沟，墓葬有长斜坡墓道和数量不等的天井、过洞，其中28座保留有封土，其余196座墓葬规模小，墓葬结构简单，或墓向为东西向，均不符合献陵陪葬墓规格，甚或不是唐代墓葬，因此排除在外[①]。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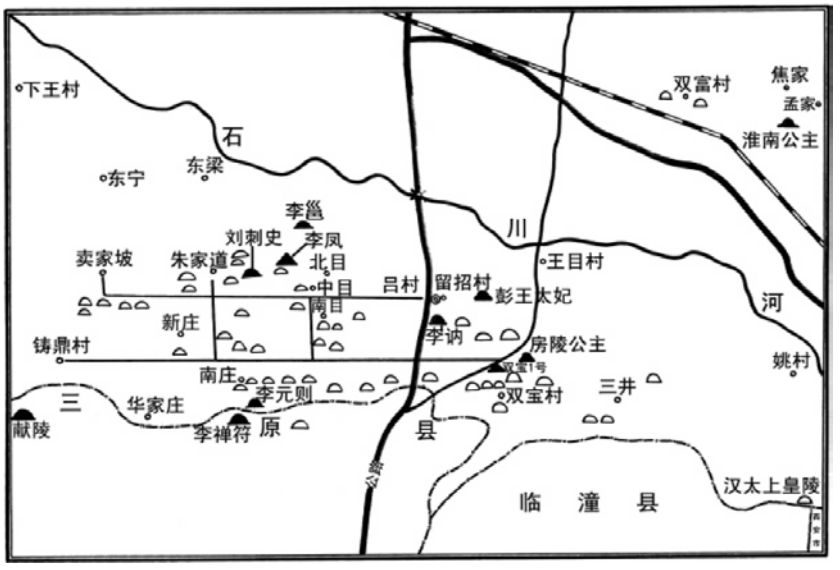


图 7　唐献陵陪葬墓分布图　（采自张蕴：《关于献陵陪葬园区布局的思考》，《考古与文物》，2012 年第 3 期）

综合相关记载可知献陵陪葬者分为三类：一类是后妃，一类是宗室，还有一类是大臣。其中后妃墓两座，即太穆皇后窦氏墓、楚国太妃万氏。宗室墓 17 座，即河间王李孝恭墓、襄邑王李神符墓、清河王李诞墓、韩王元嘉墓、彭王元则墓、道王元庆墓、郑王元懿墓、虢王元凤墓、鄫王元亨墓、徐王元礼墓、滕王元婴墓、邓王元裕墓、鲁王灵夔墓、霍王元轨墓、江王元祥墓、密王元晓墓、馆陶公主墓。大臣墓 6 座，即并州总管张纶墓、平原郡公王长楷、荣国公樊兴、谭国公邱和、巢国公钱九陇、刑部尚书刘德威。考古工作者曾对虢王李凤墓和房陵大长公主墓进行了科学发掘。

李凤（622 ~ 674）系唐高祖第十五子，两《唐书》有传。据本传记载，李凤在武德六年（623）初封豳王，贞观十年（636）改封虢王。历任邓、虢、豫、青诸州刺史，实封千户。高宗上元元年（674）薨，赠司徒、扬州大都督，陪葬献陵。其墓位于富平县吕村乡北吕村西 300 米处。封土呈覆斗形，顶部长 7 米、宽 5 米，底部长 90 米、宽 30 米。1973 年 9 月，因雨水浸陷墓室，陕西省文管会与富平县文化馆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该墓由 4 个过洞、3 个天井、8 个小龛及甬道、墓室组成。墓道全长 63.38 米，甬道与墓室间有两道石门，墓室底部略呈正方形，内有石棺床，床面上有少量腐败棺木及骨骼残片。出土文物 340 件，其中陶俑 225 件，陶器 12 件，石刻 12 件，其他饰物 87 件。墓道和墓室中有大量彩色壁画，内容以建筑、花鸟、人物为主。据墓道中所存墓志铭，此墓为李凤及其夫人刘氏的合葬墓。

房陵大长公主（618 ~ 673）为唐高祖第六女。初嫁左卫将军窦奉节，奉节死后改嫁贺伦僧伽。咸亨四年（673）病逝于九成宫，同年十月四日陪葬献陵。其墓位于富平县吕村乡双宝村北 300 余米处，地面封土荡然无存。1975 年文物考古部门即对此墓进行了清理。据发掘资料记载，斜坡墓道宽 2.56 米，长 57.8 米，有 5 个过洞，4 个天井，6 个小龛，甬道分为前后两段，均用砖券筑。墓室有二：前室南北长 3.6 米，东西宽 3.54 米，穹隆，中心高度 4.45 米。后室南北长 4.1 米，东西宽 4.16 米，穹隆，中心高度 5.2 米。石椁在后室偏西处，因早年被盗，空无一物。考古人员在前甬道发现墓志一盒，盖顶篆书“大唐故房陵大长公主墓志铭”12 字，志文阴刻，凡 809 字。墓中虽出土少量陶俑，但品相不佳。墓道、甬道及墓室壁画残损严重，但有 27 幅侍女人物画颇为精美，生活气息浓厚，很有参考价值。

三、陵园变迁

献陵是唐代第一座帝王陵墓。故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不仅置陵署、设陵令，而且驻军进行保护。时有帝王拜陵、公卿巡陵，并采取多种措施，使献陵得到很好的保护。据两《唐书》记载，康子元、张公及等人都曾担任过献陵令。唐太宗、唐玄宗等人都曾拜过献陵。如《唐会要》卷二十载：贞观十三年（639）正月一日，太宗朝谒献陵，“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太宗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待御者莫不欷



图 8　齐士员造像碑，位于献陵封土东北约 600 米处。为贞观十三年（639）献陵守陵官齐士员为太武皇帝、太穆皇后敬造祈福石佛殿　（摄影：李川）

嘘。”唐宪宗时，藩镇曾派间谍向献陵纵火。《旧唐书》卷三十七载，元和十年（815）十一月，“献陵寝宫永巷火”。对此，唐宪宗十分震怒，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唐朝灭亡后，献陵建筑日渐损毁。五代时被军阀温韬盗掘。宋初曾下令修补，并进行祭礼。明初禁樵采。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西巡抚毕沅立“唐高祖献陵”碑，划界保护。晚清以来石刻有所损坏。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些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献陵进行过调查。王子云率领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曾在献陵实地写生。他对献陵的石刻很感兴趣，认为“较早的唐陵石雕是唐高祖献陵前的石狮（虎），同样的作品共有八件，分置陵园四门之外。另有石犀和石柱各二列置于墓前。这在唐代帝王陵墓葬仪卫石雕中是很特殊的”[①]。后来贺梓城、刘庆柱、巩启明、张建林等人也曾对献陵进行过较为仔细的考察。

研究成果：学术界对献陵的研究相对较少。所发论著仅有数种，具体情况如下：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嗣虢王李邕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2年。

樊波：《唐献陵石犀趣谈》，《华夏文化》，1997年第2期。

巩启明：《唐献陵踏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

吴杰：《献陵石犀》，《西部大开发》，2008年第7期。

张蕴：《关于献陵陪葬园区布局的思考》，《考古与文物》，2012年第3期。

张建林、张博等：《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张蕴、卫峰：《唐嗣虢王李邕墓前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7期。

五、遗迹与遗存

（一）遗迹

唐代以后，献陵的地面建筑逐渐被毁，仅余地基。封土位于陵园中部偏东，覆斗形，高约19米，底边东西长130米，南北宽110米，顶部东西长30米，南北宽10米。南门、北门

① 李炳武主编：《长安学丛书·王子云卷》，三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6～197页。

与封土相距 180 米，东门距封土 130 米，西门距封土 198 米。门址及角楼周围，堆积大量板瓦、筒瓦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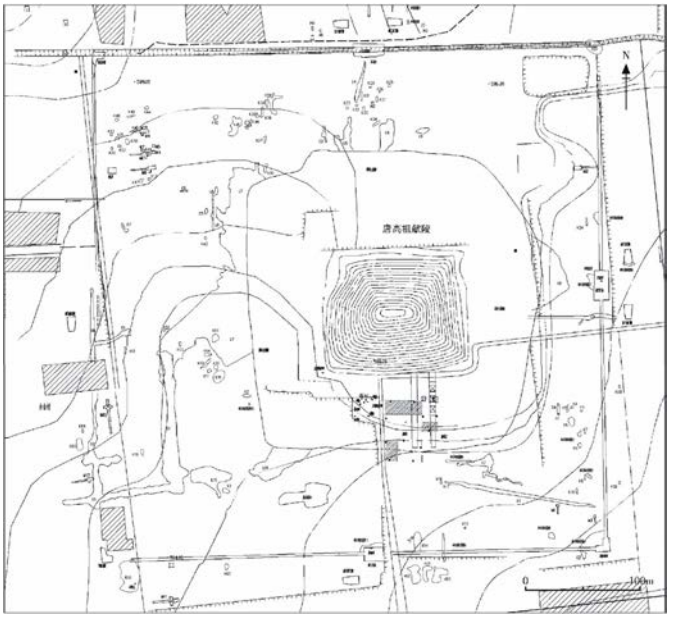


图 9　献陵陵园平面分布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

献陵陵园平面形状略呈方形，墙垣南北长 451 米，东西宽 448 米。墙垣底宽约 2 ~ 2.5 米，夯层厚 12 ~ 20 厘米不等。墙垣基址两侧地面可见大量瓦片及白灰墙皮残片，瓦片中板瓦较多，筒瓦较少，偶有莲花瓦当残块发现。陵园墙垣四角筑有曲尺形的夯土角阙阙台基址，除东南角阙基址保存较好外，西南角阙、西北角阙部分被破坏，东北角阙几乎破坏殆尽。陵园墙垣四面中间原分别建有门，各门址保存情况不同，形制和规格相同，均由门址、门阙、门外石虎构成。西门址破坏严重，南门址被水泥路打破，北门址被现代水渠打破，东门址相对较完整。南北长 26 米，东西宽 14 米，门址外有门阙 1 对，门阙为夯土筑就，平面为三出阙的形制，石虎距离门阙 125 米，两石虎间距 33 米。南门石虎与石柱之间为陵园神道，长度 404 米，两石柱间距 37 米，未探出路面遗迹。

下宫遗址位于乳阙以南 1210 米，偏西 370 米，现为三原县长城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厂址，遗址东西长约 100 米，南北宽 120 米。仅在四周发现少量夯土基址和大量砖瓦堆积，遗址整体面貌不清楚。北宋时曾在此修建唐高祖庙并立碑。

献陵北遗址位于献陵陵园东北，其西侧围沟恰好位于北司马道中轴线，遗址南垣墙与陵园北门石虎间距 46 米。地面上有红烧土及砖瓦残块堆积[①]。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

（二）遗物

献陵遗物主要是陵园中的大型石刻和陪葬墓出土的一些文物，其大型石刻是记述重点。

1. 石虎

南门外的一对虎，位于门址南 165 米处。东侧的石虎向西而立，保存完好。身长 2.75 米，胸宽 1 米，通高 1.8 米，颈下有“武德拾年九月十一日石匠小汤二记”铭文。西侧石虎大小与东侧石虎相同，于 1959 年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展出。据《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记载，东门外石虎位于门址东 140 米处，二虎南北相对，相间 37.5 米，地面可见北侧石虎背部，南侧石虎完全掩埋于地下。北门外石虎，在门址北 150 米处，二虎东西相对，间距 37.5 米，东侧石虎已不存，地表仅余石座，西侧者半埋土地中，仅露出背部，腿已断。西门外石虎，在门址西 150 米处，二虎南北列置，相间 37.5 米，南侧者与基座分离，腿、嘴残破，身躯完好。北侧者半掩土中。现今这东、南、北三处陵门的 5 只石虎在经过考古发掘之后已全部埋于地下，地面上仅见北门两石虎基座。

2. 石犀

石犀位于石虎之南、石柱之北，东西相对。东侧石犀高 2.12 米，长 3.35 米，体态硕大，造型逼真，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完好。其右前足下石板上刻有“高祖怀远之德”6 字，“高”字已漶泐不清。西侧石犀被掩埋于地下。



图 10　迁展碑林博物馆的献陵石犀　（摄影：郑茂良）

3. 石柱

献陵石柱位于南门外神道的尽头，原为一对，东西相距 39 米。东者保存较好，西者现已残毁。东边石柱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通高 7.23 米。下部包括础石和石座，显得厚重稳当。石座略成覆钵形，质地十分坚硬，四面线雕花纹。

座上浮雕一对首尾衔接的螭龙，鳞甲如新，形态逼真，颇为精美，可惜龙头已被破坏。石座中部有卯，以接柱身。中部柱身为八棱形，向上收杀。每面线刻绕枝花团，通身又有S形对舞双龙。上部柱顶有八棱形石盖，盖上雕有一蹲避邪，挺胸昂首，耸耳披鬣，小巧玲珑，看上去很有趣。西边石柱倒埋在水沟中，石柱的盘龙石座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砸毁，近年曾发掘出石座残块。献陵石柱在造型上仍保留着南朝石柱的某些风格，但已显示出唐代的特点。汉魏六朝时，石柱的纹饰多为首尾相接的双虎或双螭，石柱的主体多为瓦楞圆形。从献陵开始，石柱柱身改为八棱形，纹饰改为舞龙和缠枝。

六、文物保护

1956年8月，献陵被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陕西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4月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陵冢及周围外延5米；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陵园宫墙四门内。

2001年6月，献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7年7月，献陵文管所成立，专司保护职责。

2011年1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献陵保护范围包括陵园封土、城垣、四门及南门神道等部分；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边外延200米。

第二节　唐太宗昭陵

一、墓主生平

李世民（598 ~ 649），唐高祖李渊次子，母太穆皇后窦氏。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十二月生于武功之别馆。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唐太宗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以超人的意志和非凡的才能，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大刀阔斧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政治上，唐太宗非常注意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君子则国治，用小人则国乱。由于唐太宗知人善用，因此，在他身边的谋臣猛将，大都能够各显神通，发挥作用。

在经济上，唐太宗采取多种办法，努力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贞观初年残破的景象消失了，社会经济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在军事方面，唐太宗进一步完善府兵制，特别重视边疆地区的巩固和开发。为了维护祖国辽阔的疆域，他抛弃了以往帝王所持的民族偏见，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他曾说：“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平等看待各民族，怀柔少数民族外，还经常提拔少数民族成员做官，参与国家政治。

唐太宗在位 23 年，由于他锐意维新，励精图治，终于促成了著名的“贞观之治”，给盛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而千百年来一直得到人们的高度称赞。作为“贞观之治”的促成者，唐太宗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

二、营建始末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积劳成疾，在终南山翠微宫溘然长逝，终年 52 岁。同年八月十八日，唐高宗为太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葬唐太宗于昭陵。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北部，因山为陵，所在的九嵕山海拔 1188 米，是关中唐十八陵中



图 11　昭陵远景
（编写组供稿）

海拔最高的陵园。通过调查，现知陵园的重要建筑群遗址有 3 处：九嵕山南侧偏东山梁下的南司马门及献殿遗址；西南侧台地上的下宫遗址；北侧山坡的北司马门遗址。此外还有山腰南侧和东侧的石窑、石室遗迹。九嵕山南侧和东侧的山坡及山下东、南部的开阔平原地带则是昭陵的陪葬墓区。包括陪葬墓区的陵园总面积约 20 平方公里，地跨礼泉县烟霞、赵镇、北屯 3 个乡镇[①]。昭陵因山而置，九嵕山孤耸回绝，气势雄伟，树木葱茏，风景绮丽，是渭北山系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山。封域 120 里，总面积达 30 万亩，是关中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昭陵是唐太宗亲自为自己选定的藏身之地。史载，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长孙氏崩后，唐太宗下诏开始营建昭陵。据《唐会要》卷二十《陵议》记载，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对侍臣讲：过去汉朝皇帝在世的时候就营造山陵，这样既为自己建好了阴宅，可以亲眼看到它，又省得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力物力，我很赞同这种做法。古人因山修坟，比较方便。我看九嵕山孤耸回绕，依山旁凿，可置山陵。我死后就葬在这里。于是下诏在九嵕山上修建昭陵，要求务从俭约，能容下一口棺材就行了。事实上，昭陵决非“足容一棺而已”。《唐会要》卷二十载：昭陵因九嵕层峰，从南面的悬崖峭壁上挖掘深七十五丈的墓道，修建玄宫。缘山傍岩，修筑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才能到达玄宫门。昭陵规模之宏大，于此可见一斑。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2 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6 期。

昭陵是由唐代著名建筑设计师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设计，其平面布局仿照唐长安城。当年昭陵有富丽堂皇的地面建筑和地下宫殿。高大的南门、雄伟的献殿和庄严的祭坛，构成地面建筑的主体。陵寝因山而建，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

玄宫建筑在山腰南麓。初建时架设栈道，“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栈道长 230 步，约合 400 米。玄宫深 75 丈，石门五道，中间为正寝，是停放棺椁的地方，东西两厢排列着石床。床上放着许多石函，里面装着殉葬品。墓室到墓口的通道上，用三块大石砌成，石与石之间相互铆住。



图 12　九嵕山南麓保存的栈道遗迹　（摄影：郑茂良）

昭陵下宫遗址位于九嵕山南麓皇城村东侧的开阔缓坡地带，2004 年进行了钻探调查和局部试掘。下宫为一组完整的宫殿建筑，外周为长方形的宫城城墙，南北 304 米，东西 238.5 米，夯土城墙厚 2.5 米左右，寝宫北部用一道东西向内城墙隔出南北宽 47.5 米的夹城，宫城东西两面未发现城门，南北两面辟城门，夹城城墙上与北门相对的位置又设一重门，3 座门址虽破坏较严重，但总体结构仍大体可辨。门的基址均为包砖的夯土台，与陵园北司马门已发掘的门址结构大体相同。其中南门址东西 23.2 米，南北 13 米，夯土台基原高 1.2 米左右，周有砖铺散水。北门址形制、规模与南门址相当。北重门门址较小，结构亦相同，城墙范围内经初步钻探，发现南北分布的 3 组夯土基础和纵横分布的夯土墙体，其间有大量砖瓦堆积[①]。在九嵕山北麓设北司马门，紧依山势，南高北低，由五层台阶地组成。在南三台地上有寝殿，东西庑房，阙楼及门庭，中间龙尾道通寝殿，是昭陵特有的建筑群。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六骏及十四藩君长像等石刻。

昭陵陪葬墓分布于昭陵的东南方向，陪葬区很大，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陪葬墓群。关于昭陵陪葬墓的数量，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两《唐书》记载 74 座，《唐会要》载 155 座，《长

① 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

安志》记载 166 座，《文献通考》载 174 座，《关中陵墓志》载 130 座，《礼泉县志》载 203 座，《历代陵寝备考》《陕西通志》等书所载则为 160 余座 。1977 年，昭陵文物管理所对昭陵陪葬墓进行考古调查，称昭陵有陪葬墓 167 座，其中可确定墓主姓名、身份和入葬时间的有 57 座。后来昭陵博物馆与煤炭部航测遥感中心合作，运用航测和实地勘查相结合的方法，确定陪葬墓数为 188 座。《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一文记载的最新数字为 193 座，包括宫人墓。在这些陪葬墓中可以确定墓主的陪葬墓有 62 座。自北至南依次为 : 韦贵妃墓、燕妃墓、韦昭容墓、长乐公主墓、段简璧墓、城阳公主墓、新城公主墓、魏征墓、宇文士及墓、唐俭墓、唐嘉会墓、薛頔墓、遂安公主与驸马王大礼墓、杨恭仁墓、高士廉墓、马周墓、房玄龄墓、温彦博墓、李靖墓、裴艺墓、宇文崇嗣墓、彭城夫人墓、褚亮墓、孔颖达墓、杜君绰墓、崔敦礼墓、李思摩墓、李福墓、阿史那忠墓、豆卢宽墓、豆卢仁业墓、段志玄墓、张胤墓、李承乾墓、清河公主与附马程处亮墓、兰陵公主墓、李孟常墓、吴黑闼墓、房仁裕墓、程知节墓、姜遐墓、姜简墓、李震墓、斛斯政则墓、张阿难墓、李勣墓、尉迟敬德墓、王君愕墓、周护墓、李冲墓、李贞墓、薛收墓、契苾氏墓、张士贵墓、陆妃墓、执失善光墓、临川公主墓、郑仁泰墓、牛进达墓、许洛仁墓、安元寿墓和梁敏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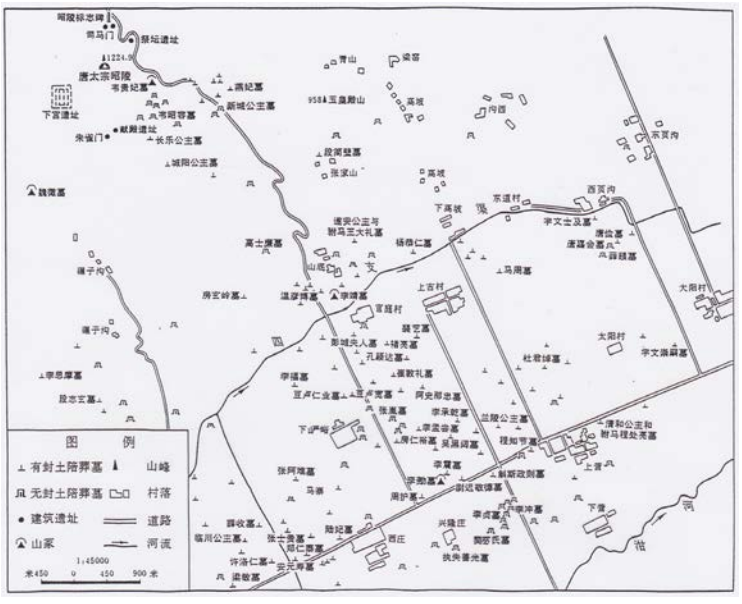


图 13　昭陵及陪葬墓分布图

从现存封土情况来看，昭陵陪葬墓有四种类型 : 第一类依山为墓。魏征墓和韦贵妃墓即是如此。第二类是覆斗形墓。如太宗第五女长乐公主墓和太宗第十六女城阳公主墓。墓前均存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墓的南北两面有土阙。第三类是圆锥形墓葬。此类陪葬墓所占比重很大，文武大臣墓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制。第四类是山形墓。此类陪葬墓的数量不多，目

前只发现李勣和李靖墓。据文献记载还有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也是山形墓。李靖墓象征阴山、积石山，现存形状略如起伏的山岭，中间有一主峰，两边各一缓丘。冢前立有石人、石羊、石虎、石碑。李勣墓象征阴山、铁山、乌德鞬山，同样在墓前有石人、石羊、石虎、石碑。这种特殊形状的墓葬封土，是对有特殊功勋重臣的特殊奖赏。无论哪种类型的陪葬墓，在墓前都树有墓碑，在墓中都埋有墓志。这些墓碑和墓志都是极为重要的资料，对于了解墓主人的生平事业，对于认识唐代前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重要的价值。昭陵陪葬墓数量众多，不能逐一列举。兹略举几座重要墓葬，以见其一斑。

（一）李勣墓

李勣（594 ~ 669），原名徐世勣，字懋功。汉族，曹州离狐（今山东菏泽东明县东南）人。唐高祖赐其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早年从李世民平定四方，后来成为唐王朝开疆拓土的主要战将之一，曾破东突厥、高句丽，功勋卓著。历事高祖、太宗、高宗三朝，出将入相，深得朝廷倚重，与名将李靖并称。封英国公，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总章二年（66）十二月初三卒，享年 76 岁。高宗辍朝七日，赠李勣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李勣墓位于礼泉县东北 18 公里之烟霞新村，墓前有石人、石羊、石虎等雕刻。墓冢由 3 个高约 6 丈的锥形土堆组成，上部形成倒“品”字形的 3 个山头，象征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以表彰生前破敌之功。墓前有石碑，高 5.6 米，碑首雕刻 6 条龙。碑文由唐高宗李治亲自撰书。武则天临朝称制时，其孙子李敬业起兵造反，因此坟墓被挖，棺材被劈。后唐中宗为其追复官爵，并重新安葬。1974 年文物部门配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发掘结果表明，此墓为斜坡土洞式墓



图 14　李勣墓碑和“山”形封土　（摄影：郑茂良）

葬，墓道长 63.75 米，有 4 个天井，4 个过洞，两个壁龛。墓室虽经盗掘破坏，仍出土了一些重要文物。如“大唐故司空太子太师赠太尉扬州大都督上柱国英国公李公墓志之铭”、鎏金铜鞘铜柄剑、三梁进德冠等。墓室周壁原绘画有大量精美壁画，惜多已残破，好在乐舞图仍较完整，是研究唐代乐舞的重要资料。

（二）尉迟恭墓

尉迟恭（585 ~ 658），字敬德，朔州平鲁人。原为刘武周部将，刘武周灭亡后投降李世民。唐郑决战时有单骑救主之功，得以重用，此后参与李世民历次战役，屡立战功。在玄武门之变中充当重要角色，亲手杀死齐王李元吉，又率兵威逼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官至唐右武侯大将军，封鄂国公，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显庆三年（658）去世，享年 74 岁。唐高宗为其废朝三日，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临吊，册赠司徒、并州都督，谥曰忠武。赐东园秘器。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由于他对唐太宗忠心耿耿，后来与秦琼被民间尊为“门神”。其墓在礼泉县东北 18 公里的烟霞新村，西北距昭陵 12 公里。墓前原有许敬宗所撰“大唐故司徒并州都督鄂国忠武公之碑”，1974 年移入昭陵博物馆。封土为圆丘形，高 8.8 米，底径 26.5 米。1971 年 10 月至 1972 年 1 月，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发掘。此墓由墓道、4 个过洞、4 个天井、4 个壁龛、前后两个通道和前后两个墓室组成，水平全长 56.3 米。甬道与墓室均由砖砌成。后室内有一正方形石棺床，床上堆满淤泥。泥土中夹杂零碎腐朽棺木，随葬品早已被盗劫一空。出土敬德夫妇墓志各一方，均很完整。另有陶俑残部数十块，以及铜带饰 1 件，玉佩 2 件，料珠 58 粒。

（三）张士贵墓

张士贵（586 ~ 657），本名忽峍，字武安，弘农卢氏（今河南卢氏县）人。史载其“善骑射，臂力过人”“弯弓百五十斤，左右射无空发”。隋末聚众揭竿起义，后归顺李渊，唐初屡立战功，历任右光禄大夫、右屯卫大将军、左领军大将军等职，封虢国公。唐显庆二年（657）病故，享年 71 岁，陪葬昭陵。墓位于醴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 300 米处。1972 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进行了发掘。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有 5 个天井、5 个过洞、两个小龛，全长约 57 米。墓室中原有壁画，惜全部剥落。由于经过多次盗扰，室内较为零乱。出土墓志一方。志盖厚 15.1 厘米，底边长 98.2 厘米，盖面篆书“大唐故辅国大将军荆州都督虢国公张公墓志

铭”。志石边长98.2厘米，厚15.1厘米，55行，满行57字。同墓还出土有其妻子虢国夫人岐氏墓志铭盖，志石已失。此外，还出土各种文物409件。随葬明器有瓷质、白陶质和红陶质三类，均彩绘或彩绘贴金。瓷质俑凡22件，均为男骑马乐俑，马披鬃长尾。瓷质坚硬，釉上涂彩，简捷明快。白陶俑共207件，胎质洁白坚硬，表面施以黄釉或白釉，男女的脸部涂有红、白粉。或加彩、贴金。女俑衣裳和马的鞍鞯描画得细，看上去很精美。红陶俑共95件，胎质均为细泥红陶。施釉，彩绘比釉陶简略。在这些陶器中，有两件白陶抬蹄舞马，造形优美，栩栩如生，系陶俑中的珍稀种类。



图15　张士贵墓出土的白陶舞马　（摄影：郑茂良）

（四）杨恭仁墓

杨恭仁，本名杨伦，后改名温，以字行。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人。隋文帝仁寿年间，任甘州刺史。隋炀帝大业初，转任吏部侍郎。曾率兵平定杨玄感之乱。隋亡后降唐，被李渊任命为门下省黄门侍郎，封为观国公。李世民即位后，改任雍州牧，加授左光禄大夫，并行扬州大都督府长史。贞观五年（631）迁洛州都督。贞观十三年（639）卒。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谭州都督，陪葬昭陵。《大唐故特进观国公墓志》载：“维贞观十三年龙集己亥十二月己巳日，特进、观国公薨於京城安定里第，春秋七十二。”其墓在礼泉县烟霞乡山底村东，西北距昭陵主峰约5公里。1979年7至9月，昭陵博物馆与厦门大学合作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出土“大唐故特进观国公杨公墓志”一合，同时出土文物110件。其中女立俑29件，男立俑42件，男骑马俑12件，文官俑4件，武士俑1件，镇墓兽1件，八菱铜镜1件，四耳瓷罐1件，长颈壶3件，陶磨1件，卧狗、卧羊各1件，还有儒俑1件，胡人俑头1件。墓室壁画大多损坏，

唯七侍女图保存较好。

（五）长乐公主墓

长乐公主，本名李丽质（620 ~ 643），唐太宗第五女，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其长相秀丽，性格开朗，为人仁爱，擅长书画，深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宠爱。贞观二年（628），封长乐郡公主，食封三千户。贞观七年（633），下嫁长孙无忌之子宗正少卿长孙冲。贞观十七年（643）八月十日，因气疾而死，享年 23 岁，陪葬昭陵。其墓位于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西北距昭陵陵山仅 1 公里。封土为方形覆斗式，墓园中有 4 个土阙，墓前还有石人、石虎、石羊、石柱等石刻。1986 年长乐公主墓被盗。同年八月，考古工作者对此墓进行了清理。发掘显示，该墓由墓道、4 个过洞、5 个天井、4 个壁龛、甬道及墓室六部分组成，总长 48.18 米。甬道中设有三道石门，这是其他墓葬所不能比拟的。墓中的随葬品虽然被盗，但仍清理出完整品 123 件，包括武士俑 4 件，男立俑 40 件，镇墓兽 2 件，立猪、立牛、立羊、立鸡各 1 件，卧狗 1 件，杯 3 件，豆 1 件，彩绘骑马男女陶俑 22 件，骆驼 3 件，等等。其中白瓷壁雍砚底径 31.5 厘米，高 9.4 厘米，是目前所见最大的唐代砚台。墓内各处都绘有壁画，但该墓曾经多次被盗，因而墓内损坏严重，壁画大多残缺，所出土的随葬物也仅有百余件。但所存壁画中绘有苍龙、白虎、骏马、仪卫、仕女等大量图案，其中《云中车马图》相当特别：在瑞气流云中，两匹骏马所驾的红色木车正在奔驰。车辕饰以龙头，轭顶饰以红缨，车后两侧各插一面 5 旒红旗，



图 16　长乐公主墓　　（摄影：郑茂良）

车厢中坐 3 人，神态安详，栩栩如生。车厢左下方有一摩羯，张嘴伸舌，鳍尾俱全，是唐墓壁画中难得的上乘之作。这幅壁画出土后曾引起轰动。此外，第二过洞口上的三间重楼建筑显示了唐代高超的绘画技巧，也为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建筑，提供了新的佐证。

（六）新城公主墓

新城公主（634 ~ 663），唐太宗第二十一女（最幼女），母文德皇后长孙氏。贞观十六年（642）封衡山公主。同年，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贞观十七年（643），婚事取消。贞观二十三年（649）二月六日下嫁长孙诠，因太宗于五月去世，婚礼中断。永徽三年（652）五月二十三日，改封新城郡长公主，完婚，增食封至五千户。显庆四年（659），长孙诠被流放嶲州，不久被杀，于是改嫁韦正矩。龙朔三年（663）三月，病逝于长安县通轨坊南园，时年方三十，有诏陪葬昭陵。其墓在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北的小山梁上，西距昭陵仅 1 公里。封土为覆斗形，南北长 40 米，东西宽 42 米。墓前原有碑一通，石柱、石羊、石虎、石人各两件，后移至昭陵博物馆。1994 年 10 月至次年 6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与昭陵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此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墓为长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坐北朝南，由墓道、5 个过洞、5 个天井、8 个壁龛、甬道和墓室组成，总长 50.8 米。墓室盗扰十分严重，石棺床被撬起翻乱，棺木及人骨散落各处。出土各类彩绘陶俑 293 件，包括立俑 181 件，骑马俑 63 件，武士俑两件，镇墓兽两件，动物俑 45 件，还出土陶靴 34 件，以及少量小件铜器、铁器、水晶、玉石等。所出“大唐故新城长公主墓志铭”对了解新城公主生平有一定帮助。墓中保存了大量精美壁画，墓道两边分别绘制青龙白虎及仪仗出行场景，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则用较宽的赭红色带绘出枋栏、斗拱、廊柱等建筑图案。特别是绘于墓道东壁的“担子图”（抬轿图）是研究唐代轿辇制度的重要资料。

（七）韦贵妃墓

韦贵妃（597 ~ 665），名珪，京兆杜陵人，北周太傅韦孝宽的曾孙女，太宗李世民之妃。武德七年（624），生临川公主（太宗第十二女）。贞观元年（627），被册立为贵妃。贞观二年（628），生纪王李慎（太宗第十子）。太宗死后，被高宗封纪国太妃，随儿子纪王李慎迁居藩地。唐高宗麟德二年（665），与燕太妃陪同高宗前往泰山封禅。九月二十八日卒于洛阳，享年 69 岁。次年十二月陪葬昭陵。其墓位于礼泉县烟霞镇陵光村北冶姑岭上，西北与昭陵陵山仅一沟之隔，

依山而成，是昭陵陪葬墓中距昭陵最近、规格最高的一座墓葬。墓前有石柱、石羊、石虎等石刻。1990 年 11 至 12 月，昭陵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墓道全长 49.38 米，由墓道、4 个过洞、4 个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墓室和四壁龛构成。墓内出土文物 100 余件，其中有贴金彩绘双头镇墓兽及彩绘贴金天王俑堪称珍品，为唐代陪葬墓所仅见。墓内壁画内容丰富，色彩鲜明，保存良好。有威武雄健的仪卫，肃穆直立的门吏，有神情各异的给使，有亭亭玉立的侍女，有生动传神的乐伎等。所出“大唐太宗文皇帝故贵妃纪国太妃之铭”对了解韦氏生平有一定价值。1991 年 11 月，韦贵妃墓正式对外开放。



图 17　韦贵妃墓　（摄影：郑茂良）

三、陵墓演变

唐代帝王对本朝陵寝十分重视。《册府元龟》卷二百六十一载：“上元三年（676），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并为斫昭陵柏木，高宗将杀之。太子抗疏善才等尝预蕃寮，先经驱策，期于矜贷，帝从之。善才仅免死除名，怀义配流桂州，昭陵令孔祯以不能简察免官。”其管理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昭陵下宫，是供奉墓主饮食起居的地方。起初建筑在陵墓旁边的山上，在山陵的西南脚下，与南面的南门大致在东西一条线上。后因供水困难，加之山火焚毁，就移于封内的西南方的瑶台寺，距陵 18 里，称“陵下宫”。据瑶台寺遗址出土的题刻残石看，晚唐时期与建陵同祭于此。下宫不但是皇帝谒陵、公卿巡陵必到之处，也是春秋祭、朔望祭、节日祭、日进食、朝夕祭之处。史载，开元十七年十一月

十六日，唐玄宗拜昭陵，“及上入寝宫，闻室中有謦咳之音。上又令寝门外设奠，同祭陪陵功臣将相萧瑀、房玄龄等数十人，如闻其扑蹈之声。”此外，陵寝若有损坏，也能予以修理。如贞元十四年正月，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曾在昭陵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写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在五代战乱的过程中，昭陵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被华原（今陕西耀县）贼帅温韬盗掘。《新五代史》卷四十《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宋太祖建隆二年（961），诏先代帝王陵寝，令所属州县遣近户守视，其陵墓有堕毁者也加修葺。

明朝统一全国后，对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但到明后期，昭陵又是一派残破景象。明人刘永在《谒昭陵》说：“玉寝荒凉无识处，石文断蚀不甚收。”明赵崡《游九嵕山记》说：“既至峰下，观历朝祭碑与翁仲或侧或仆，独六马皆一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明代所修《礼泉县志》载，昭陵“有献殿，有后殿，有下宫，山巅也有游殿，今俱废，惟陵北存石屋三间（楹），六骏列于左右，及贞观中擒服诸番君长颉利等十四人像，琢石列之北司马门内。今皆不完。其周垣、重门、甬路诸故迹犹存也。陪葬凡一百七十有七。下宫在九嵕山陵之右，后毁于火，贞元十四年欲复置，山高无水泉，苦于供役，廷臣集议，移置瑶台寺侧，去陵一十八里，周一百二十里，今废。”

好在清代前期，统治者曾多次派人至礼泉祭祀昭陵。康熙七年（1668）、二十一年（1681）、二十七年（1688）、三十五年（1697）、三十六年（1698）、四十一年（1702）、四十二年（1703）、五十二年（1713）、五十八年（1719），雍正元年（1723）、二年（1724），乾隆元年（1736）、二年（1737）、十四年（1749）、十七（1752）年皆有祭昭陵之举。当时的地方官也比较注意对唐陵的保护。

20 世纪前期，关中地区兵荒马乱。这一时期对昭陵最严重的破坏是昭陵六骏被盗事件。1914 年，美国的文物贩子勾结奸商，买通了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和陕西将军陆建章等，将昭

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盗走，运至美国费城。1917 年，美国文物贩子又怂恿盗窃其余四骏。为了掩人耳目，竟丧心病狂地把价值连城的四骏浮雕打成了小块，企图装箱运走。消息传来，民怨沸腾，西安民众奋力抗争，官方看到事态严重，出面将四骏追回，交给当时的陕西省立图书馆保存。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政府重视文化遗产，关中唐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1953 年，考古工作者对昭陵进行了普查。1961 年，国务院将昭陵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加强对关中唐陵的保护和研究。1972 年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1978 年，又成立了昭陵博物馆。昭陵博物馆收藏昭陵文物 4500 多件，其中包括 500 平方米的唐墓壁画和 40 余通唐代墓碑。此外，还对昭陵的尉迟恭墓、张士贵墓、郑仁泰墓、李福墓、李勣墓、李震墓、阿史那忠墓、临川公主墓、安元寿墓、李贞墓、李冲墓进行了发掘。为保护碑碣修建了“昭陵碑林”，使 40 余通墓碑和 20 多方墓志得到妥善安置。



图 18 “昭陵碑林” （摄影：郑茂良）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一）考古调查

考古学界对昭陵的调查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就曾对昭陵进行过考察。40年代，王子云率西北艺术考察团对昭陵进行勘踏。他在1942年踏查昭陵时，曾于荒草丛中见到两件已经失去头臂的石像残躯。并对昭陵六骏做了有益的探索，制作了昭陵四骏马浮雕翻制品各一件，拓片各两份。王子云说：

> 唐太宗死后这六块浮雕即列置于陵山北坡的陵垣北门内东西两庑以作为陪侍。其列置次序是，东庑：一、特勒骠，二、青骓，三、什伐赤；西庑：一、飒露紫，二、拳毛騧、三、白蹄乌。惋惜的是这批名贵的雕刻制作于1914年被反动军阀进行盗劫，先盗走六骏中形态最为优异的飒露紫、拳毛騧二骏（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年又来盗运其余四骏，在劫运中途幸被群众截获。[①]

20世纪70年代以后，也曾有许多专家学者对昭陵进行过考察。

2002至2003年度，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昭陵祭坛（即北司马门遗址）遗址进行了清理和发掘[②]。发掘面积总计5100多平方米。祭坛遗迹以两阙间的中线为轴东西对称，并以门庭为界，



图19　俯瞰昭陵北司马门祭坛　（摄影：郑茂良）

① 李炳武主编：《长安学丛书·王子云卷》，三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8页。

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2002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1期。

分门内外两部分。大门以北的遗迹有东西对称的双阙和双阙后的长条形房址，以及大门两侧的夯土围墙。大门以南的遗迹有门庭西南的条形房址、方形房址和南端的长廊状房址。出土的遗物有唐代建筑构件、石刻残块和明清祭祀碑。建筑构件包括长方形砖、方砖、筒瓦、板瓦、各种纹样与规格的瓦当、鸱尾、兽头脊头砖等。石刻则为十四蕃君长像座和昭陵六骏残块。

昭陵北司马门遗址是唐代帝陵陵园建筑遗址中首次发掘的一组完整建筑群。整组建筑以轴对称的形式依地势而建，由北向南逐渐升高，外圈有围墙环绕，严密紧凑。考古清理出的昭陵北司马门和北阙的基址，是一个祭祀性的建筑群体，由门阙、列戟廊、廊房、门址、围墙等构成。明清时期在昭陵修建的北门正是在唐废墟上筑的。所以现在的发掘，顺理成章地知晓了明、清两朝的昭陵北门建筑群的总体布局、结构和功能。

北司马门里的建筑主要是唐朝石刻长廊。由于西侧的地势比较高，这处的石刻屋顶建筑基址保存得相对完好一些；东侧由于比较低，除了清代围墙以内的遗址，基本上都破坏掉了。考古人员在北司马门里还发掘出了唐时水道，主渠外有副渠，最称奇的是它与一暗水道相连，道口用了五块石条上下左右撑起来，暗道中间还用 6 根铸铁竖成栅栏，既能排墙顶、门庭雨水，又能泄山洪，设计相当巧妙。

这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昭陵六骏的原始基座和十四国君长像残片。昭陵六骏都有基座，每个座都由三层组成，复原高度距现在地面足 1 米多。当时每匹马是分开的，因为原始基座的下层并没有移动，而它们之间是阶梯间隔的。原始基座位置的确定，说明六骏一直就在第五台阶。早在唐末五代时，六骏就有一些残损。新出土的“什伐赤”蹄腕部分和“青骓”右前腿的膝盖部分，一千多年了，一直埋在地下，膝窝部分的毛丝丝毕现。这对于后人感知昭陵六骏的原始风貌提供了珍贵的依据与见证。除“六骏”基座外，此次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像残块，其中躯体部分有 5 块，头部残块中有面部、发际部分和颈部共计 15 块。根据基座与石像的成功对接，确定了这些蕃酋的排列位置。如西侧蕃酋依次为吐蕃赞布、高昌王、焉耆王、于阗王、薛延陀可汗、吐谷浑可汗、龟兹王。通过发掘，还弄清了一个基本事实，十四国蕃郡长与六骏一块本来放在七间房内的。清代建祭祀大殿的时候，把唐时的屋子面积缩小了，这样十四国蕃郡长像就晾在外面了，仅把昭陵六骏用廊坊盖了起来。



图 20　昭陵 ZLS1 石室外景　（摄影：郑茂良）

此外，通过这次勘探，对九嵕山上的“九洞”有了更准确的认识。过去学者认为这些洞是千年前修筑陵园的匠人生前所住之地。现在经相关专家考察，推测小洞是宫人墓，编号为 ZLS1 的大洞则可能是长孙皇后的暂厝之处。长孙皇后临死，“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她于贞观十三年（639）病逝，可能临时埋葬于此。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李世民驾崩，长孙皇后与他一起重新合葬在了昭陵的地宫。此墓从此就荒了下来，形成一个空洞墓。另一个重大的新发现是昭陵东北角的又一丛葬窑。这个窑是用石头堆起来的，共两层，四孔窑洞，里面有铠甲马、陶人等。窑最深处 8 米，做工非常精细，石头打磨得有大头小头，大头七寸，小头五寸；结构极其严密，连缝隙的灰缝都撬不下来。

昭陵的寝宫，权德舆曾说：“寝宫便殿，永奉衣冠。”[①] 结合其他文献，可知“寝宫”具有“寝”和“庙”的双重功能。献殿又称“享殿”，是寝宫的主体建筑。文献中在涉及唐陵时，曾多次提到过献殿。如《昭陵志》载：“高力士于太宗献殿见小梳厢一，柞木梳一，黑角篦子一，草根刷子一。叹曰：‘此先帝（太宗）首创义旗，新王皇极，遂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②] 2005 年考古人员对昭陵寝宫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钻探，与此同时，还与德国美因兹博物馆合作，用测地雷达和磁力探测仪对遗址进行了探测，两种方法探测的结果基本吻合。经调查，寝宫的宫城呈长方形，外围有近 3 米厚的城墙，其东西宽达 238 米，南北长 301 米，宫城内距北墙 47 米处有一道城墙使北部形成一个夹城。夹城内只有一处面积很小的建筑遗迹，大部分建筑遗迹分布在南侧的宫城内。宫城内的建筑由南到北共有三组，

①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八四《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中华书局，1978 年，第 4944 页。

② （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四《帝王训俭》，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基本呈中轴对称的建筑格局，三组建筑两边都连接有长条状建筑基址。宫城内最北端的建筑形状近似不规则的“凸”字形，最南端的基本呈哑铃状，中间为东西向的长条建筑，其东西长 73 米、南北宽 15 米。在东廊的东边显示出一座用围墙围起的小院落，西边则是一座面积较大的长方形建筑。位于南北两组建筑中间的，则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建筑遗迹，其东西长 59 米，南北宽 38 米。它和南端的一组建筑以及两边的长条状建筑，共同围成了一个东西长 71 米、南北宽 44 米的大型长方形广场，广场上普遍存在较坚硬的踩踏面。从最新发现的昭陵寝宫遗址，可以推测出昭陵寝宫是由一系列宫殿组成的宏大建筑群，为研究唐代帝陵陵园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图 21　唐昭陵下宫遗址　　（摄影：郑茂良）

昭陵玄宫目前尚未发掘。史载温韬盗掘昭陵时“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这都可想象玄宫内部宏丽的情景。宋初开宝四年（971），宋太祖让地方官员对被盗掘过的前朝关中帝王陵进行修缮。经过千年的沉积，现在整座山到处灌木丛生，已找不到地宫洞口。虽然昭陵曾经被盗，但这并不意味着昭陵地宫里面再没有其他东西，像壁画、陶俑，包括一些金银器洒落或者遗失在墓都应是基本的遗存。

（二）研究成果

学术界对昭陵碑石关注较早。宋赵明诚《金石录》、陈思《宝刻丛编》，明赵函《石墨

镌华》、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清王昶《金石萃编》、孙星衍《寰宇房碑录》、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毕沅《关中金石记》、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存逸考》，以及武树善《陕西金石志》等书均有所著录。至于清代学者阮元的《大清防护唐昭陵碑》、孙三锡的《昭陵碑考》和近代学者罗振玉的《昭陵碑录》则是有关昭陵碑刻的专著。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昭陵陪葬墓进行了普查和勘探，并对若干陪葬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十方埋在墓道中的墓志。

由于昭陵在唐陵中占有重要地位，故研究昭陵的论著相当丰富：

马海航、郭瑞著：《唐太宗昭陵石刻瑰宝》，三秦出版社， 2007 年。

张志攀主编 ， 陈志谦、陈瑶撰稿：《昭陵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 2006 年。

胡元超著：《唐太宗与昭陵》，三秦出版社， 2005 年。

人文杂志丛刊编委会编辑：《唐太宗与昭陵》，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出版发行室，1985 年。

罗振玉辑录：《昭陵碑录》 三卷 ，晨风阁， 1908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

李昊阳主编、胡元超编著：《昭陵文史宝典 》，三秦出版社，2006 年。

胡元超：《昭陵墓志通释》，三秦出版社，2010 年。

李子春：《新拓唐昭陵宇文士及碑》，《考古》， 1960 年第 7 期。

云石：《昭陵陪葬墓调查记》，《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孙迟：《昭陵孔颖达碑座上的刻字》，《文物》，1979 年第 12 期。

张晓龙：《昭陵》，《人文杂志》，1980 年第 4 期。

阎振维：《昭陵——唐代文物遗存的一座宝库》，《人文杂志》，1980 年第 4 期。

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 年第 2 期。

陈志谦、张崇信：《唐昭陵段璧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 年第 6 期。

陈志谦：《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博》，1988 年第 3 期。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考古》，1989 年第 1 期。

宋德闻、 姚思汗等：《昭陵古墓葬遗址遥感解译和定位的研究》，《文物》，1992

年第 7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3 期。

葛承雍：《试破唐“昭陵六骏”来源之谜》，《寻根》，2000 年第 2 期。

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李勣（徐懋功）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 年第 3 期。

高春鸿：《昭陵唐墓壁画》，《文物世界》2002 年，第 1 期。

李浪涛：《“昭陵六骏”群雕赏析》，《文物世界》，2002 年第 4 期。

高春鸿：《唐昭陵韦贵妃墓壁画作者探讨》，《文物世界》，2003 年第 3 期。

权东计：《唐昭陵与长安城空间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1 期。

权东计：《唐昭陵地貌景观与遗址分布空间意象初探》，《经济地理》，2004 年第 4 期。

张建林、王小蒙等：《2002 年度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6 期。

伍伯常：《萃处京畿——从窦昭陵功臣家族迁居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08 年第 3 期。

王世平：《昭陵六骏被盗经过调查》，《四川文物》，2008 年第 5 期。

英卫峰、 霍雅琴：《试论唐昭陵陪葬墓区的“中轴线”》，《考古与文物》，2009 年第 3 期。

刘向阳：《昭陵石室与长孙皇后初殡地关联问题探讨》，《文博》，2012 年第 5 期。

徐志华：《昭陵博物馆藏唐代墓志纹饰研究》，《艺术百家》，2013 年第 4 期。

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

王玉清、苟若愚：《唐阿史那忠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 年第 2 期。

陈志谦：《唐李承乾墓发掘简报》，《文博》，1989 年第 3 期。

陈志谦：《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第 12 期。

言昭文：《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 年第 10 期。

呼延塘菱：《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5 期。

兰英姿：《唐代帝王陵墓建筑制度研究——昭陵北司马门复原探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 年。

五、遗迹与遗存

昭陵陵园的地面建筑大多荡然无存。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遗迹主要是陵园建筑遗址和数十座陪葬墓而已。

昭陵之玄宫是昭陵的主体建筑，在九嵕山主峰南侧的山腹之中。其入口在悬崖之上，具体位置目前尚未探测。

昭陵陵园唯南面的司马门和北面的司马门遗址较为清晰。南司马门遗址在玄宫南 800 米处。门外有双阙残迹，门内有献殿遗址。北司马门在玄宫北侧 600 米处，门内有祭坛和山门遗址。下宫位于玄宫西南 1150 米处，基址均较为明显。



图 22　唐昭陵南司马门遗址　（摄影：郑茂良）

南司马门内有建筑遗址，南有三门，内砖铺地面，残垣之上有壁画痕迹，遗址内曾出土高 130 厘米、底长 100 厘米、宽 65 厘米的鸱尾，重约 150 公斤。有学者据此推算，殿堂的高度当在 10 米左右，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建筑之规模。

下宫遗址略呈长方形，东西 237 米，南北 334 米，四周有墙垣残迹，南北垣墙中各辟一门，宫内有大量房屋基址。祭坛位于北司马门内，遗址也为长方形，南北长 86.5 米，东西宽 53.5 米。两处遗址的具体情况已在前边说明，兹不赘述。

昭陵遗物甚多，部分精品收葬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大部分收藏在昭陵博物馆中。在这些遗物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昭陵六骏”。

“六骏”即特勒骠、飒露紫、青骓、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是唐太宗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所乘过的六匹战马，贞观十年（636）十一月，营建昭陵时，用青石雕刻六骏的形象，安置在昭陵北司马门内东西两厢，后人习惯上称之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由阎立德、阎立本设计，太宗亲撰赞语，欧阳询书丹。总章二年（669），殷仲容将赞语分别题写于各马的石座上。在唐代，昭陵六骏已被神话，相传安史之乱发生后，昭陵六骏曾在潼关南原阻击叛军。

特勒骠是昭陵东庑浮雕中的第一匹骏马。这匹马系突厥特勒所赠，黄里透白，喙部微黑，很有灵性。武德二年（619）秦王李世民曾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宋金刚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乘唐军与薛仁杲作战之机率兵攻占山西大部地区，逼近黄河，威胁关中。在危难之际，李世民率军趋龙门，渡黄河，打退敌军前锋，在柏壁（今山西绛县西南）与宋金刚对垒。之后切断宋军粮道，趁宋军撤退之机穷追猛打，鏖战一昼夜，宋军大乱，溃不成军。唐军收复太原，大获全胜。军中作《秦王破阵乐》相庆。在这场战役中，特勒骠表现出众，深受李世民的赞赏。后来唐太宗为特勒骠石刻题写赞语：“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高度评价了特勒骠的功绩。



图 23　特勒骠　　（摄影：郑茂良）

飒露紫在昭陵西庑浮雕诸马中位于第一。武德四年（621），李世民率军进攻洛阳，与王世充主力在邙山相遇。李世民为试探敌情，乘飒露紫率精骑数十冲入敌阵，在激烈拼杀的过

程中，坐骑飒露紫被敌箭射中，情况万分危急。幸好丘行恭赶到，砍杀敌军主将，把自己的战马让给李世民，一手牵着受伤的飒露紫，一手持刀与李世民“巨跃大呼”，连斩数敌，突围而出。营建昭陵时，李世民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丘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下。” 并题赞语：“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袭三川，威凌八阵。”现存飒露紫浮雕正如史书所载，作丘行恭拔箭之状，马头偎人，似在忍受巨大的痛苦。此马体形高大，可能是出自西域的名马。



图 24　青骓　（摄影：郑茂良）

青骓在昭陵东庑中位于第二，是李世民在虎牢关与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据宋人游师雄说，此马“苍白杂色，前中五箭”。武德四年（621），唐军围困洛阳，王世充感到力不能支，遂向河北的窦建德求救。窦建德认为唐军在消灭了王世充之后，必然会进攻河北，所以发十万大军救郑。五月，李世民和窦建德双方在虎牢关前展开决战。李世民采取了后发制人的战术，首先坚壁高垒，挫了夏军的锐气，后展开大规模反攻。反攻一开始，青骓长嘶一声，冲入敌阵，风驰电掣，锐不可当。唐军以一当十，喊声震天。夏军仓促应战，阵营大乱，全线溃退。结果窦建德被擒。王世充见状，只好出城投降。李世民乘胜出击，夺取河北。通过这场战役，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后来，唐太宗给青骓浮雕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石刻青骓作疾驰飞奔之状，表现冲锋陷阵的威武神态。马身五处中箭，均系冲锋时被前面的敌军射中。既是迎面射击，而箭多在马的后部，说明此马速度极快。身中五箭仍冲锋不止，足见此马异常神勇。

拳毛騧为昭陵西庑的第二匹。这是代州都督许洛仁送给李世民的一匹黑嘴黄马。李世民曾乘此马与刘黑闼作战。刘黑闼是继窦建德之后出现的河北农民起义军领袖。他在武德四年七月起兵反唐，半年之间，攻占河北大部地区。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再次东征，与刘黑闼战于今漳水一带。双方相持两个多月，战斗十分残酷，唐将罗士信等死于沙场。刘军前锋

过河，即向唐军发起猛攻。李世民乘拳毛騧进行狙击，等刘军半渡，从上游决堤放水，使刘军大败。在这场战役中，拳毛騧身中六箭，可见战斗是何等的激烈。通过这场战役，唐军又收复了河北。唐太宗给此马所写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图 25　什伐赤　　（摄影：郑茂良）

什伐赤在昭陵东庑诸马中位于第三，是李世民在与王世充和窦建德作战时乘坐的又一匹名马。此马为纯红色，像一团烈火。洛阳之役极为残酷。在飒露紫和青骓相继战死之后，李世民改乘什伐赤。石刻什伐赤作凌空飞奔状，身中五箭，四支在臀部，系从前方射来，一支在背，系从后方射来。显然，此马在冲锋陷阵时也受了重伤。

白蹄乌在昭陵西庑诸马中位于第三。这是一匹四蹄发白的黑色战马。李世民曾骑此马与薛举父子进行过激烈的角逐。唐朝建立之初，盘踞在金城（今兰州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大举东进，企图颠覆唐王朝。为了巩固关中，解除后患，唐高祖令李世民率军反击。双方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县境）展开激烈的争夺，起初唐军节节失利。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改变战术，据险设营，坚守不战。两个月以后，敌军粮草用尽，进退两难。李世民以少量兵力诱敌深入，然后亲率劲旅，直捣敌后，使敌军阵脚大乱，慌忙向西北方逃去。为彻底消灭敌人，李世民摧动白蹄乌，乘胜追击，迫使薛仁杲投降。石刻白蹄乌鞍鞯俱全，昂首怒目，鬃鬣迎风，四蹄腾空，神采飞扬。



图 26　白蹄乌　　（摄影：郑茂良）

北宋时，陕西转运判官游师雄对昭陵六骏十分推崇，鉴于六骏位于九嵕山上，“自山下

往返四十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的情况，特在昭陵旁边的太宗庙中彩塑昭陵六骏，并树立了“昭陵六骏碑”。现今这组石刻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陈列，其余四骏收藏于碑林博物馆。

六骏在雕刻上采用了浮雕的艺术手法，这在唐陵石刻中是一种创造。浮雕每方高约1.71米，宽2.04米左右，厚0.3米，四周有边。马身雕刻精美，神态各异。马头上侧有一尺见方的空白地带，据说是当年题刻赞语的地方。现在文字磨灭，已不可见。石座上殷仲容刻写的题词也已模糊不清。从这些石刻来看，它以太宗当年所乘的六匹骏马为原型，准确、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六骏的状况，不仅形似，而且也很有神韵。战马的鞍鞯装饰也清晰可辨。通过这些战马，人们不难想见1300多年前的战阵场面，也不难看出当时战马的装备情况。很显然，这些战马是当时历史的见证，同时也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明代诗人王云凤说：“秦王铁骑取天下，六骏功高画也优。”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唐太宗在位期间，比较注意处理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古帝王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抛弃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按照“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原则解决民族问题，受到少数民族的信赖和爱戴，被推为“天可汗”。当时少数民族纷纷表示归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故唐高宗在昭陵设置了蕃像以彰显太宗功绩。

当时雕刻的蕃像共有十四个，人称“十四国君长像”。他们是：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新罗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麴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从宋人游师雄《昭陵图》和元人李好文《昭陵图说》来看，宋元间十四国君长像保存完好。其后逐渐被毁，现在已看不到一个完整的蕃酋像了。

六、保护管理

1961年，国务院公布昭陵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成立“昭陵文物管理所”，1978年建成昭陵博物馆并对外正式开放。馆藏文物8000余件，其中等级文物4000余件。现

有昭陵文物精品展陈列室，唐墓壁画陈列室，碑石陈列室（昭陵碑林），共集中展示昭陵陵园近 40 座陪葬墓出土的精品文物 400 余件（组）。



图 27　昭陵博物馆内景　　（摄影：郑茂良）

昭陵文物精华展厅里，陈列着昭陵祭坛遗址和部分陪葬墓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既有瓷和红陶，也有昭陵独有的彩绘釉陶和绚丽多彩的唐三彩。张士贵墓出土的贴金彩绘文武官俑被定为国宝级文物。唐墓壁画陈列室展出诸多陪葬墓出土的大量壁画，有婀娜多姿的侍女、翩翩起舞的乐伎、神态各异的给使，还有贵夫人乘牛车出行的场面。这些都是唐代政治、外交、文化和军事活动的视觉再现。

昭陵碑林始建于 1974 年，共收集昭陵六骏碑、唐太宗像碑、昭陵图碑等 60 余通，出土墓志 40 余合，60 余通碑石中有 22 通 1979 年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书法艺术名碑，为国家一级文物。40 余合墓志，有 26 合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1991 年建成长乐公主墓文管所和韦贵妃墓文管所并正式对外开放。

2000 年，投资 750 万元，修建从昭陵博物馆起，途经长乐公主墓文管所、韦贵妃墓文管所至昭陵主峰的 14.8 公里的旅游专线，使整个景区有四个文物景点，年接待中外游客 30 多万人次。是陕西省境内重点和热点景区之一。

第三节　唐高宗、武则天乾陵

一、墓主生平

李治（628 ~ 683），太宗第九子，母长孙皇后。贞观二年（628）生于东宫之丽正殿，五年（631）封晋王，十七年（643）册封为皇太子，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驾崩后即位，成为唐朝历史上的第三代皇帝，时年 22 岁。高宗即位之初，能够效法太宗行事，“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永徽四年（653）将武则天接入宫中，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又力排众议，立武则天为皇后。显庆四年（659），高宗患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即令武则天参与朝政。咸亨五年（674），高宗自称“天皇”，让武则天称“天后”，时人称之为“二圣”。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崩于洛阳贞观殿，终年 56 岁。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悉听天后处分”。高宗临死时，曾对侍臣讲：“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



图 28　乾陵　（编写组供稿）

命，得还长安，死也无恨”，宛然有西归之意。因此决定在今乾县西北依梁山为高宗修建陵寝。文明元年（684），武则天欲亲护高宗灵柩西返，群臣谏阻，乃命睿宗护柩，葬高宗于乾陵。

武则天（624 ~ 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唐朝功臣武士彟次女。武德七年（624）生于长安，14 岁被唐太宗诏入宫中，封为才人。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病逝，武则天到感业寺出家为尼。唐高宗时再度入宫，先为昭仪，后当皇后。高宗死后废中宗，另立睿宗，独揽朝纲。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 15 年，能够用人纳谏，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当时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国力强大。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终年 82 岁。临终时留下遗制，要求去帝号、归葬乾陵[①]。对此，给事中严善思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建议于乾陵之旁，另择吉地，“别起一陵”[②]。由于武三思等人通过上官婉儿及韦后反对严善思的意见，唐中宗才决定停止讨论，下诏“准遗制以葬之”[③]。神龙二年（706），唐中宗“护则天灵驾还京”[④]，将武则天葬入乾陵地宫。

二、营建始末

乾陵是陕西唐十八陵最西边一个，位于今乾县县城西北梁山主峰之上，梁山距长安 80 公里，位于长安西北的“乾”地，九嵕处其东，武水环其西，北连丘陵，南接平壤，孤峰特起，挺拔俊秀，是修建陵墓的好地方。乾陵因梁山主峰而筑，封域范围 80 里，气势极为宏伟，被称为“关中唐陵之冠”。

乾陵的营建工作是从唐高宗去世后开始的，武则天决定遵照唐高宗的遗愿，把他葬在关中。但是，这一决定遭到一些士人的反对。陈子昂谒阙上表，认为关中地狭，又遭荒馑，“流人未返，田野尚芜”，不能供给千乘万骑的食宿，也不堪凿山采石的劳役；而东都富庶，地灵人杰，是设置陵寝的最佳之地[⑤]。武则天召见了陈子昂，虽授以“麟台正字”之职，但没有接受他的

①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第 53 页。

②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严善思传》，第 1303 页。

③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第 397 页。

④ 《旧唐书》卷七《中宗纪》，第 57 页。

⑤ （清）董诰编：《全唐文》卷二一二《谏灵驾入京书》。

建议[①]。她坚持遵奉高宗遗愿，在关中营陵。任命吏部尚书韦待价摄司空，为山陵使，发兵民十余万开始破土动工，营建乾陵。



图 29　乾陵“述圣纪”碑　（摄影：郑茂良）

乾陵的主体工程由地下宫殿和地面建筑组成。地下宫殿以墓室为主；地上建筑包括城阙、献殿、寝殿、游殿等设施。由于当时大唐物力雄厚，人员充足，加之设计合理，组织得法，兵民昼夜辛劳，经过半年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巨大的陵园工程。

文明元年（684）八月十一日，乾陵修成以后，武则天又命侍中刘齐贤和霍王元轨知山陵葬事，为唐高宗举行隆重的葬礼将高宗葬于乾陵[②]。为了确保地宫的安全，在埏道口外塞满石条，“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③]。武则天在乾陵南门外为唐高宗立“述圣纪碑”，把永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全部归于高宗。碑刻成后，复嵌金悄，碑文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使宏伟的陵园显得十分壮观。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逝于上阳宫之仙居殿。朝中经过激烈的争论，唐中宗最后决定“准遗制以葬之”[④]。神龙二年（706）唐中宗“护则天灵驾还京”。直到武则天的葬礼结束，乾陵的营建工程才宣告完成。

三、陵园结构

乾陵是唐王朝在关中地区修建的第三座帝王陵墓，采用了因山为陵的形式。其陵园基本呈方形，经 2006 年和 2011 年两次考古勘探，陵园布局较以前的认知更为清楚。陵园以梁山主

①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陈子昂传》，第 1281 ~ 1282 页。

②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第 112 页。

③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第 396 页。

④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第 397 页。

峰为中心，坐北朝南，两重城郭环绕山峰四周，第一重城郭是地宫和寝殿的所在地，相当于皇帝居住的宫城。第二重城郭相当于国家机关所在的皇城。皇城之外，封域之内的大片地方为陪葬墓区，相当于外郭城或百姓居住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自然的破坏和人为的破坏，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存在，但建筑遗迹仍依稀可辨。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乾陵的建筑布局是以神道为南北中轴线来安排的，地面建筑主要有城阙、陵山、寝宫、游殿、下宫和陵署等。相对而言，乾陵是关中十八陵中保护较好的一座，其规模之大、文物之多、景色之美，都是罕见的。

（一）地面建筑

1. 城垣阙台

乾陵四周均有围墙，墙基宽约3米，往上层层收分，至顶部宽度约为2米左右，墙高5～8米。但由于这些墙垣都是用夯土筑成的，经过一千多年的风吹雨打和人为的破坏，到现在绝大部分都已夷平，只有少数墙垣若断若续，尚能体现昔日的盛况。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的墙垣进行过探测，得到了一些比较可靠和数据。内郭南墙东起沈家池村之北，向西经石马道村、黄巢沟至上坡岭，全长1450米。北墙由东华门村北842米处起，向西经后宰门村，到村西708米处止，全长1450米。东墙南起沈家池，向北经东华门村西，到村北842米处止，全长1582米。西墙由西华门村北842米处起，向南经西华门村、下沟上坡而止，全长1438米。南墙经过黄巢沟，西墙经过何家沟低时，均有用石条修成的排水洞。东南城角高7.5米，东北城角高5.1米，西北城角高5.5米，西南城角高10米，均为夯土筑成，周围残存唐代瓦当、瓦片、砖块、石渣，特别是西北城角和东北城角，均有石条砌筑的地基存在[①]。从现存城垣遗迹来看，乾陵墙垣的建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用石条砌筑墙基，上面再以土夯筑墙。墙顶铺有板瓦，做成双坡，以利排水。墙身则涂为白色或淡红色。二是下挖土壕，打造墙基，直接在墙基上夯筑城垣，仅在四角及四门有阙处用石条作基。

乾陵城垣四面中部各开一门，由于是因山为陵，因而四门只是大体对称。四门外各有三出阙对，阙台上建有土木结构的楼阁。此外，城墙四角均筑有角阙，上建楼阁，有如城墙四角的角楼。乾陵内城四门则清晰可辨。南神门在神道北端，门外25米处有高约10米左右的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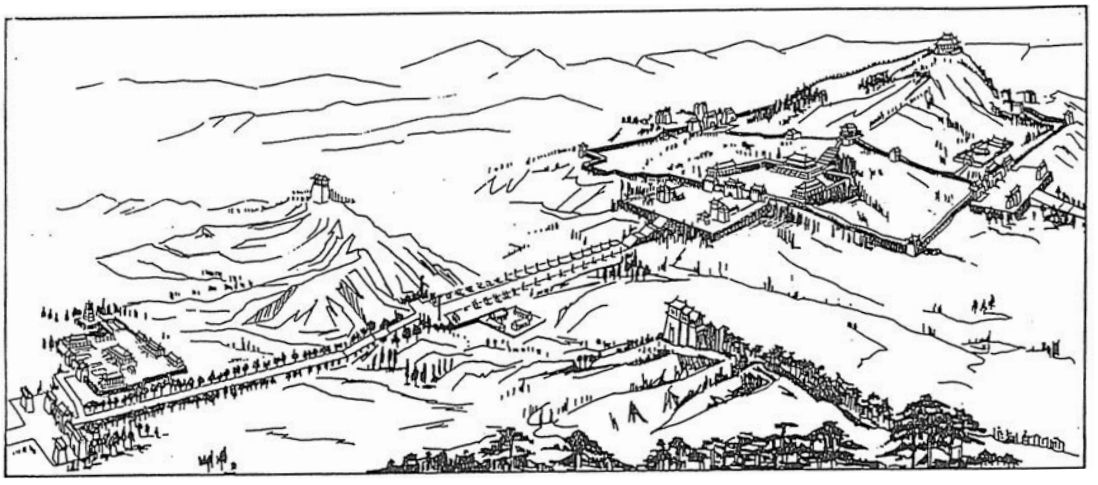


图 30　乾陵古建筑复原示意图

阙台两个，阙间距为 41.5 米。北神门在梁山北麓，门前 28 米处有高约 5 米的阙台两个，阙间距为 40 米。东神门在梁山东麓，门外 38 米处有阙台两个，北边的高 6.5 米，南边的高 5 米。西神门在梁山西麓，门外 31 米处也有阙台两个。

鹊台位于乾陵乡张家堡村，有东西二阙，二阙址东西间距 100 米，阙址基部置石条。乳台在梁山主峰以南的东西对峙二山峰之上，东阙址高 19.3 米，底部东西 18 米、南北 8.5 米；西阙址高 8 米，底部东西 9.5 米、南北 3 米。

2006 年对陵园北神门遗址进行发掘，其门址为夯土台基，外周有包砖和砖铺散水。散水宽 0.75 ～ 0.8 米。中间斜坡漫道宽 8.5 米，长 3.5 米，南高北低。北门外清理出石马两件，还



图 31　乾陵北神门出土的石虎（摄影：郑茂良）

发现石虎一尊[①]。

2. 陵山

乾陵借助梁山的自然山峰为冢，不存在修建墓冢的问题，但为使乾陵更有气势，当时也曾对梁山的顶端进行过若干修饰。乾陵陵山在陵园中的位置，大体是东西居中而偏北。这与在陵山前修建寝殿的制度有关，文献记载乾陵内城中有献殿、寝殿等建筑。这一点也已为考古工作者所证实。献殿等建筑群落即位于陵山之南，则陵山所处的位置自然要偏北一些。此外，陵山东西居中而偏北，也符合当时“坐北朝南”的“尊君”思想。

3. 寝宫

寝宫位于南门内正对山陵之处。唐人权德舆曾说：“寝宫便殿，永奉衣冠”[②]。结合其他文献，可知“寝宫”具有“寝”和“庙”的双重功能。史书在记载唐代皇帝“亲谒陵”时，都提到“寝宫”。从这些记载来看，寝宫在陵园中所处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寝宫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唐陵中只有献殿，没有寝殿；有些人认为有献殿和寝殿而无寝宫；有些人则认为献殿就是寝宫。事实上，寝宫是一个较为庞大的建筑群，包括献殿、寝殿等建筑在内，规模宏大，门外列戟数十杆，显得十分庄严。

献殿又称享殿，是寝宫的主体建筑。文献中在涉及乾陵时，曾提到过献殿。元李好文《长安志图》所载“唐乾陵图”中就在南门内绘有献殿。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在乾陵发现了献殿的遗址。乾陵献殿位于南门内，为长方形建筑。献殿与南神门之间的东西两边还有东西阁遗址。献殿是依照朝堂建筑的，象征皇帝生前处理朝政之地，规模宏大，蔚为壮观。从《宣室志》卷三所载张诜的经历来看，献殿内的陈设一如朝堂之制。因为大臣的拜陵和祭祀活动均在此殿举行，故有献殿之名。又因此殿类似帝王生前处理朝政的大殿，所以也有人称之为衙殿。

寝殿在献殿之北，是寝宫中最重要的建筑。象征帝王生前居住的大殿，里边彩塑死者的真容或树立死者神主，安放死者的各种遗物，供养如平生之仪。凡帝王拜陵，在献殿行礼之后，都要到寝殿来献食，并瞻仰遗物。《大唐开元礼》卷四五《吉礼·皇帝拜五陵》详细记载了

①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2006 ~ 2010 年），三秦出版社，2012 年。

② 《全唐文》卷四八四《代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第 2192 页。

当时皇帝拜陵的仪程。其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寝殿及其他建筑。这些记载至少可以说明寝殿有东西二廊；殿中有神位，陈设一如帝王生前所居，床帐、冠冕、衣服等应有尽有。

4. 下宫

下宫为守陵宫人所居，以供奉帝王日常饮食起居。从宋敏求《长安志》等书的记载来看，唐陵下宫多在陵园的西南部。据考古发掘，乾陵下宫遗址位于鹊台与乳台之间中轴线的西侧，周围地势开阔，坡度平缓。总体平面近似方形，周围是夯土筑城的宫城外墙，南北379.7 ~ 380米，东西 382 ~ 383 米。下宫宫城南门位于南墙中部偏东，门宽 12.5 米。宫城之中又有内城，内城平面总体呈长方形，南墙残长 190 米、西墙长 293.5 米、北墙长 206 米、东墙残长 249.5 米，内城范围内共发现各遗迹 60 处，其中夯土遗迹 44 处，踩踏面遗迹 6 处。下宫内外城之间也有大量建筑遗迹分布[①]。从现存遗址来看，乾陵下宫是一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

5. 其他

除上述建筑外，乾陵中还有一些设置。比如神游殿、陵署等等。乾陵神游殿在梁山之巅，仿神宫建筑，供死者魂游。陵署是管理陵园的机构，在关中十八陵中普遍存在。唐玄宗天宝十三载二月下令：“献、昭、乾、定、桥五署，改为台令，各升一阶。自后诸陵，例皆称台[②]。”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乾陵陵署在陵南六里，过去当地人称之为“看墓司”。

（二）地下宫殿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时至今日，人们对乾陵地宫的具体情况仍然知之甚少，我们可以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披露的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1. 墓门与羡道

羡道也叫埏道，就是通常所说的墓道。唐代盛行斜坡墓道，帝王陵墓也不例外。在堆土成陵时，一般是从土冢之南百余米处下斜凿隧，直通墓室。因山为陵时，则是从山峰南腰斜凿而下，直入山腹。

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工作者曾对乾陵墓道进行过探测。乾陵墓道开凿在南部山腰的青石山脊上，有隧道通往北端的墓门。隧道呈斜坡形，正南北向，全长约 65 米，东西宽 3.87 米，

①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2006 ~ 2010 年），三秦出版社，2012 年。

②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

墓门外隧道北端宽 2.75 米，深度只勘查出 2.75 米，由于道内全为铁细腰拴板石条所堵塞，无法继续勘查。墓门及隧道内全用石条迭砌，并用铁细腰嵌住，再用铁浆灌注在石条与铁细腰之间。其上部全为夯土，也相当坚硬。夯土每层厚 16 ~ 23 厘米，石条最长 1.25 米，铁细腰长 18 ~ 27 厘米、厚 5 ~ 8 厘米，重 10 ~ 20 斤。隧道内石条上凿有嵌铁细腰的凹槽，有的槽内填满石灰代替细腰，有的凹槽内既不填石灰也不嵌细腰，有的石条上有数个凹槽。石条由南而北顺坡一层一层筑上，夯土也顺山坡一层层打上去。有的石条上刻“莱常口”三字。隧道的中腰南部两边石墙上残存石灰及壁画痕迹，道内夯土中夹杂着小砖瓦块、石灰块、小石片，部分地方是一层土一层小石渣。隧道由南到北至墓道口，石条的迭砌可以看出约 24 层，那么这个隧道就要大约迭砌 2500 多块石条[①]。

考古工作者在乾陵羡道口外的石墙上发现了石灰和壁画的痕迹。这说明乾陵羡道经过粉刷，且绘有精美的壁画。此外，羡道内口与墓室之间，很可能有较长的过洞，过洞中有石门。五代时期的军阀温韬在盗掘昭陵时发现，昭陵的石门达五重之多。至于羡道的外口，则以石条封之。可以说，羡道是乾陵地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玄宫

经过羡道，即可进入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唐代常常以墓室多寡区分墓主人地位的高下，一般官吏为单室墓，重要的文武大臣和宗室皇戚为二室墓，因而，皇帝陵墓当为三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五代十国时的帝王陵墓中找到旁证：目前已发掘的前蜀王建永陵和南唐二陵都是三室墓。但是，乾陵是否三室？现在还不能肯定。从《五代史》所载温韬进入昭陵地宫时所见到的情况及《大唐元陵仪注》所反映的情况分析，乾陵也可能是巨大的单室墓。不过，即使是大型单室墓，也可能象征性地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关于乾陵墓室的形状，从唐人的宇宙观念和已发掘的王公大臣、皇亲国戚及六朝五代帝王陵墓分析，当是上圆下方，顶部为穹隆式，底部呈四方形的。至于墓室的大小，虽然目前尚无具体材料可资说明，但应该比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及南唐二陵的墓室都要大得多。《长安志》载，乾陵封域为 80 里。地面气派如此宏大，地下规模绝不可能低矮窄小。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查记》，《文物》，1960 年第 4 期。

3. 地宫中的陈设

乾陵地宫里有什么陪葬品？《大唐元陵仪注》等资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乾陵地宫的信息：在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所谓棺床。棺床上分别停放着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珪、璋、璧、琥、璜等“六玉”。唐高宗、武则天穿一百二十套大敛之衣，口含贝玉，仰卧于褥上，面对棺盖。棺盖内侧镶有黄帛，帛上画着日月星辰及龙鱼等物。地宫的后室或后部设有石床，石床及其周围放置着衣冠、剑佩、千味食及死者生前的玩好之物。前室或前部则设有宝帐。账内设有神座。神座之西，放着玉制的“宝绶”“谥册”和“哀册”。神座之东，放着一些玉币。周围置有“白佩”“素幡”“明器”等等。除此外，乾陵地宫中还藏有许多书画古籍。在众多的殉葬品中，数量最大的要数明器，推测乾陵地宫中有数以千计的陶质、瓷质、木质明器。此外，金银珠宝也是重要的殉葬品。尽管唐代帝王临终时都说“陵园制度，务从节俭”[①] “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但他们的子孙的所作所为正好与此相反。后来唐僖宗曾自供说：“累朝遗训，毕及山陵，以汉文薄葬之词，为烈圣循常之命。约锦绣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而并违先旨。”[②] 因此，乾陵地宫中也可能存放着金玉宝器。

（三）陪葬墓

乾陵陪葬墓位于陵园东南方向。《唐会要》载乾陵有 16 座陪葬墓，《长安志》载 6 座，《文献通考》《关中陵墓志》俱载 17 座，《乾州志稿》则称有 41 座。据《唐会要》卷二十一载，陪葬乾陵者有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泽王李上金、许王李素节、义阳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安兴公主、特进王及善、中书令薛元超、特进刘审礼、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右仆射刘仁轨、左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卫将军高侃等 16 座。另据《文献通考》和《关中陵墓志》等记载，陪葬乾陵者还有左仆射杨再思。这就是说，乾陵陪葬墓至少有 17 座。

乾陵陪葬墓的封土形式有两种类型：第一类为覆斗形墓，共有 5 座，其中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为二层台覆斗形，封土规模较大，且有陵园，陵园南面还建有土阙，土阙之南排列有石狮、石人、石柱等。章怀太子墓也为覆斗形，但没有二层台，墓前的石刻是石羊。第二

① 《唐大诏令集》卷十二《遗诏上》，第 60 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十二《遗诏下》，第 66 页。

类为圆形封土，规模较小，无陵园和石刻。已发掘的陪葬墓有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李瑾行墓和薛元超墓。墓葬形制均为带斜坡墓道多天井、多过洞带小龛的砖砌双室或单室墓。

在乾陵陪葬墓中，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是最有名的。

1. 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李仙蕙（684 ~ 701），字秾辉，中宗第七女，在韦皇后所生之女中排行第三。初封永泰郡主。以郡主身份下嫁武承嗣长子武延基。因与其兄李重润和武延基私议武则天男宠，受到惩罚。墓志铭称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身怀有孕的李仙蕙因难产而死，但《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记载永泰郡主坐罪被杀。中宗复位后追赠为永泰公主，以礼改葬，号墓为陵。



图 32　永泰公主墓　　（摄影：郑茂良）

永泰公主墓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最大、最典型的一座唐代女性墓葬。1960 年到 1962 年发掘，经过修复和整理，1965 年正式对外开放，乾陵博物馆即建其上。墓葬由神道、外部石刻、围墙、角楼、阙楼等地面建筑和地下建筑组成。覆斗型封土高 14 米，56 米见方，夯筑方式为平夯。封土四周围绕有高大的围墙，南北长 275 米，东西宽 220 米，总面积达 60500 平方米。围墙四

角建有高大的角楼，南门外建立一对高约 20 米的单出阙楼。阙楼以南是一条宽约百米的神道。两侧分别放置石狮一对、武士四尊、石柱一对等大型石刻。

依据发掘清理后的实地测量，永泰公主墓道全长 87.5 米，宽 3.9 米，深 16.7 米，设计为长斜坡形向下延伸，与地平面呈 28° 夹角。土洞、双室砖墓结构，有前后甬道和宽敞的前后墓室，8 个便房，6 个天井，5 个过洞，一套高级石椁葬具，一道坚固的石门，四个具有礼仪性质的石幔座，一合墓志，从墓道开始到后墓室，按照不同部位的功能和性质，绘制有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的壁画。虽然此墓早年已被盗掘，但出土的各种类型文物仍达 1000 多件[①]。

进入永泰公主墓，仿佛置身于一个富丽堂皇的地下艺术宫殿。墓道两旁精美的壁画，使整个地下宫殿盎然生辉。代表吉祥如意的左青龙、右白虎腾飞于流云之中。下面紧随一组威武的仪仗队伍，东西两壁绘制一边均为 36 人的步行仪仗队伍，一边分为六组，每组前一人率先，后五人为一队。另外，还有高大雄伟的阙楼图，等级森严高级别的 12 杆列戟图。进入过洞，过洞上绘有代表吉祥富贵的宝相花、象征多子多孙的海石榴花等吉祥花卉。不过，这些壁画大部分都是后来临摹上去的，原迹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库中。

过洞两侧的便房，是用来放置大量陪葬品的，有琳琅满目的唐三彩及陶制品，有武卫文侍、歌舞乐工、马牛羊猪、粮仓井架、碗盘瓶罐等。尤其是第二天井，东西两侧便房众多的女骑马俑，充分反映了唐代社会开放的格局。

位于第五过洞下面，有一合长宽各为 117 厘米、由上为志盖下为志底组成的墓志铭。绕过墓志铭进入前甬道不远，在东壁上侧有一个盗洞，当时盗洞下有一副死人的骨骼，头骨在地下，骨骼旁有一把铁斧，并撒落了一些金银珠宝，由此可以断定，这是盗墓同伙之间互相残杀所致，盗墓的时间大约在唐末或五代十国时期。走过狭长的前甬道，便是前墓室，墓室上圆像天，绘有天体图，东面的山峦、金乌与西边的月亮、玉兔遥遥相对，也绘有白色的星星点点，象征着繁星满天。下方法地，绘有唐代建筑图案，体现了天圆地方之说。前墓室东壁南侧的 9 人“宫女图”最为著名，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叶浅予带着他的学生到此墓写生时，细心品味，感慨万千，作诗一首：“公主长眠宫女在，壁上着意塑粉黛。口角眉尖似有情，是喜是忧费疑猜。”可以说是对这幅壁画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 年第 1 期。

经过最后一道坚固的石门和后甬道，进入后墓室，后墓室同前墓室的结构相同。西侧安置石椁，石椁依照房屋建造，是一个完整的唐代房屋建筑式样的模型，由 34 块石料拼装而成，上面有刚劲凝练的线刻画。题材大多是宫女的生活风貌以及花枝缠绕、蔓草依依、鸟兽图纹等等。

2. 章怀太子墓

章怀太子李贤（654 ~ 684），字明允，陇西狄道人。唐太宗之孙，高宗李治第六子，武则天次子。永徽五年（654）出生，不久封王。自幼得到良好教育，长大后容貌俊秀，举止端庄，才思敏捷，深得高宗喜爱。上元二年（675）立为太子，曾多次监国，得到朝野内外称赞。又曾召集文官注释《后汉书》，史称“章怀注”，具有较高史学价值。调露二年（680），以谋逆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文明元年（684），武则天临朝，遣酷吏丘神勣赴巴州校检李贤居所。丘神勣至巴州拘禁李贤，逼令自尽，终年 31 岁。李贤之死在朝中引起震动。武则天为了安抚人心，将丘神勣贬为叠州刺史。垂拱元年（685）四月廿二日，在显福门为李贤举行哀悼仪式，派司膳卿李知十持节，册命追封李贤为雍王。李贤死后，遗体埋在巴州城南化山麓。唐中宗李显复位后，在神龙二年（706）追赠李贤为司徒公，令其子李守礼前往巴中将李贤的灵柩迎回长安，以雍王的身份陪葬乾陵。中宗死后，睿宗践祚，又进一步为其兄李贤恢复名誉。景云二年（711），睿宗追赠李贤为章怀太子。又重开墓室，将其妃清河房氏尸骨迁之乾陵与其合葬。

章怀太子墓位于乾陵乡马家坡杨家崖村北的高地上，东北距永泰公主墓约 600 米，南距杨家崖约 200 米。发掘工作于 1971 年 7 月 2 日开始，至 1972 年 2 月下旬基本结束。其墓为洞室墓。其整个墓形结构，可以分为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前后室和小龛等。全长 71 米。墓道在南，由南而北呈斜坡形，墓道水平长 20 米，宽 2.5 ~ 3.5 米（南宽北窄），最浅仅距地表 0.2 米，最深处距地表 7 米，墓道坡 21° 。过洞 4 个，券拱形，长 2.7 ~ 3.4 米，宽 2.2 ~ 2.4 米，高 2.8 ~ 3 米。天井 4 个，由北往南，第一天井因接近甬道，系用砖砌，故未发掘。其余 3 个天井东西长 3 米，南北宽 1.8 ~ 2 米，深 9 ~ 12 米。三个天井的东西二壁，分别有六个小龛，放置随葬品。前甬道长 14 米，宽 1.7 米，高 2.1 米。前后甬道及前后室全用砖砌，用方砖铺地。



图 33　章怀太子墓　（摄影：郑茂良）

前甬道口有木门一道，木门已经朽坏。发掘时过洞、前后甬道及前后室均积有淤土。前甬道的淤土高 2 米，前室淤土高 2.5 米，后室甬道口为前室淤土所掩，故后室淤土仅 1.5 米。在清理淤土时，在前甬道木门内发现铜质鎏金门泡钉 66 个，铜质鎏金铺首一对，铜质鎏金锁子一把（未见钥匙），以及残存的木门残片，镶嵌木门边的铜质鎏金片门钉，以及朽木灰等。从木门倒塌情况看，是向西北倒塌的。故在清理时，很多泡钉都在门内偏西北处。在木门后约 1 米的甬道上，发现有重 65 公斤的铅块 6 块。其形状有圆形、方形、椭圆形和长方形等。在铅块附近，发现有柳叶形箭头和机具零件。铅块、箭头和机具零件可能是防盗设施。在未掘甬道时，淤土中经常发现朽木（带漆皮，可能是木棺朽后被水冲刷出来的）、人的肋骨、小腿骨等。靠近前室甬道口，发现铜镜一面。镜面朝上，可能是被盗墓者由后室盗出后又摒弃的。盗坑在第二天井的东南角，坑系椭圆形，长 75 厘米，宽 60 厘米。

前室略呈正方形，长宽各 4.5 米，穹隆，高 5.6 米。顶部绘有日、月、星辰及银河。先用深蓝色作底，然后涂以乳白色石灰。银河是从西南到东北角，形如一条长带。星辰用大小不同的圆点代替。大小不同的圆点，可能代表亮度不同的星座。能看出北斗七星。东部偏南绘有黄色太阳，中有三足金乌。西壁靠西南绘有淡黄色月亮，中间为桂树，其右为玉兔站立捣药，左为蟾蜍。后甬道及后室淤土较少，故后室未被淤土掩埋的壁画，其颜色鲜艳如新。前室顶

部由于石灰浆剥蚀，有的地方显露出深蓝或黑色。在清理前室底部时，发现有零星的三彩小立俑，双螭壶、三彩骑俑，这些东西被盗墓者砸得粉碎。后室石门被砸断，左扇完好，均倒卧于后甬道中。后甬道淤土 1.6 米，后室淤土 1.4 米，后甬道长 9 米。后室结构与前室同，长宽各 5 米，高 6.2 米。顶部及四壁的部分星辰系贴金、贴银，日月均贴金。西壁的月亮及贴金的星辰被盗墓者刮去。东壁太阳贴金及金星银星，除个别自然脱落外，均全部保留。银星则氧化为黑色。后室太阳在东壁正中，西壁月亮则偏西北。这样不同方位的绘制日月，可能代表不同季节，或含有日月运转之意。

后室有庑殿式石椁一座，约占后室面积的三分之二。石椁长 4 米，宽 3 米，高 2.1 米。由 33 块大石板组成。椁盖五块石板中的最南一块已被盗墓者撬开成八字形，石椁东南角倚柱也随之向南壁倾倒。第一块顶部椁盖被撬开后，即进入椁内，将椁内之物盗窃一空。石椁内淤土 1.5 米。在清理时，淤土全部筛过，未发现随葬品。在石椁内壁东北角发现两只腿骨和头骨碎片，触之即成粉末。棺椁内均被盗扰，葬式不明。石椁中未发现有二具骨植的现象。在椁外西壁淤土中发现有一只腿骨，有可能是其妃房氏的。在发掘天井过洞及甬道时，也曾发现过肋骨、脊椎骨和一片肩胛骨，大概是后室房氏的棺木朽后被水冲刷出来的。从章怀墓志铭推知，其妻房氏在景云二年（711）十月死后与之合葬，石椁已封闭，不易启开。故收其妻棺柩放置于石椁外东部，是故知其同室不同椁。石椁内外壁均刻有人物、动植物、飞禽、昆虫等线雕画。与壁画同为重要文物之一。

出土文物绝大部分为陶器，各龛中的放置情况是：第四天井放置陶立俑、伎乐陶俑、骑俑、陶猪、陶犬、陶牛、陶羊、陶马、陶鸡等。第三天井东西小龛放置男女三彩立俑、大型三彩马、三彩骆驼及牵马、牵驼俑等。第二天井东西小龛放置三彩天王俑、文臣俑、武官俑、镇墓兽、彩绘塔式罐绿釉花盆等。墓志共有二合：一为“雍王墓志”，一为“章怀太子墓志铭”，均放置于后室甬道口及后室内[①]。

墓中壁画丰富而精美。从墓口至后室总长 71 米的墓道、过洞、天井至后室四壁，全为壁画。全墓共有 58 组壁画，二百多个人物、动植物、山石等。壁画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墓道口至甬道，全都画在土墙上，甬道口至后室则画在砖墙上。壁画内容除了传统的青龙、白虎是

①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

作为方位之神外，其余整个壁画，都是反映李贤生前生活片断的。墓道两壁画的是狩猎出行、马球、礼宾和仪仗等。从第一过洞开始以后，似乎表示进入庭院，诸如列戟、侍女、门卫宦者、歌舞等画面。这些壁画，除个别的自然脱落外，95% 以上均保存完整。所绘人物、动植物、山石飞鸟等，从布局、线条、比例服饰以至设色等，无不气韵生动，随类赋彩。所绘人物形象生动，活泼自然，很有艺术性。

3. 懿德太子墓

懿德太子李重润（682 ~ 701），本名重照，避武则天名讳，改为重润。系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孙，中宗李显与韦皇后长子。唐高宗永隆二年（682）封为皇太孙。684 年中宗失位，重润被废为庶人。圣历元年（698）中宗复为太子，重润封为邵王。大足元年（701），因与其妹永泰郡主等人私下议论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等，为人谗构而死，年仅 19 岁。中宗复位后，于神龙元年（705）追封为懿德太子。神龙二年（706）将其灵柩由洛阳迁至乾陵陪葬，特制“号墓为陵”。故在唐陵陪葬墓中等级最高。

懿德太子墓在乾陵东南隅约两公里的台地上。墓园面积约 54891 平方米，地面建筑已毁，基址尚存。地表有双层覆斗形封土，底边南北长 56.7 米，东西宽 55 米，高 17.92 米。南面有土阙、石狮、石人、石柱等。

1971 年 7 月至 1972 年 2 月，陕西省博物馆与乾县文教局组织专家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地下由斜坡墓道、6 个过洞、7 个天井、4 对小龛、前后甬道和方形前后砖室组成，全长 100.8 米。前后墓室均为方底穹隆式，全部用砖砌成。前室长 4.45 米、宽 4.54 米、高 6.3 米，后室长 5 米、宽 5.3 米、高 7 米。葬具置于



图 34　懿德太子墓墓道　（摄影：郑茂良）

后室，庑殿式石椁内外壁均有线刻图，墓壁满绘壁画。墓道两壁以楼阙城墙为背景绘太子出行仪仗，过洞绘驯豹、架鹰、宫女、内侍等。第一、二天井绘列戟图。甬道及墓室壁面绘持物宫女、伎乐等宫廷生活画面。

此墓规模宏大，随葬品十分丰富[①]。虽已遭盗掘，但仍出土文物1000余件，包括太子哀册、俑、三彩器和鎏金铜马饰等，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墓内壁画比较完整，凡40幅，分别绘在墓道、过洞、天井、前后甬道和前后墓室墙壁上。其题材有仪仗、青龙、白虎、城阙、伎乐、男仆、宫女等，显示出李重润的显赫地位和特殊身份。如仪仗队中列戟达48件，属帝王一级。仪仗队有196人，由步队、骑队和车队3个部分组成，阵容庞大，气势不凡。《架鹰图》《侍女图》《鹰犬畋猎图》《列戟图》等，真实地反映了唐代宫廷的日常生活。

四、陵墓变迁

唐代帝王非常重视陵寝的修建和保护，陵寝若有损坏及时予以修理，如《唐会要》卷二十载："（贞元）十四年（798）正月诏曰：八陵（献、昭、乾、定、桥、泰、建、元）宫寝，久要修葺，此缘非便，未及兴工，宜令宗正寺与所司即计料依所择日速修理。""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所缘寝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并令制置，上亲阅焉。"[②] 八陵的修建工程完成后，权德舆作《代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说：

> 臣闻宗庙之享，以致吉蠲；山园之制，以极严敬。国朝祀典，参用汉法，寝宫便殿，虔奉衣冠。日往月来，久未修复。伏惟皇帝陛下继明恭己，大孝因心，丕承祖宗，对越天地，荐馨香于九庙，崇经构于八陵。庶工子来，百堵皆作，人神协吉，龟筮告犹。用成奕奕之新，实自蒸蒸之孝。行宫尽复，神御以安。

太和五年（831）五月，宗正官请修献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庄陵、惠陵、昭陵。文宗下诏："所修陵寝事至严重，简计崇饰，须得精实，宜令度支郎中卢商、将作少匠韦长同往诸陵子细简计，具合修处与不合修处闻奏。"[③] 黄巢起

① 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②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第400页。

③ 《册府元龟》卷三〇《帝王部·奉先三》。

义之后，关中多次沦为战场。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温毁坏长安城，胁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关中地区到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哀帝天祐二年（905）正月十八日，又发生了“盗焚乾陵下宫”的事件[①]。

五代时期，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致使关中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也使关中唐陵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大部分陵墓都被华原（今陕西耀县）贼帅温韬盗掘。《资治通鉴》卷二六七载：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冬十月，“华原贼帅温韬聚众嵯峨山，暴掠雍州诸县，唐帝诸陵发之殆遍”[②]。《旧五代史》卷七三《温韬传》载：温韬为耀州节度，“唐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③]。《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载：“韬在镇七年，唐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④]

宋初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墓的过程中，也对乾陵进行了保护。元祐年间（1086 ~ 1094），游师雄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看到关中唐陵惨遭破坏，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重绘了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长安志图》也有记载：

> （乾陵）狄仁杰以下六十人画像姓名今皆不存，其见于奉天县丞赵楷绘像记者才二十九人焉。楷之记文多不尽载，撮其大指，略曰：唐之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谓盛矣，宜其立垅完固及于无穷。今兵火之余，荒墟坏皿，瓦砾仅存，理也宜也。独高宗武后之陵，崇丘磅礴，上诣青冥，双阙耸峙，丹青犹在。是岂造物者有以扶护而致然耶？抑也穷匮国力，深规厚图，使人未易窥也？转运游公一日按部过乾陵，慨然兴叹，乃录高宗天后时朝臣六十人重图于陵所。[⑤]

宋辽夏金时期，来乾陵凭吊者不乏其人，或在乾陵无字碑上篆刻题记。据无字碑上的题记，金太宗时，“大金皇弟”也曾对乾陵进行过整修。

---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〇《哀帝纪》，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03 页。

② （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卷二六七，后梁太祖开平二年十月，第 8705 页。

③ 《旧五代史》卷七三《温韬传》，第 961 页。

④ 《新五代史》卷四〇《温韬传》，第 441 页。

⑤ （元）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

明朝统一全国后，一方面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所作为的帝王；另一方面，指派专人看守陵墓。正德四年（1509）重阳节，宋廷佐等数人游乾陵，在其《游乾陵记》中记述：

> 陵正南两峰对峙，上表双阙，曰“南门”。内列石器：首石柱二，次飞龙马二，南二，马十匹，仗剑者二十人。次二碑：东碑无文，间刻前人题名；西碑文曰《述圣记》，后自制也。碑制四方如局，俗曰七节碑，今仆矣。次双阙，陵之内城门也。大狮二，南向。左右列诸番酋长像，左之数二十有八，右之数三十，今仆竖相半；背有刻，皆剥落，不可读。论者谓太宗之葬，诸番酋长来助者甚众。武后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其事，刻之以夸耀后世，是也。复北行，抵后山下，并麓而西，曰“白虎门”，北曰“元武”，东曰“青龙”，皆表双阙，树石器。于时复抵南门，将寻临川上仙之迹而吊之，遂憩阙下，削苔读碑。喟然曰：“……吾想武后之营斯陵也，以为不穷奢极侈，无以耀当时而夸后世，且无以尽身后之富贵。肆兹土木器物之制，皆壮丽坚固，盖欲传之百千万世而无蔽也。抑岂知今日如此哉？”

显然，到明代中期，乾陵的地面建筑已不复存在，石刻也多有损坏。述圣纪已仆倒，宾王像仅有 58 个，且已“仆竖相半”。嘉靖年间（1507 ~ 1566），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对乾陵也有一定的破坏。

到了清代，情况稍微有了好转，《乾县新志》卷九《古迹·陵墓》载，清代祭告之陵，凡 39 处，乾陵不在其中。但历来有陵租地 998.6 亩，分与陵户耕种。另拨 20 亩为狄梁公墓地租，余地 978.6 亩。陵户共 25 家，计每年征银 19.572 两，不在正项钱粮内。由于清代前期最高统治者和地方官吏都对乾陵比较重视，因之乾陵一度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鸦片战争以后，乾陵又处于无人问津的境地，遭受着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时人吴玉在



图 35　清代毕沅所立“唐高宗乾陵“碑　（摄影：郑茂良）

《晚过乾陵》诗中也说："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乾陵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

20世纪前期，关中地区兵荒马乱，乾陵继续处于被破坏的状态。30年代，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在《长安史迹考》第十二章《唐代之陵墓》中记载：

> 乾陵狄仁杰等六十朝臣画像祠堂已成瓦砾堆积之处。陵前石刻自南向北排列。最前方有石柱一对，倒折左右。其次有飞龙马一对，右者已埋入土中，仅露出头部，左侧者也转倒一旁。其北有半裸刻南一对，状若鸵鸟或食火鸟。次有石马五对，右边者幸皆完整，左边者缺损较多。再往北有石人十对，右侧倒地者二，左侧倒竖相半。次为述圣纪和无字碑。内城门中蕃酋石像右侧立者二十一，倒者三，共二十四；左侧立者十六，倒者十三，总二十九，惜其头部均已失去。蕃像北有石狮一对，又有毕沅所立"唐高宗乾陵碑"。

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乾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195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乾陵进行了重点考察，发表了《乾陵勘查情况》。1961年，国务院将乾陵确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加强乾陵的保护和研究，1961年成立乾陵文物保护管理所。1978年，又成立了乾陵博物馆。通过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乾陵保护的力度。因此，除"文革"时期外，乾陵很少受到人为的破坏。通过五六十年代的重点勘查，已经对乾陵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1957年，对乾陵石刻进行了修复，1987年修整了乾陵神道。近年又加固了石刻基座。此外，还对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薛元超墓和李谨行墓进行了科学发掘[①]。

1980年贺梓城发表了《"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对1953年以来的调查成果进行了报道。1982年，贺梓城、王仁波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乾陵》，再次对乾陵进行了介绍。1987年，刘庆柱、李毓芳又发表了《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他们1973年至1978年对关中唐陵的调查情况。此外，罗哲文、罗扬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孙中家、林黎明在《中国帝王陵寝》中也对关中乾陵进行了若干介绍。通过这些报道和介绍，加之乾陵旅游业的展开，人们对乾陵的了解逐渐增多，保护乾陵的意识也有所增强。

---

① 黄展岳：《中国西安洛阳汉唐陵墓的调查与发掘》，《考古》，1981年第6期。

五、考古调查与研究

学术界对唐乾陵的探讨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叶，但真正的研究是从 50 年代开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一些重要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和研究。乾陵作为“唐陵之冠”自然而然地被列为调查和研究的对象。当时，陕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乾陵陵园进行了重点考察。



图 36　法国人维克多·谢阁兰于 1914 年拍摄的乾陵翼马

60 年代初，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乾陵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热潮。1960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唐乾陵勘查记》，对当时乾陵的陵园石刻和陪葬墓情况进行了介绍，还记录了勘探乾陵的过程，使人们对乾陵的状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同时也激起了人们研究乾陵的热情。1961 年，考古工作者对永泰公主墓进行了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不久，《人民日报》《大公报》《陕西日报》先后发表了介绍永泰公主墓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以此为契机，许多学者加入了研究乾陵的行列。1963 年，武伯伦在《文物》上发表了《唐永泰公主之墓志铭》，笳声和田禾分别在《美术》上发表了《唐乾陵石狮》和《唐代永泰公墓石刻线画》。1964 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发表了《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对永泰公主墓的地理位置、墓葬形制、葬具和葬式、随葬器物进行了详细论述，文中还附有大量图片，为乾陵及其陪葬墓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遗憾的是，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70 年代，受“文革”的影响，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上都处于沉寂的状态，但乾陵研究因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发掘仍有一线生机。1972 年，《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和《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同时在《文物》上发表。这两份简报虽然没有永泰公主墓《简报》那

样翔实，但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两墓的结构与文物，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发掘后，李求是和乾陵文管所分别撰文对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王仁波则撰文对懿德太子墓的壁画进行了分析。此后研究工作再度中断。但有些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研究乾陵的热情，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对乾陵进行了再次调查。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相继发表。1979 年，王仁波发表《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这是“文革”之后研究乾陵的第一篇论文。

80 年代，考古工作者和文史工作者对乾陵表现出较大的热情，乾陵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1980 年，陈国灿发表《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乾陵研究的一篇力作。1982 年，贺梓城、王仁波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乾陵》，再次对乾陵进行了介绍。1983 年后，每年都有研究乾陵的论著问世。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多。其中林思桐《对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的初步研究》、云翔《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日本使节”质疑》、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王双怀《乾陵无字碑之谜》等都有较好的反响。此外，罗哲文、罗扬在《中国历代帝王陵寝》，杨宽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也对关中乾陵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通过这些研究和介绍，加之乾陵旅游事业的展开，人们对乾陵的了解逐渐增多，保护乾陵的意识也有所增强。

九十年代，乾陵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除壁画等课题之外，一些学者开始对乾陵石刻的保护问题和乾陵文化进行探讨。1994 年，杨忠堂撰写了《乾陵石质文物风化蚀变的微观特征研究》，不久，和玲、甄广全又撰写了《乾陵石刻化学风化研究》。这类文章在乾陵研究方面是前所未有的。1996 年，赵文润发表了《论乾陵文化》一文，首次对乾陵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1997 年，樊英峰、刘向阳撰写的《乾陵文物史迹述丛》出版。该书对与乾陵有关的 35 个问题进行了论述，书后还附录了乾陵碑刻上的文字，是一部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的著作。它的出版，显示出乾陵研究较前有了较大的进展。

当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乾陵研究也迎来了它的新阶段。研究乾陵的学者明显较前增多，研究的成果也不断出现。从 2000 年到 2003 年，有关乾陵的论著就达到 20 余种。2000 年，樊英峰的《乾陵历史地理初探》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使乾陵研究的领域又有所开拓。此后，张沛的《乾陵无字碑别论》、王翰章《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樊英峰《关

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王晓莉《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的再探讨》相继发表。王双怀的《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陈安利的《唐十八陵》、刘向阳的《唐代帝王陵墓》也相继出版。



图37　在靖陵神道遥望乾陵　　（摄影：郑茂良）

据统计，在过去的50多年间，海内外学者发表的有关乾陵的论著百余篇，其中专门探讨乾陵问题的有70多篇。从这些论著的内容来看，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相对而言，大家关注较多的仍是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九个方面：

（一）关于乾陵历史地理。乾陵历史地理是乾陵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起点较高。

（二）关于乾陵陵园结构。陵园结构是乾陵研究的重要课题。最先研究这一课题的是考古人员，后来史学工作者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

（三）关于乾陵的石刻艺术。

（四）关于乾陵陪葬墓的情况。乾陵有17座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也是乾陵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发掘以来，不少学者都曾对乾陵陪葬墓进行过探索。

（五）关于乾陵壁画。在研究唐代乾陵的论著中，有关乾陵壁画的文章是相对较多的。这大概是由于乾陵壁画数量较多，精美绝伦的缘故。

（六）关于乾陵蕃酋像。

（七）关于“述圣纪”碑。学术界对述圣纪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60年代。

（八）关于“无字碑”。“无字碑”是乾陵最著名的石刻，也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九）关于乾陵文化。

纵观唐乾陵研究的历程和研究的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到，50年来的乾陵研究是很有成绩的：其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研究乾陵的队伍不断壮大。起初研究乾陵的主要是一些考古人员。现在从事历史研究、地理研究、文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也加入了乾陵研究的行列，这些研究人员分布在许多文博单位和大专院校，为今后乾陵研究工作的深入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其二，到目前为止，已经对乾陵的一些重要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从建筑布局到陵园结构，从文物古迹到陵园文化，都有专文发表。特别是在乾陵石刻、壁画等方面，发表的文章较多，显示出研究工作已经从粗线条的宏观研究向细线条的微观研究发展。其三，更重要的是，在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比如对乾陵结构的研究、对乾陵石刻和壁画的研究都有较大进展，在乾陵历史地理和乾陵文化的研究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研究成果：

人民美术出版社：《唐永泰公主墓壁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唐李贤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唐李重润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

廖彩樑：《乾陵稽古》，黄山书社，1980年。

武则天研究会、乾陵博物馆编：《武则天与乾陵》，三秦出版，1986年。

樊英峰、刘向阳：《乾陵文物史迹论丛》，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

吴志毅、梁子：《乾陵之谜》，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

拜根兴、樊英峰：《永泰公主与永泰公主墓》，三秦出版社，2004年。

樊英峰、王双怀：《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文物出版社，2013年。

杨正兴：《乾陵勘察情况》，《文物》，1959年第7期。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第4期。

贺梓城：《乾陵述圣纪和它的现存文字》，《文物》，1961年第3期。

王策：《从永泰公主墓室壁画谈起》，《美术》，1962 年第 1 期。

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志铭》，《文物》，1963 年第 1 期。

茹声：《唐乾陵的石狮》，《美术》，1963 年第 6 期。

禾田：《唐代永泰公主墓石刻线画》，《美术》，1963 年第 6 期。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 年第 1 期。

杉村勇造：《唐の永泰公主の石椁画》，《みづゑ》，1965 年第 10 期。

陕西历史博物馆：《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

乾县文教局等：《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 年第 7 期。

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文物》，1972 年第 7 期。

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 年第 6 期。

上原和：《章怀懿德两太子唐墓壁画と高松塚坟壁画について》，《古美术》42 卷，1973 年第 9 期。

乾陵文管所：《对〈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等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文物》，1973 年第 12 期。

饭岛武次：《唐高宗乾陵》，《古代文化》31 卷，1979 年第 4 期。

王仁波：《懿德太子墓所表现的唐代皇室埋葬制度》，《中国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 年。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1980 年第 2 期。

贺梓城、王仁波：《乾陵》，《文物》，1982 年第 3 期。

林思桐：《对章怀太子墓壁画〈马球图〉的初步研究》，《体育文史》，1983 年第 2 期。

齐德文：《乾陵发现契丹小字石刻》，《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6 期。

杨正兴：《唐薛元超墓的三幅壁画介绍》，《考古与文物》，1983 年第 6 期。

陈国灿：《乾陵石人群》，《中国建设》，1983 年第 8 期。

何汉南：《唐代乾陵石刻取象初探》，《咸阳考古文物论丛》，1983 年。

廖彩樑：《〈大唐永泰公主志铭〉新释及永泰公主之死》，《文博》，1984 年第 3 期。

云翔：《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日本使节”质疑》，《考古》，1984 年第 12 期。

陈国灿：《唐乾陵及其石人群像》，《文史知识》，1985 年第 2 期。

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 年第 3 期。

孙东位：《乾陵附葬墓——刘濬墓志考述》，《人文杂志丛刊》，1985 年第 5 期。

王双怀：《乾陵“无字碑”之谜》，《中外历史》，1987 年第 1 期。

武伯纶：《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两幅壁画和几件陶俑》，《古城集》，三秦出版社，1987 年。

张永祥：《乾陵陪葬墓的两个有关问题》，《文博》，1989 年第 2 期。

章群：《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国际唐代文化论集》第 1 集，1989 年。

魏明孔：《“无字碑”何以无字》，《丝绸之路》，1994 年第 4 期。

杨钟堂：《乾陵石质文物风化蚀变的微观特征研究》，《考古与文物》，1994 年第 6 期。

樊英峰：《唐薛元超墓志考述》，《人文杂志》，1995 年第 3 期。

杨云鸿：《乾陵石刻的艺术风格》，《文史杂志》，1995 年第 5 期。

和玲、甄广全：《乾陵石刻化学风化研究》，《考古与文物》，1995 年第 6 期。

刘向阳：《盛唐风貌留华章——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琐谈》，《武则天与乾陵文化》，1995 年

魏学海：《从乾陵陪葬墓壁画〈列戟图〉看唐代的列戟制度》，《武则天与乾陵文化》，1995 年。

杜文玉：《关于薛元超的几个问题》，《武则天与乾陵文化》，1995 年。

樊英峰：《唐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盆景与盆栽》，《故宫文物月刊》（台）总第 145 期，1995 年。

刘向阳：《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琐谈》，《故宫文物月刊》（台）总 146 期，1995 年。

樊英峰：《唐永泰公主墓出土陶俑各种发式、鞋和帽》，《故宫文物月刊》（台）总 147 期，1995 年。

王维坤：《唐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辨析》，《考古》，1996 年第 1 期。

赵文润：《论乾陵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王东明：《乾陵之谜》，《文化月刊》，1996 年第 5 期。

拜根兴：《永泰公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故宫文物月刊》（台）总第 159 期，1996 年。

杨云鸿：《唐乾陵陪葬墓壁画艺术》，《文史杂志》，1997 年第 1 期。

林集友：《武则天陵前的无字碑试析》，《四川文物》，1997 年第 2 期。

和玲、周伟强：《乾陵石刻清洗研究》，《文博》，1997 年第 5 期。

马涛：《乾陵风化石刻物理及水理学性质研究》，《文博》，1998 年第 2 期。

杨钟堂：《陕西乾陵石刻材料溯源》，《西北地质》，1998 年第 2 期。

杨军昌、甄广全：《乾陵石刻保存状况及保护处理建议》，《文博》，1998 年第 4 期。

樊英峰：《乾陵石刻制度始于恭陵》，《武则天与偃师》历史教学社，1998 年。

张永祥、胡然：《乾陵考古五题》，《文博》，1999 年第 3 期。

郎享伯：《寄残梦与黄泉：乾陵无字碑猜想》，《社会科学辑刊》，1999 年第 4 期。

周伟强、和玲、甄广全：《乾陵石刻裂隙的粘合处理》，《文博》，2000 年第 5 期。

樊英峰：《乾陵历史地理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 年第 3 辑。

张沛：《乾陵“无字碑”别论》，《文博》，2000 年第 6 期。

刘向阳：《乾陵无字碑中的“碑”》，《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7 辑，2000 年。

沈睿文：《唐陵陵园布局的分类及演变》，《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王翰章：《关于乾陵无字碑等问题的商榷》，《文博》，2001 年第 2 期。

樊英峰：《关于乾陵文化的再探讨》，《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 年。

马文廷：《谈乾陵阙楼的特点及形制》，《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 年。

陈晔：《从懿德太子墓的结构看唐乾陵陪葬墓的形制》，《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 年。

穆兴平：《谈“述圣纪碑”与武则天的关系》，《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 年。

牛芸：《“无字碑”昭示的历史悲剧》，《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 年。

魏鹏：《浅谈唐章怀太子墓壁画的艺术成就》，《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 年。

刘向阳：《唐乾陵石雕刻群及其组合象征的含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 9 辑，2002 年。

樊英峰：《乾陵唐墓壁画的历史价值》，《文博》，2003 年第 1 期。

张鸿杰：《乾陵“六十一蕃臣像”衔名订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3 期。

李怡：《西安地区唐墓壁画中卫士服考辨》，《文博》，2003 年第 3 期。

樊英峰：《乾陵 61 蕃臣像补考》，《文博》，2003 年第 3 期。

梁子、文军：《乾陵六十一蕃王考述》，《文博》，2003年第6期。

王维坤：《乾陵应为“寿陵”之蠡测》，《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2003年。

王晓莉：《乾陵61尊石人像有关问题的再探讨》，《武则天与嵩山》，中华书局，2003年。

廖原：《关于乾陵、定陵〈无字碑〉》，《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秦建明：《乾陵神道鸵鸟为射侯说》，《文博》，2006年第3期。

张静、张媛：《乾陵石狮造型艺术分析》，《美术大观》，2009年第6期。

刘向阳：《乾陵唐杨再思墓碑简考》，《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4期。

赵斌：《刍议唐乾陵六十一蕃臣像中的新罗人》，《丝绸之路》，2010年总24期。

程义：《乾陵地下结构蠡测》，《西部考古》总第五辑，2011年。

张鑫：《唐乾陵石仗马的马具与马饰》，《文博》，2014年第3期。

六、遗迹与遗存

（一）石刻

在乾陵陵园中，有数以百计的石刻。这些石刻或高大雄伟、气势磅礴，或鬼斧神工、玄妙莫测，或造型逼真、栩栩如生，都是珍贵的艺术品。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都远超前代陵墓石刻，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乾陵石刻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石刻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集中反映了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在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唐朝的历史状况和唐代文化的特点。

乾陵石刻主要有石柱、翼马、鸵鸟、仗马、石人、石狮、蕃像和石碑等十余种。根据这些石刻所反映的内容，大体上可将这些石刻划分为四类，即：陵墓标志、祥瑞鸟兽、仪卫人马和纪念性石刻。

1. 标志性石刻

乾陵中的标志性石刻是石柱，位于神道的最南端，是唐陵神道的标志。石柱通高约7.5米，础石四周线雕云纹，石座置于础石之上，四周线雕祥兽纹。石座为覆莲式环座。环座中部有卯。柱身底部有榫，榫插入覆莲环座中的卯内。柱身为八棱，向上收杀，每面最宽为49厘米。各棱面线雕缠枝海石榴花纹，为抱合式二方连续图案。顶部由宝珠、八棱面盘和仰莲盆组成，宝珠由八棱面盘托承，盘置于仰莲盆中，盆则置于柱身之上。这种造型与献陵石柱不尽相同，

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以莲花座和花莲盘为饰。乾陵石柱雕刻精美、气势非凡，是唐陵石柱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乾陵以后诸陵的石柱，均受到乾陵石柱的影响。

2. 祥瑞鸟兽

这类石刻有翼马、鸵鸟和四门石狮。

翼马位于石柱之北 30 米处。文献记载："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天马又称龙马，自古以来，人们即将天马当作瑞兽看待，将其置于陵所，显然也是以此嘉瑞来表示明君盛世。乾陵翼马两者形制略有差别。东边翼马体形较小，身长 2.97 米，胸宽 1.17 米，身高 2.3 米，披鬃，瞋目，闭口，躯体圆丰、四腿直立，足为马蹄，腹下透雕，两肋雕饰五层卷云纹翼翅，翼翅犹如前锐后阔的扇面。西列翼马较大，额上有角，其余造型与东边的略同。两个翼马的四足和尾部均与石座相连。石座置于础石之上，四周线刻花纹图案，图案祥云、花草，还有神龙、獬豸、狮、象等动物图案。整个图案布局巧妙，浑然一体，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

鸵鸟位于翼马北侧 200 余米。鸵鸟的设置可能与南或朱鸟有关。南本来是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因南方属火，朱为赤色，



图 38　乾陵东列石柱　　（摄影：郑茂良）



图 39　乾陵神道西列鸵鸟石刻　　（摄影：郑茂良）

像火，所以古人便把南方七宿组成的这个鸟称为南或朱鸟。在古人看来，天上有南，人间也应当有这种鸟，所以就图写其形，以示吉祥。另一种可能是因为鸵鸟为外国千里迢迢进贡而来，将其石刻立于陵寝之前有寓意唐朝皇帝具有“怀远之德”的意义，如在高宗时期就将外国进奉的鸵鸟献于昭陵以显太宗功德。乾陵鸵鸟浮雕石屏高 1.8 米、长 1.4 米，鸵鸟作侍立状，昂首挺颈，腿长颈直。石屏与石座相连，石座下为础石。鸵鸟的造型也与其他陵寝中的不同，其他陵寝鸵鸟的颈部都是弯曲的，唯独乾陵鸵鸟作昂首远视之状。

乾陵四门共有 8 尊狮子。狮子作为陵墓石刻始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陵墓置石狮更为常见。帝陵置石狮当以北魏孝庄帝元子攸的静陵最早，唐初李虎、李昞被追封为帝，永康陵和兴宁陵均置石狮，昭陵以南的礼泉县后寨村有石狮一对。自乾陵始，以后诸唐陵之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狮子原产于非洲和亚洲西部，大约在战国时期传入我国。狮子在佛教中被神化。佛教比喻佛祖讲经“演法无畏，犹狮子吼。其所讲说，乃如雷震”，又说“佛为人中狮子”。狮子被描绘成“铜头、铁额、钩爪锯牙、弥耳跪足、目光如电、声吼如雷”的“绝域之神兽”，有“拉虎吞貔，裂犀分象”的本领。以狮护门可固若金汤，故唐陵石狮均置于陵园四门之外。现今乾陵石狮 5 个保存较好，而北神门双狮和西神门北侧石狮已经残毁。乾陵石狮高 3.35 米，宽 1.3 米，做工精致、高大凶猛，威慑力很强。初唐石狮在造型上多为走式，乾陵门狮由走式变为蹲式，以后诸唐陵石狮，均为蹲踞。

3. 仪卫人马

乾陵中的仪卫人马有两种：一种是仗马，一种是石人。

乾陵仗马分设两处，一位于鸵鸟北侧，东西两列各 5 匹；二位于北神门外，东西两列各 3 匹，每匹仗马旁均有控马人。古人认为“在天莫如龙，在地莫如马。”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因而对马特别重视。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垅，如生前之象仪卫耳。”这就是说，石马等石刻的设置，是模仿帝王生前和仪卫，唐陵石马的设置也是如此。所谓“仗马”实际上就是仪仗之马，从“六闲”中挑选出来的体形、毛色、个性最好的马，每日要在“进马官”的控制下立仗充当仪卫，不能鸣叫，也不能随便走动。朝堂外立仗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礼仪。陵墓神道上仗马自然也

是要显示帝王生前的威仪。

帝王陵前置石人以北魏宣武帝的景陵为早。唐代诸陵石人布局大体相同，但造型颇有差异。乾陵石人位于仗马之北，共十对，每对南北间距 18.5 米，东西列石人形制相同。身高一般为 3.87 米，头戴帻冠，长袖阔带，脚着长靴，双手拄剑，神态各异。石人用整块巨石雕成，从近处看身长腿短，似乎比例失调。但从远处看，却凝重自然，协调大方，有很好的视觉效果。



图 40　乾陵神道东列仗马和控马人石刻　（摄影：郑茂良）

4. 纪念性石刻

纪念性石刻主要是蕃臣像。

蕃酋像位于南门阙北 18 米处，分东西两组排列，为少数民族石像，习惯上称之为“蕃像”“诸蕃君长像”或“宾王像”。唐朝以前，坟墓上很少设置蕃像，除西汉霍去病墓石刻中有“马踏匈奴”和“野人”像以外，其他坟墓尚无设置蕃像的记载，帝王陵墓中更无设置蕃像者。唐陵从昭陵开始出现这类石刻，到乾陵蕃像的数量大幅增加。蕃臣像分为两组，每组南北 4 行，东西 8 排，分别侍立于南门阙内的东西两侧。其总数达到 60 余人。

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的国力空前强大，统治范围北愈大漠，西越葱岭，达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与唐的往来十分频繁，“四夷酋长”多被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同时在朝廷担任十二卫大将军等职。根据这种情况，就仿照昭陵的做法，把当年曾“侍轩禁者”的 60 余位“四夷酋长”雕刻成像，置于乾陵，以反映唐高宗和武则天的统治权力及各民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宋人赵楷在为游师雄《乾陵图》所写的“记”中说：“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夸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

各肖其形，镌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①] 后人多据此发挥，认为这些蕃臣是营建乾陵时前来助役的人或者是前来祭奠唐高宗的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乾陵有些蕃臣像的衔名有“故”字，也就是说，在唐高宗和武则天亡之前，他们就已经去世，是不可能来助役或参加祭奠活动的。核实而论，这些人都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归附唐朝，并在唐朝担任过高级职务的少数民族首领。



图 41　乾陵东列蕃臣像　（摄影：郑茂良）

乾陵蕃臣像最初可能是 64 个，每个石像的背部都刻有像主人的官衔和姓名。到北宋时，蕃臣像只存61尊，且“姓名漫灭”。陕西转运使游师雄“访奉天县旧家所藏拓本完好者摹刻四碑”。可惜的是这四通石碑到元代仅余其三，且有残损。李好文在《长安志图》中只录出 39 人的官衔和姓名。清初叶奕苞在《金石录补》中录出 38 人。到现在，乾陵蕃臣像上留有名衔者仅 6 人，其官衔姓名可考的也只有 36 人。这 36 人中，有吐谷浑、吐蕃、突厥首领各二人，其余都是来自安北、北庭、安西等都护府和少数民族首领。其中安北都护府属下回纥诸部酋长有：“故左威卫大将军兼金微都督仆固乞突”“故左卫大将军兼燕然大都督葛塞匐”“左威卫大将军兼坚昆都督结篾蚕匐肤莫贺咄”。北庭都护府属下西突厥诸部酋长有：“故大可汗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十姓可汗阿史那元庆”“左威卫将军鹰娑都督

① 《长安志图》卷中。

鼠尼施处半毒勤德”“故右威卫将军兼洁山都督突骑施傍靳”“故左武卫将军兼双河都督摄舍提暾护斯”“故左威卫大将军兼匐延都督处木昆屈律啜阿史那盎路”“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右金吾卫大将军兼大漠都督三姓咽麵叶护昆职”“十姓可汗阿史那斛瑟罗”“右领军将军兼千泉都督泥孰俟斤阿悉吉度悉波”“故右金吾卫将军兼俱兰都督阙俟斤阿悉吉那靳”“故右卫将军兼颉利都督拔塞干蓝羡”“碎叶州刺史安车鼻施”“故左武卫大将军突厥十姓衙官大首领吐屯社利”。安西都护府所属诸族酋长有：“故右骁卫大将军兼龟兹都督龟兹王白素稽”“故右武卫将军兼龟兹都督龟兹王白回地罗徽”“龟兹大首领那利自阿力”“疏勒王裴夷健密施”“于阗王尉迟璥”“朱俱半国王斯陁勒”“播仙城主何伏帝延”“康国王泥涅师师”“石国王子石忽那”“吐火罗王子特勤羯达健”“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都督波斯王卑路斯”“波斯大首领南昧”“大首领可汗颉利发（残）”。吐谷浑、吐蕃、突厥首领及使臣有：“吐浑青海王附马都尉慕容诺曷钵”“吐浑乐王徒耶钵”“吐蕃大酋长赞婆”“吐蕃使大论悉曩热”“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默啜使葛暹嗔达干”。这些蕃臣的官阶也很高，大都是三品以上的大官。这说明，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在朝中任职的情况更为普遍。

乾陵蕃臣像在明代中后期遭到很大的破坏，“仆竖相半”，多已无头。到二十世纪初，所有石像“头部均已失去”。关于这些石像无头的原因，现在还未明确，从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蕃臣像的破坏有自然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明代以来关中地区所发生的大地震中，可能有一些蕃像仆倒，甚至摔坏。但大部分蕃像的头可能是被人故意打掉。从现存石刻状况来看，这些蕃臣的服饰和发型是不尽相同的，大多穿窄袖阔裾服装，也有个别的袖较长。领型有圆领、大翻领或斜叉领，腰束带，脚穿靴，双足并立，两手前拱，头发有卷发，也有披发。雕刻工艺都是相当高超的。站在这些蕃臣像前，我们还可想见当年朝堂中蕃臣侍立的场面。

乾陵石刻的这种组合与布局，是在献陵石刻和昭陵石刻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结果。由于乾陵的石刻组合已趋于完善，因而受到后人的重视，高宗以下唐代诸陵石刻，大体上都是仿照乾陵设置的，说明乾陵石刻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

（二）碑石和墓志

乾陵的碑石和墓志主要有“述圣纪碑”“无字碑”“永泰公主墓志”和“章怀太子墓志”等。

1. 述圣纪碑

述圣纪碑位于南门外的西阙楼前，与高大的无字碑两相对峙，这是武则天为唐高宗立的歌功颂德碑。碑通高 6.85 米，宽 1.86 米，重约 89.6 吨。碑体由五块方石榫卯套接而成，碑顶为庑殿式，基座雕有獬豸和海石榴纹，碑为七节，象征“七曜”，七曜是古人认为构成世界的七种基本物质，即日、月、金、木、水、火、土。七节碑寓意唐高宗的文治武功如日月星辰，普照天下，光耀千秋。碑文 46 行、共 5600 余字，由武则天亲自撰写，唐中宗李显书丹，现仅存 1000 余字。此碑曾经倒塌，是新中国成立后重新修复起来的，碑顶是新修建的。檐角的护法力士原有 4 个，现在只留下两个，也都残缺不全。

2. 无字碑

无字碑位于南门外的东阙楼前，用一块巨石雕成，通高 7.53 米，宽 2.1 米，厚 4.19 米，重约百吨，以其当初立碑时碑上未刻一字和高大雄浑著称。碑首采用浮雕的手法，雕刻着八条螭龙，龙身相互缠绕，鳞甲分明，栩栩如生。相传龙有九子，性格各不相同。螭是其中的一个，它喜欢登高，所以作为装饰品，古代人常常把它雕刻于碑首或宫殿柱身上面。碑的两侧刻有“升龙图”，线条简洁，生动传神。碑座呈方形，与碑首的圆形相对应，取天圆地方之意。碑座正面刻有“狮马图”，狮昂首怒目，十分威严；马屈蹄俯首，温顺可爱。从宋到明，文人墨客在上面刻了 42 段文字。其中最珍贵的是碑阳正中一块用女真文字刻写的《郎君行记》，旁有汉字译文，内容为 1134 年金人修葺乾陵地面建筑的事情。女真文字早已绝迹，这段文字为我们研究女真族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



图 42　乾陵无字碑　（摄影：郑茂良）

的资料。

3. 永泰公主墓志

墓志出土于永泰墓第五过洞下面，长宽各为 117 厘米。志盖上刻“大唐故永泰公主志铭”九个篆体大字。在志盖的四周，雕刻着十二生肖和蔓草图案。十二生肖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形成各种动物应有的特性，个个生动活泼，形神兼备。志底上面有在正方形方格中用楷书写成的一千多字铭文，通读可知，永泰公主是唐中宗李显的第七女，武则天和李治的嫡孙女，生于 684 年，死于 701 年。对于公主的死因，徐彦伯写的墓志铭文“珠胎毁月，怨十里之无香。琼萼凋春，忿双童之秘药”句成为解读和探讨永泰死因的关键性问题。前句用珍贵的珠子受到月缺的影响不能正常的发育，隐喻了公主受到武则天的威胁不能正常生存。后句以双童之秘药借喻永泰公主获罪于武氏之故使她年纪轻轻而早死。《新唐书·诸帝公主》记“永泰公主，以郡主下嫁武延基，大足中，为武后所杀。”又据《资治通鉴·则天顺圣皇后》载：“太后春秋高，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邵王重润其妹永泰郡主，主婿武延基窃议其事，易之诉于太后。九月壬申，太后皆逼令自杀。”志铭证实史书记载是可信的。

4. 章怀太子墓志

章怀太子墓志中共有二合：一为“雍王墓志”，一为“章怀太子墓志铭”，均放置于后室甬道口及后室内。雍王墓志铭系李贤棺柩在神龙二年（906）由巴州迁回以雍王礼葬的墓志铭。章怀太子墓志铭系景云二年（711）追赠李贤为章怀太子，其妃房氏与之合葬时的墓志铭。雍王墓志铭长宽各 90 厘米，厚 20 厘米，盖 3 行 9 字篆书：“大唐故雍王墓志之铭”。盖周边雕刻蔓草及十二生肖，四斜边也饰蔓草，志文 40 行，行 41 字，共 1600 余字。志文未署撰书人姓名。书法严正遒劲。章怀太子墓志铭长宽 87 厘米，厚 17 厘米。志盖 4 行 16 字：“大唐故章怀太子并妃清河房氏墓志铭。”四周斜边及志文四边均刻蔓草纹。志文 34 行，行 33 字，约 1100 字。志文为其子邠王李守礼之师卢灿撰，歧王李范书。这两方墓志同样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三）壁画和线刻画

文物考古工作者从 1960 年至 1972 年先后发掘清理了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薛元超、李谨行等五座陪葬墓，出土壁画 1200 平方米，石椁线刻画 150 平方米。

1. 墓室壁画

壁画是中国古代一种传统的绘画形式，起源甚早。然而，壁画艺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分类的繁荣时期，却是在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唐代。唐墓壁画是唐代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陵的壁画取材于唐代宫廷生活，内涵十分丰富。它们线条圆浑凝重，色彩富丽大方，画面细致丰润，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三座乾陵陪葬墓出土的壁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笔法娴熟，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再现了一千多年前唐王朝宫廷生活的生活场景与时代气息，其中以《观鸟捕蝉图》《宫女图》《狩猎出行图》《打马球图》等较为著名。

（1）《观鸟捕蝉图》

出土于唐章怀太子墓前墓室西壁，画面描绘了 3 个侍女在宫廷花园内嬉戏游玩的瞬间情景，仅用一树、一石、一鸟和一只停息于树上的秋蝉作为情景气氛烘托，是一幅反映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之美的秋情意趣图。画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对 3 位宫女眼神的刻画，前面的侍女，年龄较大，双手相交搭于腹前，目光呆滞，若有所思；中间的一位头梳双髻，一身时尚的胡装扮相，年龄较小，无忧无虑的目光和神情专注于树上的那只小蝉上，蹑手蹑脚，轻甩右衣袖，正欲捕捉树干上的秋蝉；最后的这位侍女年龄稍长，仰起的脸庞上一双充满希望的眼睛，左手挽臂纱，右手扶着欲插入脑后的发钗，正仰头观看天空飞翔的一只小鸟，她渴望自由地神情俨然溢于画面之外。画面虽然没有描绘一砖一瓦，但每一位用心的观者却能感受到那高大厚实的宫墙的存在，不由得被一种沉闷、压抑的心绪



图 43　章怀太子墓“观鸟捕蝉图”壁画　（编写组供稿）

左右着、牵引着。

（2）《宫女图》

永泰公主前墓室东壁南侧的《宫女图》，画面上描绘了 9 位栩栩如生的身着宫装的宫女，为首者双臂交叉于腹前，挺胸趋步前行，姿容高雅华贵，有学者们认为她可能是墓主人永泰公主李仙蕙。其他宫女神态各异，服饰与发式不同，她们各司其职，手持宫廷贵族日常生活用品，分别捧盘、执杯、抱物、执扇、端蜡烛、拿拂尘。她们的发式有高髻、单刀髻、单螺髻、双螺髻。在服饰方面，多着曳地长裙，外着半臂披彩帛，薄衣单衫，露颈袒胸，脚着如意尖头履；也有的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内穿条纹裤，着透空鞋。画面表现了一个夏令之夜，侍女们列队去侍奉主人的情景。画家从正面、背面、侧面等不同角度，运用参差错落的人物布局，虽然没有任何背景衬托，却使这幅看似平淡的人物画，充满了韵律感和一种生动和谐的美感。特别是画面上所描绘的右起第四位捧杯侍女的形象，她身材修长，丰颊秀眉，双手捧着一只高脚杯，身体呈反“S”曲线而立，画家在细致的观察生活之后，画出她外在形象的同时更画出了她内在气质、风度和神韵，且赋予她一个优美的站立捧杯动作。

（3）《狩猎出行图》

该画绘制于章怀太子墓入口处的东壁墙面上。图中绘有 40 余骑人马，另有两匹骆驼满载狩猎用的辎重物资，近处有林木相间，这是一个分工明确的狩猎队伍，整幅画面由前导部队、中队、后卫及后勤部队四部分组成。他们驾鹰、抱犬、跃马、扬旗，反映了唐王朝一位太子狩猎出行的壮观场面。画面中一大队人马呼喊着急驰奔向狩猎场，人马过后荡起的漫天沙尘，给人以扑鼻窒息之感。

（4）《打马球图》

原作绘在章怀太子墓道入口处的西壁上，与东壁的《狩猎出行图》相对称。这幅图描绘了在郊外山谷中进行的一场激烈争球的运动场面。画面上共绘有 5 人，他们每人身骑骏马，手持球杖，正在激烈的争打地上的红色小球。画面中前 1 人骑枣红色骏马，身体重心后移，手持月牙鞠仗，坐骑向前急驰，右侧身后视，反手作挥杆击球状，他是这幅画的灵魂与核心。其余 3 人皆俯身纵马持杖相迎，而另 1 人被烟尘笼罩，只能看见马身的左侧后半部分。这是一幅古代马球运动的真实再现，他不仅是研究唐代体育运动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外友好文化

体育交流的有力实证，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5）《阙楼仪仗图》

此图临摹于懿德太子墓墓道。壁画内容反映的是身为太子的李重润率兵即将出城的一个宏大场面。画面描绘了高大的阙楼及与之相连接的坚固的城墙，城墙下是由 26 人组成的人马肃立的仪仗队伍，旗幡飘扬，以城外的峰峦叠嶂作为衬托，更显画面的宏伟与壮观。仪仗队由骑兵和步兵两个队列组成，官兵们个个精神饱满，列队庄严肃穆，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昂扬的斗志，是唐代太子大朝仪仗时的宣赫场面情景再现。



图 44　章怀太子墓“打马球图”壁画　（编写组供稿）

2. 石刻线画

线刻画是用白描手法，全部用阴刻线条来描绘景物的图画。乾陵石刻线画通常用屏风画的形式来表现，每扇高约 1 米、宽 80 厘米，分布于石椁内外，石门上下左右，石墓志四侧和石雕基座之上，其中以石椁上的数量为多。图案内容有仕女、宦官、猛兽、飞鸟和缠枝蔓草花纹等[①]。

永泰公主墓出土石椁，是乾陵对外开放的三座陪葬墓中石椁雕刻最为精美的一具。它由 34 块青石拼装而成，长 3.82 米，宽 2.75 米，通高 1.9 米，形状似一座庑殿式建筑。在它四面石壁上的内外，阴刻着互相分隔的 15 幅仕女人物画及 24 幅缠枝蔓草鸟兽纹图案，总面积 40 平方米。画中的宫女们有捧盒、抱壶、赏玩花枝的，也有凝神静思、闲立对话的，还有女着男装、俏丽潇洒、恬静端庄的。这些线刻画为研究唐代历史和艺术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其中一幅刻画了两位身着短襦长裙的宫女形象，她俩置身在盛开的花园之中，身旁有两只相向飞动的小鸟，

① 樊英峰、王双怀：《线条艺术的遗产：唐乾陵陪葬墓石椁线刻画》，文物出版社，2013 年。

左面的一位仕女持花一枝，右手似动非动像拈弄花草，右面的仕女站在那里似在观看，与持花女相对而立。整幅作品生动细腻，给人以无限回味之感。

石椁石门两扇门扉左右刻画两位站立的宫女，头戴凤冠，冠顶部插有花钿，前后插系有长缨的簪，步摇由珠宝组成，身穿广袖短襦，微露酥胸，胸前束一带，上绣团花图案，腰侧悬垂一完整佩饰。几欲垂足的袖边上饰绣着一对鸾凤，下着曳地长裙，裙腰齐胸。

乾陵的线刻画刀法刚劲，技巧娴熟，所刻宫女呼之欲出，鸟兽形神兼备，花草生意盎然。整个画面气韵生动，优美传神，线条流畅，堪称石刻艺术中的瑰宝。

（四）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盛行的一种美术陶瓷，以器物表面施以灿烂夺目的彩釉为主要特征。这种器物先做成胚胎，待阴干后入室烧至1000℃左右，取出晾冷，再上釉彩进行第二次焙烧，烧成温度约为800℃～1100℃，比瓷器的烧成温度1300℃稍低。其釉色主要有褐红、浅黄、赭黄、绿色、蓝色、紫黑等。

1. 镇墓兽

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的两尊三彩辟邪，俗称镇墓兽，通高1.1米左右，施黄绿色釉，被安放在墓内第一道墓门外两侧。这是迄今为止唐墓出土同类明器中最高大者之一。这两尊镇墓兽其中一尊如龙的头，长有双角，并有戟直立，身生一双鹰翅，中足下为四只爪子，非禽非兽；而另一尊则明显是武士的面孔，马蹄足，头出双角，臂长双翼，鬣毛耸立，非人非兽。这种怪异的动物是集取多种动物身体的某些部位，组合成一种、独创的、奇异的形体，其造型狰狞恐怖令人畏惧，它是放在墓门两侧，用以驱魔辟邪的陪葬品，其形象给人以凛然不可侵犯之感。

2. 三彩俑

章怀太子李贤墓所出土的三彩文官俑和武官俑最具特色。其造型、高度、色泽完好程度等都堪称唐三彩之冠。武官俑冠上饰有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此鸟叫鹖，即鹖鸡，是一种勇健好斗不俱生死的鸟。因此，这种冠称为鹖冠。相传春秋时孔子的弟子子路曾戴过这种冠。到了唐代，在武士的冠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装饰物，是猛健与常胜将军的标志。文官俑头戴三梁进德冠。三梁进德冠是唐太宗李世民结合进贤冠和幞头亲自创制的，以冠梁数区别等级，

作为礼冠，以赐臣下。一般情况是皇帝七梁，王五梁，三品以上三梁。能享受如此殊荣的文官俑其身份都是非常尊贵的。这两尊三彩文武俑，是唐三彩中的极品，高度均在 1.2 米以上，虽经 1300 多年，出土时色彩艳丽如初，曾多次被国家文物部门选中，在海外展出。

两尊天王俑出土于唐章怀太子墓，通身施绿色彩釉，面部涂白，头戴兜鍪，身穿铠甲，脚穿长靴，身体比例协调，形象生动逼真。兜鍪，武士头上戴的一种盔，古称胄，汉以后称兜鍪。这两尊三彩俑其形象塑造令人赞叹，圆睁的双眼放射着光芒，身体发达的肌肉透着威猛正义的气质。坚实有力的右脚下踩踏一伏卧着的鬼怪，左手叉腰，右手握拳状，而他身体的重心却在右脚上。脚下的鬼怪，尖帽大耳，鼓目咧嘴，作垂死反抗挣扎状。

三彩骑马狩猎俑出土于懿德太子李重润墓中，一个骑在马上的猎手拉弦引弓欲向空中射箭的形象。马驻足静立，猎手左手持弓，右手搭箭，随着猎物在空中的飞移，而转换不同角度，准备随时放箭，千钧一发的瞬间情景定格。此物是所谓绞胎釉色，即在制胎时将釉色加入之后成型，使体表呈现五彩斑斓的艺术效果。

三彩马与三彩牵马胡俑出土于唐章怀太子墓。三彩大马，马身象牙白色，马蹄咖啡色，金鞍绿鞯齐备，马头套及马身均贴黄花，花心绿色点缀其间，马头向左微侧，含首屏气，马尾紧扎翘起，马身、马腿肌腱纹理块状均匀自然清晰分布于身体各部位，膘肥体壮，臀圆腰长，形体高大，造型生动传神。马左前方站立一个牵马胡俑，上着绿色白翻领、束腰、窄袖、齐靴长袍，深深凹陷的眼睛里满含笑意，方圆形脸庞两侧镶嵌着一对深深的酒窝，面部表情十分丰富。头顶的发丝纹理细腻逼真，发辫在两耳上端用红头绳扎紧后绕脑后一圈盘起，头向左微偏，右手呈握缰绳状，与他左前方的三彩马相呼应。



图 45　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唐三彩　（编写组供稿）

三彩牵驼胡俑和三彩载物骆驼出土于唐章怀太子墓，一

匹深赭色的双峰骆驼呈站立姿势，形体高大，姿态劲健，驼头高昂，前伸，尾向左下卷曲，驼身肌健纹理自然清晰，骆峰上驮虎头形囊，囊的旁边有绿白相间的丝线环绕，囊下有棕色架板，釉色从骆驼身上自然流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流釉效果。胡俑头戴赭色尖顶帽，大刀浓眉、鼓目，阔嘴上翘的八字胡须，满脸络腮胡须，典型的西域胡人形象。身穿大翻领紧袖、束腰、褶皱裙，腰下裙摆尖叶瓣装饰，脚着绿色长靴，右手高，左手低，呈握绳状。

3. 三彩器皿

三彩碗：永泰公主墓出土，奢口、圈足。碗内由 24 道绿白相间上有杏红色小点点缀其间的条纹装饰，色彩浓烈艳丽。碗外则由上、中、下三部分组成，除下部圈足外，上中两个部分之间用一条稍突起的线条隔开，中部花纹较繁，上部花纹较窄且疏，碗外部也是绿、白、杏红三色装饰，但用色较清淡。宽窄相间的花纹，繁简有致的纹饰布局，浓淡相宜的色彩构图，使这件器物显得华美高雅。

三彩盘：盘子绿底色，且红白相间，盘内有三叶瓣状白色花纹相错装饰，中间犹如几只红色的金鱼游弋在碧水绿草之间，又像盘内盛着一大朵火红的花一样艳丽夺目。

三彩小酒盅：小酒盅与现代陕西关中地区农村使用的小酒盅几乎一模一样，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象牙白，翠绿釉色自然过渡，交错使用，使其呈现翠玉般温润的质感。

（五）其他收藏

除了石刻、壁画、线刻画、三彩俑等文物之外，乾陵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精美文物，包括金属器物、玉器、陶器等等。

1. 金属器物

金饰品：鎏金小饰品是马身上的装饰物，如杏叶状，古人叫它杏叶，叶瓣上有凸凹有致的叶脉，显得生动、形象、逼真。它们的制作材料、工艺与鎏金门锁相同，做工精细，图案优美，体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金器制作工艺水平。

铜镜：1971 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清理章怀太子墓时，出土的铜镜是墓主人生前使用过的，直径 24.5 厘米，厚 1.5 厘米，重 4.26 公斤。此镜颜色洁白如银，至今仍明亮如新，光可鉴人。其铭文曰：“鉴若止水，光如电耀。仙客来磨，灵妃往照。鸾翔凤舞，龙腾麟跃。写态征神，凝兹巧笑。”这面铜镜不但有富丽典雅的纹饰，还有内涵深邃的铭文，合理的化

学成分配比，精良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达到了唐镜制作的极致，堪称铜镜中的杰作。

铁锁、马镫：铁锁、马镫均严重锈蚀。

2. 玉器、陶器和木器

玉器有玉璜、玉璧、玉佩三种器物类型，根据出土时摆放的位置看，可能是永泰公主身边的陪葬礼器，有玉璜、雕镂螭纹出廊璧、蝙蝠形大玉佩、蝙蝠形小玉佩、走兽游鱼佩等。据专家考证，均为羊脂玉，属汉代传世物，显然是皇家所有，是永泰公主从洛阳迁来陪葬乾陵时她父亲中宗皇帝所赐。

绿釉罐和绿釉瓶：罐和瓶都是釉质明亮、色调纯正的翠绿色，器物上只有一种绿色，即单色釉。

木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的 5 枚用红柳木雕刻的彩绘木俑，头戴帷帽，足蹬朝靴，面部表情生动，服装红蓝色彩绘花纹清晰可见，历经 1300 多年保存如此完整，色彩艳丽，简直是一个奇迹。

绘彩俑：彩绘是陶器制作的另外一种形式，这种工艺早于唐三彩。陶质的猪、牛、羊三牲和犬，是陪葬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侧面反映了唐文化的多样性。

塔式罐：塔与罐的结合体，叫塔式罐，造型非常少见，由基座、中腰部、上圆罐、盖四部分组成。基座上是大象头与佛像相间的浮雕圆形，中部如细腰鼓型，上部是圆形的罐，罐盖把作成七层佛塔形，具有印度佛塔建筑艺术的风格特点。

一组乐俑：有的骑在肥硕的马上，或奏乐，或舞蹈，表现了一个乐队演奏的场面。乐器中有长笛、短笛、埙、排箫。

一匹骆驼和一位牵驼俑，考古专家认为其五官特征很像今天的藏族人。西藏在唐代叫吐蕃国，641 年，唐代的文成公主就嫁给了吐蕃的首位国王松赞干布，从此，藏民族与祖国内地民族联合，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七、保护管理

据《资治通鉴》载：“唐诸陵有署令一人，从五品以上；府二人，吏四人，主衣四人，主笔四人，主药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又有陵会一人，率陵户守卫之。”《后唐修奉天西陵寝诏》记载：“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园有所缺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其时

对乾陵的祀奉、管理，仍因袭唐制。《乾县新志》载“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处，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顷九十八亩六分，分与陵户耕种。不知何年拨二十亩为狄梁公墓地租。余地九顷七十八亩七分。陵户其二十五家，计每年征银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不在正项钱粮内，另文解布政局”。

民国时期，战乱频仍，不仅陵园无人管理，而且陵租地散失殆尽，被陵户自耕。

1956 年 8 月 6 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乾陵为陕西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57 ~ 1959 年，乾县人民委员会多次整修石刻，普查文物，并对乾陵陵区，包括内外城遗址、下宫遗址和 17 座陪葬墓进行勘察。

1960 年乾陵发掘委员会成立，由省政府、省文管会、省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研究室、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北大学、陕西师大、乾县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下设办公室和业务组，有工作人员 10 人。

1961 年 1 月 22 日，乾县人民委员会批准成立乾陵文物管理所，归乾县文教局领导。同年乾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1978 年 6 月，经乾县人民政府批准，乾陵文物管理所改名为乾陵博物馆，归乾县外事办公室领导。

1984 年 10 月，乾陵博物馆馆内机构进行调整，下设群工部、文物保管部、文物陈列部、文物复制部、资料研究室、旅游服务部、保卫科、后勤组、章怀太子墓管理组、懿德太子墓管理组等。

1985 年 3 月，乾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乾陵旅游业开发建设领导小组，下设乾陵开发办公室，负责乾陵的开发和建设。

1987 年 9 月，乾县文物旅游局成立，负责管理全县文物旅游事业。

1990 年 2 月，文物旅游局停止办公，工作移交县政府办公室代管。

1992 年 6 月，乾县乾陵文物保护旅游开发委员会成立，常设办事机构为乾陵开发办公室，下设工程组和外联组。8 月 24 日，县编委批准成立乾县乾陵旅游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和乾县乾陵文物保护委员会，一套人员，两个牌子，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1993 年 12 月，乾县文物旅游局重新开始对外办公，与乾陵开发办合并，下设办公室、工

程组、文物组和旅游组。

2000 年初开始，乾陵景区先后开展了乾陵地面建筑与遗址现状调查、乾陵陪葬墓现存情况调查、乾陵永泰章怀懿德三墓现存原始及复制壁画保存现状调查，为科学保护这些文化遗存提供了依据。先后完成了陵园东西乳峰阙楼遗址、南门外东西阙楼遗址和永泰公主墓前东西阙楼遗址保护工程，解决了长期以来因自然雨水冲刷和风化对土质遗址的破坏。与陕西省档案保护科学研究所合作，用先进的古代彩绘壁画颜料恢复保护剂对严重褪色的30件彩绘陶俑、陶器和永泰公主墓墓道现存部分原始壁画进行了保护性试验，制订了《乾陵永泰章怀懿德三墓现存部分原始及复制壁画保护方案》。与日本“平山郁夫保护振兴基金会”合作，对乾陵的大型石刻第一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了保护。



图 46　保护过的乾陵石人同未保护石人对比图　（编写组供稿）

2013 年，由陕西省文物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编制的《乾陵保护总体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准。这一规划将推动乾陵的考古调查、勘探与保护利用工作更加有序开展。乾陵保护总体规划，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实施，对乾陵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永续传承将起到指导性和强制性的作用。规划主要内容包括考古与保护项目、遗址展示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环境整治和绿化项目等。在整体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可以发挥乾陵的社会教育功能，并成为陕西区域旅游亮点。

乾陵的规划范围是以乾陵为中心，将环陵路以北两公里以南，西平铁路以北、福银高速公路以西、漠谷河以东区域纳入规划红线，规划总面积约 66 平方公里。未来建设“乾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乾陵、靖陵为重点，辐射乾陵 17 座陪葬墓群，展示唐代盛世帝王和衰落帝王不同的墓葬格局，以及唐代帝王陵墓、陪葬墓群的宏大气势。各陵墓之间通过建设独具特色的生态景观走廊，使游客观其陵、闻其事、赏其景，真正受到知识的陶冶、心灵的震撼。

第四节　唐中宗定陵

一、墓主生平

李显（656 ~ 710），原名李哲，唐朝第四位皇帝，唐高宗李治第七子，武则天第三子。683 年至 684 年、705 年至 710 年两度在位。

显庆元年（656）十一月五日生于长安。初封周王，仪凤二年（677）十月三日徙封英王，永隆元年（680）八月二十三日册封为皇太子。宏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唐高宗病逝，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悉听天后处分”[①]。十二月六日，李显即位，次年改元嗣圣，是为中宗。

中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他在即位之后不能根据高宗新丧、天下多事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而是在皇后韦氏的操纵之下，千方百计地为韦氏家族牟取利益，甚至不顾朝臣的反对，



图 47　定陵陵山和南神门石狮　（摄影：郑茂良）

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下》，第 112 页。

要将韦后的父亲提拔为宰相。这些做法引起了武则天的不满，旋即被废为庐陵王，逐出长安，先软禁于均州，后安置于房州。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晚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颇为犹豫，最后决定召回李显，于圣历元年（698）九月十五日，册封为皇太子。圣历二年（699）腊月二十五日赐姓武氏。

李显于神龙元年（705）正月在“五王之变”后复位。但复位之后，不听臣下劝阻，不但追封韦皇后的父亲为王，而且让韦后参与朝政。韦后及其幼女安乐公主均有政治野心，景龙四年（710）六月二十二日中宗被二人合谋毒死，享年 55 岁，谥孝和皇帝，景云元年（710）十一月二日葬于定陵。唐玄宗天宝八载（749）追尊为孝和大圣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加尊为孝和大圣大昭孝皇帝。

二、营建始末

定陵位于今渭南市富平县北 10 公里处的凤凰山，主峰海拔 751 米，定陵即修于主峰之上，封域 40 里。

《旧唐书》卷七载：景云元年（710）“秋七月……甲子，右仆射许国公苏瓌、兵部尚书姚元之、吏部尚书宋璟、右常侍判刑部尚书岑羲并充使册定陵。”定陵陵园基本为方形，东西 1250 米，南北 1180 米。其玄宫位于凤凰山南腰腹中。城垣东西南北四边正中有四神门，门前有阙，城垣四角有楼。城垣中有献殿、下宫等建筑。《长安志》卷一九载：定陵“封内四十里，下宫去陵五里”。

定陵陪葬者各书记载不一，主要有和思皇后赵氏、节愍太子、宜城公主、长宁公主、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寿公主及驸马王同皎等。在这些陪葬墓中，唯节愍太子墓的位置得到确定。

节愍太子李重俊（？～707），唐中宗第三子。神龙二年（706）被立为皇太子，因非皇后韦氏所生，立为太子后颇受猜忌。安乐公主想当皇太女，视李重俊为眼中钉，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神龙三年（707）七月，李重俊率李多祚、李承况、独孤祎之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党羽十余人。又派李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亲率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欲杀韦皇后等。结果被阻于玄武门之外，士兵临阵倒戈，斩李多祚及李承况等于楼下，余党溃散。政变失败后，李重俊奔匿终南山，终为左右所杀。睿宗即位后，追赠为节愍太子，陪葬定陵。其墓位于富平县宫里乡南陵村北，1992 年被公布为第三批陕西



图 48　节愍太子墓　　（摄影：郑茂良）

省文物保护单位。1995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该墓进行了发掘清理。探明陵园东西 120 米，南北 150 米。每边中部有门阙一对，面积 10 米 ×10 米，四个角阙由夯筑城墙相连，宽 2 ~ 2.5 米，南门阙前有司马道，宽约 20 米，司马道两侧原有大量石刻，今仅存石人一尊，石蹲狮一座。墓冢为夯筑覆斗形，夯土层厚 12 ~ 15 厘米，封土底部边长 37 米，高 20 余米。地下部分由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壁龛、墓室等六部分组成，全长 54.25 米。在壁龛、天井、过洞、 甬道、墓室出土大量的文物，有彩绘陶俑、白瓷、哀册、玉璧等文物 200 余件。墓室中还有大量壁画，内容涉及山水、列戟、仕女、官吏、瑞禽、屏风等，对研究唐代礼制制度，工艺绘画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陵墓演变

定陵在唐代曾遭受过两次破坏。一次是在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十二月乙卯夜，寝殿发生火灾[①]。另一次是在代宗永泰元年（765）二月戊寅，寝殿被党项羌所焚[②]。德宗贞元十四

① 《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第 177 页。

② 《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第 278 页。

年(798)四月至六月，左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奉诏对定陵进行维修，建屋三百八十间[①]。此外，还遭受过自然的破坏。《旧唐书》卷三十七载："大和八年(834)…… 七月辛酉，定陵台大风雨，震，东廊之下地裂一百三十尺，其深五尺。诏宗正卿李仍叔启告修之。"后梁开平二年(908)，温韬盗掘定陵。宋太祖于建隆二年(961)、开宝三年(970)两次下诏对定陵等被盗陵墓进行修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定陵又受到太监梁永等人的盗掘。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8)，陕西巡抚毕沅在定陵立碑予以保护。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世纪40年代，王子云曾率西北艺术考察团在定陵写生。80年代，贺梓城、刘庆柱、李毓芳等对定陵进行过调查。

研究成果：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

姜捷：《关于定陵陵制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1期。

王小蒙、刘呆运：《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4期。

五、遗迹与遗存

(一)遗迹

定陵地面建筑损坏已久，现在所能看到的遗迹主要有乳台、鹊台基址和四门基址。

1. 乳台和鹊台遗址

鹊台在南门外2863米处。现存东西二阙，相间约180米。东阙底长15米，宽11米，高4米；西阙底长15米，宽10米，高5米。

乳阙在南门外623米处，东西二阙间距为175米。东阙底长14米，宽12米，高6米；西阙现今已被平毁，据资料记载底长15米，宽11米，高7米。

乳台和鹊台均为夯筑，夯层在9厘米左右，周边有残砖断瓦堆积。

2. 四门阙台遗址

南神门阙台遗址在南门外23米处。东西二阙相间78米。东阙底长13米，宽8米，高5米；

① 《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第387页。

西阙底长 14 米，宽 7 米，高 5 米。

东神门阙台遗址在东门址外 34 米处。南北二阙相间约 70 米。南阙底残长 14 米，宽 8 米，高 4 米；北阙底长 12 米，宽 10 米，高 5 米。

北神门阙址在北门外 37 米处。现今实地只存西阙，东阙不存，西阙底长 18 米，宽 12 米，高 5 米。

西神门阙址在东门外 24 米处，南北二阙相距约 60 米。北阙底长 12 米，宽约 8 米，残高 4 米；南阙底长 14 米，宽 7 米，残高 3.5 米。

四边门阙均为夯筑，夯层厚度在 7 至 19 厘米之间，各阙台周边均有砖瓦残片。

（二）遗存

定陵遗存主要是陵园中石刻和陪葬墓中出土的文物。

1. 四门石狮

在陵园四门之外，原有石狮四对。现今东门、南门、北门外各存石狮 1 蹲，其余石狮均已残毁。实测各门石狮相距 27 米至 30 米不等，与门址的距离在 4 至 10 米之间。石狮的高度为 2.4 米，均作蹲踞之状。



图 49　定陵北神门石狮　　（摄影：郑茂良）

2. 神道石刻

除门狮之外，在南神道两侧，还有石人、石马等大型雕刻。20 世纪 60 年代，尚有石柱、翼马、仗马、石人及巨型无字碑等石刻 25 件。惜这些石刻在“文革”中多已被毁。今仅存石人一对。石



图 50　定陵神道西侧新出土的石人　　（摄影：郑茂良）

人东西相距 90 米，距南门约 300 米，通高 2.9 米，戴鹖冠，穿长袍，双手拄剑，其身躯半埋土中。近年来，考古部门在神道西侧、原有石人北侧发掘出土石人两尊，已在原位扶正。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定陵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东至北陵村、西至才窑村、南至三凤村、北至大郎沟村；一般保护区为重点保护区外延 20 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30 米内。

2001 年 6 月，定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定陵保护范围主要包括陵山凤凰山以及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外延 200 米。

第五节　唐睿宗桥陵

一、墓主生平

李旦（662 ~ 716），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小儿子，初名李旭轮、李轮。龙朔二年（662）六月一日生于蓬莱阁之含凉殿。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封殷王。乾封元年（666）七月徙封豫王，总章二年（669）又徙冀王。上元三年（762）再封为相王。永隆二年（681）又封为豫王，改名为旦。

嗣圣元年（684）中宗被废后，李旦即位，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实际上大权掌握在武则天手中，他本人则“居之于别殿”[①]。天授元年（690）武则天改朝换代，他被降为皇嗣，赐姓武氏，仍旧名轮。圣历元年（698），武则天改立李显为皇太子，另立李旦为相王。神龙二年（702）中宗即位时，欲封他为皇太弟，他坚辞不就。十月十四日，改封为安国相王。唐隆元年（710）中宗被毒死后，其子李隆基发动羽林军冲入宫中，杀死韦后及安乐公主，与太平公主拥立他当皇帝。睿宗即位于承天门楼，改年号为景云，时年 49 岁。



图 51　唐桥陵全景　（蒲城县人民政府供稿）

① 《旧唐书》卷七《睿宗纪》，第 152 页。

唐睿宗二次登基后，立李隆基为皇太子，而让太平公主参与朝政，这加剧了皇太子与太平公主之间的矛盾，出现了政出多门、号令不一的情况。延和元年（712），唐睿宗禅位于皇太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开元四年（716），死于长安城之百福殿，享年55岁。是年十月，葬于桥陵，庙号睿宗，谥作大圣真皇帝。同时改蒲城县为奉先县，以奉睿宗陵寝。天宝八载（749），增谥为玄真大圣皇帝。天宝十三载（754），又增谥为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

二、营建始末

桥陵位于渭南市蒲城县西北15公里的丰山之上。丰山为蒲城名山[①]，海拔743米，与秦岭遥相呼应。其主峰西面有三山起伏，北面也是崇山峻岭，唯东南面地势较为平缓。因桥陵修建于“开元盛世”期间，故制度严谨、规模宏大、气度非凡。

桥陵营建始于开元四年（716）六月，由将作少监李商隐负责，由御史大夫李杰护作。《新唐书》卷一百三十《李商隐传》：“商隐以将作少监营桥陵，封高邑县南。”同书卷一百二十八《李杰传》载：李杰“以护作桥陵，封武威县子。”当时唐王朝已进入全盛时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大，有能力修建规模宏丽的陵园。所以尽管唐睿宗在遗诏中强调说：“厚葬伤生，可以深诫。其丧纪及山陵制度，一依汉制故事。”[②]但唐玄宗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给睿宗修建了庞大的陵寝。

桥陵因山而筑，封域40里，在山腹开凿地宫，并在四周建造城阙。史载陵园地面城垣因山势而筑，略呈正方形，唯东北部突出，不甚规则。四边各置一门，东神门与西神门基本相对，南神门居中，而北神门位于北墙偏西处。陵园中有献殿、寝殿、下宫等大型建筑，以及数十件高大的石刻，还有不少陪葬墓。占地二十九顷九十亩四分。陵园四角阙址尚在。在南神门东阙址、东神门南阙址和乳台西阙址的基部均发现有条状基石，其大小、形制相近。神道长625米，宽110米，两侧列有高大的石刻。

桥陵陪葬墓《唐会要》及《长安志》所载计有8座，即惠宣太子李业墓、惠庄太子李撝墓、惠文太子李范墓、金仙公主墓、凉国公主墓、代国公主墓、鄫国公主墓及云麾将军李思训墓。《文献通考》所载为9座，《关中陵墓志》所载为12座，《蒲城县志》所载为13座。现在可

① 《大明一统志》卷三二《陕西布政司》，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57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十二《睿宗遗诏》，第73页。

以确定位置的陪葬墓有让皇帝李宪墓、惠庄太子墓、王贤妃墓、金仙公主墓和李思训墓。

三、陵墓演变

桥陵在唐代得到很好的保护。《通典》卷第五十二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四月敕：“献昭乾定桥恭六陵，朔望上食，岁冬至寒食日，各设一祭，如节祭共，朔望日相逢，依节祭料。桥陵除此日外，仍每日进半口羊食。”大诗人杜甫在《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中写道：“先帝昔晏驾，兹山朝百灵。崇冈拥象设，沃野开天庭。即事壮重险，论功超五丁。陂陀因厚地，却略罗峻屏。云阙虚冉冉，风松肃泠泠。石门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宫女晚知曙，祠官朝见星。空梁簇画戟，阴井敲铜瓶……”于此可见唐时桥陵的盛况。据《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崔损在维护唐八陵时，曾为桥陵增筑屋舍 140 间。陵园中设有陵台令等官员，专门管理陵园事务，又置陵户 400 以供奉陵寝。



图 52　清代毕沅所立“唐睿宗桥陵”碑　（摄影：郑茂良）

唐朝灭亡后，桥陵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陵园建筑逐渐损毁。但在五代时期兴起的盗墓风潮中，桥陵未受到影响。清张心镜《蒲城县志》卷二《陵墓》条载：乾隆四十年（1775），知县冯方业在桥陵、泰陵、景陵、光陵各筑周围墙垣，通长一百丈。高六尺，厚三尺，前后门二。每陵各设守陵户十名。毕沅抚陕时，也对桥陵采取保护措施。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一）考古调查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考察桥陵。40 年代，王子云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桥陵，并制作桥陵鸵鸟浮雕翻制品一件。1963 年 4 ~ 11 月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蒲城县境

内的睿宗桥陵、玄宗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 4 座唐陵进行了勘查[①]。其中重点勘查保存较好的桥陵，试掘了墓道，探查了陵墙，实测并绘制了桥陵的平面图，记录了石刻的情况。为了解墓道的结构，在墓道上开了两条东西向的探沟。经试掘，约略推知墓道的结构和封固情况。1980 年发表的《唐桥陵勘察记》[②]介绍了调查和试掘情况，并公布了桥陵平面实测图。

1973 ~ 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关中唐十八陵进行了为期 6 年的实地调查，并发表调查报告。其中对桥陵有多篇介绍[③]。1993 年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德国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合作调查了蒲城县境内的桥陵、景陵、光陵、泰陵 4 座唐代帝陵，其中《唐睿宗桥陵》报告于 2002 年在德国出版，报告中公布了桥陵陵园遗址、陵园石刻调查的结果，尤其对陵园石刻做了详细描述[④]。1995 ~ 1996 年、2000 ~ 2001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先后对陪葬桥陵的惠庄太子墓和让皇帝李宪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出版了发掘报告[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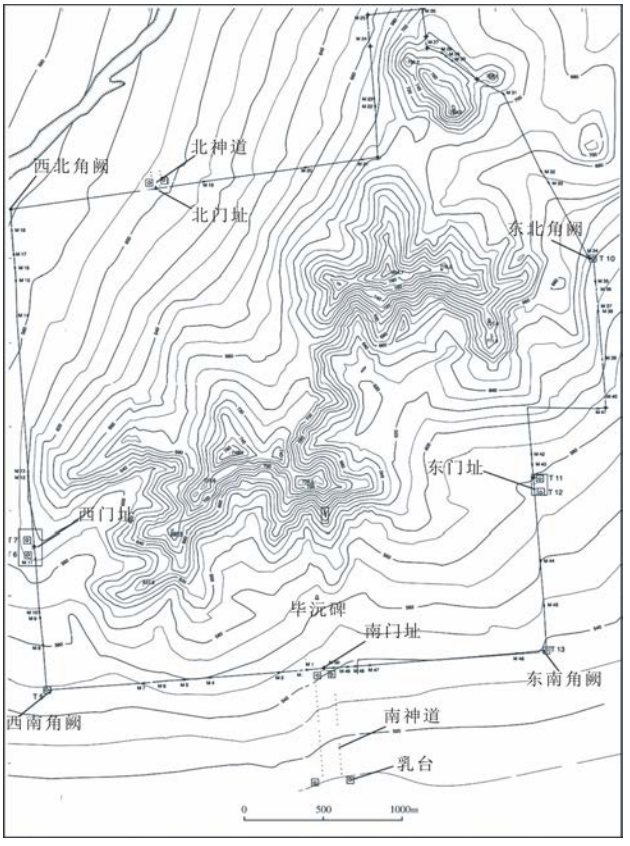


图 53　桥陵城垣走向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

从 2007 ~ 2009 年，陕西省考古

① 雒忠如等：《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 年第 1 期。

②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4 期。

③ 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16 ~ 263 页。

④ 美茵兹罗马—日耳曼中央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睿宗桥陵》，达尔马斯德特，2002 年。

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 年。

研究院对陵园进行了全面勘探，探明了陵园的四门门址及门阙基址、四角阙基址、乳台基址、鹊台基址的平面形状及结构，陵园城垣走向及基础结构得以确定，探出布局极为完整的下宫宫城遗址，明确了陪葬墓区及每一座陪葬墓的墓园形制。2008 年对南门门址、南门外西侧阙址、蕃酋殿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虽然遗址破坏严重，残存的夯土基址和柱础石仍可看出是殿堂式建筑。门阙为三出阙，结构与乾陵南门阙相同。蕃酋殿建筑平面为曲尺形，从南门向南 660 米的神道南端现存乳台阙址，阙址东西 29 ~ 28.6 米，南北 16 ~ 16.5 米，两阙台间距 180 米；从乳台阙址向南 2700 米残存鹊台阙址，据 1993 年钻探，两阙台间距 193 米。

桥陵因山为陵，由陵园、神道、下宫、陵园石刻组成。陵园平面大部分呈方形，只有西北部因山势向外突出，几经曲折形成不甚规则的多边形。范围包括整个丰山和尖山、赵家山两个小山。陵园的墙垣环绕山麓建造，个别部分越山跨沟，南墙和西墙均为直线，分别长 2820 米、2813 米；东墙在东门以北向东折，继而北折，与东北角阙相接，全长 2655 米；北墙在东半部先向北折，继而东折，然后向南、东南两次转折，与东北角阙相接，全长 4944 米。陵园四角各有角阙，四面设门，门外 1 对门阙。

1.“让皇帝”李宪墓

让皇帝李宪（679 ~ 742），原名成器。睿宗李旦长子，母为肃明刘皇后。能诗歌，通晓音律，尤善吹笛。本为太子，后让与其弟李隆基。历任太子太师、太尉，封宁王。恭谨自守，不妄交结，不预朝政，为玄宗所重。开元二十九年（742）冬，李宪病死，享年 63 岁。玄宗追谥他为“让皇帝”，陪葬桥陵，称墓为惠陵，老百姓则称之为“让冢”。



图 54　桥陵陪葬墓之让皇帝惠陵　（摄影：郑茂良）

惠陵位于蒲城县西北 4 公里的三合村东北。《长安志》记载：陵“在县西北一十里封阳乡胡村。封内十一里。陪葬诸王三（郑王筠、嗣宁王琳、同安王珣），公主三（蔡国、代国、

霍国）”[①]。封土呈圆锥形，底部约 30 米见方，高约 14 米。墓前原有石柱、石人、石马等，现在仅存石碑一通，石人、石狮各一对。2000 年，考古工作者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出土各种文物 860 余件。

2. 惠庄太子李撝墓

惠庄太子李撝又名李成义，睿宗第二子，母亲为掖庭宫人柳氏。垂拱三年（687），封恒王。武则天临朝时，改封为衡阳郡王。长安年间，官居尚衣奉御。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复位，加赐实封二百户。唐睿宗复位，进封申王，先后担任右卫大将军、殿中监、光禄卿、右金吾卫大将军、行司徒兼益州大都督等职。玄宗开元二年（714），任司徒兼幽州刺史。避讳昭成皇后谥号，改名李撝。历任邓、虢、绛三州刺史。后复为司徒。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廿五日病逝，赠惠庄太子，陪葬桥陵。其墓在蒲城县坡头乡桥陵村东，西北距桥陵约 3000 米。地面仅存封土及石狮一对。封土呈覆斗形，底边长 32 米，高 7.5 米。墓室多次被盗。1995 年 10 月至 1996 年 5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蒲城县文体广电局组织专家对此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发掘资料显示，此墓由斜坡墓道、3 个过洞、3 个天井、6 个壁龛、甬道及穹隆墓室组成，全长 53 米。出土陶、铜、玉、石等各种质料文物 1300 余件。陶俑最多，达 1100 余件。其中骑马俑 507 件，男立俑 563 件，女立俑 18 件，镇墓兽两件，陶猪、陶牛、陶鸡、陶狗、陶羊、鹦鹉等 13 件。其次是铜质类门饰。玉质类主要是汉白玉哀册。石质类则主要是石门及其附件。此外，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和墓室中均绘有壁画，惜多已脱落。但第一过洞两侧的文吏图，第二过洞两壁的列戟图及墓道两侧的车骑出行图保存较好。

3. 金仙公主墓

金仙公主（689 ~ 732），讳无上道，睿宗第九女。初封西城县主，进封金仙公主。神龙二年（706）度为女道士，师从道士史崇玄和叶法善。开元二十四年（736）病逝，陪葬桥陵。其墓在蒲城县三合乡之武家屯村。封土原为覆斗形，后被剥平。墓前有石羊及神道碑。其碑由徐峤撰文，玄宗书丹，颇为名贵。1974 至 1975 年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及蒲城县文化局对此墓进行了发掘。发掘显示墓为斜坡墓道，有 5 个天井、6 个小龛及前后两个墓室。出土“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之铭”一方，书丹者为其胞妹玉真公主。还出土武士俑、天王俑、乐伎俑、

① （宋）宋敏求撰，辛德勇、郎洁点校：《长安志》卷十一《蒲城》，三秦出版社，2013 年，第 549 页。

胡俑、生肖俑等文物，藏蒲城县博物馆。

研究成果

学术界对桥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种：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 年。

高起胜：《桥陵石雕》，《美术》，1989 年第 9 期。

马文良：《桥陵奇碑》，《渭南师专学报》，1993 年第 3 期。

沈睿文：《桥陵陪葬墓地研究》，《文博》，2000 年第 5 期。

孙怀彦、李百福：《唐桥陵陪葬墓睿宗贤妃王芳媚墓志考略》，《考古与文物》，2003 年第 3 期。

王士立：《唐桥陵獬豸石刻造像初探》，《大舞台》，2010 年第 11 期。

张建林、张博等：《唐睿宗桥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1 期。

潘虹：《唐桥陵石刻现状调研及保护措施》，《牡丹江大学学报》，2014 年第 7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 年第 2 期。

五、遗迹与遗存

桥陵陵园城墙遗迹依稀可辨，墙垣残高 1 米，宽 2.8 至 3 米。四面门外阙台遗址及角楼遗址均较清晰。

东神门阙台遗址西距东门 47 米，南北二阙相间 97 米。南阙址底径 14 米，高约 5 米；北阙址长 14 米，宽 7 米，高 5 米。台基有条状基石，附近散布砖瓦残片。

西神门阙台在西门外 44 米处，南北二阙间距 87 米。南阙底长 11 米，宽 7 米，顶部长 8 米，宽 3 米，残高约 2 米；北阙址底长 17 米，宽 11 米，顶长 7 米，宽 3 米，高约 3 米。附近有瓦砾。

南神门阙台在南门外 25 米处，东西二阙相距 64 米。东阙址底长 25 米，宽 19 米，高 3 米；西阙址底长 12 米，宽 10 米，高 2.5 米。基部有条状石块，地表有砖瓦残片。

北神门阙台遗址在北外 38 米处，东西二阙相距 97 米。东阙址底长 7 米，宽 4 米，高 3 米；

西阙台底径 14 米，高 4 米。地表也有砖瓦残片。

桥陵玄宫凿于山腹，考古探测羡道全长 70 米，宽 3.78 米，由南向北以石条叠砌封固，石条大小不一，以千字文编序，推测石条总数约 3900 块。石条上下铺有 0.1 米厚的黄土，以石灰灌缝。因埏道无扰动痕迹，故推测桥陵玄宫未曾被盗。



图 55　桥陵东神门南侧“回头望”石狮　（摄影：郑茂良）

桥陵乳台北距南门门址 641 米，现存东西二阙址相间 180 米。东阙址底长 21 米，宽 18 米，高约 5 米。西阙址底长 20 米，残宽 8 米，高约 5 米。基部有条状基石，其长度在 1.2 米，宽 0.7 米，厚 0.32 米左右。

桥陵石刻自南而北计有石柱一对，獬豸一对，鸵鸟一对，石马五对，石人十对。这些石刻大部分完整地保存下来。

现存石柱通高 8.64 米，由座、身、顶三部分组成。座为方形，上雕覆莲 12 瓣。柱身八棱形，线雕缠枝卷叶纹及各种祥禽、瑞兽图案。柱顶为仰莲承桃。

獬豸身高约 3 米，体形硕壮，怒目露齿，身有双翼，保存完好。

鸵鸟位于獬豸北 28 米，身高 1.9 米、长约两米，回首贴附于翅外下部，两腿行进于山间，身上毛羽较细密。其构图虽较乾陵祥鸟美观，但似无脱



图 56　桥陵东列石柱　（编写组供稿）

凡超俗的气势。以后诸陵祥鸟大体上都采用了这样的模式，但造型不同，神态各异。

桥陵五对仗马大小基本相近，马体肥美，唯马饰有所不同。石马身高 1.7 ~ 2 米，身长 2.3 ~ 2.6 米，均立于石台之上，形态不一，栩栩如生，东列仗马鞅鞦所系饰物，除南数第三仗马为珂形装饰外，其余均为唐代流行的杏叶，叶中实以宝相花。南数第三个仗马有圆形马镫，鞍鞯侧系五鞘孔绦带，鞍后马背之上置火珠，形如覆莲盆，直径约 20 厘米。其他仗马未置马蹬。西列南数第四仗马，马头转向北（左），马栽短鬃，前有攀胸，系挂杏叶，但后无鞯，有鞍，无镫；南数第三、第五匹仗马均披鬃，鞅鞦俱全，鞍鞯齐备，其侧均有五鞘孔绦带，除南数第三匹仗马的鞅鞦系挂珂饰外，其余仗马均无马镫。桥陵北门外仗马共三对，除西列南数第一仗马为缚尾外，其余仗马的形制、大小均与神道仗马无异。

石人身高 3.67 米至 4.28 米不等，头戴鹖冠，中饰飞鹰，褒衣博带，足蹬高头履，双手柱剑，面部表情，庄严肃穆。其体型之高大，为诸唐陵之冠。

此外，桥陵四门外均有石狮。石狮呈蹲踞状，雌雄分明，张目露齿，挺胸昂首，形态各异，镌刻细腻，肌肤丰满，造型雄伟，高达 2.8 米，堪称石刻艺术的珍品。东神门外石狮蹲坐回首，为唐陵石刻所罕见，其他各门石狮也均保存完整。由于桥陵是在开元年间修建的，因之石刻高大宏伟充分显露出充实、富丽、博大、雄浑的盛唐景象。桥陵陵园石刻较之乾陵，个别石刻体量稍大了些，獬豸代替了翼马，石人装束有了些变化。桥陵石刻气势雄伟，雕刻手法细腻，有“唐代石刻艺术之冠”的美誉。之所以如此，除了当时的国力、财力及审美观念等因素外，还寄托着李隆基对其父的感念之情。



图 57　桥陵神道东列瑞兽　　（编写组供稿）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桥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80 年成立桥陵文管所，专司保护管理。

1988 年 1 月，桥陵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范围为丰山主峰周围 300 米；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西各至石狮外 200 米，北至北神门石马北 200 米，南至坡蟠公路南 200 米。

2010 年 9 月，桥陵南门遗址保护、展示工程正式开工，属桥陵二期保护工程一部分，主要内容为复原、展示遗址原貌。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保护范围划分为 13 个独立保护区，包含陵山、丰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鹊台等遗址以及 12 座陪葬墓；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六节　唐玄宗泰陵

一、墓主生平

李隆基（685 ~ 762），唐睿宗第三子，母为昭成顺圣皇后窦氏。垂拱元年（685）八月五日生于东都洛阳。永昌年间（689）过继给李旦的长兄孝敬皇帝李弘为嗣，初封临淄王，后改封楚王兼任潞州别驾。唐隆元年（710）六月庚子日，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先天元年（712）李旦禅位，李隆基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天宝十五年（756）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尊其为太上皇。宝应元年（762）病逝，终年78岁，葬于泰陵。庙号玄宗，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清朝为避讳康熙帝之名玄烨，多称其为唐明皇。



图58　整修一新的泰陵神道　（摄影：郑茂良）

唐玄宗在位早期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他先后在宰相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的协助下，针对中宗、睿宗时的弊政，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裁汰冗官、擢拔贤才、打击豪强、抵制食封、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压抑佛教、禁造佛寺。使唐朝社会经济发展到高峰，成为

唐代最繁盛时期，史家誉之为“开元盛世”。当时的大唐“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也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①]。另外学校教育盛况空前、科学文化蓬勃发展、疆域辽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但唐玄宗在取得了这些成就之后，就逐渐失去了进取精神，在奸相李林甫的引诱和蒙骗之下，拒谏饰非，重用小人，使朝纲开始出现紊乱现象。在他 61 岁开始宠爱杨贵妃，于是杨家亲族依靠裙带关系连类而升，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在李林甫死后任宰相之职，更是权倾内外。加之府兵制破坏之后，军事上逐渐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形势。天宝十四年（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公然发动叛乱。次年六月，叛军西犯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发生兵变，杨国忠和杨贵妃被杀，唐玄宗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后来唐玄宗逃到了四川，而太子李亨北上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肃宗至德二年（757），唐玄宗回到长安，先后幽居兴庆宫和太极宫，数年后抑郁而死。

二、营建始末

泰陵在蒲城县东北 15 公里的金粟山，西南距西安市约 125 公里，是关中十八陵中最东边的一座陵墓。金粟山因山上“有碎石若金粟”而得名，是五龙山的支脉，海拔 852 米，山势突兀，与西岳华山遥遥相望。泰陵因金粟山主峰而筑，前有东西二峰环拱，封域 76 里。

《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载，开元十七年（729），唐玄宗至奉先县拜谒桥陵，见金粟山有龙盘凤翥之势，又靠近他父亲的陵寝，便对侍臣说：“吾千秋后宜葬此地，得奉先陵，不忘孝敬矣。”《唐会要》卷二十、《大唐新语》卷十等也有类似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金粟山是唐玄宗生前就选定的万年吉地。

泰陵的陵园规模较大，平面布局严整，墙垣四面各开一门，城内有献殿及其他建筑。神道两侧布列象生卤簿，陵园内广植松柏，与城阙浑然一体。

唐玄宗病逝之后，肃宗病情加重，十几天以后也病故。所以玄宗的陵墓实际上是由唐代宗主持修建的，代宗按照玄宗生前的愿望，在金粟山上修建了陵寝，于广德元年（763）三月十八日葬唐玄宗于泰陵。

泰陵陪葬墓据《唐会要》《长安志》《文献通考》及《关中陵墓志》记载只有一个，即

① 《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

赠扬州大都督高力士。另据《新唐书》记载，还有元献皇后葬泰陵。

三、陵墓演变

唐代在泰陵设陵署进行管理。有陵台令、主文、主乐、主辇、典事等职官，并有陵户数百。德宗贞元年间，曾在泰陵建屋 380 间。唐亡后泰陵陵园建筑荒废毁损。北宋初，宋太祖曾下令修葺泰陵。开宝六年（973）所立“大宋新修唐玄宗皇帝庙碑”云：“圣朝乾德四年，敕置守陵人户，建庙于旧陵之侧。内降礼衣一幅，常服一袭之。”清乾隆四十年（1775）陕西巡抚毕沅立“唐元宗泰陵”碑（“元”即“玄”，避康熙讳），并加以保护。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曾制作泰陵翼马石刻拓片二份、泰陵实景写生一幅。80 年代，贺梓城、刘庆柱、张建林等人曾对泰陵进行过调查。

199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渭南地区文管会对高力士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高力士（684 ~ 762），本名冯元一，祖籍潘州（今广东省高州市），幼年入宫，由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遂改名高力士。曾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故深得玄宗宠信，累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被誉为“千古贤宦第一人”。其墓位于渭南市蒲城县山西村，由斜坡墓道、4 个天井、4 个过洞、6 个小龛、甬道和墓室组成，全长约 41 米。墓室为四角攒尖砖室墓，边长 4.2 米，高 5.6 米。室内西侧有石棺床，平面由 11 块石板拼成，长 4.2 米，宽 2.4 米。因经多次盗掘，墓室破坏严重。出土各类陶俑 222 件，以及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 20 余枚。墓中有长方形墓志一合，盖顶篆书“唐故开府仪同三司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墓志”。墓中有壁画，但保存状况差[①]。省文物局、渭南市计划部门于 2004 年审批通过并立项，建高力士墓博物馆。

2008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泰陵陵园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和调查，陵园的范围、城垣的走势、遗迹的分布情况已经基本清楚。平面形状大致呈五边形，城垣四面都有门，南门和北门之间距离 1134 米，东门和西门之间的距离 1169 米。南门和北门外有神道，南门神道长 472 米，神道两侧列置石刻。通过调查还在陵山以东 3 公里姬家沟发现了一处泰陵石刻的石料开采场[②]。

---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②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2006 ~ 2010 年），三秦出版社，2012 年。



图 59　2013 年 4 月拍摄的高力士墓　（摄影：郑茂良）

研究成果：

马文良：《生为君臣死为邻——高力士陪葬泰陵之谜》，《文史杂志》，1989 年第 5 期。

马文良：《唐玄宗泰陵的石雕》，《文博》，1991 年第 4 期。

马文良：《风流天子今安在——漫话唐明皇及其泰陵》，《渭南师专学报》，1998 年第 4 期。

孙常吉：《浅析唐泰陵石刻翼马的造型艺术》，《当代艺术》，2008 年第 1 期。

郑薇：《试论泰陵雕塑中的线和线条感》，《大众文艺》，2011 年第 9 期。

张建林、张博等：《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3 期。

邢福来、李明：《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牛致功：《有关高力士的几个问题——读高力士的神道碑及墓志铭》，《史学月刊》，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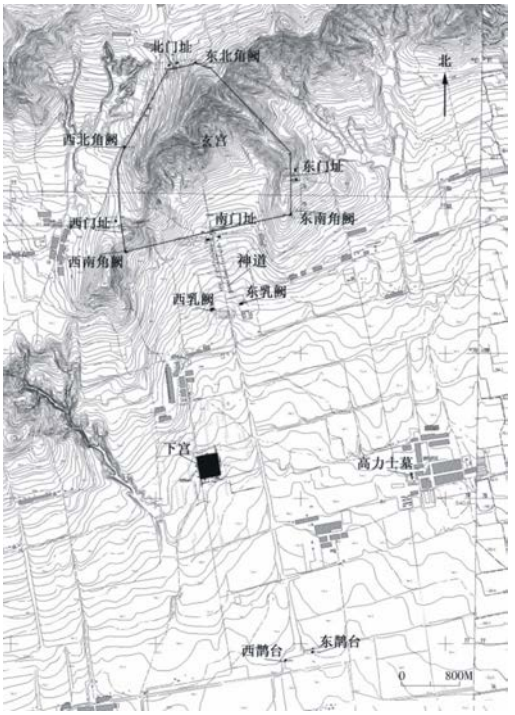


图 60　泰陵陵园平面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3 期）

年第 4 期。

王连龙：《高力士墓志研究补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7 年第 5 期。

黄日初：《高力士研究四题——以高力士及其后嗣的碑志为中心》，《浙江社会科学》2008 年第 8 期。

五、遗迹与遗存

泰陵四门外有双阙，门与阙的距离在 29 米至 39 米之间，两阙间的距离最近 44 米，最远 70 米。

南神门北 20 米为献殿遗址，东西 120、南北 80 米。遗址范围内地面遍布唐代残砖碎瓦。

下宫去陵五里。遗址在泰陵南 2250 米的敬母山村南，遗址范围东西 250 米，南北 200 米。遗址南有“大宋新修唐玄宗皇帝庙碑”。

陵园遗址内殿宇建筑已荡然无存，石刻多被破坏，仅存三四十件。

泰陵门狮与桥陵基本相同，但体形变小。神道也比较宽，石刻由南向北为石柱、翼马和鸵鸟各一对，仗马五对，石人十对。北门外仗马与乾陵、桥陵相同，只是造型有一定的变化。

石柱原本东残西毁，仅存上部，现已修复。从残存部分来看，其形制与桥陵石柱基本相同，只是泰陵其他石刻均小于桥陵石刻，故石柱肯定也比桥陵石柱要小。

翼马位于石柱北 20 米处，披长鬃，两胁浮雕出翼翅，翅作三长翎，后腿上部线刻流云纹，腹下与座连为实体，尾巴下垂，与石座相连，兽体左、右、前三面均有流云纹浅浮雕。东列者头顶有独角，颈部微缩，马身后倾，作欲奔之势；西列者头顶独角微小，前后腿直立，前腹下沉，躯身肥硕，作侍立之状。从雕刻艺术方面来看，泰陵翼马不象乾陵翼马那样夸张，似有一点写实的味道。泰陵天马不再凭马腿支撑庞大的躯体，而以马腹之下的云纹浮雕与



图 61　泰陵东列鸵鸟　（编写组供稿）

石座相连。天马身体各部均按比例雕刻，马翼与马腹下的云纹呼应，既增加了天马行空的感觉，看上去也比较美观。

鸵鸟双腿较短，身躯肥硕，颈部弯曲较甚，毛羽不大清晰。

泰陵仗马均已残毁。从所存部分看，马背有鞍无镫，马身置鞅鞦，其下系杏叶。马栽短鬃，尾下垂。泰陵北门外置仗马三对，形制同神道仗马。

石人南北间距 19 米，比桥陵石人小，身高大约 2.5 米。东侧的头戴进贤冠，身穿宽袖长袍，袖胡过膝，腰系革带，足着高头履，背部腰带下有双佩、大绶，双手执笏，雍容大度。西侧的头戴鹖冠，冠前饰雁鸟，身穿长袍，肩有背带，腰系革带，足着靴，双手拄七节剑，颇有将军风度。唐陵从泰陵起，石人开始东文西武规制。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泰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58 年，成立泰陵文物管理所，专司保护管理。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范围为金粟山最高点四周外延 300 米；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西各至石狮，北至北神门石马，南至南神门石柱；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200 米内。

2001 年 6 月，泰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泰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金粟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鹊台等遗址以及高力士墓，即南至鹊台以南 420 米、距离公路 350 米，西至杨家山村以东 500 米沟边，西北至敬母山海拔 840 米至 794 米山脊一线，北至包括整个五龙山，东北至五龙山东端的姬家沟，东至高力士墓以东 42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七节　唐肃宗建陵

一、墓主生平

唐肃宗李亨（711 ~ 762），玄宗第三子，母元献皇后杨氏。景云三年（712）生于长安东宫之别殿，其母为元献皇后杨氏。李亨初名李嗣升，先天元年（712）九月被封为陕王，开元十五年（727），更名李浚，徙封忠王。开元二十三年（735）七月改名为李玙，开元二十六（738）年六月三日册封为皇太子。开元二十八年（740），又更名为李绍。天宝三载（744），又改名为李亨。

755 年，安史之乱发生后，与玄宗一起奔蜀，至马嵬，怂恿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发动政变，后被唐玄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北上组织平叛力量。同年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位，时年 46 岁，改年号为至德。针对两京沦陷，叛军十分猖獗的情况，唐肃宗即位后启用名将郭子仪，团结各地官军，并借回纥兵向叛军发动进攻。至德二年（757）夏秋之际，郭子仪率军先后收复长安和洛阳，取得战略反攻的重大胜利。但唐肃宗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并轻信谗言，猜忌郭子仪等人，把军政大权交给宦官鱼朝恩和李辅国等人，坐失良机，使战争进入旷日持久的状态。

肃宗晚年，宠信宦官李辅国和张皇后，纵容他们干预朝政。李辅国起初和张皇后结为一党，后来逐渐发生矛盾。张皇后谋立越王李系为太子，得到唐肃宗的默许，而李辅国则表示反对。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患病，加之玄宗新丧，病情加剧。张皇后怕李辅国趁机作乱，密谋诛之，不料走漏风声，反为李辅国所制。李辅国和程元振等人假传太子命令，率军入宫将李系等人投入大牢，并带兵进入肃宗所居长生殿，逼张皇后出宫。张皇后不从，哀求肃宗救命，肃宗惊吓致死，享年 52 岁。谥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庙号肃宗。宝应二年（763）三月二十七日葬肃宗于建陵。



图 62　建陵陵山和东列石人　（摄影：李川）

二、营建始末

建陵位于咸阳市礼泉县北 12 公里的索山石马岭之上。东北距昭陵 5 公里。索山亦名武将山，海拔 783 米。东西两侧为大沟深壑。东与昭陵遥相对峙，西与梁山之乾陵隔川遥望，北面群山叠嶂，南面是层层梯田和广阔的沃野。陵园因山而筑，封域 40 里。

建陵的修建大体上与泰陵的修建同时进行。但代宗对建陵较为重视，他曾下《厚奉建陵诏》说：“人子之道，存乎色养，穹苍不待，创痛诚深！朕触目哀荒，攀号无计，终天永诀，先远有期，欲报之心，不胜罔极，务崇兆宅，庶竭哀怀。应缘山陵监护卤簿等事，宜令有司备其厚礼，不得节减。尽库藏之所有，成迁厝之大仪。”[①] 但因时值安史之乱之后，国家财政困难，故陵墓制度已不能与盛唐时期的陵寝相比。



图 63　建陵陪葬墓之郭子仪墓　（摄影：李川）

建陵陵园按“因山为陵”的制度依山而筑，因受山形的限制，陵

①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六《厚奉建陵诏》，第 431 页。

园略呈梯形，南宽北窄。城垣有四座城门，玄宫位于武将山主峰的小山包中，南门内有献殿、神道、乳台、鹊台等建筑，西南方向建有下宫。

建陵陪葬墓《唐会要》《长安志》所载只有汾阳王郭子仪墓。据《新唐书》等文献记载还有章敬皇后墓和李怀让墓。现今在陵山西南的坡杨村存圆锥形墓冢两座，其中西侧一座墓冢前立有石碑一通，上书“唐汾阳王郭子仪之墓”，右侧书“巡按陕西监察御史毕懋康立”。

三、陵墓演变

建陵因与泰陵同时修建，故其制度与泰陵相仿，但用功则多于泰陵。起初建陵陵园管理尚好，但中唐以后出了问题。《唐会要》卷十七载：“建中二年（781）二月，复肃宗神座于寝宫。初，宝应中，西戎犯京师，焚建陵之寝，至是始创复焉。元和十一年（816）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黄堂南面丹景门，去年十一月，被贼斫破门戟四十七竿。”可见在德宗至宪宗当政时期，建陵曾遭到人为的破坏。到唐文宗时，唐陵建筑遭到损坏。五代时，建陵被温韬盗掘。宋、明两代略有保护。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西巡抚毕沅立“唐肃宗建陵”碑。1957 年，礼泉县有关部门鉴于建陵石刻艺术价值颇高，因“久已剥蚀，倾塌殆尽”的情况，曾向中央文管会报请修葺。修葺工作于 1957 年 12 月完成，对建陵的保护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王丕忠、程学华等人对建陵进行了探测。80 年代，贺梓城、刘庆柱等学者曾对建陵进行过考察。其后陈安利、刘向阳、李浪涛等也曾对建陵进行过调查。

研究成果：

王丕忠、程学华：《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 年第 7 期。

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石武将头》，《文物》，2005 年第 11 期。

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一件兽面脊头瓦》，《考古与文物》，2006 年第 5 期。

范坤、李刚：《唐建陵石刻雕塑的造型语言》，《文化月刊》，2010 年第 1 期。

五、遗迹与遗存

建陵陵园呈不规则矩形，东南与西南角阙址间距 1050 米，东北与西北角阙址间距 879 米，东南与东北角阙址间距 1524 米，西南与西北角阙址间距 1373 米。建陵依山为陵，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从遗址分布情况来看，城垣四面各辟一门，门外各筑门阙 1 对，并置石狮 1 对。四门互不对称，皆依山势而设。北门西距西北角楼址 173 米，西门北距西北角楼址 618 米，东门北距东北角楼址 900 米，南门西距西南角楼址 570 米。城垣四角均有角阙，四个角楼遗址保存较好。东南角阙高 2.5 米，底径 12 米。西南角阙高 3.5 米，底径 12 米。东北角阙高 3 米，底径 12.5 米。西北角阙高 3 米，底径 14 米，宽 12 米。

献殿遗址在南神门北，范围东西 50 米，南北 50 米，总面积约 250 平方米。周边有残砖断瓦。

下宫去陵 5 里。今陵园西南 2200 米有一处长 110 米，宽 70 米的建筑遗址，疑即为下宫所在。

陵园南偏西约两公里为陪葬墓区，原有封土 6 座，现今尚存两座，其中一座为汾阳王郭子仪墓，立有墓碑。

南神门外设神道，长 763 米。石刻东西列间距 160 米，东西两列石刻隔沟相立。

石柱位于乳台阙址北 95 米，石柱高 5.5 米（石座埋在土中，未计在内），造型与桥陵石柱略有不同。石座已不是十二瓣覆莲环座，而是微隆圆盘环座。顶部的仰覆莲之间的莲珠也变得较小。

翼马位于石柱北 28 米，身长 2.40 米，身高 2.45 米，形制与其他陵基本相同，唯其翼翅的三长翎尾端卷云纹更为突出。

鸵鸟位于翼马北 32 米，身高 1.19 米，长 1.40 米，头颈回曲于翅上，双脚立于山石之间，其毛羽清晰，犹如鳞状，头较大，眼突出，尾部发达，雕刻精美。

仗马位于鸵鸟北 32 米，每对南北间距 30 米。形制略同泰陵，身长 1.90 米，身高 1.80 米。其变化之处主要是在马颈下系一圆球状的东西，如足球



图 64　建陵东列翼马。目光坚定、比例协调，可说是唐陵石刻的代表作　（摄影：李川）

大小。马前原来均有一控马者，现已残毁不存。

石人形制略同泰陵，有文武之分。文左武右，身高在 2.3 米至 2.5 米之间。文者头戴冠，衣袖宽广，前绅后绶，有革带双佩，双手执笏，表情严肃。武者头戴冠，着广袖衣，双手拄剑，神态威严。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建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范围为城垣遗址（城垣四角角楼遗址、四门石狮、石马）周围外延 30 米，神道地面石刻和门阙遗址外延两米；一般保护区为北至凉马村南，西至西山头村坡根底，东北至南岭盖细腰处，东至索山梁东坡根底，南至坡杨村、围墙村。

2000 年成立建陵文物管理所。

2001 年 6 月，建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建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武将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八节　唐代宗元陵

一、墓主生平

李豫（727 ~ 779），系肃宗长子，其母为章敬皇后吴氏。原名俶，开元十四年（727）十二月十三日生于东都上阳宫之别殿，开元二十年（732）封为广平郡王。马嵬兵变后随其父北上灵武。肃宗即位后，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统帅郭子仪等诸将与叛军作战，收复两京。至德二年（757）进封楚王，乾元元年（758）改封成王，同年五月十九日被册立为太子。不久改名为豫。肃宗死后，李辅国拥立他当皇帝，是为代宗，改元宝应，时年 37 岁。



图 65　元陵陵山和神道东侧翼马　（摄影：郑茂良）

代宗即位之初，大将李光弼等人最终平息了安史之乱，但战争使黄河流域广大地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边疆地区也开始出现危机，唐王朝从此走向衰落。当时朝廷大权实际上继续掌握在李辅国手中。李辅国曾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分。”[①] 代宗对此颇为不满，但慑于李辅国的淫威，却一味委曲求全，听任摆布，甚至尊李辅国为“尚父”。对于当时出现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吐蕃入侵、回纥勒索等问题，代宗显得无能为力，便一心向佛，提倡佛教，希望从中得到解脱。

① 《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宦官·李辅国传》，第 4761 页。

大历十四年（779），死于长安城之紫宸殿，终年54岁。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当年十月，葬代宗于元陵。

二、营建始末

元陵位于富平县西北14公里的檀山之上。檀山海拔851米，山东侧有支家沟、西有三条沟。

代宗临终前，曾在遗诏中说："其丧仪及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并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①] 但德宗即位，却下诏要求："应缘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唐会要》卷二十载：

> 建中元年，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刑部员外郎令狐峘上疏谏曰："臣闻……秦始皇葬骊山，鱼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魋为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之，有礼者葬愈薄，无德者葬愈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之娱。有司给物，悉依元祐，利于人也。远方底贡，惟供祀事，薄于己也。故泽州奏庆云，诏曰'以时和为嘉祥'；邕州奏金坑，诏曰'以不贪为宝'。恭惟圣虑，无非至理。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缘应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发德音，皆比踪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目，有违贤哲之心，与失德之君竞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不得以金银锦彩为饰。'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耶？"疏奏，优诏从之。[②]

最终令狐峘的上书切谏被德宗采纳，故元陵规模，略如建陵，并无多大改变。

元陵依山而筑，陵园平面呈不规则矩形。内城四面各置一门，四隅均建角楼。南门外设神道及乳台，神道两侧列置大型石刻。其形制与建陵相仿。

下宫位于元陵西南方向、元陵村北，距离南神门约3.5公里。

---

① 《唐大诏令集》卷十一《代宗遗诏》，第68页。

② 《唐会要》卷二〇《陵议》，第398页。



图 66　考古发掘中的元陵下宫　（摄影：郑茂良）

元陵无陪葬墓，唯以睿贞皇后（德宗生母）禕衣祔葬[①]。

三、陵墓演变

元陵之陵园制度与丧葬礼仪是按照《大唐元陵仪注》实施的。该仪注现存杜佑《通典》中，由此可知德宗时对元陵的修建十分重视。唐代中后期，元陵基本上得到较好的保护。但唐朝灭亡后，元陵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宋明两代，曾对元陵有所保护。清代毕沅曾为其立碑。晚清以来，破坏较为严重。

四 、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贺梓城、刘庆柱等学者调查过元陵。其后王双怀、陈安利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些专家也曾到元陵进行过考察。国内学者对元陵进行深入研究较少，日本学者金子修一从《通典》中将《大唐元陵仪注》的内容全部辑出，译成日文，并进行探究。

研究成果：

金子修一：《大唐元陵仪注新译》，（日）汲古书院，2013 年。

金子修一、博明妹：《围绕《大唐元陵仪注》的诸多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 年第 4 期。

① 《旧唐书》卷五十二《后妃·代宗睿贞皇后沈氏》。

五、遗迹与遗存

元陵陵园虽然破坏严重，但城垣遗址依稀可辨。实测东西二门相距 2500 余米，南北二门相距 2700 余米。四门外阙台均有遗存。

东神门阙台在东门外 34 米处，南北二阙相间 55 米。南阙底长 17 米，宽 9 米，残高 3 米。北阙底长 17 米，宽 8 米，残高 5 米。周围有残砖破瓦遗存。

西神门阙台在西门外600余米处。现存南北二阙相距55米。南阙底长28米，宽10米，高8米。北阙底长 18 米，宽 14 米，残高 6 米。周围绕也有残砖断瓦。

南神门阙台在南门外，东西二阙相距 80 米，东阙底长 18 米，宽 12 米，残高 4 米。西阙底长 25 米，残高 5 米。有砖瓦散布。

北神门阙台在北门外 54 米处，东西二阙相间 55 米。东阙底长 17 米，宽 12 米，残高 4 米。西阙底边长 22 米，宽 14 米，残高 5 米。同样有残砖堆积。

元陵石刻地面之上原本仅有陵园东、西、北神门外石狮，北神门外仗马和神道东侧翼马。2017 年上半年，考古部门对元陵实施勘探，发掘出土神道石柱、仗马、石人等石刻。

石狮形制、大小与泰陵同。地面之上现存 5 件，分别为北门 2、西门 2、东门 1，其中东门石狮已迁富平文庙保管。每对石狮间的距离在 18 米至 22 米之间，均作蹲踞状。

北神门外原有立仗马 3 对，现今地面之上存 4 匹，西 3、东 1，残高 0.6 米至 1.2 米不等，残长 1.4 米左右。



图 67　元陵西神门石狮　（摄影：郑茂良）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元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范围：东至石斜村白家沟，西至陕压厂柏油路，南至张家窑，北至温家壕；一般保护区：陵园四门阙外延 20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30 米。

2001 年 6 月，元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元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陵山檀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九节　唐德宗崇陵

一、墓主生平

唐德宗李适（742 ~ 805），唐代宗李豫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779 ~ 805 年在位，是唐朝第九位皇帝。李适初封奉节郡王。宝应元年（762）担任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雍王，在名义上统军平定安史之乱。次年拜尚书令。广德二年（764），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即位。

德宗即位后，唐朝前期所实行的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已被破坏，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建中元年（780），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实行两税法。在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的同时，唐德宗还试图削弱藩镇力量，以加强中央集权，但由于措置失宜，反而引起了一连串的事端。接连发生了“四镇之乱”“奉天之难”后，唐德宗开始对藩镇姑息迁就，使藩镇割据的问题更加严重。贞元年间，德宗任用贤相李



图 68　崇陵旧照　（采自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295 页）

泌，政局渐趋稳定，但他又宠信宦官，提倡“进奉”，设置“宫市”，榷酒榷茶，加重税收，引起了新的社会矛盾。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初一，诸王、亲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从此患病，同月二十三日，崩于会宁殿，享年64岁。永贞元年（805）九月一日，谥曰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十四日，葬于崇陵。

二、营建始末

崇陵位于泾阳县云阳镇东北15公里的嵯峨山的主峰东边。嵯峨山又名慈山，海拔955米，东西群山相连不断。

崇陵是由杜佑担任山陵使而主持修建的。主要负责人还有礼仪使杜黄裳、礼仪副使李庸、按行山陵地副使李**扞**、卤簿使郑云达等。陵园分为内外两城。内城东西长，南北短。东西二门间距2500米，南北二门间距1670米。封域40里。玄宫位于嵯峨山南麓中峰的山腰间。此处为九条山脉交汇处，有如九瓣莲花之心，古人称之为“莲花穴”。

《新唐书·后妃传》载，贞元三年，德宗昭德皇后王氏去世，葬于靖陵。至永贞元年，改葬于崇陵。据此，崇陵应为唐德宗与昭德皇后的合葬之陵。

三、陵墓演变

崇陵在唐代保护较好。五代时可能被盗。其后陵园建筑因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不复存在。宋明两代曾有诏保护。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西巡抚毕沅曾立碑保护。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对崇陵进行过较为仔细的考察，并在其《长安史迹研究》中有所论述。80年代，贺梓城、刘庆柱等曾调查此陵。其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相关专家也曾对此陵进行考察。

研究成果：

关于崇陵，王双怀、刘向阳等在其专著中有所涉及。相关论文只有一篇，即

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第4期。

五、遗迹与遗存

崇陵陵园东西北三门及门外双阙均筑于山上，遗址附近散布古旧瓦砾残片甚多，原本均置石狮一对。

南神门北边是正方形的献殿遗址，酷似高宗乾陵。但此陵在石狮南侧，有建筑基础四个，与献殿基底平行，呈直线排列，较为特别。

崇陵陵园石刻保存较多，虽有损坏，但颇为精美。

石柱形制基本与建陵相同，高 6.9 米（底座未计）。石柱上部宝珠较高，覆莲下的八棱面台盘较厚。石柱的柱体上出现了伎乐飞天和忍冬等纹饰。可惜大部分已被磨灭，唯左侧石柱的正面比较清晰。

翼马的马头显得清瘦，颈部较长，角变大，身变短，腿变高，三长翎组成的翼翅尾部简化，左右翼翅上部交于鬃处。东边的一匹较肥壮，眉脊上部有一圆球状鬃结，披长鬃；西边的一匹较瘦长，栽短鬃。二者相对，迥异其趣，雕刻技法精湛。



图 69　崇陵西列翼马　（摄影：李川）

鸵鸟个体相对较小，头颈弯曲后折於翅上，颈部较直，头小，嘴尖，雕刻较粗疏。西侧鸵鸟地表之上已不存。

仗马均残，从残存部分看，马背置鞍鞯、披障泥，饰鞅鞦，马尾下垂。崇陵北门外有三个残石人，身穿窄袖袍，腰系革带，双手拱握，脚著小靴，当为控马者。此处原有仗马和控马人于 2013 年就地掩埋保护。

石人位于仗马北 22.4 米，每对南北间距也为 22.4 米。身高 2.76 米左右。东列形制与泰陵同，唯左侧佩剑，剑的两头从胸前和肘后露出。西列头戴高冠，冠顶呈亚腰形，上饰花纹，身穿广袖袍，袖胡过膝，左右肩有背带。背后冠下施巾，腰带下有短巾，袍的背部服饰种类较多。资料记载，在崇陵神道西列翼马西 160 米有一小石人，其大小、服饰与北门外控马者相同。

在控马小石人东 10 米，一座房屋的西墙基部，有二小石人，其一身披袈裟，下垂莲叶，似为佛僧，现今这些小石人在实地已不存。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崇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北至北神门，南至南神门南第二对主阙，东至东神门，西至西神门；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与重点保护区相同。

2001 年 6 月，崇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崇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嵯峨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图 70　崇陵西神门北侧石狮　（摄影：李川）

第十节　唐顺宗丰陵

一、墓主生平

唐顺宗李诵（761 ~ 806），为德宗长子，母为昭德皇后王氏。肃宗上元二年（761）生于长安大明宫。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封为宣王。德宗建宗元年（780）立为皇太子。贞元二十一年（805）带病即位，时年 45 岁。

顺宗对肃宗以来形成的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及其他弊政颇为不满，早在当太子期间，他就常和侍读王叔文等人谋划革新。顺宗即位后，王叔文依靠唐顺宗和尚书左丞同平章事韦执宜、散骑常侍王伾、屯田员外郎刘禹锡、礼部员外郎柳宗元及韩晔、韩泰、程异、陈谏、凌准、吕温、陆质等人进行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宦官和藩镇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四月，宦官俱文



图 71　丰陵陵山—金瓮山　（摄影：郑茂良）

珍、刘光琦、薛盈珍等拥立顺宗长子李纯为皇太子。五月以后，逐渐剥夺了王叔文等人的权力。七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等上表要求皇太子监国。八月，顺宗再次中风，宦官俱文珍等以顺宗多病为借口，逼迫顺宗退位，禅位于太子李纯，同时贬杀王叔文，又贬柳宗元等 8 人为远州司马。顺宗退位后，居于兴庆宫中。宪宗元和元年（806）正月，上尊号应乾圣寿太上皇。正月十九日，崩于兴庆宫咸宁殿，谥号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同年七月十一日葬于丰陵。

顺宗曾想有番作为，但身体多病，终无所成。故《新唐书》载：“昔韩愈有言‘顺宗在东宫二十年，天下阴受其赐。’然享国日浅，不幸疾病，莫克有为，也可以悲夫！”①

二、营建始末

丰陵在渭南市富平县东北 20 公里的金瓮山上。金瓮山俗称虎头山，海拔 851 米。东部、南部地势平缓，北部、西部山峰叠连。

顺宗在遗诏中说：“伏以崇陵仙寝，复土才旋，甸邑疲人，休功未几，今又重劳营奉，朕所哀矜。况汉魏二文，皆著遗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务从俭约，并不得金银锦彩为饰。”② 当时距德宗崇陵竣工才两个多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要修建丰陵，颇为困难。宪宗以杜佑摄山陵使，以杜黄裳为礼仪使，主持修建丰陵。杜佑深明礼制，有主持修建崇陵的经验，故丰陵建设过程较为顺利。

陵园依金瓮山而筑，制度略如崇陵，封域 40 里。玄宫位于山之南麓中腹。陵园呈不规则矩形。四面有墙垣，各辟一门。门有门阙，角有角楼。门阙内有石狮。南门外神道列置石象生，即所谓石人石马之属。

《文献通考》说丰陵无陪葬者，但实际上有陪葬墓 1 座。据《新唐书·后妃传》等文献所载，为庄宪皇后墓。

三、陵墓演变

丰陵在唐代诸陵中规模相对较小。但唐王朝对它的管理一如其他陵寝，故在唐代，丰陵

① 《新唐书》卷七《顺宗纪》，第 219 页。

② 《唐大诏令集》卷十二《顺宗遗诰》，第 74 页。



图 72　清代毕沅所立“唐顺宗丰陵”碑，现今该碑已扶立　（编写组供稿）

保护较好。五代时，丰陵被温韬盗掘。其后陵园建筑损毁。宋明两代虽下令保护，禁止樵采，但作用有限。清代陕西巡抚毕沅曾为丰陵立碑。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纪世 40 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曾制作丰陵石柱拓片两份。80 年代，贺梓城等学者曾赴丰陵考察。世纪之交，陕西文博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曾对此陵进行过调查。

研究成果：

目前，仅《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唐十八陵》《唐代帝王陵》等书对丰陵有所论述，尚无其他重要成果。

五、遗迹与遗存

丰陵内城遗址隐约可见，但遗迹所存无几。据勘测，东西长度约 1500 米，南北长约 1700 米。门阙、角楼破坏殆尽，唯西神门和北神门外阙台较为清晰。西神门阙台南北二阙相距 30 余米。南阙台底长 8 米，宽 4 米，高 6 米。北阙台底长 6 米，宽 5 米，高约 5 米。北神门阙台东西相距 56 米。东阙台底长 6 米，残宽 2 米，残高 3 米。西阙台底长 11 米，宽 8 米，高 5 米。周边有残砖瓦存在。

今陵园遗迹所存无几，石刻仅余数件。北神门外石狮实地只能看见一石狮脑顶，西神门外石狮一件，现今已迁富平文庙保管，神道存西侧半截石柱。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丰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东至支家村，南至陵前村，西至马家坡，北至甘河村；一般保护区为陵园四门阙外延 20 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30 米内。

2001 年 6 月，丰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丰陵保护范围基本呈方形，西南至白土坡，西北至金瓮山主峰以南的山坡下，东北至地虎崖村，东南至陵前北堡，主要包含金瓮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图 73　丰陵埏道入口旧照，现今已回填（编写组供稿）

第十一节　唐宪宗景陵

一、墓主生平

唐宪宗李纯(778～820)，初名李淳，唐顺宗长子，母庄宪皇后王氏。代宗大历十三年(778)生于长安大明宫。德宗贞元四年(788)六月封为广陵郡王、开府仪同三司。贞元二十一(805)年四月册为皇太子，改名为李纯。七月，唐顺宗病重，权且料理军国政事。八月，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拥立下接受唐顺宗的禅让，时年28岁。次年改元为元和。

唐宪宗即位后，力图削平藩镇，恢复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先后平定了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和镇海节度使李锜的叛乱，从而使朝廷的威望有了明显提高。元和九年(814)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割据蔡州。唐宪宗派兵讨伐，吴元济不但公然与唐军对抗，还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但唐宪宗并没有因此而动摇，重用大将李光颜和青年将领李愬，一举平息了吴元济的叛乱。这是中唐以来中央在同藩镇斗争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对其他藩镇形成了威慑。一时间，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请求让其长子入侍，并表示愿意献出沂、密、海三州。横海节度使程权请举族入朝，其他节度使也纷纷上书表示服从中央，史称“元和中兴”。



图74　景陵陵山和神道东列翼马　　(摄影：郑茂良)

但唐宪宗在取得了这些成绩之后，渐渐骄侈。任用皇甫镈而罢贤相裴度，政治日见衰败。他还信仙好佛，想求长生不老之药。元和十三年（818），他下诏征求方士。皇甫镈向他推荐山人柳泌，由他配制长生药。宪宗遣宦官使至凤翔迎接佛骨，刑部侍郎韩愈上疏[①]，恳切诤谏，宪宗勃然大怒，欲杀韩愈。裴度等奏言，才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次年，李纯开始服用长生药，性情变得暴躁易怒，经常斥责或诛杀左右宦官，宦官集团又分为两派，吐突承璀一派策划立李恽为太子，陈弘志、王守澄一派拥护李恒为太子。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宦官陈弘志等潜入大明宫中和殿，弑杀宪宗，并假传遗诏，拥立李恒为帝。宪宗在位 15 年，促成“元和中兴”，可同太宗、玄宗相提并论，但这样的结局，令人惋惜。故《新唐书》载：“宪宗刚明果断，自初即位，慨然发愤，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卒收成功……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则尤甚于德宗。”[②]当年五月，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同月，葬于景陵。

二、营建始末

景陵位于渭南市蒲城县西北 13 公里的金帜山上。金帜山海拔 872 米，山势高耸，犹如一面旌旗。山的北面群峦蜿蜒，东面和南面地势平缓，西面为大沟深壑。景陵因金帜山主峰而筑，坐北朝南，封域 40 里。

宪宗死后，其子穆宗即位，以宰相令狐楚为山陵使，以柳公绰为山陵副使，开始在金帜山为宪宗修建景陵。金帜山为青石构造，开凿地宫的工程十分艰巨，但整个陵园的修建仅仅用了 4 个多月时间。元和十五年（820）五月，唐宪宗灵车行至半道，忽然风雨大作，文武百官都去避雨，只有山陵使令狐楚扶着灵柩没有离开，以显示他的忠心。但令狐楚在当山陵使期间私自扣押工匠报酬 15 万贯不发，导致工徒怨诉盈路，唐穆宗只好撤销了他的宰相职务，在《景陵优劳德音》中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③]。

景陵因金帜山而建，陵园略呈不规则矩形。东南和西南角阙址间距及西南和西北角阙址间距均为 2400 米，南北二门间距 2500 米，东西二门间距 2900 米。玄宫开凿在金帜山南麓的山腹中。城墙四神门外皆有阙台，四隅皆有角楼。南神门外为神道所在，长约 626 米。神道

①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论佛骨表》。

② 《新唐书》卷七《宪宗本纪》，第 219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七十七《景陵优劳德音》，第 435 页。

两则列置石象生。陵园中有献殿、下宫等建筑。


图 75　景陵立仗马　（编写组供稿）

景陵陪葬墓，据《唐会要》《文献通考》记载有 4 座：即郭皇后墓、郑皇后墓、王贤妃墓和昭惠太子李宁墓。目前只在陵园南 1200 米屈家村北和陵园南 2050 米西南庄西北各发现陪葬墓一座，墓主尚未确定。

据考古发现，惠昭太子实际上并未陪葬景陵。惠昭太子李宁（793 ~ 812），宪宗长子，纪美人所生。顺宗时为平原郡王。宪宗即位后，封为邓王。元和四年（809），册封为太子，改名李宙，不久又改回原名。元和六年（812）闰十二月廿一日病逝，谥号惠昭太子。1990 年 11 月至 1992 年 2 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陵工作站与临潼文管会等单位，对临潼县西泉乡椿树村一座被破坏的古墓进行了清理。出土文物有铜、铁、陶、唐三彩、石器、玉器各类文物 180 件，但大多残破。棺床上发现汉白玉册文和哀册 195 段（块）。经研究修复为 136 节段。其中完整的 17 件，从玉册文字得知，此墓墓主即为惠昭太子。

三、陵墓演变

景陵当初建置规整，柏城森严。唐朝灭亡后遭到破坏，北宋初对此陵进行过修葺。宋开宝六年（974）五月所立“新修唐宪宗庙碑铭并序”记载：“自唐抵宋，绵革五朝，梁则干戈日寻，晋则猃狁孔炽，汉因屠戮而覆，周乃功烈未伸”“宪宗陵在同州蒲城县，庙貌圮毁，基址芜没”。至宋始修新庙，“其成也，广殿回廊岳立翼张，瑶阶列侍，宝座当阳。巍巍塑衮冕之容，烈烈绘旌旗之状，于是神有依而人有奉矣。厨库咸敝，牺币毕臻，笾豆有常，笙镛在列，斯则时饷丰而礼文备矣。”宋以后再度受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唯明初禁樵采，清乾隆四十四年毕沅立碑进行保护。目前景陵神道上的沟壑，系雨水溯原侵蚀所致。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蒲城县文物管理部门的相关人员、考古学者贺梓城、刘庆柱、张建

林及大专院校的一些学者曾对此陵进行过调查。

2008 ~ 2010 年根据勘探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下宫大殿遗址、西侧鹊台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下宫遗址有内外两重城墙，外城南北长 376 米，东西宽 318 米。内墙垣内发现两处面积较大的建筑遗址，东西宽 34 米，南北进深 24 米。鹊台保存情况较差[①]。

研究成果：

刘庆柱等人在其调查报告中对景陵有所涉及。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陈安利《唐十八陵》、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对此陵有专门论述。

五、遗迹与遗存

景陵东南、西南和西北角阙址尚在，角阙址附近唐代砖瓦碎块甚多。陵园四门外阙址和鹊台东阙有所保存。

东南角阙址高 4 米，底长 20 米，宽 7 米；西南角阙址高 3.5 米，底径 15 米；西北角阙址高 5.5 米，底径 14 米。

南神门北 50 米为献殿遗址，范围东西 200 米、南北 150 米。鹊台的东阙址尚在，高 1 米、底长 7 米、宽 6 米，西阙址已被平掉。鹊台北距陵园南神门 2876 米、乳台遗址 2350米。

景陵下宫遗址在三合齐家西南庄北，北距陵园 2300 米，遗址范围东西 350 米、南北 200 米。其南有开宝九年（976）所立“大宋新修唐宪宗庙碑铭”。碑身高 2.66 米，宽 1.52 米，厚 0.48 米，碑座长 1.77 米，宽 1.37 米，高 0.47 米。

景陵石刻雕饰精美，生动逼真。石柱位于乳台阙址北 79 米，通高 7.7 米。



图 76　大宋新修唐宪宗庙碑　（摄影：郑茂良）

①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2006 ~ 2010 年），三秦出版社，2012 年。

翼马在石柱北 24 米，身长 2.35 米，高 2.5 米，东列垂尾，独角较小；西列缚尾，独角较大。

鸵鸟在翼马北 24 米，高 1.35 米，长 1.75 米，头颈弯曲，身躯肥硕，腿短如鸭。

景陵仗马在鸵鸟北24米，南北间距24米，身长1.95米，高1.55米，形制与建陵同。马头较长，马面有当卢，系络头，口衔镳，脖下系铃，有鞍鞯、无马镫，马身无饰物，马尾下垂。

石人位于石马北 22.5 米，每对石人南北间距 22 米，身高 2.65 米，形制与泰陵相同。

此外， 在北神门外原置仗马三对，今存仗马 5 匹，东 3、西 2，东西列间距 45 米。除西列南起第一匹为缚尾外，其余石马均与神道石马形制相同。资料记载，在仗马北还有两对小石虎，东西分列，现今实地已不存。



图 77　整修之后的景陵北神门　　（摄影：郑茂良）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景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金帜山主峰最高点向四周外延 300 米内；一般保护区为东、西、北各至石狮，南至南神门石柱前；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200 米内。

2001 年，景陵文物管理所成立，专司管理保护职责。

2001 年 6 月，丰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景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金帜山陵山以及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鹊台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二节　唐穆宗光陵

一、墓主生平

唐穆宗李恒（795 ~ 824），本名为李宥，唐宪宗第三子，母懿安皇后郭氏。德宗贞元十一年（795）七月生于大明宫之别殿。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封为建安郡王。宪宗元和元年（806）八月进封遂王，元和七年（812）十月惠昭太子死后被册立为皇太子，改名为李恒。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宪宗崩后即位，时年 26 岁。次年改元长庆。

唐穆宗即位之初也曾想有所作为。长庆元年（821），他派刘元鼎赴逻娑（今拉萨）与吐蕃结盟，树立“唐蕃会盟碑”，较好地处理了唐与吐蕃之间的关系。同年，他又任命韩愈为京兆尹，以李听为河东节度使，以维持这些地方的社会秩序。但之后“宴乐过多，畋游无度”“不留意天下之务。”任用的宰相萧俛、段文昌又无远见，“元和中兴”的成果化为过眼云烟，社会问题又严重起来。在中央，宦官专权，大臣不和，牛僧孺、李德裕各树朋党，互相倾轧。在地方，许多藩镇故态复萌，割据称雄。

穆宗效法宪宗，长年服用金丹，结果身体状况恶化。长庆四年（824）正月，崩于大明宫寝殿，终年 30 岁。遗诏：“山陵制度，务从俭约，无禁婚嫁祭祀饮酒食肉。其医官等念其勤瘁，亦可矜怜，并不须加罪，宜便释放。将相卿士，中外臣寮，送往事居，无



图 78　光陵陵山和清代毕沅所立“唐穆宗光陵”碑　（摄影：郑茂良）

违朕意[①]。”谥曰睿圣文惠孝皇帝，庙号穆宗。当年十一月，葬于光陵。

二、营建始末

光陵位于渭南市蒲城县光陵村北的尧山之阳。尧山海拔 1091 米，也名浮山。相传尧时洪水滔天，诸山皆没，唯此山独浮。山的南部、北部和东南部较平缓，东北部主峰突起，重峦叠嶂，西部和西南部为沟壑。光陵即因尧山为陵，封域 40 里。

穆宗死后，敬宗诏神策六军及奉先等县百姓修建光陵。根据唐穆宗的遗诏，唐敬宗遣勘舆者赴渭北陵区勘卜茔兆，结果选中了尧山。此处离景陵较近，也算是父子死后有缘。茔兆选定后，即委派山陵使、礼仪使、山陵副使、按行使 、桥道置顿使、内山陵使、兼监修桥道使、修筑使、修筑副使、卤簿使、仪仗使、桥道置备副使等负责修筑山陵，准备葬礼。当年十月，光陵营建完毕，唐敬宗颁发《光陵优劳德音》，对参与修建光陵的各级官吏进行了奖励，同时减免了奉先等县百姓的青苗钱。

光陵因尧山而建，规模较泰陵为小，陵园占地十六顷九十二亩八分，封域四十里，下宫去陵五里。陵园有内外二城，略泰陵之制。陵园呈东西窄、南北长的形势。石刻也多集中在南门外神道两侧。

据《唐会要》《文献通考》等书记载，光陵有陪葬墓两座，即恭僖太后王氏和贞献太后萧氏。现在仅存墓址一处，墓主尚不能确定。

因穆宗未能保住唐宪宗“元和中兴”所形成的格局，又服食“金丹”中毒，受已成之业而不保，蹈已覆之辙而不拔，故后人每至光陵，感叹良多。清人何亮基在《光陵怀古》中写道：“仙丹自古不可求，枉把韶华付东流。尧山白云空惆怅，覆车何曾忆旧游”。

三、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蒲城县文管所人员曾对光陵进行过初步调查。80 年代，贺梓城、刘庆柱等对光陵进行专业考察。其后王双怀、陈安利、刘向阳等也对此陵进行考察。

2009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光陵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光陵环绕陵山筑有夯土城垣，东西两门直线距离 2644.2 米，南北两门直线距离 3153.1 米。下宫遗址位于整个陵园的西南，遗

① 《唐大诏令集》卷十一《穆宗遗诏》，第 69 页。

址略呈正方形，周有城垣环绕，东西长约 200 米，南北宽 182 米。遗址内有两处较大的夯土建筑遗址，地表散布有大量唐代砖瓦、红烧土等。2010 年对陵园的东门遗址，东门外的北阙台遗址，南侧蕃酋殿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东门门址东半部保存较好，门址夯土台基平面呈长方形，南北 25 米，东西残宽 5.6 米，面阔五间，进深两间[①]。

研究成果：

目前尚无专门论著。唯《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唐十八陵》《唐代帝王陵》等书及相关调查报告有所涉及。

四、遗迹与遗存

光陵南神门北 20 米为献殿遗址。范围东西 300 米、南北 150 米。

城垣角楼遗址仅存西南一处，底径约 12 米，残高 1.5 米。

四神门外阙台清晰可见。东神门阙台在东门外 74 米处，现存南北二阙址相间 65 米，均呈长方形，底长 18 米，宽 8 米，高 6 米。



图 79　光陵东神门　　（摄影：郑茂良）

西神门阙台距西门 74 米，南北二阙址相距 65 米，南阙底长 16 米，残宽 5 米，残高 8 米。北阙底长 16 米，残宽 6 米，高 10 米。

南神门阙台距南门 84 米，现存东西二阙址相距约 80 米，二阙均呈圆丘形，底径约 14 米，

①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2006 ~ 2010 年），三秦出版社，2012 年。

残高约 5 米。

北神门阙台距北门 79 米。东西二阙址相间 90 米，均呈长方形，底长约 16 米，宽 8 米。以上诸阙周边均有残砖断瓦分布。

光陵乳台遗址在南神门外 592 米处。东西二阙相距 182 米，东阙址底长 11 米，宽 8 米，残高 3 米。西阙台已平毁。鹊台在乳台南 1900 米处，均已平毁。

目前陵园残存石刻 20 余件，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 60 米。石刻损失严重，多已残缺，亟待保护。

四门外原置有石狮一对，现今南神门存双狮；东神门存双狮，但南侧石狮残毁严重；北神门存西侧石狮；西神门存双狮，石狮身高 175 厘米、宽 85 厘米。头呈方形，眉脊突起，颧骨突出，躯体肥壮。

石柱位于乳台阙址北 107 米，高 7.15 米。

翼马位于石柱北 22 米，身长 2.35 米，高 2.50 米。东列翼马，头顶有独角，角微小，披长鬃，垂尾；西列翼马，头顶残，短鬃，缚尾。

光陵现存两个残缺仗马，马背置鞍鞯，均无马镫，披障泥，系鞅鞦，饰杏叶。有一残石人，腰系环带，从服饰看，系控马者。

石人地面之上仅存西列一尊，无头，着两档铠，拄剑。

北神门外有石马 3 对，均残，东西列间距 32 米。南数第一对在阙址北 62 米，第二、第三对南北间距均为 24 米。其形制同神道仗马。



图 80　光陵西列石人　（摄影：郑茂良）

五、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光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尧山西岭最高点向四周外

延 300 米内；一般保护区为东、西、北各至门前石狮，南至南神门石柱前；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200 米内。

2001 年 6 月，丰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光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尧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鹊台等遗址以及一号、二号陪葬墓；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三节　唐敬宗庄陵

一、墓主生平

唐敬宗李湛（809 ~ 826），为穆宗长子，母恭僖皇后王氏。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封为鄂王，不久改为景王。长庆二年（822）十二月册立为皇太子。长庆四年（824）正月即位，时年方 16 岁。次年改元宝历[①]。

当时，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的情况已很严重。朝政实际上控制在宦官王守澄、梁守谦及朝臣李逢吉、牛僧孺手中。但敬宗依旧是贪图享乐，不关心政事，史称“视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进见”。由于朝政昏暗，社会动荡。河朔三镇相继反叛，兵连祸结。就连长安城中的染坊工人也进行了暴动。此事对敬宗有一定的刺激，但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沉溺于游乐，不理朝政。

敬宗最大的爱好是踢球和进行徒手格斗。常常招募力士与太监格斗，有些小太监体力不支，被摔得头破血流。他还爱在夜间去捉狐狸，随从人员稍不尽力，他便大打出手，或将其发配流放，



图 81　唐敬宗庄陵封土　（摄影：李川）

① 《旧唐书》卷十七上《敬宗纪》，第 507 页。

连家属也不能幸免。结果宦官和力士对他都很怨恨。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八日，唐敬宗夜间猎狐回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及击球将军苏佐明等 28 人饮酒作乐，酒过三巡，敬宗入内殿更衣，刘克明熄灭灯，苏佐明闯入内室，将敬宗杀死，谎称暴病而亡。谥为睿武昭愍孝皇帝，文宗太和元年（827）七月十三日葬于庄陵。

二、营建始末

唐敬宗庄陵位于咸阳市三原县陵前乡柴家窑村东 250 米的荆原上，附近地面海拔 515 ~ 520 米。陵墓堆土而筑，封域 40 里。陵南 1200 米为断崖，崖下高程 420 米左右。

敬宗死后，文宗即位，以宰相裴度主持庄陵的营建事务。庄陵为唐代第二座堆土成陵的陵墓，其建造方法与因山为陵者有所不同。经过半年时间，主体工程大体完成。

庄陵有陪葬墓一处，为悼怀太子李普墓。

三、陵墓演变

庄陵在唐代曾得到较好保护。五代时可能被温韬盗掘。其后陵园建筑损毁，树木也被砍伐。宋明两代虽曾下诏修补，禁止樵采，但未能挽救其颓废之势。清乾陵四十四年（1779）陕西巡抚毕沅曾为其立碑保护。但近代以来石刻多被破坏。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原县的文管人员曾对庄陵进行初步调查。80 年代以后，贺梓城、刘庆柱、王双怀、陈安利、刘向阳等也曾对此陵进行考察。

目前尚无专门论著。唯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陈安利《唐十八陵》、刘向阳《唐代帝王陵》等书及刘庆柱等人的相关调查报告有所涉及。

五、遗迹与遗存

庄陵积土为陵，封土底部呈方形，边长 57 米，高 17 米，呈覆斗形。陵园东西 490 米，南北 480 米，封土大体在陵园中部。陵园四面有墙，各有一门。门阙角楼，略如献陵之制。神道在南门外，东西两侧列置石象生。

四门外阙台也清晰可辨。东神门阙台西距门址 58 米，现存南北二阙相距 45.5 米。南阙址底长 15 米，宽 9.5 米，高 4.5 米。北阙台底长 15.5 米，宽 9.6 米，高 4.6 米。西神门阙台在西

门外 52 米处。南北二阙相去 46 米，惜已被削平。南神门阙台在南门外 52 米处，东西双阙相距 60 米，阙已被削平。北神门阙台在北门外 52 米处，东西双阙相距 58 米。现仅存东阙，底长 15 米，宽 10 米，残高 5 米。阙台周边均有残砖瓦分布。


图 82　庄陵西列翼马　　（摄影：李川）

四角阙址除西南角阙被平掉外，其余尚有迹可寻。实测东南角楼底边长 6 米，残高 1.5 米；东北角楼底长 16 米，宽 14 米，残高 3.5 米；西北角楼底长 8 米，宽 6 米，残高 3.2 米。地面均有砖瓦残片。

庄陵现存石刻近 20 件，多已残破。四门石狮各一对。每对间距 13.5 米至 19 米不等，与门的距离一般在 4 至 8 米之间。现今除东神门南侧和北神门西侧石狮胸部以下被土掩埋，情况不明外，其他各石狮保存较好。

神道石刻现存 9 件，自乳台北 70 米起依次为八棱石柱一对，通高 6.4 米，现今柱身掩埋，地表只可见东侧基座；石柱之北为翼马一对，东侧仆倒、西侧屹立，通高 3.3 米，长 2.4 米，宽约 1 米；翼马北侧有石人 5 尊，东三西二，通高 2.8 ～ 2.9 米，身宽 0.85 米。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庄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封土周围外延 14 米；一般保护区为陵园四门内；建设控制地带与一般保护区相同。

2001 年 6 月，庄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庄陵保护范围主要包括封土、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四节　唐文宗章陵

一、墓主生平

唐文宗李昂（809 ~ 840），唐穆宗第二子，母为贞献皇后萧氏。穆宗长庆元年（821）封为江王，取名为涵。刘克明等人在杀死敬宗后，伪造遗诏，立绛王李悟为帝。两天后，宦官王守澄等指挥神策军杀死绛王，将 18 岁的李昂推上皇位，是为文宗，次年改元太和。

文宗即位时，宦官专权的情况已相当严重，他决心铲除宦官势力，任命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御史大夫，并将二人用作心腹。当时“牛李党争”激烈，两党都与宦官有一定的联系。郑注和李训首先利用牛、李两党之间的矛盾，将两党的首领贬出朝廷，同时，对反对宦官的官员加以重用。接着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斗争，诛杀了宦官韦元素、杨承和、王践言、王守澄、陈志弘等。文宗与李训、郑注商定，趁所有宦官为王守澄送葬时，由郑注率兵将其一网打尽。但李训为了抢功，趁郑注前往凤翔搬兵之际，又与文宗改变了原定方案。太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上朝。李训指使金吾将军韩约奏称金吾左仗院的石榴树上出现了甘露，



图 83　章陵陵山和仅存的神道西列石人　（摄影：郑茂良）

请文宗前往观看，想将仇士良等宦官诱至左仗院全部杀掉。仇士良等行至左仗院门口，发现其中有诈，立即逃回朝堂挟持文宗并率禁军杀李训及朝官一千余人，史称“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以后，文宗实际被宦官软禁。开成五年（840）正月，唐文宗自感生命将尽，召来杨嗣复和李珏托付后事，要求他们辅佐太子。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则伪造遗诏，废皇太子为陈王，立李瀍为皇太弟。正月四日，唐文宗崩于大明宫之太和殿，终年 32 岁，谥号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同年八月十九日葬于章陵。

二、营建始末

章陵位于富平县西北 14.5 公里雷村乡西岭山，西岭山又名天乳山，海拔 783 米，孤耸于雷村乡西南部的塬地上。陵园因山而筑，封域 45 里。

文宗死后，由宰相杨嗣复为山陵使，主持章陵的修建工作。唐文宗临死前实际上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仇士良等人在伪造的文宗遗诏中说：“汉文薄葬，朕实慕之，营奉山陵，务从俭约，勿以金银彩缘饰丧具。”故章陵制度，略同丰陵。

章陵因天乳山而建，玄宫开凿于天乳山南麓。陵园平面略呈方形，东西约 1350 米，南北约 1300 米。城垣四面各辟一门，门有门阙，四隅建有角楼。南门内设献殿等建筑，南门外设置神道，列置石象生。此外，还有下宫、陵署等建筑。

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章陵有陪葬墓一座，即贤妃杨氏墓。

三、陵墓演变

章陵在唐代得到较好保护。五代时可能被温韬盗掘。其后陵园建筑相继损毁。宋初曾有诏对此陵进行修葺。明初禁止樵采陵园树木。清毕沅抚陕，立“唐文宗章陵”碑于陵前。近代以来，陵园破坏严重，石刻毁佚严重。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贺梓城、刘庆柱等人曾对章陵进行过调查。90 年代，王双怀、陈安利、刘向阳等对此陵进行过考察。其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巩启明、王保东等也曾对章陵进行调查。

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陈安利《唐十八陵》、刘向阳《唐代帝王陵》等书及刘庆柱等人的相关调查报告有所涉及。

巩启明、王保东等：《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 年第 3 期。

五、遗迹与遗存

实测章陵陵园东南至西南角阙址 840 米，东北至东南角阙址 832 米。神道长 500 余米。建筑遗址破坏严重。现存遗址主要有以下几处：

四门阙台遗址：东神门阙台南北二阙相距 35 米，南阙底长 14.8 米、残宽 7.3 米、残高 3.5 米；北阙底长 15 米、宽 9.5 米、残高 4 米。

西神门阙台南北相距 35 米，南阙底长 13.5 米、宽 6 米、残高 5 米；北阙已被平毁。

南神门东西二阙相距约 90 米，东阙底长 8 米、宽 6.5 米、高约 6 米，西阙底长 10.5 米、宽 8.8 米、残高 5 米。所有阙台均系夯筑，夯土层在 10 厘米至 12 厘米之间。阙台周边均有砖瓦残存。

北神门阙台均被平毁。

西南角楼遗址：平面呈方形，残迹南北长 6.8 米，东西宽 6 米，高 3 米。周围散布若干砖瓦残片。

乳台遗址：在南门外 500 余米处。现存东西二阙，相距 150 米。东阙底长残存 9 米，宽 8 米，高 4 米。西阙底长 10 米，宽 9 米，高 7 米。地表也有残砖破瓦。

章陵石刻在“文革”中被坏严重。目前仅存南门外神道西侧拄剑石人 1 件，残高 1.75 米；东列石柱 1 件，几乎全部埋于地下，地表仅可见柱角。另有蕃酋像 2 件，残高 0.64 至 0.8 米。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章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东至箭杆岭，南至杨窑村，西至西陵村，北至陈家套；一般保护区为陵园四门阙外延 20 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30 米内。

2001 年 6 月，章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章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天乳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五节　唐武宗端陵

一、墓主生平

唐武宗李炎（814 ~ 846），本名李瀍，唐穆宗第五子，母为宣懿皇后韦氏，宪宗元和九年（814）六月十一日生于东宫。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封颖王。开成五年（840）正月四日文宗病逝后继位，时年 27 岁。次年改元会昌。会昌六年（845）三月，改名为李炎。

武宗自继位后，任用李德裕为宰相，整顿朝纲。一方面，限制藩镇势力，平定了卢龙军、昭义军等藩镇叛乱，这些胜利对于提高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积极的意义，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另一方面，抗击回鹘的侵扰，保卫了北方边疆的安定。同时剪除了宫中仇士良等宦官势力，加强了皇权。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唐王朝出现了新的转机。

唐武宗在历史上是以灭佛而著称的皇帝。他的年号是会昌，故佛教界将这场灭佛称之为“会昌法难”。唐武宗之所以灭佛，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教势力至中唐时期已趋于膨胀，“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坏法害人，无愈此道。”[①] 一是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劝说和宰相李德裕等人的支持下，遂有灭佛之举。“会昌法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三武一宗灭佛”中最严厉的一次，在与僧俗地主争夺土地、劳力等方面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在拆毁寺院的过程中，经济损失也不小。特别是不久之后懿宗复法，损失更大，难以估量。但此次灭佛，对佛教的打击很大，尽管此后懿宗掀起新的崇佛高潮，终不能挽救佛教衰落的趋势。

会昌六年（648）三月二十三日，唐武宗因服食“丹药”病逝于大明宫，终年 33 岁。武宗成为太宗、宪宗、穆宗、敬宗之后，又一位因此而死的皇帝。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当年八月三日葬于端陵。

---

① 《全唐文》卷七六《毁佛寺勒僧尼还俗制》。



图 84　端陵封土　　（摄影：李川）

二 、营建始末

端陵在咸阳市三原县徐木原西边。陵近南边断崖，陵南 1500 米即徐木原下的平川。此地海拔 540 米，崖下平川高程约 400 米。

宣宗继位后以宰相李德裕为山陵使，具体负责端陵的建设事宜。端陵是堆土为陵，用时四个多月，到会昌六年（ 648 ）八月，陵寝竣工。

陵园形制与献陵略同，封域 40 里。封土底部东西 58 米、南北 60 米、高 15 米。陵园东西 540 米、南北 593 米。

武宗的宠妃王才人，在武宗驾崩后，于幄下自尽。唐宣宗即位，表彰其节，赠为贤妃，葬在端陵之柏城。

三、陵墓演变

端陵虽修于唐代后期，但由于它位于海拔 540 米的徐木原西边，南边 1500 米处即为断崖，故看上去颇为宏伟。在唐代，端陵管理有序，保护较好。但唐亡后迅速衰败。五代后梁时，端陵被唐陵大盗温韬所掘。宋太祖曾下令修葺。明初朱元璋令禁樵采。清陕西巡抚毕沅立“唐武宗端陵”碑。晚清以来破坏加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所保护，但“文革”中有文物被毁。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考察端陵，并在其《长安史迹研究》一书中有所论述。五六十年代，三原县的文物管理人员对端陵进行了初步调查。80 年代，贺梓城、刘庆柱等学

者在调查十八陵时也对端陵有所留意。90 年代，王双怀、陈安利、刘向阳等人也曾对此陵进行过考察。

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陈安利《唐十八陵》、刘向阳《唐代帝王陵》等书及刘庆柱等人的相关调查报告对端陵有所涉及。

五、遗迹与遗存

实测端陵陵园占地约 32 万平方米，现存建筑遗址有以下几处，即东神门阙遗址、南神门东阙遗址和乳台遗址。

东神门阙台遗址在东门外 34 米处，现存南北二阙相距 76 米。二阙遗存大小基本相等，底长约 24 米，宽 14 米，残高 4 米。夯土层在 8 厘米至 10 厘米之间，地面有大量砖瓦残片。



图 85　端陵东神门双阙　（摄影：李川）

南神门阙台在南门外 34 米处。东西双阙相距 106 米。西阙已毁；东阙底长 12 米，宽 12 米，残高 4.5 米。地面也有砖瓦残片。

乳台遗址位于南门南 248 米处。现存东西双阙相距 140 米。二阙大小基本一致，底长 17.5 米，宽 15 米，高 6 米。地表有残砖碎瓦。

四门石狮 6 件。北神门石狮已毁，其余三门尚属完整。现存每对石狮间距在 14 米至 23 米，距门的距离约 10 米左右。石狮通高 1.6 米至 2.05 米，身长 1.25 米至 1.41 米，宽 0.9 米至 0.98 米。均作蹲踞之状。

神道石刻共 10 件。

石柱 1 对，柱身八个棱面均线刻蔓草花纹，但以南面保存较好，形制同建陵。左侧尚好，右侧已倒折，仅存基础。

翼马 1 对，通高 3.06 米至 3.12 米，身长 2.8 米至 2.85 米，宽 1.05 米至 1.1 米。有卷云双翼。

鸵鸟 1 只，鸟首回顾，身躯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鸭。现已迁碑林博物馆。

立仗马两件，均残。置鞍鞯、披障泥无马镫，饰鞅。

石人 4 尊，东列 3 尊、西列 1 尊，高 2.0 ～ 2.95米。



图 86　端陵东列石人　（摄影：李川）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端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封土周边外延 5 米；一般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均为陵园四门阙址内。

2001 年 6 月，端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端陵保护范围主要包括封土、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六节　唐宣宗贞陵

一、墓主生平

唐宣宗李忱（810 ~ 859），原名李怡，宪宗第十三子，母孝明皇后郑氏。元和五年（810）六月生于大明宫。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封为光王。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一日，武宗病逝。宦官马元贽等将他迎入宫中，立为皇太叔，翌日继承皇位，改名为李忱。时年 37 岁。次年改元大中。

宣宗喜读《贞观政要》，在即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他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打击不法权贵、外戚。他把死于甘露之变中除郑注、李训之外的百官全部昭雪。同时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在对外问题上，不断击败吐蕃、回鹘、党项、奚人，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使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因此，史家对宣宗的评价较高，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中之治”。



图 87　贞陵陵山和神道石刻　　（摄影：李川）

尽管宣宗即位后“忧勤无怠”，但天下常发生水旱灾害。而自大中十二年（858）后，因所任将帅管理不当，各藩镇也相继发生叛乱。宣州都将康全泰驱逐其观察使郑薰、湖南都将石再顺驱逐其观察使韩琮、广州都将王令寰驱逐其节度使杨发、江西都将毛鹤驱逐其观察使郑宪。李忱分命崔铉兼领宣、池、歙三州观察使，温璋任宣州刺史，蔡袭任湖南观察使，李承勋任广州节度使，韦宙任江西观察使，平定各州叛乱。

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宣宗因服长生药中毒，于大明宫驾崩，享年 50 岁，在位 13 年。谥圣武献文孝皇帝，后加谥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庙号宣宗。咸通元年（860）二月十五日葬于贞陵。

二、营建始末

贞陵在咸阳市泾阳县云阳镇西北白王公黄村北的仲山之上，仲山主峰海拔 1560 米，东、西、北三面群山环绕，山南地势较平缓。相传汉高祖的哥哥刘仲曾居于此山，山上有仲子庙。

宣宗死后，懿宗即位，令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绹摄冢宰，具体负责贞陵的营建工作。贞陵设计宏大，施工艰难。但陵墓主体工程的修建只用了将近半年时间。

贞陵因仲山而建，封域 120 里，与昭陵相同。玄宫开凿于仲山的主峰走马岭上，东距东神门 1150 米，西距西神门 840 米，南距南神门 1120 米，北距北神门 2705 米。内城平面略呈曲尺形，总面积 629 万平方米。四门建有门阙，四隅建有角楼。神道长 505 米，宽 68 米，置乳台、鹊台各一对。神道两侧列置石刻。虽陵内建置与乾陵相去甚远，但在唐代后期诸陵中算是最有气派的。

三、陵墓演变

贞陵是唐代后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陵园的管理工作也做得相当到位。唐朝灭亡后，陵园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五代时期，此陵很可能被温韬盗掘。北宋初，太祖赵匡胤曾下诏修补其缺漏。明初禁止樵采。清毕沅曾立“唐宣宗贞陵”碑一通。近代以来虽有破坏，但保存情况比富平、三原诸陵要好一些。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泾阳县文教局、陕西省考古所的一些工作人员曾对贞陵进行过调查。

刘庆柱等人的调查工作较为详细。90 年代以后，王双怀、陈安利、刘向阳等也对此陵进行过实地考察。



图 88　贞陵神道东侧仗马及控马人发掘现场　（编写组供稿）

2007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贞陵进行了全面勘探，贞陵城垣为夯土筑成，平面形状略呈不规则的五边形，城垣四面各有城门遗址，受自然条件限制，门址选址因地制宜，并非对称分布。除南门位于北仲山山脚下地势较平缓外，其余门均筑于山脊上。东西两门直线距离 2066.8 米，南北两门直线距离 3395.3 米。下宫遗址保存较差，宫城整体平面呈方形，南北长 248.39 米，东西宽 172.11 米，宫城南面有城门，宫城内有残存面积较大的夯土建筑遗址 4 处。并对南门东阙、西侧蕃酋殿、西南角阙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蕃酋殿遗址虽然破坏严重，但仍残存有部分建筑遗迹和 6 件蕃酋像残躯，在神道新发现埋于地下的石刻 25 件，包括石人、牵马人、柱础、石座等。还发现宋到明清时期祭祀碑残块共计 13 件[①]。

研究成果：

《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唐十八陵》《唐代帝王陵》等书及刘庆柱等人的相关调查报告有所涉及。此外，有两篇论文。

泾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唐贞陵调查记》，《文博》，1986 年第 6 期。

罗宁《〈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2 期。

①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留住文明》（2006 ~ 2010 年），三秦出版社，2012 年。

五、遗迹与遗存

贞陵南墙沿仲山南麓东西直线构筑，其余三面皆随山脉的自然走向而修。实测城基的宽度均为 3 米。南城基横跨两条峡谷，现在保存最长的一段为 380 米。北城基也跨两条山谷，现存最长的一段为1000米。东城基自东神门以南沿山麓直线构筑，东神门以北随山势蜿蜒而筑，现存最长的一段为 140 米。西城基现存最长的一段为 1500 米。

陵园东、西二门外两对阙址分别位于仲山东西两座山的峰巅上，气势壮观，南北二门阙也较为高大。

东神门阙台在门址东 38 米处，现存南北二阙相距 36 米，两阙底长均为 23 米、宽 19 米、高约 12 米。

西神门阙台在西门外 20 余米处，南北二阙相距约 30 米，大小相仿，底长 18 米、宽 12 米、高约 10 米。

南神门阙台在南门外 40 米处，东西二阙相距 108 米，东阙底长 18 米、残宽 8 米、残高 4 米，西阙底长 18 米、残宽 8 米、残高 3 米。

北神门阙台在北门外 24 米处，东西二阙相间约 24 米，东阙底长 25 米、宽 14.6 米、高约 8.2 米。西阙底长 24 米、宽 14.8 米、高 8.5 米。各阙下均有残砖、筒瓦等建材分布。

角楼遗址也较清晰。东南和西南二角阙址相距 1600 米，东南和东北二角阙址相距 2800 米，东北角阙址西距北门 1600 米，西北角阙址东距北门 1200 米。陵园东南角阙址位于泾阳县石滩村西北，西南角阙址位于泾阳县崔皇村西北，西北角阙址位于淳化县富德村庙坡北，形制略同，址高 2 米左右，长、宽各 12 米。

鹊台遗址位于泾阳县庙背后村北，北距陵园 1982 米，二阙址东西间距 100 米，大小相近，高 4 米、底长 16 米、宽 10 米。

乳台二阙址在陵园南 482 米，位于王东村和王西村北，二阙址东西间距 148 米。现今仅存东阙，高 4.5 米、底长 20 米、宽 14 米。

下宫遗址在陵园南 2000 米，范围东西 250 米，南北 200 米。遗址南部立有“大宋新修唐宣宗庙碑”。

贞陵现存石刻计 39 件，包括石柱 1 对，翼马 1 对，鸵鸟 1 只，石马 5 对（其中神道存 6 匹，



图 89　贞陵西神门双狮和双阙　　（摄影：李川）

东 2、西 4；北神门存 4 匹，但已迁淳化县），石狮 4 对（北神门双狮迁淳化县），石人 16 尊。

贞陵四门石狮的形制同崇陵，除西神门石狮置于西门外 325 米的山梁上外，其余均置于各门外 8 米至 9 米的地方。每对石狮间距 14 米至 22.4 米不等。所有石狮均作蹲踞状，高度在 1.58 ~ 1.9 米之间，

神道石刻自南起首为石柱 1 对。石柱通高 8.08 米，柱身八棱面线刻蔓草花纹。东列石柱保存较好；西列石柱柱身断裂，风蚀较甚。

次为翼马。在石柱北 22 米，身长 2.83 米、身高 2.80 米。东列翼马头如河马，造型粗俗；西列翼马头顶有角，马背上分布着 24 个圆窝。二马的左右翼翅均于颈上部相连通。这些现象皆为前代诸陵所无。

次为鸵鸟。现今地表之上仅存东列鸵鸟，屏高 1.11 米、长 1.40 米，腿短如鸭。整个屏面饰满浮雕山石。

次为立仗马。石马身长 2.05 米，高 1.75 米，背置鞍鞯，披障泥，马尾下垂。

石人的形制略如庄陵。东列为文官，身高 2.47 米。西列为武官，身高 2.88 米。均头戴冠，身着宽袖长袍，足登圆头履。但现存西列南数第 3 石人，其服饰、造型均同东列石人，当为文官。东列现存 7 个石人，均为文官，未发现形同西列石人的武官。



图 90　贞陵东列石人　（摄影：李川）

北神门外石马现存两对已迁淳化县，形制与神道上石马相似。这些石刻雕工较为粗疏，已不能与唐代前期诸陵相比。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贞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陵园东、西、北神门外阙址及南神门外第二对阙址；一般保护区为陵园四门阙外延 10 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10 米内。

2001 年 6 月，贞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2 年，成立贞陵文物管理所，专司贞陵保护管理工作。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贞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仲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下宫、鹊台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七节　唐懿宗简陵

一、墓主生平

唐懿宗李漼（833 ~ 873），原名李温，为宣宗长子，母元昭皇太后晁氏。太和七年（833）十一月十四日生于藩邸。大中元年（847）封郓王。宣宗晚年欲立三子李滋，在其病危时，密诏枢密使王归长等 3 人入宫，拟立李滋为太子，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宣宗崩后即皇帝位于柩前。改名为李漼，时年 27 岁，次年改元咸通。

懿宗在位 15 年，骄奢淫逸，不思进取，宠信宦官，迎奉佛骨，面对内忧不知其危，遭遇外患不觉其难，把宣宗在位期间重新点燃起来的一点希望之光彻底熄灭了。即位时，正值多事之秋，社会矛盾已相当尖锐。但懿宗对此置若罔闻，不思改革，只图享受，其生活之奢侈，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史载他每个月都要举行十几次大宴，山珍海味无所不有。他外出游玩，随从人员多至 10 余万人，浪费钱财不可胜计。由于政治腐败，出现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但唐懿宗不思改革，而是求诸神灵，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规模空前的佛事活动，简直



图 91　人工修整痕迹很明显的简陵陵山　（摄影：郑茂良）

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佛教势力又迅速发展起来。他本人沉溺其中，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布施钱财。在懿宗的倡导下，大规模的法会道场空前兴盛。当时翰林学士刘允章上《直谏书》，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说明统治十分黑暗，老百姓已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

咸通十四年（873）七月十九日，唐懿宗病崩于长安城之咸宁殿，终年 41 岁。谥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次年二月五日，葬于简陵。

二、营建始末

简陵在渭南市富平县西北 18 公里的紫金山，紫金山也叫虎头山，海拔 889 米。山南、山北地势较平坦，东西两边有峰台翼护。

懿宗临终时，遗诏以司空、门下侍郎、平章事韦保衡摄冢宰修建陵寝，要求“其山陵制度，切在俭约，并不得以金银锦绣文饰丧具”[①]。僖宗欲大修陵寝以尽孝道，但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迫在眉睫，国库空虚，政局不稳。故对简陵的修建有一定影响。整个简陵工程显得较为粗放、简陋。

简陵依紫金山而筑，玄宫即开凿于紫金山南腹。陵园有城，四边置门，并建门阙、角阙。西、北二神门外阙址筑于山上，其所在山峰海拔分别为 814 和 853 米，封域 40 里。陵内石刻略如丰陵之制。

三、陵墓演变

简陵在唐代后期诸陵中修建质量较差，不仅如此，在唐末即遭到破坏。五代时又被温韬盗掘。其后陵园建筑逐渐损毁。宋明两代曾有诏保护，但作用甚微。清陕西巡抚毕沅立“唐懿宗简陵”碑。其后破坏仍时有发生。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 40 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曾制作简陵飞马雕刻拓片两份。80 年代以后，贺梓城、刘庆柱、王双怀、陈安利、刘向阳等对此陵进行过考察。

研究成果：仅有《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唐十八陵》《唐代帝王陵》等书及刘庆柱等人的相关调查报告对简陵有所论述。

---

① 《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第 684 页。

五、遗迹与遗存

简陵西、北二门外阙筑于山上，北门外阙址所在的石马岭地势较平坦、开阔，南北二神门和东西二神门的直线距离均为 2000 米左右。遗址主要有四门阙址及乳台遗址。

四门阙遗址：东神门阙台在东门外 34 米处，南北二阙相距 68 米，南阙底长 18 米、宽 15 米、高约 7 米，北阙底长 18 米、宽 15 米、高约 6 米。

西神门阙台在西门外 34 米处，现北二阙址相间 56 米，南阙底长 26 米、宽 21 米、高约 9 米，北阙底长 26.5 米、宽 14.5 米、高约 8 米。

南神门阙台在南门外 42 米处，东西二阙相距 104 米，东阙底部残长 5 米、残宽两米、残高 1.5 米，西阙底长 13 米、宽 8 米、高 7 米。

北神门阙台在北门外 31 米处，东西二阙相距 50 米，东阙底长 18.5 米、宽 16 米、高约 9 米，西阙底长 24 米、宽 18 米、高 8.5 米。阙台周围砖瓦等建筑构件残存。



图 92　近期修整过的石刻简陵北神门　（摄影：郑茂良）

乳台遗址：在南神门外 312 米处。现存东西二阙相距 147 米，东阙底长 20 米、宽 11 米、高 8 米，西阙底部残长 8 米、残宽 5 米，基本夷为平地。

简陵石刻损毁较严重。四门石狮、神道石刻及北门外石刻均曾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四门石狮：存 7 件。东门、西门和北门各存 1 对，每对相距 14.5 米至 20 米不等。南门存

1 只。狮高在 1.4 米至 1.95 米，长 1.15 米至 1.4 米，宽 0.87 米至 1.2 米。均为蹲狮，体型肥硕。

神道石刻，现地仅存 4 件。

翼马 1 对，高度为 2 米、2.1 米，身长分别为 2 米、2.06 米。西列天马头上独角突出，而东列天马独角微小，其形制略同贞陵。这两件石刻已于 1991 年移至陕西历史博物馆保存。



图 93　简陵神道西列仗马　（编写组供稿）

仗马两件，现存仅余西列，形制同贞陵。

石人两件，均在西列，头部皆残，身高 2.4 米，宽袖长袍，腰系革带，双手拄剑，为武官形象。资料记载另有两件小型胡人石刻，造型较为特别，现今实地不存。北门外石刻：玄武门外两侧有仗马现存 4 匹，东 1 西 3，形制与神道仗马相同。另西侧有控马人 1 尊，头部残。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简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陵园东至三条村、西至山西村、南至团结村、北至耀州区赵家堡；一般保护区为陵园四门阙外延 20 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50 米内。

2001 年 6 月，简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简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紫金山陵山、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第十八节　唐僖宗靖陵

一、墓主生平

唐僖宗李儇（862 ~ 888），原名李俨，懿宗第五子，母为惠安皇后王氏。咸通三年（862）五月生于东内大明宫。最初封普王，咸通十四年（873）七月懿宗病重时，被宦官刘行深和韩文约等立为皇太子，懿宗崩后继位，年仅 12 岁，为唐代即位年龄最小的皇帝。

僖宗生于深宫之中，是一个热衷游乐的皇帝。他即位之初，改元乾符，朝政由宦官田令孜操纵。当时土地兼并，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加之关东、河南发了大水，关中出现了旱灾和饥荒，终于暴发了王仙芝和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广明元年（880）十二月，黄巢攻克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唐僖宗仓皇逃往成都。黄巢起义历时十年，直到中和四年（884）才被镇压下去。这场大起义波及大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在镇压的过程中，各地军阀势力恶性发展，之后军阀之间的混战便与日俱增。



图 94　靖陵。矮小的封土、简陋的石刻，大唐的气息早已远逝　（摄影：郑茂良）

光启元年（885）三月，唐僖宗回到长安，又遇上了秦宗权的叛乱。十二月，李克用进逼长安，宦官田令孜挟持唐僖宗逃奔凤翔、宝鸡。

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还长安，三月即崩于长安城中的武德殿，终年27岁。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其年十二月，葬于靖陵。

二、营建始末

靖陵位于咸阳市乾县东北4.5公里铁佛乡南陵村，海拔高度为806米，隔豹峪沟与乾陵相望。

僖宗死后，昭宗即位，以韦昭度摄冢宰，负责修建山陵事务。僖宗临终遗诏称：

> 约锦绣金银之饰，禁奢华雕丽之工，皆例作空文，而并违先旨。今者流离若是，病毒堪悲，仗百姓即百姓一空，捐国用则国用无取，不可踵从前之计度，困此日之生灵。俾朕厚颜，下见先帝。应缘山陵事务，宜令中外商量，比从来每事十分各减六七。桐棺瓦器，朕所慕之，况在今晨，勿欺大夜[①]。

由于刚刚经历了唐末农民战争，唐王朝财政拮据，加之时局动荡，靖陵的规模与制度在唐陵中最为简率，不能与其他诸陵同日而语。

三、陵墓演变

靖陵建于唐末，规模小，谈不上什么气势。五代时被盗。宋明虽有诏保护，但作用有限。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陕西巡抚毕沅曾为靖陵立碑。20世纪90年代，不法分子多次觊觎靖陵。1994年12月30日夜，靖陵再次盗掘。盗墓者用炸药在靖陵封土南侧炸出一个16米深的盗洞，直接进入墓室，对靖陵进行盗窃。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乾县及乾陵的文物考古人员曾对靖陵进行勘踏。80年代以来，贺梓城、刘庆柱等学者也曾对靖陵进行过考察。90年代靖陵被盗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靖陵进行了抢救性发掘，从而使靖陵成为唯一发掘的唐代帝王陵墓。

研究成果散见于《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唐十八陵》《唐代帝王陵》等书及刘庆柱等人的相关调查报告。

---

① 《唐大诏令集》卷十二《僖宗遗诏》。

五、遗迹与遗存

靖陵系堆土而成，平面略呈方形，南北长 485 ~ 510 米，东西宽 480 米。封土底部呈方形，边长 40 米，高 8.6 米；顶部也是方形，边长 8 米。封土在陵园中的位置是东西居中而偏北，距南城墙 264 米，距北城墙 176 米。陵园四边各有一门，门外有阙，四隅有角楼。现存东北、西北和西南角阙址。东北角阙址高 3 米，底长 16.1 米，宽 8 米。西北角阙址高 3 米，底长 5.5 米，宽 4.5 米。西南角阙址已被夷平，现存角阙址残迹长 6.7 米，宽 5.5 米。乳阙在南神门外 325 米处，现存东西二阙相距 100 米，东阙底长 11.3 米、宽 9.8 米、残高 4 米，西阙底长 11.5 米、宽 9.5 米、残高 5.5 米。

考古发掘显示，靖陵地宫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水平全长仅 44.18 米，比唐陵中普通陪葬墓的规格还低。墓道位于封土南侧正中，南北走向，长 35.6 米，宽 2.4 米至 2.9 米，呈 45 度附梯，腰部有二层台，两侧绘有壁画。顶部被盗洞破坏。墓室为土洞构造，穹隆顶，底部南北长 4.5 米，东西宽 5.8 米。东西两壁各有三个壁龛，龛内绘画有兽首人身的生肖图案。墓室的地面用石碑、石块、方砖铺成东西 4.4 米、南北 3.1 米的棺床。棺床与北壁间有两个石函。棺木腐朽，淤泥中有人骨数块。



图 95　靖陵西侧石柱和残缺的翼马　（摄影：郑茂良）

靖陵出土文物 100 余件，主要有石碑、石函、龙凤玉璧、玉佩、哀册玉残片、鎏金铜锁、鎏金宝石铜花等。由于该陵多次被盗，破坏严重，墓内的壁画已不足原来的三分之一，壁画的艺术水平远不能和盛唐时相比。值得注意的是，用来铺设棺床的石碑竟是乾陵陪葬者杨

再思和豆卢钦望的墓碑。豆卢钦望碑保存较好，而杨再思碑文字已漫泐不清。此二碑现存乾陵博物馆。

陵园内原有石刻与其他唐陵相同，现多已残毁。南神门外石狮已残，神道现存石柱、翼马、石马和石人等石刻，石刻东西列间距 60 米。

石柱位于乳台阙址北 24 米，近期有所修复。

翼马在石柱北 26 米，仅存西列，残毁严重。

仗马现存 5 匹，东面 2 匹、西面 3 匹，均不同程度残缺。

石人 3 尊，东列 2 尊、西列 1 尊，均缺失头部。藩酋像 1 尊，现放置于西列石人北侧。

六、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靖陵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东、北至缓坡，西至土坎，南至小路；一般保护区为东、西、北均至土坎，北至缓坡；建设控制地带为东至南北沟，西至南陵村，南至土坎，北至东西路。

2001 年 6 月，靖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1 年 1 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重新调整后，靖陵保护范围主要包含封土、城垣、四门、南门神道等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为各保护区各边外延 200 米。

附一：永康陵

一、墓主生平

永康陵是唐太祖李虎的陵墓。

李虎（？～ 551），陇西成纪人（天水秦安），西魏太尉李天赐之子，唐高祖李渊祖父。李虎博览经史，精研儒学，胸藏奇谋异略，历官秦州清水郡太守、太尉、大都督、尚书左仆射，陇右行台、少师，西魏八柱国之一，封陇西郡公。于大统十七年（551）卒，追封唐国公，谥襄。武德元年（618），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重加整修墓冢，号为永康陵。



图 96　永康陵封土　　（摄影：李川）

二、营建始末

李虎当初下葬时应是遵循王公大臣的规制，李渊建唐之后追谥其为皇帝，对其陵墓自然要以帝礼加以扩建。但李虎墓的原址是否就在三原县，因清道光五年（1825）在甘肃省清水县鲁家湾出土过李虎墓志而变得扑朔迷离[①]。不论是原址扩建还是迁址扩建，永康陵前的石刻都应是在唐朝增置的。从石刻的风格来看，神兽、石狮应该安置于唐代初期，而仗马、石人则表现出明显的唐代中期风格。

至于永康陵是否有陪葬墓，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三》载："建初、启运、兴宁、永康陵，令各一人，从七品下；丞各一人，从八品下。掌守卫山陵。凡陪葬，以文武分左右，子孙从父祖者亦如之；宫人陪葬，则陵户成坟。诸陵四至有封，禁民葬，唯故坟不毁。"另外现今在永康陵东约 5 里的焦村有李寿墓、李广业神道碑和李孝同神道碑；东南 6 里新隆庄有于志宁神道碑和于大猷神道碑；东南约 7 里的三店村有臧希晏神道碑和臧怀恪神道碑（现已迁碑林博物馆）。这些墓葬从唐初延续到唐代中期，符合"子孙从父祖者亦如之"，很可能就是永康陵陪葬墓。

① 陈作义：《唐代先祖李虎墓》，《人民政协报》，1997 年 10 月 29 日第 4 版。

三、考古调查与研究

对永康陵的调查研究较少，20 纪世 40 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耗时两日对永康陵封土、神道和附近陪葬墓冢进行调查。90 年代巩启明曾赴永康陵调查，之后发表《唐永康陵调查记》，刊于《文博》杂志 1998 年第 5 期。

四、遗迹与遗存

永康陵位于三原县陵前镇侯家堡。据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调查资料，当年永康陵东、西、北三门均无门址遗迹、石刻遗存。神道由南至北依次有石柱一对（均倒地），石兽一对（东倒西立），仗马两对（均倒毁），石人三对（五倒一立），石狮一对（相对而立、保存完好）。石狮之北约 80 米处有大量砖瓦，估计为献殿遗址所在。封土高约 18 米、底径约 50 米，封土南有毕沅所立“唐太祖永康陵”碑[①]。至 1996 年秋，巩启明调查时测得神道起于封土南侧 246 米处，石柱至石狮长为 205 米、神道两侧石刻间距 30 米。其中石柱、石兽和仗马保存状况没有变化，石柱通高 4.5 米，直径 0.6 米；下有石座，八棱柱身，仰覆莲宝珠顶；西侧石柱篆刻“唐永康之陵”五字。向北约 30 米为石兽，均通高 2.1 米，长 2.6 米，昂首，西侧石兽立于长方形浮雕云纹基座上，后腿及尾部有不同程度残缺；东侧石兽四肢残毁仆倒于地。再北 28 米为仗马 2 对，每对仗马间隔 28 米，仗马均通高 2.5 米，长 1.4 米，头部及四肢有残缺，马身雕有鞍鞯。而石人只剩 1 对位于仗马北侧 60 米处，西侧石人残存腰部以下，东侧石人于 1960 年迁入碑林博物馆。而石人之北 60 米处的一对石狮，西侧石狮于 1959 年迁入碑林博物馆，东侧石狮仅保留狮身残石一块。



图 97　永康陵神道西侧石兽　（摄影：李川）

① 何正璜：《何正璜考古游记》，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年，第 192 ~ 194 页。

封土前毕沅碑亦佚失[①]。

现今在永康陵陵区只可见西侧石兽屹立，其余石刻已埋入地下。

五、保护管理

1992 年 4 月，永康陵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其重点保护区为墓冢周围外延 7 米，包括所有石刻；一般保护区为重点保护区外延 13 米；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173 米。

2013 年 3 月，永康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二：唐世祖兴宁陵

一、墓主生平

兴宁陵是唐世祖李昞的陵墓。李昞（514 ~ 572），亦作李昺，字明泽，祖籍陇西，是唐朝开国君主李渊的父亲，妻为元贞皇后独孤氏。出身陇西李氏，家族世代都仕于北朝，其父李虎为西魏八大柱国之一，称陇西郡公。551 年，李昞承袭为陇西郡公，564 年，加封唐国公。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李昞病故，享年 59 岁，谥唐仁公。李渊登位后，他被尊为皇帝，庙号唐世祖，谥号元皇帝，其墓重新扩建，号曰兴宁陵。



图 98　兴宁陵神道石刻　　（摄影：郑茂良）

① 巩启明：《唐永康陵调查记》，《文博》，1998 年第 5 期。

二、营建始末

李昞终于北周建德元年(572),其墓葬即当时所建,因此此墓当属北周国公墓,不属帝王陵。入唐，兴宁陵同永康陵一样，经过一番追谥扩建，增加陵前石刻，达成帝陵规模。其石刻风格同永康陵前石刻风格极为相似，其神兽、石狮应该安置于唐代初期，王子云在《陕西古代石雕刻》一书中评价：“兴宁陵前瑞兽，就其形象和风格看，与其父李虎永康陵的瑞兽很接近，虽在体躯的表现方面比永康陵的瑞兽显得健壮，但仍然保持了初唐时期的质朴风格。”而仗马、石人则增设于唐代中期。

三、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纪世 40 年代，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兴宁陵进行调查。2010 年、2014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两次组织人力对兴宁陵陵园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初步搞清了陵园的整体结构布局，为陵园遗址的整体保护规划提供了详细的基础资料。2016 年，对陵园石刻及部分建筑基址进行发掘清理，以进一步验证勘探结果的真实性。

四、 遗迹与遗存

兴宁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后排村，西北距汉高祖长陵约 1 公里，西距秦咸阳城一号宫殿遗址约 2.5 公里，南隔渭水与唐长安城相望。兴宁陵封土为园丘形，底径约 15 米，残高 5 米。陵南设神道，自南而北地面之上列置石刻 8 件。为石兽 1 对，地面上高 1.6 米，通长 2.25 米，昂首，雕卷云纹双翼，腹下有云状柱与底座相连；仗马两对，地面上高 1.2 ~ 1.27 米，通长 2.05 ~ 2.2 米，马首微俯，身佩鞍镫；石狮 1 对，地面上高 0.9 米，长 1.3 米。

2016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兴宁陵神道两侧发掘出土石柱、石人等石刻 9 件，其中石柱 1 对，位于石兽南侧，均埋于地下；石人 5 尊（西列中间石人佚失），位于仗马北侧，东为文官、西为武将，均失去头部。另外在东列南起第二匹、西列南起第一匹仗马旁发掘出土控马人各 1 尊，其中西列控马人保存头部，为胡人形象。考古发掘之后，这些石刻又被埋入地下保存[①]。

① 赵争耀：《唐兴宁陵考古新发现 9 件石刻》，《三秦都市报》，2016 年 10 月 14 日，第 A12 版。



图 99　在兴宁陵考古发现的一尊控马人，头部保存完好，在现存唐陵控马人中实属罕见（摄影：郑茂良）

五、保护管理

1956 年 8 月，李晒墓由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墓冢周围外延 5 米及陵墓石刻；一般保护区为墓冢周围外延 15 米，石刻周围外延 5 米内；建设控制地带为一般保护区外延 200 米。

2013 年 3 月，兴宁陵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三：顺陵

一、墓主生平

荣国夫人杨氏（579 ~ 670），出身隋朝宗室，父杨达，伯父为隋朝观王杨雄。杨氏 44 岁嫁给武士彟，生三女，长女嫁贺兰越石，次女武则天，三女下嫁郭孝慎。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后，封杨氏为代国夫人，显庆五年（660）十月九日，改封荣国夫人。后又改封卫国夫人。咸亨元年（670）八月二日杨氏在九成宫而殁，寿高 91 岁，赠鲁国太夫人，谥号忠烈，闰九月加赠太原王妃。光宅元年（684），武则天追封武士彟为太师、魏王，杨氏则为魏王妃。五年后，即永昌元年（689），武则天再加封武士彟为周忠孝太皇，杨氏为周忠

孝太后。

杨氏完全是母以女贵。她逝世以后，因为她的丈夫武士彟封太原郡王，故依王礼规制葬之，冢称墓。不过到了 684 年，武则天临朝称制，便增封其父为太师，魏王，母为王妃。到了 689 年，又增封父为忠孝太皇，母为忠孝太后，从而改父墓为章德陵，改母墓为明义陵。690 年武则天称帝，又增封父为太祖孝明高皇帝，母为孝明高皇后，并将其父的章德陵改为昊陵，其母的明义陵改为顺陵。



图 100　顺陵封土和内城神道　（摄影：郑茂良）

二、营建始末

顺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韩家村南。“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略云，杨氏死时，头脑清醒，她认为合葬非古，表示“将追究罔极之慈，愿在先茔之侧”。武则天乃“奉尊遗旨，无忝微音。割同穴之芳规，就循陔之懿躅。即以其年庚午闰九月辛酉，迁座于雍州咸阳县之洪渎原郑恭王旧茔之左”。郑恭王即为杨氏之父杨达。《新唐书·高宗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载：“诏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亲与外命妇赴吊，以王礼葬咸阳，给班剑、葆仗、鼓吹”。

武则天临朝称制以后，在尊崇其父的同时，也进行了尊崇其母的活动。永昌元年（689）尊其母为忠孝太后，改墓为明义陵；天授元年（690）又追尊其母为孝明高皇后，并改称顺陵；圣历二年（699）改顺陵为望凤台。长安二年（702）又在顺陵立“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顺陵碑”。唐玄宗开元元年（713）改称太原王妃墓，但后来民间一

直沿用顺陵之旧称。

三、考古调查与研究

20 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曾考察顺陵。1962 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顺陵进行勘察，王世和发表了《唐顺陵勘查记》。改革开放以后，贺梓城、刘庆柱、王双怀、刘向阳等人都曾对此墓进行过实地考察。

研究成果：

张德臣：《大唐女皇与顺陵》，三秦出版社，2005 年。

王世和：《唐顺陵勘查记》，《文物》，1964 年第 1 期。

张德臣：《顺陵碑与嘉靖地震》，《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 年第 1 期。

张延峰：《武则天与唐顺陵》，《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 年第 6 期。

赵荣、权东计：《唐顺陵遗址现状与形制探讨》，《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4 期。

范培松：《顺陵天禄漫谈》，《文博》，2004 年第 3 期。

赵映奎：《唐代顺陵石狮造型艺术特色初探》，西安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1 年。

王洪汀：《唐代顺陵石刻中走狮形象分析》，西安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12 年。

田有前：《唐顺陵营建过程研究》，《考古与文物 》，2013 年第 4 期。

李　超：《唐顺陵石刻本体状况与保存环境的监测评估》，西北大学硕士论文， 2014 年。

四、遗迹与遗物

顺陵原来仅有一重城郭，后来扩建，又修一重，形成内外二城格局。陵园平面略呈长方形。内城位于外城偏北部，南墙长 286 米，东墙长 291 米，西墙长 294 米，北墙长 282 米，面积 83070 平方米。外城南北长 1264 米，东西宽 866 米，面积 1094624 平方米。城墙系夯土筑成，四边置门及阙。墓冢位于内城北部略偏西。神道在南神门外，列置大型石刻。

经过 1300 多年的风雨沧桑，顺陵陵园发生了很大变化，建筑遗迹的损毁严重。从现存城垣残迹来看，外城南面正门外有两个土阙，相距 50 米。内城南墙中段亦有两个土阙，相距 22 米。城墙系夯土筑成，残宽 1.9 ~ 2.2 米。封土底部平面呈方形，边长 48.5 米，陵高 12.6 米。经钻探获知，墓道为斜坡形，长 28.5 米，高 2 米。墓道中绘有壁画。



图 101　顺陵神道西列天禄　（摄影：郑茂良）

（一）四门石狮

现存陵东、西、北神门石狮 3 对。均作蹲踞状。狮高 3 米左右，胸宽 1.10 米，座高 0.5 米。6 个门狮风格基本一致，但神态各异。西门北侧石狮，螺鬃盘旋，腮髯奋张，上唇卷翘，舌尖勾起，腕趾筋腱凹凸，爪锋深陷入石，气势逼人。东门南侧石狮，鬃鬣纷披，阔口长目，尾巴盘屈而后甩上脊背，雄健而舒放。北门西侧石狮，目光如炬，獠牙似剑，筋肉隆起，爪如坚钢，富有活力。南神门为走狮，雄、雌各一。走狮体积巨大，造型雄伟，呈阔步缓行姿态，气势磅礴，威武有力。雄狮高 3.05 米，长 3.45 米，宽 1.0 米，头披卷毛，突眼隆鼻，丰颐利齿，阔口半开，看上去十分雄伟。

（二）神道石刻

陵前内外两处神道现存石人、石羊、石莲花座、石柱顶、石础、天禄等石刻 30 余件。其中以外神道瑞兽天禄是最有代表性的。

天禄：现存 1 对，位于陵前神道两侧。天禄为瑞兽，其形似鹿，因头长一角，俗称“独角兽”。高 4.15 米，长 4.2 米，宽 1.9 米。此像昂首端立，神态镇静而威猛。肩部和前腿两边相接处长有双翅，翅上刻卷纹。四肢雄健，长尾拖地。体量庞大，姿态生动。

碑铭：神道南端原有一《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此碑系武三思撰文，相王李旦（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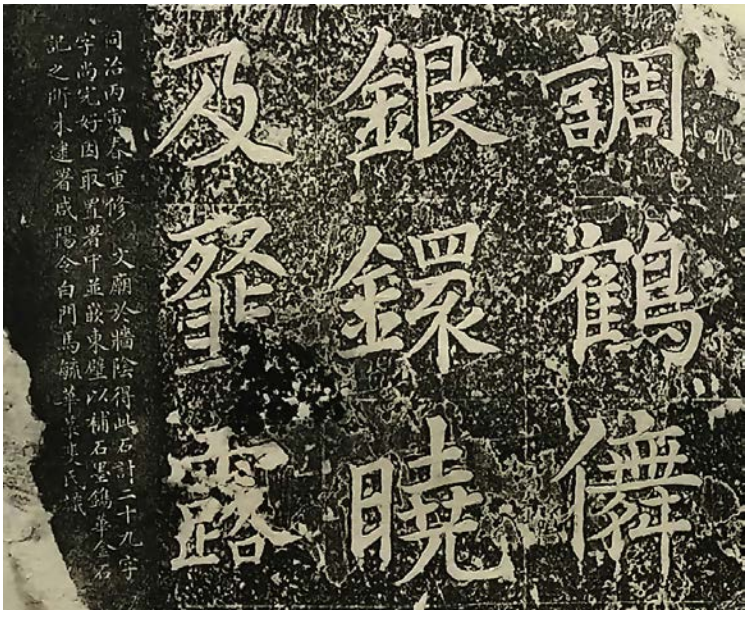


图 102　顺陵残碑从清初陆续被发现，其中右下角一块残碑上原本留有清同治年间题刻，记录了这块残碑被发现保存的过程，但今字迹已泐，幸留有民国时期拓片，得知题刻全文如下：“同治丙寅（同治五年、1866）春，重修文庙于墙阴得此石，计二十九字，字尚完好，因取置署中并嵌东壁，以补石墨镌华金石记之未逮。署咸阳令白门马毓华棠溪裴氏识。”　（摄影：郑茂良）

唐睿宗）书丹，全文 4000 余字，其中有武则天造字 16 个，碑刻于长安二年（702）正月，为唐代名碑之一。明嘉靖乙卯年（1555）关中大地震时断为多节，现存残石 9 块，藏于咸阳博物馆。

此外，顺陵附近还曾出土武三思镇墓石 1 方，有“今陪顺陵”刻书。陵园西南有两座土冢，东西并列。西面一座发掘出土苏府君墓志铭盖一块，目前学界认为此墓墓主是苏定方；东面一座已塌陷，1984 年出土“大唐故光禄大夫工部尚书使持节都荆州刺史驸马都尉上柱国莘安公窦府君墓志铭”一合。由此可知，这两座墓冢应非顺陵陪葬墓。

五、保护管理

1961 年 3 月，顺陵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0 年成立了顺陵文物保管所。

1992 年 4 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保护范围：重点保护区为墓冢、土阙及所有石刻；一般保护区及建设控制地带为南至土阙南 200 米，北至石马北 200 米，西至西门石狮西 200 米，东至东门石狮东 200 米。

2001 年 6 月，丰陵作为“唐代帝陵”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近期对顺陵周边环境进行保护改造，将依托唐顺陵打造西北最大的国

际樱花文化展示基地。

附四：李茂贞墓

一、墓主生平

李茂贞（856 ~ 924），原名宋文通，字正臣，深州博野（今河北蠡县）人。唐末至五代时期藩镇军阀，官至凤翔、陇右节度使，封岐王。

李茂贞初入镇州博野军，以军功升任队长，之后所属军队击败了黄巢的部将尚让，以军功迁神策军指挥使，光启二年（886），田令孜挟唐僖宗逃往凤翔，李茂贞带领所部担任唐僖宗的护卫，抵挡朱玫手下大将王行瑜的追兵。因功受命为武定节度使，为唐僖宗赐姓名为李茂贞。光启三年（887），唐僖宗由凤翔返回长安，遭遇藩镇李昌符拦截，李茂贞将其击败斩杀，晋升凤翔、陇右节度使。大顺元年（890）封陇西郡王。景福年间（893）朝廷与李茂贞发生多次冲突，先后数次出兵讨伐，结果连连战败。宰相杜让能、李溪、韦昭度先后被杀，李茂贞不但未获罪反被晋封为岐王，加守尚书令。

唐朝灭亡后，李茂贞未向后梁称臣，沿用唐哀帝的天佑年号。后唐建立后，李茂贞上表给庄宗李存勖，向后唐称臣，改封其为秦王。后唐同光二年（924）卒于凤翔府私第，享年 69 岁，谥曰忠敬，由其子李从曮嗣立。



图 103　修整后的李茂贞墓神道　（摄影：郑茂良）

二、营建始末

据凤翔节度推官薛光序撰“大唐秦王谥曰忠敬墓志铭并序”和凤翔管内观察支使鱼崇远撰“晋故秦国贤德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李茂贞于同光二年（924）四月卒于凤翔府私第，次年十二月迁葬于宝鸡县陈仓里，归祔于先考大茔，营建时间最少在20个月。李茂贞妻刘氏于天福八年（943）十月卒，开运二年（945）十一月祔葬于李茂贞陵，修造时间至少36个月，前后两次陵墓建造均由其子李从曮的主持，李茂贞墓结构简单，刘氏墓则规模宏大，结构复杂[①]。李茂贞及其夫人墓既不是按人臣墓、也不是按帝王墓规格建造，在等级分明的时代，判定为人臣墓葬，不应该有双室砖墓，也不能带中央神道，更不得立石柱。判定为帝王陵，则其生前并未称帝，属有实而无名型。另外帝王陵不见有墓志，但墓志提及“地称强国”“而称盟主”，可视为建造陵墓者的理论定性，凭盟主之名得以统治强国，这也许能解释李茂贞墓的制度介于陵与墓之间的现象。

三、历代变迁

李茂贞墓位于今宝鸡市金台区北塬上的陵塬乡陵原村，南距宝鸡市5公里，背靠陇山，濒临渭河，三面环沟。东过金陵河与贾村塬相邻，西隔长寿河与紫塬相望，塬下有穿过宝鸡市区的渭河。北部延伸至千阳岭，属陇山向东南延伸的余脉。陵塬坐落在北原山脚下，属陕西黄土高原的一个板块，起始于吴山，形如屏风，南部平坦如砥，北部呈台阶式向上渐次抬高。这里黄土深厚，水位偏低，适宜深挖墓穴和丰殓厚葬，建造茔域条件优越。

清代乾隆十二年（1747）凤翔府曾奉旨整修时留下断续围墙。1982年，宝鸡县人民政府立碑保护，但盗墓活动不止，古冢出现深达15米的盗洞。1998年，宝鸡市考古队对陵塬村古墓进行考古勘探，发现一座存封土的墓葬。经当地村民提供线索，又在其西发现了一座无封土墓葬。1999年，宝鸡市文物局委托宝鸡市考古队对东侧古墓进行发掘，找到了墓道。到2001年，考古工作重新开始。

①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经过考古调查、勘探和保护性发掘后，其形制基本清楚，属夫妻同陵不同穴的葬制，即双穴合葬墓。李茂贞墓室位于陵园东北侧，残存部分夯筑封土，呈覆斗形，东西长 18 米，南北宽 13.8 米，残高 2.1 米。墓葬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组成，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墓，坐北朝南，总长 50.7 米，墓室砖石混用。李茂贞妻秦国贤德太夫人刘氏墓室位于陵园西北侧，封土被平整土地时夷为平地，由墓道、端门、庭院、墓门、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几部分组成，全长 57.1 米，属于石条拱券和青砖构筑的砖石结构墓。两墓平行，相距 32 米。

墓前神道，位于两墓正南方，距李茂贞墓道开口 30 米，神道宽 12 米，东西两侧各有石造像一排，相向而立。这些石刻包括：文武官、动物、石柱等，曾被人为推倒破坏，有的已经毁坏不存，现有的均不同程度损坏。造像均选用青色石灰岩雕琢而成，人物像配长方形石座，动物像则像座浑然一体。其西侧现存造像 14 尊（组），包括武官 3、文官 2、马与控马人 2、虎 3、羊 3、石柱 1，造像间距约 10 米，均面向东方；东侧造像现存 7 尊（组），包括武官 1、文官 1、羊 2、马与控马人 2、石柱 1，造像间距 10 米，均面向西方。其中东侧石柱保存较西侧稍好，由宝顶、柱身、底座三部分组成，柱身八棱，通高 367 厘米，而西侧石柱仅残存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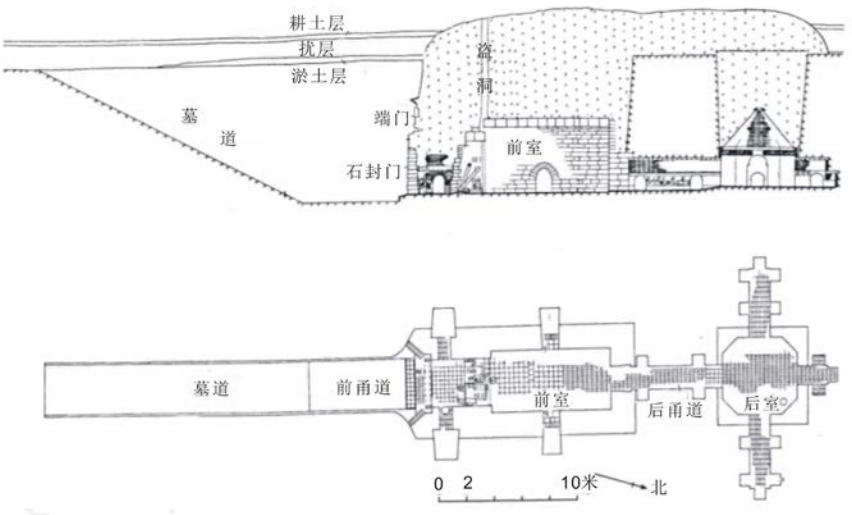


图 104　李茂贞夫人墓平、剖面图　（采自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厘米。此外，尚有位置不明之两件石像，一为石狮，一为文官。据传原来陵园四门各有一对门狮，但后来多毁坏，仅存 1 只也于 1970 年初毁掉。

李茂贞墓出土文物包括陶瓷器、金属器、石器等种类。其中陶瓷器物主要有经幢残片，八棱柱状，正中有圆孔，径 12 厘米，每片残存字数多少不等，最多者 46 字，最少者仅存 3 字。另有塔式罐和盖等。金属器物有铜器和铁器，其中铜器有铺首及衔环，泡钉若干，铜饰，铜镜 1 件，开元通宝钱币 15 枚；铁器有牛、猪各 1 件等。石器有经幢 1 件，护法金刚座 1 件，莲花座 1 件，墓志及盖 1 合等。经幢为石灰岩八棱柱身，上部残，五面阴刻梵文、汉文的双体经文，三面未刻文字，残高，170 厘米。甬道中部地面上摆放的墓志分为志盖和墓志石，志盖为盝顶形，盖顶边刻牡丹花纹、角刻团花纹，而中间却未刻文字，四斜分别线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下层为墓志石，共有 1128 字，正方形，青石质，行楷书体，志文结构严谨，书写飘逸流畅，首题“大唐秦王谥曰忠敬墓志铭并序”。墓志记录李茂贞世系、生平、家族等内容。

刘氏墓出土文物有陶瓷器、金属器、石器、砖刻等。陶瓷器物有碗、兽面饰之类如鸱吻、狮面瓦当、兽面瓦当、塔式高柄仰莲杯、塔式罐、陶经幢、佛像等。其中陶经幢残片上有阴刻文字 3 行 9 字，陶佛像头部残缺，残高 10 厘米，袒胸，双手拥抱于腹前施禅定印，双腿结双跏趺坐，雕琢形象线条流畅。金属器包括铜制泡钉、铺首及衔环、铃、锁、管饰、马镫、带扣、帐钩、片饰及开元通宝钱；铁制刀、钩、环、鼎等；银制支撑器。石器包括石门、造像石、石函、墓志 1 合。造像石为八棱柱状体，各面有莲花形龛，龛内雕供养人、侍女、护法金刚等，通高 30 厘米。石函为长方形盝顶盖合缝处用铁汁粘合，内装似铁券类器物。墓志为“晋故秦国贤德太夫人墓志铭并序”，盝顶形，篆书阴刻，四斜分别线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下层墓志有 1691 字，长方形，青灰色石材，四侧线刻十二生肖像，制作精细，保存完整。

刘氏墓最具特点的是砖刻器物，如砖砌仿木结构端门、庭院东西两壁上砖雕、后甬道东西壁二龛之间镶砌的重彩伎乐砖雕等，彩绘浮雕砖共 72 块、构成完整图案 37 幅。其中端门第三层东、西厢各有妇人启门图，端门西厢顶端有乘凤驾鹤西游图；庭院东壁砌有二人轿子图（2 人均面向墓室，归来之意），西壁砌有八人轿子图（8 人均面向墓道，出行之意），庭院东耳室南北壁有汉人牵马图两幅，西耳室南北壁有胡人牵驼图和胡人持节牵驼图，庭院东西两侧各有一组横向排列的瑞鸟衔草图，西壁完整，东壁仅存局部；后甬道东西两壁有 9 幅伎乐砖

雕图，东壁自南而北分别是舞蹈者、抱拍板者、击正鼓者、拍毛员鼓者、击鸡娄鼓者、擂大鼓者、残、操笛者和乐舞指挥者。西壁自南而北分别是舞蹈者、拍板者、弹琵琶者、击羯鼓者、敲磬者、吹笙者、上部残、吹箫者和乐舞指挥者，这一组砖雕图表现墓主生前生活情景之娱乐、出行等场面。砖雕手法娴熟，姿态优美，线条流畅，是难得的艺术佳作，可与同时期之成都王建墓、河北王处直墓、郴县冯晖墓等五代墓之散乐图媲美。另外该墓还有大量壁画，内容有侍女图、花草图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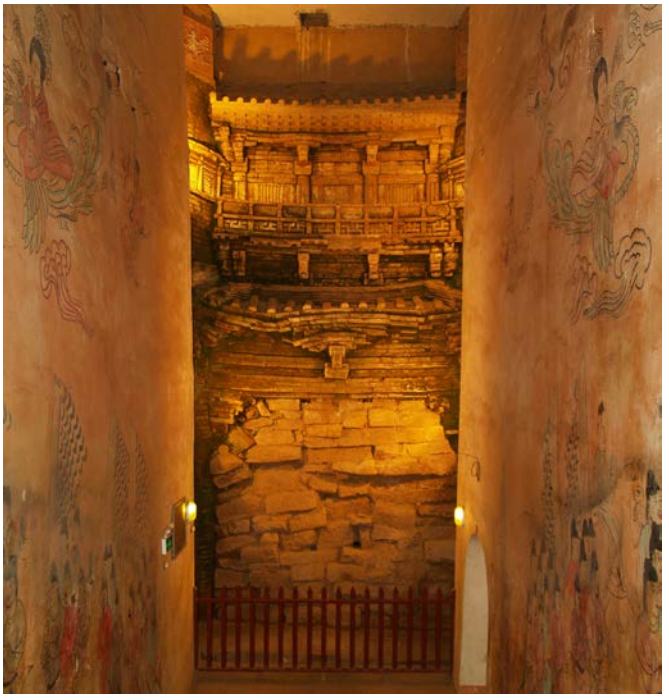


图 105　李茂贞夫人墓砖砌仿木结构端门　（摄影：郑茂良）

刘氏墓室之砖砌仿木结构建筑端门别致新颖，气势恢宏，自下而上，分为三层。最下一层由台阶、石封门、补间铺作、柱头铺作、梁架和屋顶等部分组成，除封门采用石材外，其余部分皆以各种形制的泥质灰陶砖构件构成。第二层的基础建在下层正脊的北面台阶上，由补间铺作、转角铺作、勾栏栏板、栏杆等几部分构成。上层是端门整体建筑的最高一层，中心建在第二层勾栏飞阁屋顶之上，两侧斜壁上又分别建有东西两厢，斜壁各宽 1.38 米。正面以高浮雕的砖雕和砖砌的立柱、柱头铺作，共同构成仿木结构的四柱三开间的建筑格局。大门位置居中，两侧各有一落地式破子棂窗，东西两厢皆呈三柱两开间，各有一门、一窗，东厢板门两扇半开，一女持拂尘，端立门间；西厢板门一扇紧闭，一扇微启，一侍女俏立于微启之门间，作探身张望状。以妇女启门作装饰，一为启门，一为闭门，做法成熟，既是对东汉以来同类题材的继承和创新，也是对宋代以后此类题材启转。

研究成果：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五代李茂贞夫妇墓》，科学出版社，2008 年。

刘军社：《李茂贞与秦王陵》，三秦出版社，2006 年。

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岐王李茂贞》，宝鸡市地方志办公室出版发行，2003 年。

蒋五宝：《揭开大唐秦王陵之谜》，三秦出版社，2007 年。

王凤翔：《晚唐五代秦岐政权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 年。

王凤翔：《新见唐秦王李茂贞墓志浅释》，《文物春秋》，2006 年第 6 期。

王凤翔:《唐秦王李茂贞之妻刘氏墓志考释》,《唐史论丛》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 年。

五、保护管理

清乾隆十二年（1747）凤翔府筑墙围护、整修陵园。

1982 年，宝鸡县人民政府为李茂贞墓立碑保护，

1998 年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对陵墓进行了考古勘探，1999 年对东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2001 年继续对东西两座墓室进行考古发掘。先发掘刘氏墓室，在发掘墓道过程中，为不破坏端门，另辟蹊径绕过端门而入。

2003 年 9 月，李茂贞墓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其保护范围为：墓冢四面外延 50 米，包括墓前神道和陪葬墓区，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各外延 10 米。

2003 年底，在李茂贞墓的遗址上建起大唐秦王陵博物馆，陵园新建山门、大殿、展厅等，占地近 60 亩，对游客开放，初步完成了对李茂贞墓的保护性开发利用。

2013 年 3 月，李茂贞墓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七章

明代秦藩王墓



洪武三年始，朱元璋先后分封诸子为藩王，镇守各地。明制规定“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由于封陕的第一代藩王为朱元璋二子朱樉，在诸王中年龄最长、权利最重，故秦藩号称天下首藩。

《明史·表第一》载：“愍王樉，太祖嫡二子，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府。”据《明史》记载，以后还传 10 代 14 位至景王朱存枢，崇祯末被李自成所掳，不知所终。有明一代 200 余年间，先后有 13 位藩王[①] 30 余位郡王及其夫人、子孙等埋葬于今长安区、雁塔区的少陵原、鸿固原、高望原、凤栖原等地。整个墓地分布于未央路至韦曲南北中轴线以东、西安府城东南、明咸宁县境内南北长约 9 公里、东西宽约 5 公里的范围内，被称为明秦藩十三陵。赵崡在《游城南》中记：“少陵（宣帝许后陵）在司马村东，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柏森蔚，华表、翁仲，数十里相望焉。”可窥当年规模。

现地表只发现 7 座陵园，分别为第一代愍王朱樉陵园、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第三代康王朱志堙陵园、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第八代宣王朱怀堮陵园、第九代世子朱敬鈔陵园。陵区的分布以第一代愍王朱樉陵园为中心，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位于朱樉陵园之东，第三代僖王朱志堙陵园、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位于朱樉陵园之东南，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第八代宣王朱怀堮陵园、第九代世子朱敬鈔陵园位于朱樉陵园西北或西。

---

① 梁志胜、王浩远依据大明秦世子朱存枢暨妃张氏合葬圹志、大明宗室秦景王圹志墓志认为《明史》记录有误，朱存枢为世子时已薨。秦景王当为朱存机，最后一位秦王当是朱存机。朱存枢及妃张氏合葬墓志并盖于 1978 年 4 月在西安市南郊邮电第十研究所院内出土，收藏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2006 年被收入《陕西碑石精华》。大明宗室秦景王墓志朱存机墓志现存长安区博物馆。文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5 期。

《西安府志》卷六十四《古迹下・陵墓》载：

“秦愍王朱楝墓在鸿固原，妃邓氏、王氏祔。又隐王尚炳、僖王志堙、淮王志均、昭王秉欋俱在左右。秦康王志堙墓在少陵原，子惠三公锡墓祔。秦简王诚泳墓在韦曲原，定王惟焯墓祔。秦宣王怀堵墓在高望原，靖王敬镕、敬王谊澑、肃王谊溯、景王存枢墓俱在焉。”

考古调查时，在愍王朱楝陵园内发现 10 座墓葬，其中也发现第三代僖王朱志堙墓志石，可见记载可信。依次推测第三代僖王朱志堙、第三代怀王朱志均、六代昭王秉欋墓葬应在第一代朱楝陵园内；第七代定王惟焯墓，当在第五代简王诚泳陵园内或附近；第九代秦王朱靖王敬镕、第十代敬王谊澑、第十代肃王谊溯当在第八代宣王朱怀堵陵园内或附近。

第一节　秦愍王朱樉墓

一、墓主生平

秦愍王朱樉（1356 ~ 1395），太祖第二子，高皇后生。洪武三年（1370）封秦王，十一年（1378）就藩西安。其年五月皇帝赐玺书曰："关内之民，自元氏失政，不胜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转输之劳，民未休息。尔之国，若宫室已完，其不急之务悉已之。"二十二年（1389）皇帝改大宗正院为宗人府，朱樉为宗人令。二十八年（1395）正月，朱樉帅平羌将军宁正征叛番，番惧而降。朱元璋赉予甚厚。同年三月因病薨，享年 40 岁，赐谥册曰："哀痛者，父子之情；追谥者，天下之公。朕封建诸子，以尔年长，首封于秦，期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夫何不良于德，竟殒厥身，其谥曰愍。"

朱樉妃，元河南王王保保之妹。次妃，宁河王邓愈女。朱樉薨，王妃殉葬。葬朱樉墓旁。

二、营建始末

朱樉墓位于秦藩陵园区中部，东与西汉宣帝杜陵相距 2000 米左右，今长安区韦曲街道办大府井村东北约 50 米。由陵墙、主墓、陪葬墓、陵园内建筑基址及神道石刻 5 部分组成。主墓朱樉陵位于陵园内中部偏北，居于 10 座墓葬的中部。20 世纪 70 年代在陵区地表仍可见到朱樉妃邓氏墓碑。

原地貌为北高南低，呈缓坡状，地域开阔。20 世纪 70 年代平整土地，将缓坡地修为三层台阶地以便耕种。陵园东邻雁引路，南邻大府井村，西邻简王井村，北邻雁翔路。陵园平面长方形，方向 90 度，南北长 430 米，东西宽 370 米，占地面积 156000 平方米。

主墓朱樉墓位于缓坡地最高点，陪葬墓分布于东南、西南两侧，拱卫主墓；陪葬墓 9 座，目前保存有封土者 5 座，封土已被全部破坏者 4 座。据推测 M2、M3 当为朱樉两妃王氏、邓氏的墓葬。2010 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第三代秦僖王朱志堙墓志石，据村民介绍其墓葬为朱樉陵园带封土墓葬之一，后来封土被夷平，M11 当为其墓。按《西安府志》卷六十四《古迹下・陵

墓》记载，第三代秦王淮王志均、第六代昭王秉欉墓葬也应在 9 座陪葬墓之中，但是具体位置不清。其他墓葬墓主也不清。

朱楝墓 M1 墓道南端发现一座建筑基址，整体呈方形，建筑基址相互间有踩踏道路连接。建筑基址南端 10 米处，发现一残石龟座，当为石碑基座。其南为陵园神道，神道为南北走向，通至南陵墙中部门址。神道两侧原有 9 对石刻，目前保存有东侧 9 尊、西侧 7 尊。陵园东、南、西面中部各发现一座门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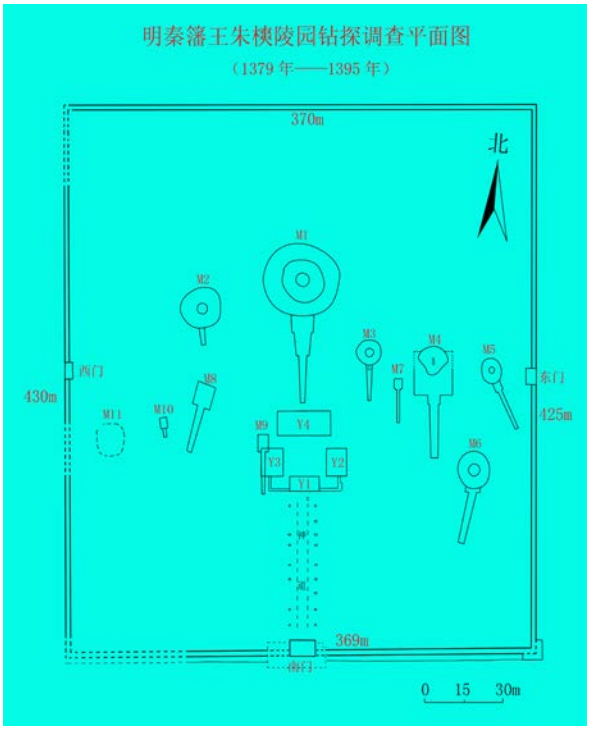


图 1　朱楝陵园平面调查勘探示意图　（编写组供稿）

按照洪武二十八年（1395）定制：“亲王丧，礼部奏遣官掌行丧葬礼，翰林院撰祭文、谥册文、圹志文，遣官造坟，钦天监官卜葬。”愍王朱楝陵园规模不算太小，在选址上应当提前有所考虑，但是愍王因病遽然去世，丧葬也当比较仓促。入葬顺序当是愍王与其妃先葬入，后来第三代秦王及第五代再晚些葬入。

三、陵墓演变

愍王陵园建成后，先后葬入多人，后来又修建了隐王、康王、惠王、简王、宣王陵园及世子墓等。有明一代，这些陵园气势相当宏伟。在 2010 年考古调查时，在愍王朱楝墓墙垣、门址、陵内建筑遗址附近采集多件琉璃鸱吻、瓦当残片及灰陶滴水、瓦砾等，说明当时的陵墙、门址及其他建筑上采用琉璃建筑构件，后来修复时又采用了一些灰陶建筑构件。钻探中发现南门址两侧、东墙址南端和南墙址东端拐角处有大量瓦砾及大量砖石堆积，推测南门及东墙址南端和南墙址东端拐角处可能有大型砖石建筑存在。明王朝覆灭后，因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和破坏，四周陵墙与地面建筑坍塌，已被耕土层覆盖，墓葬封土被逐步蚕食。

经钻探得知愍王朱楝陵园东墙址和北墙址基本保存较好，拐角清晰，夯土结构紧密。西墙址南段和北段及南墙址西段陵墙有所破坏。东陵墙中部偏北发现东门址、西陵墙中部偏北



图 2　朱棣陵园航拍　　（编写组供稿）

发现西门址，相互对应。南门址规模较大，应是每年祭祀活动的主要通道，也应为正门。

神道北端的长方形建筑遗址，当是季时月令祭祀的主要场所。北面的长方形建筑遗址，当是摆放祭祀用品的场所。各个房间有道路连接，说明之间往来频繁。明代定制：

> 亲王自初丧至除服，御祭凡十三坛，封内文武祭一。其服制，王妃、世子、众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宫人，斩衰三年，封内文武官齐衰三日，哭临五日而除。在城军民素服五日。郡王、众子、郡君，为兄及伯叔父齐衰期年，郡王妃小功。凡亲王妃丧，御祭一坛，皇太后中宫、东宫、公主各祭一坛。布政司委官开圹合葬。继妃、次妃祭礼同。其夫人则止御祭一坛。俱造圹祔葬。

四、考古调查与研究

朱棣陵园东墙址现地表已不可见，经勘探东陵墙址保存基本完整，墙址全长 425 米，宽 3.6 ~ 3.8 米，为五花夯土筑成，土质结构紧密。夯土距地表深 0.24 ~ 0.8 米，夯土厚 0.1 ~ 0.9 米。陵墙外东侧发现踩踏路土，长 213 米，宽 3.3 米，其路土厚 0.05 ~ 0.08 米，与陵墙夯土层在同一层面上。在东陵墙址南端向北 50 米处，东西向发掘一剖面，上部堆积层厚 0.2 ~ 0.5 米，夯土面呈斜坡形状，西高东低。墙基夯土宽 3.8 米，夯土厚 0.1 ~ 0.45 米，内为五花状夯土，土质较硬，呈黄褐色。夯土层下为黑垆土，黑垆土厚 0.4 ~ 0.5 米，黑垆土以下为自然原始黄土。东陵墙址坐落在黑垆土之上。地面部分因人为和自然破坏，已无痕迹。

南墙墙址呈东西走向，全长 369 米，东段保存较好，西段破坏较为严重。个别地方墙基夯土保存很薄，南陵墙外也有踩踏路土出现。南墙夯土宽 3.6 米，厚 0.4 ~ 0.5 米，土质紧密。上部扰土堆积厚度为 0.1 ~ 0.4 米。夯土层下面为黑垆土，黑垆土厚度为 0.4 米，土色为深褐色，土质结构紧密。下层为自然原始黄土。

在南陵墙址东端向西 30 米处，南北做一剖面，夯土墙宽为 3.6 米，上部扰土堆积层厚 0.1 ~ 0.45 米，夯土厚度为 0.4 ~ 0.55 米。夯墙为五花夯土夯实，土质较硬，呈黄褐色。南陵墙外踩踏路土保存较好，土质坚硬。踩踏面距地表 0.2 米，踩踏土厚度为 0.05 ~ 0.1 米，东西长 369 米，宽 3.8 米。南陵墙址夯筑于黑垆土之上，由于后期平整土地，地面部分已经消失。



图 3　明秦藩愍王朱楧墓陵园全貌　（摄影：郑茂良）

南门门址位于陵园南陵墙中部，东西长 23 米，南北宽 12 米。墙址夯土距地表 0.6 米，均为五花夯土，夯层分明，土质坚实。周围堆积杂乱，并有大量的瓦砾残片和白灰渣出现，大部分堆积瓦砾较厚，探铲无法穿过。地层堆积如下：耕土层距地表 0.3 米，内含有植物根系，近代堆积等；堆积层 0.3 ~ 0.5 米，土质松散，内含有较多明代砖瓦、白灰渣等；夯土层 0.5 ~ 1.4 米，土质较硬，内含有少量陶渣颗粒，呈五花状，夯层厚 0.2 米；扰土层 1.4 ~ 2 米，部分略带有夯土，呈深褐色，土质稍硬。2.3 米以下为原始黄土。

西门址位于陵园西陵墙中部偏北，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9.4 米，东西宽 6.4 米，门址中部发现踩踏土，长 9 米，宽 5.5 米，厚度为 0.06 米。上部及四周为扰土层覆盖，含有大量的瓦片、白灰渣等。地层堆积：耕土层 厚 0.1 ~ 0.3 米，内含有植物根系，砖瓦碎块等，土质松散；扰

土层 0.3 ~ 0.8 米，内含有少量陶片，砖瓦碎渣，呈黄褐色。夯土层 0.8 ~ 1 米，含有少量陶渣，土层密实；黑垆土 1 ~ 1.4 米，呈黑褐色，土质较硬。以下为原始黄土。

陵区内建筑遗址：由南、北、东、西、通道五部分组成。南房址位于陵园内中部神道正北端，东西长 23 米，南北宽 11.5 米，基址夯土距地表 0.7 ~ 1.5 米，夯土厚度 0.8 ~ 1.1 米，内为五花夯土，土质坚硬。

北房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41.9 米，南北宽 22.5 米，夯土层厚 0.37 米。基址夯土呈黄褐色，土质结构紧密，夯层分明。夯土为五花夯土，夯层厚度 0.15 ~ 0.18 米，土质坚硬。

东房址基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 20.8 米，东西宽 15.9 米。夯土为五花夯土，距地表 0.3 ~ 0.5 米，夯土厚度为 2 ~ 2.2 米，夯土呈黄褐色，土质结构坚实，夯层厚度 0.15 ~ 0.18 米。西房址基址南北长 21 米，东西宽 16.9 米，平面呈长方形。夯土厚度 2.5 米，夯土距地表深 1.2 ~ 1.5 米，夯土为五花夯土，土色呈黄褐色，夯层厚度 0.16 ~ 0.19 米，土质坚硬。

房址上部及四周堆积为扰土层、杂填土，土质松软，内含有较多瓦砾等。部分基址已打破黑垆土层，夯筑于自然原始黄土之上。

通道位于房址的东西两侧。东侧通道（L1）长 28.2 米，宽 2 ~ 3.7 米，踩踏面距地表 0.5 ~ 0.7 米，厚度 0.3 ~ 0.5 米，该通道为南房址与东房址之间连接通道。西侧通道（L2）长 26 米，宽 1.5 米。踩踏路土距地表 1.5 ~ 1.6 米，厚度 0.2 米，该通道为南房址与西房址的连接通道。

研究成果：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群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 年第 2 辑，三秦出版社，1995 年。

肖健一：《明秦藩家族谱系及墓葬分布初探》，《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2 期。

梁志胜、王浩远：《明末秦藩世系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5 期。

陈　冰：《西安明秦王墓的考察与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年。

五、遗迹与遗存

朱楩陵园内共发现陵墓 11 座，编号分别为M 1 至M 11。M 1 位于陵园中部偏北，应为朱楩之墓，由封土堆、墓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封土堆呈圆锥形，保存基本完整，底部径长约 55 米，顶部径 9 米，封土高 15 米。钻探表明，封土由五花夯土筑成，夯土较硬，夯层厚度为



图 4　朱楝墓封土　（摄影：郑茂良）

0.1 ~ 0.12 米。封土顶部草木丛生，发现圆形盗洞。墓道平面梯形，全长 47.5 米，宽 2.5 ~ 16.8 米。墓道底部为斜坡，在封土南 9 米墓道深 16 米见底。根据斜坡坡度计算墓道最深约为 20 米。墓道内为五花夯土回填，土质较密。墓室在封土以下，钻探难度较大，钻孔在 15.6 米处发现墓砖，深孔未能穿过。表明朱楝陵为大型砖室结构，其墓室整体结构不详。

M 2 位于主墓M 1 的西南方向，相距 50 米，由封土、墓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封土呈圆锥形，底部直径 29 米，顶部呈圆形，直径约 5 米，高 12.3 米。封土堆经过夯实，层次分明，夯土为五花夯土，夯层厚 0.1 ~ 0.12 米，土质较为坚硬。墓道平面呈梯形，墓道长 13 米，南端宽 2.6 米，北端宽 3.6 米。封土堆下南 1 米为墓道，深为 8.5 米，坡度为 30°，根据坡度计算最深为 13.5 米。墓道内均为五花夯土回填，夯土坚实，土质密实。墓室在 10.6 米处见砖未能穿过，该墓室应为砖室结构，整体结构不详。

M 3 位于主墓M 1 东南方约 35 米处，由封土堆、墓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封土位于墓道的北端，由于人为蚕食，封土堆底部及周围破坏较为严重，现东西 15 米、南北 17 米，顶部直径 6.8 米，高 5 米，五花夯土打筑而成，夯层厚度为 0.11 ~ 0.13 米，土质坚硬。墓道位于封土堆南，墓道坡度为 8°，平面梯形，长 28 米，南端宽 2.6 米，北端宽 4 米，经钻探墓道深度为 7.2 米。墓道内为五花土加夯回填，夯土密实。墓道北段距封土堆 3 米处，发现一盗洞，开口为圆形，直径 0.8 米，为现代盗洞。墓室压在封土堆以下，盗洞内发现碎砖，分析墓室应为砖室结构，已遭破坏，墓室深度应为 7.8 米左右。

M 9 位于主墓M 1 的南端偏西75 米处，陵园内遗址的西房址叠压于M 9 部分墓道之上，因此推测可能为早期墓葬，与明代陵园无关。M11 位于主墓 M1 的西南方，也是该园内最西边一座墓，现为砖瓦窑，据当地村民证实该墓在烧制砖瓦时遭到严重破坏，可能是第三代僖王朱志堙墓葬。



图 5　朱棟墓神道东侧石麒麟　　（摄影：郑茂良）

神道。根据现场两侧石刻分析，神道长约 120 米，宽约 19 米。神道北端距残存碑座 5 米，南端距南门址约 25 米。

石刻位于神道两侧，并排对立，共有 16 尊，由最北残存碑座至最南石柱处南北长 105 米，因人为移动，部分石刻已不在原位。石刻分别为石柱东西各一、计两件，石虎东西各 1、计两件，石羊东 1 件，石麒麟东西各一、计两件，石马东二西二、计 4 件，石文官东西各一、计两件，石武官东一，石狮东西各一、计两件。

六、保护管理

明秦藩王朱棟陵园，从考古调查发现两种不同的釉陶建筑材料考察，在明代可能被维修过。之后陵墙、门址及其他建筑遗址可能属于自然坍塌，被掩埋于地下。

2001 年，文物部门对朱棟墓前石刻进行扶正、加固保护。

2003 年 9 月，朱棟墓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主墓封土东西 54 米，南北 48 米；神道东西 30 米，南北 225 米；西侧陪葬墓封土东西 36 米、南北 33 米，东侧陪葬墓封土东西 30 米、南北 30 米，2 号陪葬墓封土东西 40 米、南北 36 米，3 号陪葬墓封土东西 30 米、南北 30 米，4 号陪葬墓封土东西 27 米、南北 27 米。以上区域四面外延 40 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 60 米。

2006 年 5 月，朱棟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节　秦隐王墓 、秦康王墓、秦惠王墓

明秦藩第二代隐王朱尚炳陵园，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东伍村北，陵园呈南北方向，平面长方形，南北长 336.0 米，东西宽 192 米，占地面积 64512 平方米。陵园内现存 3 座圆丘形封土，石刻 12 件。

第三代康王朱志堙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康王井村东，地表不见封土，墓前尚存神道碑龟座、石马、石文武官、石狮计 9 件。

第四代惠王朱公锡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庞留井村东，地表残存圜丘形封土两座，墓地尚存“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秦惠王暨妃王氏合葬墓”碑各一通，其他石刻 15 件。



图 6　明惠王和王妃墓封土　　（摄影：郑茂良）

一、墓主生平

明秦藩第二代隐王朱尚炳，愍王朱楝之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继承王位。在位时，沔人高福兴等为乱，朱尚炳巡边境捕盗。永乐九年（1411），朱棣派使者至西安，朱尚炳称疾不出迎，见使者傲慢。朱棣赐书曰：“齐王拜胙，遂以国霸；晋侯惰玉，见讥无后。王勉之。”朱尚炳入朝谢罪。永乐十年（1412）去世，在位称王 18 年，谥为隐，史称秦隐王。

隐王死后其子僖王朱志堙继位，永乐二十二年（1424）薨。在位 12 年，无子，庶兄怀王朱志均由渭南王嗣。宣德元年（1426）薨，在位仅两年，无子。

隐王庶三子康王朱志堙，永乐二十年（1422）封富平王，宣德三年（1428）由富平王进封。嘉靖《陕西通志》云其“仁爱恭敬，无声色货利驰骋畋猎之欲，淡然无足动其中者。”并著有《默庵集》。《明史》卷一百十六《列传诸王》记载宣德四年（1429），护卫军张嵩等讦其府中事。朱志堙不安，辞三护卫。宣宗皇帝答书奖谕。朱志堙顾数听细人，正统十年（1445）诬奏镇守都御陈镒，按问皆虚，而审理正秦弘等凌辱府僚，棰死军役。帝以书戒饬之。景泰六年（1455）薨，在位 28 年，谥曰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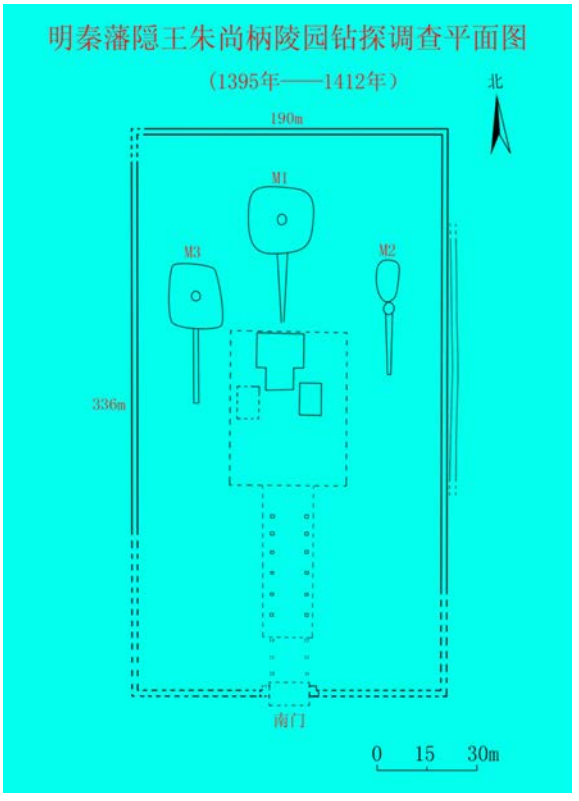


图 7 明隐王朱尚炳陵园钻探调查平面图 （编写组供稿）

明秦藩第四代惠王朱公锡，第三代康王朱志堙嫡长子，天顺二年（1458）袭封秦王。《明史·诸子》载其“以贤闻，好读书”，著《益斋集》。成化二十二年（1486）薨，在位 29 年。

二、考古调查

《西安府志》卷六十四《古迹下·陵墓》载：“又隐王尚炳、僖王志堙、淮王志均、昭王秉樻俱在（愍王陵）左右。秦康王志絜墓在少陵原，子惠三公锡墓祔。”

据考古调查，隐王朱尚炳陵园位于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东伍村北 200 米处， 东距汉宣帝杜陵约 1000 米，西邻雁引路，北邻雁翔路，西距第一代隐王陵园约 800 米。陵园由陵墙、陪葬墓、陵园内建筑基址、神道及石刻 4 部分组成。陵园南北向，平面长方形， 南北长 336 米，东西宽 192 米，占地面积 64512 平方米。东墙基址南北走向，残长 275 米，宽 3.5 米。陵园西墙基址北段保存较为完整，南段由于后期人们平整土地，已无从寻找。陵墙由五花土夯筑，

夯土距地表深 0.3 ~ 0.4 米，夯土厚为 0.4 米，夯土墙基筑于回填土之上。北墙东西走向，北邻雁翔路约 800 米，陵园北墙基址保存较为完整，全长约 192 米，宽 3.5 米。陵园南墙基址已全部消失。钻探中在其中部发现局部夯土基址，残长 5.5 米，宽 3.5 ~ 5 米，夯土距地表深 0.4 米，深 1.1 米。夯土厚度为 0.7 米，层厚 0.1 米，夯土内含有少量白灰颗粒。此处应为南门址。目前只发现一处门址。并据此推测陵园南北长 336 米。

在陵园中部偏北，墓葬之南、神道之北发现建筑遗址，平面呈倒“凸”字形，南北长 23 米，东西宽 30 米，夯土距地表深 0.4 米，夯土厚度为 0.6 米，夯层为 0.1 米，夯土为五花状，土质密实，上部及四周为耕土及扰土。

由于僖王志堙、怀王志均无子，按史志记载附葬愍王，2012 年考古队在愍王陵园调查时，曾见僖王志堙墓志石盖，得知其墓葬被盗掘，墓葬确实位于愍王陵园内。怀王志均墓葬推测也当在愍王陵园内。

康王朱志堙陵园，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康王井村东，在第一代愍王朱楝墓东南约5公里处。《陕西文物地图集》记载其占地面积 1500 平方米，因未对其进行考古勘探，实际面积不详。据记载早年曾出土康王妃墓志一盒，边长各 95 厘米，盖篆“大明宗室敕谥秦康王妃陈氏墓志铭”，因此确定该处为康王陵园无疑。

第四代惠王朱公锡墓，位于长安区大兆乡庞留井村东，在第三代康王朱志堙墓东南约 2 公里处。《陕西文物地图集》记载占地面积 1900 平方米。地表残存圜丘形封土两座，左侧高大，当为惠王墓。惠王墓是秦藩陵园中除愍王、隐王陵园之外石刻保存最好的。

三、遗迹与遗存

隐王陵园中 M1 位于陵园内的中部偏北，南北向，由封土、墓室、墓道三大部分组成，全长 74 米。封土位于墓道之北，现状为覆斗形，下大上小，底边残长 36 米，南北残宽 33 米，残高 12 米。顶部为一平台，东西长 6 米，南北宽 5 米。五花土分层夯筑而成。墓室位于封土之下，根据钻探及斜坡墓道测算，该墓室应为砖室结构，深度 19 米。墓道位于墓室之南，平面梯形，斜坡底，墓道全 41 米，南端宽 2.2 米、北端宽 5 米，南端深 1.8 米、北端深 17.5 米，墓道开口距地表深 1 ~ 1.5 米。墓道内填土均为五花土，但是经过夯打，夯层厚 0.11 ~ 0.12 米。

M2 位于 M1 东南侧，南北向，由封土、墓室、墓道三部分组成。封土位于墓道之北，现

状不规则，是后期平整土地时被严重破坏，底部南北残长 21 米，东西残宽北端 15 米，顶部东西残宽 1 米，南北 1 米，高 8 米。封土为五花夯土，夯层厚 0.11 ~ 0.13 米，土质坚硬。墓室位于封土堆之下，根据钻探知墓室为砖室结构。依据斜坡墓道测算墓室深 15.8 米。墓道位于封土堆及墓室以南，平面呈梯形，斜坡底，坡度为 22° ，长 41.4 米，南端宽 3 米、北端宽 4 米，南端深 1.3 米、北端深 14.5 米，墓道开口距地表深 1.5 米。墓道内为五花夯土，土质较硬。墓道北端与墓室连接处有一个较大的盗洞，盗洞直径 5.2 米，现有深度 7.4 米。

M3 位于 M1 西南侧，南北向，由封土、墓室、墓道三大部分组成。封土位于墓道之北，现状不规则，上小底大，底部各边被蚕食，略呈长方形，西边残长 28 ~ 35 米，顶部边长 4 ~ 5.2 米，高 11.6 米。封土为五花夯土，土质较硬，夯层厚 0.11 ~ 0.12 米。墓室位于封土之下，根据钻探及斜坡墓道测算深度为 17.8 米。墓道位于封土、墓室之南，平面长方形，斜坡底，全长 43.7 米，宽 3.5 米，南端深 2.0 米、北端深 13.5 米。墓道内五花夯土，土质较硬，夯层面较平整，墓道开口于黑垆土之上，距地表深 0.8 米。

神道位于中部遗址之南，南北走向，通至南门址，残长约 85 米。两侧有排列石刻 12 件，分别为石麒麟一对、石马两对、石文武官俑两对、石马一对，其他只发现石刻基座。石柱、石虎、石羊均丢失。神道已被水泥路覆盖，无法勘探。

康王墓曾经被盗，墓葬封土破坏严重。早年王翰章先生调查时曾见康王及陈妃合葬墓碑、康王妃陈氏墓志。陈氏墓志盖铭文“大明宗室敕谥秦康王故妃陈氏圹志铭”，墓志云“康王既薨之十有九年，为成化九年四月十八日妃以疾薨于正寝。……于是年十二月四日合葬咸宁县章曲里鸿固原”。当时墓前有御祭文碑一座，龙首龟座，高 4.5 米，宽 1 米，厚 0.29 米，是明穆宗皇帝隆庆元（1567）年二月二十八日遣陆师道祭墓的碑文。神道两侧尚存石刻 9 件，由南向北依次为，石马 3 匹、东 1 西 2，石人两尊、文武各一相错分列东西，石狮一对，神道碑和龟趺各一。

惠王墓保存较好。地表可见两座封土，正中者高大，圆丘形，高约 10 米，边长 60 米，当为惠王墓。东南封土，较低矮，当为惠王妃王氏墓。地表尚存石刻 15 件，从南向北依次为石柱一对，顶部天禄缺失，石虎一对、石羊一对、石麒麟一对、石马两对、石武官东列 1 尊、石文官一对。墓地尚存高大神道碑，碑额篆“书大明宗室秦惠王神道碑”，碑高约 3.5 米。封土前碑石正面为“秦惠王暨妃王氏合葬墓”。



图 8　明秦康王墓前石刻　（编写组供稿）

四、保护管理

2003 年 9 月，隐王墓、康王墓和惠王墓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隐王墓，主墓封土东西 33 米，南北 42 米；神道东西 20 米，南北 180 米；两侧两座陪葬墓封土均为东西 20 米、南北 20 米。以上区域四面外延 40 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 60 米。

康王墓，主墓封土东西 15 米，南北 21 米；神道东西 30 米，南北 198 米；西北侧陪葬墓封土东西 12 米、南北 12 米。以上区域四面外延 40 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 60 米。

惠王墓，主墓封土东西 24 米，南北 24 米；神道东西 18 米，南北 231 米；东侧陪葬墓封土东西 20 米、南北 18 米。以上区域四面外延 40 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 60 米。

2006 年 5 月，隐王墓、康王墓和惠王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节　秦简王墓、秦宣王墓、秦世子墓

明秦藩第五代简王朱诚泳陵园，位于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简王井村，陵园平面长方形，坐北面南，占地面积约 59786 平方米。陵园内尚存封土 3 座，神道石刻尚存石柱、石虎、石羊、石马、石人等。

第八代宣王朱怀堵陵园，位于长安区韦曲街道办事处三府井村东，南北向，尚存封土两座，神道两侧尚存石柱、石虎、石羊、牵马人、石人等，推测为宣王陵园。 世子朱敬鈁墓，位于长安区杜陵乡世子井村东北，封土被毁，地表原存墓碑一座，立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螭首龟座，碑高 3.2 米，宽 1.15 米，厚 0.30 米，碑额刻“睿赐墓碑”，现已迁杜公祠保管。



图 9　明宣王墓神道西列石马和控马人石刻　　（编写组供稿）

一、墓主生平

简王朱诚泳，第四代惠王庶长子，弘治元年（1488）九月，由镇安王进封秦王，朱诚泳自称“宾竹子道人”。《明史・列传・第四》载：“性孝友恭谨，尝铭冠服以自警。秦川多赐地，军

民佃以为业，供租税，岁歉辄蠲之。长安有鲁斋书院，久废，故址半为民居，诚泳别易地建正学书院。又旁建小学，择军校子弟秀慧者，延儒生教之，亲临课试。王府护卫得入学，自诚泳始。”著有《经进小鸣集》。弘治十一年（1499）薨，在位 11 年，无子。

昭王朱秉欀，为简王朱诚泳从弟临潼王朱诚瀔庶长子，弘治八年（1496）袭临潼王，十三年（1501）嗣封秦王，十四年（1502）薨，在位两年。

定王朱惟焯，昭王朱秉欀庶长子，正德四年（1509）袭封。史载有贤行。嘉靖二十三（1544）年薨，在位 35 年，无子。

宣王朱怀堵，定王朱惟焯再从子，初封镇国中尉，嘉靖二十七年（1548）嗣封秦王。史载奏以本禄千石赡诸宗，赐敕奖谕。嘉靖四十五（1566）年薨，在位 18 年。

世子朱敬鈖，宣王朱怀堵嫡二子，嘉靖三十三年（1554）生，三十八年（1559）卒，年仅 5 岁，追封世子。世子墓碑文称：“生于嘉靖癸丑十二月二十日。此子生而资禀明英，丰姿雅秀，方四岁即知敬让，……迨五岁乃诵古诗，乐闻古事，虽未悉得其详，而大略志趣既有所得……乃于丁巳岁，敕赐名敬鈖，待有此正之封，不幸于戊午十二月十七日因患痘疹，累医不痊……时方六岁也。……嘉靖三十八年岁次己未孟夏朔日，父秦王允中道人识。”

靖王朱敬镕，宣王朱怀堵庶长子，隆庆三年（1569）袭封，万历四年（1576）薨，在位 7 年。

敬王朱谊澡，靖王朱敬镕嫡长子，万历三年（1575）封世子，九年（1581）袭封，十四年（1586）薨，在位 5 年，无子。

肃王朱谊溍，靖王朱敬镕嫡三子，万历十四年（1586）加封紫王，十五年（1589）进封。自肃王朱谊溍以后，最后几位秦王记载混乱，《明史》、方志记载不一。

二、考古调查

《西安府志》卷六十四《古迹下·陵墓》载：“秦愍王朱楱墓在鸿固原，妃邓氏、王氏祔。又隐王尚炳、僖王志堐、淮王志均、昭王秉欀俱在左右。秦康王志契墓在少陵原，子惠三公锡墓祔。秦简王诚泳墓在韦曲原，定王惟焯墓祔。秦宣王怀堵墓在高望原，靖王敬镕、敬王谊澡、肃王谊溍、景王存枢墓俱在焉。”按此记载昭王朱秉欀墓当在愍王朱楱墓左右，但是目前尚未发现，或为愍王陵园中陪葬中的一座；宣王朱怀堵陵园发现于长安区杜陵乡三府井东，可见墓葬封土及陵前石刻，石刻臃肿，是唯一有牵马人的陵园。靖王朱敬镕、敬王朱谊澡、

肃王朱谊溍当在葬陵园里或附近。自肃王朱谊溍以后，秦藩王葬地难寻。

《咸宁县志》载“秦简王诚泳墓在韦曲原，定王惟焯墓附”。据调查简王朱诚泳陵园位于简王井村北，平面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园南北残长 280 米，东西宽 179 米，占地面积 59786 平方米。主墓朱诚泳墓 M1 位于陵园中部北段，陪葬墓分别置于主陵的东南方及西南方。园内共发现 5 座墓葬，主墓 1 座、陪葬墓 4 座（第七代定王朱惟焯当为其一），陪葬墓封土堆均被毁。陵园南部石刻已被村民移动。据王翰章先生《明秦藩王墓调查记》[①] 记叙，1989 年 11 月 18 日，简王村 5 人曾盗掘简王墓，盗洞深约 18 米，直达墓室，砸开墓门，将木棺前的一匹彩绘陶马和东西排列整齐的彩绘陶俑盗出，后被公安机关破获、缴回，现陈列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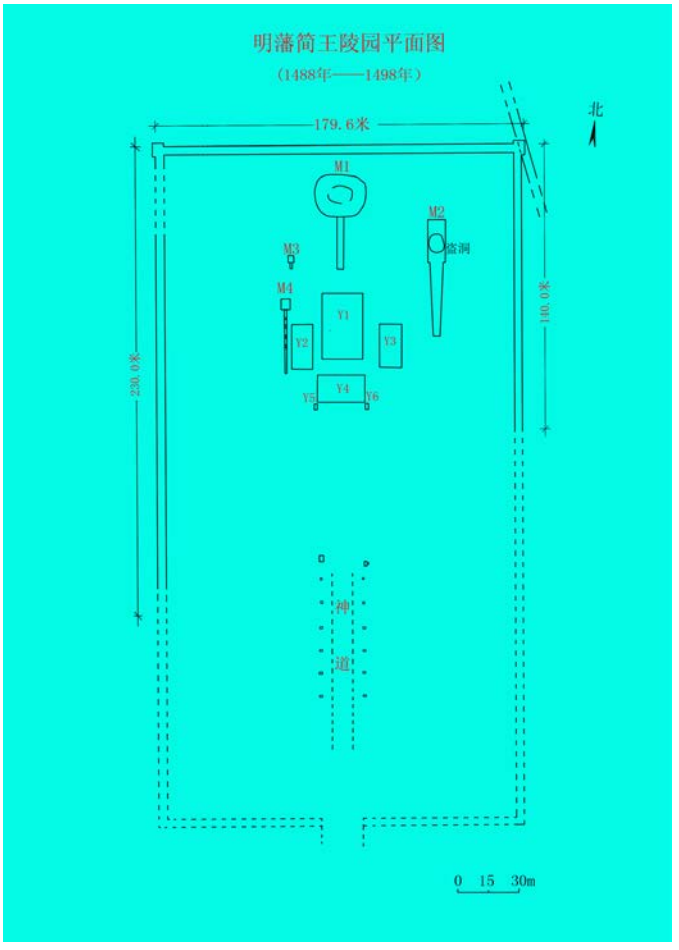


图 10　明秦藩简王陵园平面图　（编写组供稿）

经勘探得知简王陵陵园方向 356° 东墙址北段、西墙址北段、北墙址西段保存较好，陵园中部发现建筑基址。陵园南墙被村里破坏、道路硬化，未找到南墙及南门遗址。东陵墙址墙基南北走向，墙址墙基北段尚有保存，残长 140 米，宽 4 米。为五花土分层夯填筑成，土质坚硬，夯土距地表深 0.45 米，夯土厚 0.4 ~ 0.8 米，夯层厚 0.13 ~ 0.15 米。东墙基址的东侧有踩踏路土，踩踏路土长 130 米，宽 3 ~ 4 米，踩踏土面距地表 0.7 ~ 1.1 米，厚为 0.06 ~ 0.1 米。西陵墙址，

① 王翰章：《明秦藩王墓调查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5 年。

南北走向，西邻西汉公路约 200 米，残长 240 米，宽 4.0 米。北陵墙址东西走向，距雁翔路约 300 米，西段保存较厚，全长 179 米。东墙、西墙、北墙均未发现门址。

建筑基址位于陵园中部偏北，M1 主墓道南端，当为简王陵园祭祀遗址，由前、后、东、西 4 部分组成。前端基址位于主墓 M1 南端，平面长方形，南北长 33 米，东西宽 32 米，夯土厚度 2 ~ 2.8 米。后端基址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8.6 米，南北宽 13.3 米，夯土厚度 0.2 米。东侧基址位于建筑基址东侧，平面长方形，南北长 25.3 米，东西宽 11.5 米，夯土厚度 0.35 ~ 0.75 米。西侧基址位于建筑基址西侧，平面长方形，南北长 21.5 米，东西宽 10.0 米，夯土厚度 0.75米。

推测宣王陵、世子墓的形制与简王陵园当类似，但未经过考古勘探，具体情况不明。

三、遗迹与遗存

简王陵园内，地表尚存封土一座。M1 位于陵园内的中部北端，为陵园主墓，南北全长 53.6 米，由封土、墓室、墓道 3 部分组成。封土位于墓道之北，现状不规则，下大上小，底部边长 26.6 ~ 28 米，残高 13 米，顶部边长约 6 米。封土为五花土夯筑，土质坚硬，夯层厚 0.11 ~ 0.12 米。墓室位于封土堆之下，5.5 米见砖未能穿过，墓室为砖室结构，根据斜坡墓道计算，深 9.5 米。墓道位于墓室南端，平面长方形，墓道开口距地表深 0.5 米，底部斜坡底，坡度为 18° ，墓道全长 26 米，宽 3.5 米，墓道内为五花夯土。

M2 位于 M1 主墓东南方，方向 356° ，在 1964 年遭到盗扰，封土后被夷平，部分墓室夯土业已暴露。墓室为长方形，开口距地表深 0.8 ~ 1.0 米，长 21 米，宽 8.5 米，墓室顶部打一深孔，8.3 米深见砖未能穿过，根据斜坡墓道计算，墓室深度为 12 米。墓道位于墓室以南，平面呈梯形，斜坡底，长 36 米，南端宽 3.5 米，北端宽 7.2 米，深 12 米，墓道开口距地表深 0.8 米，内为五花土回填。

M3、M4、M5 位于陵园内主墓 M1 西南及南方，封土皆被破坏。

神道位于主墓 M1 之南，建筑遗址正南，由于土地平整、耕种等原因，踩踏迹象已消失。神道两侧有石刻 10 件，分别为石麒麟一对、石马两对、文武石人两对，在简王村内发现石柱一对。

宣王墓地表现存封土一座，高约 7 米。神道石刻 11 件，由南向北，依次为石柱 1 对、石虎 1 对、石羊 1 对、牵马人及马 1 对、文官石人 1 对。另外尚可见到石龟座 1 件。宣王墓石刻肥胖臃肿，形体不似前几陵高大雄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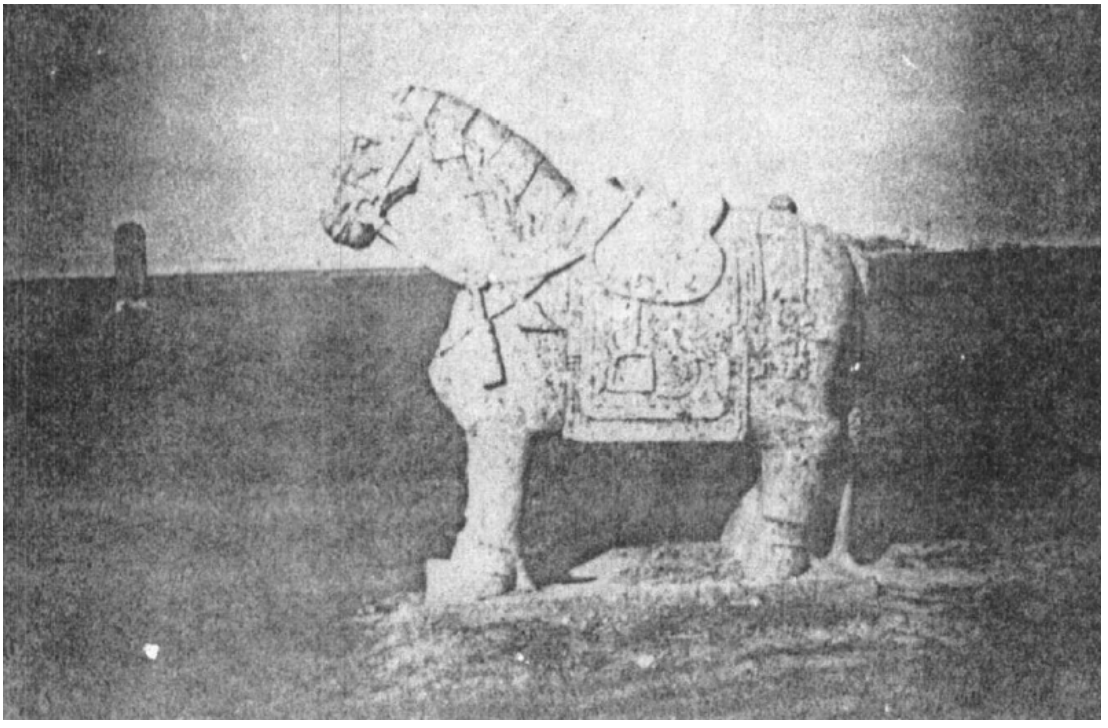


图 11　明世子墓前石马和石碑　（采自西安杜陵文管所，傅文琪、李梅、刘玖莉：《明秦藩王墓前石刻调查与研究》）

世子墓地表未见封土。20 世纪 90 年代，王翰章调查时除墓碑外还可见石马 1 件、石麒麟 1 件。

四、保护管理

2003 年 9 月，简王墓和宣王墓被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同时公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简王墓，主墓封土东西 40 米，南北 40 米；神道东西 38 米，南北 180 米。以上区域四面外延 40 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 60 米。

宣王墓，主墓封土东西 30 米，南北 27 米；神道东西 25 米，南北 230 米。以上区域四面外延 40 米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保护范围四面外延 60 米。

2006 年 5 月，简王墓和宣王墓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百年来关中唐陵地表文物变迁略录

郑茂良

唐代帝陵作为中华帝陵文化中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从古至今一直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北宋时期的游师雄可说是考察、研究唐陵的先行者，其对昭陵、乾陵和建陵的研究成果至今依旧是珍贵的史料。20 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桑原骘藏对献、昭、乾、崇和端陵进行实勘考察，考察成果分别收录在足立喜六著《长安史迹研究》[①] 和桑原骘藏著《考史游记》[②] 中。1943 年 8 ~ 11 月，王子云和何正璜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对简、元、章、定、丰、桥、景、光、泰、献、端、庄、崇 13 座唐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其后发表《唐陵考察日记》一文[③]。1973 ~ 1978 年，刘庆柱和李毓芳对陕西 18 座唐陵进行全面考察，其后有《陕西唐陵调查报告》一文发表[④]。笔者通过以上文章，结合 2013 ~ 2017 年实地考察唐陵所掌握的情况，撰写此文，力图将这 18 座唐陵在这百年来的一些变化呈现给读者。各陵记叙次序依次为鹊台、乳台、神道石刻、南神门、东神门、北神门和西神门，陪葬墓、下宫和陵园墙垣、角阙等遗址不在本文涉及范围。

①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259 ~ 308 页。

② 桑原骘藏：《考史游记》，中华书局，2007 年，第 67 ~ 77 页。

③ 何正璜、王子云：《唐陵考察日记》，《何正璜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00 ~ 246 页。

④ 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16 ~ 263 页。

献　陵

贞观九年（635）五月，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当了9年太上皇后崩于太安宫垂拱前殿[①]，谥曰太武、庙号高祖。随后在今三原县永合村西北约300米处堆土为冢，营建陵寝。在陵寝的规制上，先是决定依西汉长陵制度，但工程浩大加之时间紧迫，后改依东汉原陵的规模来营建。当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神道石刻　因献陵属第一座唐代帝陵，各项规制尚未完善，故神道石刻较为简单。足立喜六文中记述神道最南有石柱一对，东侧完好，西侧已倒，仅存基座。石柱北约90多米处存大石座一对，推测为石马基座。1943年9月29日，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时发掘出西侧石兽头部，发现为石犀。东侧石犀于1960年发掘出土后迁于碑林博物馆展出[②]。现今在神道实地所见同刘庆柱文中记载相同，只可见东侧屹立的石柱和西侧石柱基石。据《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③]介绍："西侧石柱柱身翻倒埋于地下，柱身上三个面还残留有清晰的花纹图案。西侧石犀埋于地下，头向东，右侧前后肢较左侧靠前，故原应呈行走状。现存躯干部分，四肢均从上部残断，尾部中段以下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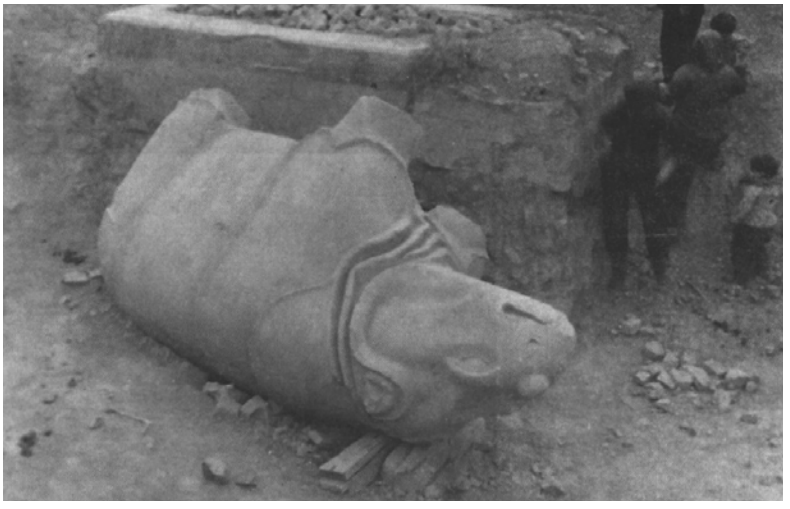


图1　献陵神道东列石犀迁往碑林前的旧影　（采自赵力光《古都沧桑·陕西文物古迹旧影》，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205页）

① 《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8页；《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9页载："贞观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九年五月，崩于垂拱前殿，年七十一"。另（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131页；（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61页均记大安宫。

② 巩启明：《唐献陵调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第47～55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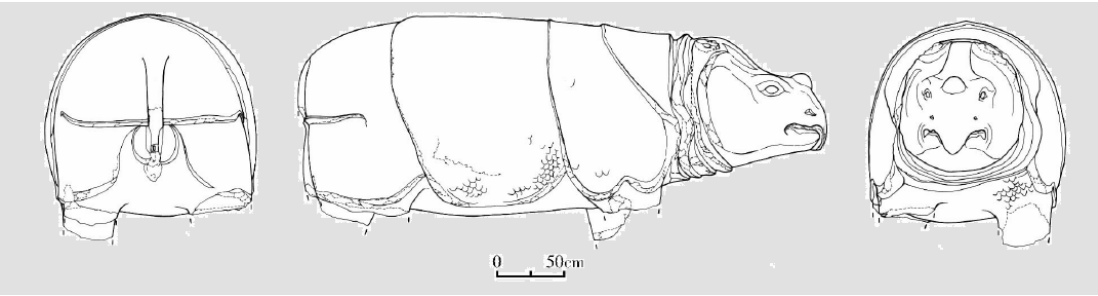


图2　献陵神道西侧石犀白描图　（采自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南司马门　司马门原指天子宫门，后引申为陵园各门。在献昭二陵时期，陵门在文献中多记为司马门，如《唐会要》卷二十载："贞观十三年（639）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寮、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①] 另有同书同卷载："上欲阐扬先帝（太宗）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②] 但之后各陵又多以神门相称，如《旧唐书·五行志》载："元和八年（813）三月丙子，大风拔崇陵上宫衙殿西鸱尾，并上宫西神门六戟竿折，行墙四十间檐坏。"[③] 故献昭二陵的陵门在文中称之为司马门，其后各陵陵门以神门相称。

献陵南司马门前原有石虎一对，西侧石虎于1959年迁于碑林博物馆展出[④]，现地仅存东侧石虎，石虎颈下有"武德拾年石匠小汤二记"楷书题刻，现大部分字迹浸泐。何正璜文中记载在陵冢前有毕沅立"唐高祖献陵"碑等明清古碑8通，踏勘时仅见清康熙二十年（1681）所立石碑一通和一石趺员碑座。

其他三处陵门　足立喜六文中记载："献陵之东西北三面各有门址一对，相互对立。"但在何正璜文中记载已是："今门址可见者，仅有东门门枕石外之砖瓦堆，且仅存有半尺许之痕迹"。到刘庆柱调查时各门址门阙阙台遗迹已全部消失。关于这三处陵门前石虎，何正

①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二十《亲谒陵》，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

②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二十《陵议》，第337页。

③ 《旧唐书》卷三十七《五行志》，第1362页。

④ 巩启明：《唐献陵调查记》，《文博》，1999年第1期，第47～55页。

璜文中记载为：“东神门外仅有一石座可见；北神门外东侧仅见石座，西侧石虎仆倒但尚露于地面；西神门外二虎均可见，被村人用作座石。”刘庆柱文中记载的石虎数量为：“东神门存南侧石虎、北神门存西侧石虎、西神门存石虎2。”据《唐高祖献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与发掘简报》载：“西门两只石虎被永和村十组的农家宅院分隔南北，石虎均置立于石座旁边，腿均已断；北门现存西侧石虎，置于石座北部，仅露出背部，腿已断；东门地面可见北侧石虎，南侧石虎完全掩埋于地下。”现今这三处陵门的5只石虎在经过考古发掘之后已全部埋于地下，地面上仅见北门两石虎基座。

昭　陵

贞观十年（636）六月，长孙皇后大渐前留下以山为葬，力求简朴的遗言。也有文献记载是李世民过九嵕山时，喜好此山“孤耸回绝”[①]的气势，故在此建陵。但不论怎么说昭陵不但是唯一一座唐代皇帝生前营建的帝陵，而且开创了唐陵以山为陵的先河。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李世民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年五十三，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同年八月，同长孙皇后合葬于今泾阳县烟霞镇北九嵕山之上的昭陵。

因山陵制度草创，故昭陵同其他唐陵的规制有很大的差异，如昭陵很可能只有两处陵门，如游师雄所绘的《唐昭陵图》[②]中就只绘有南北二门，考古调查至今也未发现东西二门的痕迹[③]。另外石刻也仅有太宗生前设立的六骏和高宗时期增设的十四藩君长像，且都安置于北司马门内，而不像其他各陵将大部分石刻安置于陵山南麓南神门外的神道两侧。

南司马门　位于皇城村东约800米处，其早年间情况在足立喜六、何正璜等人的文章中均未提及，刘庆柱文中记载仅存双阙阙台，现今双阙阙台依旧保存完好，甚是高大。在九嵕山南麓山脚西侧遗存上下两排、共计8孔石室，石室形制基本相同，在一人高的过洞后就是一个十来平方米的石窟，洞壁粗糙，有烟熏痕迹。另外在山的东南方向、距山顶垂直高度约30米的一处山崖下还有一石室遗迹，该石室由三部分组成，恰同唐墓的墓道、甬道和墓室相仿，

①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二十《陵议》，第336页。

② （元）李好文，毕沅校正：《长安志图》中卷，光绪辛卯年（1891）思贤讲舍据乾隆五十二年（1787）灵严山馆本重刻本。

③ 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第82～90页。



图 3　位于九嵕山东侧的丛葬窑遗址

故很多学者认为此石室就是长孙皇后灵柩暂厝之处[①]。在此石室东侧不远处有条石箍就石窑 4 孔，分上下两层，宽、高约 2 米，现存长度 7 米左右。刘庆柱根据在其内发现陶马和托板残片的情况，推测其用途应为放置随葬品的丛葬窑。

北司马门　位于高蔡尧村南约 700 米处。桑原骘藏文中记载：

> 门前立毕沅“唐太宗昭陵”碑，碑后三孔砖砌券门，为后人增砌。券门之南为双阙遗迹，阙前有御祭祝文碑十数方，字迹模糊，几不可读。双阙南约 40 米为享殿遗址，今仅存础石，两侧庑殿安置六骏石刻，左右各三。而十四藩君石刻已不知其所。

足立喜六在其文中记叙，阙前立有文德皇后碑，这点恐为笔误，因为此碑很早就已断裂不存，只是在游师雄的《唐昭陵图》中有所标记。近年在移动一厚度达 0.4 米的明代祝文碑时才在碑榫上发现“率更令臣欧阳询奉”8 字，至此才知该碑在断裂后被横向切割改造成御祭祝文碑使用了[②]。

据刘庆柱文章记载，明清时期的山门遗址在 1973 年 9 月还有所保存，“位于祭坛南 50 米，东西 12 米、南北 3 米，有 3 个门洞，中门宽两米、左右门宽 1.5 米，东西两侧有墙垣遗迹。山门内为院落，院南系正殿，院中有方亭，东西北三面为廊，东西廊长 20 米、宽 7 米。”

现今北司马门最北有毕沅立“唐太宗昭陵”碑，明清山门遗迹已不存。碑南约 230 米为

---

① 张建林：《昭陵石室初探》，《乾陵文化研究》第二期，三秦出版社，2006 年，第 38 ~ 41 页刘向阳：《昭陵石室于长孙皇后初殡地关联问题探讨》，《文博》2012 年第 5 期，第 43 ~ 48 页

② 刘向阳：《昭陵石室与长孙皇后初殡地关联问题探讨》，《文博》2012 年第 5 期，第 43 ~ 48 页。

双阙阙台遗址，其东阙台外立有文德皇后残碑和十余通明清御祭祝文碑。阙内两侧庑房遗址中原本立有著名的“昭陵六骏”，众所周知“飒露紫”和“拳毛騧”于20世纪初被盗卖国外，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和“青骓”在经历磨难后，现陈列在碑林博物馆，但六骏石座依旧保存在两侧庑房遗址中，其上安置有近年复刻的六骏石刻。六骏之南为十四藩君长像石刻，安放的七间廊房遗址，石刻原本东西两面相向而立，每面7尊。现已发现刻铭石座13件[①]，石座呈方形，上部凿方坑，人像足下连石台置坑内，固定方式与乾陵蕃酋石像相同，只是人像刻铭不在背上而在石座正面。根据石座刻字和5件保存在原位置的石座，现东西两侧藩君长像的分布已大体明确，西侧石人分别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前排（东）南起第一；于阗王伏阇信后排（西）南起第一（二者同处七间廊房南起第一间）；吐蕃赞府松赞干布前排南起第二；焉耆王龙突骑支后排南起第二（二者同处七间廊房南起第二间）；高昌王左威武将军麴智勇（处七间廊房南起第三间，但已移位，不可判断前后）；龟兹王诃黎布失毕（被移去改为明代御祭碑碑座，2001年7月18日发现）；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慕容诺曷钵（被移做护坡基石，2002年12月4日发现）。东侧石人分别为：突厥颉利可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咄苾；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突厥答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婆罗门第那伏帝国王阿那顺；林邑王范头黎；新罗乐浪郡王金真。但具体排列位置尚不清楚。两列藩君长石刻之间有寝殿遗址[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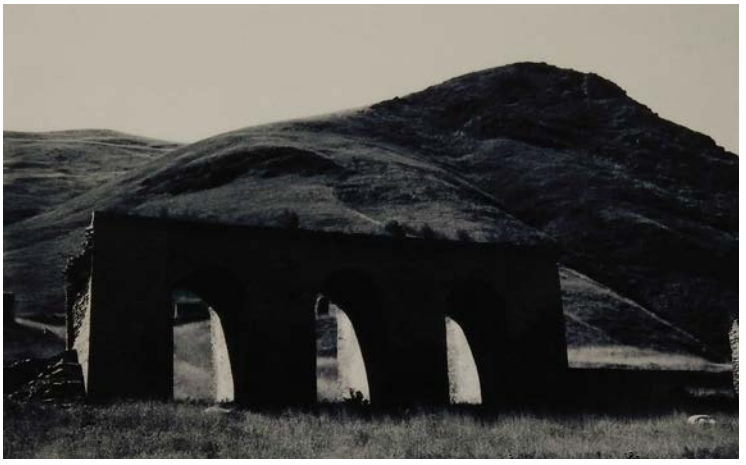


图4　20世纪40年代，王子云拍摄的昭陵北司马门明清时期山门旧影

① 张建林、王小蒙：《对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考古新发现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第17～22页。

② 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咸阳市文物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

乾　陵

宏道元年（683）十二月，唐朝第三位皇帝李治崩于洛阳贞观殿，年五十六。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高宗崩后陈子昂等人认为洛阳风水绝好，建议将高宗葬于洛阳，但因高宗崩前留有“苍生虽喜，我命危笃。天地神祇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的遗言[①]，表示出落叶归根的强烈愿望，故在今乾县县城北约 10 里的梁山为其营建陵寝。文明元年（684）八月，葬高宗于乾陵。神龙元年（705）十一月，武则天崩于洛阳上阳宫，大渐前希望死后同高宗合葬，但关于武则天能否合葬乾陵，当时朝中也是争议不绝，最后还是于神龙二年（706）五月葬武则天于乾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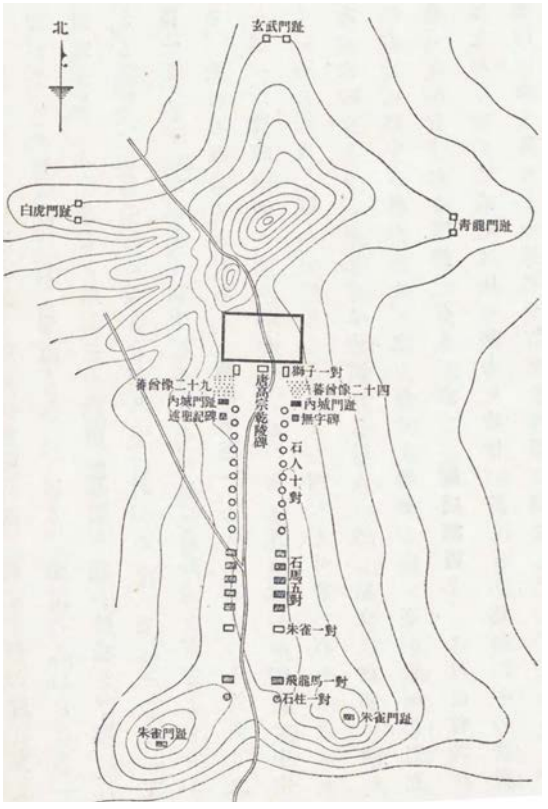


图 5　唐高宗乾陵平面图　（采自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 年，第 282 页）

至乾陵时期，唐朝已成为一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②]的强盛帝国，在帝陵的规制上要以充分体现国家威仪为主要目标。加之经过近 50 年的摸索，结合之前两座帝陵的经验，唐人在此时终于探索出一套兼取古今且具有自己风格的帝陵营建模式，这种模式不但在有唐一朝被严格执行，且深刻影响到其后各朝代帝陵的营建。

鹊台和乳台　鹊台是位于陵山之南的第一道阙门，可视为进入陵园的标志，乳台为第二道阙门，可视为神道开始的标志。乾陵鹊台位于李家堡村南、距南神门约 3000 米处，双阙阙台分处于公路两侧，东阙高约 10 米、西阙高约 17 米，均保存较好。站于鹊台处北望陵山，乳台双阙阙台分列神道南侧东西两山之巅，为唐陵最为壮观之乳台。

---

① 《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第 112 页。

②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百二十八，三秦出版社，2008 年，第 468 页。

神道石刻　桑原骘藏文中记载神道石刻在上世纪初的情景为：

双阙下有华表一对，呈六角形，高约二丈，径三尺余，如今二者均已倒地。其北约六七米处，有石龙马一对，亦倒于地上。进而往北百余米，有朱雀一对，其次有石马五对，或损毁、或倾倒。接着有石人，高丈余，皆执剑。石人原有十对，如今站立者仅有十一尊。再往北有两方石碑，西边的一碑即“述圣记碑”，刻有高宗一生的功绩，由武则天撰文，唐中宗书写。但如今碑石已倾倒，四五块台石散落于左右。东边碑即所谓“无字碑”，据传系于阗国进贡之物，高二丈余、宽五尺、厚三尺余。碑原无刻字，但如今表里两面有许多宋金以后的题名。其中以宋崇宁、政和、宣和年间和金正大、兴定年间为古。著名的“金都统经略郎君行纪”在碑表面中央，尤为引人注目，此为金兴定五年（1221）所刻，文用女真文字，附汉语翻译。

1961 年 1 月 22 日，陕西省第一个专门保护帝王陵墓的文博单位——乾陵文物保护管理所成立[①]，乾陵的保护工作走在了整个关中唐陵的前列，故神道石刻得到了很好的修复和保护。2016 年 2 月 12 日寻访乾陵时，在神道看见其东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柱，翼马（腿下部残缺），鸵鸟，仗马和控马人 5 组（南起第 1 组控马人头部缺失、仗马保存较好，第 5 组仅存基座，其他各组不同程度残缺），石人 10 尊、无字碑；西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柱，翼马，鸵鸟，仗马和控马人 5 组（南起第 1 组仅存基座，第 4 组控马人头部缺失，仗马保存较完整，其他各组不同程度残缺），石人 10 尊（南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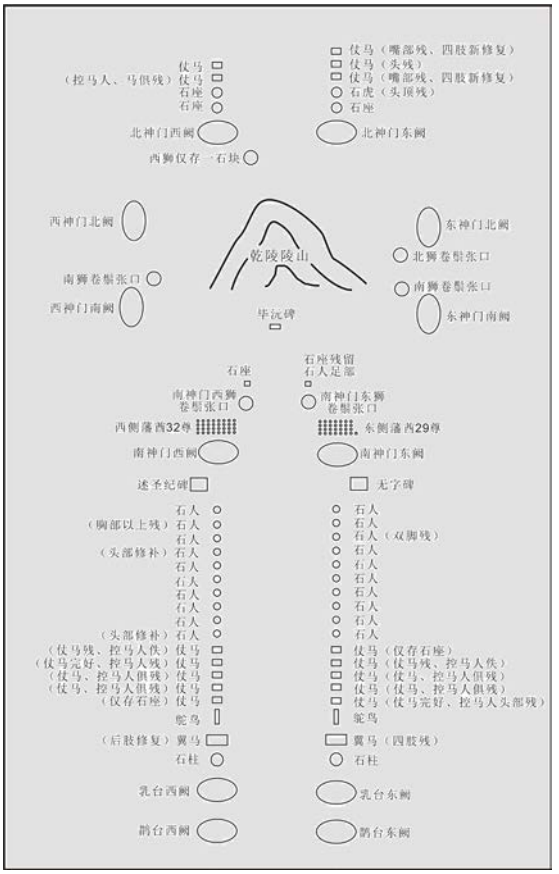


图 6　唐乾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① 《乾县志》编纂委员会：《乾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833 页。

第 9 尊胸部以上缺失），述圣记碑。石刻数量同刘庆柱于 1973 年 4 月调查时相同，不同的是经乾陵管理处多年修缮，陵区景致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南神门　乾陵藩酋殿位于南神门双阙内侧，通过考古发掘得知其后各陵藩酋殿移至双阙外侧[①]。桑原骘藏文中记载南神门情况如下：

> 如今东侧藩君石像树立者二十一尊，仆倒者三尊，共计二十四尊。西侧树立者十六尊，扑卧者十三尊，计二十九尊。但有的欠头、有的缺手，破损已相当严重，背刻文字亦固不可认。再往后有石狮子一对，高约一丈，十分精巧。其北有陵碑，上题“唐高宗乾陵”，系乾隆丁酉（1777）所建。

现今双阙阙台已用砖砌出三出阙样式。阙北两侧即为著名的61藩臣像，西侧32尊、东侧29尊，虽皆失头部，但已全部扶立。再北为双狮，全为卷鬃张口、气势如虹，实属中国石刻艺术宝库中的精品。石狮北为殿堂式门址遗址，在其门前东西两侧各存石座一方，东侧座上残存双脚痕迹，故推测在神门前原本或立有内侍石刻。门址北约 30 米处，有毕沅立“唐高宗乾陵”碑。

东神门　位于东皇门村西侧，在刘庆柱文中记载存双阙阙台和双狮，实地踏勘所见情况同其记载无变化。双狮位于阙内，皆为卷鬃张口。

北神门　位于寨子窑村南侧，刘庆柱文中记载：“存双阙但双狮残，之外在双阙北 90 米处尚存仗马一对，东西间距 29.9 米；东列仗马北 15.5 米，又有仗马和控马者石座各一。”现今实勘情况为双阙阙台存，阙内双狮仅存西侧一残石。但阙外石刻数量有所增加，其东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座，石虎（头顶部残），仗马（嘴部残、四肢新修复），仗马（头部残），仗马（嘴部残、四肢新修复）；西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座，石座，仗马和控马人（仗马嘴部残、四肢新修复，控马人仅存膝以下），仗马。

西神门　位于西皇门村中。现今的情况同刘庆柱文中记载相同，双阙阙台南大北小，仅存南侧石狮位于阙内，卷鬃张口，近期有所修复。

定　陵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载：“景龙四年（710），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

① 张建林：《唐代帝陵陵园形制的发展与演变》，《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5 期，第 82 ~ 90 页。

年五十五。……九月丁卯，百官上谥曰孝和皇帝，庙号中宗。十一月己酉，葬于定陵。”[①] 定陵位于今富平县三凤村北凤凰山。

鹊台和乳台　鹊台位于宫里镇东北约 400 米的农田中，双阙阙台甚大如古冢，据南神门阙址约 2900 米。乳台遗址位于一水渠南岸，距南神门阙址约 600 米。刘庆柱调查时，乳台双阙阙台都存，但今仅存东阙台。

神道石刻　1971 年夏，王翰章、魏京武对关中唐陵做过一次调查，仅富平县 5 座唐陵，就有 60 余件大型石刻被毁，其中以中宗定陵最为严重，尤其让人扼腕的是，定陵无字碑也被当地造反派头目率人推倒[②]。《富平县志》记载此事较详细：“1967 年春，唐中宗定陵前的无字碑，被宫里公社三凤大队个别干部带领群众砸毁后，做成 72 条碾子，每条以 10 元价格出售。”[③] 那么神道原本有多少石刻呢？据何正璜文章记载，在 1943 年 8 月间神道石刻由南至北尚有：

> 华表一对均已倒没地上，仅存石座。右边之一尚存僧帽式华顶盖，成八棱形，高 2 米，宽 0.6 米；石兽一对均完好；石马四对，左右列第一第三均已倒，余者完整，右列且已埋没地下；石翁仲八对，左右各存四，余均倒没，石座亦不可见；无字碑一（位于南神门西阙台南侧），高 6.5 米、宽 2 米、厚 1.2 米，座高 1 米、长 3 米、宽 2.5 米，系一大方石凿成，碑之两侧各刻云龙纹；较远之土堤下遗有残毁之藩首像残体躯三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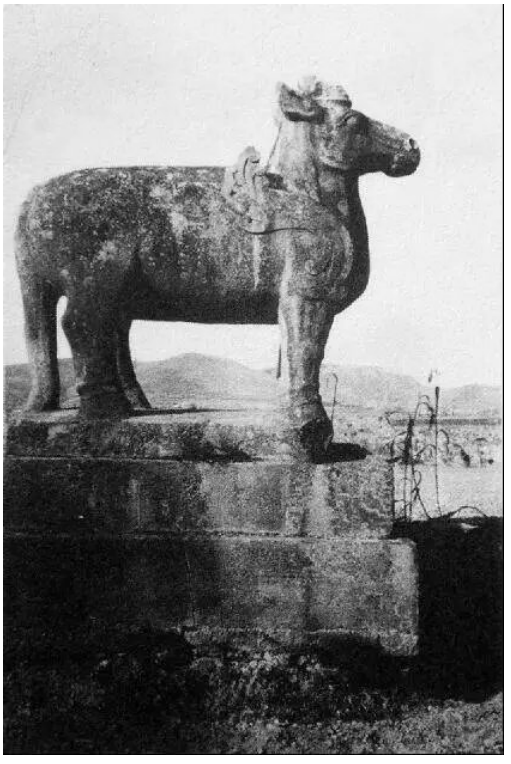


图 7　定陵神道西侧石兽旧影

① 《旧唐书》卷七《中宗本纪》，第 150 页。

② 王翰章：《陕西帝王陵寝考》，《文物考古论文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年，第 309 页。

③ 富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富平县志》，三秦出版社，1994 年，第 29 页。

其中关于石兽，何正璜描述更细：“鹿形之巨兽，其有角，乡人亦名独角兽。此独角兽亦有两翅，形状与飞马相似，唯体积特别巨大，高达三公尺……定陵石刻较特异者即为独角兽石刻，此在他陵为天马，而此陵则为鹿形独角兽，此兽在唐代陵墓前唯咸阳原之武氏顺陵有此相同一对，其他未曾经见。”关于在定陵神道没有发现鸵鸟石刻，何正璜说道：“在他陵石刻行列均有鸵鸟一对位于石兽之次，但定陵则无此物，且就其地位距离亦无此物建立之位置，此于他陵不同者，应留待将来考证”。据《西部网》2016 年 2 月 25 日《武则天儿子陵墓发现 18 对石刻，绝大部分被毁坏》一文介绍，经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人员在定陵神道中共发现 18 对 36 件石刻，可惜的是除个别保存较好外，大部分已经被毁。由此推断定陵原本应有鸵鸟石刻。

至刘庆柱调查时，定陵神道只可见武将石人两尊半埋于土中，一东一西遥相呼应。2015 年前后经考古发掘，在西列石人北侧又发掘出土武将石人两尊，均保存完好，现已在原地重新扶立。而原本东西两尊半埋石人，东侧虽已全部发掘，但没有提升，尚处于坑中；西侧石人得以提升至地表。同时考古工作者对无字碑碑址也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砖瓦残块，推测无字碑最初应建有碑亭。



图 8　2013 年 3 月拍摄的定陵神道西侧被半埋着的石人

南神门　据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不但双阙阙台、双狮均存，而且在石狮之北还存有毕沅“唐中宗定陵”碑。至刘庆柱调查时，不但毕沅碑不存，双狮也仅存东狮位于阙内，石狮膝以下掩埋，卷鬃闭口。现今情景为该石狮已全部清理出土。

东神门　位于金盆村南一公路东侧。何正璜文中未记载该门遗存情况，刘庆柱文中记载东神门存双阙阙台和南侧石狮，石狮高 2.4 米、宽 1.2 米，直鬃闭嘴、前肢均残，埋于阙内土崖中。受 2013 年春节简陵南神门东侧石狮被盗的影响，该狮不久即迁入富平县文庙保管。现



图 9　迁富平文庙前定陵东神门南侧石狮旧影　　（采自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帝陵档案》。三秦出版社，2010 年，第 186 页）

今实地仅存双阙阙台，两阙间距较大。

北神门　位于二郎沟村西北约 200 米处。何正璜文中记载：“其阙门基仅西边者尚可见，石狮已全部埋没，石马仅存其一，且亦半陷地下”。而刘庆柱文中记载：“在双阙内存西侧石狮，卷鬃合口，残高 1.6 米。双阙外侧仗马仅存 2，均残，东西分列，间距 39 米。西者于北神门外阙址北 65 米，东者于阙址北 45 米。”两文记载的最大矛盾为一个为仅存西阙台、一个为双阙阙台均存，实地踏勘的情况为仅见西阙台。阙内西狮为卷鬃，面部破坏殆尽；阙外存杖马两匹，西侧杖马除头部残毁外其他保存较好，东侧仗马地面之上仅存基座。据《西部网》2016 年 2 月 23 日《唐中宗陵前出土一批石刻，曾立无字碑现已荡然无存》一文介绍，经考古发掘在北神门外一件石虎连同驯虎人和西侧一件控马人石刻被清理出来，从所附照片看驯虎人位于石虎一侧，从而能解释为何乾陵北神门石虎旁还有石座这一现象。

西神门　位于三凤村西农田中。何正璜文中记载：“西门阙门基已去其半，两门基相距 52 公尺，石狮位于门内约 15 公尺处，石狮立于左者为雄狮，已倒地。立于右者为雌狮，尚完好，两狮相距约 17 公尺。”刘庆柱文中记载，南侧门阙被平毁，石狮残。实地踏勘时没有发现石狮，但却看到保存较为高大的双阙阙台，估计是刘庆柱当年行文时将北、西两处神门阙台保存情况混淆了。

桥　陵

开元四年（716）六月，唐朝第5位皇帝李旦，在当了4年太上皇后崩于大明宫百福殿，年五十四。随后在今蒲城县安王村北的丰山上为其营建陵寝。庙号睿宗，谥号大圣贞皇帝，十月，葬睿宗于桥陵。

鹊台和乳台　鹊台在何正璜一行考察时就已经湮灭不存。乳台双阙阙台直至现今依旧保存较好，距南神门阙址641米。

神道石刻　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神道石刻由南至北分别有：

华表一对，东倒西立，石柱为八棱，高5.8公尺，柱身刻狮子纹，东南两面尚可辨；石兽一对，均完好，做昂首怒吼状，头高3公尺、身高2公尺、长3.4公尺；鸵鸟一对，东倒西立，宽2公尺、高2.5公尺，两雕刻姿势形体相同；石马5对，东列第1和第5匹倒损，余完好，唯左（西）列头部口鼻均断去，各马造型姿态不一，有昂首俯首及曲颈等形体；石翁仲10对，东列南起第1、2、3、7、10和西列第7尊倒损，余均完立，翁仲高约4公尺，全部比例及衣褶雕刻均比他陵优异，尤以左（西）列南起第1及第6造型更为卓越。



图10　唐桥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至刘庆柱调查时，神道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柱一对；神兽一对；鸵鸟一对；仗马5对；石人东列南起存第3、4、5、6、7、9，计6尊、西列存1、2、4、5、6、8、9、10，计8尊。2013年4月9日踏勘时其他石刻数量不变，只是东列多出南起第8尊、西列多出南

起第 7 尊石人，且在西列石人最北置无头藩酋像一尊。

南神门　参考何正璜文章，南神门从 1943 年至今遗存情况无变化。双阙阙台高大完整。阙内东狮卷鬃合口、西狮直鬃张口，双狮肌肉丰满、造型雄伟，不论从个头体量和精美程度上都不逊于乾陵南神门双狮。石狮北侧即为门址遗迹，毕沅碑立于门址北侧约 1 里处的陵山脚下。

东神门　位于赵家山村内。据何正璜文中记载双阙阙台均已毁没，但刘庆柱文中记载，双阙阙台依旧保存。现今踏勘情况为双阙阙台均存，但北阙较低矮。双狮位于阙内，为唐陵中唯一一对扭头对望石狮。北狮直鬃，面部已被毁；南狮卷鬃合口，其面相凶残让人在阳光下依然不寒而栗。

北神门　位于东山村北部的三岔路口处。何正璜文中记载：“石狮一对尚完好，石马三对仅存其二，余均倒毁，其中一马似坐仰，姿势颇生动，为他陵所未见”。刘庆柱文中记载：“除双阙、双狮外，共三对仗马，最南边一对南距阙址北 18 米，东西列间距 70 米，每队仗马南北间距 17 米”。现今踏勘所见为双狮位于双阙阙台内，均为卷鬃，东狮张口、西狮合口。阙外三对仗马为近期修复，其中最北一对仗马后肢蹲屈，形态同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唐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上舞马的形态十分相似，应为何正璜文中所记“他陵所未见”的仗马。

西神门　位于党窑村东约 500 米处。按各文所记载遗存情况来看，1943 年至今几无变化。双阙阙台、双狮保存完好，现今石狮位于阙内麦田中修建的台基之上，南狮卷鬃合口、北狮直鬃张口。

泰　陵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朝第 6 位皇帝李隆基在当了 6 年太上皇后崩于太极宫神龙殿，年七十八。谥曰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玄宗。据《唐会要》卷二十载：“开元十七年（729），玄宗因拜桥陵，至金粟山，观冈峦有龙盘凤翔之势，谓左右曰：‘吾千秋后，宜葬于此地。’后遂追先旨葬焉。”[①] 于是就有了位于今蒲城县石道村北金粟山上的泰陵，广德元年（763）三月，葬玄宗于此。

① （宋）王溥撰，牛继清校证：《唐会要校证》卷二十《陵议》，第 338 页。

鹊台和乳台　鹊台早已湮灭，据《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①]一文介绍，鹊台台基与乳阙在陵园中轴线上的直线距离为 2462 米，两鹊台间距 181 米。现今实地可见西鹊台基址遗迹，并立于标志碑。乳台遗址位于距南神门阙址 439 米处，双阙阙台保存较好。

神道石刻　从泰陵起，唐陵石刻有两点明显改变，一是开始按东文西武的规制安置石人，二是石刻高度大幅度降低。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神道石刻的情况为：



图 11　2013 年 4 月拍摄，修整前的泰陵神道

> 陵前华表一对均倒地，西侧者已不可见，八棱柱甚短，高仅 2.5 米，盖高 1.5 米；飞马一对均完整，姿态雄健生动，尤以东侧造型特异，作昂首退立状，充分表现马之野烈性格，以雕刻艺术价值论，当可与肃宗建陵之翼马媲美；鸵鸟一对均倒地，造型类章陵所见，即足颈甚短，殊不类鸵鸟；石马五对均倒毁，东侧尚有残段可见，西侧已没入荒草，唯马前均有御马卫士，现仍有可见者；石翁仲十对，东侧立者四，其中二头已断去，西侧立者二，余没灭。

近 40 年后神道石刻的情况，刘庆柱文中记载如下：

> 石柱位于乳台阙台北 100 米处，东者残，仅存上部，西者毁佚；翼马位于石柱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蒲城县文物局：《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 年第 3 期，第 3 ~ 11 页。

北 20 米，东西两匹均保持完好；鸵鸟位于翼马北 18 米，东西两通保存较好；仗马东列存 5 匹（均不同程度残缺），西列仅存南数第 1 匹；石人存东列南起第 2（残）、3（残）、4（仆倒）、5（仆倒）、6（头残）、7（上身残）、9（头残）尊，西列存南起第 3（头残）、5、6（头残）、8（下身埋土中）尊。

2013 年 4 月，踏勘时所见神道石刻保存如下：东侧由南至北保存有石柱（甚矮）；翼马；鸵鸟；仗马和控马人 5 组（仗马南起 1 至 4 俱存、第 5 组仅存控马人；控马人位于南起第 4 和 5 组，头部均缺失）；文官石人 10 尊（除南起第 3、4、5 尊保存较完整外，其他不同程度残缺）。西侧由南向北有石柱（仆倒在东侧华表处）；翼马；鸵鸟（石刻背后有北宋陕西转运副使游师雄留下的题刻：“陕西转运副使游师雄行部蒲城，同新知广安军□鼎臣、转运司勾当公事欧阳成、知县事周涛、白水县令束端卿思议诣金粟山谒唐明皇泰陵。绍圣元年（1094）四月十九日，巡栓□遇、巡监张邕从行”）；仗马和控马人 1 组（南起第 1 组，控马人佚、仗马保存较完整）、武将石人 9 尊（缺南起第 1 尊，除第 2、6、9 尊保存较完整外，其他不同程度残缺）。2016 年 2 月，再次踏勘泰陵，此时神道已整修完毕，东西石柱均已加高修复，其他石刻除东列仗马南起第 1 组新增控马人外，其余无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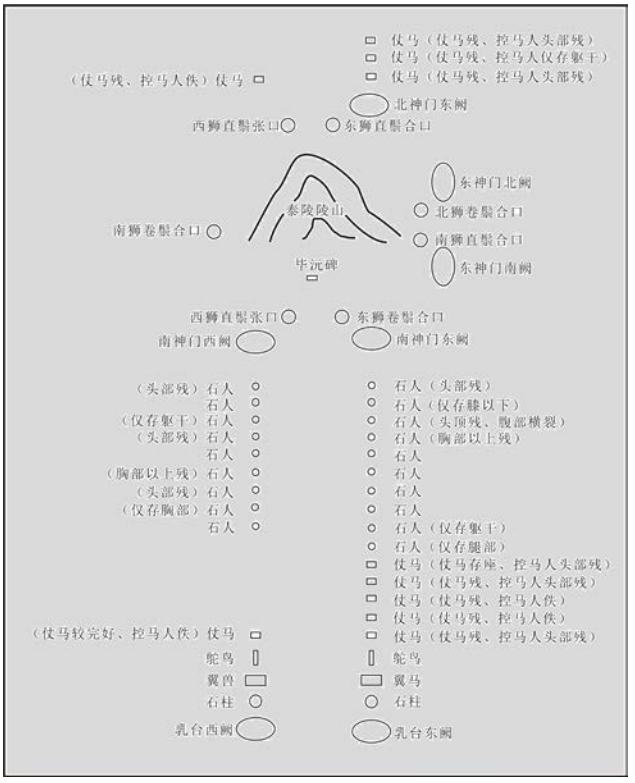


图 12　唐泰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南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南神门双阙内，石狮一对均倒地，石狮北有毕沅所立‘唐元宗泰陵’碑。另外门址内外遗有藩酋像数尊，分立两侧，左侧有一立者已无头。”现今南神门情况为，双阙阙台保存较好。石狮均已扶立，东狮卷鬃合口、西狮直鬃张口，体量同乾、

桥等陵相比矮小不少。至于藩酋像，在刘庆柱调查时，在西狮东北约 5 米处有一石人，依体量、服饰推断为藩酋像，现今已不存。

东神门　位于唐陵村东北约 400 米的山岗之上。何正璜文中除南神门外，其他各门均无记载。刘庆柱文中记载同现今踏勘所见相同，存双阙阙台，双狮位于阙内均为合口状，南狮直鬃、北狮卷鬃。

北神门　位于岭南村东南约 150 米处山坡上。2013 年踏勘所见为：双阙仅存东阙台。双狮位于阙内，皆为直鬃，东狮合口、西狮张口。阙外东列存仗马和控马人 2 组（仗马俱残、控马人头部缺失，其中南侧控马人站立）。以上情况同刘庆柱文中记载相比，除西阙台不存外（文中记载西阙台塬本高度仅剩 1 米），其他相同。据《唐玄宗泰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掘简报》一文介绍，在此也出土石虎 1 件。2016 年再次踏勘时，仗马和控马人数量有所增加，其东列为 3 组（均不同程度残缺，新近修复）；西列也新出土仗马 1 匹（位于南起第 1，头部和四肢残，新近修复）。



图 13　2008 年在泰陵北神门发现的石蹲虎，现保存在泰陵文管所

西神门　位于东山怀村东约 500 米处。刘庆柱调查时，双阙阙台还高出地表约 2.5 米，并存有南侧石狮。现今踏勘只看到南侧石狮，造型为卷鬃合口，双阙阙台已平毁。

建　陵

宝应元年（762）四月，唐朝第 7 位皇帝李亨崩于大明宫长生殿，年五十二。谥曰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庙号肃宗。在位于今礼泉县石马村北武将山上为其营建陵寝。宝应二年（763）三月，葬肃宗于建陵。关于建陵的调查报告找到最早的为 1961 年 9 月上旬对其进行的

一次调查、探测[①]，其所录情况同刘庆柱的记载大致相符。

鹊台和乳台　鹊台遗址在各类资料中均无记载，应早已湮灭。刘庆柱文中记载乳台双阙阙台均存、距南神门阙址 763 米。现今踏勘时在地表之上只存有西阙台。

神道石刻　刘庆柱文中记载建陵神道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

> 乳台北 95 米处有石望柱一对（东侧高 5.5 米、西侧残佚）；再其北 28 米翼马一对（身躯虽变小，但雕刻之精致为诸唐陵中最为突出）；再北 32 米为鸵鸟一对（形制同泰陵）；再北 32 米有仗马 5 对，仗马南北间距 30 米（均不同程度残缺）；再北 32 米有石人 10 对，石人南北间距 30 米。

同 1961 年那次调查相比，神道石刻缺失 3 尊控马人（当年的调查报告中并未说明这 3 尊控马人的具体位置）。2016 年 2 月 11 日，踏勘的具体情况为：东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柱（中裂），翼马，鸵鸟，仗马 5 匹（均不同程度残），文官石人 10 尊（南起第 1、4、9 尊头部缺失）；西列神道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石柱础石（一段柱身滑落沟中，柱头被埋），翼马，鸵鸟，仗马 5 匹（均不同程度残），武将石人 10 尊（南起第 5、10 尊头部残缺，其中第 10 尊石人头部于 2003 年 3 月在沟中发现，现藏于昭陵博物馆）[②]。从石人神情来看，文官神态肃穆雍容、武将相貌庄重威武，虽高度较之乾桥等盛唐帝陵要矮小不少，但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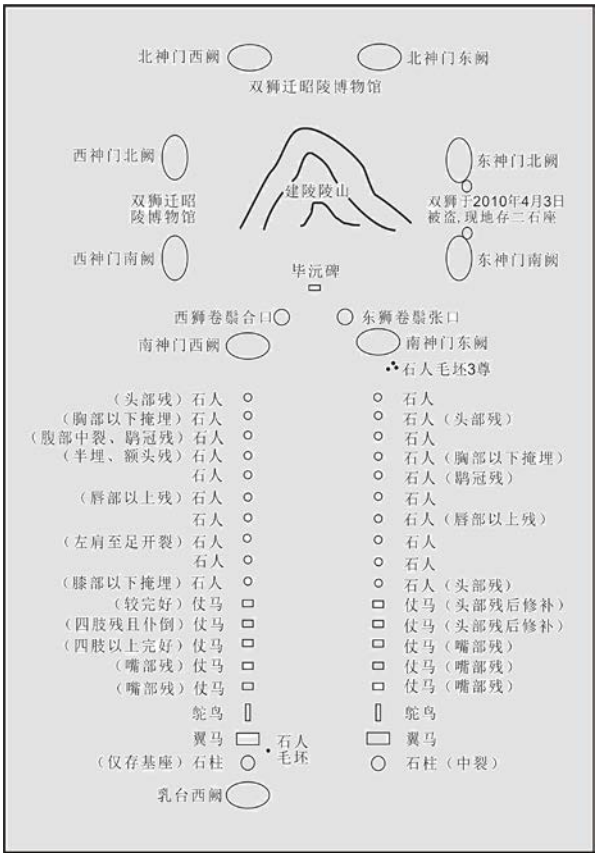


图 14　唐建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 年第 7 期，第 31 ~ 33 页。

② 李浪涛：《唐肃宗建陵出土石武将头》，《文物》，2005 年第 11 期，第 91 ~ 96 页。

态却壮硕不少，从熟练的刀法上能看得出大唐虽经“安史之乱”但自信犹存。

南神门　遗迹的保存情况这些年变化不大。双阙阙台保存较好，阙内存双狮，双狮一律直鬃但发尾卷曲，东狮张口、西狮合口。双狮石座上阴刻瑞兽图案。双狮之北立有毕沅碑，在毕沅碑后有一方不大石碑，记录了1957年礼泉县政府修葺建陵石刻事宜，估计神道个别仗马嘴部拙劣的修补就源于此。另外在南神门东阙和神道西石柱附近发现散落4尊石人毛坯。1961年调查时，考古人员在石人北侧发现两对高1.6米的小石人，有的倒在地上，有的夹于崖间，今日不得而知这两对小石人是藩酋像，还就是这4尊石人毛坯，此情况刘庆柱文中未提及。



图15　唐建陵已佚失的东神门南侧石狮（采自陕西省文物局编：《陕西帝陵档案》。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09页）

东神门　位于武将山东麓两个山包中间。现今双阙阙台保存完好，但双狮于2010年4月3日夜被盗，至今未破案。现地仅存双狮石座，座上依然阴刻瑞兽图案。需说明的是，石狮的安置位置不像其他门址位于阙内，而是紧贴双阙安置于阙台外，应是受地形影响，不得已而为之。

北神门　位于凉马村南约500米山坡处。受东神门石狮被盗的影响，双狮已迁昭陵博物馆保存，现地双阙阙台保存完好。

西神门　位于山西头村东约200米处。同北神门一样双狮迁昭陵博物馆保存，现地双阙阙台保存完好。

元　陵

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唐朝第8位皇帝李豫崩于大明宫紫宸殿内殿，随后在今富平县张家窑村北的檀山上为其营建陵寝。八月，谥曰睿文孝武皇帝，庙号代宗。十月，葬代宗于元陵。

鹊台和乳台　何正璜文中记载：“登上元陵陵山，遥望陵前约六里处，亦有外阙门一对隐约可见，与近处阙门及石刻行列构成子午线。”说明在1943年，鹊台和乳台依旧存在。至

刘庆柱调查时，鹊台阙台已被平毁，其台基位于元陵村东约1000米、距陵山南麓约4000米处。至于乳台遗址在刘庆柱文中没有记载，2013年3月27日，踏勘时在马家窑村中寻到保存不好的乳台东阙台，底边长3米、宽1米，高不足2米，距南神门阙址约600米。

神道石刻　元陵神道石刻在地表之上保存较差，据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也仅有：

最南端之石华表及翼马各一对。华表东边已倒地，且仅余一节，而缺少顶盖。西边立者成矩形之石柱各面均有花纹，现仅正南一面刻纹尚可辨，为类似唐碑侧之蔓草纹。东边已倒之华表其埋入土中之两面花纹甚清晰，可施拓印。翼马雕刻不见精致，头部甚小，颈部特长，唯昂然屹立之姿势雄伟生动，而无形中表现出唐代特有之精神。两马均垂尾，腹下及腿部均刻有云纹，颇具特点。按代宗元陵仅次于肃宗建陵，以时期论，其雕刻当足以代表中唐作风，唯因残毁特甚，惜已不足窥得其全貌为憾。除华表翼马而外，仅左列离翼马约140公尺处遗有无头翁仲一具，另有张家窑居民门前，遗有翁仲座石二……又另外有翁仲二躯镶入附近关帝庙之墙垣下，作为基石，实堪痛惜。

刘庆柱调查时，神道已无一件石刻。现今实勘时能看到已残成独立金鸡状的东列翼马。另外在张家窑村中看到二石人石座，不知是否为当年何正璜所见。2017年上半年，考古部门对元陵神道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被掩埋的石柱、仗马和石人等石刻，其中仅石人就发现7、8尊。



图16　发掘出土的元陵神道东列石人

南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

陵前见清毕沅所立“唐代宗元陵”碑，位于偏西之山足下，以指南针测视，与

陵门及石刻均在一子午线上。碑楼已毁……陵前朱雀门基址离碑楼约一里，两门基距约50公尺，附近瓦片亦多，唯两石狮已倒没，仅有一石座之边缘尚隐约露于麦田中。

刘庆柱调查时的情况即为现今所见，南神门仅存双阙阙台。经2017年上半年的考古发掘，得知南神门双狮已被砸毁，其中东列石狮存残石数块，西侧石狮仅余拳头大残石一堆。

东神门　位于白家崖村西约230米处的山坡之上。何正璜文中记载，“门阙门基甚为高大，唯石狮已湮失”。刘庆柱调查时，除双阙外，双狮亦存，南侧石狮高1.36米，直鬃张口；北侧石狮高1.46米，卷鬃合口。2013年踏勘时仅可见南侧石狮蹲于阙内，下部被土掩埋。之后不久，受简陵南神门石狮被盗的影响，该狮也被迁入富平县文庙保管。



图17　唐元陵东神门南侧石狮，现今此石狮已迁富平县文庙保管。

北神门　位于温家壕村西南约300米处山坡之上。何正璜文中记载：“元陵北门阙门基及两石狮均存，唯狮已作斜倒状，雕工粗糙，矮小已失狮形。阙门外并列石马三对，其行列距离同于简陵。右边者均已倒毁，左边三马首足均毁且亦倒于座侧”。刘庆柱文中记载：“双阙和双狮存，仗马存5，均残，东西列仗马间距30米，西列南数第一个在阙址北27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23.5米，第三个在第二个北24.5米；东列南数第一个在阙址北65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12米。”2013年踏勘所见为，双狮位于双阙阙台内，东狮高1.54米，直鬃，嘴部已残；西狮高1.63米，卷鬃合口。仗马4匹（西3、东1）位于阙外，杖马均甚残，西列3匹南北依次排列还能看出当年所列队形，东侧那匹镶入一土崖中，仅露臀部。

西神门　位于中山村东约500米的山坡之上。何正璜文中记载：“西门在西山坡下，两门基之间现已被山洪冲成深沟。石狮已无踪影，门基址亦被农人耕去其半，想见数十年后，必将尽行没灭而绝无踪迹可寻。”说门基址被破坏，恐是当日他们踏勘时错误的将平常土包

当成阙台了。按刘庆柱调查资料双阙阙台保存完好，只是此处阙台位于石狮西侧另一山梁上，相距 600 余米。这样修建门阙，在唐陵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处。现今西神门双阙、双狮保存完好。南阙底径 11 米、高 4.5 米，北阙底径 13 米、高 3 米，两阙相距 100 米。石狮蹲踞于对面山梁之上，南侧石狮卷鬃合口、北侧石狮直鬃张口。双狮原本倒伏于地，富平县文物旅游局于 2013 年 1 月间扶正。

崇　陵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朝第 9 位皇帝李适崩于会宁殿，年六十四。随后在今泾阳县石马巷北的嵯峨山东麓为其营建陵寝。九月，谥曰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葬德宗于崇陵。

鹊台和乳台　为了搞清楚崇陵是否保存有鹊台，当年何正璜等人在陵前五里调查过一对古冢，见双冢并非平行，故疑其为陪葬墓而非门阙遗址。在刘庆柱文中也未提及鹊台遗址，故推断其早年间就已湮灭不存。乳台双阙阙台现在保存完好，距南神门阙址 596 米。

神道石刻　崇陵神道石刻在清末的情况，足立喜六文中记载为：

> 石柱一对，石柱高 30 尺，表面上刻有大型蔓草花纹图案，可惜大部分已被磨灭，惟独左侧石柱正面，仍鲜明可辨。石柱之次为天马一对，但左右形制不同。次为石鹅一对，石马三对，石人十一对。现在左侧石鹅和两侧石马俱已颓废，仅有一部分露出地面。石人倒地者左三右六，完整者还不到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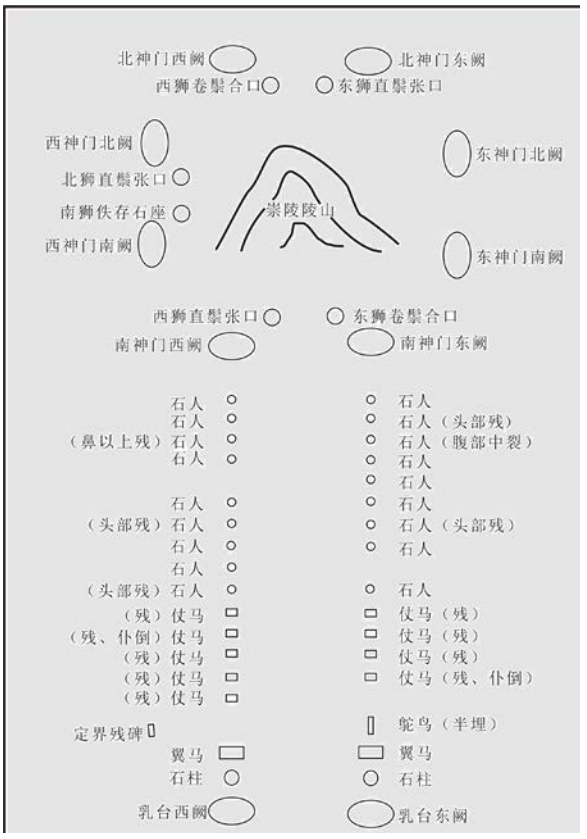


图 18　唐崇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文中所言石人十一对，恐是将藩酋像也算上了。近40年后，何正璜文中记载神道情况如下：

> 华表一对均立，唯西边之一底座园座弃置一边，未置柱下，殊为奇特。飞马一对均立。朱雀一对东立西倒，造型拙劣，不类鸵鸟。石马五对，完全倒毁，御马卫士数躯似可见。石翁仲十对，立者十三，倒者七（分别为东列南起第4、7、8、9、10，西列南起第3、7），雕刻矮小粗劣，全身高2.5公尺，唯东西两列装束面貌均不相同。朱雀门基址外，遗有藩王石座十块，唯其中两块类似门枕石，西列并有藩王像一躯，作披西式斗风之装束。

对比两文所述，这些年间崇陵神道石刻数量无大的变化，至刘庆柱调查时，崇陵神道石刻保存情况和2013年3月24日踏勘所见大致相同，已不存西列鸵鸟、东列南起第1匹仗马和东西列各一石人（刘庆柱文中记载，东列佚南起第10，实地比对应佚南起第2；西列佚失南起第6尊）。其具体情况如下，东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柱，翼马，鸵鸟（半埋土中），仗马4匹（俱残），文官石人9尊（南起第4、9尊头部缺失，其他保存较好）；西列石刻由南至北分别为：石柱，翼马，仗马5匹（俱残），武将石人9尊（南起第1、4尊头部缺失、第8尊头顶部缺失，其他保存完好）。另外刘庆柱文中记载，当年何正璜一行所见的藩酋像仍然存在，并且在神道附近发现控马人、佛僧像等石刻，当日踏勘实地未发现这些石刻。

南神门　足立喜六文中记载，南神门双阙阙台内有石狮一对，并有毕沅所立“唐德宗崇陵”碑。碑的北面为正方形献殿遗址，酷似高宗乾陵。但此陵在石狮与毕沅碑之间，有基础四个，与献殿基底平行，呈直线排列，较为特别”。从文中所附平面图来看，献殿遗址前立有两通石碑，其一为毕沅碑，另一通没有介绍。何正璜文中不但介绍此碑为崇陵定界碑，而且详细收录碑文如下：

> 上书“清乾隆四十年（1775）立”。中书“唐德宗皇帝之陵”，侧书“接唐书永贞元年十月己酉葬神武圣文皇帝于崇陵，是年改葬昭德皇后王氏。《长安志》封内四十里，下官去陵五里，《陕西通志》崇陵在泾阳县西北四十里嵯峨山下。今筑围墙，垣周方六十丈，高六尺，不开门，自垣南拜坛以下，及石人石兽所立至道口，俱不许耕种，四周立石为界。查勘陵户四名，每名给口食地二十亩，税地一顷一十四亩。清丈注册，不得侵越封内。禁不许掘煤、烧窑、穿井，每年本县官春秋亲祭稽查，

特揭示”。落款“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巡府陕西西安等处地方兼都察院右副督御史赞理军务兼理粮饷毕沅题，泾阳县知县方承保书并立”。

目前此碑被铲去侧书文字，置于神道南侧、文保碑西。而另一通毕沅碑已不知去向。至于南神门其他遗迹，百多年来则变化不大，双阙阙台高大完好，双狮位于阙内，东侧石狮高 1.75 米、卷鬃合口，西侧石狮高 1.89 米、直鬃张口。

东神门 位于上红沟村北约 400 米农田中。何正璜文中记载，“阙门基址甚高大，石狮一对亦完存，狮之背后有座石四块，当为门址所在”。至刘庆柱调查时，双狮皆佚，独存双阙阙台，情况如今。

北神门 位于东坡村东南约 500 米处。何正璜文中记载：“两阙门基间距特远。石狮一对完存。唯石马三对、石虎一对均已倒毁于荒草丛中，几无从辨识。仅遗存有二三石座及无头之马躯一，石虎则见于较远之农田中。”

刘庆柱文中记载：“东列石狮北 30 米的一南北土崖上有三个残石人，身穿窄袖袍，腰系革带、双手拱握，脚著小靴，残高 1.4 米、肩宽 0.53 米，当为控马者。据当地群众说，此地原有仗马，现均佚”。

2013 年 3 月 24 日，现地除看到双阙阙台和双狮（东狮直鬃张口、西狮卷鬃合口）外，还在附近寻到杖马 2 匹和一控马人（均残且倒伏于地）。2014 年 11 月 6 日，再次踏勘时，发现这些仗马和控马人已不存，后得知已就地掩埋保存。



图 19 2013 年 3 月拍摄，现已掩埋保护的崇陵北神门仗马之一

西神门 位于陵山西侧两山包之间的鞍部。何正璜文中只说存双阙和石狮，但未说明为几只石狮。刘庆柱文中明确说存两只石狮，南狮高 1.9 米，卷鬃合口、北狮高 1.6 米，直鬃张口。现今踏勘所见为，双阙阙台伏于两侧坡上，南阙尚明显、北阙矮小，阙内仅存北狮和南狮基座。

丰　陵

元和元年（806）正月，唐朝第10位皇帝李诵，在当了10个月太上皇后崩于兴庆宫咸宁殿，年四十五。谥曰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庙号顺宗。七月，葬顺宗于丰陵。丰陵位于今富平县陵前村北的金瓮山上。



图20　1943年9月，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调查丰陵时，发掘神道石柱时的情景。

当年何正璜一行，由丰陵下宫一直行到陵山脚下，只寻到一残存半截的石柱和一通毕沅碑，这凄惨的场景和如今所见相同。可能是受此影响，他们只是站在陵山之巅眺望了其他三处神门的位置，未见遗迹，就拓了石柱柱身花纹，次日即赶赴桥陵。刘庆柱作为一名专业的考古工作者，面对如此情景，依然调查了整个丰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现结合2013年3月27日踏勘收获，将其他三处神门的情况记录如下。

东神门　位于红河村西。在刘庆柱调查时双阙阙台就已平毁、双狮佚失。

北神门　位于后坡村西南侧山坡上。刘庆柱文中记载“北神门双阙间距58米，东阙高4米、西阙高1.5米，仗马2，均残，分别位于阙外北20米和40米处。”现今踏勘在实地只看到一石狮头顶部露出地面约碗口大小，此石狮在刘庆柱文中未记录。在该狮东北方向约220米处和西北方向约180米处各存阙台，两阙相距约150米，不但间距远远大于刘庆柱文中记载，而两阙还存在数十米的高差，应不是文中所载双阙遗址，但附近再无夯台。至于仗马实地也未发现，但据村民所言，石狮所在地当地人称之为“狮子坪”，在其北略低处称之为“石马坪”，仗马应埋于“石马坪”。

西神门　位于马坡村中。北阙台位于该村小学校园内，南阙台位于校外。在阙东约5、60米果园中一土崖上镶嵌着石狮一尊，只露面部和一小部分胸部，形态不明，此狮刘庆柱文中也未记录。在踏勘之后不久，该狮也迁入富平县文庙保管。



图21　丰陵西神门已移位石狮，现已迁富平文庙保管

景　陵

元和十五年（820）正月，唐朝第11位皇帝李纯崩于大明宫中和殿，年四十三。朝廷在今蒲城县义龙村北的金帜山上为其营建山陵，谥曰圣神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五月，葬宪宗于景陵。

鹊台和乳台　刘庆柱文中记载景陵仅存东鹊台阙台，2013年4月9日，踏勘时在郭家村西、距南神门阙台约2800米处寻到该处遗迹。何正璜文中记载，乳台门阙虽埋没过半，但双阙阙台均存，至刘庆柱调查时，仅存东乳台，位于距南神门阙台约630米处。现今踏勘时在地表上已看不到乳台遗迹。

神道石刻　何正璜文中记载，神道石刻保存情况如下：

> 华表一对均已倒毁，左边之石柱已断为三段，右边之石柱尚完整，柱长约4.8公尺，远较桥陵为短。飞马一对均完整，唯雕工粗劣……马左卷尾右垂尾，腹下亦有云纹。鸵鸟一对左立右没，造型矮小，不类鸵鸟，石宽2公尺、高1.5公尺。石马五对，仅倒损其二，雕工甚劣，马之造型垂首无神，显示沮丧衰颓之气象。石翁仲十对仅存其六，余均倒毁，体躯瘦小，全身仅高1.5公尺，衣褶表情均不及他陵之丰满自然。

刘庆柱文中记载如下：“石柱东者仆倒、残，西者佚。翼马存二。鸵鸟存西列，东列佚。仗马东列存南起第1、2、3、5，西列南起存第1、2、5。石人仅存东列二尊，其中一残一完好。”

至2013年石刻虽有大幅增加，但残毁很严重，具体情况如下：神道东侧由南至北分别为

石柱（仆倒），翼马，鸵鸟残座，仗马5匹（南起第4匹倒地、残损），文官石人8尊（除南起第6尊保存较好，其他不同程度残缺）。神道西侧由南至北保存有石柱（仆倒），翼马（尾部残），鸵鸟，仗马5匹（南起第3、4、5倒地、残损），石人基座，武将石人6尊（其中2尊为残块，其他均残缺头部）。2016年4月30日，再次踏勘景陵神道，发现东列那尊保存完好的石人已不在现地，据当地人说是被搬至文管所保存。



图22　2013年4月拍摄的景陵神道唯一完整的东列石人，现今实地不存

南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南神门遗迹保存情况如下：

> 朱雀门基址一对尚高耸，附加花纹砖甚多……门内石狮一对，亦矮小粗劣，左没右立，狮高1.5公尺。石狮北约280公尺处有献殿遗址，审其砖瓦为明清时代筑建……其东南角并有碑亭遗址，其祭碑可见者，有明成化洪武及清乾隆等御制祝文碑……毕沅所立“唐宪宗景陵”碑在献殿之后。

刘庆柱文中记载同现今情况相同，双阙阙台内仅存西狮（狮鼻被毁），高1.8米，直鬃张口，石狮北立有毕沅碑。而那些何正璜文中记载的明清祝文碑，据《蒲城县志》记载，在民国时期多被国民党军队打靶击碎[①]。

东神门　位于西山村西。刘庆柱文中记载，东神门双阙阙台保存完好，阙内南狮为直鬃张口、北狮为卷鬃合口，同现今情况一样。

① 《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蒲城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第6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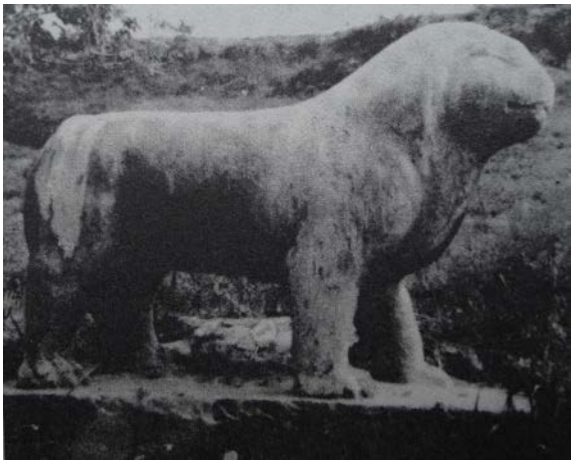


图 23　景陵北神门立虎
（采自刘庆柱：《唐十八陵调查记》，《三秦 60 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三秦出版社，2010 年，第 8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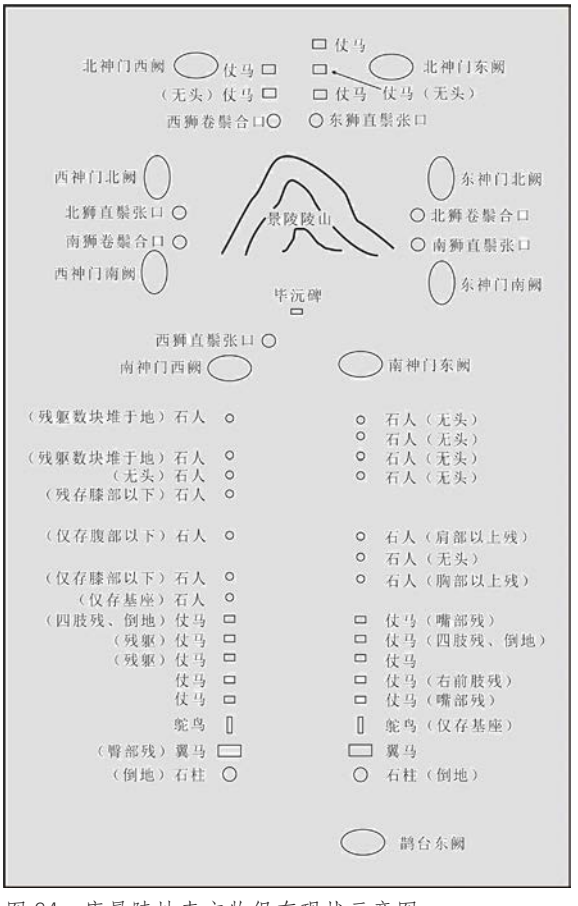


图 24　唐景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北神门　位于王坡村西南约 500 米山坡处。刘庆柱文中记载：

> 双阙东小西大，保存较好。双狮位于阙内，东狮高 1.7 米，卷鬃合口；西狮高 1.5 米，直鬃张口。仗马三对，东西列间距 45 米，东列仗马，南数第 1 个在阙址南 22.4 米，第 2 个在两阙址东西线上，第 3 个在阙址北 24 米；西列仗马，第 1 个在阙址南 18 米，第 2 个在两阙址东西线上，第 3 个在阙址北 19 米。仗马北有两对小石狮，东西分列，一对蹲狮在南，东西间距 18 米；一对行狮在北，东西间距 41 米。蹲狮和行狮，东西列形制相同。

2013 年 4 月 9 日踏勘发现，双阙阙台如刘庆柱所述，但双狮为东狮直鬃张口、西狮卷鬃合口，同其记述相反。仗马存 5 匹（东三、西二），除西列南侧仗马站立外，其余石刻皆滚翻于地。至于那些小石狮，实地未见，其后在刘庆柱另一篇文章中看到行狮照片，形状同乾陵北神门石虎相似[①]。2016 年 4 月 30 日，再来踏勘北神

① 刘庆柱：《唐十八陵调查记》，《三秦 60 年重大考古亲历记》，三秦出版社，2010 年，第 89 页。

门，所有石刻均有所修复并原地扶立。

西神门　位于原家山村西南约 200 米处。现今情况与何正璜文中记载相同。双狮位于高大的双阙阙台内，南狮卷鬃合口，北狮直鬃张口。2013 年所见为双狮半埋，2016 年看到双狮则均得以升高，石座亦可见。

光　陵

长庆四年（824）正月，唐朝第 12 位皇帝李恒崩于寝殿，年三十。庙号穆宗，谥曰睿圣文惠孝皇帝。在今蒲城县光陵村北之尧山上为其营建陵寝。同年十一月，葬穆宗于光陵。

鹊台和乳台　鹊台遗迹在何正璜、刘庆柱文章中均未提及，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记载：“在乳台南约 1900 米处 ,1994 年新发现鹊台一对。”[①] 现今踏勘时，在此范围内未发现任何夯台遗存，加之文中又未记录鹊台长、宽、高等数据，故怀疑其所指为鹊台台基遗迹。乳台遗址位于光陵村南、距南神门阙址约 600 米，现今情况如刘庆柱文中所述，仅存东阙台。

神道石刻　光陵神道穿过光陵村，村中一条东西向道路将其截为南北两半，乳台和部分石刻位于道路南侧，石人等石刻位于道路北侧。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神道石刻保存情况为：

> 华表一对均已倒毁，且左列之一没入地下不可见。飞马一对均倒弃地面，唯无残损。鸵鸟一对已没入地下，仅右边露有残石。石马五对，右列没其三，左列全湮灭地下。石翁仲十对已全部倒折，且多已没入沟中，其身段大小与景陵同，唯帽为飞翅式，纹饰甚复杂，面部亦多连腮须，双手拱立持剑与他陵无异。

刘庆柱文中记载的神道石刻情况为：

> 石望柱位于乳台阙台北 107 米，仅存东列且仆倒于地。翼马一对倒于石望柱北 22 米，均有不同程度残缺。仅于东列翼马北发现鸵鸟石刻残块。在东列发现两个残仗马，在残仗马北有一残石人，从服饰看应为控马人。石人身高 2.68 米，东列石人仅存 1，位于翼马北 155 米，形制同景陵；西列石人存 4，头戴高冠，冠前饰团花纹，两侧饰羽翅纹，穿广袖长袍，袖胡过膝，脚著靴，双手持五节剑。

2013 年 4 月 9 日踏勘的情况为：东列石刻存仆倒的石柱和翼马（嘴部残毁），西列除存

①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 年，第 527 页。

有仆倒的石柱和翼马（嘴部残毁）之外，还存一尊无头翁仲及一翁仲基座（镶于石人南侧土崖中）。2016 年 4 月 30 日再次踏勘时，在东列翼马北约 40 米处发现一大部分被掩埋的残缺仗马。

南神门　百多年来的变化倒是不大，何正璜文中所述倒地之双狮和毕沅碑现今均已扶立。双阙阙台较为高大，阙内双狮均为合口，东狮卷鬃（右前腿残）、西狮直鬃。毕沅碑立于石狮北约 2 里的陵山脚下。

东神门　位于唐陵村南约 300 米处。何正璜、刘庆柱文中均记载东神门仅存双阙阙台。2013 年 4 月 9 日踏勘时在双阙内见到双狮，北狮保存较好、卷鬃合口；南狮已残为很多碎块，大致拼出一个狮子模样。

北神门　位于狮子坡村南约 700 米的山坡之上。刘庆柱文中记载：“西列残缺石狮位于双阙阙台内。仗马 3 对均残，东西列间距 32 米，南数第一对在阙南 26 米，第二、第三对南北间距均为 24 米，从残存部分看，形制同神道仗马。”以上情况如现今踏勘所见。据《蒲城县志》记载，东侧石狮被当地村民拖于村中，弃于涝池[①]。在村中打听该石狮下落，村人均告知已佚失。

西神门　位于皇边村北约 300 米处。刘庆柱文中记载双阙阙台存、石狮仅存北狮，现今踏勘的情况为双狮均位于双阙内侧，北狮卷鬃张口；南狮直鬃合口，从石座上滑落，侧依在石座旁。

庄　陵

《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本纪》载：“宝历二年（826）十二月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谥曰睿武昭愍孝皇帝，庙号敬宗。大和元年（827）七月十三日葬于庄陵。”[②] 庄陵位于今三原县柴家窑村东约 250 米处。为唐代第二座堆土为冢之帝陵。

鹊台和乳台　庄陵鹊台各文均未提及，估计早年间就已湮灭。2013 年 3 月 19 日踏勘时，

① 《蒲城县志》编纂委员会：《蒲城县志》，第 615 页。

② 《旧唐书》卷十七《敬宗本纪》，第 522 页。

在距南神门石狮约500米处，寻到刘庆柱文中记载的东乳台遗迹，残存规模几乎等同于田野中的寻常坟墓，如不是存有夯层很难判定。

神道石刻　何正璜文中记载，神道石刻存："华表一对均倒毁。飞马一对东倒西立，式同端陵。鸵鸟一对东立西没，式同景陵。石马四对均倒没地下，仅东列有可见者。石翁仲十对，湮没过半，立者仅四座，雕刻比端陵较胜一筹。"

30多年后的情况在刘庆柱文中记载如下：

> 石望柱位于乳台阙址北70米，均倒于地。翼马位于石望柱北24米，西列完好、东列倒于地，翼马颈较瘦长、头短、腿高，东者垂尾，西者缚尾。鸵鸟仅存东列、位于翼马北24米，形制同景陵，鸵鸟身高1.1米、身长1.5米。东列南数第一个石人位于鸵鸟北142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140米、第三个在第二个北41米；西列南数第一个石人位于鸵鸟北168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116米、第三个在第二个北80米。石人高2.77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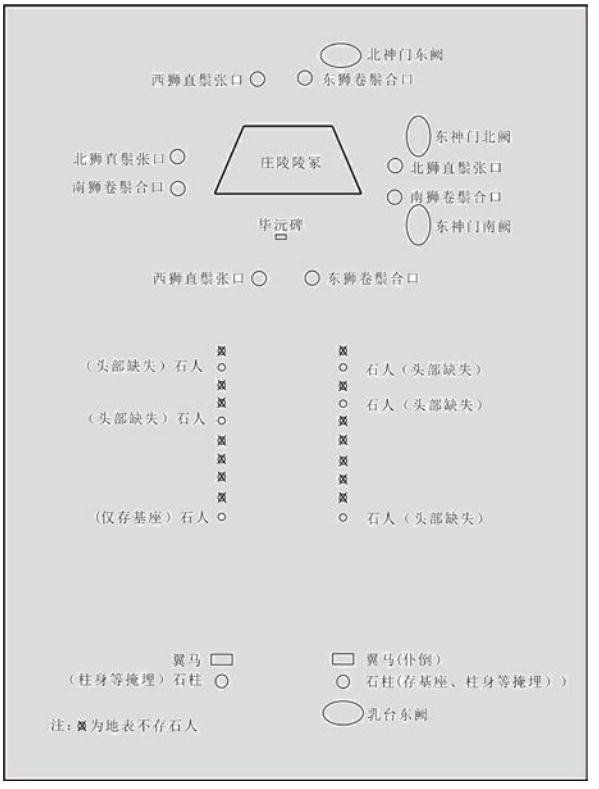


图25　唐庄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2013年3月19日踏勘情况为，东列石刻由南向北存石柱（仆到），翼马（仆到）和无头文官石人3尊；西列存石柱（仆到），翼马，石人基座和无头武将石人2尊。同刘庆柱文中记载相比佚失西列南起第一尊石人（现地存石座）。2016年2月27日再次踏勘时，倒地石柱均被埋于地下，地面仅见东列石柱基座。

《枪声为盗墓贼送终》[①]一文介绍了庄陵石人被盗头颅的详细经过。1997年5月3日夜，韩华民雇佣三轮车夫涂庆民，将庄陵5尊石人的头颅用铁锤击落后盗取，通过孙国宾将4颗石人头颅卖于香港人孔某(因车辆颠簸致使一颗滚落道旁，被路人拾得上交，现存三原县城隍庙)，

① 大海、邢山：《枪声为盗墓贼送终》，《党风与廉政》，1998年第3期，第17～18页。



图 26　2013 年 3 月拍摄的庄陵神道东列石柱

韩华民、孙国宾落网后，经审判于同年 12 月 29 日在庄陵前伏法，涂庆民被判 8 年有期徒刑。但被盗卖的 4 颗石人头至今渺无音讯。

南神门　刘庆柱文中记载，双阙阙台被平毁，双狮存，均高 1.75 米，东狮卷鬃合口、西狮直鬃张口，同踏勘所见相同。只是刘庆柱文中所述的 8 尊藩酋像，已迁入三原县东里花园保存，现地不存。毕沅碑依旧立于石狮北约 220 米、陵冢前。

东神门　刘庆柱文中记载，双阙阙台存，双狮残。2013 年的情况为：双阙保存较为高大，只是阙内双狮几乎被土全部掩埋，南狮仅露前爪、北狮仅露尾部。2016 年 2 月 27 日再次踏勘时看到，北狮直鬃张口已全部出土，南狮卷鬃合口、胸部以下依旧被土掩埋。

北神门　刘庆柱文中记载，存东阙台和阙内双狮，双狮头部以下埋于土中，两狮朝向冲南，估计被后人调了方向，此情况同 2013 年踏勘情况相同。2016 年看到东狮卷鬃合口、还是仅露出头部，西狮直鬃张口、已全部出土，但两狮朝向均已冲北。

西神门　刘庆柱文中记载，双阙阙台被平毁，双狮存，南狮高 2 米、卷鬃合口，北狮高 1.9 米、直鬃张口，同现今所见相同。

章　陵

开成五年（840）正月，唐朝第 14 位皇帝李昂崩于大明宫太和殿，年三十。随后在今富平县杨家窑村北的天乳山上为其营建陵寝。谥曰为元圣昭献孝皇帝，庙号文宗。八月葬文宗于章陵。

鹊台和乳台　据《唐章陵调查简报》[①] 记载，章陵鹊台阙台上世纪七十年代尚存，后被平毁，其基址位于上杨村西南、东干渠北岸约 20 米处，两阙间距约 300 米，北距乳台 1700 米。乳台遗址位于杨家窑村南，双阙阙台保存较好，北距南神门阙台约 600 米。

神道石刻　何正璜文中记载："陵前石刻行列倒毁特多，完整存在者当有华表一对均倒没、翼马二均立、鸵鸟存西列一件、石马一对（西倒东没）及翁仲四，其余均已倒毁或湮没。翼马刻法次于元陵而优于简陵，全体比例相称，鸵鸟亦甚优美。"刘庆柱调查时在章陵神道未见一件石刻。2013 年 3 月 27 日踏勘时，也仅寻得被埋的只剩一角的东侧石柱（南距乳台 130 米）、西列无头武将石人一尊及无头藩酋像一尊。据《唐章陵调查简报》记载："西列石柱被深埋在村民杨振卿家水窑边。另外在东侧石柱北 62 米处存有仗马一件，残毁严重，仅背部露出地表。"

南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南神门存双阙阙台和双狮，阙北立有毕沅"唐文宗章陵"碑。在刘庆柱调查时的情况如今，仅双阙阙台存。据《唐章陵调查简报》一文介绍，东侧石狮埋于地下，而毕沅碑毁于 1967 年。

东神门　位于箭杆村东 130 米。现今只存双阙阙台，同刘庆柱文中记载。

北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在天乳山顶，遥望北门阙址仅存尺许小堆，有石狮一对，石马三对。"在刘庆柱调查时已无任何遗存，据《唐章陵调查简报》一文介绍，以上遗迹均毁于文革期间。

西神门　位于西陵村北 100 米处，不见双狮，只存西神门南阙台，如刘庆柱当年所见。

端　陵

会昌六年（846）三月，唐朝第 15 位皇帝李炎崩于大明宫，年三十二。谥曰至道昭肃孝皇帝，庙号武宗。在今三原县兴隆村北为其营建陵寝，当年八月，葬武宗于端陵。端陵为唐朝第三座堆土为冢之帝陵。

鹊台和乳台　端陵之鹊台各文均无记载，应早已湮灭。乳台双阙阙台现存，距南神门 248米。

神道石刻　端陵神道仅 200 多米，为唐陵最短之神道。据足立喜六文中记载，在清末神道尚存"石柱一对，天马一对，石鹅一对，石马二对，石人六对（东列立者为南起第 2、4、5、

① 巩启明、王保东、李江红：《唐章陵调查简报》，《文博》，2003 年第 3 期，第 3 ~ 8 页。

6 尊，西列立者为南起第 5 尊，其余均倒毁）”。

之后何正璜文中记载较细但神道石刻数量变化不大。

华表一对，东立西没，没者仅见棱角存者，座宽 1.5 公尺，柱高 5 公尺，刻大蔓草花纹，现有两面可见。飞马一对均倒地，西侧已没入地下。鸵鸟一对，均倒扑无从见。石马三对，均倒毁，且与鸵鸟、飞马等堆积一处，同有御马卫士体躯二尚可见，马身高 1.4 公尺、长 1.8 公尺。石翁仲六对，东者立四、西者立一，余多埋入地下，（座）四面均有狮纹线刻，石翁仲连座高 3 公尺，式小而劣，如景、泰诸陵。

再之后刘庆柱文中记载神道石刻的情况如下：

石望柱位于乳台阙台北 65 米，仅存东列耸立。翼马位于石望柱北 9.8 米，东列仆倒、西列立，形制同庄陵。东列鸵鸟佚失，西列鸵鸟迁陕西省博物馆（今碑林博物馆）。在西列翼马附近存仗马二，均残。石人东列现存 3，南数第一个在翼马北 80 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 13.5 米、第三个在第二个北 14 米；西列存 1 个石人，在翼马北 98 米。石人身高 2.89 米，形制同庄陵，唯东列石人左侧不佩剑，腰带下无前后花结长帛。



图 27　兴隆村已被改成石槽的端陵无头石人残躯

现今情况同刘庆柱的记录实地多出西列石柱柱础，位于翼马西侧约 5 米处。另外依刘庆柱文中所载数据来看，西列武将石人当年是完整的，但现在已失头部。踏勘时在兴隆村中还发现一被改成石槽的无头石人残躯，正面向下，不可分辨文武。

南神门　刘庆柱文中记载，南神门存东阙台，阙内东狮高 1.7 米、卷鬃合口、西狮高 1.8 米、直鬃张口，如今所见。但何正璜文中所录的毕沅碑，在刘庆柱调查时已不存。

东神门　现今情况同何正璜文中记载，双阙阙台保存完好，阙内北狮高 1.5 米、卷鬃合口，南狮高 1.6 米、直鬃张口。

北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

端陵北陵门除阙门基址及石狮之外有石马两对，半数倒损。在狮背后有陵门基址，长 20 公尺，中开三门，门宽 2.9 公尺，每门有门枕石两块并列，石长 1.3 公尺、宽 0.7 公尺、厚 0.4 公尺。附近砖瓦片甚多，显然为原有之陵垣门址，此为他陵所未见者。

以上遗存在刘庆柱调查前已不存，他仅在陵冢东北 750 米的西三合村饲养室院内见一控马人，头残，高 1.4 米，身穿圆领窄袖袍，腰系带，足着靴。

西神门　何正璜文中记载原有双阙阙台，至刘庆柱调查时已平毁，现仅存双狮，南狮高 2 米、卷鬃张口，北狮高 1.9 米、直鬃合口。

贞　陵

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唐朝第 16 位皇帝李忱崩于大明宫，年五十。谥曰圣武献文孝皇帝，庙号宣宗。于今泾阳县崔黄村北之仲山上为其营建陵寝，次年二月，葬宣宗于贞陵。

鹊台和乳台　贞陵鹊台位于袁门高张村南、距南神门阙址 1982 米，现今双阙阙台保存完好。乳台距南神门阙址 482 米，刘庆柱调查时，双阙阙台存，今仅存东阙台遗址。

神道石刻　刘庆柱文中记载当年神道石刻情况为：

石望柱位于乳台阙址北 24 米，石望柱高 6.95 米（石座埋于土中，未计算在内），形制同建陵，柱身八棱面线刻蔓草花纹，东列石望柱的东南、南、西南和西面花纹保存较好，西列石望柱柱身断裂、风蚀较甚。翼马位于石望柱北 22 米（神道石刻南北间距均为 22 米），身长 2.83 米、身高 2.8 米，东列翼马头若河马状，头顶无角，尾垂，造型粗俗；西列翼马头顶有独角，缚尾，臀部后倾，造型拙朴，西列翼马马背之上前后分布 24 个园窝，二翼马左右翼翅均与颈上部连通。鸵鸟仅存东列，高 1.11 米、长 1.4 米，腿短似鸭形，整个屏面饰满浮雕山石。仗马东列存 2、西列存 4，身高 1.75 米、身长 2.05 米，马背置鞍、无马镫、披障泥，马身饰物简化，马尾下垂，脖下系铃。较其他唐陵仗马特殊者，贞陵仗马马背上凿有园窝，西列南数第一仗马有园窝 13 个，东列南数第一、第二仗马分部有园窝 16、14 个。石人东列存南数第 1、3（半埋土中）、4、6、7、8 尊；西列存南数第 1、4、5、6、7、10 尊，形制同庄陵，东列石人高 2.47 米；西列石人高 2.88 米，东列应为文官、西列应为武官，但现存西列南数第二尊石人，其服饰造型同东列石人，当为文官。东列现存 6 个石人，均为文官，未发

现形同西列的武官。

现今的情况是：石柱、翼马、鸵鸟和仗马同刘庆柱文中记载相同，只是神道东列多出石人1，位置为南数第9尊；西列多出石人3，位置为南数第3、7、9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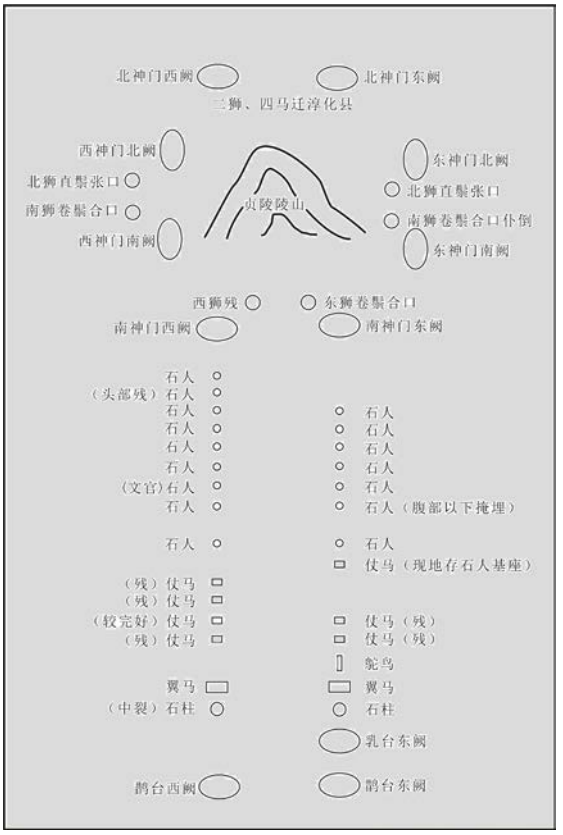


图28　唐贞陵地表文物保存现状示意图

南神门　现今情况如刘庆柱文中所录。双阙阙台存，阙内东狮高1.72米，卷鬃合口，西狮大部分缺失。如果说同刘庆柱调查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为防盗给石狮焊了铁笼。

东神门　位于西山庄西北300米之山坡上，现今情况如刘庆柱文中所录。双阙阙台依山势北高南低，双狮藏于阙内、均高1.6米，南狮卷鬃合口、仆倒在地，北狮直鬃张口、屹立不倒。

北神门　位于淳化县石马坪南约300米的山坡上。现仅存双阙阙台，刘庆柱文中记载："有双狮和仗马二对，仗马东西间距25米，南起第一对在阙址北25米，第二对在第一对北22米，形制同神道仗马"，现今这6件石刻已迁淳化县文博馆北门前保管。

西神门　位于陵山西麓山坡之上。高大的双阙阙台在山脚下就可遥望，但特殊的是双狮却位于阙外约300米处，此情况为唐陵唯一。南狮高1.53米、卷鬃合口，北狮高1.65米、直鬃张口。以上情况同刘庆柱当年调查所见相同。

简　陵

咸通十四年（873）六月，唐朝第17位皇帝李漼崩于咸宁殿，年四十一。谥曰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庙号懿宗。随后即在今富平县陵怀村北的紫金山（亦称虎头山）上为其营建山陵。次年二月，葬懿宗于简陵。

鹊台和乳台　当年何正璜一行在陵怀村南约五里处见一对古冢，东西并列、间隔约175米，

经测量推测为简陵鹊台双阙遗迹。至刘庆柱调查时此遗迹已湮灭。乳台遗址位于陵怀村北、距南神门阙址 312 米处，东阙台保存高大，而西阙台只略显于地面。

神道石刻　何正璜文中记载，神道石刻当年可见的数量就不多。

> 在外阙门内 80 公尺处，有石刻东西对列。今仅西列尚散立成行，首为翼马，次为鸵鸟，再次为石马三，再次为石人三……其各石刻间距距离：翼马鸵鸟间相距 10 公尺，鸵鸟石马间相距 27 公尺，其间疑原有他种石刻，今倒毁不见者。因三马之间亦各间距 10 公尺，石马与第一石人翁仲之间相距 16 公尺，第一石人与第二石人之间相距 30 公尺，第二石人与第三石人之间相距 43 公尺，疑其间原来应有多数石人存在。第三石人至内门阙门基相距约 40 公尺。东列仅存翼马已倒地破损外，其他均因山洪冲流而一无所存，雇人掘出东列鸵鸟，发现已中断，仅存下部，全部形体已无可辨，随即再次掩埋。

刘庆柱文中记载神道石刻情况如下：

> 翼马二，位于乳台阙址北 90 米，东西相距 90 米，西列翼马头上独角突出，而东列翼马头上独角甚微小，形制同贞陵。仗马二，均位于西列，南数第一仗马在翼马北 45 米，第二仗马在第一仗马北 20 米，形制同贞陵。石人二，均位于西列，南数第一石人在仗马北 21.8 米，第二石人在第一石人北 45 米，形制同贞陵。

现今除二翼马迁往陕西历史博物馆外，其他如刘庆柱文中所述。

南神门　双阙阙台百多年无变化。至于石狮，何正璜文中记载当年就仅存东狮，该狮于 2013 年 2 月 9 日夜被盗，2 月 20 日被盗石狮在河北邢台找到，次日运回富平文庙保管。毕沅所立“唐懿宗简陵”碑原立于石狮北约二百步处，至刘庆柱调查时已不存。另外在东



图 29　2013 年春节，唐简陵南神门东侧石狮被盗后迁往富平文庙保存，此为被盗前屹立原地的石狮　（摄影：党明放）

阙台南侧何正璜记录有藩酋像 2 石座，刘庆柱记录为 5 方，现今实勘见到 3 方。刘庆柱文中记载在石座旁有藩酋像二，现今实地不存。

东神门　位于三条沟村中。刘庆柱文中记载的情况如今，存双阙阙台和阙内双狮，南狮卷鬃合口、北狮直鬃张口，雕工拙劣，鬃毛草草以线刻表示。

北神门　位于铜川市耀州区石原村东。何正璜文中记载为：

> 其阙门土基较西门为高，版筑层犹历历可数，现成钝圆锥状。两阙址相距 52 公尺。阙门内列有石虎一对、石马三对、石狮一对。狮虎均向外立，马则对立。马之右侧均有御马者，作卫士胡服装束。石马石虎均好，石狮则同西门所见者矮肥不合比例。各石刻大小石虎高 1 公尺，石狮高 2 公尺，石马头高 1.5 公尺、身长亦如此、尾部高 1 公尺。各石刻存在情况：石虎立于右者已损坏，且离座已二三尺。马则右边者二立一倒，左边则全倒。御马武士已全部倒损，断头缺臂，离开原来地位甚远，行将全部埋没地下。在石狮后部约 5 公尺处遗有石门枕一对，长仅 1 公尺许，似非唐物。

至刘庆柱调查时双阙阙台保存情况不变，但石刻仅存：“双狮和仗马 3，仗马均残且都位于西列，第一仗马在门狮北 7.8 米处，其余间距均为 6 米。”2017 年前情况为：双阙阙台存，阙内由南至北存有，扑到于地且残缺的双狮（东狮卷鬃合口、西狮直鬃但面部残毁）和 4 匹残缺杖马（西 3、东 1）。2017 年简陵北神门得以修复，石狮和仗马均修补、扶立，且新出土西列中间仗马控马人 1 尊，现立于仗马北侧。

简陵北神门仗马全部位于阙内，此情况从现今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为唐陵唯一；另外，景、



图 30　2013 年 3 月拍摄，修整前的简陵北神门

光二陵仗马南起第一列位于阙内、第二列位于双阙间、第三列位于阙外；其他各陵北神门有仗马遗存者均位于阙外。还需说明的是，行文至此，在北神门出土过石虎或有石虎记载的已有乾、定、泰、崇、景、简5陵。

西神门　位于高家窑村东约350米处。何正璜文中记载如下：

> 门阙土基及石狮一对均尚存。石狮位于门阙内约19公尺处，两狮相距14公尺，外向蹲踞于双层石座上，唯石座已半没地下。高约2公尺，长亦如此。胸下前足部宽约1公尺，雕工颇粗劣，且全体比例不相称，显示唐代艺术之末期风格。二门阙土基每边约27公尺，高仅及半，下方上圆，成钝圆锥状，两基相距约62公尺。

刘庆柱文中记载同以上情景。2013年3月27日踏勘时，双阙阙台保存较好，阙内双狮受南神门石狮被盗的影响已迁富平文庙。2016年5月21日，再次踏勘时，看到在石狮原位置处，置新雕石狮两只。

靖　陵

文德元年（888）三月，唐朝第18位皇帝李儇崩于太极宫武德殿，年二十七。谥惠圣恭安孝皇帝，庙号僖宗。在今乾县南陵村西北方向为其堆土为冢营建陵寝。同年十月葬僖宗于靖陵。靖陵距乾陵五里、隔豹谷相望，区区一谷就隔开大唐近300年的盛世兴衰。

鹊台和乳台　刘庆柱文中记载，仅存乳台双阙阙台遗址，距南神门遗址325米。现今踏勘所见同此。

神道石刻　刘庆柱文中记载，神道石刻保存情况为；

> 石望柱、翼马、仗马和石人，均残，东西间距60米。石望柱位于乳台阙址北24米，东列残、西列佚。翼马位于石望柱北26米，存西列且残。仗马现存3（东2西1），东列南数第一个在石望柱北44米，第二个在第一个北105米；西列仗马残毁甚烈，在翼马北。石人现存2，东西各1，东列石人在陵台南400米、仗马北12米；西列石人在陵台南312米。

2016年2月12日踏勘所见同其记录有以下两点不同，其一为西列石柱已出土且扶立。其二为西列又出土1匹残缺仗马。2016年6月5日，再次踏勘靖陵神道，看到又新出土仗马、文官石人、藩酋和石狮各一，现今神道石刻的保存情况为：东列由南至北存有石柱（原本柱头缺失，现部分柱头出土，置于柱顶端）、仗马2（仅存残躯）、石人（无头）、石人（新出土、

无头）、石狮（新出土、置于神道北侧、头西向）；西列由南至北有石柱、翼马（仅存残躯）、仗马3（均不同程度残缺，其中南起第1匹为新出土）、石人（无头）、藩酋（新出土、无头）、石狮（置于神道北侧、仅存残块、头东向）。



图31　2013年3月拍摄，修复前的靖陵神道东列石柱

神门遗址　现今情况如刘庆柱文中所述，南神门毕沅所立“唐僖宗靖陵”碑尚有保存，双狮残缺严重，如前文所述，已被置于神道石刻序列。仅东神门存双阙阙台，高不足2米。其他门阙遗迹地表无存。

1994年考古部门对靖陵进行抢救性发掘，考古挖掘发现，靖陵由斜坡阶梯形墓道、拱形甬道和土洞墓室组成。全长44.7米，墓道长35.6米、底部宽2.7米，甬道长4.1米、宽2.2～2.5米，两壁各有两龛。墓室深19.2米，东西宽5.78米、南北长4.5米，东、西、南三壁共有8个龛。棺床用石碑、石块和砖砌成，其中使用了乾陵陪葬墓礼部尚书、左仆射豆卢钦望和中书令、户部尚书杨再思的墓碑，让人唏嘘不已[①]。

纵览关中唐陵百多年来的变化，其石刻被破坏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一为“文革”时期，其中尤以富平县的唐中宗定陵遭破坏最为惨烈，章、元二陵次之。二为改革开放之后，宵小将邪恶的目光转向了唐陵。现有报道的就计石狮二只、石人头数枚被盗，至今渺无音讯。受盗窃之影响，不少石刻被迫迁移原处，仅石狮就达十余只之多，此举虽属无奈，但多少也是对唐陵原有风貌的破坏。喜的是随着对文物保护的日趋重视，唐陵受损的事件也日趋减少，在踏勘时看到很多唐陵附近都已成立了文保所，监控设备也日渐增多。尤其是2016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16字文物保护方针，我们相信保护唐陵的工作也将更加积极有效。

① 咸阳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咸阳市文物志》，三秦出版社，第74页。

编后记

《陕西帝王陵墓志》（以下简称“帝陵志”）是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委托西北大学编纂的一部陕西地情丛书。2012 年 11 月 22 日，帝陵志课题组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就编纂帝陵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题组成员构成、编写进度，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等进行讨论。主编徐卫民与大家就志书的名称、编写进度、志书规模、编写模式等问题达成共识。考虑到陕西帝王陵的资料完整性以及炎黄二帝在中国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所以，将陕西的王陵、号墓为陵者，以及省级重点保护的王陵也纳入编写范围，这样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多资料，也便于读者了解陕西帝王陵的整体情况。

会议决定课题组具体分工如下：概述和先秦时期帝王陵由徐卫民撰写；秦代帝王陵由丁晓雯撰写；汉代帝王陵由王社教撰写，其中汉陵概述由王社教撰稿，第一、二、三、四、五、六、七节由刘菊撰写初稿，第八、九、十、十一节和太上皇陵由张宇娟撰写初稿，汪燕平校改补充，最后由王社教统稿；十六国北朝帝王陵由王世平撰写；隋代帝王陵由贾志刚撰写；唐代帝王陵由王双怀撰写；明代秦藩王陵由肖健一撰写；全书由徐卫民统稿。

2013 年 4 月 16 日在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举行了帝陵志课题项目签约仪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史天社，西北大学社科处处长刘丰、文化遗产学院院长陈洪海，课题负责人徐卫民和课题组其他成员参加。

至此，帝陵志课题的研究与撰写就正式启动。经过反复的酝酿、讨论、切磋。2013 年 6 月 27 日，课题组召开编撰会议。确定各陵墓分章记述，每章大体分为七部分：第一节，概述；第二节，墓主生平；第三节，陵墓营建始末（包括遗址所在地、修建方法、基本结构、陪葬墓、入葬时间等）；第四节，陵墓的演变（包括近代以前的保护措施、祭祀状况、后代的演变）；第五节，考古调查与研究（包括研究成果）；第六节，遗迹与遗存（分类介绍遗物在哪里）；第七节，目前保护现状（包括近代以来的保存现状、保护单位、保护法规、保护措施等）。具体到每个陵墓特点时，内容、结构可略有变化。

2013 年 8 月 12 日，帝陵志编纂工作座谈会在西北大学召开。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吴玉莲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等帝陵志课题组成员参加座谈。徐卫民就编纂工作的组织协调、资料收集和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现有志稿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其他课题组成员简要介绍了志稿的编纂过程。省地方志办公室干部肖成刚、郑茂良先后从体例、文风、记述重点、资料使用等方面对志稿提出修订意见。

2014 年 8 月，帝陵志编纂工作引起全国各大媒体普遍关注。8 月 22 日，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在其编辑的《每日要情》中作了专题介绍。8 月 25 日，《西安晚报》刊登了一则报道帝陵志编纂工作的消息，引起了陕西宣传网、华商网、陕西传媒网、三秦网、新西部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新华报业网、凤凰网、网易、中国经济网、新浪网、大西北网、中国文化传媒网、中国新闻网、中国城市经济网、中国日报网、中国广播网、央广网、光明网、中国台湾网、东方网、

新民网、华龙网等 30 余家省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媒体认为，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时间最长的省份，帝王陵墓也分布最多；陕西具有独特的帝王陵墓文化景观，其历史价值和独特性在中国帝王陵墓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帝陵志的编纂整合了帝王陵墓发掘研究资料，彰显了陕西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有助于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建设。

2014 年 8 月课题组成员交稿，主编徐卫民开始统稿，至 2015 年 4 月向省地方志办公室提交初稿。2015 年 5 月 7 日，帝陵志初审会在西北大学召开。著名考古专家焦南峰、张建林负责审定。会后徐卫民代表课题组又进行了几个月的修改，于当年 10 月份交省地方志办公室。

2015 年 11 月 30 日，帝陵志终审会在西安召开。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锦春，副主任秦向东、史天社、吴玉莲及省志处人员，徐卫民等课题组成员共 16 人参加会议。会上，徐卫民从课题立项、篇目设置、凡例拟定、资料收集、内容撰写等方面介绍了志稿编纂过程，并对初审稿的修改情况进行说明。审稿人焦南峰、张建林、肖成刚、郑茂良先后发表审读意见。王锦春代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宣布帝陵志通过终审。会后徐卫民针对各位专家提出的意见，按照地方志的体例等要求，对整个稿件进行修改、增删，完成终审后的修订工作。期间，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处长李川、年鉴编辑部负责人郑茂良多次赴实地踏勘，又增补大量历史、实拍图片，修正各陵墓文物实存状况的记述，对于提高本书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7 年 10 月，在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秦向东的支持下，付梓出版帝陵志。

在志书编写与出版的过程中，课题组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陕西省

地方志办公室保障了经费，做好了业务指导审定工作。陕西省委宣传部社会科学规划处支持列为陕西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志参考引用的学术成果未作一一列名；提供图片者，除课题组成员徐卫民、贾志刚、王双怀、王世平、肖健一外，还有张建林、岳起、郭燕、张军朝、于春雷、霍彦儒、方丹、姜淼等也未能全部署名，只是以“课题组供稿”名义记之。特向所有付出心血和提供帮助的专家学者们致谢！

编　者

2017 年 9 月